

**本书根据伦敦一九七八年  
Verso 英文版 Late Capitalism 译出**

《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资料译丛》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主编的一套资料丛书。这套丛书将选译外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有关的历史文献、正反面人物的文章和专著以及其它背景材料，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参考。

---

## 选编者的话

五十年代末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次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科学技术革命。这个革命使资本主义的工农业生产获得了猛烈的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引起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某些变化，引起了社会阶级结构的某些变化，引起了工人阶级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某些变化。这个发展变化给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世界各国学者纷纷以各自的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变化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比利时学者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所写《晚期资本主义》一书就是其中一种观点的代表作。我们的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去正确地阐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同时又需要根据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变化的实际材料去发展马克思主义，探讨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规律性。翻译出版这本书就是为了给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同志们提供参考。

1981年10月

---

## 译者的话

比利时学者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氏所著《晚期资本主义》一书，原文系德文，题为《Der Spätkapitalismus》（一九七二年出版）。我们是根据一九七八年 Verso 英文版译出的。英译者是 Joris De Bres。

曼德尔氏在这里试图说明自从马克思逝世以来某些学者为什么没能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的原因。然后，曼德尔氏描述了各阶段各种不同类型剩余价值和世界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理论。

曼德尔氏也论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种种特征，并论述了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从法西斯上台到美国英国战争经济出现的最近一次经济扩张的长波，以及一九四七——一九七二年出现的“经济繁荣”。

曼德尔氏还论述了一些其他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资本主义发展的参考。

1981年10月

---

## 目 录

导 言 .....	( 1 )
第 一 章 运动规律和资本历史 .....	( 7 )
第 二 章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结构 .....	( 45 )
第 三 章 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剩余利润的 三个主要来源 .....	( 82 )
第 四 章 资本主义历史中的“长波” .....	(121)
第 五 章 晚期资本主义的资本增值、阶级 斗争和剩余价值率 .....	(167)
第 六 章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特性 .....	(212)
第 七 章 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和对公司计划 及经济规划的压力 .....	(259)
第 八 章 技术革新的加速 .....	(289)
第 九 章 持久的军火经济与晚期资本主义 .....	(320)
第 十 章 资本的国际积聚和集中 .....	(363)
第十一章 新殖民主义与不等价交换 .....	(404)
第十二章 服务部门的发展、“消费社会”和 剩余价值的实现 .....	(444)
第十三章 持久的通货膨胀 .....	(481)
第十四章 晚期资本主义的工业循环 .....	(519)
第十五章 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 .....	(561)
第十六章 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意识形态 .....	(592)
第十七章 晚期资本主义概说 .....	(619)
第十八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危机 .....	(665)

## 导 言

本书的中心目的之一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长期迅速发展的原因，这种迅速发展曾使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感到吃惊；与此同时，还要证实这一时期固有的限制，这种限制保证，随着这种迅速发展而来的，将是世界资本主义另一次日趋高涨的社会经济危机浪潮，其特点是总增长率低得多。在本书于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二年首次以德文本出版的时候，其基本主题在很多读者看来，从经验方面来讲仍然是尚待证明的，或者说是疑信参半的，而且，读者都以广泛的怀疑态度来对待本书的主题——尽管自一九六七年以来，国际货币制度已经有了一些崩溃的征兆，而且，在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爆炸。到今天，说战后经济发展关键性的转折点是在我们身后，而不是在我们面前，说那个“长期繁荣”已经成为过去的事物，这很少有人表示怀疑了。相信在“混合经济”中有永久性的高速发展和充分就业，这已证明是一种神话。本书试图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内来解释上述情况为什么必然会是如此，并说明战后资本主义实际动力的后果会是怎样的。

在对《晚期资本主义》的英文版进行修订的时候，我们尽量不把那些广泛的新材料编进书里，以表明我们原来的论据所证实了的内容。我们已经修改了或澄清了一些次要的公式，并加进了有关的最新统计数字。所有进一步的说明，将留待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现状的一般矛盾和长远趋势的国际辩论中去论述，这种辩论正在进行。为了理解世界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些

新的假设。这些假设的论据是否充分和合理，只有历史才能作出判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害怕历史的判决。

由于本书的基本目的是要对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提供一种解释，以便使“总的资本”的运动规律能与“多种资本”的具体的、现象方面的形式相调和。不论是只限于对后者的分析也好，或是从前者直接加以推论也好，所有的尝试都没有方法学上的正当理由，或实际成功的希望。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情况是很清楚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政权和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世界贸易具体的和多变的结构，以及剩余利润的主要形式，所有这些，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各个连续历史阶段以及晚期资本主义本身的现貌所作的任何叙述中，都需要包括在内。为了设法达到上述这些目标，本书所采用的一种结构，与马克思写《资本论》时原定的计划不无关系——那也就是说，它论述了总的资本；竞争；信用；分成资本；土地产业；工资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其结尾部分，马克思把世界经济危机包括在内）。但是，我并没有按照这一计划的每一节来写，当然，马克思《资本论》的最后版本本身，也大大偏离了这一计划。

《晚期资本主义》的前四章，安排了本书的总的轮廓。这四章分别论述了初步的方法问题（第一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其种种内部矛盾之间的关系，和适应其需要的社会地理背景的形成——即世界市场（第二章和第三章）；资本主义技术发展与资本增值之间的关系（第三章和第四章）。读者如果对理论问题不那么精通，或不那么感兴趣，就可以略去第一章，或者把第一章置于本书的末尾。

接下去的分析性的九章是按照逻辑历史的顺序来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面貌：晚期资本主义最初的起点——资本增值方面

各种条件的根本改进，这是由于工人阶级在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情况下遭遇了种种历史性的挫折而造成的结果(第五章)；晚期资本主义通过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随后发展(第六章)；晚期资本主义那作为资本发展新阶段的特点——固定资本生命周期的缩短、技术发明的加速（在资本主义晚期，技术发明的租金成了垄断性剩余利润的主要形式）、永久性重整军备对剩余资本的吸收（第七、八、九三章）；晚期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的特殊关系——资本在国际间的积聚和集中，这产生出作为资本表面主要形式的多国合作，也产生出以平均劳动生产率不同水平而生产商品的国与国之间的外汇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控制着国际贸易（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晚期资本主义实现问题的新形式和“解决办法”——永久性的通货膨胀和典型的晚期资本主义贸易周期，这种贸易周期在通货膨胀的标志下把一种古典的工业周期与信用扩张和信用收缩的“反周期”结合在一起了（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

最后的五章相对而言是综合的性质。这五章是想把前面的分析结果综合在一起，并且试图说明这样一些方式，在这些方式中，资本的基本运动规律和固有的矛盾不仅仍在继续起作用，而且实际上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它们得到了最极端的发挥（第十四章至十八章）。

在这里，需要提出两点警告。第一点，所谓“晚期资本主义”，决不是暗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已经有了变化，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分析发现成为过时。正如列宁只能在《资本论》的基础上来发展他对帝国主义的论述，以证明控制着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过程的一般规律。因此，我们在今天也只能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基础上来试对晚期资本主义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

展的新时期。它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就广义言之，列宁所列举的帝国主义时期的各种特点，对晚期资本主义都仍然完全适用。

第二点，我们必须表示十分遗憾，因为我们未能对这一历史时期提出一个比“晚期资本主义”更恰当的术语——我们对这一术语之所以感到不满意，是因为它是按年代而言的，不是综合而成的。在本书的第十六章里，对于这个术语为什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仍很适用，我们作了解释。这一术语与“新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相比的话，其优越性是很明显的——后者的含意模棱两可，既可以解释为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有基本的连续性，也可以解释为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没有连续性。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从讨论中会为我们产生出一个更好的综合性的术语来。在此期间，我们仍然保留“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我们觉得，这是可以想出的最有用的一个术语，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信，真正重要的不是个命名问题，而是对我们时代所发生的历史发展作出解释。

《晚期资本主义》一书要试图解释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发现的那种就资本主义基本运动规律而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战后历史。换句话说，这部书想说明的就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抽象的”运动规律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部开展的“具体的”历史中，仍然在起作用并可加以证实。因此，它与当前社会经济思想中的两种基本趋向是直接相冲突的。它不接受那些人的假设，不论那些人是学院派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那些人相信，新凯恩斯派方法、国家干预、垄断势力、公私“计划”、或任一个个别作者或个别学派所主张的上列项目的任何一种联合形式，能使资本的长期运动规律中立或使之取消。在另一方面，它也不接受对立面的（但在实际上是相反的）论点，这种论点认为，经济方面的这些运动规律是十分“抽象”的，以致在“真正的历史”中，这些

规律根本不能自我表现出来，因此，经济学家的唯一作用就是说明这些规律是如何和为何被歪曲或者在其实际发展中被一些意外因素弄得偏离了正道——而不是去说明在一些具体的、可见的过程中，它们是如何被表明并被证实的。

马克思经济学新近的复兴（这在前些时候我们曾预言过），是近些年来特别令人满意的现象。但是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学者和工人中的青年一代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去历史的重新运用，是一件困难的、强求的工作。这对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读者来说，尤其如此，对这些人来说，本书所讨论的某些经典的权威——例如在第一章和第四章中所讨论的——也许其中大部分他们都不知道。提到一九三九年以前的那些“较早的”辩论，无论怎样说那决不只是一个虔敬或者博学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些大论战，都是与资产阶级社会各种基本矛盾和长期趋势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的关键性问题，直接相关联的。这些问题在今天，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摆在我们面前。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最终几乎使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争全盛期初期的所有理论家都一言不发了。但是，他们镇压不住他们那些知识分子后代。如果不能适当地恢复这份遗产，要想解决当前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那会是困难得多的。

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恢复，正好与新李嘉图学派对“新古典”边缘学派的攻击相合拍，这种攻击是在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的鼓励下，由所谓剑桥学派领导的。只要劳动价值学说得到任何恢复，即使是按前马克思的说法，也是值得欢迎的，而我们自己就一直深信，在新李嘉图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是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综合的。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来保卫马克思超越李嘉图而完成的那些决定性的进展，而新李嘉图学派的理论家们现在正在想方设法来取消这些进展。本书并不想

来论述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只在这一点方面除外：在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过程中军火生产的功用这个特殊问题方面——换句话说，就是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这个问题。这一点将在第九章中加以扼要论述。

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我感到最大的困难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时代与我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最亲密的政治经济学家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在我动手写作本书之前就作古了。因此，对我们共同讨论的回忆和对他那伟大的遗著《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过程》的研究，必然会尽可能地成为这位天才理论家那些建设性评论的代替物。

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科学系的社会主义者学生们和助理讲师们邀请我为一九七〇—七一年度冬季学期的客座教授，他们提供了一种“外部压力”——这种压力往往对一个作者是很必要的——他们劝我把我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观点以系统的形式加以综述，我的那些观点就以现在这种形式提了出来。他们还给我提供了为这一目的所需要的空闲时间。

所以，我把这部著作献给我已故的朋友和同志罗曼·罗斯多尔斯基，他协助建立了西乌克兰的共产党并且是该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他协助在西乌克兰开创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他在他的整个一生中始终忠于解放工人阶级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并且在我们这动荡世纪最黑暗的岁月里，他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连续性；我还要把这部著作献给西柏林自由大学的社会主义者学生们和助理讲师们，他们那种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智慧，将会保持并发扬这种传统。

## 第一章

### 运动规律和资本历史

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的一般运动规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一个最为复杂的问题。这种关系一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阐述，这一事实可以说明其难度。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发现，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分析的产物，重复这一点已成为老生常谈了：“例如十七世纪底经济学家们总是从活泼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多数国家等等着手的；但在他们结束时，总是通过分析而找到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一旦或多或少地确定了并抽象出这些个别的因素，也就开始了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简单事物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个经济体系。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所以是具体的，因为它是许多规定底概括，因而是多种多样事物底统一体。因此，在思维中，具体表现为概括底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底起点。在第一种方法里，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种方法里，抽象的规定在思维底道路上复制为具体的事物。黑格尔所以陷于错觉，是因为他把实在事物理解为在自身中自我概括、在自身中自我深化并且自动运动的思维底结果；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掌握具体、把它复制为一种精神的具体的思维方式。”〔1〕

但是，把马克思的方法说成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进程”，那是无视了其中的丰富内容。首先，这种误解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马克思看来，具体既是“真正的起点”，也是知识的最终目标，马克思把这看作一个积极的、实践的过程；是“思维过程中具体的复现”。其次，这种误解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就像列宁说过的那样，从抽象到具体的进程必须以从具体到抽象的进程为先导。<sup>〔2〕</sup>因为，抽象本身已经是前此的分析工作的结果，这种分析工作已经试图把具体分离成为种种的“决定性的关系”。第三，这一错误破坏了分析和综合这两个过程的统一。抽象结果只有在它能够成功地再现具体中所有的“形形色色的因素的统一”时，才是真实的。黑格尔说，只有整体是真实的，而整体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是对立的统一，不是抽象和具体的一致。第四，具体总和的成功的再现只有应用于实践中，才能变为结论性的。这就意味着——正如列宁所明确地强调的——“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进行检验”<sup>〔3〕</sup>。

可是反过来，“最简单的抽象概念”（范畴）也不单单是“纯理解”的产物，而是实际历史发展初始的反映：“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达的整体底主导关系或一个比较发达的整体底从属关系；这些从属关系，当整体向在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中所表现的方面发展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历史之上了。就这种意义来说，从最简单的事物上升到复杂事物这种抽象的思维过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sup>〔4〕</sup>所以，再引一段列宁的话以说明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两种分析：演绎的和归纳的——逻辑的和历史的。”<sup>〔5〕</sup>它代表这两种方法的统一。在这里，“归纳法的”分析只能是“历史的归纳”，因为马克思认为每一重关系都要由历史来决定，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包含着理论与经验历史事实的统一。<sup>〔6〕</sup>

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经说过，正因为本质与外貌不是直接一致的，科学才是必要的。<sup>〔7〕</sup>马克思并不认为科学的任务只是去发现被其外表弄模糊了的那些关系的本质，而是对这些外表本身进行解释。换句话说，科学的任务是去发现使得本质与外貌在一个统一体中再一次重新结合的那些中间环节。<sup>〔8〕</sup>如果这种结合没有发生，那么，理论就降而成了与经验现实毫无关系的抽象“模式”的纯理论建设，而且，辩证法也就从唯物主义退回到了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分析与唯心主义辩证法是不相一致的，但与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致的；其所研究的是用经验可以证实的那些因素。”<sup>〔9〕</sup>奥图·莫尔夫 (Otto Morf) 曾正确地指出：“在同一的和对立的两重性的统一体中，本质和外表之间的中介所出现的过程，一定是一个辩证的过程。”<sup>〔10〕</sup>

此外，毫无疑问，马克思认为，经验上对物质的占有应当先于认识的分析过程，正象实践的、经验的检验应当能推导出这种过程那样——也就是，把它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说：“当然，叙述的方法，必须在形式上同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方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不过，这层一经作到，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象是处理一个先验的结构了。”<sup>〔11〕</sup>比这再早几年，恩格斯也说了与此很相近的话，他说：“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sup>〔12〕</sup>马克思自己在给库格爾曼 (Kugelmann) 的一封信中也再一次重复了这一论点：“朗格极其天真地说，我在经验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一种处理材料的

方法——即辩证方法——的描述而已。……”〔13〕

因此，卡列尔·科西克(Karel Kosik)正确地强调说：“从抽象到具体的进程，最初往往是一种抽象的运动：其辩证法包含着对这种抽象性的克服。所以，广义地说来，这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从部分到整体，又从整体到部分，从外表到本质，又从本质到外表，从总额到矛盾，又从矛盾到总额，从客观到主观，又从主观到客观。”〔14〕 综而言之，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我们可以总结为六点，这六点可大致分述如下：

1. 深入地占有经验方面的材料并精通这种材料（外表）在历史上所有的有关细节；

2. 分析这种材料并划分其组成的抽象因素（从具体到抽象的进程）；〔15〕

3. 探索这些因素之间有决定意义的一般联系，这些联系说明这种材料的抽象的运动规律，换句话说，就是说明其本质；

4. 发现有决定性意义的中间环节，这种中间环节对材料的本质与外表之间的媒介是有影响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进程，或者具体作为多种决定联合体在思维中的再现）；

5. 在具体历史的发展运动中对分析（上面第2、3、4条）从实践和经验方面的证实；

6. 在无比复杂的现实中，通过对知识以及以知识为基础的实践的运用来发现新的、在经验方面有关的资料和新的联系——甚至往往是新的、抽象的、基本的决定。〔16〕

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认识过程中严格区分的各个阶段，因为，这些要素中有些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其间不可避免地会有互相沟通的地方。因之，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方法较之“连续具体化”过程或者学术科学中典型的“近似法”过程要丰富得多。“由于个别的、特殊的外貌在这里只是被从表面消除掉或重新介

绍了，换句话说，没有任何辩证的中介，那么，幻象很容易就会产生，抽象和具体之间并没有实质的桥梁存在。因此，可以完全合乎逻辑地相信，理论模式实际上（虽然是以一种简单化的形式）包含了在探索中的具体课题的一切实质因素——比如说，这正象从一个很高的高处拍摄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表示出了这片风景中所有的基本要素，尽管所能见到的一切只是一些山脉、大河或者森林。”〔17〕庸俗唯物主义的简单化方法——根据这种方法个别事物的具体特征消失了——与唯物辩证法本身之间的差别一下子变得明显了。〔18〕金德里契·柴林尼（Jindrich Zeleny）正确地强调指出，现实在理智上的再现，或者用阿萨塞尔（Althusser）的说法“理论上的实践”，必须与实际的历史发展保持经常的联系：“在马克思的整个的《资本论》中，抽象辩证发展与历史具体物质现实之间的持续不断摆动，随处可见。但是，与此同时还必须强调指出，马克思的分析一再离开历史现实的表面进程，以便对这一现实必要的内在关系作出理想的说明。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抓住历史现实，就是因为他以一种真正资本主义关系的理想的、典型的内部组织形式科学地反映了这种历史现实。他并没有使他自己离开这种关系以便与历史现实保持一个距离，他也没有象唯心主义者那样逃离开历史现实。他离开的目的，是为了紧紧地、合理地占有现实。”〔19〕

在这里，与阿萨塞尔及其学派的观点有一个明显的对比。上面提出的那些原则并没有给马克思主义以“赋与历史意义”而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或争辩说，《资本论》的特殊课题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构和规律——也不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可是，它们断言，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关系也是真正历史与这种历史过程理智上的再现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还断言，这种辩证关系决不能只局限于“理论生产”的水平之上。马克思的观

念与阿萨塞尔的观念之间的差别，最明显地表现在马克思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在这里，马克思明白地宣称：“De prince aboard [首先]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20〕另一方面，阿萨塞尔说：“马克思在知识概念的‘形式的发展’与具体历史中真实范畴的发展之间，小心翼翼地作出了基本的差别，我们忽视了这种基本差别，这把我们引向了知识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引向了在《资本论》本身之中对逻辑事物和历史事物的识别。几乎不会使我们惊奇的是，那么多的解说家都团团地围绕着这一定义问题，在《资本论》中，所有有关逻辑和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是真的都预先假定了一种不存在的关系。”〔21〕

这样，阿萨塞尔就只是同意了经济理论与历史理论之间的一种关系；相比之下经济理论与具体历史之间的关系被称作“虚假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和“想像的”。看来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不仅与马克思本人对他的方法的解释相矛盾，而且想在“知识的客体”与“真实的客体”之间建立一种基本的二元论，以逃避经验主义及其知识理论的幽灵——这种幽灵是他自己的创造——这种企图不可避免地有跌入唯心主义之危险。〔22〕

对理论和历史这样一种重新统一的需要，有时会引起争论，争论的原因是，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特性，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都恰恰排除只有经验事实的任何种统一。据争辩，就广义的历史而言，运动规律只是一些“趋势”。因此，运动规律被认为排除了在短期或者中期中与暂时事件有任何因果联系的可能性，即使在长期中，也被认为不能以物质上统一的、经验方面的方式来加以说明。据进一步认为，这些趋势中的每一个都

可以引致一种反趋势，这种反趋势可以在一个相当时期内抵销其自身的影响。<sup>[23]</sup>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三、十四和十五章中对于利润率趋势的论述，一直被当作趋势和反趋势的经典例证在极为广泛地引用，这种趋势和反趋势据说对最后结果是无所谓的。

于是，从这种情况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发展规律几乎不可能有经验方面的“证据”。的确，据认为，企图探究这种“经验方面的证据”暴露了对马克思的方法和意图的基本的、“实证主义的”误解，因为抽象化的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即“纯”生产方式方面和“具体”历史过程方面，是互相排斥的，实际上在任何地方它们也不靠拢在一起。

不难证明，马克思本人无论如何是明确而又坚决地拒绝在理论分析与经验资料之间的这种有全面性质的鸿沟的。因为，这种分离的真正含意是从唯物主义辩证法向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一种重大的倒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趋势”并不能唯物地和从经验方面来说明其自身，“趋势”根本就不是一种趋势。它是虚假意识的产物，或者对不喜欢那个词汇的人来说，是科学错误的产物。此外，在历史过程中，“趋势”并不能导向任何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干预。一旦“发展规律”被认为过于抽象而不再能够说明具体历史的实际过程的时候，那么，这些发展趋势的发现就不再是这种过程的革命变化的一种工具了。剩下的只不过是纯理论社会经济哲学的一种退化了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发展规律”象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一样，模模糊糊地存在着——人们的手指尖总是触摸不到。在这样建造起来的制度下，抽象化真正成了“空虚的”，或者象恩格斯那更为尖锐的说法——只是一个词汇而已。正是由于这个原故，对于在理论与历史之间或理论与经验资料之间的中间统一的拒绝，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总是与对马克思

主义原则的修正关联在一起——或是与机械宿命主义决定论关联在一起，或是与纯唯意志论关联在一起。理论与历史不能够重新统一，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理论与实践的不能够重新统一。

于是，彼得·杰夫利斯 (Peter Jeffries) 责备我们试图从经验方面来证实马克思的各种范畴，而他则宣称，这些范畴例如资本、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等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从经验而言根本未曾出现。但是，有没有一种中间媒介使我们把表面现象（在一个特定时期中商品的利润、生产价格和平均价格）以数量关系与马克思的基本范畴相联结起来呢？不论怎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肯定认为是如此的。<sup>[24]</sup>杰夫利斯之跌入唯心主义辩证法是由于这样一些事实：他迫使具体只是倒向了外表，<sup>[25]</sup>他不曾了解本质以及其与外表的中间媒介，形成了抽象与具体因素的一个统一体，他也不了解辩证法所表明的，引用黑格尔的说法，“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宇宙，而且还有一个拥有特殊财富的宇宙。”<sup>[26]</sup>因此，他也不会理解下面恩格斯的看法：“在交换之初，当生产物逐渐变为商品的时候，交换大致是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的。在数量上比较两个物品的价值的唯一标准，是花费在它们上面的劳动。因此，那时价值曾经有其直接的、现实的存在。我们知道，在交换中，价值的这种直接存在就停止了，现在就不再有它了。而我认为，对您说来，不用费什么事就能看出（起码是大致看出）那些将上述直接的、现实的价值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的价值的中间环节，后一种价值隐藏得很深，以致我们的经济学家能够满不在乎地否认它的存在。对这个过程作出真正历史的解释，当然要求认真的研究课题，而为此花费的全部心血将换来丰硕的成果，这样的解释也将是对《资本论》的宝贵补充。”<sup>[27]</sup>

所以，要解决的这个双重问题，可以更精确地说明如下：

1.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历史是怎样

被说成是这一生产方式各种内在矛盾的展开来的发展史，换句话说，怎样作为最后一招而被其“抽象的”运动规律所决定的呢？在这里，这种分析的抽象和具体因素之间的统一是由什么“中间环节”来形成的呢？

2. 过去一百年的实际历史怎样会被追踪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句话说，扩大资本的联合和它已经征服了的前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领域的外貌是怎样分析的，它们的本质又是怎样说明的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在真空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结构的特点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在西欧、东欧，在亚洲大陆、北美洲、拉丁美洲和日本。<sup>[28]</sup>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从这些不同的区域中出现的，并且以它们那复杂的统一（连同非洲和大洋洲的种种社会）构成了“具体的”资本主义。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和比例，组成了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生产方式的联合体，或者更精确地说，组成了各种各样过去的和现在生产方式的各种连续阶段的联合体。<sup>[29]</sup>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有机统一面对着整个体系所共有的资本主义特点的首要地位，决不会把这种联合体——它在每一方面都是特殊的——降低到次等重要因素的地位。恰恰相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确有一种功能，这个功能就是使不平等的和联合发展的规律普遍有效。<sup>[30]</sup>本书下文对帝国主义现象的更彻底的分析，将会证实这一点，在这里，我们只是作个预测。

如果没有非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在世界上已经起过的和仍在发挥的作用，那么，就几乎不可能彻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每个连续步骤的特征——比如从滑铁卢(Waterloo)到

色当 (Sedan) 那种自由竞争的英国式资本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的那种帝国主义的古典时期以及目前晚期的资本主义。

为什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 和《资本论》中运用得那么纯熟的理论与历史的结合此后从来没有成功地重复过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连续阶段呢? 为什么至今仍没有一部令人满意的资本主义历史以作为资本内部规律的一种功能——以及上面提出的所有条件呢? 为什么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显然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历史的新阶段迄今还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说明呢?

这种明显的意识落后于现实的状况至少说部分地归因于理论上的暂时麻痹, 这种麻痹是由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强辩滥用造成的, 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在四分之一世纪期间把马克思主义方法本来可以自由发展的地域, 缩小到了最低限度。这种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影响, 时至今日仍远远没有消除。但是, 除了阻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二十世纪有任何满意发展的那些当时的社会压力之外,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还有一种内在的逻辑, 在我们看来, 这种内在逻辑至少说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作出了那么多重要的努力都没有达到目的。在这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这种内在逻辑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强调。一个是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分析工具, 另一个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分析方法。

象在《资本论》中那样,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来解释这一生产方式的特殊方面——或从这些方面产生的特殊问题——所作的全部努力, 其起点几乎都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用的那种再生产计划。在我们看来, 马克思所发展了的那些再生产计划不适于用作这个目的, 而且在探索资本的运动规律或资本主义的历史中也不能使用。因此, 要想从这些计划中推断出

“纯”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可能性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致命的垮台，不可避免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或者晚期资本主义的本质，作出任何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 (Roman Rosdolsky) 在他的重要著作《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已经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简略地概述一下他的论据。<sup>[31]</sup>它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的学生们作了四次最出色的努力来使理论与历史再结合，都没有取得成功。这四次努力是由鲁多尔夫·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亨利克·格罗斯曼 (Henryk Grossmann) 和尼古莱·布哈林 (Nikolai Bukharin) 四人作出的。奥图·鲍威尔 (Otto Bauer) 用去了他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试验这同一个问题，他作的那些连续努力也一样，对这个问题没有获得任何满意的答案。

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在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起着一种严格限制的、特殊的作用，而这种计划是为了解决一个单一的问题而设计的，再无其他。这种计划的功能是用来解释一个以“纯”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在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中，经济生活似乎是取决于数以百万计的、互不相关的买和卖的決定），为什么和怎么样不走向持续的混乱和再生产社会、经济过程的永久障碍，而总的说来却是在“正常地”起着作用——那就是以每七年或者十年（在马克思的时代）爆发一次的经济危机为形式的一种大崩溃。或者换一个说法：一个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制度，它只是为了利润而发生作用，并把它所生产的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看作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物，这样一种制度怎么会能保证再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因素呢，而这种再生产过程恰恰是由这种物质因素的特殊使用价值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它怎么能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自发地”克服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呢？这

样一来，再生产计划的功能就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完全可能存在的。

马克思为了这个目的使用了许多熟悉的抽象概念。他把所有的公司划分成为两大部类，一类是生产生产手段的(部类 I)，另一类是生产消费品的(部类 II)。社会上所有不得不出卖其劳动力的生产者，也同样划分在这两个领域之中。同样的划分也适用于社会所有的大量的生产手段，不论是固定的(机器、建筑)还是流动的(原料、动力来源、辅助因素)。利用这些分析性工具，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社会生产是处在一种均衡的状态，也就是说，只要他所发明的均衡公式在被奉行，那么，社会的和经济的再生产就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在简单再生产的体系中，这个公式就是  $Iv + Is = IIc$ 。这意思是说，经济的均衡要依靠部类 I 中商品生产是否能在部类 II 中导致一种赚钱的商品需求，在价值方面要能符合这些商品，而这些商品它必须交给部类 II，反之也是如此。从马克思那扩大生产的计划中，可以很容易地推导出同样的平衡公式；据我们所知，最早作出这种公式的是奥图·鲍威尔。<sup>[32]</sup>

马克思为了使他那论据的结构尽可能地精密，他故意从他的计划中除去了这一经济的非资本主义部分。因此，对从事简单商品生产的农民和工匠，他只字未提。但是，制订这样一个计划并不困难，在这个计划中，这些集团可以以另外的组成部分的面貌出现，同时在这个计划中，比如说，他们可以从部类 I 中购买固定的生产手段，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可以向这个部门出售原料和消费品。为了再现马克思的平衡公式，人们可以用简单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消费品的价值来降低部类 II 的产量。

然而很明显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发展不能纳入“平衡”概念之中。宁可说它是一些平衡周期和不平衡周期的辩证

统一，这两种因素中的每一种都可产生其自身的否定。每一次平衡都不可避免地要导向一次不平衡，而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就又使得一次新的、暂时的平衡成为可能。更有进者，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之一：受平衡的破裂所控制的，不但有危机而且也有生产的加速增长，不但有遭受阻碍的再生产，而且还有扩大的再生产。同样不容置疑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导致这样的永恒的不平衡。我们只需举出一个例子：资本有机组成的增长除了能决定别的之外，还能决定部类 I 的增长较部类 II 更为迅速。我们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平衡的破裂，也就是不均衡地发展，是属于资本的本质的，因为它是以竞争为基础的，或者用马克思的说法，它是以“多种资本”的存在为基础的。假如事实是竞争的话，那么，“发财致富的不断冲动”（这是资本的一个特点）就真正是要寻求剩余利润，寻求高出平均利润之上的利润。这种寻求会导致不停的努力来改革技术，使生产成本低于那些竞争对手，以便获得剩余利润以及更大的资本有机组成，与此同时也就提高了剩余价值率。作为一种经济形式，资本主义的一切特点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取得的，这些特点的基础在于其破坏平衡的先天性趋势。这同样的趋势也扎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运动规律之中。

很明显，尽管有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和资本分割成为竞争的个体公司，专门设计来证明经济中周期性平衡的可能性的那些计划，将不能够用作分析性工具来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其本质而言必须导致平衡的周期性破坏，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增长总是必定导致不平衡，正象其本身就往往是这种不平衡的结果那样。因此，现在所需要的是其他一些计划，这些计划从一开头就与这一趋势相结合以便使这两个部类以及与它们相一致的一切，都不平衡地发展。这些更一般的计划应当以这样的方式来

制订，就是说马克思那再生产计划将只是组成一个特殊的例子——正象经济平衡只不过是这种趋势的一个特殊例子，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使这种制度各种各样的成分、部门和因素，都不平衡地发展。

这两大部类中的不平衡的增长率应当与这两大部类中不平衡的利润率相一致。两大部类中的不平衡增长应当在不平衡的积累率和资本有机组成的不平衡的增长速度中表现出来，资本有机组成的这种不平衡增长速度又反过来被这两大部类不平衡的危机冲击弄得周期性地和部分地放慢下来。这些可能就是似乎将使我们把马克思的计划“动力化”的那些因素。（马克思的这些计划对于研究周期性平衡或暂时取代不平衡的各种可能性和变体仍然是重要的工具。）鲁多尔夫·希法亭、罗莎·卢森堡、亨利克·格罗斯曼、尼古莱·布哈林、奥图·鲍威尔等许多人在理论上所作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使用了专门为分析平衡而设计的工具来试图探索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问题，也就是探索已破坏了平衡问题。

鲁多尔夫·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宣称，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不论是简单规模的再生产还是扩大规模的再生产都能不受干扰地进行，只要这些比例还维持着……所以，决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必然在群众消费不足的情况中有其根源，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天性特征……从这些计划本身来看，也不能认为有一种商品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恰恰相反，这些计划所表明的是，生产的任何扩大都是可能的，这与可资利用的生产力的潜力是相一致的。”〔33〕

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打算用他的再生产计划来证实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受干扰的生产”的可能性的这种说法：正好相反，他深深地相信资本主义对危机的天生的敏感性。他决没有把

这一点只是归之于生产的无政府主义；他还把这归之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群众消费的发展之间的差异，他认为这种差异是资本主义的性质中所必不可少的。“直接剥削的条件和这种剥削由以实现的条件，并不是相同的。它们不仅会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开，并且在概念上也会分开。一个只受限制于社会的生产力，另一个却要受限制于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性和社会的消费力。但后者既非由绝对的生产力，也非由绝对的消费力决定，而是由那种建立在对抗性分配关系基础上的消费力决定。这种对抗性分配关系，使社会大多数人的消费，减少到一个只能在相当狭小的限界以内变动的最小限度。并且，消费力还会由积累冲动，由追求资本增大，追求剩余价值生产规模扩大的冲动受到限制。”〔34〕

这样看来，马克思所说的，与希法亭想从再生产计划里所体会出来的意思，恰恰相反。更使人吃惊的是希法亭自己在论述危机和再生产计划时一开头所说的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也是如此，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有一种总的联系，这是所有社会形态都共有的一种天然条件”。他进一步甚至更清楚地说：“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消费关系所提供的狭窄的基础，就是经济危机的总根源，因为，扩大消费的不可能是销售停滞的一般的先决条件。如果消费可以任意扩大的话，生产过剩将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扩大消费就意味着利润率的降低。因为，广大群众的消费扩大，是与工资的提高紧紧连在一起的。”〔35〕尽管有这些正确的见解，希法亭到后来还是被再生产计划错误地引进了以“纯粹”不平衡为基础的一种危机理论中。

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的积累》一书中责难马克思以下面这样的方式设计了他的计划：“不管部类Ⅱ而使部类Ⅰ取得一种较快的扩展，那是完全办不到的。”在几页之后，她宣称这个计划排除了“生产的飞跃扩大”。〔36〕然而，她把再生产计划中的这些明显的矛

盾只是归之于部类Ⅱ所生产出售不掉的消费品，也就是归之于缺乏一个“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出路”，这种出路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的实现所必不可缺少的。实际上，她在这里的批评与上文简述的关于这种计划的目的和功能的误解，是相一致的。这些计划的目的决不是要来说明不顾部类Ⅱ而使部类Ⅰ有一个更快的增长率，这种增长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要来说明“生产的飞跃扩大”，这种扩大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导致破坏平衡。恰恰相反，这些计划的目的是要证明，尽管有这种“飞跃的扩大”，尽管有这种周期性的平衡破坏，要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周期性的平衡，也是可能的。

这就使人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马克思没有为“飞跃的再生产”作好准备。同样明白的是，如果我们无视了关于平衡的这个假说，那么，我们无论如何就没有必要去寻求在“非资本主义购买者”中再生产计划那些“内在矛盾”的解决办法了；在利润率的均等化过程中，在剩余价值从部类Ⅱ向部类Ⅰ的转化中，这一点很是有待于发现的，而利润率均等化之成为必要，是部类Ⅱ中较少的资本有机组成使然的。罗莎·卢森堡本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既是逻辑的解决办法，也是正常历史的解决办法，<sup>〔37〕</sup>但是，她很快就以再生产计划的“内在一致性”为理由拒绝了这一点，她宣称，这种解决办法与马克思制订这种计划时所提出的那些条件不相一致（比如商品以其价值出售）。因此，她没有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增长过程及其发展的愈来愈严重的不平衡性，都并不意味着与这些条件相一致。

对罗莎·卢森堡说来情况是如此，对亨利克·格罗斯曼说来，情况就更是如此。乍一看来，这位作家对再生产计划的功能的理解，较罗莎·卢森堡为强。格罗斯曼在他的著作《积累——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中，他明确地强调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些

计划是以假设状态的平衡为基础推测出来的。但是，这立刻就暴露出，他所指的只是商品的供与求之间的那种平衡，这种平衡会导致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忽略。但在事实上，《资本论》第二卷关于再生产计划的正文中，并没有排除市场价格的这种波动。通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这种波动根本没起什么作用，只是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中才顺便提到了它。

当我们在论述生产价格或利润率的时候来讨论波动，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波动在马克思的体系中要起主导的作用。从这种波动，也就是从对剩余利润的追逐，我们可以对资本家的全部投资和积累活动，有一个基本的解释。这立刻就反过来使我们面对竞争。马克思在试图证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平衡是可能的，这时候，他忽略了竞争，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不但预测了供和求的平衡，也预测了这两个因素即全部资本的平衡发展；与此同时，格罗斯曼把这些同样的预测使用到了他对资本主义向积累、增长和崩溃的发展趋势的探讨中。他并不理解，这样一些预测用来分析这些趋势，那是十分荒谬的，因为这些预测事实上把他所打算分析的给否定了。

顺便说一说，格罗斯曼对再生产计划的处理，与罗莎·卢森堡的处理相对比的话，暴露出他对马克思体系中竞争所起的主要作用的基本误解。格罗斯曼从马克思论述有关竞争外貌的本文中，即竞争与价值问题的关系的本文中引了一段话，然后得出结论说，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的说明中，竞争没有起重要的作用。格罗斯曼不顾下面这一事实而得出了那个结论：他本人从《资本论》第三卷中引用了下面一段话，<sup>[38]</sup>这段话应该更好地教给他并告诉他，资本主义没有竞争就不能发展：“并且，只要资本的形成已经只有在少数成熟的、能由利润量的增大来补救利润率的下降的大资本手中发生，生产的炽烈的火焰就会熄灭。”<sup>[39]</sup>

格罗斯曼在他的论据中使用了奥图·鲍威尔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奥图·鲍威尔一九一三年为了反驳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的积累》而制订出来的。奥图·鲍威尔的计划似乎把资本的发展规律考虑进去了；因为，在这种计划中，资本的有机组成和积累率增长了，而利润率反倒降低了。但是，鲍威尔的计划立刻就否定了它本身的一些设想，因为，随着资本的有机组成的增长，它为那两大部类容纳了同样的剩余价值率和同样的积累率，这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都是站不住脚的。<sup>[40]</sup>于是，这种计划就给格罗斯曼提供了他的“数学根据”：缺乏剩余价值，积累就必然停滞，因为否则的话，对资本家的消费就会增长不足。众所周知，它只在第三十四周期时“停滞”了。如果我们还记得，再生产计划的目的是为了系统地阐述为每隔五年、七年或十年一度的周期性危机所净化了的平衡状态，那么，事情就很明显——恰恰与格罗斯曼自己的意愿相反——他事实上证明了他所想要证明的情况的反面。因为，这一论据的结局是，资本主义在遭到经济崩溃之前，还能存在很多年，如果不是几个世纪的话。

布哈林也是这样，他对卢森堡的批评是以马克思的计划为基础的。他试图构想出一种“市场和危机的总理论”，这种理论也同样是平衡的条件出发，充其量也不过是用“资本主义各种矛盾趋势”的方法达到一种不均衡（努力增加生产，但是压低工资）——并不是资本的内在发展趋势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运动规律。在论述过程中，布哈林看来似乎被马克思的计划中所显露出来的“平衡条件”所着迷，以致他象希法亭那样为他的论题辩解说，如果“无政府主义的生产”消除了的话，就象计划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那样，那么，再生产的危机就不会再有了。<sup>[41]</sup>在这里，布哈林倒霉地引用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的一段话作为他的论据的基础，而这一段话所说的恰恰是其反面。布哈林引用下

面这一段话：“因此，这里假定：(1)是资本主义生产，其中每一个别行业的生产以及这种生产的增加，都不是直接由社会需要调节，由社会需要|| 811 ||控制，而是由各个资本家离开社会需要而支配的生产力调节的；(2) 尽管如此，生产却是这样按比例地进行，好象资本直接由社会根据其需要使用于各个不同的行业。

按照这个自相矛盾的假定，即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社会主义的生产，那么，实际上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42〕

布哈林得意地继续说道：“如果采用计划经济的话，就不会有生产过剩的危机。马克思的思想在这里是很清楚的：对无政府主义的征服，即计划，并不反对去消灭作为一种特殊因素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它被描绘为包含有这种消灭。”〔43〕在这里，布哈林忽略这样的情况：在那些条件中，资本主义生产将是“全部的社会主义生产”，马克思在这些条件中显然包括的不但有个别生产领域之间的均衡，而且还有由社会根据需要直接使用“资本”（也就是，没有商品生产或交换价值，而只有有使用价值的生产）。不论是布哈林所引用的这一段话之前的那段话或是他引用的这段话之后的那段话，都很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看来，在各种各样工业分支部门中，价值创造的均衡增长，并不是实现剩余价值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只有根据社会的需要通过对使用价值生产的适应，在“全部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种种条件下才能得到解决：“其次，如果其它所有资本都按相同的比例积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它们的生产也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即使是这样，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它们需要多用1%的刀，因为他们对刀的需求，既同它们自己产品的增加没有什么联系，也同他们对刀的购买力的增长没有什么联系。”马克思接着说：“此外，在资本积累相等的不同行业内（说资本在不同行业按相等的比例积累，又是一个不妥当的假定），与所用资本的这种增加相应的产品量，是

极不相同的，因为不同行业的生产力，或者说，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与所使用的劳动之比，是大不相同的。这里和那里生产出相同的价值，但是同一价值表现出来的商品量却大不相同。因此，当 A 行业的价值增加 1%，商品量增加 20%，而 B 行业的价值同样增加 1%，但商品量只增加 5% 时，就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 A 的商品量必定在 B 行业找到市场。在这里忽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44〕

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看来，危机的引起，不仅仅是由于工业各个分支中价值的不均衡，而且也是由于交换价值发展与使用价值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是资本的增值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布哈林的国家资本主义中不再有危机发生，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也必须把这第二种类型的“不均衡”加以消除——换句话说，它就不再是资本主义了，因为它不再以资本增值的压力为基础了。它将会克服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

如果我们现在从把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当作工具来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不足之处这儿，移向跟随马克思使用的经济分析法的不足之处那儿，有一个突出的事实会使我们大吃一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发展趋势问题和不可避免要崩溃问题的讨论，进行了半个多世纪，每一个著作家都想试图把这个问题压缩成为一个简单的因素。〔45〕

在罗莎·卢森堡看来，这一因素当然就是实现剩余价值的困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将非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多的领域吸收到资本主义商品流通中来的必要性；后者被看作是唯一的办法，来销售消费品中用其他办法无法售出的那些不可避免的残余品。这一基本机制不但可用来说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而且也可用来说明预先知道的这一制度经济崩溃的不可避免性。〔46〕

在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中，竞争——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是资本的唯一致命弱点。但是，希法亭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无疑是关键性的特征从其全部来龙去脉中提出来，并认为它就是资本主义危机和不平衡的唯一的原因。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引向他后来的那个“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这一概念认为“一般的卡特尔”可以消除危机，也把他引向了拒绝接受资本主义最终经济崩溃这一观念。<sup>[47]</sup>

在奥图·鲍威尔这一方面，他在持续不断地努力去寻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单一的”、最关键的、内在的经济矛盾，这把他相继引向了一系列不同的立场。他的原来观点是认为非积累现金资本的周期性解放是破坏资本主义平衡的最主要的因素，但是他逐渐从他的这种观点发展到了罗莎·卢森堡那消费不足学说的更具独创性的说法。<sup>[48]</sup>这一点在他那最后的经济分析著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有所表达，他在这部著作里提出了这样一个论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这样——一个事实，永久资本生产（在部类 I 中）的增长，较消费品生产中对永久资本的需要要快。据说这是剩余价值提高之后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sup>[49]</sup>弗里茨·斯特恩伯格(Fritz Sternberg)、列翁·萨特(Leon Sartre)和保尔·斯维齐(Paul Sweezy)都接受了鲍威尔的这一论题而小有改变，或者可以说是独立地发展了这同一论题，<sup>[50]</sup>其结果是他们到最后都得出了与罗莎·卢森堡相同的结论：资本主义如果不是内在地吃了不能售出的消费品残余的苦头，那么，它至少是吃了消费品生产那未被利用的能力的苦头（或者说，等于同样的东西，吃了大量生产手段的苦头，这些生产手段尽管部类 II 要购买，但仍然销售不出去，因为后者不能购买）。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一书中，我已经揭示了这一基本误解——一个明显的“预期理由”——这种误解是这一类型论据的

基础。所有这些著作家都是在这样一种基本假设下工作的：生产价值的比例是没有变化的，或者说，两大部类之间的生产能力是没有变化的，而来自部类Ⅱ的商品需求由于越来越高的剩余价值率和日渐增长的资本有机组成的缘故，却很自然地增长得较来自部类Ⅰ对商品的需求为慢。这么一来，危机自然就变得不可避免了。但是，部类Ⅰ的生产增长与部类Ⅱ的生产能力（斯维齐）之间这种“技术比例”（奥图·鲍威尔称之为“技术系数”）的永恒性，或者生产额外消费品所需要的生产手段（鲍威尔），还根本没有证实。

部类Ⅰ加速了的发展必须以提高整个经济中资本有机组成的方式来最终也提高部类Ⅱ的生产能力，这一事实决不能证明，这两大部类的生产能力必须以同样的比例增长。但是，这两种能力互相之间的比例如果发生了变化，并且在商品总生产方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增长的话，那么，伴随着部类Ⅰ对商品那增长了的需求而来的，肯定就是部类Ⅱ生产能力的一个绝对增长（或相对地说较小增长）和对这种能力的充分利用，而不必导致生产过剩或者生产力过剩。

亨利克·格罗斯曼在资本增值的越来越多的问题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主要缺点，这必然会导致“积累过度”，也就是导致这样一种状态：整个现有的剩余价值不再能满足现有资本的赢利增值了。他的论据过分地依赖他在开始时的那些相当武断的数字，这种论据摇摆于两种主要态度之间。一方面，他说明了增值资本的困难将会变成一种绝对的障碍，如果这些困难确实能导致被资本家毫无生产意义地消耗掉的那些剩余价值降低的话。另一方面，他争辩说，所有已积累资本之不能“赢利地”增值，将会使全部扩大过程完全停顿。<sup>[51]</sup>第一种论辩是没有用的，因为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指明用作消费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在经

常增加的资本家人数中还是可以再分的（这种情况在格罗斯曼的计划中比在现实中更甚，因为他所预测的那种增值的困难，将会大大加强资本主义的竞争）。作为已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一份儿的消费降低，与每一个资本家家庭消费的提高是很相一致的（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考虑在关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最终目标”的资本家的消费需要方面，格罗斯曼究竟正确到何种程度）。第二种论辩包含着一个明显的谬误：因为，如果全部现有的剩余价值不再能满足所有已积累资本的增值，那么，其结果将不会是整个经济的崩溃，而只是“过剩的”资本通过竞争和危机而贬值(Entwertung)。格罗斯曼要用这一点来证明的是这种情况：向过分积累发展的先天趋势无疑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这种趋势必然要由于同属这一制度固有的另一种趋势而中立化，这另一种趋势就是为了避免增值过程中较长期的停滞而通向资本周期性贬值的趋势。这就正是马克思本人强调的那种生产过剩危机的功能。因此，格罗斯曼并没有证明这一过程将会最终使得资本的增值一般说是不可能的。〔52〕

那位波兰——美国经济学家米恰尔·卡列基(Michal Kalocki)作出了迄今最先进的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与现代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结合了起来——他的著作预见到了凯恩斯的很多发现。他的结论是格罗斯曼的论题的一个变种：即，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积累率，也就是这种剩余价值在非生产性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区分，是马克思体系中的“战略变数”。但是，从这一体系的整个原文中分离出这个因素并没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资本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展示出一种较低的积累率，接踵而来的则是一个较高的比率（或者反过来，较高比率的非生产性消费，接踵而来的是一个较低的比率）。〔53〕

同样立场的另外一个变种是由所谓“永久战争经济”学派的理

论家们发展起来的，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米契尔·基德龙 (Michael Kidron)。<sup>[54]</sup> 如果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通过非生产性的消费而转移到“这一制度之外”的话，那么，积累是可以不受其内部限制而继续进行的。在第九章中，我们将讨论这一理论的那些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延缓崩溃，可以用对剩余价值的非生产性使用，也就是用浪费来加以解释。但是，武器生产，也就是商品生产，也就是价值生产，是怎样与剩余价值的浪费等同对待的；剩余价值的浪费又是怎样导向了经济的加速发展的；这仍然还是个谜。

布哈林是唯一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sup>[55]</sup> 他在批评罗莎·卢森堡的时候似乎已经指出，这个制度的几个基本矛盾必须得加以考虑，以便能预测这个制度那不可避免的崩溃。<sup>[56]</sup> 与此同时，格罗斯曼在责难布哈林时是正确的，他责难布哈林对这些矛盾的动力只字未加分析，并责难他未曾说明这些矛盾——或这些矛盾中的一些矛盾——怎么样和为什么有被加强的趋势。<sup>[57]</sup>

这样，我们发现所有这些理论（只除了布哈林的一点意见，而布哈林本人恰恰是没有在这一方面发展成一种系统的理论），都患有的一种基本失调症，即都没有从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单一的变量来推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动力。马克思所发现的所有其他发展规律，都只是或多或少自动地作为这一单一变量的功能在发挥作用。但是，马克思本人在几个地方断然否认这一种假设，例如：“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到阐明。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它的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被说明。”<sup>[58]</sup>

事实上，任何一种单一因素的假设，作为一种动力的总额，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观念相对立的；在这种动力总额中，为了产生任何一种特殊结果，所有发展基本规律的相互作用都是必要的。这种观念的意思就是，这一生产方式中的所有基本变量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和周期地起到自主变量的作用——当然不到彻头彻尾独立的程度，而是通过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在一种经常连接在一起的相互作用之中。这些变量包括下列这些重要项目：总的资本有机组成，特别是在最重要的那些部类中（除了其他事物之外，这还包括资本总额及其在这些部类中的分配情况）；永久资本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分配情况（也是在总的和在每一个重要部类中；此后我们将省去对公式的这种不言而喻的附言）；剩余价值率的发展；积累率的发展（生产性剩余价值与非生产性消耗掉的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资本周转时间的发展；和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这是在这些部类中某一种资本有机组成的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功能）。

本书的主要篇幅将用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六个基本变量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我们的命题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以及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性和已经表露出来的种种矛盾的历史，只能作为这六个变量相互影响的一种功能来加以阐明和理解。利润率的波动是这一历史的地震仪，因为，这种波动明白无误地表明，这种相互影响的结果与以利润为基础，换言之，以资本的增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那种逻辑，是相符合的。但是，这种波动只不过是结果，这个结果本身还必须用这些变量的相互影响来加以解释。

在这里——为了预测我们在后文中的种种发现——我们将举出一些例证，在我们看来，这些例证表明这一命题是正确的。剩余价值率——也就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率——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功

能<sup>[59]</sup>和阶级斗争在每一个特定时期中的一种临时性产物。把它看作是积累率的一种机械功能，比如这样一种简单化的形式——较高的积累率 = 较少的失业 = 稳定或者甚至剩余价值率的降低——这是把可以导致特殊结果或者可以缩小这种结果的那些客观条件，与结果本身混为一谈了。剩余价值率在事实上是否提高了，这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要看工人阶级对资本要提高剩余价值率所作的努力所表现出来的抵抗程度。在这一方面所可能发生的变化是多么的多种多样，其结果又是多么千种百样，这从最近一百五十年来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的历史中，可以一眼就看出来。从格罗斯曼的公式中，还可以找到一个更加不正确的机械关系的例子：低的劳动生产力 = 低的剩余价值率；高的劳动生产力 = 高的利润率。马克思常常提到美国的情况，在美国，从一开始工资就是高的，这并不是作为高的劳动生产力的一种功能，而是由于边境关系引起的长期缺乏劳动力；所以，北美洲的高的劳动生产力并不是高工资的原因，而是高工资的结果，因而，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随之而来的是比在欧洲的为低的利润率。

无产阶级的抵抗程度，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展开，并不是使剩余价值率发展成为积累率那部分独立变量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产业后备军的原始的、历史的地位，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这一后备军的规模大小，增长着的积累率才能够被伴之以增高的、稳定的或者下降的剩余价值率。如果有大批的后备军，那么，增长的积累率对劳动力商品的供与求之间的关系，没有重要的影响（可能除掉某些高级职业）。这说明了剩余价值率的迅速增长，尽管，举例来说，英国在一七五〇年至一八三〇年之间，或者印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有一种积累率的迅速增长。相反的是，如果——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由于“过剩”劳动力向国外大批移民而使产业后备军有减少趋势的话，那么，积累率的迅速增长就完

全可以伴之以剩余价值率的一个高峰或一次跌落。举例说，这个体制将适合一八八〇年与一九〇〇年之间的西欧，或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意大利。

同样，资本有机组成的增长率也不能认为只是来源于竞争的技术进步的一种功能。这种技术进步大家都认为能使活资本为了降低成本而被死资本所取代，换句话说，它在固定资本的支付方面所引起的增长较之在工资方面的为迅速。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关于这一点的经验方面的证据。但是，我们知道，不变资本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固定部分（机器、建筑等等），一个是流动部分（原料、动力来源、辅助因素等等）。固定资本的迅速增长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仍然没有明确地给我们说明资本有机组成的发展趋势。因为，如果生产原料部门的劳动生产力比生产消费品部门的劳动生产力增长得更快的话，那么，流动不变资本相对地说就会变得比可变资本更廉价，这最终将会导致这样一种局面：资本的有机组成将会不顾加速了的技术进步、不顾固定资本中剩余价值的加速积累而比以前增长得不是更迅速而是更缓慢。

我们在这里已经预测了后文探讨的结果，旨在说明我们将在那些探讨中所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同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基本比例都作为部分独立的变量来处置，以便能够为这一生产方式制订出长期的发展规律。关键的任务将是对这些部分独立的变量在具体历史环境中所具有的影响进行分析，以便能够解释资本主义发展史中那些连续的状况。

这样的情况将会出现：这些不同的变量和发展规律的相互影响，可以在各种各样生产领域的趋势中和在发展不平衡的资本价值的各种各样的组成部分的趋势中，加以总结。部类 I 和部类 II 的不平衡发展，仅仅是这一过程的开始，这一种开始对这种单一

的运动决不是可以减少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探讨一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在这两大部类中所导致的不平衡发展的程度，以及这种内在逻辑在这两大部类和在整个经济中所导致的积累率和剩余价值率的不平衡发展的程度。这是在固定不变资本与流动不变资本之间的一种不平衡发展；在积累率与产业后备军之间的一种不平衡发展；在对剩余价值的非生产性浪费与增长的资本有机组成之间的一种不平衡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比例的所有这些不平衡的发展趋势的联合——也就是马克思的体系中主要变量的这些部分独立变化的联合——将能够使得我们释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尤其是这一生产方式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我们称作“晚期资本主义”，我们释明所用的办法是依靠资本本身的运动规律，毋须乎诉诸外在的因素，这种外在因素是与马克思对资本所作分析的核心不相容的。这样一来，“主观事物的生命”就会出现在资本的所有运动规律的相互影响中。换句话说，在资本的表面与本质之间、在“多种资本”与“总的资本”之间产生调解的，就是它们的总和。

查尔斯·贝特尔海姆(Charles Bettelheim)在新近与阿菲利·艾曼纽尔(Arghiri Emmanuel)的一场论战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原文中的“独立变量”这一观念的有效性已经提出了疑问。尽管总的说来，我们赞同这一次论战的方向，但是，我们还不能有保留地承认这一点。贝特尔海姆写道：“当我们讨论马克思的这些公式并在完全明白这些公式的功能的情况下运用这些公式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力改变这些公式中的‘量值’，除非是这种改变被一些变更证明为对的，这些变更要在合乎规律的情况下对于构成这些公式所指的那种结构的种种因素，发生影响。只有从理论上证实了的这些变化，才能够改变这些量值，不是任意地改变，而是在完全符合这种结构的实际规律的一种方式下改变。”<sup>(60)</sup>在

这里，贝特海姆忽略了两个基本的困难。第一，再生产计划并不是对增长问题和破坏平衡问题进行分析的工具，所以，任何一种“规律”都不可能来调整其组成部分的变化（两大部类的平衡增长或这两大部类的平衡积累率，都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而只是方法学上的抽象概念以达到这些计划的目的，也就是来证明，经济中的周期性平衡是可能的）。第二，虽然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揭露了长期的最终结果（增长的资本有机组成、增长的剩余价值率、降低的利润率），但是，这些规律并没有揭露这些发展趋势之间的任何确切的、有规律的比例。因此，把上面列出的那些变量视为部分独立的功能和部分互相依赖的功能，这不但是合法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很显然，这样一种独立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存在于这种特殊生产方式及其一般长期发展趋势内在逻辑的结构之中的。<sup>[61]</sup>但是，恰恰正是这种一般的长期发展趋势与这些变量那短期和中期的波动的结合，使得抽象的“总的资本”与具体的“多种资本”之间的调解成为可能。换句话说，正是由于这一点才能够通过其连续阶段再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真正的、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样，这一种生产方式的历史就变成了资本与前资本主义的和半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之间的对抗发展史了，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永远要体现在其本身之中的。所以，我们将最先把那些结构变化加以叙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播使得这些结构变化在世界市场上从滑铁卢到萨拉热窝（Sarajevo）的时代中发生作用。然后，我们叙述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资本主义衰落时期中，这一世界市场此后所发生的变化。

## 注 释

- 〔1〕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伦敦英文版，一九七三年，第一〇〇—一〇一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一分册，第二十五—二十六页）。
- 〔2〕 列宁：《列宁全集》英文版，第三十八卷第一七一页。
- 〔3〕 列宁：《列宁全集》英文版，第三十八卷第三二〇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第三十八卷第三五七页）。
- 〔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伦敦英文版，第一〇二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一分册，第二十七页）。
- 〔5〕 列宁：《列宁全集》英文版，第三十八卷，第三二〇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第三十八卷第三五七页）。
- 〔6〕 奥图·莫尔夫：(Otto morf)《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和辩证法》，法兰克福，一九七〇年，第一四六页。卡尔·马克思：“这种有机体制自身，作为整体来看，有它的各种前提，而它所以能发展为一个整体恰恰就在于：所有的种种因素都从属于社会，或把它还缺少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这样，它就在历史上发展为一个整体了。向整体的转化构成了这种有机体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英文版第二七八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二分册第五十一页）。（着重点是著者所加）。
- 〔7〕 “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伦敦，一九七二年，第七九七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八一七页）。
- 〔8〕 马克思：“资本在它们的现实运动中，本来也就是在这各种具体形式上互相对立。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式和它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式，都只当作特别的要素来表现。”《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五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五页）。
- 〔9〕 麦克斯·拉菲尔(Max Raphael)：《具体辩证法的认识论》，法兰克福，一九六二年，第二四三页。
- 〔10〕 莫尔夫前引著作，第一一一页。

-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伦敦版一九七〇年，第十九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XXI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1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摩里斯·杜伯（编）：《政治经济学批判》，伦敦，一九七一年，第二二一页（中译本见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一八页）。
- [13]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修订本），莫斯科，一九六五年，第二四〇页（中译本见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三一一页）。
- [14] 卡列尔·科西克：《具体辩证法》法兰克福，一九六七年，第三十一页。苏维埃著作家伊林科夫（E.I. Ilenkov）在关于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的统一）方面，已经贡献出了一部有趣的著作。见伊林科夫所著《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米兰，一九六一年。
- [15] 爱里希·汉（Erich Hahn）追随在苏联著作家伊林科夫之后强调说：“真实的具体主体之区分成各种抽象的决定，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等同于从经验物体向理论方面的运动。认识的经验阶段只能用来准备这一区分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柏林，一九六八年，第一九九一二〇〇页。
- [16] 爱里希·汉提到了苏联理论家斯米尔诺夫（V.A. Smirnov）提出的科学认识的七步骤计划（参见其上引著作第一八五—一八七页）。在一开头，斯米尔诺夫就把“观察”与“对观察记录的分析”加以区别对待，但是这样一来就失于考虑到本质与外表之间那种有关键意义的调和作用，并且把问题降低为理论与经验事物的对抗。
- [17]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过程》，法兰克福，一九六八年，第二卷，第五三三页。也见黑格尔“在想到未来事物的渐近性时，通常是认为未来事物从感觉上或实际上是存在的；之所以尚未觉察到，只是由于其微小。事物的逐渐消失也是如此，不存在的事物或取而代之的事物也被认为是确实存在那儿，只是还不能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和消失失去了一切意义。”《逻辑学》，伦敦，一九六九年，第三七〇页。
- [18] 卡列尔·科西克前引著作第二十七页。

- [19] 金德里契·柴林尼，《知识逻辑与〈资本论〉》，法兰克福，一九六九年，第五十九页。
- [20]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载《马克思全集》德文版，第十九卷，第三六九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四一二页）。重点系著者所加。
- [21] 路易斯·阿萨塞尔：《资本的目标》，载阿萨塞尔和艾铁尼·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合著《读〈资本论〉》，伦敦，一九七〇年，第一一五页。
- [22] “经验主义”这一幽灵是阿萨塞尔在《读〈资本论〉》一书的第三十五—三十七页中创造出来的，阿萨塞尔将这一幽灵压缩为“分裂”知识的目的危险，因为，伴随着“理论上占有现实”的“错觉”的，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抽象过程，这种抽象过程只能部分地掌握住这一现实。我们已经指明，积极的、智力方面的现实的再生产，其特征恰恰就是这么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抽象和具体，普遍和特殊，在越来越重新一体化——换句话说，在这一过程中，这种“分裂”被逐步克服了。当然，思维和存在不可能达到彻头彻尾的一致，唯物主义辩证法只能试图以越来越大的精确度来重新改造现实。
- [23] 比如参见保尔·麦蒂克：《价值论与资本主义》，载《资本主义与危机，关于利润降低倾向的规律一场论战》，法兰克福，一九七〇年；汤姆·肯普（Tom Kemp）：《帝国主义理论》，伦敦，一九六七年，第二十七—二十八页等。也见阿萨塞尔的这一论点：剩余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 [24] 见《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Ⅰ，“工人报”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在这里，我们只举出一个例子。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计算了一家英国纺织厂的剩余价值总额和剩余价值率，他根据的是曼彻斯特一家制造商的确切资料（已发表的），这些资料是恩格斯提供给他的；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一九页。在《资本论》第三卷恩格斯编的第四章中，恩格斯又一次举出了这一例子，并且说：“我们在这里，关于近代大工业的资本的实际构成，又偶然有了一个实例。总资本合计 12,500 镑，其中 12,182 镑为不变资本，318 镑为可变资本。”《资本论》第三卷，第七十六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六十四页）。在恩格斯看来，问题并不是资本“从不在经验方

面出现”或“是不可估量的”，而是资本家阻止大伙接近他们的账目，因而掩蔽了估量资本所必要的和足够的因素。“因为只有少数资本家想到要这样对自己的营业进行计算，所以，统计学家对于社会总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到底成什么比率的问题，也几乎绝对保守沉默。只有美国的《国情普查》曾经指出，在现有各种关系下，各种营业所付的工资及其所获的利润的总和，可以大到什么地步。这种资料纵然也令人可疑，因为它的根据，不过是产业家们自己的不受约束的报告，但它仍然极可宝贵，是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所有的唯一资料”。见《资本论》第三卷，第七十六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六十四页）。

- 〔25〕“马克思在这里说明，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外表的运动过程，不可能是一个直的过程。”彼得·杰夫利斯：《马克思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Ⅱ，“工人报”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在杰夫利斯的说明所指的《资本论》的一节中（第三卷，第二十五页），马克思很明显地并没有从具体到“表面”这种说法（较之抽象的“本质”更加不够“真实”）。正相反，马克思在那里说道：“资本在它们现实的运动中，本来也就是在这各种具体形式上互相对立。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式和它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式，都只当作特别<sup>1</sup>的要素来表现。”（着重点系著者所加，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五页）马克思的意图正是要说明这一实际运动。对马克思说来，正象对黑格尔那样，真理是在整体之中，也就是在本质与外表的统一之中。
- 〔26〕《逻辑的科学》，伦敦，第五十八页。路西安·格尔德曼（Lucien Goldmann）（《康德》，伦敦，一九七一年，第一三四页）已经正确地指出，作为康德的《纯理性批判》的基础的，是经验事物与“本质”（事物的本身）之间不可逾越的矛盾这一观念。所以，杰夫利斯在把本质降为抽象并表明他并没有理解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关系的时候，他从黑格尔（更不用马克思了！）退回到了康德。
- 〔27〕《恩格斯致索巴特》，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第四八一页（中译本见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五七五页）。
- 〔28〕“不过，相同——按主要的条件说相同——的经济基础，仍然可以自无

数不同的经验上所与的事情，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由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形和等级差别。这些都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所与的事情的分析方才可以理解”。〔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七九一一七九二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九二五页）〕。

〔29〕“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就其本质而言，是落后的国家。但是，落后国家也是由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的一部分。因此，落后国家的发展具有一种联合的性质：最原始的经济形式与最新式的资本主义技术和文化的联合。……无产阶级斗争中个人民主和过渡的要求的分量，这些要求的相互结合及其表现，都取决于每一个落后国家特殊条件的特殊性质，而且在相当的程度上，取决于其落后的程度。”托洛茨基：《资本主义死亡之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第四十一—四十一页，载《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纽约，一九三九年。

〔30〕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各种不同的横断面，每个横断面都有其本身的深刻的内部矛盾。在各个时期，人类各个横断面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和达到的各式各样的发展水平，就是资本主义的起点。资本主义只是逐步地战胜了传统的不平衡性，破坏了这种不平衡并改变了它，从而运用了其本身的手段和方法。……从而它恢复了和睦关系，并且使最先进和最落后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都获得了均衡。……为了使各个国家在经济上互相靠拢并拉平这些国家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运用了它自己的办法，这就是说，运用了无政府主义的办法，这种办法经常在削弱它自身的作用，这种办法就是使一个国家来反对另一个国家，使一个工业分枝部门来反对另一个工业分枝部门，发展世界经济中的某些部分，而同时又使另外一些部分的发展受到阻碍而处于落后状态。只有这两种基本倾向的相互关系——这两种基本倾向都出自资本主义的特性——才能为我们说明这一历史性过程的活生生的实质。托洛茨基：《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第十九—二十页，纽约，一九七〇年。也见罗莎·卢森堡，《资本的积累》，伦敦，一九七一年，第四三八页：“欧洲资本已经吞吃了埃及的农民经济。大片大片的土地、很多劳动力以及无数的劳动产品都作为赋税被国家征收去了，这些土地、劳动力和劳动产品最终都转换成了欧洲的资本并被积累起来了。很明显，……证实这些肥沃土地是为了资本

- 积累的，恰恰就是埃及各种条件的原始性质。”
- [31] 罗斯多尔斯基前引著作，第五三四—五三七页、五八三一—五八六页。
- [32] 奥图·鲍威尔：《经济危机理论》，载“新时代”，23/1，第六十七页。布哈林用更简明更优美的语言表达了这同一公式：见《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维也纳，一九二六年，第十一页。后者的英译本，见罗莎·卢森堡和尼古莱·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伦敦，一九七二年，第一五七页。
- [33] 鲁多尔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维也纳，一九二三年，第三一〇页。
-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四四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二六六页）（着重点是著者所加）
- [35]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二九九页。
- [36] 罗莎·卢森堡：《资本的积累》，第三四〇—三四一页。
- [37] 卢森堡：《资本的积累》，第三四〇页。
- [38] 亨利克·格罗斯曼：《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与破产规律》，法兰克福，一九六七年，第九十一—九十二页。
- [3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二五四页（应为第二五九页——译者）（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二八三页）
- [40] 奥图·鲍威尔：《资本的积累》，第八十三页，载“新时代”，31/1，一九一三年。
- [41] 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第二二六页。
- [42]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英文版第三卷，伦敦，一九七二年，第一一八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第三册，第一二六页）。
- [43] 布哈林：前引著作第二二八—二二九页。
- [44]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卷，第一一八—一一九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第三册第一二六一—二七页）。
- [45] 直到现在，对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单一原因”的解释，其最为极端——也是最为天真的——说法，是纳塔里·莫斯科夫斯卡的说法：“确定联合曲线的这同一个因素（1）也能确定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个曲线。如果我们不考虑次要的因素和原因而只考虑主要的原因，那

么，我们在经济学中就可以区别出两种相对立的倾向。一种倾向的代表们从经济中的消费过度和节约不足（积累不足），看出了腐化的原因，而另一倾向的代表们则相反，他看出了消费不足和过度节约（过度积累）。”她还加了这样一条脚注：“不错，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承认单一原因的危机理论，这是因为‘危机自身表现形式的复杂性’和‘这些事件根源的多样性。’但是，如果进一步考查的话，就会发现，就连在这些研究者的理论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单一的原因也占着统治地位。”纳塔里·莫斯克夫斯卡：《晚期资本主义的动力学》，苏黎世，一九四三年，第九页。

- [46] 系统地发展这些概念的第一批著作家有：海因里希·库恩诺（Heinrich Cunow）《衰亡论》，载“新时代”，一八九八年，第四二四—四三〇页；亚历山大·巴瓦斯（Alexander Parvus）《商业危机与劳动组织》，慕尼黑，一九〇一年；卡尔·考茨基《危机理论》，载“新时代”，20/2，一九〇二年，第八十页；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路易斯·鲍丁 Louis B. Bondin《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一九〇七年，第一六三一—六九页、二四三—二四四页。
- [47] 见格罗斯曼前引著作，第五十七—五十九页。
- [48] 奥图·鲍威尔关于这一问题的一系列观点，主要出现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文章题目是《经济危机理论》，载“新时代”，一九〇四年；也出现在他的这一著作里：《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主义》，维也纳，一九〇七年，第四六一—四七四页；也出现于他的这一文章：《资本的积累》，载“新时代”，一九一三年；也出现在他的这一著作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九三六年出版于布拉蒂斯拉伐。（Bratislava）。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的关键性因素按年代先后分别为：固定资本重新组织的波动（一九〇四年）、呆滞资本向国外投资的压力（一九〇七年）、资本积累与人口增殖之间的脱节（一九一三年）以及最后一点第Ⅰ部类的发展与第Ⅱ部类生产手段的需求之间的脱节（一九三六年）。
- [49] 奥图·鲍威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第三五—三五三页。
- [50] 保尔·斯威茨：《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纽约，一九四二年，第一八〇—一八四页；列翁·萨特尔：《马克思主义关于周期性危机理论大纲》，巴黎，一九三七年，第二十八—四十页、六十二—六十七页；弗里茨·斯特恩伯格：《帝国主义及其危机》，柏林，一九二九年，

第一六三页以下。

- 〔51〕 格罗斯曼前引著作，第一一八—一二三页、一二九—一三五页、一三七—一四一页。
- 〔52〕 弗里茨·斯特恩伯尔格对于格罗斯曼的论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科学的一次革命》，柏林，一九三〇年。
- 〔53〕 米恰尔·卡列基：《经济动力学理论》，伦敦，一九五四年。
- 〔54〕 米契尔·吉德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伦敦，一九六二年。
- 〔55〕 在这里，我们没有把列宁考虑在内，因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他并没有提供一个系统的理论。但是，他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肯定没有染上“单一原因”的毛病。
- 〔56〕 布哈林前引著作，第二二九—二三〇页、二六四—二六八页。
- 〔57〕 亨利克·格罗斯曼前引著作，第四十四—四十八页。不错，布哈林有一句话（前引著作第二六四页）试图从生产力的破坏和劳动力再生产的不可能性来推断资本主义的垮台，这与他在《转化时期的经济》一书中的计划是完全吻合的。在对这一研究进一步讨论时，我们将有机会对这些观点作更彻底的批评性考查。
- 〔58〕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第五一〇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第二册第五八二页）。来源同上，第五三四页：“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中译本同上，第二册，第六一〇页）。
- 〔59〕 “我们只能说，如果工作日的界限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相适应；如果工资工人人体力所能容许的工作延长程度相适应，所以利润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的限制。显然，在波高利润率的这两界限之间可能有许多变化。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通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断斗争来确定，资本家经常力图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经常地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抵抗。”卡尔·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伦敦，一九六八年，第二二六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二卷，第二〇〇—二〇一页）。

- 
- [60] 查尔斯·贝特尔海姆，载艾曼纽尔：《不等价交换》，伦敦，一九七二年，第二八三—二八四页。
- [61] 贝特尔海姆本人后来也承认，在马克思所发明的那些特殊关系中有一种“相对的不确定性”。见《不等价交换》，第二八八页。

## 第二章

### 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

资本的实际运动很明显地是从非资本主义的一些关系开始的，并且是在与这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进行经常的、开发性的、新陈代谢式的交换的结构中发展的。这并不仅仅是罗莎·卢森堡的一个命题或一种发现：马克思本人在某些地方也很清楚地谈到了并强调了这一点。比如：“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争要支配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都对生产的封建束缚的破坏，起过巨大的作用。但近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手工业时期，终久不过在近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已经在中世纪形成的地方，方才发展起来。例如，我们可以拿荷兰和葡萄牙来做比较。〔1〕……资本主义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分解作用，曾经是一个多大的障碍，人们尽可以在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得到一个适切的例证。在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此外，在印度，又还有在土地共有制基础上建立的村社的形式要加进来；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以统治者和地主的资格，双管齐下，同时应用他们所有的直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目的是要把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摧毁。他们的商业在那里，不过在这个程度以内，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的影响，也就是，不过因为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把纺织业，这个

在工农业生产的统一中作为一个原始不可缺少部分的纺织业破坏掉了，因此也把公社毁坏掉了。但是，就是在那里，对它们来说，这种解体工作也不过极其缓慢地进行着。在中国，这种解体作用就进行得更慢，因为在中国，没有直接的政治权力加进来加强它的作用。因农业和加工制造业直接结合而起的巨大经济和时间节约，在那里，曾对大工业产品提出非常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有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通过的流通过程的各种杂费加进来。同英国的商业相反，俄国的商业就让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原样不动。”〔2〕

卡尔·马克思写出了这一节之后二十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给康拉德·施米特（Conrad Schmidt）的一封信中也庄严地宣称：“价值规律以及剩余价值通过利润率来分配的情况也是这样。……这两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已经充分地实现，也就是说社会已经被简化为地主、资本家（工业家和商人）和工人这三个现代阶级，而一切中间阶层都已被消灭的前提下，才能最完全地达到近似的现实。这种情形甚至在英国也还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我们决不会让它发展到这个地步”。〔3〕（着重点是著者所加）

此外，马克思还制订了这么一个简明的理论规律：资本的起源决不能与其自我发展等同起来：“资本发生的条件和起源的前提正好是假定着：资本还没有存在，而是刚要产生，因而它们将随同现实的资本、随同资本底出现而消灭；而资本自身则从它的现实性出发，树立它自我实现的条件。所以，例如说最初当货币或自为存在的价值转化为资本的时候，在资本家那一方面必须先有一种他作为非资本家（Nichtkapitalist）而完成的积累——不管是通过由他亲身劳动所创造的产品或价值而来的积蓄等等都可以——；因而也就是说如果货币变为资本的前提是作为资本起源

底已知的外在前提而出现的话，那么资本一经成为资本，它就创造它自己的前题，即占有种种现实条件，不通过交换而创造新价值——通过它自己的生产过程。”〔4〕（重点系马克思所加）

因此，我们现在是在讨论一个双重的过程，而且，如果我们既要了解资本的起源，也要了解资本此后的自我发展的话，那么，这一双重过程的两个方面必须结合起来。换句话说，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在整个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积累，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连续状态，而且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发生的事。在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一直到现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总是与通过生产过程中价值创造的那种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同时共存的。农民、商人、工匠、有时还有雇主、公务员和高级工人等，都想变成资本家，他们自己也通过这种或那种办法（尽量压缩消费；高利贷；盗窃；欺诈；遗产继承；抽彩得奖）取得初始的资本数量以剥削劳力。虽然这种原始积累过程已经预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这与马克思描述过的那种资本原始积累历史过程有所不同），并且，虽然在已经工业化了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原始积累过程的作用不是十分重要，但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即所谓“发展中”国家——中，它的作用还是相当重要的。正因为这些原故，原始积累过程不论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往往对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比对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创造要更大。

这两种不同的要素必须置于互相关联的一种结构中。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根源可上溯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这种原始积累正是从它那垄断性质中取得其特殊的原动力的；在地球表面上有几个点，在这里第一批用机器操作的现代化工厂出现了，除了这几个点之外，世界上根本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尽管在资本主义制造业中已经有了价值的创造）。然而，由于所有这些都

或多或少地有一种类同的生产力水平，所以，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拉丁美洲，不论是在俄罗斯、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几乎没有什么国际上的利润变化率，以刺激出一种动力学上的发展。〔5〕

说明今天原始积累过程的情势，显然是大不相同的。这些积累过程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建立起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了的结构之内的；因此，它们与已经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处于经常竞争的状态，或处于永远的新陈代谢交换状态。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在国际上的增长与扩大，使得三种要素保持了一种辩证的统一：

(a) 在已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领域中，资本积累的继续进行；

(b) 在已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领域之外，资本原始积累的继续进行；

(c) 第二个要素受第一个要素的决定和限制，也就是第二个要素与第一个要素之间的斗争和竞争。

那么，这第三种要素，也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继续进行所受在已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领域中的资本积累的决定和限制，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

不论是在每一个个别的国家还是就国际而言，资本的发展都是从中心——换句话说从它那历史上的诞生地——向周围进行的。它总是设法向新的领域扩展，把一些商品简单再生产的新的部门转化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领域，并且把直到目前还只是在商品生产中生产使用价值的那些部门，加以改变。〔6〕这一种进程时至今日还在我们眼前仍在继续进行，在最近二十年期间，生产直接食用食品和饮料自动售货机器等等工业的扩展，是可为例证以说明这一进程的规模。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往这些领域中深入发展，受到了

两种主要因素的限制。第一种，这种生产方式必须是竞争性的，那也就是说，销售价格必须低于简单商品生产或家庭生产领域中生产同一商品的成本价格，或者至少说销售价格必须是够低廉，使原来生产者觉得，从购买新产品所节省下来的时间和劳动量的观点来看，他们自己那种比较廉价的生产不再是有利可图的了。〔7〕

第二种，必须有过剩的资本，将这种过剩资本向这些领域进行投资所产生的利润率要高于将这些资本投资于已经现存的领域中（绝对利润率不一定更高，但是，无论如何要比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的领域中所进行的额外投资所产生的边缘利润率要高一些）。

自我再生产资本的积累给资本的原始积累留有余地的确实程度，要视这两个条件之被认识来定，即是全被认识，只是被部分地认识或是在过多的限制之下被认识。

小规模的和中等规模的资本打入了这一未被占领的领域，执行了一项“肮脏的工作”，摧毁了那些土生土长的、传统的生产关系，〔8〕在打入过程中，或是自己崩溃破产，或是为剩余价值的“正常的”生产创造条件，这种“正常的”生产它本身也将随后参加进去。这后面的这种情况，就是转变成为“正常的”工业资本、农业资本、金融资本或者商业资本。

布哈林正确地把世界经济界说为“生产关系和国际规模相应交换关系的一个体系”。〔9〕但是，他在他的著作《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中，没有强调这一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接合起来的一种体系，这些生产关系是被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把它们互相连接在一起，并受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控制。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一种世界市场的形成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的一种产物——不可与商业资本所制造的世界市场混淆不分，商业资本所制造的世界市场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决条

件〔10〕——并且理解为按照资本主义标准说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和国家结合而成的一种多边自我制约的体系。这一问题我们一方面在本章中还将更深入的探讨，另一方面在我们讨论不等价交换和新殖民主义诸问题时，还将更深入地探讨。

历史学家奥里弗·柯克斯(Oliver Cox)对这种接合体系多少有一点暗示。但是，他以前有关威尼斯商业资本的著作对他发生的影响过于强烈，以致使他不认为这种“等级经济和等级国家”不只是由“世界市场的分化形势”所决定的。因此，他完全忽视了各种生产关系的区别。〔11〕这样一个错误，其他一些著作家例如阿利菲·艾曼纽尔(Arrighi Emmanuel)、萨米尔·阿敏(Samir Amin)和安德烈·刚德尔·佛朗克(Andre Gunder Frank)等都所有分担，其程度较柯克斯或略重或略轻不等，在本书第十一章中，我们还将讨论这一方面。

如果我们把从产业革命以来的这两百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加以综览的话，我们就可以区分出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接合的下列各个阶段。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年代，大规模工业的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严格地局限于西欧和北美。与此同时，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都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开始了——尽管这一过程的疾徐是不平衡的。此外，在这些国家的手工业工人和本地农民的纺织业生产逐渐被破坏，与此同时，愈来愈多的家庭工业往往与真正的工厂工业结合在一起。当然，外国资本确实也流进了那些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但是，它们不能控制在那里的积累过程。〔12〕外国资本控制这些初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所遇到的两个最重要的障碍，应该加以论述。第一，在大不列颠、法国和比利时的资本积累的规模，不足以使这种资本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起一些工厂。大不列颠从一八六〇年到一八六九年之间每年对外投资的平均额，只有两千九百

万英镑；在从一八七〇——七九这十年中，对外投资每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五，即增长为五千一百万英镑，此后在从一八八〇——八九年这十年间，又增长为六千八百万英镑。〔13〕第二个障碍是运输手段的不足——产业革命在制造业和运输工业中的不平衡发展。〔14〕这就有效地使得西欧大规模工业的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廉价物品不但不能深入到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小城镇和穷乡僻壤中去，而且甚至也不能深入到欧洲南部和东部的小城镇和穷乡僻壤中去。确实，运输和交通体系的不足，障碍了西欧本身国家市场的形成。在铁路推广之前，在法国每吨煤的价格，在卢瓦尔河(Loire)南部的圣太田(St.Etienne)矿区一八八三年为6.9法郎，在巴黎高至36—45法郎，在拜昂纳(Bayonne)和更远一些的布里塔尼(Brittany)，甚至高达50法郎。〔15〕

因此，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大不列颠、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日渐增长的对外投资，主要是集中地冲击外国的铁路建造方面，因为，这一世界范围交通网的发展，是它们对不发达国家国内市场逐渐加强它们的控制的一种先决条件，而这些不发达国家是被它们拖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这一漩涡中去的。〔16〕

但是，恰恰是这种集中力量修筑铁路导致了一种时间上的间隔——大约从一八四八年革命起持续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这一段间隔时间里，这些经济本身也在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向发展，总的说来，它们是处在本乡本土资本原始积累的毫无限制的状态中。国际间工资的差异性加速了这一过程。〔17〕即使是这第一次运输革命也没有使长途运输廉价而又易腐烂商品的运费，能有一个决定性的降低，这一事实就意味着不发达国家的本地资本仍然享有食品市场、酿造业市场和缝纫用品市场（每一方面的奢侈品除外）等等，而不受威胁。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和西班牙等是这一现象的最明显的例证。在这些国家里，如果我们不管

在铁路修筑和公债方面的外国投资的话，那么，正是当地的资本使得其内部市场稳步发展，原始积累顺利进行。

比如在意大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纺织工业仍然主要是由农民和家庭工业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在亚麻和大麻的纺织方面，大约有三十万农妇从事工作，每人大约每年有一百五十个工作日。在意大利，一百二十万公担的原料中，有三十万公担输出国外，其余九十万公担在国内消费。这九十万公担中，已经机械化了的工业使用的约占九分之一强，其余约九分之八为家庭生产所使用。甚至在一八八〇年，在亚麻和亚麻织物生产方面，家庭纺织还超过了工厂纺织。在丝织工业方面，工业突破大约是从一八七〇年开始的，一直到十九世纪终结，这一过程才告完成。在棉花生产方面，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都是由家庭手工业控制的；到一八七〇年，大规模工业才在纺纱方面取得了一个突破，至于在编织方面，直到此后的十年之后才有了突破。<sup>〔18〕</sup>在这一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外国资本没有起什么作用。

在俄罗斯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虽然一八四〇——七〇年的第一次工业化浪潮是用进口机器完成的——在一八四八年俄罗斯购买了英国出口机器中的百分之二十六——但是，并没有值得一提的外国资本参预。<sup>〔19〕</sup>在一八四五年，俄罗斯整个进口和家庭机器生产总值略高于一百万卢布，到一八七〇年，达到了六千五百万卢布。在一八六一年，俄罗斯使用的工业机器总值高达一亿卢布，到一八七〇年，达到三亿五千万卢布。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波兰和芬兰除外）的年生产总值从一八四七年的大约一亿卢布提高到一八七〇年的超过二亿八千万卢布。支持这一运动的资本，几乎完全是本国的。<sup>〔20〕</sup>在日本，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类同的发展状况。在一八七五年，日本银行资本总额为二百五十万日元，到一八八〇年增长到四千三百万日元。在此后的一年中，

家庭工业仍然控制着棉纺业和棉织业，但到一八九〇年，大规模工业就已经巩固了其对这些领域的统治。〔21〕

这些国家在那个时候都是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之间的具体连接以及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都有其两面性。

一方面，廉价机器商品从国外的进口随带着“价廉的大炮”，这对传统的家庭生产是一个大破坏者。意大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时，输入品中仍然有一半是制造工业的产品或半成品，在日本，廉价棉纱的无限制输入（在一八七四年平均价格每斤大约是 29.6 日元，一八七八年则为 25.5 日元），对于农民的家庭工业产生了一种毁灭性的影响（家庭工业棉纱平均价格，一八七四年为 42.7 日元，而一八七八年则为 45 日元）。〔22〕但是，在上列这两个例子中，当地机器工业能够在十年中取代当地的家庭工业，也就是说，外国产品清除了“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对外贸易的迅速专业化（比如在俄国的农产品和后来的石油；在日本的生丝和棉纱），可以使得世界市场的一些重要部门成为日渐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出路。这样取得的利润又反过来成了当地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

当然，与世界市场的结合以及在这一方面相对不发达的种种条件，对于这些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产生了严重的相反作用，这种情况也是确实有的。在较高的劳动生产力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与在较低的劳动生产力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进行交换，这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这是一种较少劳动对较多劳动的交换，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这种情况：价值和资本在有利于西欧的情况下从这些国家外流。〔23〕由于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储备，这必然会造成这样的逻辑结果：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的资本有机组成低于首先工业化了的那些国家。〔24〕但是，这种外流的规模和较低的有机组成的规模，对于土生土长的

和独立的资本积累还不足以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至少说在这些国家中不足以构成威胁：在这些国家中，社会政治方面的阶级力量已经可以恢复因全国大规模工业发展造成的对手工业工人的损害。比如在土耳其，在那里，这些条件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要么即使存在也很微弱——这是因为这个国家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执行其充当现代资本主义的接生婆的任务（例如那里是由东印度公司之类的外国商业资本所控制），或是因为外国人而不是本国资产阶级已经控制了现金资本的原始积累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产生国内的工业化，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从纯经济观点来看的话，现有先决条件对这种国家之有利程度，并不亚于俄罗斯、西班牙或者日本。〔25〕

在帝国主义时代，这一整个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未曾资本主义化的那些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到这时也要受制于西方大资本本身的再生产。就这一观点来看，对于后来被称作“第三世界”的那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而不是本国统治阶级的原始积累过程。后者现在是被迫来补足宗主国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这不仅是来自这些宗主国那廉价商品竞争的直接结果，它尤其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直接结果：资本投资本身是来自这些宗主国的，这些投资所开办的工业只是符合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

因此，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过程，窒息了所谓“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因为，第一，它借日趋严重的“资金外流”之机，把该地现有的资本原始积累资源给吸收了。从民族经济这一立场出发，这种资金外流现在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利用外国资本继续不断地剥夺本国社会剩余生产，这很明显地使得有利于民族资本积累的资源大大地缩减了。〔26〕第二，它把这样一些部门剩下的资源集中起来了；这些部门的特点就是——用刚德尔·佛朗克的话

说——“不发达的发展”，或者用西奥顿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的话说就是“依赖性发展”：〔27〕对外贸易、帝国主义的经办机构、土地和不动产建造的投机、高利贷、流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服务”机构（抽彩奖券、贿赂、强盗行径、赌博以及某种程度的旅游等）。最后是第三点，它限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方法是加强旧统治阶级在乡村的地位、使乡村人口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保持在实际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的领域之外。〔28〕

粗粗看来，这种结果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得到发展了的资本再生产，在宗主国家推动了同时共存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与此同时，它又阻碍了非工业化国家的这同样的过程。资本在哪里“最丰富”，恰好在那里积累得就比较快；哪里“最缺乏”，那里资本的积累和流通就要慢得多，矛盾也较多。这一幅图景似乎与市场经济规律和自由经济理论是相矛盾的，然而，一旦我们考虑了相对利润率问题，它就变得立刻可以理解了。是什么决定了所谓“第三世界”的片面的“不发达”呢，既不是帝国主义分子的恶意，也不是当地统治阶级的社会无能——更不用说种族方面的无能了——而是社会、经济条件的一种复杂关系，这种复杂关系一方面鼓励现金资本的原始积累，与此同时又使得工业资本的积累比上述那些投资领域更为无利可图——而且还更为不可靠——更不用说宗主国家那已发展了的再生产资本与帝国主义进行合作了。〔29〕

因此，在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古典的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发生了变化的，是宗主国与不发达国家之间那生产和交换的特殊的关系。外国资本对当地资本积累的控制（大多数是与政治控制相结合的），到这时也使当地的经济服从于宗主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已不再是袭击不发达国家的那种廉价商品的“轻型炮弹”，而是控制资本资源的“重型炮弹”了。另一方面，在

前帝国主义时期，在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的那种生产集中和原料出口，只不过是在这块土地上按照这种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取代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序幕而已。但是，到了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在帝国主义与当地寡头政治之间出现了一种长期的、社会的、政治的联合，这种联合冻结了农村中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点有决定性意义地限制了“内部市场”〔30〕的发展，并因而阻碍了这个国家的渐趋工业化，或者加强了在非工业途径中确已发生了的那些原始积累过程。

关于世界经济结构的这种转化，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发生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与古典帝国主义时期之间，事情发生在智利。智利在十九世纪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结合的第一个浪潮，发生在铜矿方面，然而，铜矿大部分还是掌握在智利人的手中。〔31〕第二个浪潮是在智利与秘鲁的战争取得胜利之后，随着硝石开采的发展而开始的，这次浪潮导致了英国资本对智利矿业的完全控制。在一八八〇年，英国向智利投资总额约为七百五十万英镑，其中六百万英镑以上采用的是公债券的形式。到一八九〇年，这个数字上升为二千四百万英镑，其中一千六百万是私人投资（特别是在硝石窑和硝石矿方面）。〔32〕很显然，有决定意义的出口产品（先是铜，然后是硝石）的性质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发生了变化的是资本积累的主要过程，是主要的生产关系。〔33〕

在不发达国家，外国资本对资本积累过程的控制，导致出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正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这种发展使得那些不发达国家成了帝国主义宗主国经济发展的补充。正如众所周知的，这就意味着这些不发达国家必须生产蔬菜和矿物原料。所以说，原料的寻求与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是携手而行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资本输出的决定性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宗主国家

相对过剩资本的发展、寻求更高的利润率和更廉价的原料，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整体。

然而，寻求原料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相适应的。通过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就导致了大宗商品的稳步增长，这种商品可以用一定数量的机器和劳动力生产出来。这又反过来导致了这样一种趋势，在商品平均价值中，固定资本也就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占份额要降低，换句话说，平均商品生产中，原料成本所占份额要提高：“所以，劳动生产力愈是发展，原料的价值就会按比例，在商品产物的价值中，形成一个愈益加大的部分，这不仅因为原料会全部加入到商品产物中去，并且因为在总产品的每一个可除部分中，由机器磨损形成的部分及由新加劳动形成的部分将会不断减少。这个下降运动的结果是，别一个由原料形成的价值部分按比例增大起来，除非原料本身生产上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也在增长，以致这种增大会由原料价值方面相应的减少而抵销。”（着重点系著者所加）〔34〕

在外国使用原始的、前资本主义手段的原料生产——以美国南部各州的奴隶经济为代表——加强了使原料变得相对而言更为昂贵这一趋势，因而，又导使宗主国资本设法将其原来寻求原料的办法转变成为对这种原料的更廉价的生产，也就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生产这些原料。〔35〕

由美国南北战争所引起的棉花价格的上涨，是这一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是，决不是唯一的一个因素。十九世纪中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原料不但是相对价格而且连绝对价格也都上涨了，这一总的上涨情势很足以说明这一趋势的普遍化。〔36〕

在不发达国家中，西方资本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的直接干预，在相当重要的程度上是由于受了这种资本对原料组织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大压力而形成的。

但是，在不发达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原料生产，就意味着是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社会经济生产条件下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国家中有的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使得运用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成为无利可图。现代新机器竞争不过这种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在农业领域中，这种情况就实质上导致了一种种植园经济，也就是一种前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制造时期的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种植园与那种前资本主义种植园经济相比的话，其优点首先在于在体力劳动者之间引进基本的劳动分工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劳动训练和更合理的组织和会计学。〔37〕在开矿的领域中，不发达国家中原料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实意味着资本主义机器的引进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开端，这是不错的。但在这里情况也是如此，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低廉价格、工业后备军的巨大比例以及无产阶级在这种条件下的相对贫困，把资本的重心从已经在西方占优势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转移到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38〕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幅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图案，这种世界体系是建筑在资本积累、资本的有机组成、剩余价值率和劳动生产力等的世界范围的不平衡发展之上的。产业革命为什么从西方开始呢？原因就是过去的三百年中，国际货币资本和金条一直集中在西方——这是借助殖民地征服和殖民地贸易而对世界的其余部分进行系统的掠夺的结果。〔39〕这就导致了资本在国际上只是集中于地球的某几个点上，即西欧的一些主要工业区域（以及稍晚些时候的北美洲）。但是，出现在西方的工业资本无法阻止较落后国家统治阶级那种资本原始积累的内在过程。充其量它只能使这种过程步子放慢。由于在时间方面和生产力方面的某种差异，由于英国对最高水平的工业生产力的垄断，这种工业化过程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年代，就逐渐伸展到了愈来愈多的国家中。

随着向不发达国家进行大量的资本输出，以便在那里组织原

料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本积累在量方面的差异性以及宗主国与经济上落后国家之间的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性，突然之间转变成了质的差异性。现在，这些国家变得既落后又要依赖别人。外国资本对资本积累的控制，窒息了这些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工业化的裂口在稳步地扩大。而且，由于原料生产仍然是前资本主义的或者只是初步地实行了工业生产，由于廉价劳动力对于机器现代化没有任何刺激作用，这种工业化裂口在生产力各个水平中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深的鸿沟，这种鸿沟既表明了、也永久化了这个实际的不发达性。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从一贯地劳动价值学说的立场来看，不发达最终往往就是失业，既包括量的方面（大量失业），也包括质的方面（低的劳动生产力）。〔40〕

在过去这一百年期间，这一基本事实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这么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方面，作为最后的解决办法，这一基本事实只有用国际资本扩展的更为基本的方面来加以说明。一点也不错，资本主义商品创造并征服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也就是说，把对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控制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大规模工业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优越性，推向了地球上的各个角落。但是与此同时，它并没有在世界各地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遍化。恰恰相反，在所谓第三世界中，它创造并巩固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特殊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在这些国家中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特别是阻碍了资本主义大规模工业的普遍化。在半个世纪以上的年代里，这些有依赖性的国家经常发生革命以前的危机，其唯一的原故就在这里，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证明这些国家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呢，这就是基本原故。

大量的资本深入到了原料生产中去，这使得这件事情成为可能：从一八七三年之后，原料价格长期上涨的趋势基本上被制止

了。接踵而来的不仅是农产品价格那种臭名昭著的狂跌——以及欧洲农业的一次大危机——而且还有与资本主义制成品工业产品价格相比矿产品相对价格的迅速下跌。<sup>〔41〕</sup>但是，由于大规模的不发达状况和劳动生产力的低下，这种趋势最终还是被不发达国家中再生产劳动力的低廉成本所扭转，而这种不发达状况和劳动生产力的低下，总是不断地在扩大这些不发达国家与宗主国之间生产力水平的差别。由于在有依赖性的国家里劳动生产力的停滞，而与此同时，在工业化国家里劳动生产力却在迅速提高，那么，在原料相对价格开始上涨之前，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露头，而且，就某些原料来说，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在持续进行，一直到一九二九——三二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这次危机的结果，造成了这一进程的突然中断，但随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国际军备繁荣，它又突然加快发展，到一九五〇年的朝鲜战争开始，它达到了高峰。<sup>〔42〕</sup>十九世纪结尾时的那种世界经济特殊结构，到这时变成了资本增值的一种障碍，更确切一些说，成了平均利润率降低的一个附加因素。

这样，资本的内在逻辑就造成了一个重复过程，这个过程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已经出现过。正象在那个时候一样，当原料的相对价格开始迅速上涨的时候，用前资本主义劳动方法和生产关系进行的这种原料的生产，就不再是通过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的那种剩余价值来源，反而变成了资本进一步扩展的一种障碍，因此，到这时候，生产方法可以上溯到资本主义制造时期或早期工业时期的原料生产，不再是殖民地剩余利润的来源，而成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一种障碍。这样，正像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时代的过渡的时期那样，宗主国的资本以大规模深入到原料领域的办法来回答这种挑战，因此，当

“古典的帝国主义”让位给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资本作出的反应是大规模地进一步深入到这一领域中去。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特别是在本世纪四十年代，这种资本大规模深入到原料领域的情况，导致了（正象它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所作的那样）在技术、劳动组织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一个基本的动荡。在十九世纪末期，问题是以有组织的方法，沿着制造期资本主义或者说早期工业的路线，来取代原始的、前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到这时候，这些又反过来必须以劳动生产力的较大增长来转变成为先进的、工业的劳动组织。但是，这就意味着在不发达国家中传统的、集中的原料生产的一个最重要的动机消失了。到这时，在宗主国的城市中使用昂贵的机器比在国外使用所冒的风险要小一些，而且，在原料商品的价值总额中，工资成本所占份额的降低，也使得使用殖民地廉价劳动力以代替宗主国较昂贵劳动力的作法，不象以前那么吸引人了。因此，原料生产大规模地转移到了宗主国的土地上（合成橡胶、合成纤维），而且，如果由于物质的原因而使这一点不能马上办到的话（例如石油工业），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大的压力来准备这最终的转移。当然，这已经开始结出果实（大量资金花在西欧和北海的石油钻探方面和对欧洲天然气的研究方面），并且还伴之以生产技术的不断精益求精。

在“古典的”帝国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之间的这个过渡时期，世界经济结构的这种重新组合的结果，是多方面的，但其性质是十分矛盾的。宗主国和不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了，因为在这时，甚至连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原料的古典市场，也遭受了相对的萧条，而且，它们的产品最终也跟不上工业化国家增长的步伐。<sup>〔43〕</sup>在同样的打击下，这些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危机进一步加重了它们的痛苦，而且，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帝国主义进一步政治削弱的有利条件下，这种情况在所谓第三世界的人民中，导致了地方性的造反和解放运动。这种日渐扩展的造反运动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失去在这些国家所投资本的危险性。于是，这种危险性以及宗主国新出现的工业分枝部门，在长期资本输出的模式中引起一个突然的变化。与一八八〇——一九四〇期间相比，这时资本已不再是主要地从宗主国投向不发达的国家。而是从某些宗主国投向另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44〕

在朝鲜战争时期之后，原料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都跌落了，这是由于现代大规模工业更高劳动生产力所生产出来的货物的竞争所造成的结果，这种价格跌落加速了不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化和在某些情况下的绝对贫困化。然而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帝国主义投向原料领域的资本越来越失去了把自己局限于在半殖民地进行原料生产的兴趣，而帝国主义投向原料领域的资本在过去本来是能够不但占有殖民利润，而且也占有垄断利润的。到这时，国际垄断资本不但对于用先进工业方法而不是用殖民奴隶来生产廉价原料发生了兴趣，而且对于在不发达国家生产制成品货物而不是原料，也发生了兴趣，那些制成品货物可以以垄断价格在不发达国家出售，而原料在这时已经变得十分价廉。〔45〕这样一来，在十九世纪创造出来的劳动分工再生产，面对着原料生产的突然扩大和来自原料生产与制成品生产的利润率差别的改变，正在缓慢地、但确定地崩溃。

同时，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垄断资本结构所发生的一种变化，加强了这一过程。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初期，宗主国的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消费品、煤和钢铁方面。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世界大萧条之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出口工业的类型，逐渐地向机器、车辆和设备方面转变。一个国家对这

一组商品的出口包装重量，实际上成了这个国家工业发展程度的一种指标。〔46〕但是，日渐增长的固定资本出口因素，使得第三世界初步工业化的最大垄断集团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而且，如果不允许半殖民地国家使用机器的话，那就不可能把机器出售给半殖民地国家。最终的分析是这样——这并不是—种慈善事业的或政治上的考虑——它构成了整个“发展意识形态”的主要根源，这种意识形态是宗主国统治阶级在“第三世界”中培养起来的。

世界经济结构的这种新的变化，是不是最终意味着第三世界向彻底工业化发展的一种趋势？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并达到世界经济的最终均匀化呢？完全不是。它只不过是意味着发达和不发达这种并列形式的一种变化，更确切地说就是：新的、不同水平的资本积累、生产力和剩余压榨正在出现，这些尽管并不属于同样的性质，但与“古典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那些相比，它们是更为明显的。

首先必须指出，关于资本积累方面的差别，大多数帝国主义在不发达世界的投资，并不是来自资本输出，而是来自在不发达世界已经获得利润的再投资，来自对当地资本市场的越来越多的控制，以及来自对不发达国家本身所生产的农业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越来越多的吸收。别的不说，在拉丁美洲的实例中，我们对于这种过程掌握有十分精确的数字。〔47〕尤有进者，不利于经济上依赖宗主国的那些不发达国家的那种向宗主国的价值“外流”或纯外流，仍然在发挥一点也不减弱的作用。除此之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种价值的纯转移，在今天甚至较过去更为严重，这不仅仅是因为红利、利息、帝国主义公司经理人的工资和不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债务等项的转移，〔48〕而且还因为不等价交换的进一步恶化。

这使我们来讨论生产力方面的差别问题。正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中所已经阐明的那样，〔49〕世界市场的不等价交换，往往是两国间平均劳动生产力差异所造成的结果。就其本身而言，这与这些国家所生产的这种商品的物质特性并无任何关系——不论它是原料还是制成品，是农产品还是工业产品。的确，体现在现代工业所生产出来的消费品的生产力水平和体现在半自动过程所生产出来的机器和车辆的生产力水平，其差别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下面这种同样大的：一方面是体现在制造期资本主义或早期工业过程所生产的原料的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是体现在工业制成品方面的生产力水平。因为，第一种比较中的资本有机组成与第二个比较中的是不相一致的。

与此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强调剩余价值率方面的差异。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要想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已经变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工业后备军的现有趋势要缩减。在现在，资本只能集中力量来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创造，即使是这一点，它也只能在这样的程度上作得到：即它要能够使增长了的生产力在剩余价值率方面所发生的矛盾影响中性化。

在不发达国家，真实的是相反的情况。在那里，工业化的开头和接着而来的平均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允许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大大下降，即使是这种价值下降由于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等原因造成的结果而并不总是能从它的货币价格中表现出来。但与此同时，这种平均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并不能导致再生产劳动力在道德方面和历史方面的成本的增长；换句话说，新的需要并不与工资相结合，或者只在一种很有限的程度上相结合。

这种现象可以首先归因于这样一种事实：半殖民地现有的趋势对产业后备军来说是越来越强烈的，因为工业化的缓慢开头赶不上穷苦农民与土地加速分离的步伐。外国资本之逐步转换到制

成品的生产，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因为后者是重在资本，而原料的生产相对地说是重在劳动力。因此，拉丁美洲劳动人口中工资劳动所占的份额，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六三年之间，总是百分之十四，而工业生产在国民总生产中所占的份额则从百分之十一增长为百分之二十三，增长了一倍以上。〔50〕

第二，由于日渐增长的产业后备军的缘故而在劳动市场上有一种不利的势力关系，这种势力关系很有效地使得把工业方面的和矿业方面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工会成为不可能办到的了。结果，劳动力这个商品不但是以其衰落的价值来出售，甚至还低于这种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如果有一种合理的、有利的政治条件，资本就有可能通过对实际工资的重大削减而使剩余价值率进一步增长，以弥补利润率降低的趋势。这种情况在阿根廷发生于一九五六——一九六〇年，在巴西发生于一九六四——一九六六年，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51〕

在有依赖性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劳动力价格较在帝国主义国家要低得多，这种情况的存在，毫无疑问地会造成较高的世界平均利润率——这一点可以最终说明，为什么外国资本要涌向这些国家。但与此同时，它也是资本进一步积累的一个限制因素，因为，市场的扩展是被低水平的实际工资和第三世界工人的微量需要局限在一个极其狭窄的范围之内的。大家熟悉的状况我们在对帝国主义全盛期的简短分析中已经描述过了，这种状况也随之又一次出现了：对当地资本来说，在工业以外投资要比在工业以内投资要更为有利可图。下列事实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不发达国家的那些工业都是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即使有时候是用西方所“丢弃”的设备装备起来的——这些工业大多数都在很大的程度上苦于有未被利用的能力以及缺乏“等级经济”。〔52〕其结果是阻止资本的集中、阻碍生产的发展，鼓励资本向非工业和非

生产领域外流、扩大失业队伍和就业不充分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队伍。真正的“不发达邪恶集团”就在那里，而并不在引起节约率不是的所谓国民收入的不足。〔53〕

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阶段的世界经济结构，在一些重要的特性方面是与古典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经济结构有所区别的。但是，它再现了甚至加强了帝国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生产力和收入 and 繁荣等方面的区别。不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减少了——而不是增长了或者保持不变——而且减少的速度还很快。从宗主国的所有公私资金转移速度都赶不上价值朝相反方向流动的步伐，而且，所谓第三世界国家随之也在它们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交易中，吃了相对贫困化的苦头。很明显，这种贫困化不会有世界贸易中的一种增长份额来伴随它的，也就是说，不会伴之以国际购买力的增长份额的。

第三世界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的迅速下降——从一九五〇年的大约百分之三十二降到一九七〇年的大约百分之十七——当然决不是暗示着帝国主义国家对半殖民地国家所出口的某些战略原料（例如铀、铁矿砂、石油、镍、铝矾土、铬、锰等等）的依赖程度有任何降低：正好相反，这种依赖性还有绝对的增长。〔54〕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构中，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是在这样一种事实中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国家出口的原料的越来越大的依赖，是由付给这些原料的价格的相对降低和这些原料价值的相对降低来陪伴的。

然而，不利于出口基本商品国家的贸易的长期衰落，也会造成这样一种结果：生产这种商品的垄断利润率与生产制成品货物的那种利润率相比的话，也相对降低了。〔55〕这也一定会导致流入制造工业的资本比流入基本生产的资本要多得多。到最后，这两种部门之间越来越严重的不平衡，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它们的相

对价格大大改变的结果——因此，才发生了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基本商品价格的猛增，投机在这次猛增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次猛增中的投机因素和联合因素肯定会再引起这些价格的新的跌落——但是不会跌到一九七二年以前的水平。这样，制成品和基本产品相对价格的这次突然改变，就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自从十九世纪初期以来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原料价格与制成品价格相比之下，突然变得昂贵了。<sup>[56]</sup> 这样一种相对价格的改变，在全世界的资本积累中必然会引起不平衡发展的新的趋势。

作为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个不平衡的、联合发展的基础，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连接在一起的，是价值规律对国际水平的具体影响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世界市场价格的形成及其对民族经济的反响问题。毫无疑问，价值规律只有一个；<sup>[57]</sup> 它有一种功能，就是通过中期的等量劳动的交换，根据社会有效需求的波动，来调整社会现有经济资源在各种各样生产领域中的分配。所谓社会有效需求就是消费结构，或者说，由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关系所决定的收入结构。但是，这样一个一般事实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告诉我们，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中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虽然马克思在一些场合<sup>[58]</sup> 讨论过这一个问题，可是，在《资本论》中，他并没有把这一问题加以系统的分析。但是，以他的看法、以他的学说中的逻辑和他对近一百五十年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的分析等为基础，就能够总结出下列的一些原则：

1.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统一的生产价格（也就是利润率的广泛平等），只能在一个国家的市场内出现（在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不同的商品价值甚至可以在一个国家内的地区性市场中并存，其基础是不同的地区的劳动生产力是各不相同

的，在这些地区中，商品在全国流通是有障碍的)。<sup>[59]</sup> 价值规律只能在下面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导致统一的价格：如果不考虑资本持有者的国籍和原籍，使资本的流动性遍及全世界，资本的分配遍及世界各个地区，因而造成一种利润率总的国际平等的话；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只有在出现一个单一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国家中的均匀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才能办到。<sup>[60]</sup>

2. 产品的统一价格只局限于“国家”市场，这种局限性必然会造成不同国家的商品价值的各不相同。马克思在几个地方明显地强调了价值规律在国际方面的这种特殊影响。这种影响的基础是生产力或劳动强度（因而也包括商品价值）水平在国与国之间的差异、资本有机组成在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剩余价值率在国与国之间的差异等等。在世界市场上，劳动生产力较高的国家，其劳动强度也就被估价为较高，因此，在这样的国家中一日劳动的产品，可以交换到不发达国家中多于一日劳动的产品。

3. 劳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国家向劳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国家出口商品的话，出口货的持有者可以获得一种剩余利润，因为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商品以高于他们本国市场的生产价格但又低于输入国的“民族的”价值的价格出售。

4. 如果出口额很大，足以控制输入国家的整个市场的话，那么，这种商品在输入国家的“民族的”价值，就会在进口商品的竞争压力之下，及时地调整到输出国价值的水平，换句话说，额外的利润将会消失。如果对这一商品的需求，此后继续极迅速地高涨，而且进口不能满足的话，那么，以较高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民族工业来取代被摧毁的落后工业，就有了方便的余地（例如在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之后，纺织工业在俄罗斯、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和一八九〇——一九〇〇年之后部分地在印度和中国），即使是这种“民族”工业的劳动生产力多少是低于输出国的

劳动生产力的。

5. 如果这种出口额一直很有限，不能够决定在输入国中某种商品所包含的必要的社会劳动量的话，那么，这种商品在这一市场上的价值就保持高于输出国的价值，而且，输出国的商品就会继续获得剩余利润（帝国主义国家向印度、东南亚和非洲输出的医药制品就部分地是如此）。

6. 如果一个国家实际掌握了对某种商品的世界垄断，那么，它的生产条件就构成了世界市场价格的先决条件（这当然就会有高过生产国普通平均利润的一种垄断剩余利润）。如果这个国家在这种商品的生产方面并没有掌握一种垄断，而在这种商品的输出方面则掌握着垄断，那么，这同一规律经过必要的修正，还是有效的。

7. 如果一种商品的生产 and 输出没有一个国家掌握垄断的话，那么，这种商品的世界市场价值将取决于满足整个国际有效货币需求所必需的商品价值平均国际水平。这种平均价值可以超过生产力最高的国家的平均价值，也同样可以保持远远低于最落后国家的平均价值。〔61〕

8. 如果一个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被促使来生产某种专门为了出口的货物，那么，这种出口货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在这种货物生产方面实际使用的特殊劳动量，而是取决于一种假设的平均数（也就是取决于这些劳动量，如果这种货物的生产与劳动生产力平均国际水平相一致的话，这种劳动量是会使用在这种商品的生产中的）。在这一方面，这个有关国家通过商品的输出就会遭到物质上的损失——换句话说，在交换用于这种货物生产中的劳动量的时候，这个国家换回的对等物是较少的劳动量。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矿物资源和否则就不会被利用的劳动力都用于这种输出的话，这个国家仍然能够从这种

出口交易中获取绝对利润。不过，与进口这些输出货物的国家相比之下，这个国家将会吃相对贫困的苦头。〔62〕

9. 所有上述这些原则都程度不等地预测了互相进行贸易的各国间的广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参见本章头页引用的恩格斯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只在边缘上是资本主义的，如果输出商品是在前资本主义的或半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那么，商品以低于其“民族的”价值而输出的趋势就会变得更为强烈——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是因为进入商品价值中的“工资”可以降低得远远低于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值，如果生产者只不过是仍然掌握着生产他们自己生活必需品的手段的半无产阶级的话，或者说，如果生产者是这样的小农民，他们仍然在从事维持糊口的农业，并且他们的消费只限于维持生命的生理上的最低限度。〔63〕

10. 正是因为合并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国与国之间的劳动生产力和商品价值，有这么些差异，价值规律才无情地驱使这些落后的国家，以一种低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在对它们本身不利的情况下，在世界市场上进行专化。如果它们不顾这样的事实，想从事高价的工业品的生产的话（以巨大的成本从事小规模的生产），它们就会被斥为在国内市场上亏本出售这些工业品，因为，同工业化国家的那些产品相比的话，生产成本的差别太大，并且超过了国内市场的正常的边际利润。俄国和中国在它们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只是采用了对外贸易的保护性垄断，才躲开了这一命运。

## 注 释

〔1〕 在这一方面，参见我们在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所作的注

释，见第一一九——一二五页。

- 〔2〕《资本论》第三卷，第三三二——三三四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三七二——三七四页）。
- 〔3〕恩格斯致康·施米特，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二日的信，载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选》，莫斯科，一九六五年，第四八三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五一六页）。也见马克思：“我们把它（英格兰）作为一个例子来谈，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那里是一个已经发展了的阶段，而且正象在欧洲大陆的情况那样，大部分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已经不再发生作用，因为农业经济基础与之不相适应……”。《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原载《资本论》第一卷的第六章，Arkiv Marksa i Engelsa，第二卷（四卷），莫斯科，一九三三年，第二五八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四五九——四六〇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七十五——七十六页）。
- 〔5〕安德烈·刚德尔·佛朗克引用了智利一位前任总统的话说，在十八世纪，巴西制造业生产的重要性比在美国的还要更大一些，《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纽约，一九六七年，第六十页。
- 〔6〕见马克思：“为这种生产方式所发展的劳动生产率、生产量、人口数、过剩人口数，又以解放出来的资本与劳动不断引起这样一些新营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资本又可以小规模地进行工作和再经过各种不同的发展，一直到这些新营业部门也以社会的规模进行营业为止。这种过程是经常不断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有一种趋势：征服迄今尚未被它支配的、还只存在着形式隶属的一切工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征服了农业、矿业、主要衣料制造业等等，它就会席卷其他一些还只〔有〕形式〔隶属〕或者仍然〔有〕独立手工业者的部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一二〇——一二二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第一〇二页）。
- 〔7〕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讨论“比较正常”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暴力干预（对原来所有主的剥夺、把农民从他们的土地和住宅中驱逐出去、不许接近传统上方便地保有土地、生活和劳动手段等）阻碍了勤劳的生产者对使用价值的生产，并且把这些转化成为劳动力商品的销售者，从而变成了工业产品的购买者。

- [8] 见罗莎·卢森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小资本家在技术变革方面起了先锋的作用。他们在双重意义上起这种作用。他们在稳定的工业分枝部门中发明了新的生产方法；他们在创造尚未被大资本家剥削的新的工业分枝部门方面，起了促进作用。”《社会改革或社会革命》，纽约，一九七〇年，第十五页。
- [9] 布哈林：《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伦敦，一九七二年，第二十五——二十六页。
- [10] 卡尔·马克思：“固然，世界市场本身，也形成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不过另一方面，这个生产方式固有的按不断扩大的规模来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也促进着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并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资本论》，第三卷，第三三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三七三页）。也见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加脚注：“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海洋轮船、铁道、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现实地形成了世界市场。”来源同上，第四八九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五六七—五六八页）。
- [11] 奥里弗·柯克斯：《资本主义制度》，纽约，一九六四年，第一、六、十页。
- [12] 据 A.C. 卡特尔估计，直到一七六〇年，在大不列颠股份资本总额中，荷兰资本大约要占四分之一（见查尔斯·威尔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十八世纪荷兰在英国的投资》载“经济史评论”，一九六〇年四月号）。在比利时的工业化中，英国资本的作用可以用现代机器制造工业的创始人柯克利尔兄弟（Cockerill）为代表。在法国工业化的第一个浪潮中，比利时和英国资本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参见亨德逊 W.O. Henderson 所著《大陆的工业革命》，伦敦，一九六一年；东特 Dhont 所著《法国统治期根特（Ghent）的棉纺工业》，载克罗紫特 F. Crouzet、恰龙纳尔 W.H. Chaloner、斯特恩 W.M. Steen 所编《欧洲经济史论文集：一七八九——一九一四年》，伦敦，一九六九年）。荷兰资本与莱茵河左岸德国纺织工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参见阿德尔曼 Gerhard Adelman：《工业化开始时莱茵河流域棉麻贸易的结构变化》，载《欧洲经济史论文集：一七八九——一九一四年》）。关于法国资本在意大利工业化第一个浪潮中所起的作用，见盖尔（A.B. Gille），《法国在意

大利的投资：一八一五——一九四〇年》，都灵，一九六八年，也见阿尔杜·亚力山德鲁·毛拉(Aldo Alessandro mola) (编)《L' Economia Italiana dopo l'unita》，都灵，一九七一年，第一三〇页以下。关于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在美国铁路体系的建造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尤其在一八六六——七三年期间)，参见金克斯(L.H. Jenks)：《作为美国发展的一种经济力量的铁路》，载“经济史杂志”，IV，一九四四年。

- [13] 菲立斯·迪恩(Phyllis Deane)和柯尔(W.A. Cole)：《英国经济发展史：一六八八——一九五九年》，剑桥，一九六七年，第三十六、二六六页。也见马克思：“一个不断扩大的大量生产，泛滥着现有的市场，所以，它必须不断从事于这个市场的扩大，从事于它的限制的突破。限制这个大量生产的，不是那个仅仅代表现有需要的商业，而是功能中的资本的量和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资本论》第三卷，第三三六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三七七页)。另外也见L.H. 金克斯：《一八七五年以前英国资本的移动》，伦敦，一九二七年。也见外交部一八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在给驻外国外交使节的著名的通报，通报明白地强调，国内投资对国外财产应享有优先权。(《外交部档案》，F.O. 十六，第六十三卷，通报日期：一八四八年一月十五日。)
- [14] “缩短流通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改良交通。过去五十年间交通方面已经发生过一次革命，那次革命的影响只有十八世纪后半期发生的产业革命的影响可以和它相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七十一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五十八页)。
- [15] 见毛里斯·列维——列保义尔(Maurice Levy-Leboyer)：《十九世纪前半期欧洲银行和国际工业化》，巴黎，一九六四年，第三二〇页。
- [16] “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运输——交通工具的变革，又是征服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经营在破灭外国手工业的产品时，强迫地把外国变作自己的原料产地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五一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一卷，第四八五页)。关于铁路建设在前帝国主义时期对英国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重要意义，参见毛里斯·杜勃：《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伦敦，一九六三年，第二九七——二九八页。

- [17] 在一八八三年，一个男纺织工人纺某一类型的纱线，每周工作六十九个小时，在英国每周所得工资相当于三十七个法郎，在法国每周工作七十二至八十四个小时，工资为十九个法郎，在瑞士工作同样多的小时，工资为九——十二法郎；见列维—列保义尔前引著作，第六十五页。
- [18] 艾米里奥·塞伦尼(Emilio Sereni)《Il Capitalismo nelle Campagne》，一九六八年，第十八、十九、二十二—二十三页。
- [19] 斯特鲁米林(S. Strumilin)：《俄罗斯的工业危机：一八四七——一八六七年》，载克罗塞特、恰龙纳尔和斯特恩所编《欧洲经济史论文集：一七八九——一九一四年》，伦敦，一九六九年，第一五八页。
- [20] 在俄罗斯组成的公司在一八五五年拥有资本 750,000 卢布，而到一八五八年则拥有 5100 万卢布(来源同上，第六十八页)。也见罗吉尔·波特尔(Roger Portal)：《俄罗斯的工业化》，载《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第二部分，剑桥，一九六六年。波特尔引用的数字是：一八六〇年为 35,000 万卢布，而在一八六〇年与一八七〇年之间，铁路公司股份资本就有 70,000 万卢布左右。
- [21] 洛克伍德(W.W. Lockwood)：《日本的经济的发展》，普林斯顿，一九五四年，第一一三页。棉纱锭的生产从一八八四年的 13,000 个增加到了—八九四年的 292,000 个和—八九九年的 757,000 个；汤玛斯·斯米士(Thomas C. Smith)：《日本的政治变化和工业发展：政府企业，一八六八——一八八〇年》，斯坦弗，一九六五年，第三十七、六十三页。
- [22] 塞伦尼前引著作，第三十二——三十三页。斯米士前引著作，第二十六——二十七页。
- [23] 据斯特鲁米林估计，在一八五五年与一八六〇年之间，有价值八千万卢布的黄金，流出了俄罗斯，在一八六一年与一八六六年之间，有价值一亿四千三百万卢布的黄金，流出俄罗斯(第一六七、一七四页)。大家公认的是，这第二个数额中的大部分可以用俄罗斯贵族的这种行动来加以解释，这些俄罗斯贵族把他们的财产卖掉并在国外过一种寄生生活，以对农奴制度的废除作出回答。
- [24] “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和土地价格低廉，但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那里总的说来还是不大发展，资本的利息很高，另一个国家的工资和土

地价格名义上很高，资本的利息却很低，资本家在一个国家就会使用更多的劳动和土地，在另一个国家就会相对地使用更多的资本。”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八五二页（应为第八七四——八七五页——译者）（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一〇二七页）。

- [25] 参见从欧莫尔·塞拉尔·萨尔斯 (Omer Celal Sarc) 著作中的引文（《改革法规与我们的工业》，和斯米里昂斯卡亚 (I.M. Smilianskaya) 的《十九世纪中叶叙里亚和黎巴嫩封建关系的解体》，载查尔斯·伊萨威 (Charles Issawi) 所编《中东经济史》，芝加哥，一九六六年，第四十八——五十一、二四一——二四五页。指出这一点是令人感兴趣的：“收益效果”的缺乏（“累积的工业化”）实际上是取决于我们已经描述过的综合性企业，而不是取决于用资本主义手段生产出来的第一批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中国的情况是，这种商品并不是原料，而是纺织品（见库钦斯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历史地位》，柏林，一九六四年，第十六——四十一、一〇六——一〇七页，关于中国纺织工业在一八九四——一九一三年期间的可观的规模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以后，这一工业重新获得的极大发展）。尽管有这种情况，累积工业化的过程，并没有发生过。在本书第十一章中，我们将比较彻底地来讨论这一问题。
- [26] 见保尔·巴兰《增殖政治经济学》，纽约，一九五七年。
- [27] 安德烈·刚德尔·佛朗克前引著作；西奥顿尼奥·多斯·桑托斯 (Thestonio Dos Santos)：《拉丁美洲的经济和贸易革命》，加拉加斯，一九七〇年。
- [28] 厄尔涅斯多·拉克鲁 (Ernesto Laclau) 认为，在阿根廷，这至少说部分地是由于这样一种事实：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地方上地主级差地租的自然增长，将大部分合并入农业出口产品的剩余价值给吸收了；见《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和人口过剩》，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七〇年。
- [29] 参见拙著《关于第三世界原始积累和工业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载《遵从一种理论，关于卡尔·马克思〈资本论〉论文集》，法兰克福，一九六七年。也见卡伊新著《发达与不发达：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伦敦，一九七四年，这部书对不发达所作的任何一种解释，都强调了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商业资本的特殊重量和作用。

- [30] 关于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在“国内市场”的创造中，劳动分工和在乡村中引进货币经济所起的主要作用，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七四七——七四九页；列宁《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与本地地主之间的关系，为当代社会联合阻止这一过程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证。见费德利科·布里托(Federico Brito)：《二十世纪的委内瑞拉》，哈瓦纳，一九六七年，第十七——六十页、一八一——二二一页。
- [31] 赫尔南·拉米列兹·尼科契亚(Hernan Ramirez Necochea)，《英国在智利的经济统治，一八一〇——一九一四年》，载《处在解放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拉丁美洲》，柏林，一九六一年，第一三一、一三七页。另见同一作者《帝国主义侵略智利史》，哈瓦纳，一九六六年，第六十二页。英国资本在铜矿中的股份不高于20—30%。也参见安德烈·刚德尔·佛朗克对这一时期的综合性研究(前引著作第五十七——六十三页)，他在这部著作里引用了一些智利的数字。指出这一情况是令人感兴趣的：在智利独立的前五十年中，智利建成了—一个拥有二百七十六艘船的高船队，这个商船队到一八六〇年达于登峰造极，然后，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跌落到了只剩下七十五艘船。
- [32] H.R. 尼科契亚：《英国在智利的经济统治》，第一四七页。
- [33] 英国资本在智利北部硝石工业方面的投资，在短短两年中超过了九百万英镑，英国资本对智利北部硝石工业的统治，伴随着——在古典帝国主义时代经常是如此——对上述这一地区(塔拉巴卡 Tarapaca)整个公用事业的统治：铁路、城市供水系统和银行，见尼科契亚上引著作，第一四六——一四七页。
-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一〇八页(第一〇八——一〇九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一〇二页)。
- [35] 尤金·杰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在其所著《奴隶的政治经济学》中(纽约，一九六五年，第四十三——六十九页)，关于美国南方各州在奴隶制度之下棉花种植园低下的劳动生产力，提供了大量具有说服力的资料。
- [36]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从大不列颠输入的原料价格，达到了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的最高点。一八七三年开始了暴跌，大约

到一八九五年左右，原料价格跌到了输入价格平均指数的一半！参见米契尔(B.R. Mitchell)和菲立斯·迪恩：《英国统计史摘要》，剑桥，一九六二年；C.P. 金德伯格等《贸易条件：欧洲实例研究》，剑桥，美国，一九五六年；鲍特尔(Potter)和克利斯蒂(Christie)：《自然资源商品的倾向性》，巴尔的摩，一九六二年。在这同一个时期，英国本身也确实在原料价格方面有一种跌落现象：在一八七三年与一八八六年期间，酸性转炉钢的每吨价格，跌到了只有其以前水平的四分之一（毛里斯·杜勃前引著作第三〇六页）。

- [37] 外国资本在“第三世界”为了生产棉花、橡胶、茶叶、咖啡以及其他产品而建立起来了一些生产中心，对于这些中心中，前工业种植园资本主义的特性，有许多种的描述。比如参见台姆比亚(S.J. Tambia)在所著《东南亚和西方财富和节约的功能》，巴黎，一九六三年，第七十五——八〇和八十四页以下。指出这一点是令人感兴趣的：即使是在较晚近的时期，也有一些介绍前资本主义生产的例子（例如一八六〇——一八六六年埃及棉花的繁荣），这使得保持价格上涨成为可能，但是，其结果是造成了农民的可怕毁灭和继之而来的适应现代的生产方式（欧文(E.R.J. Owen)《十九世纪埃及的棉花生产和棉花经济的发展》，载查尔斯·伊萨威编的《中东经济史》一八〇〇——一九一四年，芝加哥，一九六五年，第四一〇页）。
- [38] 在中国的纺织工业中，每日工作十二个小时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童工也是如此。在上海的纺织工厂中，在一九三〇年，每月只有1.7天休息日，英国驻这个城市总领事在一份文献中曾记录了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而中间无任何休息，参见这一文献，载库钦斯基前引著作，第一七〇——一七三页。
- [39]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四四三——四四七页。
- [40] 弗里茨·斯特恩伯格（见《帝国主义》第一章和第四五六页以下）是对工资的发展和剩余人口（亦即产业后备军）之间的联系，进行彻底探索的第一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本书第五章。
- [41] 联合国《不发达国家进出口的相对价格》，纽约，一九四九年。英国是那个时期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对英国说来，贸易条件很明显地变得更为有利，贸易指标从一八八〇——一八八三年的100—99，增长到一

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的 113——115, 和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的 134——136 (所有高水平年度都在连续贸易循环中)。

- [42] 根据联合国出版物《世界经济研究》, 第一卷, 《在世界贸易中的发展中国家》, 纽约, 一九六三年, 在一九五〇——一九五二年这一期间, 原料出口价格总指数, 比一九三四——一九三八年期间的平均值上涨了三年以上, 而且比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年的平均水平高出了14%。在很多情况下, 增长额与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年相比的话, 要大得多: 棉花、羊毛、黄麻和西沙尔麻为 31%; 咖啡、茶叶和可可 29%; 有色金属为 23%。在一九五〇——一九五二年这一时期, 加工商品的出口价格指数比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年的平均数要低 10%。
- [43] 下面是一些化学合成物的生产与天然原料相比较的增长数字。合成纤维在世界纺织生产中所占份额, 从一九三八年的 9.5% 增长到一九四八年的 11.5% 和一九六五年的 27.6%。合成橡胶的生产在世界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总生产额中所占份额, 从一九三八年的 6.4% 增长到一九四八年的 25.9% 和一九六五年的 56%。见保尔·拜罗克 (Paul Bair och) 《第三世界经济分析: 一九〇〇——一九六六年》, 巴黎, 一九六七年, 第一六五页。资本主义世界塑料生产从一九五三年的二百万吨增长到一九六五年的一千三百万吨——比世界有色金属总产量还要高。据罗克也报导了在原料消费方面大大加强了节约 (投入较少原料而获取同样数量的最终产品), 这是技术发展的结果: 来源同上, 第一六二页。
- [44] 在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期间, 英国国外投资资本的 40 亿英镑中, 只有 13.5% 是投资于工业化国家的, 而 86.5% 则投向了发展中国家 (其中 37.5% 投向了白人统治的国家)。一九五九年, 对外投资总额为 66 亿英镑, 其中工业化国家所占份额已上涨为 33% (再加上 24% 投向了白人统治国家): 见米契尔·巴拉特布朗 (Michael Barratt-Brown) 《帝国主义之后》, 伦敦, 一九六三年, 第一一〇、二八二页。美国是当前主要的资本输出国, 其变化甚至更为显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输出的 500 亿美元中, 到一九六〇年, 有三分之二投向了工业化国家, 在一九六〇年之后则有四分之三。也见皮叶·加里 (Pierre Jalée) 《一九七〇年的帝国主义》, 第七十七——七十八页。
- [45] 拉丁美洲在这一方面提供了一个最清楚的例证, 在这里, 据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表明，一九六六年在制造业方面的外国投资高达 53 亿美元，而石油工业（包括炼油工业和分配系统）则为 49 亿美元，矿业则为 17 亿美元，银行、保险公司、公共服务和种植园等则为 38 亿美元。

- [46]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出口货中，构成“机器和运输手段”的一组商品所占的份额，在大不列颠一八九〇年为 6.5%，一九一〇年为 10.6%，在美国、大不列颠和日本，一九六八年则为 40%，在西德一九六九年则为 46%。
- [47] 据西奥顿尼奥·多斯·桑托斯（见其前引著作第七十五—七十八页）的计算，在一九四六—一九六八年这一时期，有一百五十亿美元的资金以红利、利息等等形式，从拉丁美洲作为外国资本投资而流入了美国。从美国向拉丁美洲实际上的新的资本输出，只有五十五亿美元，因此较剩余价值的不断外流要少得多。
- [48] 关于“发展的十年”的皮尔森报告，《发展中的伙伴，国际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伦敦，一九六九年，对半殖民地国家债务的大规模增长，描绘了一幅鲜明的图景。在一九六一年与一九六八年间，从 215 亿美元增长到了 475 亿美元（第三七一页）。对这些债务每年付出的利息和外国投资的利润，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和智利已经超过了出口收入的 25%，在印度和突尼斯已经超过了 20%（第三七四页）。
- [4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五九—五六〇页。
- [50] 安德烈·刚德尔·佛朗克《Lumpenburguesia, Lumpendesarrollo》，加拉加斯，一九七〇年，第一一〇页。这些来源于联合国的官方出版物（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和国际劳动组织）。在印度也一样，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二年，每年平均工业增长率为 6.6%，而每年平均雇用增长率则只不过 3.3%，甚至在一九六六—一九七三年还跌到了 1.8%，这时比每年人口增殖率还要低。见《关于印度经济的基本统计数字》，商业研究署出版，孟买，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 [51] 鲁伊·毛罗·马利尼（Ruy Mauro Marini）估计，在圣保罗——巴西最高度工业化的中心——产业工人实际工资在一九六四年军事大暴动之后的两年中下降了 15.6%。他作出这一估计的基础是官方的生活费用指数，而这种指数肯定是低估了通货膨胀率的。《Subdesarrollo

- y Revolucion》，墨西哥，一九六九年，第一三四页。在较长的时期中，巴西最低工资的购买力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八年之间降低了62%。见艾米尔·萨德尔(Emile Sader)《巴西的政治经济》，载“政治经济评论”，一九七一年，四——六月，第三期。
- [52] 也见缪勒·普兰敦伯尔格(Müller-Plantenberg)《技术与独立》，载“政治经济评论”，一九七一年，四——六月，第三期。
- [53] 保尔·巴兰在《政治经济增长》中已经对这种经院经济学作了彻底的、令人信服的批评。
- [54] 皮叶·加里对这种越来越严重的依赖性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前引著作第二十五——二十六页)。拜罗克(前引著作第七十六页)发现，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六五年之间，发展中国家的铁矿砂在世界铁矿砂产量中所占份额从7%增长到了37%，其铝土矿在世界铝土矿产量中所占份额从21%增长到69%，其石油在世界石油产量中所占份额从25%增长到了65%。
- [55] 在六十年代，欧洲石油公司努力冲破世界石油卡特尔对石油价格的控制，取得了成功，这导致了石油价格的实际跌落，并导致了“石油主要生产国”利润的减少，这些石油生产国制造了一部分是有意识设计的——石油短缺现象，并用卡特尔暂时又重新建立了对价格的控制。这种竞争和垄断、对规定价格的冲破和重组的全部情况，以及石油市场上价值规律的基本作用，都被艾尔森豪斯(H. Elsenhaus)和容尼(G. Junne)作了详尽描述，见《石油危机现状的背景》，载“德意志和国际政治新闻”，科隆，一九七三年，第十二期。
- [56] 见安吉斯·霍恩(Angus Hone)《商品初步繁荣》，载“新左派评论”，第八十一期，一九七三年，九月——十月号。
- [57] 皮叶·纳维尔(Pierre Naville)在把这一事实作为一个伟大的发现提出来的时候，他并不是处在他所认为的处女地上，见《社会主义工资》，巴黎，一九七〇年，第十四——三十页。除此之外，他从这里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一种“单一的价值规律”可以调整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世界的经济关系(第二十四——二十五页)。价值规律已经是十九世纪中叶世界市场的一种“单一的”规律；但是与此同时，它决没有调整中国各种生产部门经济资源的分配。这一点就使得中国的生产关系有进行一次革命的必要。价值规律现在也没有调整中国或苏联

今天的经济关系。纳维尔忘记了，在资本主义时代，这种调节并不是取决于商品的运动，而是取决于资本的运动（我们在很早以前就把简单的商品生产丢下了）。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资本的自由运动在中国或在苏联是不能允许的，在那里，投资决不是取决于市场规律（从而最终取决于价值规律）。

- [58] 比如：《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资本论》第三卷，第二一四——二一五页；《资本论》第三卷，第十四章第五节；《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末尾；《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九章末尾；《资本论》第三卷，第八〇三——八一三页；《资本论》第三卷，第五十章，第八七四——八七五页；《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第十六——二十页；《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卷，第二五二——二五七页；《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八七二页；等等。
- [59] 见当代印度的实例，在那里，各个州基本食品的价格，基本上仍然各不相同，一个州可能发生了饥馑，而另一个邻近的州则可能仍然维持正常价格。很显然，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完全自由，是商品统一价值形成的先决条件。见《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九六页。
- [60] 见本书第十章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 [61] 这说明了在一个相对说较短的时期内食品世界市场价格有时发生的重大的波动。因为，一旦在世界市场上出现一个突然的甚至只是边缘的粮食短缺的话，那么，在产量最低的国家中相对而言最贫瘠的区域的产品——这种产品在正常情况下甚至根本就不输出——这时也会立刻决定世界市场价格。例如，由于世界谷物贸易只构成世界谷物产量的一个很小的比例，那么，一个大国需求量稍有增加，就会突然提高谷物价格 25% 或 50%。
- [6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二三八页。
- [6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八〇五——八〇六页。

## 第三章

### 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剩余 利润的三个主要来源

在第二章里，我们论述了这样一种情况：帝国主义问题必须历史地解释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一种质的变化。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了世界范围的再生产问题，这是马克思对资本所进行分析的基本问题之一，这就是不平衡的发展与竞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有抑制不平衡发展的趋势，但又被它所阻碍。我们就将讨论利润率的均等化问题。首先，我们将关心剩余利润探索在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已经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天生来总是会导致不平衡性。我们还必须记住，资本向新的王国的扩展问题——不论是技术上的新王国还是地理方面的新王国——最终是取决于利润水平的差别，这就意味着必须在同一时间内有一个相对过剩的资本、一个相对静止的资本和对垄断所提供的不同利润率的均等化的相对限制。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发展过程并不是由任何利润率的有效均等化所伴随的。<sup>(1)</sup>

如果说资本积累是扩大相对剩余价值再生产的一种手段，或者说是为了达到使工资绝对地或相对地降低的目的而更加扩大再生产产业后备军的一种手段，那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已经作到最大积累并具有最高有机组成的那些资本的利益，共同走到社会生产剩余价值再分配的同—个过程中去了。如果说资本积累是对

平均利润率的降低的一种反应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是，最强大的那些资本不会仅仅以扩大利润主体为满足，而是也要试图来提高它们的利润率。如果说资本积累要依靠剩余价值的实现，那么也一样，在“多种资本”的前后关系中——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竞争的前后关系中——后者最终必然是一个追逐剩余利润问题。因为，资本家只能部分地实现他们的剩余价值，或者只能在低于或等于平均利润率的情况下实现他们的剩余价值，这样的资本家与下面那些资本家相比，显然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些资本家充分地兑现了他们的商品的价值，并有所谓第二份——也就是从额外的其他一些领域中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换句话说，也就是剩余利润：“并且，个别资本在与此不同的情况下所以会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内实现剩余利润——因为各特殊生产部门间利润率的差异，将会不断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把仅仅偶然的差异撇开不说，又总是由于成本价格也就是生产费用的减少。这种减少，或是由于这个事情：资本的应用量较大于平均量，以致生产上的杂费已经减少，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一般的原因（如协作，分工之类），也因活动的范围已经较大，已经能够按更高的程度，更大的强度来发生作用。不然，就是由于这种事情：把功能资本的量撇开不说，已经有更好的工作方法、新的发明、改良的机器、化学的工业秘密等新的、改良的、平均水准以上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法被利用。”〔2〕

这种双重过程通过机器的改进和较高的资本有机组成而包含了资本本体的扩大和商品成本价格的降低，是不是可以说，这种双重过程包括了在竞争压力下资本积累的全部意义和目的呢？因此，我们把这一过程描绘成为它是由千方百计的对剩余利润的追逐所控制的，这是对的吗？

然而，只要一承认这种扩大再生产过程是取决于对剩余利润的追逐，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就出现了：在一种“正常的”资本主

义经济中，剩余利润是怎样产生的呢？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证实了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论述过的一个课题。把制造剩余利润的条件压缩成只有一个单一的因素，那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运动规律，都必须加以考虑。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利润产生于：

1. 当一种特殊资本的有机组成小于社会平均数的时候，但是，与此同时，制度上的或结构上的因素阻碍了在这些部门中产生的那种高于平均数的剩余价值，不使之进入利润率均等化的过程中去。<sup>〔3〕</sup> 举例来说，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地产垄断所创造的那种称作绝对地租的剩余利润的根源。说得更普通一些，那就是所有垄断剩余利润的根源。

2. 当有机组成高于社会平均数的时候，也就是，当一种特殊资本能够从某个部门的生产力方面获得利益，并因而占有这一部门中其他公司所生产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的时候。“根据以上的说明，可见市场价值（一切有关市场价值所说的话，加上必要的限制，都适用于生产价格）对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内按最优条件从事生产的人来说，都包含有一个剩余利润。”<sup>〔4〕</sup>

3. 当有可能把偿付劳动力的价格压低到低于其社会价值水平，也就是低于其社会平均价格的时候，或者同样也可以说在这样的時候：能够在这样一些国家购买劳动力，在这些国家里劳动力的价值（平均价格）低于它在商品出售的国家的价值（平均价格）。<sup>〔5〕</sup> 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剩余利润就会从高于社会平均数的剩余价值率上涨。

4. 当能够把偿付给不变资本各种组成部分的价格压低到低于社会平均数的水平（生产价格）的时候。实际上在正常情况下，这一点只可能在流动资本方面而不是在固定的不变资本方面办得到——换句话说，就是在这样的時候：一个公司、一种工业或一

个国家的资本，接近了一种原料，这种原料的价格低于其他种资本必须使用的那种原料的价格。

5. 当流动资本（因而可变资本）的再生产加速的时候，也就是在一种特殊流动资本的周转期较社会平均流动资本的周转期为短而这个较短期限又没有中期普通化的时候。在这里，剩余利润只在这样的時候才出现：利润率是按总股本来计算，而不是按年度资本流通来计算，因为它来源于这个公司内部剩余价值的额外生产。实际上，这种变化是上面第一条的一个特殊例子：它等于为缩短流动资本周转期的一种技术垄断。例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汽车工业中，欧洲汽车公司在为传送带和组装线产量的低成本筹措资本时所遇到的困难，传送带和组装线产量使美国公司流动资本的周转期比欧洲的要短得多。

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我们都是讨论剩余利润，这种剩余利润并没有进入短期的均等化过程，因而也没有导致平均社会利润率的增長。随着这种剩余利润而来的，确实可以是平均利润率的降低，而且，事实上大多数就是如此。有一个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剩余利润在垄断的保护之下在很多部门中都提高了，这个例子说明，如果剩余利润数量相当可观的话，它是如何甚至可以明显地促成平均利润率的跌落，因为这些剩余利润已经从剩余价值本体中被提了出来并且在非垄断化的各个部门中被瓜分了。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为什么没有发生主要的国际资本运动（而且，在相对落后国家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基本过程中，也因而并没有发生意义重大的分裂），但在帝国主义时期这些运动却会广泛地出现呢？下面的一些因素阻止了利润率发生国际性的差异，或者将这种差异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

1. 第一批工业化国家产业后备在结构方面的重要性。就长期

而言，这导致实际工资的停滞或降低（只是偶然有增长），因此，相对地说，很少有什么刺激因素来剥削落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sup>〔6〕</sup>

2.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为了这种斗争而产生的永久性工人阶级组织在早期的制度方面的缺点，首先是工会组织的缺点，这必须归因于这种产业后备军的规模。<sup>〔7〕</sup>

3. 在农业与年轻的、现代大规模工业之间生产力水平的重大差异，是“不等价交换”和工业资本剩余利润一个根源，因为，资本向农业方面的渗透和资本主义地租的出现，都还不过是一种边际现象。<sup>〔8〕</sup>

4. 西欧（和北美）可以自由接近的投资区域的众多，这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是铁路修筑的不受阻碍的发展和一系列生产领域的工业化的结果，这些生产领域例如开矿、纺织、机器修造、制鞋、钢铁冶炼、制砖、制水泥等等。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第一个世纪中导使资本趋向于国际基本稳定（或者使资本的运动主要局限于欧洲）的那些同样的因素，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开始有了相反的影响：

1. 有一个发展迅速而又不受阻碍的劳动力从西欧向外移居运动，最先是向北美洲移居。北美洲在一八五一年至一九〇九年之间共吸收了两千二百五十万移民，其中有九百万是从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〇年之间的这三十年中到达北美的，而从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五〇年这三十年中则只有二百万。西欧和中欧愈来愈多地变成了全世界的工业作坊，所以，在西欧，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的破产和产业后备军的生长，已经不再象东欧和南欧尤其是其他大陆那么严重了。随之而来的是在西欧产业后备军的一次长期的衰减和一次工人组织的再度壮大，这导致了实际工资的缓慢但持续不断的生长。<sup>〔9〕</sup>于是，对西欧和北美以外廉价劳动力进行剥削的一种新的兴趣，逐渐产生了。

2. 一方面是农业与采矿业之间，另一方面是农业与加工业之间的生产力水平之差异，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对一些重要的原料产生了愈来愈强烈的不能满足的需求，由于美国南北战争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对英国棉花的需求更加强烈了。在很多情况下，原料价格有了绝对的增长，但是，至少在所有的情况下，原料价格有了相对的提高（从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七〇年间，棉花价格持续不断地、毫无阻碍地在上涨）。

3. 西欧各国的彻底工业化达到了一个高峰，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繁荣和新的日尔曼帝国的创建阶段之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技术，这时已经普遍被采用，而且在一些西欧国家有着丰富的多余资本。资本的日趋集中和已经工业化的领域中新投资的越趋增高的成本——以及其后托拉斯和垄断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投向新投资领域的资本在迅速增加。

4. 在长期中，利润率的降低变得明显了，这种降低是由资本有机组成的明显增高所引起的。<sup>[10]</sup>

因此，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大规模形式出现的向不发达国家的迅速资本输出，就成了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输出的帝国主义资本这时以下述手段获取剩余利润：

1. 向这样一些国家和领域投资，在这里平均资本有机组成大大低于西欧制造工业的，因而就能获得高得多的利润率。

2. 这种利润率愈来愈增长，这是因为在从属人手里的剩余价值率有时要比在宗主国手里的高得多，这是由于这样一种事实：后备军的长期扩大，使得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格降低到其价值水平之下，而且，这一商品的价格比在西欧的要低得多。<sup>[11]</sup>

3. 对农业方面和开矿方面换句话说就是对原料生产方面的集中的资本输出，在最初以付给原料的某种价格而使得这种资本大赚其剩余利润（在与传统的生产方法和较低的劳动生产力的竞争

中赚得)。然后，这种资本输出导致所有原料价格的普遍降低，结果，宗主国的利润率（或者减低资本的有机组成）增长了。

4. 这些资本投资完全包括在这样的资本之内，这种资本在宗主国是闲滞的，不能获取平均利润，只能获取平均利息。因此，这种资本的大量输出，也照样会引起平均利润率的普遍增长。<sup>[12]</sup>

这样看来，工业资本主义历史中前两个连续阶段——也就是自由竞争阶段和帝国主义阶段或如列宁所描述的，古典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开端，是以两种加速积累的状态出现的。由于追逐剩余利润而开始的资本输出运动和流通的不变资本的日趋廉价，导致了宗主国平均利润率的暂时提高，这又反过来说明了一八七三年到一八九三年由跌落的利润率所控制的长期停滞之后，在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一四年期间资本积累的巨大增长。<sup>[13]</sup>平均利润率的这一增长使得资本能够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猛烈发展的第二个时期。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征服并统一了世界市场之后，它并没有创造出一个生产价格的统一体系，而是创造了不同国家生产价格和统一的世界价格的一种有区别的体系。这可以使得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能够获取剩余利润，因为它的商品可以以高于它们“自己”国家的生产价格而又低于购买国家的“国家生产价格”来出售。总而言之，不同商品价值的这种国际等级化和区分化的体系，要用劳动生产力不同水平的国际等级化和区分化体系来加以解释。帝国主义远远没有使资本有机组成在一个国际水平上均等化——或者导致一种利润率的国际均等化——它捕捉并加深了资本有机组成的国际差别和利润率的水平。

马克思正视了这一点的可能性，他写道：“资本是按更大的程度还是按更小的程度实现这种平均化，那要看资本主义在一定民族社会内发展的程度而定，也就是说，要看该国的状态和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程度而定。资本主义生产进展了，它的各种条件就会随同发展，并且让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各种社会前提全部从属于它的特殊性质和它的内在规律。那种在不断的不平衡中不断实现的平均化，在下述两个条件下，将会完成得更为迅速。

(1) 资本已有更大的能动性，也就是，更容易由一个部门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另一个地点。(2) 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由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由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第一个条件包含有这样的意思：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商业自由，除了自然的即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生出的垄断，已经把一切的垄断都排除掉。它还包含有这样的意思：信用制度的发展，已经把大量没有有机联系的可用社会资本，集中到资本家个人面前。最后，它还包含有这样的意思：不同生产部门都已经处在资本家的摆布下。这里所说的最后一点，在我们讨论一切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的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时，本来已经包括在我们的前提中；这种平均化，在有大量非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部门（例如小农经营的农业）插在资本主义经营中间，同它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碰到更大的阻碍。<sup>[14]</sup>

很明显，由于上面简述的原因而阻碍了利润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均等化的那些障碍，在国际范围内发挥的作用就更大了。比较明显的资本相对稳定、普遍的劳动力稳定尤其是大规模非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存在，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化结合，所有这些都是从帝国主义时代开始以来使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利润水平能够发生差异的因素，都是使得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本投资成为剩余利润的永久性源泉的因素。

作为最后的办法，在宗主国一方面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另一方面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还必须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资本

主义世界市场把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给普遍化了，但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给普遍化。更加抽象一点说：总而言之，帝国主义的各种表现可以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共性的缺乏来加以解释。

这种缺乏共性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它是不是从资本本身的本性中产生的呢？或者它是不是一个初始历史结构——殖民主义结构——的一种结果呢，这种结构肯定是资本向整个地球胜利进军的一个具体伙伴，但它并不代表资本积累向前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使我们又回到了利润水平的差异问题，这是无休止地追逐剩余利润的一种说法，它源出于资本积累本身的不平衡的运动。在资本有机组成不断增长和新工艺新技术不停发展的“纯粹的”情势下——这是马克思早已预见到但直到今日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才以充分发展了的形式出现——利润水平的差异，源出于资本的竞争和对所有的公司、分枝机构和地区的无情的谴责，这些公司、分枝机构和地区在这次竞赛中落后了，因而不得不把它们“自己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输送给那些领先者。除了不发达的公司、分枝机构和地区的不断生产之外，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这样，即使是在同样开端这样的“理想情势”之下，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扩大的再生产以及资本积累仍然与发达和不发达的并列和永远结合是同义的。资本积累本身就产生发达和不发达，作为资本那不平衡结合运动的一些互相决定的因素。资本主义经济之缺乏共性，是资本主义本身运动规律发展的必然产物。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技术发明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决不是取得剩余利润的唯一途径。廉价劳动力的发现及其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结合以及廉价原料的生产，也都可以为此目的服务。廉价劳动力是在这样条件下被发现并被再生产的：在那里还没有任

何普遍的劳动分工，而与此同时，在劳动力再生产物质成本方面劳动力价值的降低，阻止了任何有效需求的扩大，因而也就阻止了内部市场的扩大。在这些条件下，资本本身为它自己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不可超越的限制。到最后，即使是从曼彻斯特 (Manchester)、索林根 (Solingen) 或底特律 (Detroit) 来的最廉价的商品，面对着在很大程度上被封闭在一种自然经济中的印度人、美洲印第安人或中国农民社会之缺乏需求，也都无能为力。

由工资水平的差异引起的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有向固定化和永久化发展的趋势。资本积累在国际范围内已经定形，一方面作为宗主国大规模工业生产的一种发展，通过先进的劳动分工和技术发明向彻底工业化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又作为殖民地原料生产的一种嵌入物，在一种受抑制的或停滞的劳动分工、落后的技术和前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限制下，堵塞了任何彻底的工业化的路子，加强了不发达状况并使之永久化。<sup>[15]</sup>

这种过程对于更普遍的资本发展趋势来说，并不仅仅是个例外，因为，我们从工业化国家本身，也即从所谓“内部殖民地”也可以发现这同样的过程在起作用。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工业化国家的地区性结构中，可以不难找到不等价交换、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工业不发达、资本积累的封锁状态等同样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发达和不发达的并列，这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经济结构的一个标志。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工业资本的出现和发展，都集中在相对说为数不多的综合性企业中，企业为农业区域所包围，这种农业区域的作用是作为供应原料和食物的来源，作为工业消费品的市场，并且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储备。

关于西欧大规模工业经济内部一个农业“辅助地区”的那个经典的例子是有关爱尔兰的，马克思本人探讨了这一例子，他说：

“……爱尔兰现在还不过是英格兰的一个由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域，它不过为英格兰供给谷物，羊毛，家畜，产业上和军事上的新兵。”〔16〕很显然，这个农业地区也经历了一个资本积累，但是，这种资本中的相当一部分被吸进了“工业区域”，也就是英格兰。〔17〕可见，发达和不发达有一种互相决定的因素，因为，资本的外流加重了爱尔兰相对不发达的形势，在纯农业的条件下，这种形势只能导向进一步的贫困化。〔18〕因此，马克思明显地认为，在资本主义的黎明时期，在工业堡垒的工业发展是伴之以“依赖国家”里工业的毁灭的。〔19〕

但是，爱尔兰决不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例外。我们从工业化国家中，至少还可以另外列出三个“辅助地区”或“内部殖民地”的例子，这种例子也同样很典型。第一个是比利时的佛兰德（Flanders）地区的例子。比利时是一八三〇年独立的，它是在大不列颠之后欧洲工业化的第二个国家。现代化大规模工厂的出现，摧毁了佛兰芒人（Flemish）的乡村工业（麻布和亚麻），这一摧毁招致了绝对贫困、大批失业、移居和反工业化的一系列过程，这与马克思所描绘的爱尔兰的情况广泛地相一致。在半个世纪以上的时期里，佛兰德地区成了整个比利时工业的廉价食物、廉价农产品原料、廉价劳动力和顺从的新兵的储存库。〔20〕在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九〇年期间，东佛兰德和西佛兰德劳动人口中工业方面雇员所占的百分比，只从22.3%增加到26.4%，而在两瓦龙（Walloon）省份的列日（Liege）和海瑙（Hainaut），在同一时期内却从18.3%增长到48.4%，而整个比利时则是从15.2%增长到33.6%。〔21〕一直晚到一八九五年，在四个瓦龙省份里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比四个佛兰芒（Flemish）省份的高出50%，而且，在佛兰德并不肥沃的凯姆品（Kempen）地区，最低月工资为二十个比利时法郎，这只等于瓦龙最贫瘠地区阿登

(Ardennes)的三分之一，这里月工资高达六十个比利时法郎。<sup>[22]</sup>

第二个是废除奴隶制以前和以后，美国南部各州的例子。从下面这种意义上说，南部各州是作为农业原料的储存库和“国内殖民地”而发挥作用的：这些州构成了北方工业产品的稳定的市场并且在它们的领土内没有发展任何大规模的工业（这种情况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发生了变化）。<sup>[23]</sup>

第三个是意大利麦佐吉奥诺(Mezzogiorno)的例子。在那里，在意大利统一之后，接着出现了一个反工业化的明显的过程，这使得资本逐渐流向了北方，而那里成了南方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农产品和驯服的受保护民众的储存库。<sup>[24]</sup>塞洛斯·拉比尼(Sylos Labini)指出，意大利南方的工业雇佣人员（即使大多数都是家庭式的或小规模的工业），从一八八一年的一百九十五万六千人降到了一九一一年的一百二十七万人。意大利北方和南方工资水平的差异，从一八七〇年的百分之十二，增加到一九二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五以及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二十七。在一九一六年，意大利的股份资本约有百分之十三在南方投资，而到一九四七年却只有百分之八。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五四之间，意大利国民收入总额中麦佐吉奥诺所占份额从24.3%降到了21.1%。<sup>[25]</sup>

就比较有限的意义而言，在一八四八年大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匈帝国的广大地区的命运也与此相同；另外一些地区例如巴伐利亚(Bavaria)、西利西亚(Silesia)、波摩让尼亚——麦克林堡(Pomerania-Meckler burg)以及日耳曼帝国的普鲁士(Prussia)（也就是日耳曼帝国的东部和南部）等，命运也与此相同；<sup>[26]</sup>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的西部和中部农村（也包括部分东部农村）的命运也与此相同。在西班牙，不论是在十九世纪还是在二十世纪，南方正完成了一种彻底的类似的功能：不但作为在不发达状况永久再生产意义上的一种“国内的殖民地”，尤其是

作为额外资本的汇集区域，这种额外资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从农业中排挤出来，以加速这个国家其他地方新老工业中心的工业化过程。<sup>[27]</sup>这同一现象的一个有趣的特殊例子是日本工业中的所谓“双重结构”，这种结构从二十年代开始，以两个显然不同的部分向前发展——“现代的”和“传统的”两个部分——后者是以古代的、家庭的生产体系为基础的。<sup>[28]</sup>毫无疑问，这种双重结构使得剩余价值大批地从“传统的”部分转移到了“现代的”部分中，这样说来，“传统的”部分就可以被认为是“现代的”部分的“国内的殖民地”。六十年代中期，迅速工业化和大批农村消失的结果，乡村的劳动后备军大大地减缩了，只是在这之后，这种双重结构才开始衰落，并且，日本国内剩余价值那特殊的“半地区性的”来源也随之衰落。

在工业化了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与帝国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只是有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中经济功能是相同的。农业和工业之间生产力水平的差异——这种差异类似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和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原料生产与成品生产之间的差异——产生了不等价交换，或者说，在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不发达地区向工业化地区的价值逐渐转移。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交换就是一种不等价交换。<sup>[29]</sup>不发达地区所生产的原料（例如美国南部各州的棉花）与工业生产的成品相交换，就是一种不等价交换。不发达农业地区作为不充分就业的或失业的劳动力后备军而在工业化国家中所起的作用，是这些地区的主要功能之一，因为它保证了产业后备军能够长期维持下去（除了因机器关系而将已经有了工资关系的劳动力加以转移，从而产生的同一个产业后备军的周期性再生产之外）。<sup>[30]</sup>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不发达地区也正象“国外的殖民地”那样，是作为剩余利润来源而起作用的。下

面是马克思对于工业资本在其第一个伟大的“狂飙运动”时期，通过与小生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生产的交换而取得的剩余利润的描述：“机器经营在一个产业部门牺牲旧有的手工业或手工制造业而扩大时，它的结果是这样的有把握，好象一个用新式枪炮作战的军队一定会打败一个用弓箭作战的军队一样。机器夺取作用范围的这个初创时期，因为帮助生产出了异常的利润，所以有决定的重要性。这种利润，不仅就它本身说是加速积累的一个源泉，并且会把大部分不断新创出来，不断寻找新用途的社会追加资本吸引到有利的各个生产部门中去。这种狂风怒涛的初创时期的特殊利益，在机器新被采用的各个生产部门，会不断反复生产出来。”〔32〕

但是现在，有两个需要解决的理论上的难题我们要来加以对付。一方面，一个世界规模的生产共性的缺乏，已经由资本的某种稳定性加以解释了，换句话说，就是由缺乏统一的、世界范围的资本市场加以解释了。但是，可以肯定，一个统一的资本市场确实是存在于工业化国家内部的；的确，它的形成多一半是早于、甚至部分地是决定了现代大规模工业的到来。那么，为什么这种单一的国家资本市场没有导致一个单一的国家工业结构呢？

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大规模资本输出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或者说在工业化国家内部农业地区消失之前很久就开始了。那么，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输向了“国外的殖民地”，而不首先用来使这些“国内的殖民地”工业化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会使我更准确地抓住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特有的一种现象，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价格的形成和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的特殊应用。早于工业化过程或者在工业化过程之初就形成了的工业化国家内部的统一资本市场，〔33〕创造了一个国家统一的利息率和利润率。这只允许在工资水平方面的限界差异，同一国家不同地理区域工业工资水平的差异，几乎不能超出一定

的限度。这样一来，当工业化的第一个浪潮已过并已经填满了甚至过渡填满了“国内市场”的时候，当第一个相对的资本生产过剩作为一种结果而发生了的时候，在工业国家内部的农业地区进行彻底的工业化，就不再是有大利可图的了。在那里的生产，会有助于全国利润率的均等化。在那里已经没有剩余利润可资获取，唯一的理由就是一个统一的生产价格体系在发挥作用。在那里，平均利润率充其量可以有些微的增长。但是，较高的运输成本、更糟糕的基础结构和合用劳动力的缺乏等，很快就会抵消存在于工资水平中的那点小小的差异。<sup>〔34〕</sup>

相比之下，向落后国家输出资本可以获取利润，这正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在那里并没有世界规模的统一的资本市场、没有统一的生产价格、没有统一的利润率。工资水平的差异是那么大，只要把制造方法或者早期资本主义方法向农业和矿业介绍因而获取剩余利润的可能性又是那么大，以致帝国主义资本能够在“国外殖民地”获取的利润率（剩余利润），最初比同样资本能够希望在“国内殖民地”所能获取的，要高得多。这些“国内的殖民地”是这样一个事实的受害者：虽然可以肯定这些国内殖民地是不发达的，但是与此同时，它们在一个统一的生产价格、利润和工资体系中，却是与工业化区域拴在一起的。

直到现在，我们所论述的还只限于“国外殖民地”和“国内殖民地”生产力水平在地理上的差异性的一些例子。然而，现在我们必须探讨在已经工业化了的同一国家中不同工业分枝之间生产力水平的差异的更为普遍的例子。这种类型的差异主要起于技术进步，即生产技术的改进、资本有机组成的提高，特别是固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在这里，我们对于两种变体必须加以区别。如果除了一个统一的资本市场、统一的利润体系和统一的生产价格之外，资本的运动也不受什么限制的话，那么，过了一定的时期之

后，各种资本的竞争将会再一次导致临时从采用新技术所增长起来的剩余利润的消失。资本将会舍弃利润率较低的一些分枝，而流向利润率较高的那些分枝。在那里，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将会发生，市场价格会降低，剩余利润也会压缩，而吃了资本外流苦头的那些分枝，也不再能以现有的产量来充分供应社会的有效需求。这样一来，这一些部门的市场价格就又会上涨，其结果将是利润率的均等化。

但是，在分析这种过程的时候，我们还不可忘记，即使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也不会有利润率的立刻均等化。技术发明用之于有成效的生产的最初时刻（即技术革新的那个时刻），与出现利润率均等化的那个时刻之间，还隔着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用比较新的技术生产出来的较为廉价的商品，最初是以平均社会生产价格生产并出售的。因此，它给持有者提供了剩余利润。这一点通过商业报告等情报，才逐渐地深入到了大多数资本所有主的意识之中。于是，这一分枝的生产就增长，而且竞争的斗争也加强了，以致用较新技术生产出来的商品就开始降低平均社会成本价格（市场价值）。但是，尽管有这种情况，它仍继续在制造剩余利润，因为它的单个价值仍然低于平均市场价值。于是，竞争者就想采用这同样的较新技术，或者新的资本所有主进入这一生产领域，以图获取同样的剩余利润。只有这一加强了的竞争，通过与所节约社会劳动成正比的市场价值的降低（因为这就是任何一种真正的技术进步最终所要达到的）和随后商品价值的降低，而把革新公司的利润再一次降低到社会平均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利润率的均等化已经实现了。在这全部的中间过程中，技术革新实际上确实是允许了剩余利润的实现。

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由技术革新发展起来的剩余利润的全部出现和消失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资本积累和资本贬值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以足够的劳动生产力发挥着作用的资本，都在利润率均等化发生之前就被摧毁了。但是，资本的贬值——价值的缩减或毁坏——暗示着整个资本总额的减少（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总额必须与资本总额相对比），因而也就暗示着社会利润率的临时增长或者利润率降低趋势的临时停止。所有这些点都能说明一个公司或一个工业分枝部门，不顾随之而来的利润率均等化而仍然采用技术革新，为什么是大大有利可图的。

现在，我们该谈谈第二个变体了。在这个变体中，即使是没有资本的完全流动，剩余利润仍然可以通过技术革新的采用而得到实现。这是垄断的一个古典的例子，在这里，对资本的流动有一些有决定意义的限制，因为在最重要的资本所有主与巨大的设施成本 (*frais de premier établissement*) 之间，有一种联合执行协议——换句话说，就是质量水平更高的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这种联合造成的结果，不但有暂时的剩余利润，而且还有持续的剩余利润，这种持续剩余利润是垄断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特征。

当然，到最终是没有绝对的垄断的，而且，垄断的康采恩或少数控制的康采恩的剩余利润的增长，不是没有限制的。每年的剩余价值总量是一个已知的数量，这个数量要受从事生产的工资劳动者劳动时数的最终限制，而且，流通领域中的任何一种现象也不能使之增长。一旦剩余价值总量，因而利润总量明确了，一些康采恩或垄断的工业分枝的剩余利润，就只能依靠其他企业或其他工业分枝的剩余价值的转移来增长了。因为，在那里的每一点剩余利润都将是其他公司利润的相应降低。如果垄断的剩余利润增长了，那么，非垄断领域中的利润率就会降低，而且，总的竞争就会加强到这样一种程度：垄断资本生产价格（以及剩余利润）的最终降低也将成为不可避免的。<sup>〔35〕</sup>在另外一方面，个别的垄断康采恩或少数控制的康采恩也不能允许它们自身有过度的剩余利润，因为，正

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任何垄断都不是绝对的。进入垄断领域的困难，往往只是相对的；换句话说，它包含着一种资本支出，这种支出相对地说是难以作到的。但是，如果一个康采恩允许它自己有一种“夸大了的”剩余利润，那么，其他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就会越来越想获取这种剩余利润中的一部分，也就是打入这个领域。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必要的资本肯定地说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方便的——有几个特殊例外，这些例外我们下文还要讨论——还由于现存的垄断资本家必须经常考虑到这种可能性（这将包含着在各个方面与价格和利润的暴跌进行尖锐的竞争性斗争），它们大多数都避免各个垄断集团这种“互为利益”的“夸大”。它们不得不更要这么干，因为，在大多数垄断资本家也都作为相互供应者而互相关联的一种体系中，一个垄断资本家可交易商品的数量，要依靠其他垄断资本家的（垄断）价格。<sup>[36]</sup>这样一来，一个相等于剩余利润均等化的趋势就出现了，也就是出现了两种并存的平均利润率，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部分，另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非垄断部分。<sup>[37]</sup>这种两个平均利润率的并存也就是两种不同的生产力水平的并存，换句话说，也就是这同一个生产力不一致情况，这一情况是我们首先从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地区与非工业化地区之间价值转换的根源中发现的。<sup>[38]</sup>

这一分析被指责为违反了马克思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并实际上违反了劳动价值学说的任何形式。根据这种指责，在“正常的”竞争条件下的价值转换（就是不包括暴力、欺诈、诳骗和垄断），按照马克思价值学说的结构，是不可能的，因为商品是按照其价值来进行交换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劳动生产力的增长会导致剩余利润的获取，因为这种增长肯定会在商品价值的降低中而不是在升高中有所表现。如果一个分枝的生产降到了低于整个的平均数，那么，与使用高于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分枝的生产相比的

话,它的商品价值将会增高,而不是下落。最后,表露出技术上优越的那些企业,肯定会获得剩余利润,但是,这并不是价值的转换的结果,而只是这一事实造成的结果:据计算,劳动者所使用的劳动的强度更高了,因为其生产力水平是高于平均数的——换句话说,因为整个价值生产增长了,这是由于更大的生产能力,使用的劳动时间较之使用于这些企业的劳动时间指数所要求的为多。〔39〕

我们将作出这样的回答:这些反对意见主要是以简单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间的混淆状态为基础的。〔40〕在稳定的劳动生产力条件下,在那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可以认为是已知的,那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浪费劳动时间”的范畴,是清清楚楚的。在这里,市场现象在经济生活的“表面上”与这些现象的更深的因素总的说来是相符合的,至少说关于价值的决定量方面是如此。〔41〕(但是,价值形式的根源和要素在这个简单商品生产的时代已经不是清晰的了。)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技术发生不断的变化——事情就不再是那么简单明了,即使是关于价值的决定量也是如此。不可能事先就确定,在每一种商品之中,何者是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何者是社会浪费的劳动时间,因为,这种情况只能在事后确定了某种资本所获取的平均利润是多于平均利润呢还是少于平均利润,然后才能表露出来:“需要和供给设想有价值到市场价值的转化;当它们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时候,当商品是资本的产品的时候,它们还设想有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那和单纯的商品买卖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复杂化了的关系。就这种关系说,问题已经不是由商品价值到价格的形式转化,不是单纯的形式变化,而是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之间,进一步说,也就是市场价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一定的量的差别。在简单的买卖上,只要有商品生产者当作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就够了。在进一步的分析上,需要和供给却还

设想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存在；他们在他们中间分配社会的总收入，把它当作收入来消费，因此，也形成那种由收入而成的需要。另一方面，为要理解那种由生产者以生产者资格相互形成的需要和供给，又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总的面貌，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问题并不仅仅是要区别的形式（不管是货币的形式，还是别种商品的形式）上，为那个已经在商品形式上投入到流通中去的价值总额，取出一个相等的价值总额来，并且是要为那个垫付在生产中的资本，和任何一个别的同样大的资本一样，或者不管它是用在哪个生产部门，总是比例于它的大小，取出同样大的一个剩余价值或利润；所以，问题是要按那个会提供平均利润的价格，即生产价格来售卖商品，至少把这个当作最低限度。〔42〕

利润率均等化过程，必然会造成价值转换的结果，因为，生产价格总额与价值总额是相等的（因为均等化，也就是竞争，也就是流通领域中的运动，本身不能够“创造出”一星半点的额外价值）。因此，如果一个分枝占有了其他分枝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那么，这只能意味着其他那些分枝必须以低于商品的价值的价格来出售它们生产出来的商品。马克思明显地强调了这一点。〔43〕价值向生产价格的整个转化，就是以这种剩余价值转换也就是价值转换为基础的。〔44〕换句话说，它是以这样的一种事实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通常并不是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出售的。

尽管有一个方法论问题包含在扩大价值的“技术”决定中——每一个分枝平均劳动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包括对每一种特殊使用价值的社会需要，〔45〕但是，这一问题并不包括在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必要的连接关系中。罗斯多尔斯基曾经指出，我们必须把这种双重的价值决定视作“两个不同的探

讨阶段”——以便根据供和求的关系来决定以平均的、低于平均或高于平均的劳动生产力经营的公司的市场价值。真正的困难在于决定剩余价值总额，这种总额是便于在资本家中间分配的。举例说吧，如果某一特定商品的市场价格取决于最低的劳动生产力的公司的生产价格——由于需求长期超过于供应——那么，这一分枝中的大多数公司，就会获得剩余利润，也就是一种高于平均额的利润。这种剩余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呢？马克思只在唯一的一个地方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特别探讨，那就是在探讨地租问题时，他说：剩余利润来自农业方面的较低的资本有机组成，在那里，它产生于生产领域中，并且在那里，土地的私有制使它不能进入整个社会剩余价值的一般的再分配。但是，工业的各个分枝——除去我们在这里不能探讨的垄断资本——不能阻止剩余价值以这种方式进行再分配，因此，马克思的解决办法不能应用。由于高于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公司（或分枝），都正常地具有较高的，而不是较低的资本有机组成，那么，马克思的办法就更不可用了。如果这种额外的剩余价值不是从这种特殊生产领域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它只能有两个来源：或者是来自以前在别处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并且是剩余价值也就是价值转化的结果；或者是从流通领域中“出生”的。很明显，这些可能性中只有第一种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剩余学说是相一致的。

布施（Busch）、绍勒尔（Scholler）和西罗（Seelow）想以下的办法来解释这种剩余利润，他们说，以高于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方法经营的企业，它们的劳动强度高于那些以平均生产力生产的那些企业的劳动强度——因此，在市场上最终生产出少于平均利润的那种劳动，其中有一部分没有制造价值。但是，这是个假的解决办法。它所要作的，无非是要把价值的创造从生产领域移向流通领域。因为，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一个

企业将获得的平均利润是低于平均利润还是高于平均利润这一问题，决不是在生产过程完成时候的一个预知的结论。只是在流通过程中，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才发生。

作为待满足的“社会需要”的一种办法，〔46〕“货币有效需求”天生的只能在市场上出现，并且必须广泛地波动。因此，根据布施、舒勒和西罗的看法，剩余价值的总量将取决于这些波动。恰恰就是由于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中有这么一个矛盾，马克思为了避开这一矛盾才提出了下面这一规律：剩余价值总额已经由生产过程给出，而且，生产价格的总额，必须与这一剩余价值总额相符。但是，这就意味着，任何剩余利润必然要伴之以其他商品所有主的低于平均利润的利润。

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是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的：剩余价值总额等于社会剩余劳动总额，或者换句话说，剩余价值总额取决于少于必要劳动总额的劳动工时总数（也就是，少于为生产与生产工人工资总额等价物所必需的劳动工时数）。总的说来，在每一个企业中，这种特殊的劳动生产力是独立的，而不变的工资只有消费品工业中的劳动生产力才能加以限制。在生产过程的结尾时认为总额为已知，这实际上就意味着认为平均劳动强度、平均工资和平均剩余价值率都是已知的。这就是剩余利润正常地出现的那种结构。〔47〕只有在一些例外的情况下，剩余利润才在个别的公司中从高于平均剩余价值率中产生出来。〔48〕

马克思从这样一种主张出发：劳动价值的生产取决于活的、抽象的以及——因为假设有劳动强度的均等化和剩余价值率——同类劳动在生产领域中的实际消耗，对这一困难发现了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由资本的竞争和市场上的供和需关系所引起的一切现象，都只能在这种量的再分配方面发生影响，而不能增大或缩小这种量。

当马克思说这样一些话的时候：以低于平均生产力水平工作的企业，获得少于平均利润的利润，而且这最终符合于它们浪费社会劳动这一事实，这一公式的整个含意就是，这些企业的工人实际生产出来的价值或剩余价值，在市场上被发挥更好作用的那些公司所占有。这决不是意味着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或剩余价值，少于他们在这些企业中所干的劳动工时数所指明的那些。<sup>[49]</sup>这是《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中唯一的一种说明，这一说明与整个前后文以及与马克思价值学说的精神都能够调和一致；它很清楚地简化了价值转化概念。

我们还应当再说明一点，马克思明白无误地记录了价值转化这一现象，这不仅包括了工业的分枝之间——通过利润率的均等化——而且也包括了一工业分枝的内部。<sup>[50]</sup>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这么作的，这种方式与决定社会必要劳动工时的“技术的”和“使用价值上的”方式，十分调和。如果社会需求恰好为生产所满足，而且，“中等”企业的劳动生产力因而也决定了商品价值，那么，这就意味着花费在这一工业分枝的劳动总量，在一种双重意义上代表了社会必要劳动。因为，在同一个剩余价值率的假设之下，这一生产分枝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总量，将相等于利润总量。以高于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经营的那些公司的剩余利润，就只能牺牲那些以低于劳动生产力水平经营的公司，而以价值的转化来加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在自由竞争和利润率均等化条件下的“正常情况”——价值转化是马克思本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例外情况——在那里，最低劳动生产力的公司决定了市场价值（在那里，需求大大高于供应），或者最高生产力的公司决定了市场价值（在那里，供应大大高于需求），那么，价值的创造问题和价值总量的决定问题，就不是那么不证自明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可赞成我们自

己的解决办法，也不赞成布施、舒勒和西罗的解决办法，理由已在上简略谈到。

很显然，布施、舒勒和西罗被国际贸易问题的一个相似物所误，而得出了他们那假的解决办法。<sup>[51]</sup>因而，他们没有注意到，正是在国际贸易的来龙去脉中，马克思为了生产价格的形成和市场价值的统一而提出的那些先决条件——也就是平均而又普遍有效的劳动强度、资本和劳动力的广泛运动和利润率的均等化——没有或者很少被公认。

这样，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了一种不同的生产水平的等级结构，成了国家、地区、工业分枝和公司等受追逐剩余利润的驱使而进行的不平衡的、联合发展的结果。它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但是，它是一个由不同类部分组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而且，它恰恰是那个决定了缺乏共性的统一体。在这一整个制度中，发达和不发达互为决定因素，因为，一方面剩余利润的追逐构成了机制增长后面的主要动力，同时在另一方面，剩余利润又只能牺牲生产不发达的国家、地区和生产分枝才可以获得。因此，发达只能与不发达并列发生；发达使得不发达永久化，而其本身的发展，则靠的是这种永久化。

如果没有不发达的地区，也就不可能有剩余转化到工业化地区去，因而那里也就没有资本积累的加速。如果没有不发达国家的存在，在整个这个历史时期之中，就决不可能有剩余转化到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可能有资本积累的加速。如果没有不发达的工业分枝的存在的话，也不会有剩余转化到所谓发达的部门中去，而且在过去这二十五年中，也不会有相应的资本积累的加速。

因为，虽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国际方面、地区方面以及部门方面是发达和不发达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等级化了的整体，<sup>[52]</sup>

但是，这一多枝的、不平衡的联合发展的重心，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其重心是放在发达和不发达在地区方面的并存上。在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其重心放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与不发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国际方面的并存上。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其重心放在发达部门和不发达部门在工业方面的并存上，这主要是包括帝国主义国家，但也以一种次要方式包括半殖民地国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技术租金——以技术改进、创造发明和专利为基础的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剩余利润——在十九世纪并不存在，或者说在那个时候是种例外。这只是意味着，由于没有高水平的资本集中，技术租金相对地说是短期的，因而在整个剩余利润中所占的比重，较之“地区性的”剩余利润和以后的殖民地的剩余利润要小。但是，技术发明本身从产业革命一开始以来，在资本的发展和剩余价值的追逐方面，起到了一种关键性的作用。

如果我们了解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增长过程的性质——也就是资本积累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够看出罗莎·卢森堡的错误根源。罗莎·卢森堡认为，她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完全工业化方面，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向全世界扩大方面的“先天性限制”。我们从“一般资本”的抽象概念出发看来很清楚的，一旦我们进一步前进到了“具体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到了“多种资本”——换句话说，到了资本主义的竞争——就证明是毫无意义的了。因为，这个问题可以归结到价值问题或价值的转化，就纯经济而言，这样的增长过程是没有限制的：牺牲其他资本的资本积累增长过程，就是通过联合积累和资本贬值、通过竞争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和矛盾的资本扩大。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限制——从纯经济观点出发的话——从这种意义上说往往只不过是暂时的，因为，这种限制一方面可以超出生产

力水平的差异的这些条件，同时它也能改变这些条件。工业区域因牺牲农业区域而获得繁荣，但是，工业区域的扩大要受这样一个事实的限制：它们的最重要的“国内殖民地”受到了相对停滞的责备，因此，它们迟早要寻求“国外殖民地”，以便克服这种限制。但是，与此同时，“工业地区——农业地区”这种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会永久保持冻结。如果对这种发展过程提供一种新的刺激的话（这样一种刺激的可能来源，在本书第二章中已经描述过了，在本书下文我们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那么，没有理由认为一个早已工业化了的地区，不能转变成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或者说，一个原来的农业地区，不能转变成为一个工业集中的地区。马克思在他的时代，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在那时，这种可能性充其量不过是个边缘现象，或者仅仅表现为一个最初的开端而已。关于由交通变化和运输费用引起的生产再定向问题，<sup>[53]</sup>马克思曾经指出：“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良，会绝对缩短商品移动的期间；但不同各商品资本或同一商品资本不同各部分向不同市场移动时，因移动而在流通时间上发生的相对差别，不会因此消灭。例如，会加快商品移动的改良帆船和轮船，会缩短远港口的距离，也会同样缩短近港口的距离。相对的差别还是存在，虽然往往会减小。不过，由于运输交通工具的发展，这种相对差别将会按一种与自然距离不相适应的方式发生变化。例如，一条从生产地点通到一个内陆大人口中心的铁路，可以使一个内陆不通铁路的较近地点，和这个天然距离更远的地点比较，绝对地或者相对地变得距离更远。同一个事情，还会使生产地点到大贩销市场的相对距离发生变更。交通运输工具发生变更时会有旧生产中心衰落，新生产中心崛起的现象，就要由此说明（此外，还要说到远距离运输比近距离运输相对的说运费比较便宜）。”<sup>[54]</sup>

十九世纪中铁路和轮船的影响，曾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的空中运输、快车道和集装箱体系的影响的挑战：相对运输费用的经常大变动，使得某些生产中心兴起，而另外一些则衰落了。<sup>[55]</sup>恰恰以同样的方式，工业的一些大的分枝通过它们那高于平均数的资本有机组成，以牺牲其他分枝的方式取得了价值的转化，它们如果在工业方法或能源供应方面的技术变动过程中，证明不能迅速适应新的技术，就会逐渐衰落而降到低于劳动生产力平均社会水平以下。

这种地区的作用颠倒的例子，<sup>[56]</sup>可以从一些老的工业化地区的相对衰落中找到，这些地区中有美国的新英格兰、大不列颠的苏格兰、威尔士和北方，法国的诺尔/巴德——加来 (Nord/Pas-de-Calais) 和欧特罗瓦 (Haute-Loire) 和比利时的瓦龙尼亚 (Wallonia)。西德的鲁尔 (Ruhr) 地区部分地受到了类似发展的威胁。工业分枝作用改变的例子，可以从这样一些部门的相对衰落中找到：加工天然纤维的纺织工业、煤矿工业，潜在的还有钢铁工业。<sup>[57]</sup>毫无疑问，这种地区性的作用颠倒，从产业革命本身的一开始就发生了。对这些变化原因的探讨——这些原因对矿物资源问题来说决不仅是可减少的——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的一个值得研讨的课题。克劳柴 (Crouzet) 和乌龙诺夫 (Woronoff) 已经出版了对波尔多 (Bordeaux) 衰落根源的有趣的分析著作。波尔多是法国革命前商业和制造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城市。除了马克思提到过的那些因素——运输和交通体系的变化、市场的限制——之外，在剩余利润率的主要来源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还特别出现了一些变化（在以前：西印度殖民地商品的贸易；如今：技术发展的工业，尤其是纺织厂）以及在早已建立起来的商业和企业界地区性资产阶级的过分专门化，这使得迅速发生再转变成为可能。法国西南部在地理上的不利处境以及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对法国的封锁和大陆体系的影响，也都对这一城市的衰落，起了一些

作用。<sup>[58]</sup>

但是，在以各个国家、地区和工业分枝的不平衡发展为基础的这一个整个发展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使之运动起来的机械装置。把发达和不发达并存的一种特殊形式推翻并使之沿不同的方向发展，或使之革命化，这需要怎样一种动力呢？哪些因素能使生产力水平的种种差异发生突然变化呢？怎样的突然新动力能够使相对积累过剩、相对资本过剩、因而积累滞缓并在资本积累总额的增值中困难越来越多的状态，转换成为加速增值、因而加速积累并加速经济增长的状态呢？

这些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剩余利润根源的问题一样，也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作解答。在这里也一样，这一生产方式的所有基本变数，都必须加以考虑。必须要经常记住的是，对农业地区的剥削、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剥削和对技术不发达的生产分枝的剥削，并不仅仅是互相连续作为剩余利润的主要来源的，而且，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三个方面中的每个方面也都肩并肩地共存着。阐明这些结合，对了解晚期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少的。

## 注 释

- [1] 马克思：“不同生产部门的特殊利润率本来就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并且，在它们有所表现的限度内，它们表现的，也不是它们的一致性，而是它们的差别性。但是，一般利润率本身又不过表现为利润的最低限界，而不是表现为现实利润率的经验的直接可见的形式。”《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六七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四一六页）。也见第三六九页：“利润率却甚至在同—个部门内，也会在商品市场价格相等时显得不同，因为各个资本家本来是在不同的条件下生产相同的商品；因为个别资本的利润率不是由商品的市场价

格决定,而是由市场价格和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决定。这些不同的利润率,只是由于不断的变动,方才能够在—一个部门之内,然后又在不同部门之间,归于平均。”(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四一八页)。

-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六四四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七五五—七五六页)。
- [3] “此外,剩余利润还能在某些生产部门因处境特殊,可以无需把它们的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无需把它们的利润还原为平均利润而生。”《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九九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二一〇页)。也见《资本论》第三卷,第七四三页。
- [4] 《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九八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二〇九页)。
- [5] “一个资本家或一定生产部门的资本,会特别关心他直接使用的劳动者的剥削,事实上不过以下述的理由为限,那就是,要由例外的过度劳动,或由工资压到平均以下的办法,或由所用劳动的例外生产率,获得一种额外利益,一个超出平均利润的利润。”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九七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二〇七页)。
- [6] 这一问题曾经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间一些争论的目标。这个问题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复杂化了:工业革命及其大规模都市化,大大地改变了劳动人口的消费结构(比如说引进了住房的房租等),使得一七四〇年和一八四〇之间的实际工资的对比变得危险了。但是,应该指出,有两位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费尔普斯—布朗(E. H. Phelps-Brown)和霍普金斯(S. V. Hopkins)作出过如下估计:英国建筑工人的实际工资指数,从一七四四年的七十七(以一四五—一四七五年的水平作为一百)一直在下降,直到一八三四—一八三五年,又到一八三六—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五—一八四八年:只有到一八四九年之后,一七四四年的水平才被最后超越过去。见《七个世纪消费价格与建筑工人工资的比较》,载《经济学》,一九五六年。同样,按人口平均食糖的消费——食糖是“高质量”的消费品——在英国从一八一—年的16.86公斤下降到一八四一年的7.9公斤。整个这场争论,参见艾里克·霍布斯包姆(Eric

Hobsbawm)《英国的生活水平》，载“经济史评论”，一九五七年；阿什顿 (T. S. Ashton)《英国工人生活标准：一七九〇——一八三〇年》，载“经济史杂志”增刊 XI，一九四九年；泰勒 (A. Taylor)《英国的进步与贫困：一七八〇——一八五〇年》，载“历史”，XLV，一九六〇年。

- 〔7〕 弗里茨·斯特恩伯尔格是对资本主义发展产业后备军长期波动的意义进行探索的一个人，但是，他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他曾断言，美国的例子证明，工会并不是工资的主要决定因素，因为，在美国，工资比在西欧要高得多，而西欧的工会却弱得多：见《帝国主义》，第五七九页。（斯特恩伯尔格的书是在产业工会联合会兴起之前写成的，他的观点在那个时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斯特恩伯尔格忘记了马克思所强调的，那就是劳动商品价值的历史的、传统的要素，这在美国所采取的形式是劳动力短缺和新领域。这两种事实从那里的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有了，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阻碍了资本主义的任何迅速扩张。在欧洲以及在其他地方，产业后备军的长期波动确实实是确定了实际工资增长的长期可能性；但是，即便是在这些可能性存在的地方，这种可能性之实现也要依靠工人阶级的斗争，从而也就要依靠工会的力量。例如，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和法国实际工资的相对发展加以对比的话，那么，这肯定不能以这两个国家产业后备军的差别来加以解释的。
- 〔8〕 例如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
- 〔9〕 关于产业后备军衰减的长期倾向与此处所描述的其他一些发展之间的联系，见弗里茨·斯特恩伯尔格在《帝国主义》中所作的彻底分析。
- 〔10〕 菲立斯·迪恩和柯尔所作的计算必须有极大的保留来对待，他们的计算也暴露了大不列颠国民收入中利润、利息和“混合收入”所占份额的跌落情况：从一八六五——一八七四年这十年间的平均数39.4%降到了一八七〇——一八七九年这十年间的38.2%和一八八五——一八九四年这十年间的37.8%；见《英国经济增长》，第二四七页。关于意大利，艾米里奥·塞伦尼引用了一次暴跌，这比这个还更要尖锐一些：资本平均收益的跌落据说是从一八七一——一八七五年这五年间的24.2%跌到了一八八六——一八九〇年这五年的14.1%：《意大利的资本主义与国家商业》，罗马，一九六八年，第二四六——二四

七页。

- [11]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剩余价值率在不发达国家往往会低于在发达的国家。这仍然是如此，因为资本主义技术在那里并没有应用于生产，劳动生产力大大低于宗主国，而且，劳动者只能再生产其自身工资的那种工作日的的作用也相应地大大大于宗主国。但是，这决不是一种一般的规律。因为，如果资本主义技术引进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劳动者的消费额并没有提高（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是由于存在着产业后备军），那么，劳动价值就可能迅速降低，从而剩余价值率就会提高到高于宗主国的水平，尽管有这样一种事实：平均劳动生产力仍然大大低于后者。剩余价值率并不是劳动生产力的一种直接的功能。它只不过是表达了劳动者为生产其生存手段等价物所必需的时间与无偿地留给资本家的剩下的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如果殖民地的失业总人数增加，而在宗主国失业总人数则减少了，如果再生产劳动者维持生存手段在宗主国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减少，由于劳动者所消费商品的数量增加而部分地中立化了，而这一数量在殖民地永恒不变（或甚至还减少了），那么，在殖民地劳动生产力的较小的增长，也一定会被伴之以这样的情况：相对地说来，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大于在宗主国家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说：“各国不同的利润率，最大部分是以各国不同的剩余价值率为基础。”（第一五一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一五三页）。
- [12] 新近，出现了一些反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意见，这对追求剩余利润的资本输出，赋与了重要意义。我们将在本书第十一章中来讨论这些反对意见。
- [13] 在大不列颠国民收入中，利润、利息和“混合收入”所占的份额，根据菲立斯·迪恩和柯尔所作的计算——见本章注10——在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九四年间是跌落了，但是在一九〇五——一九一四年这十年中，它又一次上升到了42%。当然，这些数字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利润率的理论是根本不相一致的。但是这些数字确实是明白地说明了一种倾向。
-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九六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二〇六——二〇七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15] 我们再一次注意到了安德烈·刚德尔·佛朗克、西奥顿尼奥·多斯·桑托斯和萨米尔·阿敏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著作，这部著作中包含了类似的意见。安德烈·刚德尔·佛朗克迄今尚未出版的著作《关于不发达的理论》在这一方面尤其是值得注意。
-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七〇二——七〇三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一卷，第七七五页）。
- [1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四五二页。这种在农业地区的资本逐步集中及其不断流入工业地区的情况，不但发生在爱尔兰，也发生在英格兰本身以及苏格兰和威尔斯，这种事实显然已经受到了英国银行体系历史学家的强调。参见金（W. T. C. King）《伦敦贴现市场的历史》，伦敦，一九三六年，第Xii—Xiii、六页以下。
- [18] 也见波尔鲁：“增长是不平衡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杆子的插入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的不平衡。”《二十世纪的经济》，巴黎，一九六四年，第一六九页。
-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七五七页。
- [20] 关于这次破坏的毁灭性后果以及其后的饥谨，参见雅克斯敏（A. G. Jacquesmyns）《佛兰德经济危机史：一八四五——一八五〇年》，布鲁塞尔，一九二九年。
- [21] 佛尔海根（Benoit Verhaegen）：《佛兰德经济史的贡献》，第二卷，洛文，一九六一年，第五十七、一六五页。
- [22] 劳伦特·迪契斯尼（Laurent Dechesne）：《比利时经济和社会史》，巴黎，一九三二年，第四八二页。
- [23] 见尤金·杰诺维斯前引著作，第十九——二十六页、二八〇——二八五页。米尔文·雷曼（Melvin M. Leiman）· 雅克布·卡多佐（Jacob N. Cardozo）——《战前南方的经济思想》，纽约，一九六六年，第一七五——二〇三页、二三八——二四三页。
- [24] 在意大利统一之后，关于意大利南方经济发展，有相当多的文献。参见艾米里奥·塞伦尼：《资本主义运动：一八六〇——一九〇〇年》，阿尔杜·亚力山德鲁·毛拉：《统一后的意大利经济》，都灵，一九七一年，鲁吉·达尔·潘恩（Luigi Dal Pane）：《Lo Sviluppo Economico dell'Italia negli Ultimi Cento Anni》，波伦亚，一九六二

- 年；卡拉西奥罗 (A. Caracciolo)：《意大利工业的形成》，巴里，一九七〇年；罗萨里奥·罗米欧 (Rosario Romeo)：《Risorgimento e Capitalismo》，巴里，一九六三年。安东尼奥·葛兰西在他在狱中所写的一些著作中，探讨了这一问题：《quaderni del Carcere》，第二卷，都灵，一九六四年，第九十七——九十八页，以及其他地方。也见罗萨里奥·维拉利 (Rosario Villari) 编的那一卷，《Il Sud nella Storia d'Italia》，巴里，一九七一年。
- [25] 保罗·塞洛斯——拉比尼 (Paulo Sylos-Labini)：《Problemi dello Sviluppo Economico》，巴里，一九七〇年，第一三〇、一二八页。
- [26] 这样，比如说，在一九〇六年建筑业的最低工资在这些大城市如：柏林、汉堡、基尔、杜塞尔多夫、多特蒙德和埃森等，要比这些农村地区的高出一倍：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刚比嫩和佐波特）、布兰顿堡和西里西亚，以及比较穷苦的巴伐利亚、萨克逊尼和艾菲尔地区。库钦斯基：《欧洲和美国的工资和劳动时间：一八七〇——一九〇九年》，柏林，一九一三年，第六八九页。
- [27] 参见阿尔方索·柯敏 (Alfonso C. Comin)：《Espana del Sur》，马德里，一九六五年。
- [28] 参见篠原三代平：《日本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变化》，东京，一九七〇年，第八章；西莫尔·布罗德布利治 (Seymour Broadbridge)：《日本工业的二重性》，芝加哥，一九六六年；比达 (K. Bieda)：《日本经济的结构和作用》，西德尼，一九七〇年，第一八六——一九九页。在一九五五年，日本经济非农业部门中仍有着 26.5% 的非专为雇主工作者，而澳大利亚则为 11.8%，美国则为 10%，英国则为 6.2%（一九五一年）。由于制造业规模大小造成的工资差别，一九五八年包括的范围是从 30/100，而美国则为 64/100，英国则为 79/100（一九五四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的差别要高得多，那时“传统”部门（主要是纺织业和轻工业）的工资是与“土地的低报酬紧紧捆在一起”；见兰尼斯 (G. Ranis)：《日本经济发展中的因素比例》，载“美国经济评论”，一九五七年九月号，第五九五页。
- [29] 我们在谈论小农的农业产量的时候，总是持保留态度，小农还没有纳入资本主义方法中去，并且还不能导致资本主义地租的上涨。一旦农业变得完全资本主义化了，这种不等价交换马上就消失了。

- [30] 见斯特恩伯尔格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帝国主义》。
- [31] 在这里出现了与工业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相类似的进一步情况。由于这种剩余利润的经济根源在于这样一种事实：在大规模工业早期发展的整个时期中，大工厂还不能以足够的数量来供应机器生产出来的商品，这种机器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市场价格，肯定会低于手工业和制造业产品的个体价值，但会大大高于机器制造产品的个体价值。这样，在出售后者的时候，就可以获得相当数量的剩余利润，这确实就是廉价的、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品间仍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那些国家输出时所发生的情况。
-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五〇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一卷，第四八四页）。
- [33] 见里普森(E. Lipson)：《英国经济史》，伦敦，一九三一年，第二四四——二四六页。
- [34] 波尔鲁指出，在同一个国家内，如果一个具有发展性公司的地区与一个没有具备这样的公司（也就是不发达的地区）的地区相比较的话，那么，这毫无疑问会导致它们之间的发展水平的越来越大的差别：《二十世纪的经济》，第二二五页以下。
- [35] 当然，这肯定并不是意味着，通过这一点，价值从非垄断部门向垄断部门的转移就停止发生了。
- [36] 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垄断竞争与一般平衡理论》，剑桥，美国，一九四〇年。
- [37] 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第四二三——四二六页。以这种方式使垄断的剩余利润等同化的实际机制，不仅包括了这里扼要叙述了的这些因素，而且也包括市场限制，因而也包括了销售价格 of 的剩余利润率，以及限制或阻止多样化产品或代用产品传播的那种紧迫感。关于这一点，参见关于“垄断竞争”这一主题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引用了一部分，而这是从恰姆伯林(E. M. Chamberlin)的这一著作开始的，即《垄断竞争理论》，剑桥，美国，一九三三年。
- [38] 尼古莱·康德腊季耶夫有一篇论文《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动力学》，载“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记录”，60/1，一九二八年，第五十一——五十八页。康德腊季耶夫在这篇论文中，在对劳动价值的分析与对边缘有同

性的分析之间，存在着一种折衷主义的混乱。这导致了特殊的后果。在一方面，康德腊季耶夫正确地承认，商品价格的长期降低（表现在不变的货币价值方面），只能导源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也就是导源于商品价值的降低。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在谈论农产品的“购买力”和工业品的“购买力”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他在这里所比较的，并不是劳动价值，而是相对的市场价格。更有进者：如果在某一年，一吨小麦的生产要求五十个劳动小时，三套衣服要求二十个劳动小时，那么，五十年之后，前者一例的关系可能降到三十个劳动小时，而后者一例可能降到十个劳动小时，这样一来，小麦的“购买力”与纺织品的“购买力”相对比，是提高了。但是，布匹的生产可能是依靠小麦产量的费用而扩大了，而小麦与布匹之交换，可能包含着有利于纺织品生产的一种价值转移。为了弄清价格的发展是不是改变了小麦生产与布匹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我们必须不但要考虑这两种产品的需求的弹性，而且尤其还要考虑这两个部门中利润率的差别。“购买力”的提高，决不意味着利润率的提高——只是后者将会使资本改变方向，从工业退回到农业方面。

- [39] 例如参见布什、绍勒尔和西罗(Busch, Scholler & Seelow):《世界市场与世界货币危机》，不来梅，一九七一年，第二十一——二十四页。
- [40] 这些作者的论点所赖以为基础的那些引语，都是引自《资本论》的第一卷，而不是引自第三卷，这是典型的。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马克思所关心的是“一般的资本”，资本主义竞争问题和奠定价值转移基础的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问题，马克思根本就没有加以考虑。
- [41] 见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的补充》，见《资本论》，第三卷，第八九七页。
- [4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九四——一九五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二〇四——二〇五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43] 例如见《资本论》第三卷，第七五八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八八五页）：“我们已经指出，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可以在它的价值之上，或在它的价值之下，不过例外地和它的价值相一致。”也见《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第一编，第三十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第二册，第

二十一——二十二页)：“因此，认为资本竞争是通过使商品价格等于价值来确立一般利润率的说法，是错误的。相反，竞争正是通过以下途径来确立一般利润率的：它把商品的价值转化为平均价格，在平均价格中，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到另一种商品上，等等。”同样内容也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四三五——四三六页；《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第一编，第三十五页；《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七八——一七九页。

- [4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五六、一六三——一六四页，以及很多其他的章节。
- [45] 布什、舒勒和西罗断言，我主张社会必需劳动时间“具体化了的”决定，他们认为那是以纯技术的方式决定的，也就独立于社会需要或使用价值。这是不对的。早在我的这一著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巴黎，一九六二年)中，我恰恰把社会需要这一个方面(需求和供应的关系)，包括进了生产价格的决定之中(第一卷，第一九三——一九四页)。也见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介绍》，法兰克福，一九六七年，第十五页：“一种商品，如果由于没有任何使用价值而不能满足任何人的需要……那么，它从一开始就卖不出去，它不会有任何交换价值……。所以，这种平衡就意味着社会生产总额、生产力的总额、这一社会所安排的工作时的总额，已经分散到工业的各个部门，其分配比例与消费者根据其种种需要而分散其购买力是相同的。”
- [46] 决不可忘记的是：(1)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有一节文字，马克思在这里把供应超过需求这种情况界说为社会劳动时间被浪费掉了，紧接着这一节文字之后，马克思继续说：“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因此也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重要更小得多。”(第一八七页)(中译本第一九六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2) 这一节之前和之后的全部讨论，在这种讨论中，特殊使用价值的社会需求量本身已被相对化并被宣布为依赖于市场价值量。
- [47] 马克思说：“各推动不等量活劳动的资本将会生产不等量剩余价值这件事，至少在一定程度内，要有这个假设作为前提：劳动剥削程度或剩余价值率是相等的，如果有差别，当中存在的差别，也已经由某些现实的或想像的(习惯上的)补偿理由得到平衡。这件事又要把劳动者间的竞争，把劳动者会不断由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并

- 由此引起平衡的事实假定作为前提。这样一个一般的剩余价值率——那和一切经济规律一样，要当作一种趋势来看——是我们为了理论上简单的目的而假定的；但在现实上，那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前提，虽然它会由实际的阻力而多少受到阻碍，因而引起一些相当重要的地方差别（例如居住法对于英国的农业日佣劳动者）。但我们在理论上要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在纯粹形式上展开的。现实上总是只有近似性，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旧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排除，近似性就会越是增大。”《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七五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一八一——一八二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48] 马克思：“一个资本家或一定生产部门的资本，会特别关心他直接使用的劳动者的剥削，事实上不过以下述的理由为限，那就是，要由例外的过度劳动，或由工资压到平均以下的办法，或由所用劳动的例外生产率，获得一种额外利益，一个超出平均利润的利润。”《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九七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二〇七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49] “那些商品能够恰好按照或大约按照它们的个别价值来卖，所以，那些按最不利条件生产的商品，也许会连成本价格也不能实现，那些按中位平均条件生产的商品，也只能实现它们里面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七九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一八六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50] “所以当商品供给是按平均价值，是按两极间大量商品的中位价值来满足普通需要时，个别价值在市场价值以下的商品，就会实现一个额外剩余价值或剩余利润，个别价值在市场价值以上的商品，却会让它们里面本来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能实现。”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七八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一八五页）。
- [51] 布什、舒勒和西罗前引著作，第三十二——三十三页。国际“不等价交换”是一个价值转移的问题，其程度将会在本书第十一章中加以澄清。在这里，我们只是说一下这么个事实：马克思在这一方面所说的，不仅仅是不相等的劳动量，而且也有不相等的劳动时间。
- [52] “各种工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大不列颠工

业革命)之一。”毛里斯·杜勃前引著作,第二五八页。

- [53] 肯尼特·伯利尔(Kenneth Berrill)写有一篇文章:《国际贸易与经济增殖率》,载“经济史评论”,第二辑,第十二卷,第三期,一九六〇年四月,第三五二页。伯利尔在这篇文章中正确地指出,在某些不发达国家,人们宁愿从国外输入商品而不愿为国内市场生产商品,这种情况可以用这样的事实来加以解释:在那里,海上运输较之陆上运输要廉价得多。很明显,下面的事实只是对上面列出的理由的一个另外的理由:在这些国家,商品生产的发展,首先是为了世界市场。
- [54]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二五三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二卷,第二六一——二六二页)。
- [55] 例如,西欧的所谓“海上钢铁工业”之所以变得有利可图,也就是变得可能,只是因为庞大的油船和运输工具能够运输石油和矿石,其长途运费是这么便宜,致使前者可以与座落在国内煤矿附近的钢铁中心所具有的每一个成本方面的有利条件相竞争,只要煤价变得越来越比石油昂贵。
- [56] 瓦尔特·伊查德(Walter Izard)和约翰·康伯兰(John H. Cumberland)在一九五八年将列昂捷夫的输入——输出计算应用到区域之间的关系方面,并从而给我们提供了正式的工具来正式说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当然,在他们自己说来,这些工具还不能说明某些地区不发达的基本原因和基本结构,他们也不能完全计算出转移了的价值量。见瓦尔特·伊查特和约翰·康伯兰:《地区性输入——输出分析》,载“国际统计学会会报”,斯德哥尔摩,一九五八年。
- [57] 在各个欧洲国家,有关“收入水平和繁荣的地区性差别”这一主题文献,一直增长得很快。在这里,我们将只限于谈一谈一九七一年欧洲共同体出版的《地区统计》。例如,这些统计暴露出意大利在一九六八年,在撒丁岛、在最南部和在阿布鲁齐等地,工业雇用人数竟不到劳动力的30%,而意大利全国的平均数,已经超过了41%(第四十七页)。在同一年度,在西德的莱茵兰帕拉廷纳特的人口中有6%只得到了银行信贷的3.9%,在法国的西部和东部,整个人口的22.4%得到银行信贷的14%(第二〇二——二〇三页)。按人口平均的国内总生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富庶的”州(汉堡)比“最穷苦的”州(什莱斯威格——霍尔斯特因)高出一倍以上。在比利时,卢森堡省和布

鲁塞尔地区之间的差别也是如此。而在意大利，莫利斯地区与隆巴迪之间的差别几乎是一与三之比(第二一一——二一四页)。在荷兰的南部，每一千居民中的医生人数，只有阿姆斯特丹和乌德列支地区的一半。在德伦特地区，每个家庭私有动力的消费，还不到乌德列支地区的一半。在诺尔/巴德-加来每一千居民医院病床数只有普罗芬斯和蔚蓝海岸的一半。甚至在巴伐利亚，每个居民私人消费的电力也只有汉堡的一半(第二一五——二一八页)，等等。当然，在西班牙这些差异更为悬殊。

- [58] 见伍龙诺夫 (A. D. Woronoff):《西南部不动的资产阶级》，载“今日政治”，一九七一年一月。

## 第四章

### 资本主义历史中的“长波”

由竞争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循环过程，采取的形式是商品生产因而是剩余价值生产的连续扩大和收缩。与此相适应的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循环运动，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的积累方面的扩大和收缩运动。在它们的时间、它们的总量以及它们的比例方面，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的积累既不是互相之间完全相一致，也不是与剩余价值生产本身完全相一致。第三者与第一者之间的差异和第一者与第二者之间的差异，提供了关于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危机的说明。这些差异无论如何不可能是由于巧合，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中产生出来的，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接合摇摆的原因。〔1〕

在工业循环的过程中，资本积累的向上运动和向下运动，可以用下面的方式加以说明。在向上摆动时期，利润的总体和利润率都有所增长，而且，积累的量既有所增长，积累的步伐也有所加快。反过来，在危机时期以及在其后的不景气时期，利润总体既要衰减，利润率也要下降，而且，资本积累的量既要衰减，积累的步伐也要放慢。这样，工业循环就包含着积累的连续加速和减速。

在这种连续的循环状态下，利润总体和利润率的增长和衰减到底互相一致到什么程度，或者完全相等到什么程度，在我们目前的探讨中暂且不谈。这一问题留待我们论述晚期资本主义工业循环时，再来论述（见第十四章）。

在向上摆动的状况下，资本积累是加速的。但是，当这一运动到达了某种高度的时候，正积累资本的总体要想作到增值，就会变得困难了。利润率的降落是这一分水岭的最明显的标志。积累过剩这一概念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积累的资本只有一部分能以不适当的利润率甚而至于只能以愈趋缩减的利率向外投资。<sup>〔2〕</sup>积累过剩这一概念决不是绝对的，往往只能是相对的：从来不会有“绝对的”过多的资本，但是，用来达到预期的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资本，却是会有过多的。<sup>〔3〕</sup>

反过来，在危机以及接着而来的不景气状况之下，资本贬值了，而且部分价值遭到了破坏。这时候，投资不足的情况发生了，换句话说，在一定水平的剩余价值生产和一定（上涨）水平的平均利润率的情况下，可以扩大更多的资本，但所投入的资本要少于这个。正象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资本贬值和投资不足这样的时期，恰好就有这样一种功能，就是再一次提高已积累资本总体的平均利润率，这反过来又可以加强生产并提高资本的积累。这样一来，整个资本主义工业循环似乎就成了加速资本积累、积累过剩、减速资本积累和投资不足的结果。<sup>〔4〕</sup>利润率的<sup>增长</sup>、衰退以及恢复生气，既相适应于又控制着资本积累的连续的运动。

现在，问题很明显了：这一循环运动是不是每隔十年、七年或甚至五年重复一次呢？或者说，对更长时期的连续工业循环，是不是有一种特殊的内在的动力呢？在我们借助于经验上的资料来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应该从理论的观点上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马克思用所有固定资本建设所需周转期的持续时间，来确定工业循环周期的长短。<sup>〔5〕</sup>在每一个生产周期，或者说在每一年中，不变资本中固定因素的价值，只有一部分更新了，也就是主要只有机器的一部分更新了。需要连续几个生产周期或者年度来完成

固定资本价值的这种重建。实际上，机器每年只更新七分之一或十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完成建设要在七年或者十年之后。固定资本的再生产实际过程将采用这样的形式，就是在七年或十年期间，只是修理这些机器，过了这期间，这些机器一下子就被新的机器所取代。〔6〕

按照马克思的危机周期理论，固定资本的这种更新，不但说明了商业周期的长度，而且也说明了奠定整个扩大再生产基础的那种决定性因素，即资本积累的增长和加速。〔7〕因为，正是固定资本的这种更新决定了繁荣的兴奋活动。附带说一点，马克思在提出这一关键性论点时，预见到了全部现代的经院式周期理论，正象我们已经知道的，这种理论认为企业家的投资活动是周期运动向上发展的主要的刺激因素。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殊因素是这样一个事实：扩大再生产的每一个新的周期，都是从与以前不同的机器开始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由于受竞争和对剩余利润的永恒追求的鞭策，资本家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借助技术的改进以降低生产成本并使商品的价值低廉：“这种为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象进一步的说明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包含一种不断发生作用、要把一个商品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把它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现有的社会平均以下的趋势。务求将成本价格减少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压力，在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上，成了一个最有力的杠杆，但在这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只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不断增长。”〔8〕

这样一来，固定资本的更新，就暗示着从一个更高的技术水平的更新。这有三重意义。

第一，较新机器的价值将会形成投资总额的较大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提高资本有机组成这一规律，将会在这里发挥作用。

第二，较新的机器只有在下面情况下才能购买，即：当取得这种机器的费用和这种机器给现有生产所创造的价值，与资本家谋取利润的努力不发生矛盾的时候，也就是雇用活劳动的节约，超过了固定资本的额外费用，更精确地说，就是不变资本总额被超过了的时候。<sup>〔9〕</sup>第三，这些机器只能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购买：它们不但能节省劳动力，而且还能把总的生产成本降低到社会平均水平以下，也就是说，它们能够构成整个过渡时期的剩余利润源泉——直到这些新的机器在某一生产分枝中能决定平均劳动生产力。

但是，资本有机组成的增长问题，也就是在一种更高技术水平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决不能只是降低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外的资本价值组成问题的地步。正象格罗斯曼在提到马克思时所作的正确的说明那样，<sup>〔10〕</sup>资本有机组成这一概念，包括了一个技术因素，也同样包括了一个价值因素，尤其是还包括了这两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价值组成是由技术组成来决定的）。<sup>〔11〕</sup>因此，这就意味着，某一种机器就要求某一种原料和辅助原料，以及某一种劳动力，以便开动这种机器，而与这些东西的内在价值，是不相干的。<sup>〔12〕</sup>这些比数所依靠的，并不是这种机器的价值，而是其技术性能。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使用这种机器所依靠的是已经运用的基本技术，而不仅仅是已经增长了了的固定资本的数额。为了能达到从一个生产力较低过渡到一个生产力较高的过程的目的，引进一些对机器的次要的改进、较好的劳动组织、加速了的工作速度、或更好更廉价的原料，往往就够了。但是，为了能完全地重新组织技术过程，就需要新的机器，这种新的机器必须预先设计好；有时候往往还需要新的材料，如没有这种新的材料，新的生产分枝就不能产生出来；在劳动组织和能量形式方面，例如引进输送带或自动转换机器等，还需要质方面的跃进。换句话说，在固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两种不同形式之间，必须作出区别

来。有这么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生产规模肯定是扩大了，额外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也用上了，而且，资本的有机组成也确实增长了，但是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技术革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而技术革命是对整个社会生产机器发生影响的；还有这样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对生产技术或者固定资本不但有一种扩大，而且还有一种基本的更新，而这可以引起劳动生产力的质的变化。<sup>[13]</sup>

在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积累的正常条件下，固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每隔七年或十年将会具备这样的特性：在购买或定购新的机器的连续生产周期的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资本，其价值部分增长 $M\beta$ 。如果在这十年周期中，剩余价值总额以 $M = M\alpha + M\beta + M\gamma$ 来表示，那么， $M\alpha$ 表示资本家及其家人毫无生产意义而消耗掉的那些剩余价值， $M\gamma$ 表示连续十年的生产周期所释放出来的额外流动资本——这种流动资本也分成两种：一种是购买额外劳动力的额外可变资本，另一种是额外原料继续注入生产中的额外流通不变资本。 $M$ 的第三个组成部分 $M\beta$ ，就是额外的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是逐渐被释放出来的，它既可以用来购买更多的东西，也可以用来购买更贵重的、更现代化的机器。

$M\beta$ 与 $Of$ 的关系，额外固定资本与现有固定资本的关系，构成了固定资本的增长率， $\Delta Of$ 或机器社会股份价值的增长率。这一增长率水平使得我们能够限定缓慢或快速技术更新的时期。<sup>[14]</sup>当然，关于价值方面，这些量值必须得经常知道。很明显，现存固定资本 $Of$ 的资金摊提，也可以用来购买机器，但是（至少说关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实际资金摊提，而不是关于隐蔽的利润），其价值决不会高于先已购置的机器的价值。

现在，让我们从下面这一事实出发来进行论述：一种生产技术的基本变化，可以决定固定资本的一项很重要的额外支出——

除了其他那些原因之外，这是因为要创建新的生产基地并购置新的生产工具，而现存的生产过程在“正常的”积累的情况下能够生产出来的那些额外的生产工具还不包括在内。换句话说，它决定了  $M\beta/Cf$  的一个很高的比率。这样，每一个重要的技术发明时期，都似乎是一个资本积累突然加速的时期。<sup>[15]</sup>

在这种背景之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循环过程中的周期性投资不足此后就体现了一种双重作用。它不但可以用来表示平均利润率那不可避免的暴跌，而且，它在这样作的时候也就开始制止这种下跌。它还进一步创造出了一种有历史意义的储备资金，从这种储备资金中可以拨出额外的积累手段，这种积累手段是为了作到生产技术的基本更新，在“正常的”扩大再生产之上所必需的。这一点还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一些：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的”条件下，在一次七年或者十年周期的结尾所释放出来的那些价值，肯定地说，是足够用来取得比这次周期开始时所使用的越来越昂贵的机器的。但是，这些价值并不足以用来取得生产技术的基本的更新，特别是在第 I 部类中，在那里，这样一种更新，通常是与彻头彻尾的新的生产设备的创造关联在一起的。只有在几个连续的周期中为购买额外固定资本而释放出来的价值，才能够使积累过程发生这一类在质方面的飞跃。投资不足时期的周期性复发，完成了一种客观功能，就是释放出了为这一类技术革命所必需的资本。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基本的技术革命发生在某些时期，而不是发生在另外一些时期。长期投资不足的存在，正足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额外资本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实际上没有用作投资或没有被消费掉。因此，真正的问题是要说明，为什么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这种额外资本在长期停滞不用之后，又大规模地在消费。答案是很明显的：只有利润率的突然增长，才能解释剩余资本的大批投资——正象利润率的持久衰

减（或者害怕它更加仓促地衰减）可以解释这同一资本在很多年月里一直停滞不用的原因那样。<sup>[16]</sup>在资本积累的一次新的浪潮的前夕，我们应当能够记录下来下面这些因素的出现，这些因素使得平均利润率在发生在危机过程中的资本贬值周期性结果之外，有可能发生一次突然的增长。

有关的那些因素是：

1. 资本有机组成的突然降低，比如说，资本大量深入到一个有机组成非常低的领域（或者国家）的结果。

2. 剩余价值率的突然增长，比如说，由于工人阶级的严重失败和原子化导致劳动强度提高所造成的结果，这种失败和原子化使得工人阶级不能在劳动市场上使用其有利条件以抬高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并迫使工人阶级即使是在一个经济繁荣时期也得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来出售劳动力这一商品。

3. 不变资本因素的价格，特别是原料价格的暴跌，这种暴跌对资本有机组成的突然下降或由于在第 I 部类中劳动生产力的革命性进展而发生的固定资本的价格的暴跌，有比较大的影响。

4. 由于交通运输新体系的完备、分配方法的改进、股份的加速循环等等原因而发生的流动资本周转期的突然缩短。

在这里，有两个过程必须暂时从概念上分离出来。一方面，有这样一个过程，它使得平均利润率提高，并且似乎使这种提高运动起来从而导使以前的停滞资本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在另一方面，还有这么一个过程，它从以前的停滞资本的这种大规模投资中产生出来。

如果这些引发因素的天性和量就是如此，即它们的影响可以由已积累资本本体的增长而迅速中立化的话，那么，平均利润率的提高将会只是短时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积累步伐的加速将会突然被制止，并且在一个短时期的中断之后，将会让位给更

新的投资不足。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大战刚结束的时期，在各种各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就都发生了这种情况。相反，如果这些引发因素的天性和量是这样，即它们的影响不能由于积累资本突然增长的直接结果而中立化，那么，以前并未进行投资的资本总额，将会逐渐被拖入积累的大漩涡中去。于是，不但要达到一个部分的、中等程度的生产技术革命，而且要达到一个大规模的、普遍的生产技术革命，都变成为可能的了。尤其是如果几种因素能同时共同促成平均利润率的提高的话，这种情况随之就可发生。

在前面几章中，我们已经简短地强调了这样一些原因，这些原因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曾将平均利润率导向这么一个持续增长的局面，从宗主国输出的过剩资本在殖民地国家的突然大量投资，导致了世界资本有机组成的相当的降低，同时，也导致了流动不变资本价格的突然降落，这些联合起来对平均利润率发生了影响。〔17〕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至少有两个另外的时期可以记下来的，在这两个时期中，利润率相对的突然提高也发生了。第一个时期是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紧接着一八四八年大革命爆发之后。在这一情况中，决定性的引发因素，似乎是剩余利润率的根本增长，这是由于消费品工业的平均劳动生产力有了一个根本的提高，也就是说，是由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了一种根本的增长。第二个时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或开始时发生的；它也是取决于剩余价值率的一种根本提高，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提高是由于阶级势力关系的根本变化而成为可能的，这种变化由于劳动强度的根本提高而延长了，并且还和价格的降落结合在一起，首先是流动不变资本由于大多数现代技术伸进了生产原料的领域里而降价，然后是固定不变资本由于机器制造工业劳动生产力的突

然提高而降价。在下一章我们论述紧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况时，还要再来论述剩余价值率这一增长的具体原因和结果。

那么，我们已经描述过，由于受平均利润率突然提高的决定而使呆滞资本重新进入增值过程，作为这种过程的“整个技术革命”是什么呢？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里，马克思对所有发达的机器区分出了三种基本上不同的部分：动力机器、传送机器和工具或劳动机器。<sup>〔18〕</sup>当然，后面两种的进化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动力机器的发展，这种发展体现了整体的、有决定性意义的动力因素：“工作机危围的扩大，和同时进行操作的工具数的增加，使一个较大的发动机构，成为必要。这个结构要克服它本身的阻力，已经需要使用一种比人力更为强大的原动力，且不说人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极不宜于生出划一的和继续的运动了。”<sup>〔19〕</sup>而且：“一个机器体系，有的象在织布业上一样，建立在若干同种工作机互相协作的基础上，有的象在纺纱业上一样，建立在不同种工作机互相结合的基础上，但只要它是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推动，它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自动机。”<sup>〔20〕</sup>动力机械的生产，也就是机械方面的能量生产机，利用机械而不是利用手工操作，正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有组织的机械体系”形成的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运动。用其他机器来生产机器的这种机器生产，首先是动力机械的生产，是技术发生根本变化的有历史意义的先决条件：“在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大工业就会在技术上与手工业和手工制造业给它提供的基础不能相容”，也就是说，与手工业生产和手工制造的机器本身，不能相容。“所以，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的作为特征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并且必须用机器生产机器。要这样，它方才有它的适当的技术基础，有它本身的立足点。十九世纪最初十年机器经营发展的结果，机器已经在事实上渐次支配着工具机的

制造了。但是最近十年间，大规模铁路的敷设，和海洋轮船的制造，才一定要有那种在原动机制造上使用的巨魔式的机器。”〔21〕

这样一来，在动力技术方面的基本革命——用机器来生产动力机械的这种生产技术——就似乎成了整个技术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从一八四八年以来的蒸汽机机械生产；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电动机和内燃机的机械生产；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电子仪器 and 核动力仪器的机械生产——这就是十八世纪后期“最初的”产业革命以来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上的三大革命。

用机械生产动力机器的技术革命，一旦发生了，那么，机器的整个体系就会逐渐发生变化。因为，正象马克思说明的那样：“一个产业部门生产方式的革命，使别一些产业部门生产方式的革命成为必要。因社会分工而一个一个分离，各自生产一种独立商品，但当作总过程的一个阶段又密切联系起来的各个产业部门，首先有这种情形。所以，机器纺纱业使机器织布业成为必要；二者合起来，又在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上使力学——化学的革命成为必要。另一方面，棉纺纱业的革命又引起那种使棉纤维和棉子分离的轧棉机的发明；要有轧棉机，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照当时必要的巨大规模来进行。工业和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又特别地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需用的条件，那就是，使交通——运输工具有发生革命的必要。象一个以小农业（它有它的家庭副业）和城市手工业为枢纽（让我们用佛利埃（Fourier, Charles）的一个用语罢）的社会的交通——运输工具，十分不够满足手工制造业时期——它有扩大的社会分工，有劳动手段和劳动者的集中，并且有殖民地市场——的生产需要，因此要在事实上发生革命一样，手工制造业时期流传下来的交通——运输工具，对大工业来说，也马上变成了不能忍受的障碍，因为大工业有热病似的生产速度，有庞大的生产规模，有大量资本和劳动者不断由一个生产领域投

入另一个生产领域，还有新创造的世界市场的联系。所以，撇开已经完全变化的帆船建造术不说，交通——运输系统也逐渐靠内河轮船，铁路，海洋轮船和电报的系统，而与大工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了。”〔22〕

要提出证据来以说明下述情况，那并不是很困难的：在能源机器生产和动力机械的机器生产方面这三大基本革命的每一次革命，都逐渐使整个经济中的全部生产技术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交通运输体系的技术在内。〔23〕例如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在电汽和内燃机时代的远洋轮船和内燃机机车、汽车和无线电通讯；想一想在电子和核子时代的喷气式运输机、电视、用户直通电路、雷达和卫星通讯网和原子动力集装箱货船。〔24〕因此，发自动力机械和能源的基本生产技术革命的那种技术变化，导致了过剩资本的一种新的增值，这种过剩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一个接一个的周期中一直在堆积。但是，恰恰仍是由于这同一个过程，新能源和新动力机器的逐渐普遍化，必然会在一种较长久的加速积累状态之后，导致一种较长久的减速积累状态，也就是导致一种更新的投资不足和呆滞资本的重新出现。

新的动力机械的生产基地暗示出新积累资本扩大的长期可能性。只要在制造蒸汽推动机器或电力马达机器或电子机器的工业的一系列周期中所投进的资本，继续控制着市场，那么，只有小部分被谴责为进行试验的冒险资本——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充分增值的资本——敢于在能源和动力机械“新的王国”中进行冒险。等到新机械的应用越来越变得一般化了，制造这些机械的工业的增长率，也就会逐渐一步一步地降低，并且，在第一次增长状态中大大地积累的那些资本，要想继续增值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生产技术的总的变化也会使资本有机组成产生一个显著的增长，而且，根据具体的条件，这迟早会导致平均利润率的降低。

平均利润率的衰减反过来又变成了下一次技术革命的最大的障碍。在引进任何一种新的基本技术的第二种状态中，越来越多的增值困难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投资不足并产生越来越多的呆滞资本。只有在一些特殊条件联合起来使平均利润率产生一个突然增长的情况下，在数十年中慢慢积聚起来的这种呆滞资本才能大规模地投入新的生产领域中去，而这种新的生产领域是能够发展新的基本技术的。

这样，资本主义历史之出现于国际舞台上，不仅仅是作为每隔七年或十年一次的一系列周期性运动，而且也是作为一系列较长的时期，每个时期大约是五十年，这种较长的时期我们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四次了：

——从十八世纪的结尾一直到一八四七年的危机的一个长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手工制造或机器制造的蒸汽机，逐步向最重要的工业分枝和工业国家扩散；这是工业革命本身的长波。

——从一八四七年的危机持续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一个长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作为主要动力机械，机器制造的蒸汽机的普遍化。这是第一次技术革命的长波。〔25〕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个长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在各个工业分枝中普遍应用了电力机械和内燃机。这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的长波。〔26〕

——一九四〇年从北美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这一个长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普遍采用电子仪器的手段来控制机器（同时也逐渐引进了核子能）。这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长波。

这些长时期中每一个都可以再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技术确实在经历一次革命，并且，在这个时候为

新的生产手段所必需的生产基地之类的事物，必须首先要建立起来。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利润率增长、加速积累、加速发展、以前呆滞资本的加速自我扩张以及原来投资于第 I 部类而现在已从技术上废弃的资本的加速增值。紧接着是第二阶段。在这第二个阶段中，生产技术的实际变化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为新生产手段所需要的新的生产基地，大部分都已经有了，只是要进一步扩大或从量的意义上说需要改进。现在的问题是使这些生产手段在所有工业和经济分枝都普遍采用的这些新的生产基地上制造。决定在第 I 部类中资本积累以突飞猛进的速度扩大的那种力量，这时已经不复存在，相应地，这一阶段变成了这么个阶段：利润退缩、积累逐渐减速、经济发展减速、在整个已积累资本尤其是新的额外积累的资本在增值方面日渐加多的困难，以及把自我再生产而慢慢增加的资本变为呆滞资本。<sup>[27]</sup>

这一计划包括了一系列的阶段：直到一八二三年的加速增长、一九二四——一九四七年的减速增长、一八四八——一八七三年的加速增长、一八七四——一八九三年的减速增长、一八九四——一九一三年的加速增长、一九一四——一九三九年的减速增长、<sup>[28]</sup>以及一九四〇——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八——一九六六年的加速增长。按照这一计划，我们今天应该是已经进入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这一“长波”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资本的减速积累。最主要的帝国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比较迅速的衰退（法国在一九六二年；意大利在一九六三年；日本在一九六四年；西德在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美国在一九六九——一九七一年；大不列颠在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意大利在一九七一年以及世界范围的衰退在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似乎证实了这种假设。

很显然，这些“长波”并不能以机械的方式来表明其本身，而

是通过那些“古典的周期”的连接起作用的。<sup>[29]</sup>在一种扩张的状况下，繁荣的周期就会更长一些而且更强烈一些，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就会短一些而且更表面一些。反过来，在长波的这样一些状况下，这时停滞的趋势很普遍，那么，繁荣期就会不那么兴旺，而且比较短暂，而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时期对比之下就会较长、较深刻。“长波”只有作为这些周期性波动的结果才是可信的，它决不能作为加在这些波动之上的某种形而上学的附加物。

从资本主义历史似乎已经看出这些个“长波”的第一位著作家，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亚力山大·黑尔普汗 (Alexander Helphand)，即帕尔瓦斯 (Parvus)。<sup>[30]</sup>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帕尔瓦斯通过对农业危机的一些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一八七三年开始的那个长期的不景气（恩格斯认为这次不景气有重大的意义。<sup>[31]</sup>），应当很快被一个新的、长期的高涨所代替。他第一次发表他的这个意见是在一篇论文中，这篇论文刊在一八九六年的“撒克逊劳动者新闻”上，然后，经过进一步精心修订，又收在他一九〇一年出的小册子《商业危机与劳动组织》中<sup>[32]</sup>。帕尔瓦斯本人也以马克思的著名一段话作为基础，<sup>[33]</sup>他运用了资本的“狂飙运动时期”这一概念，提供了一种概念上的结构，就是紧接着扩张的“长波”而来的是“经济萧条”的长波。在帕尔瓦斯看来，这种长波运动的决定因素是世界市场因某些变化而向外扩张，而这些变化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一切领域中都在进行——在技术领域、在货币市场领域、在贸易领域、在殖民地领域等”——而且将“整个世界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更加无所不包的基础之上。”<sup>[34]</sup>他并没有提出一些统计数字以支持他的论题；而且，他在他的周期划分方面还犯了严重的错误。<sup>[35]</sup>但是，尽管有这些，他的看法仍然是具备非凡尖锐心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一个光辉的尝试，即使说他也是散漫而又前后矛盾的。<sup>[36]</sup>

一直到过了十多年之后，帕尔瓦斯的这个富于想象力的意见——这个意见曾立刻得到考茨基的赞扬<sup>[37]</sup>——才再一次被人提出来，而这一次提的是荷兰的马克思主义者范·盖尔德伦(J. Van Gelderen)。<sup>[38]</sup>一九一三年，范·盖尔德伦用费德尔(J. Fedder)这样的笔名，在荷兰的“左翼”期刊“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组三篇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处处可以看得见的价格上涨作为他的起点，为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建立起了一种“长波”的假设。这些文章一直到现在，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得到的注意，简直是微不足道的。这些文章把这一整个问题提高到了一个水平，这个水平比之帕尔瓦斯和考茨基所达到的水平要高出许多。范·盖尔德伦不但想为他的论题搜集经验上的证据，而且还细致地跟踪了价格、对外贸易、生产和生产力等许多领域和运动，以及银行贴现率、资本积累和商业基础等等方面的运动。<sup>[39]</sup>他也不想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作出说明，而且，在他这样作的时候，他和帕尔瓦斯不同，他不是从市场的扩大出发，而是从生产的扩大出发：“掀起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浪潮的先决条件，<sup>[40]</sup>是生产的扩大，不论是自发的扩大还是渐进的扩大。这就产生了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往往是间接地需求制造生产手段和原料的那些工业产品。扩大生产所产生的需求的性质……可以采用下面两种主要的形式：

1. 通过对人烟稀少地区的开垦。在这些地区，农业或畜牧业为居住人口提供了输出产品，他们用这些输出产品来偿付他们所需货物的价格。他们的所需货物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大量消耗的货物，大多数是制造品；另一种是生产资料，如机器、铁路和其他种交通运输的要素以及建筑材料等。由这种需求所引起的价格提高，从一个生产分枝扩展到另外一些分枝。

2. 通过一个生产分枝相当突然的提高，这种提高与以前满足

特殊人类需要的那种相比的话，是处在更强有力的地位（特殊需要如汽车工业和电力工业）。这一种形式的效果就一种较小程度而言，与第一种形式的那种完全一样。〔41〕

范·盖尔德伦从这一分析——这与考茨基不相干，考茨基在此时也有与此相类似的一种分析〔42〕——所得出的结论是，扩大中的“长波”是典型地跟在黄金生产的大提高后面的。〔43〕据公认，他这种解释的缺点是明显的二元论，因为，“浪潮”可能是归因于世界市场的扩大，也可能是由于新的生产分枝的发展。除此之外，他还没有认识到，资本的额外投资问题，不能压缩为货币资料的生产（即黄金的生产），而是构成了剩余价值的额外生产和积累问题。然而，对于一个先驱者，我们不能提出这样一种要求：他应该对新发现复杂问题的一切方面都能给予满意的答案。因为，毫无疑问，范·盖尔德伦的工作是属于开创性质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对“长波”理论的进一步阐述的人中——从康德腊季耶夫(N.D. Kondratieff)到熊彼特(Schumbeter)和杜普利茨(Dupriez)——几乎没有一个超出范·盖尔德伦所发展了的概念。范·盖尔德伦手头缺少统计资料，这并不能损害他所作出的贡献的先驱性质。乌尔里希·魏因斯托克(Ulrich Weinstock)错误地责备了他，说他到达了“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中特殊速度变化的固定地步”，而其证据基础只不过包括了六十年，并且还说，这应该“予以抛弃”。〔44〕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范·盖尔德伦的论据是充足或不充足的形式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根据我们今天现有的资料来看一下范·盖尔德伦的假设是否正确的问题。魏因斯托克没有回答这一问题，当然也就不能欣赏范·盖尔德伦的工作的预见性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年青的苏维埃国家的思想家们就开始深入地关心“长波”问题。康德腊季耶夫是前克伦斯基临时政

府的粮食部副部长，他从一九一九年以来就对这一问题发生了兴趣，并且在一九二〇年，他成立了莫斯科联合研究所，为他自己的“长波学说”开始搜集资料。〔45〕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这时候正在对比着一九一四年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以研究资本主义的战后发展问题，他也探讨了这一复杂的问题——尽管他很可能并不知道范·盖尔德伦的著作，〔46〕这部著作吃了这样一个缺点的亏：它是用很少马克思主义者或经济学家能接近的语言写成的。托洛茨基在对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所作关于世界形势的著名的报告中，宣布了长波问题：“在今年元月，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一张表，表包括了一百三十八年的一个时期——从美洲十三个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起到我们今日。在这期间有十六个周期，也就是有十六次危机和十六次繁荣状态。……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分析一下这条发展曲线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时期可分为五个部分，五个各不相同的时期。从一七八一年到一八五一年期间，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运动。我们发现，在这七十年期间，对外贸易按人口平均计算只从两个英镑增加到五个英镑。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发生了扩大欧洲市场结构的作用，这次革命之后出现了一个突破点。从一八五一年到一八七三年，这条发展曲线垂直上升。在这二十二年期间，对外贸易按人口平均从五英镑增加到二十一英镑，而与此同时，铁的产量按人口平均从四公斤半增高到十三公斤。然后，从一八七三年起接着是一个不景气时期。从一八七三年差不多一直到一八九四年左右，我们发现英国贸易是停滞的……在这二十二年期间，对外贸易按人口平均从二十一英镑跌到了十七点四英镑。然后又出现了另一次繁荣，这次繁荣一直持续到一九一三年——对外贸易从十七英镑提高到三十英镑。然后，终于到了一九一四年，这第五个时期开始了——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大破坏的时期。这些周期性的波动是怎样

与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基本运动相混合呢？那很简单。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危机是短暂的，其性质是肤浅的，而繁荣则是持久的、影响深远的。在资本主义衰退时期，危机的性质是持久的，而繁荣则是短暂的、肤浅的和投机的”。〔47〕

托洛茨基接下去谈到了一八五〇年之后的资本狂飙运动时期——很显然是参照了他以前的同事帕尔瓦斯的〔48〕——并在结论中提出了两个预测：第一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资本主义的某种向上发展不仅从经济上说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种向上发展将是短期的，而且决不能排除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的机会。第二个是，在这段长时期中，“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如果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遭到持续的挫折的话，那么，一次新的资本主义发展就是有可能的。〔49〕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托洛茨基有好几次机会又提到这同一个问题，〔50〕但是，在康德腊季耶夫的第一部著作出现的时候，托洛茨基在给“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一封信中，又一次论述了这个问题。在这封信中，他重申了他的这一信念：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除了那些“正常的”工业循环周期之外，还有一些较长的时期，这些时期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发展，有很大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个粗略的纲要。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同类的一些周期都分成了系列。当外形十分明确的繁荣和轻微而又短暂的危机表明了一些周期的特征的时候，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就出现了。结果，我们就得到一个资本发展基本曲线显著上升的运动。如果这条曲线在通过部分的、周期性的波动的过程中，大致上在数十年中保持在类似的水平之上，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停滞时期。最后，在某些个历史时期中，如果这条基本曲线在通过那些周期性波动的过程中，总的来说向下降了，这就象征着生产力衰退了。”〔51〕托洛茨基甚至还具体而详尽地论述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曲线”

应该怎样来研究，他强调了下边这种情况：在这些方面的经验上的探索对于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sup>[52]</sup>在这个上下文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托洛茨基强调了下面两个方面：一个是需要走出“纯粹的”经济资料的一些限制，另一个是在任何严肃的探讨中需要结合着整个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发展。这是托洛茨基对康德腊季耶夫第一个研究著作所作的尖锐批评的大意，<sup>[53]</sup>而康德腊季耶夫认为“长期循环”存在的证据，是以纯统计数据为基础的：“共产国际第三届世界大会之后，康德腊季耶夫教授研究了这一问题——象通常一样辛辛苦苦地避开了大会本身所采纳的问题的制订——并且试图与包括十年一个时期的‘小周期’相并列而建立起一个包括大约五十年左右一个时期的‘大周期’的概念。根据这一风格对称的创议，一次大的经济周期包含着五个小的周期，而且，其中有一半带有繁荣的性质，而另一半则带有危机性质，同时还有所有的过渡阶段。康德腊季耶夫所提出的关于大的周期的统计上的限定，不论是在个别的国家还是在整个的世界市场，都应当加以谨慎的而不是过于轻信证实。康德腊季耶夫教授的下述意图，已经可以预先加以反驳了：他想使他所谓的‘大的周期’时代带有在小周期中可以看得见的那同样的‘严峻的合法步伐’的色彩；很显然，这是从形式上的类似得出的虚假的概括。一旦市场出现了，那么，小周期的周期性再现就要受资本主义势力内在动力学的约束，并且还要随时随地地表现出其自身来。至于说到康德腊季耶夫所提出也作为一个周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那个大的线段（五十年），其性质和持续时间并不是取决于资本主义内部的互相影响，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外在的一些条件，资本主义通过这些条件的渠道而向前发展。资本主义在一些新的国家和大陆的获得发展、新的自然资源的发现，以及随着这些情况而来的那些‘上层建筑’秩序的主要事实，例如战争、革命等，都能决定资本主义发展

的性质以及上升、停滞、衰落时代的替代。”〔54〕

乔治·加尔维对这一点作的解释意思是说，虽然托洛茨基接受了长期波动的存在，但是，他却否认这些波动有一种循环性质。〔55〕这种论点并不是很确切的，除非我们把这整个问题降低成一个毫无意义的辩论，辩论“周期”、“长波”、“长时期”、“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大段”等等之间的词意区别。托洛茨基提出了两个中心论点以反驳康德腊季耶夫的论题：第一个是“长波”与古典的“周期”之间的类同是虚假的，也就是说，“长波”并不是象古典的周期那样具有一种相同的“天然需要”。第二个是，古典的周期可以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动力学来单独作解释，与此同时，对长波的解释，就需要“对资本主义曲线、对后者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更具体的研究。”〔56〕换句话说，托洛茨基反对“长波”的单一原因理论，这种理论是用马克思以固定资本的更新而对古典周期所作解释的类似物建立起来的。

这两种批评意见——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许多苏联经济学家都共有这种意见〔57〕——完全可以都被接受。如果我们把“长波”解释为取决于利润率涨落长波的那种加速积累和减速积累的长波的话，那么很明显，这种升降并不是取决于一个单一的因素，而必须用一系列的社会变化来加以解释，在这些社会变化中，托洛茨基所列出的那些因素，起了主要的作用。下面的表会有助于把这一点弄清楚：

一旦已经确定了“长波”的上升曲线和下降曲线都取决于十分不相同因素的交叉作用，并且还强调了这些“长波”并不是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那些古典的周期那样，具有同样的固有周期性，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来否认这些“长波”与主要机制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就其本性而言是一切变化的综合性的表达，而资本永远要受这些变化的影响：利润率的种种波动。〔58〕

长 波	主要情况	工业品价值成分的运动	运 动 的 根 源
1. 1793—1825	扩大, 利润率上升	Cf: 直线上升 Ce: 直线上升, 然后下降 V: 下降 S/V: 上升	手工制造机器、农业落后于工业——原料价格上涨。实际工资下降, 工业无产阶级和大批失业逐渐扩大。世界市场大大扩大(南美洲)。
2. 1826—1847	呆滞, 利润率停滞	Cf: 上升 Ce: 下降 S/V: 趋于稳定	从英国和西欧的前资本主义生产竞争中获取的利润衰减。愈益增长的C价值使得更高的剩余价值率中立化。世界市场的扩大速度放慢。
3. 1848—1873	扩大, 利润率上升	Cf: 下降 Ce: 先是稳定, 然后又上升 V: 下降 S/V: 上升	向机器制造机器方面的过渡, 降低了Cf的价值。Ce上升; 但这种上升不能与Cf的下降齐步前进。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结果, 随着整个西欧和北美洲铁路建设的日趋工业化和扩大, 世界市场得到了很大的扩展。
4. 1874—1893	呆滞, 利润率下降, 然后又停滞, 然后又逐步上升	Cf: 上升 Ce: 下降 V: 缓慢上升 S/V: 先是下降, 然后又回升	用机器制造机器已经普遍化。用这种机器生产出来的商品不再能生产剩余利润。资本有机组成的增长导致了平均利润率的下跌。在西欧, 实际工资提高了。由于资本输出日趋增多和原料价格降低的结果, 才逐渐允许资本积累有所增长。世界市场相对停滞。

长 波	主要情况	工业品价值成分的运动	运动的根源
5. 1894—1913	扩大，利润率先是上升，然后停滞	Cf: 下降 Ce: 上升但缓慢 V: 缓慢上升，然后转稳定 S/V: 先是直线上升，然后转稳定	对殖民地的投资、帝国主义的突破、垄断的一般化，都更进一步从原料价格明显而缓慢的上升中获取了利润，并且由于第二次技术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力和剩余价值率的直线上升而受到了促进，这些都允许利润率的总的增长，这种增长说明了资本积累迅速增长的原因。世界市场的扩大（亚洲、非洲和大洋洲）。
6. 1914—1939	衰退，利润率猛跌	Cf: 稳定 Ce: 下降 V: 先下降，然后稳定，然后又下降 S/V: 先下降，然后稳定（在德国，从一九三四年又回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世界市场的分裂、物质生产的衰退等都造成了资本增值的困难，这种困难由于俄国革命的胜利和由此引起的世界市场的缩小而更加增多。
7. 1940-45— 1966	扩大，利润率先是上升，然后逐渐开始下降	Cf: 上升 Ce: 下降 V: 先是稳定或下降，然后逐步上升 S/V: 先是直线上升，然后稳定	由于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决定的工人阶级的削弱（和部分的原子化），允许利润率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这种增长促进了资本的积累。这首先是走向了军火生产，然后走向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创造发明时代，这大大地使得不变资本廉价化，并因而促成了利润率的长期增长。世界市场由于绝对主权、世界战争和非资本主义地区（东欧、中国、北朝鲜、北越、古巴）的扩大而缩小了，但是然后又大大地扩大了，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劳动分工加强了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开始了。

长 波	主要情况	工业品价值成分的运动	运 动 的 根 源
8. 1967—……	呆滞，利润率下降	Cf: 平稳并又上升 Ce: 先是下降，然后又突然上升 V: 逐步上升，然后稳定 S/V: 稳定化	帝国主义国家对“产业后备军”的缓慢吸收，对于剩余率的进一步提高，是一种障碍，尽管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阶级斗争抨击了利润率。国际竞争的加强和世界通货危机也在这同一方面上起作用。世界贸易的扩大速度慢下来了。

与此同时，与康德腊季耶夫一样但彼此并无任何瓜葛的是荷兰马克思主义者萨姆·德·伍尔夫(Sam De Wolf)，他试图用统计学的办法将盖尔德伦的课题加以精炼，办法之一是制订出一个“反循环”的数字体系。康德腊季耶夫误解了这与古典周期在形式上的相似之处，这一点已经被托洛茨基指出来了，而德·伍尔夫在论述过程中，却把康德腊季耶夫的错误甚至发展到了更远的极端，他给“长周期”假定了一个“绝对的规律性”——“每个长周期有古典周期”两个半。德·伍尔夫给这个周期和那个周期规定了一个刻板的长度，尽管他觉得“古典周期”的持续时间将会逐渐减少，从十年减到九年，然后再减到八年甚至七年。<sup>[59]</sup>德·伍尔夫在一九二四年所作的分析，是在价格和黄金生产的发展状况下作出的，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给“长波”提出什么说明，这样一来，他的论述较之范·盖尔德伦的更为落后。他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sup>[60]</sup>人所共知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说明，这个说明与康德腊季耶夫的那种非常相似，其基础是耐用固定资本的重建，这种耐用固定资本是建筑物、煤气工厂、全部车辆、管子、电缆等等。与马克思对“古典周期”所作的说明极相类似的一种说明又一次出现了；其有效性从来没有从经验上得到过证实。<sup>[61]</sup>

康德腊季耶夫要分离并说明“长波”〔62〕的那种著名的意图，到后来被熊彼特提高成为对长周期的一种典型的解释。然而，康德腊季耶夫在他所作的第一个成熟的形式中，〔63〕仍然摇摆于这种解释的不同的类型之间。他还保留了这样的概念：长波的“退潮期”的特征是严重的农业不景气，而“长期的向上高涨期”的典型特征则包括对前一种状态时所作出的许多创造发明的应用、黄金开采的加速和巨大的社会动荡，其中包括战争。康德腊季耶夫直接（但并未公开承认）参照了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批评，他反驳了这样的“基本的”但并不是“严密的”一种考虑：“长波”与那些中等长度的相比之下，是“取决于偶然的环境和外在的事件”，“例如技术的变化、战争和革命、一些新的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结合和黄金开采的波动等”。〔64〕这样一些因素他本人也强调了，据说这些因素都是果，而不是因；这些因素所发生的影响，他一点也不否认，据说这些因素的有节奏的运动只能用经济发展的长期波动才能加以解释。因此，举例说吧，他争辩说，“并不是一些新的地区的联合给出了动力，使得经济的长波上升，而恰恰是相反，一次新的上升由于加速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动力的速度，因而才使得为了出售和原料而对新的国家和新的市场进行剥削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65〕

这一说法本身还并不是对“长波”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要等两年之后，在康德腊季耶夫的第二篇德文论文中作出。〔66〕他的解释的主要基础是“大量投资”的长期性、节约活动的波动、现金资本（贷款资本）的呆滞以及长期持续的低价格水平所造成的一些后果：“这些商品（大量投资、改进、称职劳动干部等等）具备一种长期使用的能力。它们的建造或生产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段时间要超过通常商业和工业循环的长度。这一类资本商品资金的扩大过程，既不是连贯的，也不是有规则的。这种经济方面长波

的存在，正是与这样一种资金扩大的机制相关联的；其加速扩大的时间，与上升波相一致，而这种资本商品生产的呆滞或停顿的时间，则又与大循环的下降波相一致。这样一种资本商品的生产，需要大批的资本费用，并要通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这样一种资本商品扩大生产时期的出现，也就是长的上升波时期的出现，要依靠一系列的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是：1. 高度集中的节约活动。2. 相对丰富而又廉价的借贷资本供应。3. 积累于强有力的企业和金融中心的手里。4. 一种低水平的商品价格，这种价格可以作为节约活动和长期资本投资的一种刺激物而发挥作用。这些先决条件的存在，产生了一种形势，这种形势迟早会使上述这种基本资本商品的生产增加，并因而使一个上升的经济长波出现。”〔67〕康德腊季耶夫看来已经以这样的方式给“长波”作了详细的说明，在这之后，他转而对在农业方面和工业方面平均劳动生产力的不同的速度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由农业劳动生产力的阻滞所决定的农产品购买力的提高，最终使得“长波”开动起来，因为，这样一来对所有商品的需求，全都加快了。〔68〕

康德腊季耶夫对于别人对他的批评所作的反驳，也同样可以很好地应用于他所列出的五种因果关系：他从没有证明过，这些都是原因而不是结果。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扩大了“长波”中，对农产品的供和需之间的越来越加大的间隙，可以认为不大是一种一般扩大的原因，而更象是一种结果：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和工业生产的越来越趋于提高，事实上产生了这一类的需求，而农产品的弹性，则较工业品的为差。〔69〕但是，如果农业原料和食品的价格有所提高，那么，不但是对于工业品的需求的影响，而且还有对于利润率的影响，都应当加以探讨，但是，康德腊季耶夫并没有作到这一点。这样一来，他就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工业品日趋降低的购买力”没有很快地抑制住那种扩大。

呆滞的现金资本（借贷资本）是每一次危机的一个特征；为什么这种资本在一个长时期中保持呆滞——尽管有那种低的利息率——而不是有生产性地向外投资呢？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节约活动的增加和资本的日趋集中，与其把这描绘成为可变资本，不如描绘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不变资本（在连续的“繁荣”高峰中略有间断）。〔70〕而且，关于“长寿资本商品”，〔71〕同一个反对意见也适用于德·伍尔夫的类似的论题：有四十到五十年生产生命的“资本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起一种边缘作用。如果所谈的生产手段的生命期短于这一种，那么，任何“反响作用”也不能引起一个四十到五十年的周期。于是，已经呆滞资本的上升运动和下跌运动和具有生产性投资的资本的上升运动和下跌运动，就将会大致上局限于十年的周期了。康德腊季耶夫从他自己的论据中排除了两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平均利润率的长期波动和技术革命对更新固定资本的价值和总量所发生的影响——那么，他自己就堵塞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的解决路子。康德腊季耶夫在对“长波”作出解释的时候所犯的错误的方法学上的基础，可能是在于他夸大了价格波动的固定性，并且对工业生产和生产力增长方面的波动，分析不足。最后，这还可以追踪到他对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和货币学说的抵制或修正。

约赛夫·熊彼特在对于“经济学中的长波问题”的最彻底的研讨方面是有功的，〔72〕他试图来避免这些错误。在康德腊季耶夫开始注意“长波”问题的时候，熊彼特已经完成了他那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理论，〔73〕熊彼特从他的这种理论出发，制订出了一种关于“长波”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基础是“企业家的革新活动”，也就是说，与他那总的资本主义理论仍保持和谐。他也不想给生产系列赋予较价格系列为大的重要性，尽管看来他从经验上在这一方

面是失败了。<sup>[74]</sup>而且，为什么在某些时期会引进大量的革新（“成群结队”），这个问题如果不对下述两点作一个比较彻底的探讨，是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答的：1. 生产技术的作用；2. 利润率的长期波动。恰恰是这两个因素在熊彼特的巨著中论述得不够充分。更使人感到惊异的是，熊彼特完全认识到了利润问题的中心作用。<sup>[75]</sup>

直到现在，对于熊彼特和康德腊季耶夫这种“长波”理论提出最有系统的批评的，有赫尔岑斯坦因（Herzenstein）和加尔维（Garvy）（这二人批评康德腊季耶夫），库兹尼茨（Kuznets）（批评熊彼特）和魏因斯托克（Weinstock）。<sup>[76]</sup>他们那些批评的说服力不是很大。康德腊季耶夫那些统计学上的方法在技术方面的缺陷、熊彼特的系列对“长波”起讫点的武断选择和缺乏说服力的性质（除了在价格方面的论述），都可以姑且承认。事实仍然是这样：在区别一八四八——一八七三年的主要扩大、一八七三——一八九三年的明显的长期不景气、一八九三——一九一三年经济活动的猛增、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那如果不是停滞和倒退也是剧烈减缓的发展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种更新的主要增长等方面，经济史家们实际上是一致的。<sup>[77]</sup>只有在关于“第一个康德腊季耶夫”——也就是关于一七九三——一八二三年的较快增长和一八二四——一八四七年的较慢增长的所谓交替方面——才有某种怀疑，而这种怀疑中的一部分已经证实了。<sup>[78]</sup>这一连串的至少五个“长波”，不能归之于纯粹的偶然，或归之于各种各样外在的因素。

赫尔岑斯坦因对康德腊季耶夫的批评，暴露了他在理论说明中的大多数错误。但是，在他从经验上想法反驳“长波”的存在的时候，他在另一个方向走得太远了。他不适当地推断了美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并从而试图把一八四九——一八七三年的长期上升以及一八七三——一八九三年的拖长了的不景气，只是局限于大

不列颠。然而，本章结尾处所收集的统计资料，毋庸置疑地证明，这两个长波显然席卷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个世界生产和整个世界市场。事实上赫尔岑斯坦因甚至走到了这么远，他甚至以一个专门杂志上的一篇虚幻的文章为基础，进而否定了一八九三——一九一三年的增长。他那反驳康德腊季耶夫的论据，更为有趣。康德腊季耶夫试图“将历史时期划分成循环性的周期”，赫尔岑斯坦因反对这一点，因为——他写道——康德腊季耶夫的“独一无二的历史系列……会导致世界市场一般情况的基本变化，和这一市场各领土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本变化，”而康德腊季耶夫的系列从逻辑上讲也不能够解释“固定规律的——再的波动”。〔79〕但是，他忽略了这么个事实：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独一无二的历史系列”确实是可以划分成两个基本范畴的：一个范畴是能引起平均利润率增长，另一个范畴是最终引起平均利润率下降。赫尔岑斯坦因没有确定这样的概念：这些系列对于利润率只有偶然的、不相关联的影响。在缺乏这样一种证据的情况之下（这样的证据我们从理论上、经验上来看，都是不可能提供的），为什么这种“独一无二的系列”确实不能认为是平均利润率长期上升和长期下降的连续促进因素——换句话说，就是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率的因素——那是没有理由的。

有人企图把“长波”的存在解释为“较强烈的”古典周期或“较微弱的”古典周期的一种简单的表现，这种企图也同样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80〕长期的经济发展在速度的转换方面，在一个时期受经济繁荣状态的比较强烈的影响，而在另一个时期又受危机和停滞状态的较强烈的影响，这一事实至少说应当提出一个问题。一旦这一问题被承认是如此，而不是一种不需证明的事实，那么，就必须对这一问题作出解释，因此，我们就再一次回到那个有疑问的“长波”问题上来。根据库茨尼茨的意见，用“趋势”和武断的“十年

平均数”来取代“长波”，已经成为时髦的事了。但是，在这里一个真正的问题也由于其被溶解在很长久的时间里而消失了。就连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的大萧条，也在某些这样的“趋势计算”中消失了。<sup>[81]</sup>但是，谁也不能怀疑那次特殊危机的存在。

魏因斯托克以波普尔(Popper)反对“历史循环论”的论辩为基础而争辩说，长波理论在灵感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是不可用的；<sup>[82]</sup>当然，暴露出反科学偏见的并不是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正是魏因斯托克。真正的问题最终在于，“长波”的存在到底确定了还是没有确定，如果说已确定，那么，应该怎样来加以说明。魏因斯托克进一步反对：“产量和收入的时间系列还需要一种长波的证明，这种时间系列不能为足够多的相对说先进国家建立起来，这些国家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时期中是可靠的。”<sup>[83]</sup>换句话说，“长波”从统计学上说是不可论证的。与此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主要问题并不是一个统计学证实的问题，而是一个从理论上加以阐明的问题，<sup>[84]</sup>尽管毫无疑问，如果“长波”理论不能从经验方面加以证实的话，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失去事实根据的假设，最终会成为一种虚幻。但是，经验证明的方法本身，必须要适合于要解释的特殊问题。价格的运动可能是由于通货膨胀运动所引起的——在金本位制的情况下，包括这样一种情况：贵金属商品价值的降低幅度大于其他商品平均价值的降低幅度——价格运动并不是明确的、可靠的指示物。<sup>[85]</sup>个别商品的产量数字可能在某个时期受到作为“增长部门”特殊生产分枝的作用的严重影响，在处理这种产量数字的时候，也应该谨慎从事。收入曲线也可能是取决于膨胀的价格运动，并且也是派生的指数，因而只有经过了基本的、历史的分析之后，才能使用。因此，最具说服力的指示物似乎就是工业产量的整体和世界贸易总额的发展（或者按人口平均的世界贸易）；前者将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长期趋势，而后者则将

表明世界市场扩大的速度。正是应用了这两个指示物，我们才能够为一八四七年的危机之后的“长波”，提供一个经验上的证明：

#### 大不列颠工业产量每年累积增长率<sup>[86]</sup>

迪恩 (Deane) 和柯尔 (Cole)：《英国的经济增长，一六八八——一九五九年》，第一七〇页（包括建筑贸易）。

1827—1847	: 3.2%	[87]
1848—1875	: 4.55%	
1876—1893	: 1.2%	
1894—1913	: 2.2%	
1914—1938	: 2%	
1939—1967	: 3%	

#### 德国工业产量每年累积增长率<sup>[88]</sup>

（一九四五年以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850—1874	: 4.5%
1875—1892	: 2.5%
1893—1913	: 4.3%
1914—1938	: 2.2%
1939—1967	: 3.9%

#### 美国工业产量每年累积增长率<sup>[89]</sup>

1849—1873	: 5.4%	
1874—1893	: 4.9%	[90]
1894—1913	: 5.9%	
1914—1938	: 2%	
1939—1967	: 5.2%	

世界按人口平均物质产量每年累积增长率<sup>[91]</sup>

1865—1882	: 2.58%
1880—1894	: 0.89%
1895—1913	: 1.75%
1913—1938	: 0.66%

世界贸易总额每年累积增长率<sup>[92]</sup>

1820—1840	: 2.7%
1840—1870	: 5.5%
1870—1890	: 2.2%
1891—1913	: 3.7%
1913—1937	: 0.4%
1938—1967	: 4.8%

从一九六七年起，扩大的长波转换成了增长速度缓慢得多的一个长波，这一转换已由每个时期世界工业生产各别趋势从统计学上加以证实：

工业产量年度混合增长百分比<sup>[93]</sup>

	1947—1966	1966—1975
美 国	5.0%*	1.9%
欧洲经济共同体	8.9%	4.6%
日 本	9.6%	7.9%
联合王国	2.9%	2.0%

\* 美国是：1940—1966

在杜普利茨这方面，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最后的形式出版了他的经济发展长波理论。<sup>[94]</sup>这种理论把对康德腊季耶夫

长波的解释的决定性作用，归因于货币标准的价值对商品标准的价值的背离：“一组基本的经济过程与一些偶然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基本联系，必须从货币标准价值的背离方面去寻找；货币与商品之间如果没有稳定的关系，那么，这种背离最终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控制着康德腊季耶夫长波理论的基本经济现实，这种经济现实决定了连接价格变化的一切过程。这是一个新的事实，我们将这一事实引进了对于在康德腊季耶夫的长波理论下扩大的现世进程所作的说明中，在那里，它证明是比商业周期本身所具有的决定意义要更为强烈、更为直接得多。”〔95〕杜普利茨的论据的基础在于对资本的需求的巨大的变动性（马克思主义者将会说：工业资本家对额外现金资本的需求）。在长波的上升状态中，由于货币标准价值的降落而导致的价格上升，刺激了对资本的这种需求。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在大多数情况下转折点是在战争或者革命之后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重新组织公共金融的愿望”就变得十分突出了。由于借贷的货币数量缩减了，而且，相应的紧缩通货和价格下跌也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抑制作用，货币价值标准就上升了。〔96〕

这样，在这整个的图式中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就是纯粹的心理因素所引起的——这种因素扮演了在舞台上武断地专门解决困难的人的那种角色，其方式与熊彼特所描绘的那种嗜好划时代大发明的、突出的企业家人格一模一样。〔97〕但是，除了这么个缺点之外，杜普利茨的论述还代表了商品和货币那种二元论的奇怪的、新的说法，这种二元论马克思在评论李嘉图时曾提出过严厉的批判，而且，这种二元论也并不理解这样一点：货币只能作为一种交换媒介来发挥作用，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商品。但是，一旦货币材料（也就是贵金属）的商品价值（生产价格）——这取决于其本身的生产条件——从论据中消失了的话，那么，为杜普利茨所宣称为长波后面的关键性动力的那个因素，就一降而为

纸币的波动了，也就是纸币通货的膨胀了。然而，既然长波的初始动力是归因于对资本的需求——可以增值的真正资本而不是纸币——那么，这种论据就不攻自破了。还不太清楚的是，流通的缺乏为什么会在某个时期扼杀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并且因而伴之而来的是利息率的下降，而与此同时，在其他的时期里，恰恰是当借贷扩大的时候，对货币的需求就更加直线上升并因而提高了利息率。确实，杜普利茨本人发表一个表格，这个表格表示了大不列颠的长期利息率的周期性的波动，但是，这个表格所表明的，恰好是他所想要证明的反面。因为，恰恰是在“货币重新组织”和“货币不足”的状况下，利息率较之在“通货膨胀”的状况下为低：

大不列颠长期平均利率<sup>[98]</sup>

1825—1847	: 3.99%
1852—1870	: 4.24%
1874—1896	: 3.11%
1897—1913	: 3.25%

康德腊季耶夫和熊彼特的情况是怎样，杜普利茨的情况也是那样，在整个论据中应该作为关键性环节的那个东西没有了——那个东西就是利润率。经济发展长波的涨落并不是货币的“缺乏”或“过剩”的结果，而这种“缺乏”或“过剩”要依靠是否有“通货膨胀”的一代或者受“重新组织公共金融的愿望”所激励的一代而定。恰恰相反：在下降的平均利润率给资本家的投资活动设置障碍的时候，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因而也就是利率也在经历一种相对的衰落过程。只有在特殊条件允许平均利润率的直线上升并允许市场能够显著扩大的情况下，这种投资活动才能掌握住那些技术发明，这些技术发明能够使整个工业革命化，因此就能在资本积累方面和对货币的需求方面，产生一个长期扩大的趋势（以相对高的利率）。

我们自己这种分析对于解决“长波”问题的特殊贡献，必须要关系到下面各种各样结合：即可能对利润率发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例如原料成本的根本降低；资本投资世界市场或新领域的突然扩大；剩余价值率的迅速增长或衰减；战争和革命），与资本的长期积累过程和增值过程内在逻辑的结合，其基础是基本生产技术根本更新或再生产的突然爆发。这用资本本身的积累过程和自我扩大过程的内在逻辑，解释了这些运动。即使我们假定创造发明活动是持续不断的，那么，资本积累的长期发展过程也仍然必须是断断续续的，因为，促进资本增值的条件（以及造成在高水平利润率方面上升或稳定的结果的条件）必须及时转变成确定这种增值状况恶化的条件（换句话说，就是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这一转换的具体机制必须参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这些主要转折点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然后加以分析（这些转折点就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和七十年代初期；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就是我们在本章中所已经说明的。我们已经说明，各种引发因素的不同结合，是归因于一八四八年之后、一八九三年之后、一九四〇年之后（在美国）以及一九四八年之后（在西欧和日本）平均利润率的连续的、突然的增长。在一八四八年大革命之后，利润率的上升，基本上是由于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大——这本身也是这些革命的部分产物——也是由于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生产的突然发展，这给第一次技术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固定的不变资本的根本的廉价化，导致了剩余价值率的直线上升——以及在第Ⅱ大部类中劳动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大幅度增长。所有这些决定性因素都既使得平均利润率显著地上升，也因而使得资本积累显著增长。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新的、长期的扩大发展浪潮的那

些引发因素，就是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输出资本的那个重大的运动及其引起的使原料和食品廉价化的结果，这也同样导致了帝国主义国家利润率的显著增长。这方便了第二次技术革命，这是固定资本费用的一种降低和总的工业资本周转期的明显的加速——换句话说，在剩余价值本体和剩余价值率以及利润本体和利润率方面，是另外一次主要的增长。在最近的时期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就是，在一九一三年之后，资本积累经过了长期的倒退或者停滞之后——这种倒退或停滞被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的大萧条进一步强化了——平均利润率方面的一次新的上升和资本积累的一次新的加速，为什么可能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呢（依靠所谈的特殊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提出了一个进一步的问题，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后一半之后，一个新的、长期的浪潮是不是能够预言呢——涨潮之后的退潮。在下面的几章里，我们将试图来回答这些问题。

## 注 释

- 〔1〕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一书的第十一章中，我们企图将各种各样经院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周期理论加以总结，在那一章中，我们举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中，为什么这一周期是不可避免的各种理由。
- 〔2〕 亨利克·格罗斯曼在前引著作的第一一八页以下，使用了在这种意义上的“积累过剩”观念，尽管与工业周期并不是直接相关联的。马克思也以这种方式使用了它，见《资本论》第三卷，第二五一页。
- 〔3〕 “但是就是在最极端的假设下，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也就不就是一般所说的绝对的生产过剩，不就是生产资料的绝对生产过剩。它会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不过因为生产资料要当作资本来发生功能，要比例于这个已经和它的量一同增大的价值，包括这个价值的一个价值增

- 殖，生出一个追加的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二五五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二七九页）。
- 〔4〕 参见保尔·波卡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劳动者的斗争》，载“经济与政治”，第一八五期，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第五十三—五十七页。波卡拉在这里谈到了积累过剩和资本贬值的周期。
-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一八五页。
- 〔6〕 来源同上，第一七〇页以下。
- 〔7〕 马克思：“但危机往往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所以，就整个社会考察，那又多少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资本论》，第二卷，第一八六页（译者按：此处页码原文有误，当是一八九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二卷，第一八八页）。也见《资本论》，第一卷，第六三二—六三三页。
- 〔8〕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八五九页（应为第八八一—八二页——译者）（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一〇三四页）。
- 〔9〕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六二页。
-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六一二页。
- 〔11〕 格罗斯曼前引著作，第三二六—三三四页。
-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四三页。
-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六二九页：“积累仅只当作生产在一定技术基础上的扩大来发生作用的中断时间，缩短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一卷，第六九二页）。
- 〔14〕 然而，随着技术革新的加速，通过一部分机器的置换而在进行中的生产技术的改良，可能要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以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Mβ的重要性。哈利·尼克甚至把这看作是“技术科学革命”的一个标志：哈利·尼克，《技术革命与生产资金的节约》，柏林，一九六七年，第十七—十八页。我们在本书第七章还会再来讨论这一问题。
- 〔15〕 “一股新的知识洪流会导使每一种商品在生产功能方面发生不断的变化。变化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某些进步，特别是源出于基础科学的那些进步，由于工业的基本过程经历了激烈的变化，而影响到了生产功能的全部性质。其他的一些进步导致了现行基本方法的改善。”萨尔特尔(W.E.G. Salter)：《生产力与技术变化》，剑桥，一九六〇年，第

二十一页。

- [16] 康德腊季耶夫也列举了他认为对资本积累突然扩大很必要的一些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是：“1. 高度的节约活动；2. 贷款资本的相对丰富和廉价供应；3. 积累在强大的企业和金融中心的手中；4. 刺激节约活动和长期资本投资的低水平商品价格。”（《价格动力学》，第三十七页）。这种解释的缺点是很明显的：所有这些现象都恰恰是在投资不足的阶段发生的（比如在美国是在一九三三年与一九三八年期间发生的），都没有导致快速技术更新这种情况。康德腊季耶夫完全无视了利润率那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性作用。
- [17] 参见本书第三章注十三。
- [18] 乌舍尔(A. P. Usher)批评了对机器的这种定义，而这一定义是马克思从乌列(Ure)和恰尔斯·巴伯治(Charles Babbage)那里接受过来的。乌舍尔断言，这一定义忽视了机器发展的关键性的标准，这就是不同因素成为统一、自动“列车”的那种“比较雅致”（可能是“比较节省劳动的”意思）结合的一种创造；乌舍尔《机器发明史》，哈佛，一九五四年，第一一六——一一七页。在这里，乌舍尔似乎是忽略这一情况：马克思首先描述了机器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资本论》第一卷第三七八页），因此，他就可以很明确地强调机器部件或不同机器的相互结合：“作为一个以传动机构为媒介方才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接受运动的有组织的工作机体系，机器经营有了它的最发展的形式。”（《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八一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一卷，第四〇五页）。巴伯治本人也同样很清楚这一点，因为，在真正自动化开始前一百年，他那明敏的心灵已经在忙于设计一个自动化的计算机，这种设计要采用这么一种观念：所有组成部件以其最高发展水平联接组合在一起。
- [19]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七六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一卷，第三九九页）。
- [20] 来源同上，第三八一页（中译本，第四〇五页）。
- [21] 来源同上，第三八四——三八五页（中译本，第四〇八——四〇九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22] 来源同上，第三八三——三八四页（中译本，第四〇七——四〇八页）。

- [23] 大卫·兰茨(David Landes)前引著作第一五三——一五四页、第四二—三页以下。
- [24] 见伍尔夫刚·菲费尔(Wolfgang Pfeifer)的一篇论文,载“新苏黎世报”,二十四,八,一九七二年。
- [25] 奥斯卡·兰格反对用“工业革命”这个词儿来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技术大激变,比如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等,在我们看来,兰格的这种意见是正确的。“这种用法模糊了构成工业化基础的那种产业革命的历史特征。还必须强调的是,导致大规模工业兴起的原来的产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也就与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奥斯卡·兰格,《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倾向》,维也纳,一九六四年,第一六〇页。因此,我们在这里使用的词儿是“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技术革命”(而不使用那个广泛使用的公式:“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革命”)。在这样作的时候,我们纠正了我们自己在以前所犯的一个错误。
- [26] 在这一方面,乔治·弗利德曼(George Friedmann)谈到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乔治·弗利德曼:《劳动社会学与社会学》,载乔治·弗利德曼和皮叶·纳维尔:《论劳动的社会学》,巴黎,一九六一年,第六十八页。
- [27] 在一九〇〇年和一九一二年之间,美国非农业企业的固定资本价值增加了一倍;它又以固定价格(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的美元)从168亿美元增加到314亿美元。在一九一四年与一九二九年间,它又再次增长,尽管速度比较慢一点;从314亿美元增长到536亿美元。此后,它几乎在十八年间保持不变,大危机之后,一直没有达到530亿美元这个数字,直到一九四五年才又达到,此后在一九四六年又略有下降。在一九四七年,数字仍只有549亿美元,只是到一九四八年,一九二九年的高峰才最终被超过,这年达到了633亿美元。但是在这同一时期,银行资财从一九二九年的720亿美元增加到了——一九四五年的1,620亿美元,而且,人寿保险公司的资财从175亿美元几乎增长到450亿美元,也就是说尽管美元大约贬值30%,银行资财仍然增长了70%,而保险公司则增长了100%。美国商务部:《长期经济增长:一八六〇——一九六五年》,华盛顿,一九六六年,第一八六、二二〇——二二二、二〇九页。

- [28] 原则上我们把已经结束一次“古典周期”的危机之后那一年，作为每一次长期开始的那一年，而把一个危机年作为这个长期的结束年。由于危机年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就选择了能够为世界市场定调子的那些最为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选择了大不列颠，此后选择的是美国。
- [29]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亚力山大·波格丹诺夫(Alexander Bogdanov)试图对这种可能性提出疑问。很多对“长波”持反对态度的对手都跟随着他的步伐。参见我们下面的答复。
- [30] 就严格的意义而论，这可能是不正确的。据熊彼特报告，杰丰斯(W.S. Jevons)引用了海德·克拉克(Hyde Clark)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政治经济学》，据说其中记录了“长波”在周期性经济发展中的存在。这篇文章载在“铁路记录”杂志上(一八七四年)，但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并无任何影响：约赛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纽约，一九五四年。
- [31] 参见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第四八九页所加脚注。
- [32] 巴瓦斯：《商业危机与工会》，慕尼黑，一九〇一年，第二十六——二十七页。
- [33] 本书第三章中引用了这一段话，见本书第三章注三十二。
- [34] 巴瓦斯前引著作，第二十六页。
- [35] 他说，狂飙运动时期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而在七十年代初期结束的，而现在通常接受的说法是从一八四七年的危机直到一八七三年有一个扩张的“长波”。
- [36] 巴瓦斯与托洛茨基一道，是应用于俄罗斯的永远革命理论的创始人，与所有其他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对比的话，这种理论预见到了作为就要到来的俄罗斯革命结果的一个工人阶级政府。但是，当巴瓦斯在设想以澳大利亚类型为依据的社会民主政府的时候(也就是仍然保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内部的一个政府)，托洛茨基早在一九〇六年就持有这样的意见：俄国革命将导致一个以贫苦农民的支持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
- [37] 卡尔·考茨基：《危机理论》，载“新时代”，第二十卷，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第一三七页。
- [38] 与范·盖尔德伦同时的——但各自独立的——还有阿伯特·阿夫泰

- 里昂(Albert Aftalion) (《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图甘——巴拉诺夫斯基(见其所著《商业危机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一书的法文版)、莱叙尔(J. Lessure) (《生产过剩的总危机和周期性危机》)和巴列托(W. Pareto) (在一九一三年), 这些人都接近于注意到了“长波”的问题, 但只是零零碎碎的, 都没有接近于范·盖尔德伦所分析的范围。在这一方面, 参见乌尔利希·魏因斯托克:《康德腊季耶夫——祖克伦的问题》, 柏林和慕尼黑, 一九六四年, 第二十一——二十二页。因此, 没有必要在这里来考虑他们的意见。
- [39] 菲德尔(J. Fedder), 《Springvloed Beschouwingen over industriele ontwikkeling en prijsbeweging》, 载“De Nieuwe Tijd”, 第四、五、六期, 四月、五月、六月号, 第十八卷, 一九一三年。
- [40] 范·盖尔德伦把扩张的“长波”叫做涨潮, 而把衰退的“长波”叫做落潮。
- [41] 菲德尔前引著作, 第四四七——四四八页。
- [42] 卡尔·考茨基:《黄金生产的变化和贫困的各种性质》, “新时代”增刊, 第十六, 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 斯图加特, 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在这篇文章的第二十页上, 考茨基解释了由于黄金生产的长期波动, 在一八一八——一八四九年, 一八五〇——一八七三年、一八七四——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七——一九一〇年各时期价格的长期低潮和高潮。
- [43] 菲德尔前引著作, 第四四八——四四九页。这也是至少说部分地说明了比利时教授列翁·杜普利茨今天所发展的“长波”说(请进一步参见后文)。
- [44] 魏因斯托克前引著作, 第二十八页。
- [45] 见乔治·加尔维为《社会科学国际大百科全书》第六卷(伦敦, 一九六八年)写的关于尼古莱·康德腊季耶夫的一篇文章。
- [46] 康德腊季耶夫说, 在他撰写他那一九二二——一九二五年的俄文论文时和他撰写他那篇著名的一九二六年德文论文时, 他根本不知道范·盖尔德伦的著作。他那篇德文论文题目是《危机的长波》, 载“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记录”, 第五十六卷第三期,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第五九九页以下。没有理由怀疑这一声明的真实性。
- [47]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所作《关于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

际新任务的报告》，第二届会议，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载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一个五年》，第一卷，纽约，一九四五年，第二〇一页。

[48] 来源同上，第二〇七页。

[49] 来源同上，第二一一页。

[50] 托洛茨基：《潮流——经济危机与世界劳工运动》，“真理报”，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收在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一个五年》，纽约，一九五三年，第七十九——八十四页；托洛茨基：《十月革命五周年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报告》，（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来源同上，第一九八——二〇〇页。

[51] 托洛茨基：《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最初是作为给“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的编辑部的一封信发表的（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后又出版于这一杂志的第四号上（一九二三年四月——七月号）。在这里，我们引用的是英译本，载《第四国际》，一九四一年五月，第一一二页。

[52] 来源同上，第一一四页。

[53] 这部著作就是康德腊季耶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世界经济状况》，莫斯科，一九二二年。

[54] 托洛茨基前引著作，第一一二——一四页。

[55] 加尔维，〈康德腊季耶夫关于长周期的理论〉，载“经济统计评论”，第二十五卷，第四期，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第二〇三——二二〇页。

[56] 托洛茨基前引著作，第一一四页。

[57] 在这里，加尔维引用以下这些人的观点：波格丹诺夫、奥巴林（Oparin）、斯图顿斯基（Studensky）、诺伏日罗夫（Novozhilov）、格兰诺夫斯基（Granovsky）和古勃尔曼（Guberman）。也见赫尔岑斯坦因：《Gibt esgrvsse Konjunkturzyklen?》，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一九二九年，第一一一二期：“他自己以价格长波那骗人的周期性外貌为基础，（康德腊季耶夫解释了）生产的物质力量的不平衡动力，其方法是利用了危机变化的均匀的机制。”（第一二三页）

[58] 在这一方面，参见廷勃尔根（Tinbergen）和卡列基所赋与在工业循环中的利润和利润率的重要性——尽管这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对这一说法的含意是不相一致的。廷勃尔根和波拉克（Polak）：《商业周期的动力学》，伦敦，一九五〇年，第一六七、一七〇页以下等。米恰尔，

- 卡列基：《经济动力学理论》。
- [59] 萨姆·德·伍尔夫：《繁荣时期与萧条时期》，载奥图·金森 (Olto Jensen) (编)：《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亚纳，一九二四年，第三〇、三十八—三十九页。
- [60] 萨姆·德·伍尔夫：《Het Economisch getij》，阿姆斯特丹，一九二九年，第四一六—四一九页。
- [61] 所以，伊查德、利格尔曼 (Riggelman)、阿尔文·汉森 (Alvin Hansen) 以及其他美国人就辨明了，建筑周期或建筑—运输周期的平均长度，只有十七—十八年，而不是象萨姆·德·伍尔夫所假定的三十八年。见瓦尔特·伊查德，《被忽略的一个周期：运输—建筑周期》，载“经济统计评论”，第三十四卷，一九四二年，重印于汉森和克莱门斯 (Clemence)：《对商业周期和国民收入的看法》，伦敦，一九五三年，第四六七、四七九页。关于在美国的建筑周期——往往称之为“库兹尼茨周期”——参见西蒙·库兹尼茨 (Simon Kuznets)：《一八六九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的长期变化》，剑桥，美国，一九五二年。关于美国与英国建筑周期之间的联系和(部分的)相反的发展情况，参见下面一个集子里的一些文章：迪莱克·阿尔德克罗夫特 (Derek Aldcroft) 和彼得·菲荣 (Peter Fearon) (编)：《英国的经济波动：一七九〇—一九三九年》，伦敦，一九七二年。
- [62] 康德腊季耶夫：《危机的长波》。
- [63] 康德腊季耶夫也许是受到了托洛茨基及其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的影响，他在一九二六年，以“长波”取代了“长周期”这一概念。但实际上他的“波”就等于“周期”。
- [64] 康德腊季耶夫前引著作，第五九三页。
- [65] 来源同上，第五九三页。
- [66] 康德腊季耶夫：《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价格动力学 (动力学和危机问题)》，上文已经提及。
- [67] 来源同上，第三十七页。
- [68] 来源同上，第五十八—五十九页。德·伍尔夫也许并没有读到康德腊季耶夫的论文，他对古典的周期作了一种不无相似之处的解释，他认为与太阳黑子周期有关联。太阳黑子最少的那些年，将会确定不好的收成，因而就产生农业方面有利的交换关系，太阳黑子最多的那些年，

将会确定丰收年成，从而产生工业方面有利的交换关系，因而利润就会提高，固定资本的投资也会提高。但是，德·伍尔夫明显地将这一依赖于杰韦斯的论据，局限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端时期。见萨姆·德·伍尔夫：《Het economisch getij》，第二八六——二八七页。

- [69] 康德腊季耶夫本人也强调了这一点，见前引著作，第六十页。
- [70] 不错，加速了的资本积累的周期，其特征也被增多了的资本运动表现了出来。一八四九——一八七三年这个时期，目睹了股票交易和联合股票公司的扩张；一八九三——一九一三年这个时期，目睹了托拉斯、投资银行和控股公司的扩张；一九四五——一九六七年这个时期，目睹了普通投资资金、可变换债券和欧洲债券等等的扩大。
- [71] 康德腊季耶夫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很明显是受了阿萨尔·斯皮托夫教授(Arthur Spietoff)的这篇文章的影响：《危机》，载《政治学辞典》，第四卷，一九二三年。在阿萨尔·斯皮托夫《经济变化》，图宾根，一九五五年。
- [72] 熊彼特：《商业周期》，二卷，纽约，一九三九年。
- [73]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一九一一年（英文本：纽约，一九六一年）。
- [74] 魏因斯托克前引著作，第八十七——九十页。
- [75] 例如熊彼特《商业周期》，第十五——十七、一〇五——一〇六等页。
- [76] 加尔维前引著作，魏因斯托克前引著作；库兹尼茨：《熊彼特的商业周期》，载《经济变化》，纽约，一九五三年，第一〇五——一二四页。魏因斯托克主要依靠加尔维对康德腊季耶夫的批评和库兹尼茨对熊彼特的批评。
- [77] 如果把下列各时期世界资本主义狂热扩张的参考资料都罗列出来，那就走得太远了：从一八四八——一八七三年、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或主要的世界萧条时期。在汉斯·卢森堡(Hans Rosenberg)的《一八七三——一八九六年大萧条的政治社会后果》（载“经济史评论”，第一一二期，一九四三年，第五十八——六十一页）中，列有关于一八七三——一八九六年“长期萧条”时期广泛的参考书目。
- [78] 这一点的理由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已经被马克思加以说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译文中所加的一段话中说：“但是，只有当机

械工业的根子扎得如此的深，以致它对国家的整个生产都发生了压倒一切的影响；只有当世界市场连续地控制了新世界、亚细亚和澳大利亚等地的广大区域；最后，只有当足够数目的工业化国家都进入了世界舞台——只有从这个时候起，那些不断地自我生长的周期才能真正发生，它们可以在多年中占用它们的连续阶段，并往往以一个总危机为结束，构成一个周期的结尾和另一次危机的起点。”（这一段话并不见于《资本论》的英文版中；它应该出现在第六六三页最末一句话之前——英译者注。）许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是坚持认为在一七九三——一八四七年间存在过一个长波，这一事实不但是由于一系列的价格运动，而且还由于从产业革命的爆发一直到拿破仑战争的后果，世界贸易（尤其是英国的商业）的狂热扩张，于是随之而来的是停滞，或者甚至是国际贸易的缩减。英国的出口额曾经达到过每年平均价值为4,350万英镑（在一八一五——一八一九年），这时开始跌落，到一八二〇——一八二四年跌到了3,680万英镑（在一八二〇——一八二四年），然后又降落到了3,600万英镑（在一八二五——一八二九年），和3,870万英镑（在一八三〇——一八三四年。一八一五——一八一九年的水平直到一八三五——一八三九年，其绝对数字还没有再一次达到，其按人口平均数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尾还没有达到。

- [79] 赫尔岑斯坦因前引著作，第一二五页。
- [80] 波格丹诺夫似乎是作这一尝试的第一个人。“长波并不是独立于危机周期的，而只是（！）偶然（！）进入长周期每个阶段不同长度的个别危机周期总和的一种结果。”加尔维以赞同的态度引用了这一段话，而且，魏因斯托克也重复了这段话。（前引著作第五十页）。
- [81] 所以库兹尼茨运用了在一九二八——一九六三年期间，甚至在一九一三——一九六三年期间世界贸易十年一度的增长“平均数”，这个期间完全抹去了世界贸易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九年间明显减缩这一事实：西蒙·库兹尼茨，《各国经济增长的一些数量方面，对外贸易M-X标准和结构：长期倾向》，载“经济发展与文化改变”，第十五卷，第二编，第二期，一九六七年一月。这使人想到了那些臭名昭著的“统计平均数”，这个平均数将会把落后国家“按人口平均收入”计算成为1,000美元，并用这个来确定其“相对生活标准”，全不考虑这样的情况：这个平均数是这样的形势造成的一种结果。这种形势就是人

口中有75%只收入100美元，24%收入2,000美元，而1%则收入45,000美元。

- [82] 魏因斯托克前引著作，第六十二——六十六页。魏因斯托克得出了这样的一种结论：必须认为长波更是“历史时期”，而不那么是“真正的周期”（来源同上，第二〇一页），他显然没有认识到这同一个概念在四十年以前早已被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提出来了。（关于有关的来源，见上文注五十一和注五十四）
- [83] 魏因斯托克前引著作，第一〇一页。
- [84] 在一部死后发表的著作中，兰格评论道：“即使是上面引用的历史事实（自一八二五年以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交替阶段）不受任何严肃保留的约束，它们也不是长周期存在的足够的证据。为了证明这种理论，有必要表明，在周期的两个连续阶段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但并没有任何人曾成功地指出这一点。”（奥斯卡·兰格，《再生产和积累的理论》，华沙，一九六九年，第七十六——七十七页）。尽管我们也不赞成“长周期”这种概念，因此也不接受由“涨潮”确定“落潮”或由“落潮”确定“涨潮”这种机械的看法，但是，我们还是要表明，长波的内在逻辑是取决于利润率的长期摇摆的。
- [85] 卡斯頓·伊姆伯特(Gaston Imbert)的论点完全是以价格运动为基础的，因之，这种论点必须反对。卡斯頓·伊姆伯特，《论康德腊季耶夫的长期运动》，埃克森普罗文斯，一九五九年。大卫·兰茨拒绝作为价格发展的这种“长波”观念；但是他无论如何并没有驳倒这些“长波”的存在。大卫·兰茨前引著作第二三三——二三四页。
- [86] 米契尔和非立斯·迪恩：《英国历史统计摘要》；直至一九一三年的霍夫曼索引；一九一四——一九三八年的劳麦克斯(Lomax)索引；（这两种都没有建筑贸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段时期的计算取自欧洲经济共同体统计局，其中包括了建筑贸易。
- [87] 一八〇一——一八一一年的平均数直至一八三一——一八四一年的平均数：4.7%。
- [88] 关于一九三八年以前的数字，见瓦尔特·霍夫曼：《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德国经济的增长》，柏林，一九六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字取自《联邦共和国统计年鉴》。
- [89] 关于一八四九——一八七三年的数字，见罗伯特·加尔曼(Robert

E. Gallmann);《一八三九——一八九九年的商品产量》，载《十九世纪美国经济的倾向》，《收入和财富研究》(普林斯顿，一九六〇年)的第二十四卷。后者数字取自《长期经济增长：一八六〇——一九六五年》，人口普查局，美国商务部。

- [90] 这个数字比平均数要高得多，因为，美国南北战争使得这个“长波”发生了某种延期，因此，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生产的增长比欧洲要迅速得多。
- [91] 列翁·杜普利茨：《一般的经济运动》，第二卷，劳菲因，一九四七年，第五六七页。
- [92] 我们根据下列各著作计算出来的：穆尔豪尔(Mulhall)的《统计学词典》(伦敦，一八八九年)的；穆尔豪尔和哈波尔(Harper)，《世界比较统计图表》，费城，一八九九年；西蒙·库兹尼茨：《各国经济财富的数量增长》；因格瓦尔·斯芬尼尔逊(Ingvar Svennilson)：《欧洲经济的增长与停滞》，日内瓦，一九五四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计年鉴》，一九六九年。
- [93] 根据联合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数字计算出来的。在现在这次衰退中，我们假定了下列的衰减率：一九七四年：美国-3%，日本-3%，欧洲经济共同体-1%，联合王国-2%；一九七五年：美国-2%，日本-1%，欧洲经济共同体-2%，联合王国-1%。这些估计数字很可能低估了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总衰退的规模。由于在七十年代的其余年份中，增长率肯定会低于六十年代的的增长率，尤其是在日本，那么，长期趋势就会倾向加强而不是减弱一九四七——一九六六期间增长率与一九六七——一九八?年期间增长率之间的对比。
- [94] 杜普利茨前引著作和《危机哲学》，柏林，一九六三年。
- [95] 来源同上，第二〇一——二〇二页。
- [96] 杜普利茨：《一般的经济运动》，第九十二、九十六页。
- [97] 熊彼特在其所著《经济发展的理论》中已经提出了这一论点，他在那里明确地表明，一些“革新人物”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会促成一个革新浪潮。在《商业周期》中，他进一步坚持这一理论。因此，库兹尼茨指责他提出了一种企业能力周期的论点，这种指责是很正确的。见西蒙·库兹尼茨：《熊彼特的商业周期论》，第一一二页。
- [98] 杜普利茨：《一般的经济运动》，第二卷，第五十四页。

## 第五章

### 晚期资本主义的资本增值、 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率

如果其他一切因素都等同的话，那么，资本的有机组成的增长就意味着利润率的降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四章中指出，可以阻止平均利润率下降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不变资本因素的低廉化和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或者是由于对劳动力剥削程度的提高，或者是由于工资降低到了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水平以下）。〔1〕在前面几章中，我们已经探讨了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不变资本流通部分的价值的发展情况。在以下几章里，我们将要考虑一下固定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发展情况。然而，我们必须首先考查一下二十世纪剩余价值率的种种波动情况。

如果工作时间长度保持不变的话——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般地都引进了八小时工作制，情况大体上都是如此，只有在法西斯主义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例外（如果我们把超时劳动和非全日劳动的波动除外的话）——那么，剩余价值率就会在下列条件下增长。1. 如果第Ⅱ大部类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比工资的提高更快的话，也就是，如果工人使用少于一个不变的工作日来生产他的工资的等量物的话；2. 如果劳动强度的提高导致同样的结果的话，也就是说，劳动者以少于以前的劳动时间来生产他的工资的价值等量物，这样一来，剩余劳动的持续时间就会有所增加；3. 在劳动生产力或劳动强度都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更不容

置疑的是在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都提高的情况下),实际工资就会降低,也就是说,工资的等价物可以用一个工作日的较小一部分再次生产出来。

如果有两种或者全部这三种因素都同时起作用的话,那么,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其意义将更为重大。在正常情况之下,也就是说只要劳动力商品的价格要受市场规律的节制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就很少发生。如果现有的趋势是有利于产业后备军的增加的,那么,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实际工资将会只能绝对下降,而从十九世纪的最后一个三分之一以来,在工业化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里,情况并不是如此。如果在长时期中,产业后备军保持稳定或者降少,那么,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对工资水平将会产生两种互相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将会降低,因为,为劳动力再生产传统上所需要的那些商品,到这时丧失了它们的某些价值。另外一方面,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将通过新商品与最低限度生活必需品的结合而提高(例如所谓耐久的消费品,这种消费品的购买价格逐渐合并进了平均工资中)。美国是在十九世纪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发生这种情况的,西欧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发生这种情况,而在日本,这一过程现在正处在全盛期。<sup>[2]</sup>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正常条件下,要想把不变的工作时间、下降的实际工资和提高了的劳动强度三者联合起来,那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实际工资的降低使得工人更加被动和漠不关心,也从客观上部分地在心理方面和体力方面削弱了他们,<sup>[3]</sup>这样就产生一种物质限制,这种物质限制是劳动强度不能够冲破的。众所周知,越来越严重的失业,还会在这里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一个人老是害怕失去他的职业,这就减少了波动并鼓励了更进一步的“劳动训练”,也就是更多的注意和努力,正象西德的雇主们在

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的衰退中所遇到的情况那样。〔4〕

但是，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并不是“正常的”情况。其主要的客观功能之一恰恰就是使得剩余价值率提高的所有来源，都同时地迅速联合起来，在至少是部分地降低实际工资的情况之下，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

马克思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指出了这一点：所谓显然限定了的“工资基金”之类的东西，根本没有过，也没有过按照自然需要的力量来决定工资水平的任何一种“铁的工资规律”。虽然最后分析起来，在一个商品生产的社会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取决于客观规律的，正像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都取决于客观规律那样，但是，关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商品价值，还是有某种特殊情况的，因为，这种商品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受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冲突的影响的——换句话说，就是要受阶级斗争的影响的。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马克思说：“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德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里夫兰农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在这方面起的巨大作用，你们可以从桑顿先生著的《人口过剩论》一书里看出……包含于劳动价值中的这一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限界以外什么也不会剩下。……如果你们把各个不同国家内或同一国家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内的工资水平或劳动的价值水平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劳动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仍旧不变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变数。”〔5〕接着马克思甚至更加强调地说：“然而对于利润来说，并不存在任何一种可以决定其最低

限度的规律。我们不能说，利润降低的极限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确定这个限度呢？因为我们虽能确定工资的最低限度，我们却不能够确定工资的最高限度。我们只能说，如果工作日的界限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相适应；如果工资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工人体力所能容许的工作日延长程度相适应。所以利润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的限制。显然，在最高利润率的这两个界限之间可能有许多变化。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通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断斗争来确定，资本家经常力图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经常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抵抗。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6〕

由于“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在资本与劳动之间新创造出来的价值的分配，那么，这种力量对比也同样决定了剩余价值率。这必须以一种双重的意义来理解。首先，如果这些势力之间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是顺利的，那么，工人阶级就能够成功地作到这一点：就是把由历史和社会条件所确定并由工资来满足的那种新的需要，与劳动力的价值结合起来，〔7〕也就是说，它可以提高这种价值。但是，如果经济条件是有利的，也就是说，如果由于资本积累的一种不正常速度而引起了劳动力的明显的缺乏的话，那么，劳动力商品的价格（也就是工资），也就可以周期性地高过其本身的价值。反之，如果这些势力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关系是对工人阶级不利的，那么，资本就能够成功地降低劳动力的价值，方法是消减工人们在历史上的、社会上的一系列成就，也就是部分地消除他们按照正常的“生活标准”所需要的一些商品。同样，如果各种势力之间的经济关系对工人阶级特别不利的话，

那么，资本也能够成功地迫使劳动力商品的价格降低到其价值水平以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生的这种机制能够正常地、在一定范围以内保持工资的价值和价格增加，这种机制就是扩大和再建由资本积累本身引起的那种产业后备军，也就是在工资上涨期间不可避免要出现的想在广泛的程度上用机器取代活劳动力的那种企图所引起的产业后备军。<sup>〔8〕</sup>资本的有机组成的提高和工资的上涨所引起的平均利润率的跌落，也有同样的后果。如果利润率降到了促进进一步积累资本所必需的水平以下，那么，后者就会立刻下降；在这样造成的不景气中，对劳动力商品的需求迅速减少，而产业后备军也就重新建立起来了，这样也就阻止了工资的上涨或者促使工资下跌。

斯特恩伯尔格在他的主要著作《论帝国主义》一书中，参照了二十世纪头一个十年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第一次试图来探讨产业后备军的作用，并认为产业后备军是工资波动的最主要的调节器。产业后备军的这种作用是马克思明显地强调过的。<sup>〔9〕</sup>这并不能否定了斯特恩伯尔格，<sup>〔10〕</sup>即使他的著作暴露了很多方法论方面和理论方面的错误，这些错误格罗斯曼等人曾提出过批评。<sup>〔11〕</sup>

格罗斯曼在对斯特恩伯尔格的批评中，正确地反驳了斯特恩伯尔格的那些繁琐的公式，在这些公式中，斯特恩伯尔格自以为他不得不把马克思《资本论》中一些“缺点”指出来。<sup>〔12〕</sup>但是，格罗斯曼的批评忽视了斯特恩伯尔格的课题的本质；未觉察到马克思对工资所下定义的含意（这种含意比格罗斯曼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sup>〔13〕</sup>因而他不能在抽象与具体之间提供一个媒介——换句话说，就是在确定劳动力商品价值的一般规律与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欧工资具体发展之间提供一个媒介。

也必须明确地强调的是，一旦工人利用坚强的工会组织成功地、大部分地消除了他们相互之间的竞争——工会本身也是由产业后备军的长期减缩所确定的——那么，一次新的失业增加（除了灾难性的比例之外），就不一定会自动地导致劳动力商品价格的跌落。这个时候，失业只能有其间接的影响，首先是通过这样一种事实：由于劳动力供求之间关系的不利发展的结果，工人阶级中未组织起来的阶层的实际工资开始下跌，其次是，在无产阶级中已组织起来阶层的工会战斗力被削弱了的时候。然而，这第二种情况是日趋严重的失业现象与日趋降低的实际工资之间的一个必要的媒介。如果没有物质化，或者说没有立刻地、足够地这么作的话，那么，日趋严重的失业现象就会实际上伴之以日趋提高的工资，就象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在美国的那个先例，或者象一九六八——一九七〇年在大不列颠的那个先例所表明的那样。这时候，资本将会设法以这样的方式来扩大失业量：这一媒介将始终流行——也就是，它将削弱就业工人与失业工人之间的阶级团结基础，削弱到这样的程度：大规模失业最终实际损伤了已组织起来的和仍被雇用的工资劳动者的战争力。<sup>[14]</sup>这样一来，反对失业扩大化的斗争，就变成了已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了。

这样一来，为什么所谓菲力普斯曲线 (Phillips Curve)，其作者赋与了它机械的和自动的意义，而它却没有这种意义呢，就变得易于理解了。<sup>[15]</sup>浅薄的自由改良主义论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在“新资本主义社会”的“混合经济”中，“充分就业”已经变成为一个持久的、正常的因素了，菲力普斯反对这种论点，他非常正确地表明，在货币工资变化率为一方面而失业水平或失业变化率为另一方面的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着一种明确的相互关系。这就意味着，今天的资本主义同昨天的资本主义一样，需要

产业后备军以便阻止实际工资的“过度”提高，或者使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保持在能刺激资本积累的一个水平上。但是，菲力普斯错误地在失业水平（或者失业变化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建立了一种机械的和自动的关系，而没有把“战斗者的各别势力”考虑在内。然而，后者不但包括了“劳动力市场”供和求之间的关系，而且 also 包括了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战斗力和阶级觉悟。

刘易斯 (Lewis) 有一篇论文，在论文中他把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加速资本积累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劳动力的充分供应（也就是有一个永久的、真正的或潜在的产业后备军）——从而有效地恢复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古典的论点（虽然明显地否认了这些论点在工业国家“更成熟”时期的有效性）——<sup>[16]</sup>金德伯格 (Kindleberger) 追随刘易斯的这种观点，他试图以似乎比菲力普斯不那么机械的方式，把越来越多劳动力的大大流入当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和日本加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sup>[17]</sup>与此同时，也把技术的进展考虑在内。<sup>[18]</sup>但是，由于金德伯格既把利润率又把剩余价值率都排除在他的模式之外（只有阻止“工资膨胀”的一个否定因素在其中起了一种动力作用），那么，下述情况就变得不易于理解了：农民、手工业工人或小商人的大批解放，在这样一些国家如意大利、日本、法兰西或荷兰等的产业后备军起源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为什么这种解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更早一些的阶段，没有这同样的影响呢。

当然，所有这些复杂的问题也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起了一种重要的作用——而且不只是在这三种人人皆知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战中：马克思与拉萨尔 (Lassalle) 和韦斯敦 (Weston)；罗莎·卢森堡与伯恩施坦 (Bernstein)；斯特恩伯尔格与格罗斯曼。“绝对无情”的论点曾经一再错误地归之于马克思，<sup>[19]</sup>这与他的理论是完全相矛盾的，他的理论在前引的几节中表明，两种因

素——生理的因素和伦理的或历史的因素——确定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由于生理上的最低限度，因其天生的性质，几乎是不允许压缩的，在马克思看来，在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方面，“可变的”因素恰恰就是历史的或者伦理的因素，这是合乎逻辑的。产业后备军的波动和阶级斗争在任何特定时期所达到的阶段，相应地就是需用工资加以满足的那种需要的扩大或减缩的决定性因素了。从资本家阶级的观点来看，围绕剩余价值率的这种斗争，是将工资限制到与劳动力价值的跌落相一致的那种需要的斗争（假定有一个劳动生产力的明显增长，那当然就没有理由认为，为什么这种价值的衰减不该与消费品量的增加结合在一起），而反过来，工人阶级则在努力争取获得一个用工资加以满足的、日趋增长的需要数额。

有一种奇谈说马克思持这样的观点：工人被谴责来使工资停滞或甚至下降。为了反对这一顽固的奇谈，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摘引很多章节，这些章节很显然是反对这一假设的。<sup>[20]</sup> 在《资本论》的第二卷里，我们可以读到这么一段：“在繁荣时期，特别是在欺诈繁花盛开的时期，情形却是正好相反。在这时期，货币的表现在商品上面的相对价值，在价值不发生现实的革命时，也会由其他的理由而往下降落；商品会不问它们本身的价值如何，而在价格上腾贵起来。不仅必要生活资料的消费将会增加，劳动者阶级（他们的全部后备军现在都会积极参加进来）还会暂时能够参预各种奢侈品的消费。而在其他情况下，他们本来是无法享受这些的。此外，他们还会参与这一类必要消费品的消费，这一类必要消费品的最大部分，平常不过对资本家阶级说才是‘必要’的消费资料”。<sup>[21]</sup>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有几段也提到了这同一个复杂问题。其中只有三段有在这里加以引用的必要。第一段，

马克思说：“对于每一位资本家来说，除开他自己的劳动者以外，一切其他的劳动者，一律都不表现为劳动者而表现为消费者，表现为交换价值（工资）或货币底占有人，他们拿货币和他的商品相交换。他们都是流通中心，交换行为是从这些流通中心出发的，资本底交换价值是靠这些流通中心维持下去的。他们在比例上构成极大部分的消费者，——虽然并不象普通所想象的那样大，假使我们只考虑狭义的产业劳动者的话。他们的人数——产业人口的人数——越多，他们所支配的货币数量越大，为资本所提供的交换范围便越广。我们已经看到了，资本底倾向本来就在于尽可能地扩大产业人口的数量。”〔22〕在另外一个地方，马克思写道：“不过有一点已经可以在这里顺便指出：即劳动者那种相对地只是在数量上而不是在质量上，并且只是由数量上产生的质量上的享受范围的限制，使得他们作为消费者（在进一步说明资本的时候应当更详细地去考察消费和生产的一般关系）占有生产当事人向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例如拿他们和古代或中世纪的或亚洲的劳动者所占的地位相比较，这便一目了然了。”〔23〕马克思接着说：“劳动者所以能参预较高级的，精神上的享乐，例如，为他自身的利益进行鼓动工作，订阅报刊，听人讲课，教育儿女，发展赏鉴能力等等，这些将他与奴隶划分开的唯一文明部分，从经济来看，是因为他在营业顺畅的时期，扩大了他的娱乐范围；也就是说，因为他在这样的时期，储蓄了相当的资金。……”

不管他说过多少‘善心的’话，他总要千方百计地设法鼓励他们多多消费，赋与他的商品以新的诱惑力、不惜焦唇敝舌地唤起他们的新的欲望。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之中，正是这个方面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因素，资本在历史上的生存权利以及它当前的权力都是以此为依据的。”

库钦斯基 (Kuczynski) 有一本可疑的著作《论工人的地位》，

这部书教条地阐述了“工人阶级绝对无情”这种斯大林主义的论点——这种观点在当时得到了高度评价——库钦斯基在这部著作里，正式地考虑了越来越需要对任何工资发展进行评价的重要性：“如果人们看一下过去一百五十年资本主义的历史的话，那么就可以肯定地说，劳动力价值的历史因素，有一种提高的趋势。”〔24〕然而，库钦斯基借助于以营养发展的特殊趋势为基础的那种可疑的统计数字，试图将以下两者结合在一起：一个是对新的、历史需要的增长的接受，这种需要是得用工资加以满足的，另一个是对满足生理需要的降低的主张，这种生理需要是在维持生活最低限度的水平之下。可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结合并没有任何严格的基础，它与“生理上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这种概念的本质是相冲突的。如果作出下面的说明，那就会正确得多：1. 与技术进步同时发生的那种劳动强度不受阻碍的提高，必须导致这种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有提高的趋势——因为，如果实际工资不提高的话，那么，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本身就受到了威胁；2. 与提高实际工资相比，资本主义更趋向于提高工人阶级的需要，因此，即使是实际工资提高了，那么，工资水平仍然有可能保持在劳动力价值的水平之下。库钦斯基本人表明了这两种因素。〔25〕

还是那样：如果工人阶级组织的战斗力很强，组织程度很高，那么，即使是由于严重失业而造成实际工资的降低，也只能是暂时的性质，并且会随着在此后工业状况上升中工资的迅速提高而重新又变好起来。将美国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工资发展，或者将法国一九三二年与一九三七年之间的工资发展加以研究，就足以发现，就长期而言，即使是日趋严重的失业或者普遍的失业，也不能自动地降低实际工资或者提高剩余价值率。

这样一来，“劳动力商品价值”这一范畴就取得其充分的重要意义而不必通过“战斗者的各别势力”而与工资的确定发生任何一

种矛盾。在短时期，这些工资围绕着劳动力价值而波动，这种劳动力价值可以视为已知，或者是相应于资方和劳方都接受的一种平均生活标准。从长远来看，不管商品价值怎样波动——这种商品是为了满足工人的“正常的”维持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劳动力商品价值是提高还是降低，要靠下述情况来定：无产阶级在痛苦的阶级斗争过程中，是否能成功地使生活标准的新的需要被接受为正常的需要，或者是资产阶级从他们那里把以前已经认为是正常的那些需要给取消掉。

在另一方面，如果资方能成功地将工人阶级的各级工会组织和其他一切组织——包括他们的政治组织——加以有决定性意义的削弱或者甚至消灭的话；如果资方成功地分化并威吓无产阶级达到了这种程度；任何一种集体性的防御形式都变成不可能的了，而且工人又退回到了他们起步的地方——换句话说，从资方的观点来看，这是工人与工人普遍竞争的“理想的”局面，那么，就可能作到下面几点：1. 利用失业的压力使得实际工资大幅度地降低；2. 阻止工资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即使是在一次危机之后的上升状况下，也就是长期地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3. 利用各种操纵手段、折扣和种种欺诈手法强迫劳动力商品的价格甚至降低到已经缩减了的价值之下；4. 同时完成平均社会劳动强度的大幅度提高，甚至在趋势方面试图来延长工作日。所有这些变化只能有一种结果，那就是剩余价值率的迅速的、大幅度的提高。

在希特勒领导下的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取得胜利之后，德国所发生的正是这些事情。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大批失业的压力迫使德国工人忍受大幅度的工资缩减。这种缩减的灾难性在实际工资方面较名义工资方面为轻，因为与此同时，消费品价格也降低了——但是，缩减还是相当可观的。每小时平均毛工资的指数从一九二九年的 129.5 降到了一九三二年的 94.6，也就是降低

了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十七个工业分枝技术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从一九二九年的 95.9 芬尼，降到了 70.5 芬尼，也就是说，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七；关于非技术工人，降低程度不那么严重：从 75.2 芬尼降到了 62.3 芬尼，也就是只降低了百分之十七。由于工作时的减少，这些百分比必须要加大。但是，由于在这同一时期食物价格也降低了接近百分之二十，而且工业品价格也降低了类似的百分数，所以，实际工资的降低不象名义工资突然跌落时那样尖锐。无论如何，它不象设想的那么严重，损失近六百万马克以及利润的灾难性的垮台。<sup>[26]</sup> 剩余价值率降低了——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大多是如此——这一部分是因为体现剩余价值的商品贬值了，另一部分是因为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不能够实现，但是最主要的是因为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身由于非全日工作和工作时数的减少而衰退了，这是由于为再生产劳动力所必不可少的那种与整个工作日的长度相同的工作时数，已不可能再减少了。<sup>[27]</sup>

那么，纳粹夺取了政权之后又发生了些什么事呢？平均每小时毛工资指数从一九三三年的 94.6 增加到一九三六年的 100 和一九三九年的 108.6。所以，尽管有了充分就业，一九三九年的平均每小时毛工资还远远低于一九二九年的水平，一九二九年达到了 129.5。一九三八年支付的工资和薪金总额，仍然少于一九二九年（一九三八年为四百二十七亿德国马克，而一九二九年则为四百三十亿德国马克），与此同时，靠工资生活的总人数从一九二九年的一千七百六十万增加到一九三八年的两千零四十万。<sup>[28]</sup> 若将广泛增加的工资折扣（从不到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增加百分之二十以上）也考虑在内，可以作出这样的估计：归靠工资生活的人实际支配的年收入，从一九二九年的 2215 德国马克减少到一九三八年的 1700 德国马克，大约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三。生活费用一九

三八年大约比一九三三年高百分之七，因而大约比一九二九年低百分之十左右。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德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与危机以前的时期相比的话，已经降低了百分之十以上，尽管生产也有了相当的增长（一九三八年的超出了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五），平均劳动生产力也有了提高（一九三八年的一九三九年的高出百分之十），这都是在纳粹统治下达到的。<sup>[29]</sup>在这样的情况下，利润额无疑是要上升的：从一九二九年的一百五十四亿和一九三二年的八十亿德国马克上升到一九三八年的二百亿德国马克（这些数字包括各种形式的利润，其中有商业利润、银行利润以及未分配的公司利润）。<sup>[30]</sup>

这样，剩余价值率的增长是大规模的。工资和薪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一九二九年的68.8%降到了一九三八年的63.1%；资本的份额从21.0%上升到了26.6%。如果与危机的最坏的一年，一九三二年相对比的话，剩余价值率的这种增长甚至还可以计算得更为准确一些。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八年，归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支配的名义工资总额增加了69%，受雇人员的数目增加了56%，产量水平提高了112%，工作小时数增加了117%。一点也不使人惊奇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归于资本的剩余价值额增长了146%。<sup>[31]</sup>

剩余价值率这种广泛增长的经济源泉是什么呢？（从这么两种比率8/26、20/35来看，实际上似乎是加了一倍）。<sup>[32]</sup>首先，这种增长出自工作日的明显的延长而实际工资并没有任何值得考虑的增长。在一九三二——一九三八年期间，每一个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的名义工资增长了不到百分之十，而生活费用增加了7%。但是与此同时，每一个靠工资生活的人的工作时数却增加了接近百分之四十。这样，绝对剩余价值额就显著提高了。在纳粹统治下，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额那种极端迅速增长的最重要的秘密就在这里。

其次，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露出了下跌的趋势，一件事情是因为工资必须要应付的那种需要较以前为少，另一件事情是因为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那些商品，其质量显著下降了。比如说，民用建筑就突然衰减了，也就是说，工人的居住条件恶化了（一九二八年花费了二十八亿德国马克，十年之后花了二十五亿德国马克，而劳动人口大大地增加了，这一种变化相当于每一个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的房屋建筑降低了百分之二十）。纺织品价格也有显著的提高：平均说，在一九三二年与一九三八年之间，纺织品价格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sup>[33]</sup>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费用在普通工人的计划中所占的份额，也明显地有所提高，这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总是劳动力商品价值降低的一个典型的标志。<sup>[34]</sup>消费品质量的降低，既表现在工业生产的消费品方面（衣物用代用材料来制作），也表现在食品方面。

第三点，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被阻止而不能利用劳动市场上的更为有利的条件在失业消失之后来提高出卖的商品的价格。一旦在大崩溃的压力下，这种价格跌得低于现有的价值，那么，它就在接着而来的繁荣中仍然保持这种水平。纳粹就是这样持久地压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而与此同时强将劳动力价格压低到甚至尽管有充分就业而仍低于其价值，从而成功地达到了第一次“德国经济奇迹”。

揭穿这种“成功”的社会政治秘密，并不是很困难的。工会组织和其他一切工人组织的被粉碎，以及接着而来的分化、恐吓和陷入于混乱，都使得整个一代的工人丧失了他们那自卫的能力。在“资方和劳方之间的持续的斗争”中，战斗党派中的一方，手被捆了起来，头也被打昏了。“战斗者的各别势力”决定性地倒向了

资方一边。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完全被分化了，市场规律也并没有消失，这种市场规律确定了劳动力商品价格的短期波动。一旦产业后备军在第三帝国订了契约了，工人们就借助于职业的流动性——比如向重工业和军火工业领域中流动，这些领域付出的工资较高而且还有加班费——来试图至少说稍稍改善一下他们的工资待遇，即使是没有工会的行动。只有在纳粹国家以法律上禁止职业变换并且将工人强迫固定在他们的职业上的形式，为维持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而采取暴力干涉的时候，才能阻止工人阶级在劳动力市场上利用更为有利的条件。<sup>[35]</sup>这种对德国无产阶级活动自由的废除，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资本主义阶级性质的最露骨的一种表现。<sup>[36]</sup>

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命运具有关键重要性的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一个类似的过程：在意大利、法兰西、日本和西班牙等国尤其如此。在意大利，西罗斯—拉比尼 (Sglos-Labini) 提出这样的意见：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指数，从一九二二年的 56 降到了一九三八年的 46。<sup>[37]</sup>意大利解放之后，工资冻结在法西斯时期的水平，只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才达到了一九二二年的指数。此后，工资水平非常缓慢的提高，到一九六〇年才超出了那个水平，这时指数达到了 70。在西班牙，官方的数字表明了按人口平均实际收入的降低，从一九三五年的八千五百比塞塔降到了一九四五年的五千四百比塞塔——按照一九五三年的货币价值，这当然包含了实际工资的更严重得多的下降。<sup>[38]</sup>在一九四五年与一九五〇年之间，生活费用又增长了百分之六十，而工资仍原封未动。只是到了一九五〇年之后，实际工资才逐渐有所恢复，而只是一直到五十年代的结尾，才大致达到了一九三五年的水平。与此同时，

西班牙的工业产量却提高了一倍。

日本的情况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法西斯军事独裁任职期间的工资类型,还有某些争论。但是,用之于食物的工资所占百分比之明显增加——从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的 34.4% 上升到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的 43.5%——和随之而来的用之于衣物、娱乐、卫生和个人服务等方面的工资所占百分比之降低——从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的 25.4% 降到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的 21.75%——是群众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万无一失的证据。当然,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了进一步灾难性的打击。在美军占领期间,工资被冻结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只是到战后繁荣开始时,工资才慢慢回升,但总的仍停留在极端微少的情况中,因为,在乡村中还存在着一个大规模的劳动力产业后备军,这个后备军给日本工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在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间,在日本按人口平均每年糖的消费量是十三公斤,而英国是五十公斤,芬兰是四十公斤,锡兰是十八公斤;蛋白质每日消费量是六十七克,而英国是八十六克,叙利亚是七十八克,墨西哥是六十八克。与产量和生产率相比的话,工资增加得太少,以致在整个五十年代中,工资和薪金在制造业(雇用四个或更多雇员的企业)总价值中所占的份额,即使根据官方数字也实际上降低了:从一九五三年的 39.6% 降到了一九六〇年的 33.7%。<sup>[39]</sup> 筱原三代平直率地评论道:“大致说来,一种有过剩劳动力的经济有很大的可能来实现较高的增长率(就是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因为有着较高的利润率——著者注),如果与缺乏这一条件的经济相比而其他情况又都相同的话。这不仅是因为劳动力不会在那里构成为一个瓶颈口,而且还因为相对的低工资配合上从国外引进的高水平的技术,将会造成较低的价格和出口扩大的结果。”<sup>[40]</sup> 在这样一些情况之下,战后日本显著繁

荣中所达到的突出的高水平“节约”——也就是剩余价值、资本积累和投资——也就一点也不神秘了。

更详细地考虑一下美国经济这个例子，也是有好处的。下面这个事实使得考查美国这个例子比较困难：美国经济的发展比之德国，远为复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论是工人工资的消费还是资本的实际积累，都受到了控制。所以，就形成了很多受了抑制的需求，在这次大战刚结束的时期，只能导致剩余价值率的明显的上升。万斯 (T. N. Vance) 对这种发展作了如下的计算：<sup>[41]</sup>

年 份	可 变 资 本 (十亿美元)	剩 余 价 值	剩 余 价 值 率
1939	43.3	39.9	92%
1940	46.7	46.3	99%
1944	98.8	103.0	104%
1945	98.1	104.7	107%
1946	92.6	106.3	115%
1947	98.9	119.6	121%
1948	105.4	136.3	129%

美国纯社会生产中私人消费所占份额的迅速下降，也可以间接地证实这样一种趋势。在纯社会生产指数从一九三九年的一百上升到一九四五年的一百七十八和一九五三年的一百五十八的时候，私人消费只是从一九三九年的一百上升到一九四五年的一百一十八和一九五三年的一百三十五。在价格固定情况下，按人口平均私人消费一九五三年只比一九三九年高出 11.5%，尽管生产有大幅度的增长，而且，这还没有把这种私人消费的阶级层次考虑在内。<sup>[42]</sup>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卡列基 (Kalecki) 也得到了一种类似的结论：按照他的意见，私人消费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从一九三七年的 78.7% 下降到一九五五年的 72.5%，而

在这同一时期，私人资本积累所占的份额则从16.4%上升为21.4%。<sup>[43]</sup>根据巴兰(Baran)和斯威茨(Paul Sweezy)的计算，“财产收入”(剩余价值)在整个美国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国民收入一九四五年为一千八百一十五亿美元、一九五五年为三千三百一十亿美元的数字中占一九四五年二百六十六亿美元和一九五五年五百八十五亿美元)，从14.7%增长到了17.7%。<sup>[44]</sup>

对日本的一些类似的指标也证实了这一一般趋势。根据官方的数字，私人消费在一九五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占60.4%，到一九六〇年则降为54.9%，到一九七〇年则降为51.1%。与此同时，固定资本私人购买方面的花费从占一九五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2.1%明显上升到占一九六〇年的20.3%。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价格暴跌、越来越多的资产摊提和股票投资的影响下，这个百分比下降了。但是，这种资本结构继续上升，到一九六六年，达到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而一九五一则为27%)。

当然，将马克思的那些范畴应用于这些数字系列中，必须要极端地谨慎行事。官方的统计数字只有经过复杂的计算之后才能应用到这些范畴中去。按照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来分析，这些数字包含着很重叠的量。<sup>[45]</sup>根据这一理论，工资和薪金总数中的一部分既不属于每年支付的可变资本，也不属于每年的剩余价值的量；这一点尤其可以应用于商业以及其他各种领域雇员的工资，在这些领域中，资本肯定是为了获取在其他地方创造出来的某些剩余价值而进行投资的，而其本身并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工资和薪金总额的一部分明显地是进一步属于剩余价值而不属于可变资本——经理和企业以及国家机器等等的高级雇员的薪金。但是，工资和薪金的另外一部分(以及社会生产的一部分)代表着税收，这已经使用了两三次了(包括行政部门中雇主的薪金在内)。为了计算剩余价值率，必须把这些统统扣除。<sup>[46]</sup>

不管怎么样，在官方对工资和薪金总额所占份额的计算和对国民产值中的利润额所占份额的计算之间进行比较，肯定会提供一个剩余价值率中期发展的可靠的指标，因为，为了使这些统计数字与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范畴相一致而对这些统计数字所作的必要的更正，不会以任何决定性的方式来改变它们之间在这些时期的比例关系的。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在一方面是西德、日本和意大利五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和美国在六十年代的“经济奇迹”，而另一方面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发展，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主要差别的：因为，尽管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剩余价值率有过直线上升，但是，在私人的民间投资方面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增长。实际上，整个资本的增长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的初始时期或军备工业。因此，在纳粹经济中不可能发现增长长期积累过程的因素。对一九四一——一九四四年美国的战时经济来说，情况也同样是如此，但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正。对比之下，在战后时期的西德、日本、意大利、法兰西和美国，不论是在五十年代的前一半，还是在六十年代的前一半，剩余价值率的上升，事实上导向了私人民间投资的大大的扩大，换句话说，导向了军备领域以外的积累性的经济增长。

一九三八年，德国工业的私人投资只比一九二八年的约高百分之二十五，但在一九三七年，私人投资甚至在绝对数字方面都仍然低于战前的水平。将这些数字与整个工业生产指数加以对比，那是很有趣的，如果我们让一九二八年的等于一百，那么，整个工业生产指数在一九三七年达到了一百一十七，在一九三八年达到了一百二十五。<sup>(47)</sup>换句话说，只是在纳粹经济的五年之后，即当重整军备还在全力进行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的时候，私人投资已经提高到了在经济大萧条爆发之前它已经达到

了的那个工业生产比例。

在美国，私人投资总额在一九三九——一九四五这整个期间，始终保持低于一九二九年的水平，只有一九四一年例外。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超过了一九二九年的水平，但是，一九四〇——一九四七年这一时期的平均额，产生出了一个私人投资年平均总额，这个总额比一九二九年的水平还要低百分之二十一（以固定价格计算）。〔48〕甚至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这段时期的平均额也略微低于一九二九年的总投资额水平，而在这三年期间制造业的产量则超过了一九二九年的水平，平均超过百分之七十八，而且私人社会生产总值则超出百分之五十四。私人投资的迟滞，可以用下列三个主要理由加以解释：

1. 在引进实际的战争经济之前（在德国），或者紧在战争经济停止之后（在美国），实际工资和私人消费的相对停滞，构成了一种限制，这个限制使得第Ⅱ大部类的投资活动不能够增长。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市场的期望，因而也影响到第Ⅰ大部类的投资。〔49〕

2. 在战争经济达到了充分发展的程度之后，破坏手段的生产量（第Ⅲ大部类）增长得非常之快，以致使物质条件只够再生产的稍许扩大，甚至根本就不允许再生产有进一步的扩大。由于第Ⅲ大部类的商品并不进入再生产过程，于是在绝对工业生产的提高与进一步增长的可能性之间，就产生一个越来越大的裂隙。举例说吧，如果在四年期间生产指数从一百提高到了一百五十，其中只有三十五是代表第Ⅲ大部类的商品的，一百一十五（即一百五十减去三十五）是代表第Ⅰ大部类和第Ⅱ大部类的再生产的。除此之外，在这一百一十五之中，比如说第Ⅰ大部类有二十、第Ⅱ大部类有十五不得不偏离而转入第Ⅲ大部类的生产中去，所以实际上与基础年份（我们假定为一九四〇年）相比的话，第Ⅰ大部

类和第Ⅱ大部类的再生产，与其说是发展了，不如说是退缩了（因为只剩下了八十是为了这两大生产部类的再生产的，而在这四年期开始时却是一百）。〔50〕换句话说，归根结底，一种军备经济如果要对资本积累有作用的话，它就必须吸收剩余资本而不使扩大第Ⅰ大部类和第Ⅱ大部类再生产所必需的工业资本转入军备工业中去。一种军备和战争经济如果不按照这一点来经营的话，那么，它就会一天比一天严重地将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物质条件消减，这样一来，到最后它就阻碍了资本的积累，而不是促进了资本的积累。

3. 正象库钦斯基以官方资料为基础所作的计算那样，〔51〕德国消费品工业的平均劳动生产力实际上在一九三七年降到了一九三二年的水平之下。因此，总的来说，纳粹的独裁统治并不能使相对剩余价值增长，它只能以通过使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减缩而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的方式，来提高剩余价值率。要作到这一点的可能性当然是有限的。对比之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抽出剩余劳动的特殊方法就是提高相对剩余价值。

这些考虑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表明，在军备方面越来越多的花费，根本不能产生出一种长期的资本加速积累，而且，军备花费的持续增长最终也不能克服资本增值的限制。对德国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在一九四八年以后、对大多数其余帝国主义国家在一九四五年以后的剩余价值率的主要增长，实际导致长期资本加速积累，也就是导致“基本上具有扩大性质的长波”所必要的，另有两种因素。这两个因素就是一个经常在扩大的市场和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这一扩大本身不会迅速降低剩余价值率，或者不会引起利润率的迅速下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具体形势下，地区性的市场扩大不能够产生出这一结合，这一结合只能由第Ⅰ大部类的技术转化来产生。只有象这个转化这样的大变动才

能同时导致所有工业分枝的积累增长和劳动生产力的重大提高，才能导致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显著提高以及消费品出售市场的扩大(因而也导致靠工资维持生活者的实际收入增加)。这一组问题的先决条件是，由于产业后备军的不停地扩大(也进一步由于工人战斗力的相对削弱，削弱是主观因素造成的结果)而造成的高于平均剩余价值率水平这一情况，应该保持继续。

正是这样一种结构在一九四八年的币制改革之后，形成了“德国经济奇迹”的本质，而且，经过了一些次要的变化之后，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国家所有“经济奇迹”的本质。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的十年中，靠工资和薪金维持生活者在德国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始终低于其在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二年的水平。<sup>[52]</sup>

年 份	国民收入(十亿德国马克和西德马克)	雇员的总收入	I部类占I部类%
1929	42.9	26.5	61.9%
1932	25.3	15.6	61.8%
1938	47.3	26.0	54.9%
1950	75.2	44.1	59.1%
1959	194.0	116.8	60.2%

如果我们把每一个靠工资维持生活者的收入按每一个居民社会生产来划分(也就是把这样一种事实考虑在内：自从一九二九年以来，在所有受雇人口中，靠工资生活者所占的份额有显著的增加，从大约百分之六十二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以计算相对的工资份额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它在一九二九年的指数为一百五十，到一九五〇年下降为一百四十，一九五二年下降为一百二十八，一九五五年下降为一百二十一，而到一九五九年只剩下了一百一十七。到这时，相对工资份额降到了它

的水平以下,甚至低于一九三八年的纳粹水平;在那年纳粹水平为一百二十五。<sup>[53]</sup>然而这一次,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并没有伴之以劳动生产力的相对停滞,就象在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期间那样,而是伴之以劳动生产力的极其迅速的增长,这是加速技术发明的结果。此外,数以百万计的避难者、农民、小商人和家庭妇女都被引向了生产过程,这也保证了产业后备军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产业后备军使得新创造出来的价值中的工资份额,低于某种限度。只有到了一九六〇年充分就业的到来,这时空闲职位的数目超出了失业者的数目(尽管又引进了数百万工人,这一回是从国外引进来的),相对的工资份额才停止了下跌。与此同时,剩余价值率和平均利润率的下跌,也开始了,资本家阶级企图用加速自动化的办法来制止这种下跌,这导致了朝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的倒退。<sup>[54]</sup>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国际上劳动力移徙问题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从西德的内部产业后备军实际消失的那一刻起,日趋重要。在一九五八年七月,联邦共和国只有十二万七千名外国工人;一九五九年七月,只有十六万七千名。此后,到一九六〇年中,这个数字上升为二十七万九千名;到一九六一年中,上升到五十万零七千名;到一九六三年中,上升到八十一万一千名;到一九六四年中,上升到九十三万三千名;到一九六五年中,冲出了一百万大关;到一九六六年,达到了一百三十万名;到一九七一年,超出了二百万大关。<sup>[55]</sup>如果没有这些劳动力的从南欧离开——这使得这些劳动力在本国内组成一个产业后备军——那么,西德资本主义就不能在没有利润率的灾难性的下跌的情况下达到六十年代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产量扩大。法兰西、瑞士、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国情况也是如此,只是作了某些必要的修改,这些国家在一九五八——一九七一年期间,又把另外二百万名外国工人吸收到了他们的无产阶级中去。

在一方面是剩余价值率的长期增长；在另一方面，市场通过加速的技术革新而长期扩大——换句话说，一种长期的剩余价值率增长和实际工资的同时提高；与纳粹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相对比的话，这就是在一九四五——一九六五年期间，使得帝国主义国家经济长期累积增长成为可能的那种特殊的结合。但是，纳粹的独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这种发展创造了有决定性意义的先决条件，这种先决条件对资方极为有利，因为它使得剩余价值率的根本增长成为可能，也使得劳动力价值根本受害成为可能，而这一点已经证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常的”和“和平的”条件下是不可能作到的，因为在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量越来越大了。

西德在战后吸收了一千万以上的避难者和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工人。在意大利也有类似的情况，意大利把数以百万计的南方农民和乡村居民掺合到了北方的工业中。在日本也是如此，日本把数百万以上原本从事经济领域中传统部门工作的农民和劳动者，吸取到了日本的现代大工业中。在美国也如此，美国把一千万以上的已婚妇女和四百万以上的农民、谷物分益制农民和农业劳动者吸收进了城市劳动中。在日本也这样，当乡村里的产业后备军和工业中“传统”部门的产业后备军开始枯竭的时候，在战后的长期繁荣中，例外地注入了妇女工资劳动者；事实上，有收益的被雇用日本妇女数目，从一九五〇年的三百万和一九六〇年的六百五十万增加到一九七〇年的一千二百万。对于高于平均水平的剩余价值率的长期持续，这些运动是必要的和足够的先决条件——换句话说，是平均利润率下跌的长期障碍，因而是资本积累高于平均水平的长期增长。这样一来，在一九五〇年与一九六五年之间，大约有七百万劳动者从日本的农业部门中移入。<sup>〔56〕</sup>在这同一时期，在制造工业中靠工资生活者的数目增加了一倍（从四百五十

万增至九百万)。制造工业所支付的工资和薪金总额（包括那些高报酬的雇员的薪金，这种薪金必须看作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不是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从一九五五年的七千四百四十亿日元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五亿日元，而在这同一个时期，制造工业的增值从十九亿九千万日元增加到七十四亿五千九百万日元，而且，在这同一种工业中新固定资本的每年投资额从二千八百八十亿日元增加至一万七千五百亿日元。<sup>[57]</sup>这种巨大增长的秘密是不难看出的：在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五年之间，制造工业中每一个靠工资生活者的实际工资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而每一个雇员的肉体劳动生产力则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八。<sup>[58]</sup>所以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面有很大的增长。

工资的相对份额的这种下降，也可以从荷兰的情况看出来，因为，在国民收入中工资、薪金和社会贡献的份额，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六〇年之间，实际上保持未变（一九三八年：55.9%；一九五六年：55.3%；一九六〇年：56.6%），而在这同一个时期，靠工资生活在劳动人口中的份额，则从一九三八年的70%增加到一九六〇年的78.8%。

在工业和手工业中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之间的关系的长期发展，象霍夫曼(Hoffmann)所表明的德国的情况那样，和在制造工业中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之间的长期关系，象美国官方统计数字所表明的那样，都清楚地指明了资本自我扩大的长波。又是那样：它们只是一种指示物而不是与马克思的范畴密切相符的数字系列。霍夫曼从劳动收入中排除了高级雇员的收入，但是在工业和手工业方面的资本的收入中，却不能包括这样一部分的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尽管也肯定是在那里生产出来的，但却为这一部门以外的人所占有。尽管有这一点，剩余价值率的长期的上升和下降，还是有明显的证据的，这种证据使人误解了“纯生产中不

变的劳动份额”这种一再重申的论点，<sup>[59]</sup>这种论点整个经院经济学家，特别是剑桥学派，实际上是以一种原理来对待的。

年 份	德国工业和手工业 中的资本收入(Ⅰ)	德国工业和手工业 中的劳动收入(Ⅱ)	I / I %
1870	736	3,716	
1871	900	3,930	
1872	1,178	4,461	
1873	1,316	5,099	
1874	1,174	5,310	
1875	1,082	5,405	
1876	998	5,356	
1870—1876平均			22.2%
1907	4,995	16,086	
1908	4,554	16,035	
1909	4,536	16,248	
1910	4,890	17,164	
1911	5,198	18,291	
1912	5,910	19,374	
1913	6,242	20,138	
1907—1913平均			29.4%
1925	2,617	31,232	
1926	2,295	30,078	
1927	5,900	36,635	
1928	5,333	40,839	
1929	5,489	42,915	
1930	3,044	39,169	
1925—1930平均			11.2%
1935	7,088	30,485	
1936	7,565	33,336	
1937	13,488	36,590	

年 份	德国工业和手工业 中的资本收入(I)	德国工业和手工业 中的劳动收入(II)	I / II %
1938	17,049	39,494	
1935—1938平均			32.3%
1950	15,462	38,943	39.7%
1953	24,919	56,884	
1954	30,257	62,319	
1955	32,976	70,733	
1956	34,352	79,083	
1957	37,482	85,767	
1958	37,130	92,038	
1959	46,643	98,357	
1953—1959平均			44.7% <sup>(60)</sup>

一九五〇年出现了在第三帝国统治下所达到的剩余价值率大规模增长的再现，其程度通过那一年的数字与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的数字相对比，可以一眼就看出来：而劳动收入则仍然是那样（在那个时候平均数是三百八十七亿德国马克；在一九五〇年则是三百八十九亿西德马克），工业和手工业本身所占有的剩余价值几乎增至三倍（平均数从五十六亿德国马克增加至一百五十五亿西德马克）。一直到六十年代，剩余价值率才重新开始下降。

与上引万斯的估计相比，美国制造工业的数字有一些主要的差异。这一点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量为工业以外的人所占有。对美国制造工业剩余价值率长期发展的计算，还由于下面这一事实而进一步复杂化：官方的制造业调查统计的数字中还包括有“增值”范畴中的折旧费在内，而且并不给出这种折旧费的确切的量。我们根据吉尔曼 (Joseph Gillman) 使用的方法计算了剩余价值率。<sup>[61]</sup>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单单生产工人的工资应当作为可变资本计算，或者是不是至少有

一部分白领工人——象马克思说的，对于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所必不可少的那些人——也不应当包括在可变资本的接受者中；而且，如果这一点被接受了，那么，这一部分人的规模仍有待于确定。

下面我们给出四个数字系列，它们全都是以官方资料为依据的：

系列 I：剩余价值 = 增加的价值减去工资。

系列 II：剩余价值 = 增加的价值减去折旧费和工资。

系列 III：剩余价值 = 增加的价值减去工资和百分之五十的薪金。

系列 IV：剩余价值 = 增加的价值减去折旧费、工资和百分之五十的薪金。

因此，在系列 III 和系列 IV 中，百分之五十的薪金也被算作了可变资本（参见下面的表）。

年 份	剩余价值率 = 剩余价值 / 可变资本			
	I	II	III	IV
1904	146%	134%	117%	97%
1914	149%	127%	108%	94%
1919	146%	125%	108%	94%
1923	142%	127%	106%	84%
1929	180%	163%	135%	113%
1935	153%	135%	124%	97%
1939	182%	154%	.....	.....(52)
1947	146%	129%	113%	98%
1950	159%	140%	118%	102%
1954	151%	143%	112%	96%
1958	185%	165%	121%	106%
1963	209%	192%	137%	124%
1966	219%	200%	146%	131% (63)

四个系列之间存在着令人吃惊的相似，这就使得对这些数字进行说明是相对地简单了，即使是有一点仍然是成问题的。从本世纪的开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剩余价值率都在逐渐下降，这是因为长期的失业衰退和工会组织的发展。然后，在一九二三——一九二九年这个“繁荣时期”中，剩余价值率直线上升，这是生产力（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迅速发展的结果，也是产业后备军重新组成的结果。在大萧条时期，它下降了（但是没有通常假定的那么严重），这是由于非全日工作的结果（绝对剩余价值的衰减和固定花费的相对提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它经历了一个不规则的波动（产业后备军先是暂时停止，然后又再度产生），并且，从五十年代中叶开始，它又开始大大上升（劳动生产力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都大幅度地增长）。

第三个系列和第四个系列——它们似乎偏离了本章开头时所引万斯的估计，但是可能更符合实际的发展情况——使得我们能够更精确地解释五十年代美国自动化的加速和经济功用（以及六十年代西德在这方面的情况）。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第一组影响表现在原料有时甚至包括机器等在平均商品价值中所占份额的相对下降，并因而导致了工资在每一单花费中所占份额的上升。<sup>[64]</sup>对个别资本家来说，为提高剩余价值率所进行的斗争，表现在强力压低工资所占份额的斗争中。自动化的目的就是要作到这种压低，同时也再建一支产业后备军。

善因·麦吉 (Shane Mage) 在一篇极为有趣、至今尚未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得到一个相反的结论。他声称，剩余价值率从本世纪的开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长期发展，在美国是显著地下降的。即使是如此，根据他的看法剩余价值率到一九四六年之后就停止下降了，而且又开始上升了——即使只是逐步地往上升。沙因·麦吉以较万斯或巴兰和斯威茨更高的精确性试图使

美国官方统计数字符合马克思使用的那些范畴。所以，在“可变资本”项下，他只包括生产工人的工资，而在另外一方面，所有的商业利润都被指为剩余价值。这两点改正与马克思的分析的含意是完全相一致的。但是，麦吉犯了一个双重的错误，这个错误证明他的发现是假的。<sup>[65]</sup>首先，他只将资本主义公司的纯利润（以及纯利息和年金）作为剩余价值，虽然在马克思看来，税收也代表着社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sup>[66]</sup>其次，他把受服务公司雇用的工人的工资，加进了可变资本，虽然，如果劳动价值学说严格地应用的话，真正含意的服务——那就是除了生产商品运输、煤气、电和水之外的其他一切——并不能产生商品，因而也并不能创造出任何新的价值。可是，如果麦吉的表格按这种方式进行双重的修改的话，那么，剩余价值率的长期降低就完全不复存在了。麦吉本人作了部分的——如果不是确切的——修正，但是，只是以一种假设的形式在他的著作的一个附录中作的，他在那里从工资总额和利润总额中计算了剩余价值（工人所纳的税——与社会安全所扣除的有所不同——按照马克思对这个词所赋与的含意，正常说来不能包括在可变资本中，因为这种税与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没有丝毫关系）。但是，即使是作了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修改，我们仍发现，剩余价值率从一九三〇——一九四〇年这一时期的45.1%上升到了——一九四〇——一九六〇年这一时期的57.1%。<sup>[67]</sup>如果作了全面的改正的话，那么，所得出的增长量将会与我们所作出的系列完完全全相一致。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五十年代末尾的美国的实例，更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一实例是与刘易士的下述论点相矛盾的：在前资本主义的各个经济部门都消失之后，就不可能再谈产业后备军的持久再生产问题了，并且，马克思曾假设，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活的劳动将会被“死劳动”所取代，这种假设因而也是错

误的。<sup>[68]</sup>在这个时期，恰恰出现了这种机器取代工人的情况——换句话说，劳动生产力每年的增长率超过了每年的生产增长率。<sup>[69]</sup>其结果就是产业后备军的非常迅速的再次出现，这个后备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已经消失了——以及剩余价值率接着而来的各种各样的含意。<sup>[70]</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业后备军在美国的重新形成，正象西欧和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八年之后所出现的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和实际工资的增长的结合那样，<sup>[71]</sup>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意味深长的、长期的提高的缘故——换句话说，它是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大踏步前进”相一致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第三次技术革命必须被看作是我们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的重要部分。只要产业后备军能使剩余价值率提高——这一条件又是第Ⅱ大部类中劳动生产力的意义深远的提高所制造出来的——那么，这里就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因此，在一九四九——一九六〇年期间在这样一些国家如西德和意大利、一九五〇——一九六五年期间在日本、一九五一——一九六五年期间在美国，形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真正的美好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一切因素看来都是促进扩大化的；高的投资率；迅速提高的劳动生产力；由产业后备军促进的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因而与劳动生产力相比的较缓慢增加的实际工资，同时还抑制了各种的社会紧张状态。

现在，我们可以把从一九四〇年、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六年扩大长波的一般机制，及其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实践中的各种特殊差别，加以总结了。在那次大萧条之后，重整军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将大量的剩余资本带回到剩余价值的生产方面，从而使资本积累又能够从新开始。<sup>[72]</sup>随同这种资本再注入运动而来的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剩余价值率的提高，首先是在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兰西和西班牙——也就是说，在工人阶级通过法西斯主

义和战争遭受到悲惨失败的那些国家里；然后是在美国，在这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工会上层官僚不罢工的誓言、战后工业战斗两年后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的强加以及劳联—产联领导机器向“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投降，这些逐渐腐蚀了工人阶级的战斗性。

越来越高的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方便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诞生。在一个“广泛的工业化”状态之后，资本投资从此就采取了半自动和自动的形式，特别是在美国、西德和日本。在第Ⅱ大部类中，劳动生产力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高，以及在相对剩余价值产量方面的一个相应的增长，从而剩余价值率的一个相应的提高。只是在出现了下述情况之后，一个倒转的运动才开始变得明显：这时这个扩大长波的那个动力开始到达了劳动后备军的极限、“劳动力市场”的条件最后转而对工人阶级有利、实际工资的明显提高开始压低剩余价值率。

不列颠构成了个例外，这个例外证实了这种规律。在那里，随着一九二六年大罢工运动的爆发和一九三一年工党政府的解体，工人阶级比其他主要欧洲国家（意大利除外）都早地遭到了一次划时代的失败。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在英格兰的失业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这造成的联合结果就是剩余价值率的缓慢而坚定的提高。<sup>[73]</sup>但是，到了三十年代的结尾时，由于产业劳动后备军的衰减，英国工人阶级的处境客观上改善了。此后，英国工人阶级主观地成了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六六年这三十年间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不遭受严重失败的无产阶级——这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深刻地说明了英国阶级力量的关系。这样一来，不列颠成为一个唯一的帝国主义强国，这个强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在大战之后不能够严重地提高对其工人阶级的剥削率；在新的时代，联合王国的剥削率现在仍稳定在战前的较低水平上。<sup>[74]</sup>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其结果是很明显的：对利润率的一种侵害，以及与

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一个低得多的经济增长和积累率（而且国际扩大方面对英国经济的刺激性影响，甚至也在这种增长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但是，一旦扩大发展导致了产业后备军的解除和消失，与此同时，世代的变化开始缩小工人阶级中主观的怀疑论和顺从论，那么，晚期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马上就在国际上成为过去。到这时，利润率的自动增长或者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的机会，就不再有了。这时，关于剩余价值率的斗争烈火，又重新点燃起来了。除此以外，在这次斗争中，正是这种高水平的就业情况有助于靠工资维持生活者的力量的意义深远的增加，对这些靠工资维持生活者，经济以外的压力正在压向他们，以阻止他们来压低剩余价值率。当然，这是各式各样国家干预的共同目的，它们声称这是“社会计划”、“一致行动”、一种“收入政策”，如果不说是一种“国家工资政策”或者“工资冻结”的话。由于各种工会组织的真正的商定自主权、真正的工会自由和不受限制的罢工权等构成了这一方面的障碍，各种各样“强化国家”的立法，都已经草拟出来或者都已经通过，来消除这些障碍。大约在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间，从一个“带有一种基本上扩大情调的长波”向一个“带有一种基本上停滞情调的长波”的过渡，因而与围绕剩余价值率的这次斗争是密切相关联的。晚期资本主义不能够避免一个相对地说减速的经济扩大时期，如果它不能破坏靠工资生活者的抵抗并因而使剩余价值率达到一个新的高水平的话。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停滞，而实际上如果没有实际工资的暂时下降的话，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六十年代中期，在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一种新的、加强了阶级斗争状况开始了。这次浪潮从大不列颠、意大利和法兰西开始，逐渐扩展到了西德以及其余的资本主义欧洲，并且，稍后也扩展到了日本和美国。在这同一时期中，帝国主义

之间竞争的加强，也减少了以输出社会紧张状态特别是输出失业来代替这一斗争的可能性。

在阶级斗争的这一强化中，资方与在纳粹独裁统治下或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相比，在剩余价值率方面没有机会达到有效的提高，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各种条件本身使得“战斗者的各别势力”倾向于对无产阶级有利。到今天，产业后备军的扩大已经最后变成了服务于资方经济政策的自觉的工具了。<sup>[75]</sup>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我们在上文已经引述过的罗莎·卢森堡的那段话（参见本章注十四），并且来分析一下产业后备军的各式各样的组成部分。除了其他的情况之外，对雇用妇女和二十一岁以下青少年的相当大的波动以及外国工人的雇用，都必须加以考虑，而外国工人在这一产业后备军的重新组成中，起着减震器的作用。例如在美国，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〇年之间，成年妇女被雇用的数目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一，十几岁可雇用的青少年的数目，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五，但是，在这同一个二十年期间，成年男子的雇用则只提高了百分之十六。就是由于这种缘故，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来岁青少年的失业率是百分之十八点八，成年妇女的失业率为百分之十点五，而已婚男子的失业率则只有百分之二点七。但是，这同样的减震器意味着官方的失业数字与被排除在劳动过程外的那些人的实际总数，决不相符，因为，如果出卖劳动力的机会不是很多的话，那么，有相当多的妇女和青少年就不会贡献出他们的劳动力。在意大利的劳动市场方面，卢卡·麦尔多莱西（Luca Meldolesi）对于隐蔽的失业已经得出了一个高得惊人的数字，这个数字必须包括在产业后备军之中。<sup>[76]</sup>另外还有一个由已婚妇女和青年组成的劳动力源泉以及移民工人（包括美国的少数民族：黑人、奇卡诺人和波多黎各人），在产业后备军的保持和组织中，强调一下这些劳动力来源的双重作用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对他们的雇用的波动性，要比作为“一家之主”的那些“稳定的”工人高得多。另外一方面，他们出卖劳动力所赚的工资要低得多，因为，资产阶级狡猾地设想，他们的收入只不过是他们的“家庭预算”中一个“补充”。他们的工资往往还不是以使他们的劳动力得到生理上的恢复，以致使他们不得不求助于福利、社会安全以及“非法的”寻求收入等等，以勉强糊口。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就这样变成“社会化”的了。<sup>[77]</sup>

在今天，摆在资方面前的有两种办法来重建这支产业后备军：一个办法是，加强资本输出并系统地停止国内投资，也就是说，将资本送到仍然有过剩劳动力的地方，而不是把劳动力带向有过剩资本的地方；另一个办法是，加强自动化，换句话说，集中投资以便尽可能多地解放活的劳动力（在“深度”方面的工业化而不是在“广度”方面的工业化）。

归根结底，这两种策略都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而且，两者都会产生更多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一方面，停止在国内的投资就会缩减增长率，这就会加重了社会的对抗。在另一方面，经过了某种时间上的间隔之后——时间上的间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资本输出国家与资本输入国家之间的工资水平的差异，也将会开始消失。当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一过程的速度要取决于资本输出国家的内部经济和社会结构（如果这个国家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那么，这个过程就将不致拖延；如果这个国家是个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国家，那么，这个过程就会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受到限制）。与此同时，正像下一章将要说明的，节约劳动力的自动化到最后必然限制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额，从而一定会使得剩余价值率的进一步提高更加困难。但是，比资本对平均利润率下降的策略性反应中的这些长期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反应对阶级斗争立即产生的影响。晚期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一

所伟大的学校，它教育无产阶级不但要关心工资和利润之间新创造出来的价值的分配问题，而且要关心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尤其要关心包括在劳动组织、生产过程和政治权利的运用等等之中的一切问题。

## 注 释

-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二三二页以下。
- 〔2〕 阿非利·艾曼纽尔的工资理论的最大的缺点，是未曾理解这一点：马克思所称的劳动力商品价值中“历史的或社会的因素”，是不稳定的而且不是传统的，但最低限度就潜在力而论是能动的；艾曼纽尔：《不等价交换》，第一一六——一二〇页。它把他导向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在某一地方和在某一时刻，社会认为是工资标准的”，就是工资的决定性因素。来源同上，第一一九页。
- 〔3〕 在这一方面参见雅克斯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比利时工人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发展的探讨；雅克斯敏：《法国占领下的比利时社会》，布鲁塞尔，一九五〇年，第一卷，第一三五——一三八页、四六三——四六五页，第二卷，第一四九——一六四页。
- 〔4〕 参见《企业道德白皮书(二)》，西德冶金工人联盟出版，法兰克福，一九六七年；曼德尔：《德国经济危机——衰退理论》，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法兰克福，一九六九年，第二十五页。
- 〔5〕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伦敦，一九六八年，第二二五——二二六页（中译本见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九九——二〇〇页）。
- 〔6〕 来源同上，第二二六页（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二卷，第二〇〇——二〇一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7〕 “工会的主要功能就是，他们以提高工人的需要，将他们的日常生活水平提高到高于为了生存的最低限度物质需要而创造出一种文化的、社会的生存最低限度需要，也就是工人阶级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活标准，没有直接促进的联合斗争和反抗，工资是不能降低到这一标准之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伟大的经济意义尤其在于这么一种事实：它以

从文化方面和政治方面唤醒广大的工人群众的办法，来提高工人们的文化水平，从而提高他们的经济需要。比如说，当工人们已经习惯于向报社投稿或者购买小册子的时候，那么，工人的经济生活水平就相应地提高了，结果，他们的工资也就提高了。”罗莎·卢森堡：《国民经济概述》，柏林，一九二五年，第二七五页。

- 〔8〕“生产的停滞，会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歇闲，并由此使其中就业的部分，陷在这样一种情况中，以致他们只好让工资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以下。这个操作，对资本来说，将会和工资保持平均但相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价值已经提高的情形一样发生影响。繁荣时期已经使更多的劳动者结婚，并减少子女的死亡率。这种情形——虽然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人口的现实增加——并不包含现实劳动人口的增加，但会这样利害地影响工人和资本的关系，好象实际要参加工作的工人人数已经增加一样。另一方面，价格下降与竞争战，也会刺激每个资本家，使他采用新的机器，新的改良的劳动方法，新的结合，让他的总产品的个别价值，下降到它的一般价值以下；也就是说，增进一定量劳动的生产力，减低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的比率，因而把工人游离出来，简言之，就是创造一个人为的过剩人口。”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二五四—二五五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二七八页）。
- 〔9〕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六三七页：“大体说来，工资的一般性的变动，只是由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实行调节；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则与产业循环的周期变动相适应。”（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一卷，第七〇〇页）
- 〔10〕斯特恩伯尔格：《帝国主义》，尤其是前面两章。不错，他偶而会在弗朗茨·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的理论的影响之下——这种理论是他在他的前马克思主义青年时期曾坚持过的——在工资波动中，从对劳动产业后备军调节功能的正确理解，滑到了把它过高估计为剩余价值表现的有决定性意义的决定因素——也就是劳动力的价值本身。
- 〔11〕亨利克·格罗斯曼：《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的一种新理论》，最初发表于格容伯格(Gronberg)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记录》，第十三卷，莱比锡，一九二八年。我们在这里参考的是亨利克·格罗斯曼的

重印，见《论危机理论》，法兰克福，一九七一年，第一一——一六四页。

- [12] 除了其他之外，斯特恩伯尔格声称：马克思低估了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的重要性；马克思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延迟会破坏欧洲和美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熟性”；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是一种绝对的非怜悯主义，等等。
- [13] 所以，格罗斯曼完全忘记了（前引著作第一三七页以下）“历史的和社会的要素”在确定劳动力商品价值方面的重要性，他并且谈到了后者再生产的“确切的固定”成本，而没有考虑到这么个事实：这些成本反过来也要依赖它们必须满足的那种特殊需要。在第一四二页上，我们甚至还发现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对一个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如此熟悉的著作家来说，确实是令人吃惊的：“工资，也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在这里，应该作“劳动力的价格”。
- [14] 在这一方面，产业后备军的社会根源和组成，或其中不同组成部分所占的相对比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罗莎·卢森堡等人将这种组成部分作了总结：“然而，失业者的产业后备军给工会的影响加上了可以称作空间限制的东西：只有处境较好的工人的上层，能够接近工会组织并受其影响，而这些上层工人的失业只是间歇的，而且正象马克思所说的，是‘流动的’。无产阶级的下层，包括无技术的建筑劳动者，他们不断地离开土地而涌进城市，也包括所有那些在半农村从事不正规职业的人，例如烧砖、土方工程等，所有这些无产阶级下层，都已经很不适合工会组织了，这是由于他们的职业性质中固有的一些空间的和暂时的条件，也是由于其社会背景。最后，产业后备军中的最低层、偶而找到工作的失业者、家庭劳动者以及临时受雇的穷人等，都是工会组织根本达不到的。一般地说来：在无产阶级的某一阶层中，不幸和所受压力越大，有效工会运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这样一来，工会在无产阶级内部的功效，就垂直而言是狭窄的，而对比之下，就平面而言则是宽阔的。换句话说，即使是工会只包括无产阶级最高阶层中的一部分，其影响也会伸展到这一阶层的全部，因为，其成就将会造福于在这一行业中就业的所有工人群众。”罗莎·卢森堡：《国民经济概述》，第二七六——二七七页。在我们今天，可以明显证实这一分析的，是米契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关于美国情况的分析。

《另一个美国》，哈芒兹涅尔新，一九六三年，第三十六——三十九页、四十八——五十二页、八十八页以下。

- [15] 约瑟夫·菲立普斯(Joseph Phillips)，《联合王国失业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载“经济学”，第二十五卷，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 [16] 阿萨尔·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发展》，载“曼彻斯特经济学派与社会研究”，第二十二卷，一九五四年五月。
- [17] 在金德伯格之前，而且与他无干，我们自己已经指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加速西欧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重新建立产业后备军的伟大的意义：见《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载《一九六四年社会主义记录》，伦敦，一九六四年，第六十页。
- [18] 查尔斯·金德伯格：《欧洲战后发展——劳动力供应的作用》，剑桥，美国，一九六七年。
- [19] 例如又是金德伯格，前引著作第二十页；约翰·斯特拉契，《当前的资本主义》，伦敦，一九五六年，第九十三——九十五页。
- [20]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在与这种简单化进行的斗争中出了很大的力：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过程》，第一卷，第三三〇页。
-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四一四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二卷，第四四七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2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二卷，第四一四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二十二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23] 来源同上，第二八三页和二八七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二分册，第五十八页和第二分册第六十二——六十三页）。
- [24] 库钦斯基：《论工人的地位》，柏林，一九四八年，第八十八页。
- [25] 列宁曾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有提高无产阶级需要的倾向，从而具有一种社会历史因素，这种因素进入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之中：见《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一〇六页。
- [26] 查尔斯·贝特尔海姆：《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经济》，巴黎，一九四六年，第二一〇、二一一、一五二页。
- [27] 据库钦斯基计算：冶金工业货币工资总额的指数，从一九二九年的184，落到了一九三〇年的150，化学工业从247下跌到了203，整个工业从215跌到了177。相比之下，实际偿付的工资指数，据说降低

- 了一半，而纯粹实际工资的指数，则从一九二八年的 100 跌到了一九三二年的 64，因此，下跌了三分之一以上。最后这一数字应当批判地来考查。见库钦斯基：《德国工人地位变化史》，柏林，一九四九年，第一卷，第三二五——三二六、三二九——三三〇页。
- [28] 贝特尔海姆前引著作，第二一〇——二二二页。
- [29] 来源同上，第二一二页。
- [30] 弗朗茨·纽曼 (Franz Neumann)：《庞然大物》，纽约，一九六三年，第四三五——四三六页。
- [31] 来源同上，第四三五——四三六页。
- [32] 在一九三二年，利润为八十亿德国马克，而可处理的工资和薪金则为二百六十亿德国马克；一九三八年，利润为二百亿德国马克，而可处理的靠工资和薪金生活的人的收入，则为三百五十亿德国马克。这些数字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范畴，并不完全吻合，但可以作为一种指示数字来使用。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澄清，请见下文。
- [33] 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与一九四一年四月之间，普通消费者的穿着费用，上涨了接近 50%：纽曼前引著作，第五〇六页。库钦斯基指出，住房费用的纯增长数，一九三八年的——约 285,269——甚至还低于一九二九年的——约 317,682。库钦斯基：《德国工人地位变化史》，柏林，一九四九年，第二卷，第二一〇——二一一页。
- [34] 食物价格的增涨，低于生活费用中的所有其他组成部分，只是租金除外——尤其低于纺织品和工业消费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消费品生产按人口计算，仍然恰恰保持在一九二八年大危机前的水平：贝特尔海姆前引著作，第二〇七——二〇八页。
- [35] 关于一九三六年以来第三帝国对靠工资维持生活者的运动自由的限制，参见库钦斯基前引著作，第二卷，第一一九——二二一、一九五——一九八页；纽曼前引著作，第三四一——三四二、六一九页。
- [36] 纽曼前引著作，第三四四——三四八页，在某些情况下，靠工资维持生活者对第三帝国某些最严厉的高压措施，以放慢工作的方式作出了反应，并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例如，这种行动导致了废除礼拜天加班或工作特殊报酬的相反的决定。
- [37] 见保罗·塞洛斯拉比尼：《Saggio sulle Classi Sociali》，巴里，一九七四年，第一八五页。

- [38] 克拉夫拉 (Juan Clavera)、埃斯蒂班 (Joan Esteban)、蒙恩斯 (Antonio Mones)、蒙斯拉特 (Antoni Monserrat)、罗姆布拉夫拉 (Ros Rombravella);《Capitalismo Español; De La Autarquia a La Establizacion (1939—1959)》, 马德里, 一九七三年, 第一卷, 第五十一页; 第二卷, 第三十、二十七、二十六页。
- [39] 篠原三代平前引著作, 第二七三页; 比达前引著作, 第四—五页。
- [40] 篠原三代平前引著作, 第六十四、十三页。
- [41] 万斯:《永久的战争经济》, 伯克莱, 一九七〇年, 第二十三页。
- [42] 来源同上, 第十五、十六页。
- [43] 米恰尔·卡列基:《与战前相比的美国经济形势》, 一九五六年波兰一家杂志“经济学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英译文手稿, 蒙“每月评论出版社”编辑惠予协助, 使我们得以引用。
- [44] 巴兰和斯威茨:《垄断资本》, 第三八五—三八七页。他们在这些数字中加进了剩余价值中“掩藏”在贬值折扣中的一部分。我们又减去了这一部分。
- [45] 这些重叠的量将在本书第十三章中进一步讨论。
- [46] 无论是万斯或是巴兰和斯威茨都要试图作这种改正, 但都作得很差。万斯以减去较高工资(一年超过一千美元的)的办法, 计算了靠工资维持生活者的收入(包括农业), 但是, 然后他又从纯社会产量中减去了这个数额以便确定剩余价值。这样一来, 他在计算每年创造出来的新价值时, 既保留了重叠量, 又保留了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前引著作, 第二十三页)。巴兰和斯威茨以类似的方式进行工作, 并进一步将固定资本每年保留价值的一部分加进了已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 也就是新的价值。
- [47] 贝特尔海姆前引著作, 第二二五页。
- [48] 美国商务部, 普查署:《长期经济增长》, 第一七一页。这些数字代表整个经济的投资总额, 因而也包括住房建筑等等。
- [49] 关于德国, 见贝特尔海姆前引著作第二三三、二三五、二七四页。在那里, 对一九二九年意义重大的轻工业能力过剩, 进行分析。
- [50] 进一步分析, 见本书第九章。
- [51] 库钦斯基:《德国工人地位变化史》, 第二卷, 第一四三页。
- [52] 关于一九二九、一九三二、一九三八诸年: 这些数字来自统计局, 德

- 拉克尔(H. O. Draker)重新计算了联邦共和国的面积(萨尔兰和柏林),《国际农业统计I》,载“WISO——农业和社会科学通讯”,第二十二期,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一〇五四页。关于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九年,见《综合经济发展年鉴》,德鲁克萨契,VI/100,德意志联邦议会第六选举期,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
- [53] 我们自己的计算,其基础是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和每一个平均受雇靠工资维持生活者依赖性劳动总收入的官方数字。
- [54] 用上述方法加以计算,每一个靠工资维持生活者总收入与每一个居民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一九六六年又一次提高到了137。
- [55] 马利奥斯·尼科里纳科斯(Marios Nikolinakos):《移民工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汉堡,一九七三年,第三十八页。
- [56] Masayoshi Namiki:《一八七二——一九六五年日本的农业人口》,农业发展丛书,第十七,东京(日期不详),第四十二——四十三页。
- [57] 日本通商产业省,《一九六六年日本工业统计》,东京,一九六六年,第二十六——二十七、八十七页。
- [58] 来源同上,第八十八——八十九页。
- [59] 例如见阿萨尔·刘易斯:《无限制的劳动——进一步说明》,载“曼彻斯特经济学派和社会研究”,第二十四卷,第一期,一九五八年一月,第十二页。斯特拉契重复了这同一观点,只有一点保留:工人阶级只有进行不断斗争才能保持其“稳定的份额”。见约翰·斯特拉契:《当前的资本主义》,第一三三——一四九页;约安·罗宾森(Joan Robinson):《论马克思的经济学》,伦敦第二版,一九六六年,第九十三页;尼古拉斯·卡尔多尔(Nicholas Kaldor):《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载路茨(F. A. Lutz)和海格(D. C. Hague)(编)《资本的理论》,一九六一年。
- [60] 瓦尔特·霍夫曼前引著作,第五〇八——五〇九页。
- [61] 约赛夫·吉尔曼:《跌落的利润率》,伦敦,一九六七年,第四十六——四十七、六十一——六十一页。
- [62] 一九三九年白领工人工资的数字不见于《美国统计摘要》。
- [63] 附加的价值资料、美国制造工业工资和薪金总额,见《美国统计摘要》第六十期,华盛顿,一九三八年,第七四九页;第六十九期,华盛顿,一九四八年,第八二五页;第八十九期,华盛顿,一九六八年,第七一

七——七一九页。

- [64] 萨尔特尔：《生产力与技术变化》，剑桥，一九六〇年，第二十五页。参见本书第六章。
- [65] 善因·麦吉(Shane Mage)：《论〈利润率跌落倾向的规律〉：其在马克思体系中的地位及与美国经济的关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一九六三年，大学缩微胶卷公司，安纳伯尔，密执根，第一七四——一七五、一六四——一六七、一六一、一六四页和二二五页以下。
- [66]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一切税收都可以溯源到工资或剩余价值。由于国家税收不能认为是一种可变资本——除非这种税收被用来购买生产性劳动力，例如在国家的工业企业中那样——它们只能被认为是社会剩余价值的一种再分配，或者是社会剩余价值扣除工资以后的一种提高。在赋税能以直接形成资本的一些情况之下，它们的功能就更加变得清楚了，因此，它们那作为剩余价值一部分的性质，如果不对马克思整个关于资本的理论持怀疑态度的话，那是无可争辩的。例如可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七五六页。
- [67] 善因·麦吉前引著作，第二七二——二七三页。费尔普斯—布朗和布朗尼(Browne)的计算表明，早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〇年期间，剩余价值率就在迅速增长，然后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期间，又在迅速增长：《一个世纪的报酬》，伦敦，一九六八年，第四五〇——四五二页。
- [68] 阿萨尔·刘易斯：《无限制的劳动——进一步说明》，第二十五页。
- [69] 在一九四五——一九六一年期间，美国的无产阶级（只限于靠工资和薪金维持生活的群众——也就是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群众），增加了一千四百万，或35%（但是，实际制造业只增加了一百万，制造业加上建筑业、运输业、煤气业、电业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业，不包括实际国家机器，则只增加了两千五百万）。从一九四一——一九六一年，在制造业中每一个靠工资维持生活者的物质产量（也就是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0%，非制造业则增长了42%。在工业方面的劳动时间总额增长了15%，而物质产量则增长近70%。对比之下，每周实际工资只增加了29%，按人口平均实际消费只增长了20%。下面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在这同一时期，固定资本投资额增长了70%，而第一部类投资的增长率竟高达100%，而失业（除了朝鲜战争这三

年繁荣期之外) 则摇摆于就业人数的 4.5% 左右, 如果把部分失业也考虑在内的话, 甚至可达 5—6%, 尽管在这同一时期, 有几百万靠工资生活者是服务于军队的。《总统递交给国会的经济报告: 一九六二年一月》, 华盛顿, 一九六二年, 第二三六、二四四——二四五、二四二、二二七、二四八页。

- [70] 在西德也是如此, 大量工人在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间被赶出了许多工业部门, 但是, 他们在更为扩大的部门中又找到了工作。据慕尼黑经济研究所计算, 在一九五〇——一九六一年期间, 每年有 4.33% 的受雇劳动力由于资本加强和技术进步而变成为多余的了。在一九五八——一九六五年间, 纺织工业、制革工业、细瓷工业、木材加工工业以及其他一些部门, 受雇人数都发生了明显的削减。见克鲁斯, 康恩茨和乌尔曼 (Kruse, Kunz & Ullmann), 《自动化的经济效果》, 第七十九、六十五页。
- [71] 马克思显然把这一发展的可能性也考虑在内了。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 第七五七页。
- [72] 在本书第十一章中, 我们将要研究大危机之后以重整军备开销和军火生产手段恢复资本积累所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
- [73] 费尔普斯—布朗和布朗尼前引著作, 第二四八——二五〇、四四六——四四七页。
- [74] 来源同上, 第四五八页。
- [75] 把外国工人有意识地用作一种缓冲剂来对过度的“国内就业波动”, 这种情况在西德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经济衰退中变得明显了, 在那次衰退中,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至一九六八年六月之间, 有四十万以上的外国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 (尼科里纳科斯前引著作, 第三十八、六十六——七十页)。同样的现象也可以从美国及其来自波多黎各、墨西哥和(新近) 中美洲的移民劳动力中看到。在这里, 我们没有篇幅来分析这种国际化了的产业劳动后备军的波动, 对于靠近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那些附属的贫穷国家, 在经济发展方面所造成的复杂影响。但是, 移民工人中的大部分都是非技术劳动者, 他们只能从事在宗主国经济中最脏、最苦而报酬又最差的那些职业, 这一点是臭名昭著的。从而在“土生土长”工人与“外国的”工人之间, 就由资本有意识地创造出了无产阶级内部的一个新的阶层。这就使得雇主们能够在同一个时间

内，将非技术劳动力的工资压低，挑起种族方面和地区方面的偏见，来阻止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并且利用这些人工制造的敌对情绪，在工人阶级内部传播对外国人的恐惧心理和种族主义。瑞士的什瓦森巴赫运动、英国的鲍威尔主义和在法国的反阿拉伯人大迫害等，都是后者的一些例证。因此，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事业，即使从“工会”觉悟的观点来看，就已经变成一种基本的任务，更不用说从阶级政治觉悟本身来看了。关于外国工人在西欧所受到的歧视，参见卡塞尔斯(S. Castles)和科萨克(G. Kossack)提供的文献，见《西欧移民工人和阶级结构》，牛津，一九七三年。

- [76] “华尔街日报”，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当前商业研究”，一九七二年二月；卢卡·麦尔多莱西：《意大利的产业后备军》，巴里，一九七二年。在一九四〇年，十六岁以上的美国妇女，只有27.4%是有有收入的工作的，到一九七〇年，这一百分比提高到了42.6%。在已婚妇女中，提高的还更要多一些——从16.7%提高到了41.4%。在这同一年，即一九七〇年，年龄在十六至六十四岁之间有报酬地被雇用的妇女所占百分比，在瑞典为59.4%，在日本为55.5%，在英国为52.1%，在西德为48.6%，但在意大利则只有29.1%，在这里，真正的产业劳动后备军仍然在这个国家中部和南部的不发达地区。
- [77] 詹姆士·奥康诺尔(James O. Connor)前引著作，第十四—十五、三十三—三十四页。在一九六八年，在美国有一千万靠工资生活者每小时工资不到1.5美元，有三百五十万每小时工资不到1.0美元，而制造工业的平均工资为每小时3.0美元以上，在建筑业可高达4.4美元。现在，关于对帝国主义国家“半无产阶级”的超剥削，有大量的文献。

## 第六章

###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特性

现在，我们将试图把前面几章中所进行的两种分析结合起来：一种是对生产力水平差异性的那一系列的主要形式以及追求与之相适应的剩余利润的主要方向的分析；另一种是对确定第Ⅰ大部类中整个生产结构的动力机器和能源一系列主要类型的分析。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扩大再生产的主流似乎一直是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不同地区的那种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通过逐渐深入到农业中去的结果而造成的货币资本的释放以及从土地上分离出来的生产者，导致了货币资本持续不断地向主要工业地区流动，在这些工业地区，被驱赶出来的前农民，现在形成一支产业后备军。

在这里，有两个中间阶段可以区别出来。第一个阶段是动力机器的生产和生产这些动力机器的那些机器的生产出现了，这种生产主要是以手工业和制造业为基础的。第Ⅰ大部类生产中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与第Ⅱ大部类中的商品相交换，而且并不用作消费品的机械化了了的产量，而是仍然留在第Ⅰ大部类中。农业中的原料生产，实际上仍然在农舍工业的状况下进行。在这一时期，只有钢铁工业和煤矿工业的某些生产过程具有意义深远的机械化这一个特点。但是，即使在煤矿工业方面，仍然还流行着体力劳动，以致纯工资费用高达产品价格费用的百分之六十六以上，有

时甚至达到产品价格费用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这很显然是与一种非常低的资本有机组成相适应的，这种资本有机组成在工业原料的农业生产中，可能是更低的。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第二个阶段里，机器生产也深入到了动力机器的领域和蒸汽驱动的马达领域。这时达到了用机器制造机器以便建造另外的机器的这种地步。但是在这个阶段也一样，原料的手工生产仍然是占优势的。例如这时有一个特色，在贝塞莫尔（Bessemer）和西蒙斯—马丁（Siemens-Martin）专利应用之前，钢铁工业只是由中等规模的企业所组成，而且，并没有显露出任何大规模生产的形式。〔1〕

因此，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这前两个阶段，机器操作的大工业只是在消费品工业中占有优势（主要重点是纺织工业）。甚至连运输手段的大工业生产家——特别是铁路——也只是在这一时期的第二个阶段才出现，而且也是从一八四七年到一八七三年使“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出现的那些决定性因素之一。

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就这样发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在工业革命后的第一个世纪中，第Ⅱ大部类的资本有机组成一般说来已经高于第Ⅰ大部类了。正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事实上必须描绘为：消费品借助于手工制造的机器的机器工业的生产。

一旦我们抓住了事物的这一情况，就有可能来说明，在第Ⅰ大部类中引进机器生产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一段时间。第Ⅰ部类的劳动生产力较低，第Ⅱ部类生产力较高，在这两个部类之间的利润率均等化，导致剩余价值从第Ⅰ部类往第Ⅱ部类的经常转移。支出剩余价值的不等价交换过程，在这个时期是农产品与第Ⅱ大部类产品之间的一种交换；机器的大规模引进和人造化肥之用于农业，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在西欧（以及在美国），在这一

时期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内在动力，集中在牺牲第Ⅰ部类的积累而加速第Ⅱ部类的积累方面。

这同样的结构也说明：

(a) 为什么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向非工业化国家深入过程中的主要国际方向，是采取商品输出的形式，也就是消费品的输出；因为，在整个这一阶段中，正是这个部门控制了宗主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且，每当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其所采取的主要形式都是工业生产的消费品的生产过剩。

(b)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中，资本主义在实际上是竞争性的，因为，为深入消费品部门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资本所具有的那种有节制的性质，阻止了垄断和对市场操纵情况的发生。

在帝国主义时代开始时所发生的转折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运用中同时发生并相结合的两重变化所产生的那种结果。一方面是，第Ⅰ大部类从蒸汽牵引发动机的机器生产走向了电力发动机的机器生产。其结果第Ⅰ大部类整个生产过程的转变，这一转变在生产固定不变资本的第Ⅰ大部类的分枝部门中，引起了资本有机组成的大幅度提高。但是，在生产流动不变资本的第Ⅰ大部类的分枝部门的技术方面，也发生了一种转变——原料的生产。我们认为这一转变的特征是，“从手工业的原料生产向制造业或早期工业方面发展的过渡”。这两种过程加在一起就确定了——在不同的程度上——第Ⅰ部类资本有机组成的意义深远的提高。很明显，第Ⅱ大部类中资本有机组成的提高，其规模不能与第Ⅰ部类的相比。总的说来，第Ⅱ大部类中生产技术的革命化，只限于用电力发动机取代蒸汽发动机，这几乎不可能导致资本有机组成的根本变化。〔2〕

另外一方面，在一八四七——一八七三年期间，机器制造的、蒸汽牵引的机器的逐步引进，以及这一时期铁路建筑的日趋普及

化，吸收了大量的资本。<sup>〔3〕</sup>这一种巨大的资本转移开始巩固第Ⅰ部类对第Ⅱ部类的优势。第Ⅰ部类中的资本有机组成逐渐接近了第Ⅱ部类，然后又迅速地超过了第Ⅱ部类。剩余价值从第Ⅰ部类向第Ⅱ部类的基本转移，随着利润率的均等化，随即就停止了；这种转移这时相反地从第Ⅱ部类向第Ⅰ部类发展。

但是，在第Ⅰ部类中生产出来的固定资本的特性，意味着它主要是按照定货生产的，而不是为了在任意的市场出售而生产的。生产基地也相应地根据最大的订单来调整。一旦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中最重要的分枝都装备上了机器制造的、蒸汽牵引的发动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开头很可能是这种情况——第Ⅰ部类的生产能力就不再能够被充分利用。这是一八七三—一八九三年有一种潜在停滞倾向这一长波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这意味着，由第Ⅰ部类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和由第Ⅱ部类生产但通过利润率的等同化而被第Ⅰ部类所占有的并非无足轻重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这时不再能够增值了。正象在此以前的五十年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极限所采取的形式是在第Ⅱ部类中的生产过剩，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五年也是如此，其所采取的形式是在第Ⅰ部类中的资本主义化过剩。合乎逻辑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扩张运动中的主要推力发生变化：不再向前资本主义地区输出消费品，而是输出资本（或用这些资本购买的商品，主要是铁路路轨、火车头和港口设施，也就是一些基础设施，以便使得用宗主国资本生产出来的原料的输出能够简单化并且价廉）。连同资本的日趋集中，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新的、帝国主义结构的出现的决定性原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中的这种变化，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独立变量之间的比例的这种变化，也说明了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资本的大规模渗入第Ⅰ部类，也在那里

创建了生产工厂，这些工厂就象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用巨大的生产工具来操作，因此也必须使用巨大的资本。为了能够在这一领域中进行竞争所必需的最低限度资本，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竞争越来越导向了集中；只有有限的一些独立的企业和合股的公司能够幸存下来。从一八七三年到一八九三年的长期停滞状态是与第二次技术革命——特别是电力发动机的技术——的出现相一致的，这一事实是托拉斯和垄断形成的令人信服的原因。列宁已经强调了这两种因素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sup>[4]</sup>这种垄断过程在工业的“新的”分枝（钢铁<sup>[5]</sup>、电力机械、石油）和在“新的”工业化国家（美国、德国），较之在工业的“老的”分枝（纺织、煤矿）和“老的”工业化国家（英格兰、法兰西），发生得更为迅速，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那么，按照这一先验图式，过去五十年的发展又是怎样出现的呢？由一八九三——一九一四年第二次技术革命所产生的资本加速积累之后，接着而来的是一个长时期的受了抑制的积累和相对的经济停滞，这种积累和停滞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在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们已经说明了这一停滞的主要原因：由于普遍电力化的结果产生的资本有机组成的意义深远的上升，产生了使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只能由剩余价值率的相应的、意义深远的提高来使之中立。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革命后的潮流中，资本家阶级不得不对工人阶级作一些让步，以便保持其政治统治，这更使得剩余价值率趋于稳定甚至降低，而不是提高。经过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的短暂的经济上升之后，利润率的下落导致了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的大萧条，并且使促进增值和积累的活动都停滞不前了。只有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所获得的胜利——在其他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够使得资方在剩余价值率方面获得提高，

高得足以使平均利润率在一个时期是高涨的，尽管资本有机组成是较高的。

但是，与此同时，在资本存在的全部条件中，已经发生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变化。首先，苏俄已经跳出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始以来破天荒第一次经历一种退缩，而不是一种扩大。在一个短时期内，看来原料价格新近的上涨和英国在非洲的“第三帝国”殖民化的加强，〔6〕似乎能够再一次提高资本的输出。但是，在大萧条爆发之后不久，情况就变得很明白了：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本输出，有一种长期衰减的趋势，这主要是统治着殖民地原料生产的帝国主义康采恩的垄断主义特性造成的结果。这样一来，宗主国的资本积累不足和向殖民地资本输出的衰落，就只是加速了剩余资本的出现和利润率的下跌。我们知道，过剩资本只能获得平均利息，而不能获得平均利润。因为，过剩资本本身并没有参与眼前的资本增值，而且，这种利息因而也就必须在社会剩余价值总额之外来支付，因此，剩余资本甚至更进一步将平均利润率强制压低。

其次，这种过剩资本现在开始渗进第Ⅱ大部类中。消费品的一个新的部门产生出来了，这个部门生产所谓持久消费品，它代表着第二次技术革命在消费品部门中的应用：汽车生产和电力仪器产品的开始生产（吸尘器、收音机和电动缝纫机等等）。虽然这种转化主要是局限在美国，其形式是大量生产，但是，它还是导致了资本有机组成的实际增高，这在两个部类之间重新分配剩余价值时开始压低第Ⅰ部类的利益，特别在美国是如此。由于这一情况与第Ⅰ部类平均利润率的尖锐下跌这一状况在时间方面完全一致，而且与震动了整个第Ⅰ部类的那次大危机在时间上也完全一致，于是，在这一部类中提高利润率的压力，就完全变成爆炸性的了。这种压力有四种形式：

1. 使剩余价值率立即提高（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经济）；

2. 用重整军备的方法使过剩资本立即增值；

3. 降低不变资本费用的新的企图，也就是大量资本重新向原料生产方面渗透（矿业方面和农业方面），但是这一次是用先进的工业技术，因而能降低固定不变资本的费用。缩短资本周转期的压力是与这一企图有关的；

4. 商品成本价格中工资费用所占份额的根本的缩减，伴之以半自动化和自动化的实验。这一临时趋势的原因是工资费用相对份额的上涨趋势，伴之以原料价格的根本降低和固定资本所代表的价值份额。

一旦第一个关键性的目标达到了，也就是利润率再一次上涨了，那么，通过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九年已经积累但尚未增值的额外资本的应用，通过对上列另外三种趋势的同时的剥削，资本立刻就能飞速扩大。其结果就是转入从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五年的第三个“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

这一新时期的特征之一表现在这样一种事实中：与机器制造的工业消费品（从十九世纪初期）和机器制造的机器（从十九世纪中叶）相并列，我们现在发现了机器生产的原料和机器生产的食品。因此，晚期资本主义远远不是代表一种“工业后的社会”，〔7〕它是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经济的一切部门破天荒第一次全部都工业化了；对这个时期，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加上流通领域的日趋机械化（除了纯粹修理服务之外），和上层建筑的日趋机械化。

然而，这一发展同时还确定了在最重要的生产领域中平均劳动生产力的一般的均等化。的确如此，在生产农产品或原料的某些分枝部门（例如炼油厂和合成纤维工业）和制造消费品的某些分枝部门（例如完全自动化的食品工厂），劳动生产力在最近二十

五年中的平均增长率要比生产固定资本的分枝部门为高。在美国，农业生产中每个人每小时的工作量从一九二九年的一百，增长到一九六四年的三百七十七，而在这同一时期，制造工业中每个人每小时的工作量则只增长到二百二十九。<sup>〔8〕</sup>在西德，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五年，纺织工业雇员生产力每年增长了7.7%，木材加工业增长了7%，玻璃工业增长了6.9%，食品工业增长了5.1%，而金属工业则增长了4.2%，电工技术工业则增长了4.6%，钢铁工业则增长了4%，车辆生产业则增长了3.8%，钢铁结构业则增长了3.2%，机器生产业则增长了2.8%。总括起来，在这一时期消费品工业劳动生产力平均每年增长率为6.1%，而投资商品工业则只有4.2%。<sup>〔9〕</sup>

两大部类平均生产力的这种均等化，也就是平均资本有机组成的均等化，是自动化本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一旦把充分自动化过程的原理应用到大量生产成为可能了，那么，它就可以同样成功地既应用于原料和“轻”消费品的生产，也应用于晶体管化的配件的生产或合成纤维的生产。

这样一来，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就再一次面对着类似于十九世纪中叶的那种形势：平均劳动生产力的日趋等同化。从这两个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出：

1. 首先，生产力水平的地区差异和国际差异，不再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提供主要的源泉了。这一角色现在是由部门和企业之间的这样一些差异来扮演的，<sup>〔10〕</sup>比如从上面描述的形势中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那种差异。我们决不可忘记，当以前十九世纪历史时期的特征表现为缩小两大部类之间劳动生产力的差别的时候，资方就有更多的机会以进入农业特别是进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方法，避开这种缩减所引起的后果。这些机会在今天要么已不复存在，要么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理由已如上述。

2. 这样就出现了加速技术发明的一种永久的压力。因为，其他剩余利润来源的缩减不可避免地会导向对“技术租金”的不断追求，这种“技术租金”只能通过永远的技术革新才可以取得。<sup>〔11〕</sup>技术租金是来自对技术进步垄断的剩余利润——也就是来自发明和发现的剩余利润，这种发明和发现降低了商品的成本价格，但是在某个生产分枝部门还不能变得普及（至少在一个中等时期内），也不能为所有竞争者所使用，这是由于垄断资本本身的结构的缘故：进入的困难、最低限度投资的规模、专利的控制以及卡特尔的安排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消费品的潜在的生产过剩和帝国主义时期潜在的剩余资本，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让位给了生产手段的潜在的生产过剩，以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各种经济矛盾的主要形式，尽管它很明显地是与其他那两种形式相结合的。<sup>〔12〕</sup>

这样，晚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就可以从资本的运动规律中推导出来。在进一步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将结合其他几种因素来谈，基本上以上面评述的那些为基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直接根源，可以追溯到上面已经列出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资本的四个主要目标。自动化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来源于军备经济，或者说，来源于与军备经济所达到的特殊发展程度相适应的技术上的需要。这适用于自动的、持续不断的生产过程的一般原则，这种生产过程已从人类双手直接接触的状况中彻底解放了出来（随着核子能的使用，这变成了生理上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也适用于自动计算机的建造的紧迫性，这种计算机是直接根据控制论原理生产的，它能以闪电般的速度来搜集资料，并且为作出决定而从这些资料中得出结论——例如，精确地指挥自动空中防御导弹以击毁轰炸机。<sup>〔13〕</sup>

这种新技术在生产方面的应用开始于化学工业的那些领域，

在这些领域里，决定性的动力是使得流动不变资本廉价化。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它逐渐扩散到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在那里，其主要目的基本上是降低直接的工资费用——也就是从生产过程中消除活的劳动力。在美国，这一目的毫无疑问是与要改善有时发生的实际工资提高的需要相适应的，这种工资提高在战后时期刚开始就发生了。<sup>[14]</sup>“很多资本家”为了降低工资费用，都感觉到了这种紧迫性，这种紧迫性对于“整个资方”在通过失业劳动力的解放以重建产业后备军的趋势中，也有其类似物。

利兹勒 (Julius Rozler) 区分了自动化的四种类型，或者更精确地说，半自动化和自动化的生产过程的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限定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范围：

——以自动化装置为基础，连续生产过程之间的部分转换——例如底特律 (Detroit) 的汽车工业。

——以对流量及其质量的自动控制为基础的持续流动过程——例如化学工业、炼油厂、电气公用事业。

——任何制造工厂的计算机控制过程。

——上列各体系的各种各样的联合——例如，在底特律式半自动化方面再加上计算机，就创造出了一些多头控制机械工具的联合式企业；持续流动过程与计算机的结合，在炼油和公共事业工厂方面，接近于达到了彻底自动化生产单位的目标。<sup>[15]</sup>

下面这种事实可以对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扩大作出评价：“在六十年代中期，麦克格劳—希尔公司 (MC Graw-Hill Company) 领导了一次调查……这次调查表明，雇用一百人以上的制造公司 (美国的) 的三万二千家中，有两万一千家使用了一些自动控制、自动测量装置和资料处理体系。据报导，石油工厂、工具工厂、计算机和控制设备工厂中，几乎有百分之九十使用了这些装置。三分之二的装备机械厂和金属制品厂，也都使用了控制系统……”

在一九六三年，这项调查表明，制造业的总投资中有接近七十亿美元或者总投资中百分之十八是用于设备的，这些设备被认为是自动化的或者是先进的（并且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投资是用于机械方面的）。”〔16〕

一九五四年，美国经济中的私有部门开始运用电子资料加工机械，这如果说不是对所有的生产分枝部门也是对很多生产分枝部门，最终开辟了加速技术发明和追求技术上剩余价值的领域，这一开辟表明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顺便说一句，我们因此就可以把那一年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恢复时期的结束年，和由第三次技术革命引起的繁荣的开始年。在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个“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中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区别，不但在经济——历史方面，而且在社会——政治方面都是意义深远的。

从经济方面来说，可以看出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下述十个特征：

1. 资本有机组成在质量方面的加速增长，也就是用死的劳动力以代替活的劳动力。在全盘自动化的那些企业中，实际上是全部取代。〔17〕

2. 把在生产过程中仍在从事工作的活的劳动力，从实际上从事原料生产转为从事预备性工作或监督性工作。必须强调的是，正如马克思所指明的，这种预备性或监督性功能也还是创造价值活动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是确定已生产出来的特殊使用价值形式时很重要的那些活动的组成部分。科学家、实验室工作人员、计划人员和制图员等等在实际生产过程前院工作的人员所从事的工作，也是创造价值并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的确是这样，正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总的特征，被社会劳动能力的结合过程表现出来了，这一过程马克思在他的《资本

论》第一卷第六章的原文中，作了这样的精确分析：“因为随着劳动对资本的现实隶属或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变成总劳动过程的实际执行者的并不是单个的劳动者，而是日益以社会的规模结合起来的劳动能力；互相竞争的和构成为一台总生产机器的各种劳动能力，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参加直接的商品形成过程或产品形成过程（在这里说产品形成过程比较好）；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做管理者、工程师、工艺师等的工作，有的人做监督者的工作，有的人做直接手工劳动者的工作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愈来愈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这种劳动能力的担负者也被列在生产劳动者的概念下，即直接被资本剥削的和一般从属于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劳动者的概念下。如果考察组成为工场的总劳动者，那末他的结合起来的劳动materialiter〔在物质上〕就直接实现为同时就是商品总量的全部产品，而且不管单个劳动者作为这个总劳动者的单纯成员的职能距直接手工劳动是远还是近，都完全无关。”〔18〕

3. 在自动化了的企业中，劳动力商品两种功能之间的比例的根本变化。我们知道，劳动力既创造了价值，也维护了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史中，价值的创造很显然一直是一种关键性的功能。相比之下，在充分自动化了的企业里，价值的维护现在已经变成重要的了。〔19〕不仅在投入运行的一部分机器的自动转化这种平常意义上，情况是如此，和在把原料加工到制成商品的价值这种平常意义上，情况是如此，而且在劳动手段的经济或价值的节约这样一种更为特殊的意义上，情况也是如此，而这些是与价值的巨大增长和受控制论控制的自动化机器整体适用性的提高相适应的。〔20〕

4. 在充分自动化了的企业或者分枝企业中，企业内部剩余价

值的创造与对其他企业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占有之间的比例的根本变化。这是上述自动化那三个特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5. 建筑费用与固定资本结构中购买新机器费用因而也就是在工业投资方面的费用之间的比例的变化。在美国，基本资本比例的变化如下表：

	1929	1960
建筑份额	59%	32%
设备份额	32%	52%
流通手段份额	9%	16%

6. 由于持续生产和准备工作、安装工作的大大加快（以及向持续修理方面过渡）而达到了生产周期的缩短。<sup>[22]</sup>通过原料的计划、市场的研究等等而对流通周期的缩短施以压力——因而缩短资本的周转期。<sup>[23]</sup>

7. 加速技术发明的紧迫性和“研究和发展”费用的直线上升。这是上述三种力量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8. 固定资本特别是机器的较短的寿命。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在每一个企业内使用精密的生产计划和整个经济的规划。

9. 较高的资本有机组成导致平均商品价值中不变资本所占份额增高。根据每一种不同的个别情况，这种增高可能局限在流通不变资本（原料费用、能源和辅助品）的份额之内；或可扩大到固定的不变资本方面（机器的分期付款）；或者影响到上述二者。在前文已经引述过的关于石油化学工业方面的例子中，关于原料和能源费用，莱芬逊（Levinson）提出了下面的比例：乙炔苯：87%；乙烯氯：78%；乙炔 ethylene: 59.6%。固定资本费用的份额，则分别为 12%，21%，40%。<sup>[24]</sup>尼克（Nick）和波劳克（Poll-

ock)正确地强调了这么一点:平均商品价值中固定资本所占相对份额的提高,不可避免地要伴之以每一种商品不变资本绝对费用的降低,如果自动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有竞争性质的话。〔25〕

10.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这些主要经济特征的联合结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矛盾而言,是一种有待加强的趋势:劳动力日趋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用价值的生产(这达到了不可估量的程度)与交换价值(这继续与整个人口的购买力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实现之间的矛盾;劳动过程与增值过程之间的矛盾;资本积累与其增值之间的矛盾;等等。

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部分自动化与全盘自动化之间的比例,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矛盾总的说来都有一种加强趋势这一情况进行探讨。如果生产的半自动化过程被大规模地引进了生产的某些分枝部门,那么,这只不过是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资本提高其有机组成的先天性趋势的再生产而已,并没有提出什么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是,既然半自动化,特别是制造轻工业商品的那些部门的半自动化,可以导致实现实际工资所必需的消费品价值的实质性的降低,那么,它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面,也就可以很容易地导致一个同样实质性的提高。根据奥图·布伦诺(Otto Brenner)所引用的数字,西德生产食品和饮料的工业和纺织工业,生产价值一千德国马克的商品所需的工作时数,在一九五〇年与一九六四年之间,分别从七十七小时降到三十七小时和从二百一十小时降到八十九小时。〔26〕相对剩余价值的这种显著的提高,仅仅伴随着实际工资的有限的提高,那就是说,在确定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的时候,包括了额外的商品。

但是,如果充分自动化的生产过程大规模地引进了某些生产领域,那么,整个情况就都不同了。在这些领域中,绝对的或相

对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停止上升，整个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向，是向它本身的否定方面发展：在这些领域中，几乎根本就不继续生产剩余价值了。这些领域中的公司所占有的利润总额，是取自非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分枝部门的。因此，在后者这些分枝部门中，就会出现巨大的压力，以对生产采取实际的加强措施和合理化措施，以便至少部分地来消除使它们远离了自动化部门的那些生产力水平方面的差异，因为不然的话，它们就会把“它们的”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总额中越来越多的一部分，丧失给它们那些更有生产能力的竞争者。因此就出现了在过去十年中非常独特的那些现象：加速输送带的运转并挤出工人剩余劳动的最后一秒钟（在运动——时间——措施方面——而不是象在西德被不公正地称作“最低限度时间过程”——基本计时单位是一秒钟的十六分之一）。

但是，便于分配的东西，首先必须生产出来。只要充分自动化的企业和生产分枝部门仍然只构成一个少数，〔27〕只要半自动化企业和分枝部门在每人每小时工作量方面没有表现出任何实质性的降低，并且，只要用在工业方面的劳动总量仍然继续增多，那么，晚期资本主义就一定会受到在这些大康采恩之间的强烈的竞争的限制，并受到这些部门与非垄断工业部门之间的强烈的竞争的限制。但是总的说来，这一过程在质量方面当然与“古典的”垄断资本主义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关于这一个问题，让我们简单地来考虑一下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很多批评者的反对意见。根据这种反对意见，马克思那种资本有机组成增长的概念，并没有经验方面的证明或理论方面的根据。这些批评者争辩说，机器成本和原料成本的降低以及机器的节约使用，可以导致一种“中性的”技术进步，而进入不断发展的商品生产的不变资本价值，只能以与可变资本价值相同的增长率

来增长，而不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sup>[28]</sup>就经验而言，说明下面一点是很容易的：制造固定资本的生产分枝部门的增长速度，较之生产消费品的那些工业分枝部门更为迅速；因为原料生产和中介物品生产的提高，肯定并不低于第Ⅱ大部类的增长，而且，因为能源生产的增长，显然较之后者为更高，那么，提供一种资本有机组成长期增长的经验方面的证据，并不是很困难的。这样一种表现在一些较短的时期中已经出现过，比如美国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六一年这期间就是如此。卡特尔(Anno P. Carter)利用列昂捷夫(Leontief)的那些输入输出计算法作为工具，已经探讨了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结构上的变化。卡特尔的结论是十分清楚的：“大多数的劳动系数比相应的资本系数下降得多，因此，在大多数部门中，资本与劳动之比率提高了。”卡特尔甚至更为明确地继续说道：“迄今所观察到的所有的结构方面的变化中，直接劳动系数的衰减，是最为明显的。……看来经济的作用是这样：节省劳动力是技术进步的目标，而且，绝大多数中间资本结构的变化，都可以用直接减少劳动力的需要和在较小的程度上间接减少劳动力的需要来加以证实。”毫无疑问，自动化生产的出现，必须在经验上与这种一般经济趋势相一致。在工业的个别分枝部门中，这同一种趋势也同样地明显。我们已经举出过这样一个事实：在钢铁生产方面，从汤麦斯炼钢法到酸性炼钢法的过渡，将整个生产成本中劳动力费用所占的份额从占百分之二十五降低到占百分之十七，而固定资本费用所占份额则从百分之十六上升为百分之二十五。在石油精炼厂方面，固定资本费用的比例在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五五年之间的四次连续的突破程序中，从0.21上升到了10.0，而生产十万吨汽油所需要的活的劳动力工时，则从一九一三年的56下降到一九五五年的0.4。在一个特殊的英国工厂里，从传统的机械工具到数字控制装备的过渡，使生产成本削减了一

半，而且还改变了每年降低的成本与工资薪金账目之间的关系，从 15/91 变为 21/35。在法国的雷诺汽车厂，充分自动化传输机器对万能生产机器的替代，同样也改变了每辆车劳动力费用与设备费用之间的关系，从 640/131 变成了 53/200。在西德的塑料工业，每一个靠工资或薪金生活者的固定投资总额，从一九六〇年的 2,110 西德马克增长到一九六六年的 3,905 西德马克，也就是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五，而在这同一时期，每个雇员的工资和薪金则只增长了 68.5% (单工资是 65.8%)。在联邦共和国的棉纺工业方面，每个雇员的设备价值，在一个结合最新式机械的标准工厂，从一九五〇年的 30,000 西德马克增长为一九七一年的 324,000 西德马克，而在三班制下工作的雇员数目，在这同一时期则从 274 下跌为 62，并且，工资薪金账目总额（以纺织工业的平均数为基础），在一年中只从 601,200 西德马克增长到 785,000 西德马克。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无穷无尽地举下去。<sup>[29]</sup>实际上，严格地说来，找不出任何一种商品是活劳动力费用代表着生产费用总额的一种增长份额。<sup>[30]</sup>

长期的“因素份额稳定性”的影响，甚至官方统计数字所提供的“劳动份额”的增长，与资本有机组成长期提高的基本趋势并不是相矛盾的。“因素费用”中不但包括了固定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且还包括了剩余价值；但是，其中并不包括流动不变资本的价值。因此，这种费用是不能与成本/价值相比的。因此，在这种类型的统计材料中，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将会把资本有机组成的任何增长掩蔽起来。除此之外，“劳动份额”中还包括较高的工资费用，这种工资费用至少有一部分是代表剩余价值而不是代表可变资本的。以宏观经济为基础而计算的“因素份额”，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有机组成概念偏离得更远了，因为“因素份额”中包括了在“劳动份额”概念下对非生产性劳动的补偿，而这是不能够适当

地包括进可变资本的范畴中去的。〔31〕

令人十分纳罕的是，甚至连保罗·斯威茨也参加进了这样一些著作家的行列，这些著作家否认在二十世纪中资本有机组成有任何长期增长的趋势，或者他们实际上争辩说，资本有机组成是趋向于下降的。〔32〕我们只需在上面列出的论据和事实之外再加上这么一点，那就是尽人皆知的下面两者之间的比例的差异：即劳动费用与加于技术上先进和不那么先进国家同一个工业分枝部门的价值之比，这种差异反映了资本有机组成的这种增长（尽管必须再加以强调，“附加价值”概念中包括了利润而不包括原料费用，因此它与成本/价值也不相一致）：

#### 劳动费用在附加价值中所占百分比

	针织厂	基本化学制品和肥料
美国 (1954)	23.06%	8.14%
加拿大 (1954)	27.79%	9.73%
澳大利亚 (1955—56)	38.37%	23.41%
新西兰 (1955—56)	39.85%	16.03%
丹麦 (1954)	50.04%	24.77%
挪威 (1954)	50.46%	20.28%
哥伦比亚 (1953)	53.02%	30.50%
		〔33〕
墨西哥 (1951)	79.68%	35.09%

麦吉在反驳古斯敦 (Rolf Gusten) 的时候，已经探索从理论上证实，作为资本发展规律的结果，资本有机组成必然有一种增长。〔34〕他的论证中有很多是具有说服力的，但是，如果他没有

排除马克思的分析中关于资本有机组成的增长的功能性作用的话，那么，他的说明将会更加简明。根据马克思的看法，技术的进步是在竞争的逼迫之下，由减缩生产费用的不断的压力引起的，这种压力在宏观经济方面造成的结果不可能与它在微观经济方面造成的结果有所不同。不使资本有机组成增长而能节省费用，这就得以下列情况之一为先决条件：或者是活的劳动力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取代愈来愈复杂的机器，或者是第 I 大部类能生产现代机械，这种机械既可节省劳动力和价值，又不使这种机械复合物的内在价值有所增高，或者是新原料价值降低的程度甚于工资商品价值降低的程度。但是，这就有必要使得第 I 大部类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较之整个经济的增长更为迅速。由于新的设备必须是用先已存在的机器和先已有的技术来建造，而且，其自身价值也因而取决于现在的劳动生产力，而不是取决于将来由它协助提高的那种生产力；也由于这种设备在初始阶段是不能大量生产的，那么，这种假设终究是不现实的。因此，正象卡特尔正确地强调的那样，单位费用的节省将会有向劳动力费用节省的长期趋势。这样一来，费用的节省就往往会最终伴之以商品价值中工资份额的相对减少，因而也就伴之以资本总额中可变部分的相对降低。

虽然对马克思那种资本有机组成增长的论点的传统的批评，总地来说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种批评也含有一点点真理，那就是，这种增长所受的影响较之很多庸俗化理论所假想的，不是那么自动也不是那么根本。<sup>(35)</sup>在有限的期间，达到扩大再生产而无需乎使资本有机组成有根本的变动，这是完全可能的。的确如此，第 I 大部类中劳动生产力可以周期性地出现突然的提高，这种提高远远大于社会平均额，因而在制造工业中就可以出现一种实质上的费用节省而无需提高结合在其所生产出来的商品中的不变价值。但是，这些趋势最终不能够以全面的社会规模支持下

去。正是部分自动化生产与充分自动化生产之间的对抗，使得我们在今天能够洞察一般的发展性质。因为，如果充分自动化的企业及其分枝和半自动化的康采恩的数目多到了这样的程度，它们已成为整个企业结构中的决定性因素，并且使“古典的”工业企业数字降到在生产总额中只占一个相当小的份额，那么，晚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就会带有爆炸性质：剩余价值总额，换句话说就是剩余劳动力的劳动工时总数，这时就会有缩减的趋势。

罗特(Karl-Heinz Roth)和堪佐(Eckhard Kanzow)在另外一部出色的研究著作中，忽视了部分自动化与全部自动化之间的联系，忽视了下述两种情况之间的联系：一种情况是劳动生产力的飞速提高(生产成本的降低)，在某些企业中只是一种例外，另一种情况是劳动生产力的这种飞速提高是普遍化的。他们也忽视了在兑现的种种困难方面(或者在使资本总额增值的种种困难方面)作为结果的质量上的差别。他们写道：“工业新部门中由技术决定的进步，使得联合资本能够经常地以抵制措施来扩大其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补偿的可能性。”可是很明显的是，资本中只有一部分的情况是如此。因为，随着自动化的扩大——换句话说，随着剩余价值额的根本降低和资本有机组成的直线上升——所有资本怎么可能都提高其利润率呢？在罗特和堪佐所举出的数字例子中，<sup>[35]</sup>他们考虑了四个连续的阶段——从输送带生产到大规模自动化，或从使用三十一个单位劳动力到使用九个单位劳动力<sup>[37]</sup>——并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生产加了倍，总生产增长到六倍，利润率从12%上升到55.6%。但是，罗特和堪佐忽略了在这种过程之前的三种条件的全面的经济含意，忽略了在使部分自动化普遍化的事件中（更不必说全部自动化了），这三个条件将会变成什么：不变的售出价格；加倍的物质产量；工资和薪金费用的减半。很明显，随着半自动化的扩大，这三个条件的联合变得是防

不胜防的了。如果售出价格一成不变，而人们名义收入又削减一半的话，那么，加倍量的耐久消费品有谁来购买呢？在罗特和堪佐所举出的那个特殊的例子中，下列的前提必须得接受：

(1) 在有关企业中名义工资的降低，是伴之以整个消费收入的增加的；

(2) 某些自动化生产出来耐久消费品，已被非自动化生产过程生产出来消费品所取代。这就是可以系统阐述这些含蓄的条件，以便看出，随着半自动化的日趋扩大，它们注定是要缩小或者消失的。这时，一个大规模的销售或兑现问题，必然要出现。

波劳克 (Friedrich Pollock) 在对就业和自动化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的时候，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虽然是属相反类型的 (悲观主义的而不是乐观主义的)。他写道：“引进自动化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众所周知的较高的生产力，但是，这意味着工资和薪金的一种纯的节省。如果这样解放出来的工人能够在维修或制造这些控制仪器本身找到新的职业的话，那么，工资费用 (如果有一个不变的产量的话) 就根本不会有什么纯的节省。这些节省只会转换为各种不同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也同样是成本中的一个因素，这样一来，一方面肯定可以说生产方法发生了变化，但是，并无生产力提高可言。”<sup>[38]</sup> 这一论辩的妙处在于引号中的这些话：“如果有一个不变的产量的话”。正如我们刚刚说过的那样，自动化决不意味着一个不变的产量。因此，波劳克的论辩只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如果生产的所有领域都有一种同样的自动化 (以及一种不变的消费结构)。但是，如果自动化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达到了不同的阶段，那么，十分可能的是，生产力的提高和已经自动化了的分枝部门产品贸易的提高会伴之以将解放出来的工人吸收到生产控制仪器的部门中去。于是，整个的发展过程就是在牺牲非自动化 (或者自动化程度较低的) 分枝部门的情况

下进行的。事实上，这正是在过去二十年中晚期资本主义历史中所实际发生的情况。

一旦晚期资本主义生产领域被当作了非自动化企业、半自动化企业和全自动化企业的一个矛盾单位（在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因而在整个商品生产的所有领域中），那么，很明显的是，资本必须按照其自身的性质，在某一限度之外对自动化进行越来越大的抵制。<sup>[39]</sup>这种抵制的形式，包括：在半自动化工业分枝部门中使用廉价的劳动力（例如在纺织厂、食品和饮料工业中使用妇女和学徒），这种廉价劳动力会给引进充分自动化的综合企业制造困难；在自动化机械综合企业的生产中的不断变化和互相竞争，这种变化和竞争将阻止这些综合企业的廉价化，因而阻止这些综合企业较快地进一步引进工业的其他分枝部门；不断地寻求新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最初是在非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的企业中生产出来的，等等。最重要的一点是，正如在机器操作的大工业的第一个阶段那样，大机器本身并不是由机器生产出来的，而是由手工生产出来的，因此，在现在正在进行的自动化的第一个阶段，自动化机器的总体并不是自动建造出来的，而是在输送带上建造出来的。事实上，生产电子生产手段的那种工业，其资本有机组成是十分低的。在六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和西欧，这一工业分枝每年总周转期中工资和薪金费用的份额，波动于45%与50%之间。<sup>[40]</sup>这说明了为什么自从五十年代初期以来流入的大量资本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平均的资本社会组成，而且相应地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平均利润率。因此，自动化机械的自动化生产，将是一个新的质方面的转折点，其意义相等于十九世纪中叶用机器生产机器这种情况的出现，<sup>[41]</sup>马克思强调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只要它会减少劳动者的绝对人数，也就是说，只要它会使全国能在较少的时间内完成他们的全部生产，它就会引起革命，因

为它会把许多人赶到活路之外。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的限制，就再表示出来了。那就是，它并不是生产力发展和财富生产的绝对形式，而宁可说在一定点上会和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生产发生冲突。”〔42〕

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方式的绝对内在极限。这个绝对极限既不是在于资本主义完全深入了世界市场（也就是消除了各种非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象罗莎·卢森堡所认为的那样——也不是在于已积累资本总额增值的最终不可能，即使是有一个增长的剩余价值额——正象格罗斯曼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机械化自动化进程的最后阶段，活的劳动力从生产过程中消除造成的一种结果，是使剩余价值额本身必然要缩减。资本主义与整个工业和农业的充分自动化生产是不相容的，因为这不再允许有剩余价值的创造或者资本的增值。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年代，使自动化扩展到生产的一切领域，那是不可能的：〔43〕“一旦在直接形态之下的劳动不复是主要的财富源泉，劳动时间也就不能而且一定不能再作财富底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同样不能再作使用价值底尺度。群众底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少数人不劳而获也同样不再是发展人类一般智力的条件。这样一来，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垮台了，直接物质生产过程也就摆脱了它所保有的那种贫乏和矛盾底形态。”〔44〕

也许有人反对说，自动化已消除活的劳动力，只是在生产的工厂；而在直接生产之前的所有领域中，自动化还增加了活的劳力（例如实验室、研究试验部门），在这些领域中所使用的劳动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毫无疑问地构成了“集体生产劳动者”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姑且不考虑这样一种事实：整个生产劳动力转化为受过科学训练的生产者，将会给资本的增值创

造出爆炸性的困难，甚至也暂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它与商品生产的保持究竟能和谐共存到什么程度，那么，很明显的是，这样的一种转化将意味着对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分工的根本的压制。对于无产阶级的整个社会形态和文化施加的这样一种根本的限制，将会削弱工厂和经济的整个等级结构，如果没有这种等级结构，想从生产劳动中勒索剩余价值，那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将垮台。这一趋势的最早的迹象，从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几章中来论述这一点。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迹象不可避免地宣告为处在胚胎阶段。由于资本本身的自我保护的原故，资方决不会使得所有的工人都转化为科学家，正象它决不会使得所有的物质生产都转化为自动化生产那样。

下面一些数字例子表明，由于自动化的结果，创造价值的劳动量缩减，这种趋势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到了如何的程度。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情况深刻地影响了晚期资本主义用提高剩余价值率来制止利润率下降的能力，深刻地影响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用增加实际工资来阻止社会紧张状态加深的的能力。使 A、B、C、D 表示四个周期性高峰的年份，而它们之间的间隔大约为十年。在我们这个对比的开头这一年，使两大部类中生产劳动者每人每小时工作量的总额为 100 亿（大约五百万个生产工人，每个工人每年工作两千个小时，或六百万个工人，每个工人每年工作 1,666 个小时）。使剩余价值率为 100%，也就是，有五十亿个小时用之于剩余价值的生产。由于尽管日趋自动化而增加雇用的结果，在 B 年使用的生产劳动时数为 120 亿，而不是 100 亿。我们假定，这时剩余价值率从 100% 提高到了 150%（相当于工人实际工资的生产已不必用他们劳动时间的一半，现在生产工人对此目的只用他们劳动时间的 2/5）。剩余价值额从 50 亿个工作小时增加到 72 亿

个工作小时，也就是提高了44%。由于此后生产工人生产他们工资的等价物要用48亿工作小时而不是用50亿工作小时，所有工人（保守的每年增长率为2.6%）实际工资增长总额为30%的话，在第Ⅱ大部类中就将需要劳动生产力有35%的增长率，这仍然还在能够作到的结构之中；这实际上与过去二十五年的发展情况是一致的。

在我们这个对比的C年，自动化已经制止了就业额的增长，或每人每小时工作总额的增长。这一总额停在120亿不变。例如，为了补偿资本有机组成的增长（在A与B之间和B与C之间已增长50%），剩余价值率必须再一次从150%增长到233.33%，也就是说，为了生产工人工资的等价物，他不需用去十个工作小时的四个，只需使用十个工作小时中的三个就可以了。现在剩余价值总额已上升到84亿小时，也就是整个上升了16.6%。但是，如果工人为了生产他们的消费品的等价物，在他们仍可使用的36亿工作小时（而十年前则是48亿工作小时）中的实际消费方面（在生产额或使用价值额中），要想达到进一步增长30%的话，那么，第Ⅱ大部类的劳动生产力就必须增长70%，也就是每年增长率为5.4%。就仍然正好在可能作到的边缘。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第四个年份D。为了使资本的有机组成（自从C年以来大约增长70%）的增长能够中立，剩余价值率将不得不从233.33%上升为400%，也就是说，生产工人为了要生产他的工资的等价物，只要用去五个工作小时中的一个就行了。但是，我们可以说，自动化已经使每人每小时工作量总额，从120亿降到了100亿。现在，剩余价值绝对额相等于80亿工作小时，或者换句话说，尽管剩余价值率有了大幅度增长，从233.33%增长到了400%，剩余价值额还是减少了。<sup>[45]</sup>因为，如果剩余价值额至少保持不变的话，那么，剩余价值率就必须是

525%，而不是400%，所以，仅仅16亿工作小时将留作生产实际工资等价物之用。但是，即使是剩余价值率“仅仅”提高到400%，在十年之中使实际工资进一步增长30%，那就必须得这样：在D年以20亿工作小时作出的生产量要比C年36亿工作小时所生产的生产量提高30%，也就是说，在第Ⅱ大部类中劳动生产力要提高140%：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实现9.1%的平均增长率，这似乎是不可能的。这还将大大少于这样一个年平均数，这个平均数是在D年只以16亿可用工作小时，也就是在剩余价值额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为保证实际工资增长30%所必需的。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力将在这十年中必须提高192.5%，也就是说，增长率为11.4%，而这是绝对达不到的。

结论是很明显的：由于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资本有机组成一天天提高和生产劳动者每人每小时工作总量的开始下降，实际工资最终要想继续大大增长而与此同时又能维持剩余价值额不变，那是不可能的。这两个量之中的一个将会缩减。由于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没有法西斯主义战争的情况下，实际工资的显著降低是可以排除的，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资本增值的历史危机，并且，首先是在剩余价值额方面，然后又在剩余价值率方面，出现了不可避免的下落，因而接踵而来的是平均利润率的暴跌。在我们的数字例子中，甚至连实际工资在D年也将是停滞的，而剩余价值额则从84亿工作小时降到了80亿工作小时，这仍然意味着劳动生产力会增长80%（年增长率为6%）。如果剩余价值额象实际工资那样，保持不变，那么，劳动生产力将会增长125%，也就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年增长率8.4%。<sup>[46]</sup>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比在第五章更为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在晚期资本主义加强为争取剩余价值率的斗争是自动化的本质，而且，在用于价值创造的每人每小时工作量开始衰减的同时，来

使资本增值的障碍的克服更加困难，这也是自动化的本质。下面的表说明，这一假设决不是不真实的：

美国制造业每人每小时工作量的数值〔47〕

1947:	243 亿
1950:	237 亿
1954:	243 亿
1958:	227 亿
1963:	245 亿
1966:	282 亿
1970:	276 亿

制造业中生产工人所干的总时数指数，从一九六七年的100降到一九七二年的 97.5。在西德，这同样的趋势甚至更为明显。自一九六一年以来，在工业中每人每小时工作量数值出现了一个绝对的倒退：

西德制造业每人每小时工作量数值〔47〕

1950:	81 亿
1956:	117 亿
1958:	112 亿
1960:	123.7 亿
1961:	124.4 亿
1962:	121.1 亿
1964:	118.1 亿
1966:	115.7 亿
1968:	108.3 亿

1969:	114.8 亿
1970:	118.0 亿
1971:	113 亿
1972:	108 亿
1973:	108 亿

可以预见的是，资本有机组成的增长是与自六十年代以来剩余价值率的停滞结合在一起的，而这种增长已经导致了平均利润率的下落。下面这些数字是英国的数字，这是由两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以官方的资本主义的统计数字而不是以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范畴为基础计算得来的——这些数字毫不容置疑地指出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利润率趋势是相似的：<sup>[48]</sup>

#### 工业和商业公司纯资财利润率（扣除增值之后）

	税前	税后
1950—1954	16.5%	6.7%
1955—1959	14.7%	7.0%
1960—1964	13.0%	7.0%
1965—1969	11.7%	5.3%
1968	11.6%	5.2%
1969	11.1%	4.7%
1970	9.7%	4.1%

在美国，两种互不相干的调查，产生了类似的后果。奈尔（Edward Nell）估计的剩余价值率是从一九六五年的 22.9% 跌到一九七〇年的 17.5%（即非金融控股公司纯价值中利润和利息的份额）。<sup>[49]</sup> 诺多斯（William Nordhaus）在对仅仅由于通货膨

胀而得到的虚构的“存货”利润作了谨慎的修正之后，列出了下表：

非金融公司资本真正利润率

	税前	税后
1948—1950	16.2%	8.6%
1951—1955	14.3%	6.4%
1956—1960	12.2%	6.2%
1961—1965	14.1%	8.3%
1966—1970	12.9%	7.7%
1970	9.1%	5.3%
1971	9.6%	5.7%
1972	9.9%	5.6%
1973	10.5%	5.4%

在法国，“企业”杂志报导了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三年之间利润率的逐渐下降、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七年间的某种稳定、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期间意义深远的下降、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间的猛烈上升以及从那时以后的再一次进一步下跌。在法国的制造工业中，有证券财产的纯利润率到一九七〇年算来比六十年代早期的要低三分之一。对股票在通货膨胀方面的再估价加以纠正之后，法国企业中自筹资金比例似乎从一九六一——六四年期间的79.5%和一九六五——六八年期间的83%降低到了一九七一年的75.1%，一九七二年的77.6%，一九七三年的73%，一九七四年的65%（临时数字）<sup>[50]</sup>。根据泰姆普勒(Phillippe Temple)的计算纯利润率从一九五四——六四年期间的5.3%下降到了一九六四——六七年期间的4.3%和一九六九——七三年期间的3.8%。<sup>[51]</sup>

在西德，根据联邦共和国官方经济顾问的计算，公司的总收入（减去虚构的企业家薪金并以同一公司的纯财产加以区分），在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八年之间，直线下跌了差不多 20%（在倒退的两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下跌之后，一九六八年这一年利润又明显地上升了），并且，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三年之间，又进一步下跌了 25%。〔52〕

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新的阶段，其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结构上的危机，这样一来，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就可以描述得比较精确一些了。这种结构上的危机，并不表现在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停顿上。列宁在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所作的结论中，清楚地警告不要作出任何种这样的解释。他甚至还写道，就整个地球的范围而言，帝国主义的标志是发展的加速：“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53〕

所以，帝国主义的标志，以及其第二阶段晚期资本主义的标志，并不是生产力的衰退，而是伴随着这种增长而来的或掩盖着这种增长的那种越来越严重的寄生状态和浪费现象。晚期资本主义生来就不可能把第三次技术革命或者说自动化的广泛可能性加以推广普及，这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在这一趋势中的一种有力的表现，正象它把生产力转变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从而滥用了生产力那样；〔54〕永远建设军备、半殖民地国家的饥馑（这些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力一直局限于一个水平，这种水平与今天在技术上和科学上可行的事物完全没有关系）、对大气和水域的污染、破坏

生态平衡，等等——帝国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在传统上最受社会主义者谴责的那些特征。

说得绝对一点，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的提高，较之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迅速。这种增长在过去这二十五年中，可以用物质生产或生产能力的数字和工业无产阶级的规模的数字来加以测量。<sup>[55]</sup>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两套数字，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可能性相对比的话，与自动化的潜力相对比的话，以及与它们将工业化国家生产者群众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从根本上削减的能力相对比的话，结果是很可怜的。在这种意义上——但是只以这一定义为基础——列宁对帝国主义所下的这种定义，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趋崩溃”的一个阶段，仍然需要充分证实。

资方对真正生产力和潜在生产力的滥用，不仅在于物质方面，而且也在于人的生产力方面。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时代必然是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大熔合的时代。科学可以真正地变成一种直接的生产力。在日趋自动化的生产中，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机关工作人员已没有进一步的立足之地。一个群众性的、普遍化的从体力劳动向智力劳动的转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由于自动化的结果，还从经济上和社会上来说说是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了这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56]</sup>而且在这种社会里，真正的财富是来自“一切个人那发展了的生产力”，这种预见在现在几乎是一字一句都兑现了：“自由地发展个性，从而不是为取得剩余劳动而压缩必要劳动时间，而是根本上要把社会底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到那时候，才能利用为他们大家所解放出来的时间和创造出来的物质手段使个人在艺术上、科学上和其他方面的造诣，达到高度的水平。”<sup>[57]</sup>

晚期资本主义天生带来的最坏的浪费形式，是错误地使用了现有物质和人类的生产力；这些并没有用来发展自由的男子和妇女的福利，而是越来越多地用于无用的、有害的事物的生产。资本主义的一切历史矛盾，都集中在自动化这种双重特性上。一方面它代表了物质生产力的完善的发展，这种生产力本身就具有把人类从强制操作机械的、重复的、单调的和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潜在的能力。在另一方面，它也代表对职业和收入的一种新的威胁，一种新的、强化了了的焦虑、不安全感、回复到长期大规模失业之感、消费和收入周期性丧失之感以及精神上和道德上贫困化之感。资本主义的自动化作为劳动生产力和商品与资本那异化的、有破坏性的力量，就这样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天矛盾的客观化了的精髓。

有一种意见认为，资本主义结构危机的时代——也就是从历史观点来看，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成熟的这个时期——其特征似乎应该表现为生产力的绝对的降低，或者至少为生产力的绝对的停滞，这种意见可溯源于对马克思的一句话的错误的和机械的解释，这句话出自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著名的序言，在这里，他最概括地略述了一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以如下方式论述了社会革命时代的特征：“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

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8〕看来很明显的是，这一句“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实际上不过是第一句话的一种重复；换句话说，这是以这样一个陈述为基础的：当生产力的发展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一点。从这一点出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了“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但是，这无论如何没有暗示，从此以后，如果不推翻这种生产方式，那么，任何进一步的发展都是十分不可能的。这只是意味着，从这一时代之后，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力将会更加尖锐地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并倾向于将这种生产关系推翻。〔59〕

对这一节著名的文字所作的机械的解释，毫无疑问得到了俄罗斯十月革命经验的支持，尤其是得到了布哈林在其所著《转化时期的经济学》中对这一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的支持。〔60〕布哈林在这一著作中实际上把这么个情况当成了一种规律：社会主义革命或是先于或是伴随着生产力的衰退。一九一七——二〇年俄罗斯的特殊结构——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爆发了革命，结合着一个长期的内战，内战使这个国家的整个经济彻底崩溃，并且引起了生产力的剧烈的下跌〔61〕——根本就不会是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变体。没有理由把它抬高成为一种典范。〔62〕

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们正确地记录了俄国革命后最初几年生产力的衰退。他们从物质上、在产量、就业等方面衡量了这一衰减，并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很难克服它已陷入的哪怕

是暂时陷入的这种社会经济危机。<sup>[63]</sup>一九二九年铺天盖地而来的大萧条，在一个短暂的繁荣期之后，证实了这一预见的准确性。但是，不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在他们判断长期发展的时候，仍然都十分谨慎。所以，在共产国际第三届大会上，托洛茨基宣称：“如果我们承认——让我们姑且承认——工人阶级并没有站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而是允许资产阶级统治世界命运再统治一个较长的岁月，比如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那么，可以肯定，某种新的平衡就会建立起来。欧洲将会被猛烈地推向反向齿轮中去。数以百万计的欧洲工人将会由于失业和营养不良而死于非命。美国将不得不在世界市场上重新定它的方向，再转变它的工业，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削减它的生产。从此以后，在一个劳动分工的新世界在极度痛苦中建立起来十五年或二十年或二十五年之后，一个资本主义上升的新时代也许会接着到来。但是，整个这一概念是极其抽象而又片面的。在这里所描绘的事物，似乎是无产阶级已经停止了斗争。同时，如果只是因为阶级矛盾恰恰在这些新近的年代里已经变得极端恶化的话，那么，这一点连谈也不能够谈。”<sup>[64]</sup>

托洛茨基的情况往往就是如此，这一节引语的第一段是有预见性的。这话写于一九二一年。恰恰在二十五年之后，在一九四六年，数以百万计的欧洲工人由于失业、营养不良、战争和法西斯主义而死于非命。美国确曾不得不再转变它的工业，而且在一个相当的时期（一九二九——三九年），实际上削减了生产和就业。它在世界市场上重新定了它的方向——当然既包括商品市场也包括资本市场——最终产生出了一个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和资本主义扩大物质生产的一个新的阶段。

另外一方面，上面引语的第二节，显然是局限于当时的条件的。<sup>[65]</sup>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一年指出这一点是绝对正确的，就是预

言生产力的一个新的上升是抽象的和形式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欧洲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仍然还处在上升阶段。在这样的条件下，剩余价值率的实际增长——最终是利润率的增长——是不可想象的。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不是猜测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可能性，而是工人阶级准备把资本主义的结构上的危机转变成为在最重要的大陆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所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新的高涨的那些理论，可以用来证实他们拒绝领导这一革命斗争。<sup>(66)</sup>他们所得到的收获，并不是一个长期的上升，而是在一九二四——二九年的简短插曲之后的大萧条、大规模失业、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托洛茨基的分析和预见已经证明是很正确的。

但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一年所不能指明的是这样一点：工人阶级最终必须进行斗争以阻止资本主义生产力长期上升时代的到来。为了这一点，无产阶级必须取得胜利。历史宿命论在经济远景问题方面的眼光短浅，与在伟大的政治阶级斗争问题方面是不相上下的。托洛茨基在这一方面是相当明确的，七年之后，他批评了布哈林和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的计划：“资产阶级能不能为它自己取得资本主义发展和权力的新的时代呢？只是否认这种可能性，指望资本主义本身的‘无望的处境’，那只不过是一些革命的夸夸其谈。‘没有绝对无望的处境’（列宁语）。在欧洲一些国家目前的这种不稳定的阶级平衡，不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正是由于它的不稳定性的缘故。……一种局面是这么不稳定，以致无产阶级不能够掌权，而资产阶级也不能十分坚定地感觉到它是它的家庭的主人，这种局面迟早一定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突然改变的，或者是朝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改变，或者是朝有利于严厉的长期的资本主义稳定的方向改变，而这种资本主义稳定是建筑在普通群众的脊背上、殖民地人民的骨头上……也许是建在

我们自己的骨头上。‘没有绝对无望的处境’！欧洲的资产阶级只需通过击败无产阶级和革命领导的错误，就可以从它那些严重的矛盾中找到一个持续下去的方法。但是，反过来也是如此。世界资本主义不会有什么新的繁荣了（当然，前景是大动荡的新时代），只会有这样的结果：在革命的道路上，无产阶级将能够从现在这种不稳定的平衡中找到一条出路。”〔67〕这种预见，每一点都得到了证实。这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是随着俄国革命的历史和德国革命的失败而开始的，到一九二九年就结束了。欧洲工人阶级由于领导的无能而没有能够处在一个有利地位以解决这种尖锐的社会危机。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使这一危机在有利于资方的情况下获得暂时解决，创造了先决条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阵风仍然再一次席卷了法兰西、意大利和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传统政党再一次不但证明它们完全不能完成它们的历史任务，而且也表明，它们在使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和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趋于稳定的过程中，是欧洲大资本的彻头彻尾的帮凶。〔68〕这就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第三个“带低调扩大的长波”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基础。它决不“纯粹”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活力的证明，或者它的存在的正当理由。它所证明的一切就是，在现有技术和生产力的那些帝国主义国家中，并没有对资本在纯经济意义上的“绝对无望的处境”，而且，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不能完成也可以最终给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富于希望的新的生命，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种新生命还会按照它那天生的逻辑进行剥削：只要利润率再一次增长了，那么，它就马上会加速资本的积累，革新技术，不断地追求剩余价值、平均利润和剩余利润，并且进一步发展生产力。

实际上，这就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意义所在，也是确定其历史局限性的所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它再现了这一

社会经济形式的一切内在的矛盾。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产生出来的这种结构危机时代和这一生产方式的逐渐解体，也就是生产力的这种重新高涨，必然会给资本主义的那些古典的矛盾，添加一整套的进一步矛盾。这些矛盾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加以考查，而这些矛盾所产生的革命危机的可能性，比之一九一七——三七年时期所产生的甚至更加广阔、更加深刻。

不应当忘记，马克思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并不在于生产力在量方面的无限发展，而是在于这一发展确定的、质方面的结果：“资本伟大的历史侧面，就在于制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的使用价值观点或单纯的生存观点看来是多余的劳动。一方面，需要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至于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已经成为从个人需要之中产生的一般需要；另一方面，经过资本严格的训练而贯通于继起世代中的普遍勤勉已经发展为新一代所共有的产业；最后，资本在其无限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种种条件中不断推向前进的劳动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取得和维持一般的财富仅仅需要整个社会比较很少的劳动时间，而且劳动的社会（die arbeitende Gesellschaft）对其继续扩大的再生产过程、在内容上日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的关系成为科学上的关系；因而人们在再生产上所做的劳动已经不可能再看作是自己制造物品的劳动了——一旦到了这个时候，资本底历史使命便完成了。”〔69〕一旦这些质方面的结果已经达到了，那么，资本主义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且，社会关系也就为社会主义准备好了条件。于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衰落时代也就开始了。虽然生产力还是要继续进一步发展，但是，这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资本的真正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的确，这样一种进一步的量方面的发展，在某种环境下可以实际

上产生质方面的成就。列宁的这一论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没有绝对无望的处境，这并不意味着，只要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发生，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可以以加长经济停滞和社会危机周期的代价而无限制地存活下去。因为，不仅仅是预示剩余价值额迅速增长的普遍化了的自动化，给资本增值树立了一个绝对的障碍，这种障碍是剩余价值率的任何增长都不能逾越的。在生产力以后实际发展中所包含的那种潜在发展的浪费和破坏动力也大得很，以致这一制度甚至所有文明走向自我毁灭的唯一选择，就是更高一级的社会形式。不管近二十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在国际上的一切增长，在今天，“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之间的选择，仍然是个十分贴切的问题。

## 注 释

- 〔1〕 大卫·兰茨：《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剑桥，一九七〇年，第二五四——二五九页。贝塞莫尔 (Bessemers) 的发明，是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军事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见阿米台治 (W. H. Armytage)，《工程学社会史》，伦敦，一九六九年，第一五三——一五五页。“在工业组织方面的反响，尤其是在造船方面的反响，是决定性的。冶金和机械的时代不可避免地使得大规模工业单位的成长，趋于成熟。美国东部人中的股票持有者……经历了受有创伤的经验，他们的先驱者在十年前的铁路狂热中已经吃尽了苦头。”第一五五页。
- 〔2〕 兰茨谈到了“产业革命各种技术可能性的枯竭”，而且，除钢铁工业已转化外，“在构成产业革命最初一组创造革新中含糊的收入方面的”减缩。来源同上，第二三四——二三五、二三七页。
- 〔3〕 来源同上，第一五三——一五五、五四一页。
- 〔4〕 见列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载《列宁选集》，伦敦，一九六九年，第一七七页。
- 〔5〕 这一优势是不证自明的，所以兰茨把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欧洲

经济发展阶段称作“钢铁时代”。兰茨前引著作，第二四九页以下。

- [6] 见乔治·巴德莫尔(George Padmore),《非洲,不列颠的第三帝国》,伦敦,一九四八年。
- [7] 这一观念我们在下文第十二章中还要讨论。但尼尔·贝尔在《一般教育的改革》(纽约,一九六六年)、赫尔曼·卡恩(Hermann Kahn)在《公元两千年》(纽约,一九六七年)、金·雅克斯·塞尔万-什莱伯尔(Jean Jacques Servan-Schrieber)在《美国的挑战》(伦敦,一九七〇年)等等,都使用了这一观念。
- [8] 美国商务部,普查署,《长期经济增长:一八六〇——一九六五年》,华盛顿,一九六六年。
- [9] 克鲁斯、康恩茨、乌尔曼:《自动化的经济成果》,第六十八——六十九页。在一九五〇——一九六五年期间,合成纤维工业劳动生产力每年增长率为9%。
- [10] 关于这些差别的例子,美国工会领袖查尔斯·莱芬逊在其新著:《资本、通货膨胀与多国公司》(伦敦,一九七一年,第二十八页以下)中举出了一些。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提供了西欧每个工业分支部门劳动生产力每年增长率情况:制革工业为1.3%左右,石油工业为9%左右。这是从一到七的一种变化。《一九七〇年欧洲经济研究》,日内瓦,一九七一年。
- [11] 本书下面两章还要更深入地讨论这一问题。
- [12] 这一潜伏的工具生产的生产过剩所采取的形式主要是,在第I部类的各分支部门中的一种持久的能力过剩。
- [13] 弗里德里希·波劳克:《自动化》,法兰克福,一九六四年,第四十六——四十七页。
- [14] 参见本书第三八四——三八五页表格中的第四栏。
- [15] 尤里乌斯·利兹勒:《自动化与工业劳动》,纽约,一九六九年,第七——八页。
- [16] 约赛夫·弗鲁姆金(Joseph Froomkin):《自动化》,载《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纽约,一九六八年,第一卷,第一八〇页。
- [17] 莱芬逊在前引著作的第二二八——二二九页中引用英国石油化学工厂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表示工资和薪金生产费用比例,已经降到了0.02%、0.03%和0.01%。

- [18] 卡尔·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一二八——一三〇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一〇六——一〇七页）。
- [19] 尼克，《技术革命与生产费用经济学》，第十三页：“如果在客观化劳动领域中发生了劳动力的大幅度节省，那么，一种质的方面的新形势就会出现。”
- [20] 波劳克前引著作，第二五六、二八四——二八五页。波劳克谈到了“大规模损坏”，这可以由于对控制的错误处置而造成。
- [21] 尼克前引著作，第二十一页。这是与自动化机械体积的缩小有关系的。参见黑尔姆特·鲁威格(Helmut Ludwig)：《技术生产手段的降低》，科隆，一九六二年。在比利时的冶金工厂工业中，一九七三年投资于建筑的为38亿法郎，投资于设备的为135亿法郎；《冶金通报》，3/12，一九七三年。
- [22] 鲁斯前引著作，第二十七——二十八页；克鲁斯、康恩茨、乌尔曼前引著作，第二十八——二十九页。也见同上著作第四十九页，关于次品限额的降低和物质成本的节约：“为了调整厚度而在冷轧车上安装了一种类似于计算机的东西，这使得废弃物降低了35%。在一家发电厂，由于安装了一种自动调节的供料和压力装置，使得每千瓦小时所消耗的能量降低了42%。”
- [23] 私人投资额增加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使就纯花费而言，也对最理想利用产生强制的压力。
- [24] 莱芬逊前引著作，第二二八——二二九页。
- [25] 尼克前引著作，第四十六——五十四页；波劳克前引著作，第一六六页。随着原料生产自动化的扩大，固定的不变价值额将成为相对条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参见克鲁斯、康恩茨、乌尔曼前引著作，第一一三页。
- [26] 《自动化、冒险和机会》，法兰克福，一九六六年，第一卷，第二十三页。
- [27] 虽然波劳克在前引著作第一〇九页中指出，从原料一直到最后成品的充分自动化生产过程，已经在下列这些部门中应用：钢管制造、石油蒸馏和炼制、玻璃器皿和纸张、饼干和冰激凌、香烟和军用枪弹以及面粉等等，但是，他还是认为，全面充分自动化的工厂仍然只占相当的少数。他指出了妨碍自动化普及的技术障碍：需要使生产相似并连

续、需要将生产过程区分为个别的、标准化了的行动等等。除了这些技术困难之外，显然还有经济上的困难，这些经济困难我们在上文已经简单地叙述过了。

- [28] 见约安·罗宾森：《资本的积累》，伦敦，一九五六年；黑克斯：(J. R. Hicks)：《工资理论》，第二版，伦敦，一九六六年，第六章；罗尔夫·古斯敦：《卡尔·马克思和约安·罗宾森论利润率的长期倾向》，博士论文，慕尼黑，一九六〇年。
- [29] 见安娜·卡特尔(Anne P. Carter)：《美国经济的结构变化》，哈佛，一九七〇年，第一四三、一五二页。莱芬逊前引著作，第一二九页；约翰·恩诺斯(John Enos)：《石油工业中的发明与革新》，载理查德·奈尔森(Richard Nelson) (编)，《创造发明活动的速度和方向》，普林斯敦，一九六二年，第三一八页；盖拉德·斯米士(Gerald W. Smith)：《工程经济学：资本支出的分析》，依俄华，一九六八年，第四二七页；波劳克前引著作，第一〇一页；马利乌斯·海莫尔(Marius Hammer)，《欧洲汽车工业的比较形态学》，巴塞尔，一九五九年，第六十九—七十页；“经济形势”，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第二十七页；阿曼，艾因霍夫、海尔姆斯塔特勒、伊塞豪斯特(Ammann, Windhof, Helmstadler & Isselhorst)，《战略发展与主要因素》，“纺织市场杂志”，一九七二年，卷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计年鉴：一九五二年、一九七二年》。
- [30] 在上列例子中，原料费用不包括在内。从理论上来看，设想这样一种局面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原料价格大大降低来补偿每个单位产量固定资本费用的增长，因而使得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保持稳定。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已经不能成为一种可行的建议了。一方面，原料的物质消费存在着长期不变的节俭，另一方面，用于主要工业部门的基本产品的费用，并没有长期的、绝对的降低，与此同时，固定资本费用与工资费用相比的话，也增长了。这明显地说明了资本有机组成的增长。
- [31] 在较短的时期内，可以使得机器廉价甚于消费品廉价的技术发展特殊延缓或进步，当然可以导致资本有机组成的停滞甚至衰退。贝拉·古尔德(Bela Gold)引美国钢铁工业为例，在那里，作为“总费用”(包括利润在内)的一部分，工资费用在高炉方面从一八九九年的8.9%降

到了一九三九年的 5.1%，但在这同一时期，工资费用在轧钢厂方面却从 17.1% 增长到了 21.4%：《管理经济学探索——生产力、技术、成本和增长》，伦敦，一九七一年，第一〇二页。有这样一个事实：边际利润的波动可能对下述结果发生影响，我们撇开这一事实不论，应当指出的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随着大规模自动化的应用，主要技术革命发生在轧钢厂方面。在一九三九年，每一劳动小时的固定投资费用只比一八九九年的水平高出 17%，但在一九五八年，却超过了一九三九年水平的 25%。

- [32] 保尔·斯威茨：《资本积累理论的一些问题》，“每月评论”，一九七四年五月，特别是第四十六——四十七页。
- [33] 星·巴吉查·敏纳斯 (Singh Bagicha Minas)：《因素费用和因素应用的国际比较》，阿姆斯特丹，第一〇二——一〇三页。
- [34] 善因·麦吉前引著作，第一五一——一五九页。
- [35] 卡尔·马克思：“理由简单就是，劳动生产率增进时，劳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固然会扩大，但它的价值，和它的数量相比来说，将会减低。因此，生产资料的价值绝对地说增加了，但没有和它的数量按比例增加。所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额的加大，同不变资本转化成的生产资料总量和可变资本转化成的劳动力总量之间的差额的加大相比，是更小得多的。后一个差额增大时，前一个差额会跟着增大，不过增大的程度是更小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六二三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一卷，第六八五页）。
- [36] 卡尔·海因茨·罗特和艾克哈德·堪佐：《无知和无力——在资本与科学相互关系之外》，柏林，一九七〇年，第十七页。
- [37] 下面的例子表明，这一数字例证远远不是言过其实，勿宁是言犹未尽：“传送带以及电感淬火机在汽车工厂中应用之后，代替了二十四个基本的或部分的技术操作功能，这些操作功能以前需要十五个工人总计十八个工，而新工厂则只需一个工人服务即可。”克鲁斯、康恩斯和乌尔曼前引著作，第二十一页。
- [38] 波劳克前引著作，第二〇二页。
- [39] 克鲁斯、康恩斯和乌尔曼根据经验认为：“对于旋转机器，大约有 75% 的限界价值，达到这一限界之后，日趋自动化的产量就会不成比例地高于资本费用。超出了这一限界价值，提高自动化程度就变得不

经济了。”前引著作，第一一三页。

- [40] 弗里曼：《电子资本商品的研究和发展》，载“国立研究所经济评论”，第三十四期，一九六五年，第五十一页。
- [41] 尼克在前引著作的第五十二页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在这里是跟随波劳克的（波劳克前引著作第九十五页），可是波劳克认为，自动装配机器本身就有可能包含着一种矛盾：“出产自动化机械的这种工业本身，主要需依靠体力劳动。”
- [4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二五八页（应为第二六三——二六四页——译者）（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二八八页）。
- [43] 当然，只有在国际规模上这才是如此。就理论上讲，可以想像的是，美国或西德的充分自动化工业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非自动化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而对其资本增值所必需的剩余价值加以垄断。实际上，这样一种形势造成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果，将会包含有不可估量的爆炸性。
- [44]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七〇五——七〇六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三五七页）。
- [45]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三三五页以下，已经说明了剩余价值不可能以与劳动生产力同样的比例增长，而且，剩余劳动的增长是与必要劳动的缩减成比例的，而不是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成比例的。必要劳动的这种缩减本身是有限度的，即使是提出象马克思在这些计算中所使用停滞无产阶级消费的那种假设。如果工人阶级的消费稍有增长的话，那么，这一限度当然就更加狭窄了。
- [46] 有人可能会反对，随着劳动小时数的减少，也就是雇用率的缩减，雇佣生产者按人口平均的实际工资并不需要在劳动生产力方面的这种高增长率以便保持稳定或有一个微弱的增长。对这一点的回答是：1. 劳动小时的缩减更甚于被雇佣人数的缩减，或者与被雇佣人数的稳定不变或略有增加是相一致的，因为，最终由于自动化所引起的劳动强度的进一步提高，会使得正常工作日的减少成为不可避免的；2. 生产劳动者的实际消费，必须要包括这一阶级的大部分，换句话说，它也要包括提早退休生产者的老年养老金、失业救济金、完成学业或完

成学徒期之后尚未就业的年青人的补助金。因此，随着创造其等价物的劳动小时的减少，确实可以预见到为了上述各条的实现而产生的生产力的很高的增长率。

- [47] 《一九六八年美国统计摘要》，第七一七——七一九页，载有包括直到一九六六年并包括这一年在内的情况。关于一九七〇年的情况系我们根据美国数字计算的，这些数字刊于美国官方的“每月劳动评论”，劳动部出版（一九七一年五月号）；关于西德情况，见《一九七四年年鉴》，波恩，一九七四年。
- [48] 安德流·格林（Andrew Glyn）和保伯·萨特克利夫（Bob Sutcliffe），《英国资本主义、工人和利润挤压》，伦敦，一九七二年，第六十六页。这些计算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批评，但迄今已经大部分被布尔吉斯（G. Burgess）和韦伯（A. Webb）的独立分析所证实：《英国工业的利润》，载“劳埃德银行评论”，一九七四年四月号。
- [49] 爱德华·奈尔（Edward Nell）：《美国的利润腐蚀》，格林和萨特克利夫所著《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一书美国版的导言，纽约，一九七二年。
- [50] 威廉·诺多斯：《利润份额的降低》，载奥孔（A. Okun）和波尔利（L. Perry）（编），《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集》，第一集，一九七四年，第一八〇页。
- [51] “企业”，13/10，一九七二年；非立普·泰姆普勒（Philippe Temple）：《一九五九——一九七三年生产利润的分配和物价的上涨》，载“经济与统计”，第五十九期，一九七四年。
- [52] 《一九七四年年鉴》，第七十一页。
- [53]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伦敦，一九六九年，第二六〇页（中译本，《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二卷，第八四二页）。
- [54] 参见马克思：“最后，我们从上面所发挥的历史观中还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纽约，一九六〇年，第六十八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第六十七页）。

- [55]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这一概念是生产的物质力量和劳动的物质生产能力所可简化的最后分析。他曾指出，社会生产力是在固定资本中加以测量的，并且以客观的形式存在于那里。可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六九四页。也可以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三二九页和六二一页。要想给生产力已经停止发展这一断言提供任何基础，就必须把“生产力”这一概念从唯物主义基础上分离，并赋与它以唯心主义的内容。比如说，这就是法国杂志“真理”（第五五一期，第二——三页）的编辑们所采取的步骤，他们把它与“社会个人的发展”混为一谈，而没有理会到这一定义不但与马克思的观点不相一致，而且还追溯性的美化了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按照他们的意见，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确实发展了生产力，因而也发展了“社会个人”。（关于马克思的对立观点，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七五〇页以及其他很多段落。）如果把“社会个人的发展”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公式：“社会个人发展的物质可能性”，那么，这一论点就会变得更加古怪。因为，谁能够严肃地来否认自动化扩大这些可能性，其规模远远大于机器在十九世纪所扩大的规模呢？
- [56]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伦敦，一九六〇年，第五十三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四十七页）。也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七〇八页。
- [57]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七〇六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三五七页）。
- [58]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伦敦，一九七一年，第二十一页（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二卷，第八十二——八十三页）。
- [59] 很明显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所指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推翻，而是总的一切阶级社会的推翻。他从来也不会把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历史时期（例如十六世纪荷兰革命的胜利、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胜利、十八世纪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胜利等），描述为生产力的停滞阶段或者甚至衰退阶段。
- [60] 布哈林：《转化时期的经济学》，汉堡，一九二二年，第六十七页。布哈林在他较晚近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汉堡，一九二二年）中，摇摆于这一问题的三种立场之间。他在第二八九页上写道：“因

此，当发展中的生产力之间发生了罪恶昭著的冲突，而生产关系的外壳已经容纳不了这种冲突的时候，革命就会爆发。”（着重点系著者所加）。在第二九〇页上，他继续写道：“这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如果社会要想进一步发展下去，必须无条件地将这些生产关系除掉。如果不能把它们除掉，那么，它们就会妨碍并堵塞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停滞或衰退。”但是在第二九八页上，他引用了他较早的著作《转化时期的经济学》，他在这部著作里已经宣称：“它（即指世界大战）那毁灭性的力量相当准确地指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并且悲剧性地表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之内，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彻底的不相容性”。（着重点系著者所加）。如果说在这些段落的第一个与第二个之间没有基本矛盾的话（毫无疑问，第二个指的是一个整个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并不就是说，生产力马上就停止发展，而只是说最终是如此），那么，第一个与第三个之间的矛盾，就是独出心裁的。列宁采取的立场是与第一与第二的结合相一致，而不是与布哈林的这些引文中的第三段相一致。

- [61] 关于在内战时期和战争共产主义时期俄罗斯生产能力的下跌情况的现实主义的 analysis，见辽·克利茨曼（Leo Kritzman）：《俄罗斯大革命的英雄时期》，法兰克福，一九七一年，第九——十二章。
- [62] 在高度工业化了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类型，很可能会更接近于按照下列已经经历过了的革命危机模型：西班牙（一九三一——一九三七年）、法兰西（一九三六年）、意大利（一九四八年）、比利时（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法兰西（一九六八年五月）、意大利（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秋季），而不会那么接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种“崩溃”危机模型。
- [63] 例如可参见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三届大会上的报告》中对英国生产力下跌情况的描述：“英格兰更加贫穷了，劳动生产力已经下降了。英国一九二〇年的世界贸易与战前最后一年的情况相比，至少下降了三分之一，而且在一些最重要的部门中，下降得还更多。……在一九一三年，英国煤矿工业供应煤的数量为 28,700 万吨；在一九二〇年则为 23,300 万吨，即不到 20%。在一九一三年，铁的产量达 1,040 万吨；在一九二〇年则为略多于 800 万吨，也不到 20%。”《关于世界经

济危机和共产国际新任务的报告》，载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一九一页。

- [64] 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一卷，第二一一页。
- [65] 托洛茨基在一九三八年所写的《第四国际过渡纲领》中的一句也是如此：“人的生产力已经停止发展了。”托洛茨基马上又说：“新发明已经不再能提高物质财富的水平了。”在过去二十年中，当“新的发明和改进”实际上明显地提高了物质财富的全面水平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来否认生产力的提高。
- [66] 比如可见希法亭和考茨基在社会民主党杂志“社会”上的论文，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二四年四月。
- [67] 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纽约，一九七〇年，第六十四——六十五页。
- [68] 在这一方面，引用一下戴高乐将军对多列士 (Maurice Thorez) 所起的作用和一九四四年九月以后法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作的评论就足够了：见《戴高乐回忆录》，第三卷，巴黎，一九五九年，第一一八——一一九页。
- [69]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三二五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二分册，第一〇三页)。

## 第七章

### 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和对 公司计划及经济规划的压力

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是晚期资本主义基本特征之一。这一缩短的直接根源是技术发明的加速，<sup>〔1〕</sup>反过来，这种加速又是资本重新分配的结果，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在直接生产活动中投资，而且越来越多地也在前生产领域中投资（研究和发展方面）<sup>〔2〕</sup>。资本主义要与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军备竞赛，这种竞赛并不受生产活动增值条件的局限，也不受科学发展内部逻辑的局限，这种竞赛的强制性是这种过程的促成因素。

但是，在资本主义历史的过程中，固定资本周转期缩短后面的决定性力量，毫无疑问是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在于“技术租金”，或公司与工业分枝部门之间的生产力差异性。对技术发明的连续不断的系统的追求和相应的剩余利润，成了晚期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大公司的标准的标志。<sup>〔3〕</sup>这种用“不同资本”对剩余利润的追求所采取对“一般资本”的形式是施加压力以降低不变资本的费用，并通过额外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提高剩余价值率。

第三次技术革命本身，既是加速技术发明和固定资本周转期缩短的根源，又是加速技术发明和固定资本周转期缩短的产物，它对于固定资本的生命期具有相反的物质技术反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提高了机器被使用的速度，另一方面也因为加速了机器

的报废。〔4〕

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在性质上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是老的工厂被新的工厂加速替代的总和，也就是说，是固定资本加速报废的一个过程。与此同时，它也代表了这样一种过渡：即从现有工厂循环维修的古典的操作法，也就是大体上只是每十年更新一次的操作法，向包含着不断发展、有时十分重要的技术发明在内的一般维修现代操作法过渡。〔5〕关于价值，可作如下表示：原来固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过程和额外固定资本的积累过程被严格地保持分离并在每个十年周期的开始时导向扩大再生产——生产技术的改变很少——而到现在，这两个过程一天比一天结合在一起了。简单再生产仍然在继续进行，并伴之以不断的技术革新，这样来促成扩大再生产，这可以较前为短的周期——比如五年的周期——导致生产技术的彻底更新。

固定资本周转期的加速，对于流动资本的周转期也有反响。一方面，它提高了对不断发展的投资活动的需求。这导致流动资本继续不断地再转变成为固定资本，并且加深了这样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无论如何并不是垄断资本主义天生就有的。这个倾向就是，一些公司把它们的全部资本转变成固定资本，而且，即使不是把它们在银行信贷的全部流动资本都提取出来，也是提取出了大部分。这对自我资助的公司也有反响，这是区分晚期资本主义与列宁所描述的古典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古典帝国主义是由全部资本所控制的。它对印制货币和信贷的银行的整个活动，也有影响，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将加以分析。〔6〕另外一方面，在进一步加速流动资本的周转期中，它提高了资本的利息，作为剩余价值额外生产的一个根源，这个根源变得更为重要了，因为固定资本周转期的加速提高了资本的有机组成，并从而给剩余价值额和剩余价值率的补偿提高，产生了额外的压力。其结果

是出现了所有资本主义过程的“加速”倾向，这一倾向本身表明了这样一种并行的现象：劳动过程更为加强，工人的消费更为“加速”（量方面的分化和质方面的降低）——也就是，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的加速。<sup>〔7〕</sup>

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可以用经验方面大量的证据来加以确证，而且，资本家和经济学家对此也讨论了很多。例如，马提森机械工厂 (Mattison Machine Works) 主席马提森 (Alan O. Mattison) 在美国国会自动化委员会上宣称：“机械工具的报废周期正处在从八或十年迅速缩减为五年的过程中。”<sup>〔8〕</sup> 在美国汽车工业方面，如果一家公司制造并销售某一类型的汽车至少达四十万辆的话，那么，在一年之内将专门为了生产这种新的汽车模型而制造的特殊工具和钢模的费用注销，这已经变成为普普通通的事了（这样一些工具和钢模的费用，典型地说可达一家美国大汽车公司固定资本总额的约三分之一）。<sup>〔9〕</sup> 据弗里曼 (O. Freeman) 报告，在电子资本商品工业中，“产品的寿命”是在三与十年之间，也就是平均六年半的时间，而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提到他那个时代机器的平均寿命为十三年之久。<sup>〔10〕</sup> 计算机的平均寿命短到了只有五年，而航海雷达，则为七年。<sup>〔11〕</sup> 在一九七一年，西德纺织工厂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机器（加倍宽带轮轴的苏泽尔模型），机器是一九六五年才使用的最新式装备（通常的自动轮轴机器而略改进）。<sup>〔12〕</sup> 据美国税务当局估计，从三十年代以来，机器的有形寿命总的缩短了大约 33%。<sup>〔13〕</sup> 这一数字受到了尖锐的批评，批评者中既有那些认为相应的摊提额太高的人（也就是认为它可以作为企业伪装其利润的一种手段），也有那些认为太低的人。泰尔保 (Georgo Terborgh) 举出了一些实际例证，他估计，螺丝机器的寿命从三十九年降到了十八年，“齿轮成形机”的寿命从三十五至四十二年降到了二十年，而蒸汽发电机的寿命，从三十年降到了

二十年。<sup>[14]</sup>台尔保所举出的都是具体企业的实例，不是整个工业的平均数，或所有制造业的平均数。在出产乙烯的最现代化的石油化学工厂中，固定资本的摊提，根据其规模大小，分别为四年至八年。<sup>[15]</sup>对固定资本的缩短寿命提出一般评论的太多，无法一一列出。下表列出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和六十年代——也就是大约四十五年来——的跌价标准，这个表对固定资本周转期的加速，提供了明显的证据：

固定设备生产估计寿命<sup>[16]</sup>

	A	B	C	D
	±1922	±1942	±1957	±1965
钢 管	30—60 年		15 年	
蒸汽锅炉	15—20		15	
水 量 计	20		15	
透 平 机	50		22	
酿 酒 机	25	15—20 年		16 年
工厂建筑	50—100	40—50		35
机 械 锯	14	10		
机 具	20			16
印 刷 机	40			16
木 工 机	33			20

固定资本周转期的这种缩短，产生了两方面的矛盾。一方面，它包含着一种特殊生产过程的准备期和试验期的延长以及修建厂房所需时间的延长。<sup>[17]</sup>这一矛盾是非常尖锐的，以致在一个特殊生产过程或者一个特殊工厂甚至在投诸大量生产之前，这种生产过程或工厂已经可以被认为在技术上过时了。<sup>[18]</sup>在另一方面，由于第三次技术革命而产生出来的生产工厂，所需要的资本投资，较之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所产生出来的那些工厂所需的资本

投资要超过很多。所以，这些庞大的资本额再加上一些工厂和产品范围的加速报废，使得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较之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或“古典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所冒的风险要大得多。

这些越来越多的风险，由于自动化生产技术上的特殊严格性而更趋增多了，这种严格性不允许在不断生产中有波动或在雇用人员上有波动，而这会危害企业的最低限度的利益的。<sup>〔19〕</sup>此外，研究和发展所需手段的总量，也使得尽可能精确地计算并预先计划这一花费，成为迫切需要做的事情——这些费用包括创造和销售新产品时所可能出现的间接费用。<sup>〔20〕</sup>这样一来，在晚期资本主义企业中，更精确的计划就出现了四方面的压力：

——在企业内部生产过程的精密计划方面，从自动化的特性中产生出来的压力；

——研究发展方面计划投资的压力再加上有计划的技术发明的压力；<sup>〔21〕</sup>

——计划来源于上述倾向的一般投资的压力；

——对一切生产因素作到成本计划性的压力。

自动化的工具——尤其是电子计算机——通过对数量庞大而又复杂多样的资料的迅速加工而使得一切领域中的细节精密计划，成为可能的。换句话说，自动工具使得对各种各样可能的操作方式中最理想的变数进行计算，成为可能。因此，PERT技术和C. P. M. 技术就开始被使用了——这些技术与其他电子信息处理机一样，其本身就都是军事研究的副产品。<sup>〔22〕</sup>

如果对销售没有保证的话，那么，对投资、筹资和成本的精确计划，自然便失去了意义。因此，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逻辑，就是驱使晚期资本主义的公司来计划它们的销售，以庞大的费用用于市场研究、市场分析、<sup>〔23〕</sup>广告和顾客的应付、商品的有计划的

报废（这很常见的是带来商品质量的降低）〔24〕等等。这一整个过程集中对国家施加了压力，以永久性的通货膨胀为代价来对经济中的摇摆状态加以限制。这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倾向性，倾向于国家对利润的担保，首先是通过越来越多的政府契约，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内的契约，然后通过技术上先进的公司的赞同。由国家担保大公司的利润的这种倾向，已经从生产和研究领域传播到了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领域，这种倾向是晚期资本主义另外一个关键性的标志。〔25〕

除了国家担保大公司利润这一倾向之外，晚期资本主义还暴露了对越来越多风险的第二个有特色的反应，这些风险是在加速技术上的发明和缩短固定资本的周转期的条件下，与庞大的投资计划连在一起的：企图创造出一个各种产品、规划和市场的不断的分化，〔26〕这种分化既在巨大的联合大企业的形成中有所表现，也在多国公司的建成中有所表现。〔27〕摊提额及其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表明了这些过程与固定资本周转期缩短的关系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给每一个企业创造了一种在竞争性斗争中落在后面的、几何上成比例的风险，因为，竞争的步伐随着斗争的步伐的加快而加快。与此同时，这一竞争的功能——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总额的再分配——由于出现了向充分自动化发展的各种趋势的压力的结果，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得多了。简单再生产与固定资本的日趋于再统一以及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产生了向规则的、调整了的摊提发展的强制性，也就是向计划摊提发展的一种趋势。这可用下面这一事实来表示：金融分析家们现在越来越多地使用现金流动这一概念来判断一个公司的稳定性——这是涉及到利润额和折旧费的一种概念。

如果固定资本每十年更新一次，那么，企业或公司的每年生

产中就只有机器价值摊提出 10% 的一种每年负担。如果由于商业情势欠佳并且公司的总收入减少的结果，机器价值的这个 10% 不能兑现，那么，这对其固定资本的整个再生产也并没有什么损害。这样一来，机器价值的这 10% 就必须分散在这一周期其余的九年中来分摊，或者每年的摊提负担必须从 10% 提高到 11.1%，也就是只提高机器价值的 1.1%。如果固定资本的周转期五年或甚至只有四年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单一年没有达到机器更新的生产补贴，已经足以从基本上削弱整个投资的计算，如果这并不意味着在所面临的周期中更新固定资本的彻底不可能的话。这样一来，每年摊提负担就从占机器价值的 10%，上涨到 20% 或 25%，而且，即使是有一年没有作到这种补贴，也必须把这 20% 重新分配在这五年周期中的四年中，换句话说，必须将每年摊提补贴从占机器价值的 20% 提高到 25%，或者说提高 25%（而在十年周期中则只有 10%）。如果固定资本周转期只有四年的话，只丧失一年的摊提补贴实际上意味着必须将机器价值的这 25% 重新分配在这一周期的另外三年中，也就是说，将每年摊提补贴提高到占机器价值的 33.3%，或提高 33.3%（而在十年周期中是 10%，在五年周期中是 25%）。如果没有例外的繁荣条件，这在正常结构中实际上是不可能作到的。在美国的汽车工业中，如果新的标准使“工具费用”的跌落能在二或三年实现而不是在一年实现的话，那么，利润率（按照“官方的”基础而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来计算）将会从 15.4% 降落到 11.4% 或 8.7%。<sup>[28]</sup>

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对于有计划的长期摊提或长期的投资计划是有天生的压力的。但是，长期投资计划意思就是总收入的长期计划，因而也就是成本的长期计划。但是，成本的长期计划本身并不能达到其所预期的目的，因为，实际上为了实现一个康

采恩所制订的总收入规划，只是计划成本和销售价格是不够的。销售也必须得到保证。因此，在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向经济规划发展的日趋扩大的倾向，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就与公司计划长期投资的限制相一致。这一倾向只不过是企图克服，至少说部分地克服下面两者之间的矛盾：一者是生产手段私有制所天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一者是对计划摊提和投资的越来越多的客观压力。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计划是个老问题，与资本中形式上包含了劳动这一问题同样老，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在资方统治下的基本劳动分工是从制造业时期开始的。实际生产过程越是变得复杂，它与十几个同时的过程结合越是紧密——这些过程包括流通领域和再生产领域的各种过程——那么，这种计划也就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是复杂、越是精确。关于企业内部计划的第一部严肃的著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写成的。<sup>[29]</sup>一旦必要的一套工具（概念方面的和机械方面的）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开始而趋于完成，这种企业内部的计划就可以向一个质方面更高的水平发展。

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曾在战争与贸易之间作了一个对比，而且他从一次战役的胜利中看出了一种类似于胜利交易的情况。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或者至少在其词汇和意识形态中，军事科学与经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颠倒的：有一个人现在谈到了大公司在制订它们的战略计划。<sup>[30]</sup>这是一个事实：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不再有任何疑问的是销售可以得到的商品，这些商品是以最高的利润、最高的速度生产出来的。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短期利润的增加到最高限度，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目标。<sup>[31]</sup>公司的战略目标是使长期利润增加到最高限度，在这种战略目标中，这样一些因素诸如控制市场、分享市场、商标的宣传、未来适应需要的能力、安全保障创造发明机会也即增长机会等，都变得比

立刻可以得到的销售价格或这种价格所代表的利润界限，要更为重要。<sup>[32]</sup>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无论如何不是对所有有关的情报的处理。恰恰相反，作出战略决定的必要性——从最终分析看也就是企业内部计划的紧迫性——正好表达了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中每一项经济决定所固有的不确定性。因此，使得计划成为可能的，并不是这样一种事实：在今天，从企业以外收集事物的最大量的情报资料较之以往都更为容易。使得计划成为可能的是资本家对他的企业中的生产手段和劳动者的实际控制，是资本家对最终可能从这一企业之外积累起来的资本的实际控制。<sup>[33]</sup>

在企业或公司的内部，并没有商品交换可言。有利的考虑并不能确定在一个汽车公司内相对于引擎或汽车底盘而言，究竟是生产较大量的车体呢，还是较小量的车体。<sup>[34]</sup>在一个公司内，劳动在下面这种意义上是直接社会化了：公司的总的计划——每礼拜、每月或每年生产若干辆汽车——直接决定了各个工厂、车间和输送带的产量。在同一公司的这些各种各样工厂或车间里，投资活动是由中枢确定的，而不是由每一个工厂的经理来确定的。因此，在公司内部，计划是名符其实的。

当然，这种计划也可能达不到它的战略目标；但是，它还是真正的计划。在下面两种情况之间有一种区别：一种情况是生产了一百万辆汽车，而其中百分之五由于需求突然跌落而销售不掉，另一种情况是，生产了一百万个车体和引擎，由于底盘的生产不足而有五万辆汽车不能装配起来。在第一种情况下，这一企业的外部环境——这些环境是否能预见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计划的目标有一种相反的影响。第二种情况则是计划欠周。从客观上说来，在个别公司的实际控制下，所有这些因素的真正协调是可能的，而且只是一个善于计划的问题。相比之下，长期利润最高限度化最终所依赖的、企业内部和外部一切因素的真正协调

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公司不能够——或者说不完全能够——控制企业以外的因素。这样看来，在企业内部（或公司内部）的计划与整个经济的规划之间，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中——或更进一步说：在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没有一个计划中心或计划当局可以任意控制现有的生产手段、已积累的资本和现有的经济资源，只有国有化了的那些企业可能例外。各种各样的公司或工业分枝根本不能按照有利可图的计算或期望来独立调度它们的资源。最后，以资本主义形式出现的价值规律——资方至少要获取平均利润并在这种平均利润之外追求剩余利润的紧迫性——在这里确定了资本从这个分枝到另一个分枝，或从这一公司到另一公司的流入和流出，因而也就确定了经济资源和生产手段。因此，没有一个通盘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规定出这样：假如生产出若干个汽车车体，技术经济协作因素需要生产同样数目的汽车底盘。在这里，资本的竞争、获利的期望和剩余价值的实际兑现，创造出了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中，私人的和工业上对煤的等量物的需求为  $z$  百万吨，但是在实际上煤是生产了  $x$  百万吨，煤的等量物石油生产了  $y$  百万吨，煤的等量物天然气生产了  $w$  百万吨，而  $(x + y + w)$  可以是明显地少于或者明显地多于需求量  $z$ 。因为，一方面汽车车体、底盘和引擎的生产取决于在一个公司内部的一个中心和一个所有主，而在另一方面，煤、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则取决于各种各样的所有主，他们的计算是以他们私人的或者特殊的利益为基础的。与工业公司相对比的话，这里根本没有对生产手段的集中控制。

因此，与今日工业公司内部（或者与明日推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的社会）的经济计划相对比的话，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划只能对各公司独立生产前景加以协调，此外干不了其他工

作，<sup>[35]</sup>而经过最后分析知道，这种生产前景是以商品的生产性质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以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和在不同的公司中所使用的劳动力的私人性质为基础的。这样一来，这种经济规划就不可避免地要受两个关键性的不稳定因素所困扰。

首先，它是基于这样一些投资计划和期望，这种投资计划和期望大多不过是经过与某些变量校正过的、对过去一些发展趋势所作的一些推测而已。如果市场形势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或者供与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预期不到的变化；如果有一种新产品意外地投入了市场并威胁到了“计划中的”也就是一个公司所生产的某种产品的预期的需求；如果出现了突然衰退；或如果周期出人意料地转向了“过度紧张”；那么，公司就会被迫突然改变它们的投资计划，或者是大大削减投资计划（也就是推迟投资计划），或者是突然扩大投资计划，也就是加速投资计划。除此之外，这些公司还会由于虚夸市场形势、销售倾向或商业周期而犯下错误；然后，这些公司还会由于延误了时日而不得不更加激烈地再度改变它们的计划以适应经济现实。

其次，不同的资本单位名义上在经济规划中加以协调了，但是这些单位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共同的利益，而是有不同的利益。当然，所有的大公司在想知道它们那最重要的供应公司和顾主公司的投资计划方面，都有共同的利益。到了最后，这成了奠定晚期资本主义经济规划的情报交换的客观基础。但是，这些公司并不是想得到这种情报，以便使它们本身来适应这种情报；正好相反，这些公司之所以想得到这种情报，是为了尽可能有效地来计算它们本身最大限度的私利，并且最终是为了尽可能有效地来战胜它们的竞争者的计划。因此，竞争和私人所有就意味着，正是由于情报是可以交换的，不同的投资计划之间的协调，就倾向于不起作用，这正是由于利用一个竞争公司计划的诱惑强迫它退却

的。所以，私有公司计划之间的协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两种含意：既有实际上的协调，也有对任何协调的否定。

晚期资本主义经济规划的基本不稳定性——实际上就是以个体公司所提供投资计划的协调来对未来全面经济发展所进行的预测<sup>[36]</sup>——是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预测性质的基础，而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是目标性质的基础。创造出这些预测的那些人并不具备能够看到这些预测予以实现的那种经济力量，也就是控制生产手段的那种力量。在这一方面具有特征意义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经济规划者在他们偏离了预测时想纠正这种实际发展所可使用的唯一的手段，就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政府对货币、信贷、赋税、对外贸易或公共投资活动等方面的政策有所改变。政府的这种政策的限度，将在下文论述。

绍恩菲尔德(Andrew Shonfield)对晚期资本主义所作解释的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混淆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划与资本主义之后的经济计划之间的基本差别。绍恩菲尔德举出了美国农业的例外情况，在那里，政府机构规定了要耕作的面积甚至要生产的数量——能获得多大的成功，那是另外一回事。看来绍恩菲尔德似乎并没有看出这些实践与各个公司中一种松散的“舆论”之间的差别，在那里，生产手段的私人控制是占主要地位的。这样一种舆论往往受到努力竞争的限制，换句话说，受到每一个竞争者向分别使利润最大限度化的强制因素的限制。几乎不令人吃惊的是，绍恩菲尔德把国际贸易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看作是战后长期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在对晚期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规划倾向所作的分析中，排除了国际竞争，并且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与世界经济的结合和国际竞争对于有效的国民经济规划，会产生出更多的障碍。<sup>[37]</sup>

毫无疑问，在生产计划和个别公司内部资本积累与整个经济

的规划之间，有某种既有技术性质又有经济性质的相互影响。由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所确定的、在企业内部精密计划和计算的需要，产生了技术工具和经济资料更加精确的登记的兴趣，这种工具和兴趣也可以应用于整个经济中。与由人来处理的那些技术，比如在一九一八年或一九二九年的那些技术相比的话，这一进步大幅度地提高了有效的社会主义计划的技术潜力。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晚期资本主义规划所固有的那种基本的经济不稳定性，对于各公司内部精密计划技术的应用，必然也有深刻的影响。成年累月的计算和试验、在研究和发展方面所支付的大量费用，可以由于市场的变化无常或敌对公司的一些决定而一下子成为毫无意义，而一个公司对这些情况既毫无控制力，也无能为力。预测的主要错误，属于同一范畴。直到现在，公共规划中心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种错误，有时候实际上造成自食其果的后果，例如加强了循环的不平衡性而不是期望的反循环的效果。<sup>[38]</sup>同样，私人投资量每年的广泛的波动，也跌入了这同一个范畴。经济规划和国家对经济越来越多的干预，决没有使这些波动消失；这些波动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循环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特征。法国是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的唯一国家，在法国，这些波动一直是非常明显的：

法国总资本形态每年增长率<sup>[39]</sup>

1954: 12.4%	1962: 11.6%
1955: 9.3%	1963: 3.2%
1956: 21.0%	1964: 9.6%
1957: 5.5%	1965: 4.3%
1958: 7.3%	1966: 9.3%
1959: 5.7%	1967: 5.6%
1960: 16.2%	1968: 7.4%
1961: 2.3%	1969: 10.3%

由于经济规划的影响总是不稳定，有时候甚至是非常的“粗鲁”，对晚期资本主义来说，所谓“社会规划”的计算就极为重要了。固定资本周转期缩短了，这迫使各个公司精确地制订计划并计算各种成本费。但是，确切地计划成本费用也就意味着确切地计划工资费用。对工资费用的确切计划又反过来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从所谓劳动力市场上供和求的波动中解脱出来的先决条件。这说明这种工资费用有向长期计划方面发展的一种倾向。

要做到这一点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长期的、有约束力的、集体的协定制度，这种协定在今后的岁月中可以消除有关工资费用的一切的不稳定性。但是，正常的晚期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使工人的运动和阶级斗争有最低限度的发展自由，在这种正常的晚期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中，这一解决办法最终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事实上已经证明是一种失败。<sup>[40]</sup>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潜在发展趋向的长波”时期，因为一种原因，劳动力市场的总的趋势，是倾向于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缺乏劳动力，以致使这一类的协议与市场规律发生了冲突。这种协议代表着一种企图，就是企图以相对地说有利的市场形势所提供的工资增加机会，来欺骗工人。在越来越多的工人通过他们的经验（变换工作的可能性、雇主付出的超过协议的支付以及有时候其他职业的诱惑）看来，这一点不可避免地越变越清楚了。到最后，甚至连只对来自下面的压力有部分责任的工会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工会会员在经验方面的这些发现的反响。这样一来，在雇主与工会之间“志愿”性质实际工资计划的不可能性，就变得越来越清楚并让位给了国家调停的一种倾向。“政府的收入政策”或“一致的行动”，也就是对约束“工业双方”的工资增长率的宣布，越来越取代纯粹契约性的长期协议。

但是，使得长期集体协议注定失败的这些同样的规律和力量，

也同样使得“政府收入政策”注定失败。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很快就发现，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对于工资和工资的增长，完全能够作出计划并加以控制，但是，对于商品价格的增长或者其他一些阶级的收入，首先是对于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企业的收入的增长，它却不能保持类似的控制。这样一来，“政府收入政策”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工资政策”——换句话说，是人工地限制工资增长的一种企图，此外什么也不是。<sup>[41]</sup>所以，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保护自己而反对欺骗他们的这种特殊的方法，正象他们曾经反对工会的那种志愿自我限制法那样；他们靠给工会施加压力和“非正式的罢工”或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办法，以便典型地至少来争取将劳动力商品的出卖与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加以调整，当这些条件相对地说有利于出售者而不仅仅是这些条件不利于他们的时候。

这样，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为大公司所需要的对工资费用的中期和长期计划，就需要下列二者之一采取措施：或者是远远超出了工会的志愿自我限制法之外的资产阶级国家，或者是依赖与工会官僚主义合作的“政府收入政策”。为了取得最低限度的功效，必须对于工资的水平 and 工会工作的自由加一个法律限制，并且对罢工权利也加以法律限制。如果劳动力的缺乏现象，也就是说实际上的充分就业局面——这种局面对于大资本并不是好事——能够避免的话，而且与此同时产业后备军也能重新形成的话，那么，上述措施将会在实际上有某种临时的效果，在美国，从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的通过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的情况，就确实是如此。

于是，工会机器与国家相结合就将有进一步加强的出现，这种加强在古典的帝国主义时期就已经有所萌芽了。<sup>[42]</sup>在这一方面，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在给持续不断地损害着每一天的利益的一种机器支付应付款的时候，越来越丧失尽了一切利益，而工会

的群众基础也遭到了破坏。但是，由于工会机器以这种方式与国家相结合，资产阶级并不想惩罚它而是想奖励它，那么，工会会员费的丧失肯定就中性化或者得到补偿。这样，整个过程的逻辑结果就是雇主最终强制收集应收费用，也就是强收工会会员的费用。然后，我们将会看到自由工会组织公开转变成为国家工会组织、工会会费转化成为赋税，并且工会机器转变成为政府官僚系统的一个特殊的部，这个部的特殊任务就是“管理”劳动力这一商品，正象国家机器的其他那些部分别管理建筑、飞机和铁路那样。<sup>〔43〕</sup>但是，由于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决不会简单地接受这么一个过程，并且，为了使劳动力商品的出售者获得可能的最高价格，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还将在劳动力商品的出售者与购买者之间建立起私人的或“非法的”介体，那么，这么一种国家工会体系将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但对罢工权，而且还对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和出版自由没有一种越来越多的被动和主动约束——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种实际的限制的话。<sup>〔44〕</sup>因此，在确定劳动力商品的价格的时候，消灭劳动力商品的出售者与购买者之间的斗争的这种倾向，在对基本的民主自由带有决定性意义的限制或废除方面，必然最终会达于极点，也就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强制制度。

但是，如果工会会员越来越多地为他们自己的创制权而奋斗并且重新建立了工会民主，工会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成功地逃避了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进一步的结合，并且又回复到坚决保卫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的直接利益的情况，那么，工会不但能砸碎大公司内部对成本和工资费用的确切计划，而且也能消除资产阶级政府所表示的经济计划的任何可能性。于是，工会必然会不但越来越严重地与个别的公司和企业发生冲突，不但与雇主联盟发生冲突，而且与政府、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发生冲突。因为，大公

司利益与政府在货币、金融、贸易方面的政策所缠结的日趋增长的程度，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特性危围以内的。于是，这一种冲突就会不可抗拒地演变为以工人的一方，以资产阶级和资产国家为另一方的双方的力量的考验，因为资方必然会再一次企图尽可能地来限制或镇压工人组织的活动——这一回也包括“官方的”工会在内——因为工人组织的活动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所以，这一方案也是如此，整个过程将以对罢工权利、对集会、结社、游行、出版的自由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而终结——如果资方取得胜利的话。

在雇主一方，他们是想把产业后备军的暂时消失所造成的结果转变为对他们有利，而产业后备军的暂时消失在改变劳动力商品的出售者与购买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职业评价、计时工作以及时间测量法等等一类的技术〔45〕，其设计目的都是要将工资个别化以倒转劳动力商品的集体出售倾向（这是工会存在的正当理由），换句话说，就是再一次将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加以分散并在这些人中间再引进竞争。但是，这些企图是胜利还是失败，反过来说主要还是要看资方和劳方之间的现有的力量对比关系。〔46〕

固定资本周转期缩短的倾向与工会行动自由的限制，两者相结合澄清了一个比较一般的规律：晚期资本主义天生地要加强对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一切因素的系统的控制，这种系统的控制，如果没有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整体的越来越加严密的组织，那是不可能作到的。这一规律的主要动力之一是经济力量强大的集中，集中在每个国家的几十个大公司和金融集团的手里，并且集中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总数中的几百个大公司和金融集团的手里。经济势力的这种类似于社会政治势力集中的大集中所给出的压力，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被鲁多尔夫·希

法亨描述为整个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种特殊面貌。他在他所著《金融资本》一书的结语中写道：“经济势力同时也就意味着政治势力。控制了经济，与此同时也就保证了能控制国家的强制手段。经济领域中集中得越高，大资本对国家的控制所受的限制也就越小。结果形成了国家一切行动工具的紧密结合，这似乎是国家权力的最高的发展，国家似乎就是维持经济统治的看不见的工具。但与此同时，政治力量的征服看来就是经济解放的先决条件。”〔47〕

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更进一步的推动力量是与这种一般趋势结合在一起的。向确切的成本计划和预示性的经济规划发展的趋势，我们已经在上文描述过了。有了这种趋势，就不但必须要紧紧控制工资水平或工资费用，而且也必须控制资本再生产的一切因素：“经过规划的”研究和发明；对原料有组织的研究；新机器的有计划的设计；技术劳动力的遥控的、有计划的再生产；有指导的工人消费；在国民收入或国家生产总额中预先确定的私人消费份额；等等。但是，由于这一整个发展过程本身对无产阶级就是一种客观的教育，教育无产阶级要把阶级斗争推向企业以外，推向整个经济方面，因而也推向政治方面，所以必须要注意这样一些大量的事实，这些事实是晚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特殊目的而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收集起来的，这些事实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到达工人那里，或者只是以一种零碎的、意识形态的和神秘的形式到达了工人那里，既掩盖了阶级控制的实际情况，也掩盖了剥削的实际情况。为了这个理由，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组织、管理和标准化功能，必须伸展到整个上层建筑，尤其是要伸展到意识形态领域，其永远目的是冲淡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这些趋势所流行的实际程度；这一制度最终不能取消或掩盖

其客观上的各种矛盾，这一情况对这些趋势获得成功所加限制的程度；以及斗争中各阶级之间客观上的势力关系——当然，这种势力关系部分地要依靠晚期资本主义对尖锐危机的客观倾向来确定——最终也形成主观上的阶级关系的程度；所有这些情况都将在本书下文加以探讨。<sup>〔48〕</sup>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各公司和企业内部向彻底计划和组织方面发展的趋势，对资产阶级的结构和经济管理本身的性质，必然会发生反响。在企业和公司内部实行确切的计划和计算的紧迫性和在不变资本中造成最高限度节约的紧迫性，促使晚期资本主义垄断集团引进更加完善的、科学的组织方法。<sup>〔49〕</sup>远为更加技术化了的劳动分工取代了旧的工厂等级制度。这产生了这样一种幻想：一个公司的管理的官僚主义化，相当于资本功能的一种实际的官僚主义化——换句话说，相当于控制生产手段的、由经理、董事、工程师和大大小小的“工头”组成的日渐扩大的一支部队的一个越来越大的代表团。<sup>〔50〕</sup>

现实与这一种外表是完全不相一致的。企业和公司管理的根本的技术化和合理化，代表着两个相对过程的辩证的统一——一方面是决定细节问题势力日趋发展的代表团，另一方面是决定资本发展关键性问题的势力的日趋集中。从组织上和技术上来看，这一点表现在“多分工的”公司，<sup>〔51〕</sup>而且也表现在这种强制中，即为了考虑到对公司全面有利而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格地把当局的代表团强制置于从属地位。<sup>〔52〕</sup>从资本积累过程照技术观点分离出来的“直接生产过程”的指导倾向，是随着合股公司的出现而最早出现的，这种倾向，马克思曾简短地描述过，恩格斯曾进一步评论过，这一倾向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变得更加广泛了。<sup>〔53〕</sup>实际生产技术，或者说在实验室进行的科学研究、市场研究、广告和分配，都能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的自动化。但是，不论哪个公司，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有利性——换句话说，就是已积累资金总额

的增值。如果这种增值是不充分的，那么，这个公司对生产、研究、广告和分配的整个规划，就可能被作废而没有主要的股票持有人，这些股票持有人控制着行政委员会，他们本身就服从于工程师、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市场研究家的那种“特殊的知识。”的确，这个公司甚至可以卖掉、暂时关闭或者最后解散，而这些“经理”、技术专家和细节控制者，谁也无能为力。决定细节问题的势力的代表团与决定有关资本增值问题的集中势力之间的统一，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对立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资本的规定关系，也就是处理最大量资本的能力，是最终的主宰。有些人为公司的“官僚主义化”或“技术结构”控制的论点进行辩解，这些人的错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混淆了使用力量的技术环节和它的经济基础——这种力量的真正来源。

在加速发展时期，大公司相对财政独立问题（自筹资金率很高）与这样一个问题相混淆了：即握有股票的大资产阶级与公司管理人员之间的所谓利益冲突问题，在这个时候，“经理”这一整个概念的成问题的性质，就变得十分明显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相比的话，公司自筹资金率的增长，是一个事实——这是它的周期性限制。但是，这与经理和大股东之间的利害冲突，是毫无关系的——这些大股东对于提高他们的股份价值的兴趣，要比提高股息的兴趣高得多。在今天，几乎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大股东进一步继续控制着美国的经济<sup>[54]</sup>——即使说他们还没有正式需要干预公司的日常工作。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有必要记住，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中，只有财产——持有资本——能够最终保证收入和力量，经理本身对于取得股票财产，也是极为感兴趣的。确实不错，上层经理正是以这种方式爬上了通向资本持有者本身的统治阶级的社会阶梯上。例如，购买可选择股份的技术，就是达到这种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果这一种方法由于美国的

财政技术性而成了问题，那么，它的功能就必须用其他的手段来完成。<sup>[55]</sup>

固定资本缩短了的周转期的真正结果，机器加速废弃的真正结果，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智力劳动重要性相应提高的真正结果，都是资本主要所有主活动着重点的一种转移。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年代，这一着重点主要在直接生产领域；在古典帝国主义年代，这一着重点在于积累领域（金融资本的统治）；在今天，在晚期资本主义年代，这一着重点在于再生产领域。<sup>[56]</sup>

生产领域和积累领域已经变得大部分都技术化并能自我调节了。客观的科学规律促使这些过程发展得或多或少都很“平稳”。在从一九四五——一九六五年的“低调扩大长波”中，大垄断资本已经习惯于通过价格来筹措投资，而不需要银行信贷的帮助。正是由于这种总的原因，确定细节的势力才能作被当作专家的代表，因为，大垄断资本只是需要保证已经预先确定的生产过程的无麻烦操作。<sup>[57]</sup>未来的关键领域和垄断公司、操纵市场少数公司的命运就在于选择，而不是在于对这些生产过程的经营——换句话说，就是决定什么样的生产将要发生，在哪儿发生，怎样发生，更精确一点说，就是扩大再生产将要在哪儿、怎样进行。正是因为加速了的技术发明、加速了的物质生产手段的废弃和缩短了的固定资本周转期在再生产领域中所创造出来的不稳定性，大于在古典帝国主义时期的或古典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不稳定性，所以，在这一领域中所作出的选择就构成了真正有战略意义的决定，这些决定确定了公司的生死存亡，并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通盘的经济趋向。资本的真正主人，公司的大股东、工业巨头和金融集团，为他们自己保留着这些决定而无需任何代表。<sup>[58]</sup>

结果，各个不同私人公司经济计划之间的真正协调的不可能，并不是由于——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sup>[59]</sup>——技术

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连续性，而是由于这样一种事实：对个别公司说来是理性的行为，可以导致甚至周期性地必然会为整个经济导致非理性的结果。整个经济生产的最高限度，不能简单地就是工业公司利润最高限度的总额。对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经济发展那不可超越的不稳定性和不连续性应当负责的，并不是这样的技术进步的不连续性，而是在受私人最高限度利润——也就是私人财产和商品生产——所控制的私人公司内部的那种技术进步的不连续性。

在这个意义上，在公司内部制订计划的紧迫性与不能超越“象征性的”、在通盘经济中的经济规划这一情况之间的那个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特征的矛盾，只不过是一般矛盾的更尖锐的一种表现，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存在于经济过程某些部分的计划了的组织（工厂内部的生产、公司内部的处理等等）与整个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之间，而又被价值规律所控制：“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60〕部分有理性<sup>①</sup>和整体无理性之间的这一矛盾，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达到了它的极点，这一矛盾是理解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我们将在我们的分析中加以说明。〔61〕

## 注 释

〔1〕 这一问题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2〕 工业资本中研究和发展费用总额，在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不到一亿美元增长到一九五三年的二十二亿四千万美元，和一九六三年的五十五亿七千万美元。这并不包括国家的费用。见埃德温·曼斯菲尔德(Edwin Mansfield)，《技术变化的经济学》，伦敦，一九六九年，第五十五页。莱芬逊认为，研究和发展（因而不只限于工业）私人支

出总额在一九六八年为一百七十亿美元，在一九七〇年为二百零七亿美元。

- 〔3〕 拔德康采恩(Budd Concern)的副总经理在这一方面是很明确的。“值得采用的任何一项革新，都应该有比‘正常’利润差额显然更多的利润差额伴随着它”；阿荣·盖尔曼(Aaron J. Gellman)，《市场分析与销售》，载毛利斯·哥尔兹米斯(Maurice Goldsmith) (编)：《技术革新与经济》，伦敦，一九七〇年，第一三一页。
- 〔4〕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渐加快的了的机器速度，参见汉索格·鲁克尔(Hansjorg Reuker)：《自动化对加工件和机床的影响》，载《德国工程师协会进度报告》，第一辑，第八期，一九六六年十月，第二十九——三十页；萨尔特尔前引著作，第四十四页；克鲁斯、康恩茨和乌尔曼前引著作，第五十九——六十页，等等。这一增快了的的速度是向自动化发展倾向的主要力量之一，它反过来又以使生产过程不依赖于最慢的操作步伐而大大地提高了生产过程的速度，这种操作步伐一直左右着传送带上的劳动。参见皮叶·纳维尔：《论劳动的社会学》，第一卷，巴黎，一九六一年，第三八〇——三八一页。马克思对机器劳动问题的讨论是在，比如说，《资本论》，第一卷，第四一二页，和第三卷，第二三三页。
- 〔5〕 尼克前引著作，第十七页。
- 〔6〕 参见本书第十三章。
- 〔7〕 参见本书第十二章。
- 8〕 引自《自动化——探讨中的方法》伊洛，日内瓦，一九六四年，第二十七页。
- 〔9〕 劳伦斯·怀特(Laurence White)：《一九四五年以来的汽车工业》，哈佛，一九七一年，第三十九、五十七——五十八页。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三十一卷，柏林，一九六五年，第三二九页。这封信的日期是，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 〔11〕 弗里曼(C. Freeman)：《电子资本货物方面的研究和发展》，载《国家研究所经济评论》，第三十四期，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号，第六十八页。
- 〔12〕 阿曼—艾因霍夫—海尔姆斯塔德勒—伊塞豪斯特前引著作，第三十页。

- [13] 据估计，“装备服务生命”在制造业中一九六一年要比一九四二年短34%。阿兰·扬(Allan H. Young)，《公司利润跌落的几种可选择的估计》，第一部分，载“当前商业研究”，第四十八卷，第四期，一九六八年四月，第二十页。也见这同一文章的第二部分，“当前商业研究”，第四十八卷，第五期，一九六八年五月号，第十八—十九、二十二页。据乔治·雅西(George Jaszi)计算，固定资本(包括建筑物在内)的实际平均持续时间，在美国制造业的情况是：从一九四五年的12年减少到一九五〇年的10.3年、一九五三年的9.4年和一九六一年的8.5年；“当前商业研究”，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 [14] 乔治·泰尔保(George Terborgh)：《商业投资政策》，华盛顿，一九六二年，第一五八、一七九页。
- [15] “国家研究所经济评论”，第四十五期，一九六八年八月，第三十九页。尼克在前引著作第五十九页中指出，化学工业的固定资本每五—六年更新一次。
- [16] 系列A：渥蒂耶科(P. Wojciechow)，《摊提标准和财产估计》，引自赫尔岑斯坦因《Gibtes gro sse Konjunklurzgklen?》，载《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一九二九，第二卷，第三〇七页。系列B：美国国内税收局第六号公报(一九四二年)，财政折旧费的基础。系列C：西德财政部的决定，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确定了折旧标准。系列D：雅克·迈里斯(Jacques Mairesse)：《固定生产资本的估价》，见国立统计和经济研究所集刊，系列C，第十八—十九期，一九七二年十一月。
- [17] 很多著作都估计，在一种实际发明及其用于有效生产之间，有十至十五年。埃德温·曼斯菲尔德在前引著作第一〇二页中，引用了弗朗克·林所作的估计，这一估计认为，在一九四五—一九六四年这一时期，一项发明及其商业化之间的间隙，可以估计为十四年，而在一九二〇—一九四四年期间则为二十四年。
- [18] 尼克前引著作，第二十页。
- [19] “在日趋自动化所包含的越来越多的资本支出，意味着依赖时间的费用的增加和企业灵活性的减少。由于有一种不断的生命期限问题，也就是有不断的每年折旧率问题，那么，投资于生产手段方面的资本越多，使流动资本变为固定资本的资本也就越多，如果后者变得呆滞并

且生产能力过早地受到限制的话。这样一来,由于自动化结果造成的对资本需求量的提高就支配了对生产手段的全面应用。包含在自动化中的依靠时间的资本支出的提高,只能用最高的使用强度来对付。”克鲁斯、康恩茨和乌尔曼前引著作第四十六页。

- [20] 宾宁(K. G. H. Binning):《有计划的主要研究和发展的不稳定性》,载但宁(B. W. Denning)(编):《共同的长期计划》,伦敦,一九六九年,第一七二——一七三页。
- [21] 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在六十年代中期,在西德曾争论过的大公司,有75%每两年或三年制定一次投资计划,33%的大公司是每四年或更多制定一次。“投资”首先发生在所有的长期计划中。见贝莫尔(Bemerl)、邦豪夫(Bonhoffer)和斯特利格尔(Strigel):《怎样制订工业计划?》,载“经济危机”,第十九卷,第一期,一九六六年四月,第三十一页。也见“为了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在莫尔克已经感觉到为我们的增长和操作制订一个五年前景计划,是很必要的。”见安东尼·瑙波尔(Antonie T. Knoppers):《革新的管理观点》,载但宁(编)《共同的长期计划》,第一七二页。
- [22] 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宇宙飞船追踪技术在民用工业交通的电子计算机技术方面,已产生了类似进展,例如,使用洲际弹道导弹41,800型电子计算机来分析化学工厂的溶剂或者在汽车工业中对脱离装配线的汽车进行“质量检查”试验。见“泰晤士报”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 [23] “对已经存在的市场进行市场研究;市场分析确定有没有市场存在。”阿莱·盖尔曼前引著作,第一三七页。
- [24] 例如在万斯·派卡尔德(Vance Packard):《废物制造者》(伦敦,一九六三年,第六章)中对人为的商品废弃现象的讨论。
- [25] 见厄尔奈斯特·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第五〇一——五〇七页。
- [26] 关于公司的多样化战略,参见海克曼(Nikolaus Heckmann)前引著作第七十一——七十六页;安索夫(H. I. Ansoff)、安德森(T. A. Anderson)、瑙尔顿(F. Norton)和威斯顿(J. F. Weston):《通过合并的多样化计划》,载安索夫(编)《商业战略》,伦敦,一九六九年,第二九〇页。

- [27] 关于这些复杂问题，参见本书第十章。
- [28] 劳伦斯·怀特：前引著作，第三十九页。
- [29] 劳曼 (Al. Lohmann)：《企业与经营的经济计划》，柏林，一九二八年。
- [30] 海克曼前引著作，第四十二页。贝莫尔·邦豪夫和斯特利格尔前引著作，第三十页。也见安索夫（编）《商业战略》，阿尔夫利德·钱德勒 (Alfred D. Chandler)，《战略与结构》，等等。
- [31] 加尔布雷思的《新的工业国》（伦敦，一九六九年）的基本错误之一，就是他忽视了把利润扩大到最大限度的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差别。在本书第十七章中，我们将再来讨论这一问题。
- [32] 高尔东·犹德尔 (Gordon Yowdall)（编）：《作出管理决定》，伦敦，一九六九年，第九十一页。贝莫尔、邦豪夫和斯特利格尔前引著作，第三十四页：“市场的预期和赢利性的考虑，对企业的长期计划有最大的影响。”
- [33] “所需的一部分情报指的是企业内部的过程和条件。这些情况的方便程度和企业从而变得明朗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企业本身的经营管理。”贝莫尔、邦豪夫和斯特利格尔前引著作第三十二页。当然，资料的取得要依赖对生产手段的控制而不是其他办法。
- [34] “赢利性的计算”是在公司内部作出，或个别部门在工厂内部作出，这是可能发生的。然后，这些又可用来衡量这一部门经营管理的相对效率。例如参见麦利特 (A. J. Merritt)：《收入、捐税、经营效率和计划》，载但宁（编）《公司长期计划》，第九十一—九十一页。但是，这是一种虚构的或模拟的一种赢利性，因为，这些部门并不具有独立的资本，而且，在这些部门中的投资，并不依靠“赢利性”，而是依靠公司的全面战略方面的计划。
- [35] “（在法国）计划的指导原则是用结合钢铁生产商的供应和销路以发展其典型活动的方式，把这些相互依赖的效果总和，结合到整个经济中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市场研究的工具，就是“经济学图表”，这是由弗朗索瓦·奎斯奈 (Francois Quesnay) 设计、列昂捷夫修订，由格鲁森改编使适用于法国的。其程序是在现代化的委员会中进行一致的协商。……一种协作关系可以通过占统治地位的工业集团的影响，间接地发挥作用。……正是对它们互相有利，预测的一种对抗和私人

部门的决定，才在公共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皮叶·马塞 (Pierre Masse)：《计划或反冒险》，巴黎，一九六五年，第一七三页。

- [36] 单独进行过市场研究的一些个体公司可能会发现，关于输入的供应和输出的需求两方面的市场状况，不值得公司有任何扩大。这种评价在那种结构内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一个受尊敬的计划团体建立起一个目标，比如说扩大10%，那么，不论是个体或是集体，都很容易就达到这个目标，当然要把以外的部门除外。……日本的计划“预测到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将会怎样来采取行动，如果每一个商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在微观标准和宏观标准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考虑到了国内和国外一切重要的经济因素和可能性，并且在那之后，来使其行动尽可能完善化。这样，这种计划就可以预测到作为整体的日本经济以及部分的日本经济的最佳行动将是如何。……简言之，在日本，一种计划的执行或贯彻主要依靠这一计划“预告的效果”，而经济计划部门只是作为一种顾问，而不是作为一个董事在工作。”比达前引著作，第五十七、五十九—六十页。
- [37] 绍恩菲尔德：《现代资本主义》，牛津，一九六九年，第二三一—二三二、二五五—二五七、二九九—三〇〇页。
- [38] “一九六二年有一项计划，要使经济增长4%，但是结果如何呢？经济并没有增长4%，结果在电力工业、钢铁制造工业以及其他很多工业中造成了过多的资本设备。”但宁（编）前引著作，第一九七页。关于瑞典经济计划的错误预测，参见霍尔格尔·海德 (Holger Heide)：《瑞典的长期经济计划》，图宾根，一九六五年。
- [39] 一九六三年的资料：《一九六三年国家计算的报告》，一九六四年以后，只包括生产部门，雅克·迈里斯前引著作，第五十二页。
- [40] 达成长期工资协议的倾向，在美国、西德、比利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倒转过来了。
- [41] 皮叶·保希 (Pierre Bauchet) 承认，法国的工会领袖们限制了工资的提高，而与此同时，官方的价格指数是伪造的；政府并不是处在控制价格提高的地位上，也没有提到控制未分配公司利润，因此，并没有一种“共同牺牲”，皮叶·保希：《法国的计划化》，巴黎，一九六六年，第三二〇—三二一页，我们附加一句：这项结果是一九六八年五月的。

- [42] 早在一九四〇年，托洛茨基为了工会与资产阶级国家搞联合，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趋势：见《在帝国主义崩溃时期的工会》，载《托洛茨基论工会》，纽约，一九六九年。
- [43] 在西班牙的所谓“垂直工会”，是“工会机器”这样一种功能的典型例子。
- [44] 一九七〇——一九七四年保守党政府在英国议会强行通过了“工业关系法案”，这项法案使得未授权的人，包括报纸，号召罢工成为非法的。
- [45] 例如：《计件工资制度》，苏黎世，一九七〇年；伯纳·迈尔 (Bernard Meier)，《工资和生产制度》，鲁塞恩，一九六八年；以及汉斯·迈尔 (Hans Mayr)、纳特·温伯格 (Nat Weinberg) 和汉斯·波恩什莱格 (Hans Porschlegel) 的贡献，载《自动化——冒险与机会》，第二卷，法兰克福，一九六五年。
- [46] 见统尼·克里夫 (Tony Cliff)，《雇主的攻势》，伦敦，一九七〇年。安东尼奥·莱蒂厄利 (Antonio Lettieri) 分析了这样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导致在意大利国营意大利西德尔钢铁托拉斯最近签订的劳动协定中（一九七一年签订），废除了职业评价；安东尼奥·莱蒂厄利，“社会主义问题”，第四十九期。
- [47] 鲁多尔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第四七六页。
- [48] 见本书最后一章。
- [49] 弗里德里希·波劳克前引著作，第二八二页；鲁斯 (Reuss) 前引著作，第四十八——五十一页；威廉·怀特 (William Whyte)，《驯服的成员》，伦敦，一九六〇年；等等。
- [50] 资本“官僚化”的理论一点是近四十年来的时髦问题，这一理论从贝利 (Berle) 和米恩斯的著作《现代公司与私人财产》，纽约，一九三三年，中间经过詹姆斯·波恩哈姆 (James Burnham) 的《管理革命》，直到加尔布雷恩的《新的工业国》，在本书第十七章中有更详尽的论述。
- [51] 参见阿尔夫利德·钱德勒：《战略与结构》，纽约，一九六一年。
- [52] “现代管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对大公司赢利性的控制（有效的计划），假如这些大公司在现代条件下受极端强大势力的约束的话，这种强大势力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公司赢利性集中控制向解体的道路上发展，其结

果是公司变成了(或一直是)互相冲突的势力集团与功能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失于控制的和无效的一种联合。”麦利特前引著作,第八十九页。

- [5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八〇、五一四——五二六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二七——四二八页。
- [54] 多姆霍夫证实,1%的美国成年人在一九六〇年占有着所有公司股份的75%——比一九二二年或一九二九年的比例要高(那时是61.5%)。一个参议员委员会甚至计算出,美国家庭的0.2%控制着所有这些股份的三分之二。威廉·多姆霍夫:《谁统治着美国?》,纽约,一九六七年,第四十五页。在一九六〇年,在232家大公司中有141位董事会董事占有的股份,足以控制他们的康采恩(第四十九页)。也参见菲迪南·隆德伯格(Ferdinand Lundberg):《富豪与超富豪》,纽约,一九六八年,隆德伯格也尖锐地抨击了管理至上的观念。
- [55] 关于这一点,参见巴统(Arch Patton):《股份选择不复存在了吗?》,见“哈佛商业评论”,一九七〇年九月十月号;也见绍尔利·帕特森(Shorey Paterson)的文章,载“经济学季刊”,一九六五年二月号,第十八页。
- [56] “新近的一项报告观察到,有四十多个美国职业的工业经理管理着欧洲九个很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他们访问了数以百计的工业企业。……他们发现了极其多的例子,在那里,主要的经理……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基本功能是为未来制订计划。”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商业与管理问题》,巴黎,一九五四年,引自古德曼(Goodman)前引著作,第一八八——一八九页。
- [57] 海克曼前引著作,第八十五—八十八页。也参见麦利特:《收入、捐税、经营效率和计划》,载但宁(编):《公司长期计划》,第八十九——九十页。
- [58] 海克曼在前引著作的第六十三页中,区分了企业长期计划的头两个阶段(企业目标的建立和“最理想的竞争战略”)和第三与第四个阶段(行动计划的制订和计划的试验与修订)。头两个阶段属于“上层管理”的权限之内。第三和第四阶段就不是单单公司的上层管理人员所能控制的了,即使他们有权决定最终的决定的话。

- 
- [59] 参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三七三一、三七六页)中对这一论点的讨论。
- [6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二三页。
- [61] 参见本书第十六章。

## 第八章

### 技术革新的加速

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与技术革新的加速是紧密相关的。前者往往只是后者的一种价值表现。技术革新的加速，确定了机器废弃的加速，这又反过来迫使使用中的固定资本的替代加速，并且因而缩短了固定资本的周转期。<sup>〔1〕</sup>

技术革新的加速是科学系统地应用于生产的必然结果。虽然这种应用是扎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中，但是，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史中，它决不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不断地、平稳地拴在一起的。恰恰相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它最初是非常缓慢地渗透进那一生产方式的，而且并没有构成有历史意义的机器发展的基础：“活劳动为资本所占有，从这一方面来看，也在机械中获得了直接的现实性：一方面，是直接从科学中产生的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底分析和应用才使得机器能够作出劳动者从前所作的同样的工作。但是，遵循这一条途径发展起来的机械，只有在大工业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而且全部科学都被抓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才会出现；另一方面，也要现存的机械自身已经能够提供大量的财富。在这种情形下，发明将会成为一种职业，而且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将成为对于生产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对它发生极大的鼓舞作用。不过，这不是机械发明一般所遵循的途径，更不是在各个生产部门里机械所赖以改进的途径。这条途径是分析——通过分

工，早已把劳动者的作业一步一步地转变为机械的作业，因而达到一定地步以后机械设备便可以代替劳动者。（为着节省动力。）可见，这里所出现的是直接把一定的工作方式从劳动者那里转移于采取机械形态的资本；经过这种转移，劳动者自身的劳动能力，便贬值了。因此便发生了劳动者对于机械的斗争。本来是有生命的劳动者底活动，现在成为机械底活动。”〔2〕

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是对这些条件的光辉的预见：这些条件只是在很晚以后才发展成，那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开始之后，随着科学和技术上创造发明的加速而发展成的，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而发展成的。在这种形势之下，“所有的科学都被迫来为资本服务”，而且，“发明成了事业的一个分枝，科学在直接生产方面的应用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前景，这种前景既确定了科学，也在请求科学的帮助”，这种形势只能发现科学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特殊应用。很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早期就没有发生过在科学上有决定意义的发明。更不是意味着在那个时期的发明活动是与资本“不相干”的。然而，作为一个特殊职业而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种系统的研究与发展组织——换句话说，在研究与发展方面的独立自主的投资（在固定资本和工资劳动方面）——其完全独立出现，那只是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事情。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弄清，这两个问题需要分别加以分析：智力劳动的固有的发展趋势，能够导致发明的加速出现；资本增值的特殊条件能够导使加速了的创造发明加速地应用。“科学技术上的创造发明”与“技术革新”这两个范畴，并不是一码事。〔3〕技术和科学上的发明的一天天加速，取决于科学、劳动和社会历史上一系列的互相影响的因素。〔4〕第二次科学革命是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是随着量子物理学、爱因斯坦（Albert Ei-

nstein) 的相对论、原子能研究和现代数学的基本进展而发展起来的, 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历史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在科学活动的加速方面计算机的功用、这种活动的指数增长率及其越来越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组织, 其功用也都是明显的。〔5〕第二次科学革命产生了一个科学的下层建筑, 这一下层建筑逐渐转化了一切科学, 正象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伽里略(Galilei Galileo)和牛顿(Isaac Newton)所带来的科学革命, 开创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整个的古典机械学和化学一样。正象古典物理学给从蒸汽机到电动马达的完整的一系列技术应用提供了一个基础那样, 第二次科学革命也同样给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以来的完整的、一系列技术应用, 奠定了基础, 到核子能、控制论和自动化的出现, 达到了顶点。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原子研究与核子能和自动化在技术上的应用联系在一起, 有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 这是不证自明的事实。

发明加速化的客观条件,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的战后重新武装, 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由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九年这一阶段, 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减速阶段——一个“停滞低调的长波”——两次大战之间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技术革新放慢下来了,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创造发明的初步加速, 而这是第二次科学革命的结果。〔6〕其结果是给尚未应用的技术发现或潜在的技术革新创造了一个保留的条件。于是, 建立起来的军备开始吸收这些发明中的大部分, 甚至为这些发明创造了先决条件。很明显, 我们首先想到的, 是原子弹这个例子, 但是这个例子决不是这类意义深远的例子中仅有的例子。〔7〕雷达、电子装备的微型化、新型电子部件的发展甚至确实还有数学在经济组织方面的首先应用——“操作研究”——所有这些都战时或军备经济中, 有其根源。那个所谓的公司计划的协作模范——在这个模范中, 各种规划所造

成的总的结果，超过了每个个别规划可以预见到的部分结果的总额——也是并行于或者来源于军事规划。<sup>〔8〕</sup>将科学研究工作系统地、有意识地组织起来，其目的是加速技术革新，这也是在战时或在军备经济中开创出来的。<sup>〔9〕</sup>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工业研究实验室的数目，还不到一百个，但是到一九二〇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二百二十，而且此后一直维持这个水平：“有组织的研究的信心，由于战时的胜利而增强了。”<sup>〔10〕</sup>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这些由公司控制的实验室，数目大大地增加了，到一九六〇年，总数达到了五千四百个。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总数，增加了四倍，从一九四一年的 87,000 人，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 387,000 人。<sup>〔11〕</sup>

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面，研究份量的稳步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专业化和“自动化”。首先，研究和发展工作变成了大公司劳动分工中的一个单另的分枝。此后，它们也许会采用一种独立企业的形式；私人操作的研究实验室产生出来了，这种实验室把它们的创造和发明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sup>〔12〕</sup>这样一来，马克思的预言就被证实了：发明变成了一种系统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事业。

同其他的事业一样，“研究工作”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一个单一的目的：使企业的利润增加到最大限度。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研究和发展工作的巨大发展壮大，这本身就已经证实了它对资本主义的严格的“有利性”。<sup>〔13〕</sup>事实上列昂捷夫评论道：“关于一般的生产条件，有组织的研究工作与其他任何工业没有什么区别。一个人建成了一个实验室，安装了必要的设备，雇用了胜任的人员并等待着成果。这些成果与其他任何产品一样，或者是由生产它们的这同一单位直接使用，或者是出售给别人——以一种价格出售，或者象通常发生的那样，两者兼而有之。”<sup>〔14〕</sup>西尔

克(Leonard S. Silk)曾有这样记录：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本都流向了研究和发展工作，因为在那里，“它从所花费的钱中赚到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高的平均利润率。”〔15〕这与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是完全相一致的，在这种逻辑下，技术租金已经变成了剩余价值的主要源泉。

较之“纯粹研究工作”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实际上的工业革新，也就是发展新的产品或者新的生产过程。技术更新的加速越大，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越利害，新的生产过程的使用也就越多，而且，实际上整个新的生产基地的建设，变成了劳动分工中的单另的一件事情。这样一来，充分装备起来的工厂的供应，随着制造过程、技术上的“实际知识”、专利和特许以及至为重要的专家的齐备而趋于完善，这种供应就变成了资本投资或资本输出的一种新的形式。在化学工业方面，这已经是固定资本更新的一种主要形式。从组织上来看，再生产与生产彻底脱离了；其技术实现，留给了专门的公司。〔16〕应当强调指出，主要投资方案的计划和发展所包含的时间长度以及为此所需要的技术人员数目，如果被一个公司所雇用的话，就会导致对工匠人员的不连续的使用。“在敦刻尔克(Dunkirk)的乌辛诺炼钢厂(Usinor Steel Plant)规模扩大了一倍，生产能力从每年产四百万吨提高到八百万吨，需要一千五百人的一个研究小组工作三年，还没有把建筑公司相应的服务计算在内。建筑福斯(Fos)开旷地的索尔摩尔炼钢厂(Solmer Steel Plant)面对着更大的问题，为了类似的生产能力，所需的研究计划队伍，人数甚至更多。这些队伍的绝对规模及其不规则性使得工厂建筑公司不可能在一种持续的基础上来雇用这些人。……这是使用特殊的工程公司的第一条原理，而特殊工程公司的基本使命是为这些投资制订计划和规划。”〔17〕

直接投资于生产领域的资本会导致持续的商品生产，或持续

的增值。投资于实际生产之前或实际生产之后的研究与发展领域的资本，<sup>[18]</sup>其所达到的增值，只能视在那里所使用的劳动力是生产性的程度而定，这也就是说，导致一种新商品的生产。从资本主义企业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不能应用的创造发明，都是生产的杂费或企业的一般管理费，而这些费用是应该降低到最低限度的。但是，既然在一种市场经济中，从一开始就根本拿不准应用新的创造发明是不是可能，那么，在研究工作领域中所投资本在利润方面的冒险，较之一般的要大。这是在这一领域中大公司占有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sup>[19]</sup>在研究和发展方面费用的数量和增长情况，可以从下面这些例子中看出来：发展尼龙需花一百万美元，发展奥纶需花五百万美元，发展盘尼西林需花几百万美元，发展石油催化“裂化术”需花一千一百万美元。大不列颠的皮尔金敦玻璃公司 (Pilkington Glass Company) 在发明和发展漂浮玻璃的专利方面投资了两千万美元。美国的一些专家们认为电视是“五千万美元的一种赌博”，这是因为电视在商业化之前所花费的研究和发展费用太多之故。在航空工业方面，研究和发展费用达到了天文数字的高度：到一九六五年，XB-70型喷气式飞机已经花费了十五亿美元，康克德型 (Concorde) 花费了二十亿美元。<sup>[20]</sup>在制药工业方面，研究费用通常高达占周转金总额的8—10%，尽管这一数字中只有一部分是用于基础研究的。霍希特 (Hoechst) 制药厂声称，研究和发展一种新的药物要花费多达两千五百万美元；霍夫曼—拉—罗希药厂 (Hoffmann-La Roche) 一九七三年用于研究和发展费用总额相当于其周转金的11—16%。这些庞大的资本支出的基本刺激物，仍然是这一情况：如果一个公司获得了一个“突破”，那么，它就可以得到高于平均剩余利润的利润。<sup>[21]</sup>

与其他生产性资本一样，在研究工作领域中所投的资本，是

由固定部分和可变部分构成的。固定资本包括实验室的建筑和设备，可变资本包括所雇用人员的工资和薪金。这些雇员中很多人的劳动只是在非常晚的时候才结合进了特殊商品的价值中——或者从来就没有结合进去——这一种事实并不能改变那些在研究和发展方面从事工作的那些人的总的劳动的性质，这种研究和发展工作在这样的意义上是生产性劳动：它对于新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不可缺少的，因而也对交换价值的生产是不可缺少的。对工人也同样是如此，这些工人必须把他们每年的劳动时间拿出一部分来开动机器，找出并擦洗仪器，并且还得作必要的修理。<sup>[22]</sup>这也决不会改变他们那劳动时间的性质。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些手续而想保持生产进行，那就与在机关或实验室里没有模型、公式、图纸和准备工作等等一样，是不可能的。马克思经常强调指出，工业资本的性质除了其他可说明者之外，还可以用它对劳动分工的利益或科学在生产上应用的利益的无偿占有能力来加以说明，<sup>[23]</sup>他明确地认为，研究工作者和工程师的劳动，性质上是生产性的。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从《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引了一节，在这一节中，马克思明确地把技术专家包括在生产劳动者之内；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他写道：“自然，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sup>[24]</sup>

投资于研究工作的资本是否能够增值，这种不肯定性代表了——尤其是在一个技术革新加速的时代——对计划研究工作的越来越强烈的刺激。正象在从事商品出售的任何其他部门那样，这种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在公司的范围内也是如此——被这样一些冲击所困扰：即机会、武断和对当前倾向的非科学的推断。<sup>[25]</sup>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部门，制定计划的紧迫性是清清楚楚的。久克斯、萨渥尔斯和斯蒂勒曼(Jewkes, Sawers and Still-

erman) 试图反驳这样一种论点：技术革新的加速，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是由于研究和发展工作的系统的组织。但是，他们所表明的不过是，即使在十九世纪，一些发明与科学知识和科学进步的关系，也比通常所认为的要更加密切，而且，即使在今天，个体的发明家对通常认为是革命的一大批发明，也是有功劳的。<sup>[26]</sup>但是，他们的论证与下列事实根本没有矛盾：除了其他的之外，从专利来看，出自工业公司实验室的那些发明，在整个发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sup>[27]</sup>或者说，受过科学训练人员数目的迅速扩大，是科学知识和技术革新增长的必然结果，即使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直接是成比例的。<sup>[28]</sup>把夸大了的重要性与“有发明才能的个人”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著作家，当他们指出下面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的论证是比较有力的：即他们指的是越来越多的对有创造能力的活动的不利因素，这种因素是来自被垄断集团所控制的研究工作的那种讲实际定方向的性质，是来自这种研究工作要服从于共同追逐利润这一情况。非常明显的就是，知识和本源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产生出来，并且象消费品那样，以相同的自动调整而产生出来。这并不是反驳研究工作的协作的一种论据——但是，这肯定是对服从于追逐利润的协作的一种反驳。

晚期资本主义的另外一个典型的矛盾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大的垄断集团从来也没有完完全全脱离开竞争，因此，他们也经常有兴趣把一种新产品作得完善，并且比他们的竞争者更早更大量地把新产品投向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毫无疑问有兴趣将在他们控制下的研究和发展工作加以扩大。但是与此同时，在考虑一项花费巨大的研究计划时，他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些固有的冒险：一是他们在研究出一种有贸易价值的新产品中可能得到完全失败的结果，二是竞争者的一项同时的革新可能把他预期的剩余利润的实现化成泡影，所以，在投资于研究和发展工作费用的资

本从“正常的”利润中获得增值之前，最终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将要取得暂时垄断的一种不同的产品，会产生更多的利润。这就是大公司那复杂的革新策略的一种说明，这种策略驱使这些大公司既要区分它们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纯粹为了资本增值的缘故，又要限制它们的发展。在这种意义上，久克斯、萨涅尔和斯蒂勒曼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他们说，垄断资本最终阻碍技术的进步，即使这必须以相对的方式而不是绝对的方式来理解。<sup>[29]</sup>

晚期资本主义的研究与发展费用有一个全面的大增长：在美国，从一九二八年的不到一亿美元增长到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的五十亿美元，从一九五九年的一百二十亿美元增长到一九六五年的一百四十亿美元和一九七〇年的二百零七亿美元。<sup>[30]</sup>这些增长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革新数量的提高，即使这些费用的利润会逐渐地减缩，而这些利润在五十年和六十年初期是很高的。美国制药公司曾有一个减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制药公司享有“技术租金”从十七年到十年，而接踵而来的是剩余利润率的降低。<sup>[31]</sup>这是否意味着随着军备的永久组合，在民用工业——尤其是第 I 大部类——中的技术革新的加速，也将取得一种永久的性质呢？不，决不是如此。资本增值的条件仍然是晚期资本主义动力学中的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科学和技术领域中各种发展，掩盖不了这些条件。加速了的技术革新最终意味着平均劳动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但是，只有在主要市场扩大的条件下，劳动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才能与相对高的社会生产增长率或相对高的就业水平结合在一起。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市场扩大的一些原因：第三次技术革命和以简单电动机为基础的生产技术向电子学、自动化和核子能方面的过渡。

一旦这种大变动爆发了，而第 I 大部类的一个新的部门也已

经形成以制造自动化机械和机器的联合体，那么，第 I 大部类的增长率就要开始下降，与之同时，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率也开始下降，因为，在第 I 大部类中已没有任何基本的更新生产，只有现存生产技术<sub>在量方面的扩大</sub>。这样一来，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有停滞低调的长波”。在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使得剩余价值率突然增长的那些十分特殊的条件，也使得过剩资本重新流入生产，成为可能。但是，随着“低调扩大的长波”的停止，日趋增高的资本有机组成，在资本增值的条件中引起了情况的恶化。如果这一过程继续下去，那么，就必然会毫不客气地导致投资活动的衰退。因此，从增值方面到兑现方面的各种同时的过程，就会趋向于阻碍革新活动的发展。结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第二阶段，发明与革新之间的差距就会再一次增大。为了这种缘故，为莱比锡大学一个“作家集体”和其他很多东德作家所重复的伯纳尔 (J. D. Bernal) 这种论点：在我们的时代，科学已经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是站不住脚的。<sup>[32]</sup>科学活动只有当它与物质生产直接相结合的时候，才是一种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就意味着：看它是否能注入商品生产活动。如果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是由于保守或影响到资本增值的那些困难的缘故——那么，它就只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而不是真正的生产力。<sup>[33]</sup>

研究和发展工作的大踏步前进，已经使得对掌握高级技术的智力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幅度地增长了。因此就出现了“大学爆炸”；它反过来又伴之以智力受过训练的劳动力候补人员(学徒)的大幅度供应，这可以用较高的生活水平和个别的社会促进来加以说明。在美国，到五十年代末期，二十岁至二十四岁这一年龄组的人，已经有 32.2% 在接受高等教育，在新西兰为 16.2%，在澳大利亚和荷兰为 13.1%，在阿根廷为 10%；从那时以后，这些百

分数迅速提高。到六十年代初期，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大不列颠、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十五岁至十九岁的人中，有75%以上完成了中等教育。<sup>[34]</sup>

这种“大学爆炸”所引起社会变化的最吸引人的结果是，至少在美国，可能一些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如此，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人数，如果不是学生人数，超过了今天的农场主人数或农民人数。

### 高等教育的增长<sup>[35]</sup>

		1950	1965	1980 (预测)
美国	(a) 单位千人	2297	5570	
	(b) 年龄组%	20%	41%	58%
日本	(a)	400	1085	
	(b)	5%	12%	23%
联合王国	(a)	180	432	
	(b)	5%	12%	20%
法国	(a)	187	524	
	(b)	6%	17%	31%
西德	(a)	135	368	
	(b)	4%	9%	24%
意大利	(a)	241	405	
	(b)	6%	11%	24%

科学智力劳力这种增长的标志——这是由科学知识的累积增长、研究和发展工作引起并最终取决于加速了的技术革新——就是知识分子与生产活动的大幅度的再结合和智力劳动进入生产领域。既然这种智力劳动之再引进生产过程，是适应晚期资本主义技术的直接需要的，那么，智力工作者的教育问题也必须严格地从属

于这些需要。其结果就是古典的人文大学的危机，这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错误，不仅仅是由于形式上的理由（学生数目过多、物质基础结构的落后、学生社会背景的变化等，这些在大学方面都要求一种超过一般水平的社会费用）；也不仅仅是由于全面的社会理由（避免出现一个失业的知识阶层的意图；制止学生造反的意图和为了操纵群众而跟上科学的意识形态化的意图），而且还特别是由于直接的经济理由。这种理由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对智力劳动的性质是特有的，适应大学结构的紧迫性、学生的选取和教学大纲的选择，以适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加速了的技术革新。<sup>[36]</sup>大学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培养“受过教育的”有判断能力的人和**有产者**——这一理想是适应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的需要的——而是为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而培养智力方面有技术的靠工资维持生活的那种人。

智力劳动大规模增加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反过来又产生了一种新的矛盾。一方面，商品关系内部化的制度给个人造成一种自由选择的幻景，在这种制度中，智力工作者大规模地引进“研究和发展”领域，仅仅靠直接的强制，那是作不到的。所以，晚期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设法使青年进入有关的科学和技术领域（在这一方面，从连环漫画、儿童读物和电视到科学幻想小说等大量的手段，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肯定，这种发展也必须适应客观的、全面的社会需要，而不是仅仅适应大公司为了竞争和赚钱的短期方向。人们多年来一直在咒骂阻碍或限制个人发展的手工操作体力劳动，科学和技术的累积发展在使人们从这种情况获得解放方面，创造了强大的潜力，这种科学和技术的累积发展本身，也很自然地在向今天的青年们呼吁，而今天的青年们也本能地感觉到了这种解放的功能。

但在另外一方面，这种对更高的资格、大学教育和智力劳动

的普遍需要，不可避免地要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意图发生冲突，而资产阶级国家是要用专家政治对高等教育加以改革，以便使智力技术的生产从属于资本增值的需要。资本所需要的，并不是大量的高级智力劳动者。资本所需要的是越来越多但数量又有限制的智力生产者，这些智力生产者具有特殊的资历，并在生产过程或流通过程中有特殊的任务来完成。<sup>[37]</sup>科学的积累性发展越大，研究和发工作加速的程度越快，那么，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劳动分工的增长过程、私人利益的合理化和特殊化——换句话说，劳动的持续不断的分裂——也就越是深入到智力劳动和科学教育中去。于是，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枝就开始发展起来，这个分枝的职责是对于教育经费的“物质产量”进行分析。<sup>[38]</sup>不用说，其“有用性”与满足总的社会需要，也就是使用价值的生产，是毫无瓜葛的，正象以商品和交换价值的生产为基础的任何其他政治经济学分枝那样。其所指出的有用性只是以大工业公司利润最大限度化为基础的现存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以内的那一种。<sup>[40]</sup>同样很清楚的是，这些计算并不是简单的“纯知识”的理论性研究，而是要帮助来为高等教育的专家政治改革打好财政政治方面的基础，这种高等教育的改革是专门来提高其在这一意义上的有用性的。

为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所特有并且从属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应用科学——从属于垄断集团的利润最高限度的分裂了的科学：这就是晚期资本主义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战争口号。在本章开头我们引用的马克思的话，已经变成了现实：如果科学在直接生产方面的应用，既确定了这种生产，也要求了这种生产的话，那么，发明就变成了一个分枝部门，而且，各种科学都变成了资本的囚犯。但是，从全面的社会观点来看，也就是从靠工资维持生活者和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来看，使得这一领域中每一次“大踏

步前进”具有进步意义的，正是这种科学和技术潜力的解放。因此，一种新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就在下述两者之间产生了：一方面是科学的积累增长、最大限度地占有它并传播它的社会需要，对当代科学和技术普及的日趋增高的个人需要；<sup>[41]</sup>在另一方面则是晚期资本主义固有的倾向，即倾向于使科学成为它那利润事务和利润计算的一个俘虏。

这一冲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一般矛盾的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扩大中的社会财富与日趋严重地异化并贫困化的劳动之间的一种矛盾，只要这种社会财富是被私人占有所束缚。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矛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高等教育越变成为特殊劳动过程的一种资格，那么，智力劳动也就越变得无产阶级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转化成了一种商品，而且，智力劳动力这种商品也就越是要在一种特殊的“智力和科学资格的劳动力市场上”出售，<sup>[42]</sup>而且，这一商品的价格就越是倾向于被迫降低到它的再生产条件，在特定时候为适应供和求关系而围绕着它的价值在波动。这一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越是进一步发展，那么，这种劳动分工就越是更深刻地在科学内部变得地位巩固，并且不可避免地要伴之以越来越多的过分专业化和“专家白痴”，而且，学生也就越要变成一种盲目教育的囚犯，这种教育是严格地从属于资本增值化的各种条件的。智力资格和智力劳动越是变得分裂，异化中的大学教育就越是要归并入异化了的智力劳动中去，这种智力劳动在资本的控制下也归并进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过程中。这就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传播的学生造反的基本社会经济基础，也是其在客观上反资本主义的运动的一个标志。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垄断集团设法在生产和再生产的一切领域中建立控制，或者是通过国家的代理人，或者

是通过“私人主动性”。

这样，国家和主要的垄断集团在可以预见到的情况下正在试图对在资本控制下智力劳动的包含过程取得组织上的“掌握”，方法是“规划”大学的数目、大学课程的范围和分配大学学生接受各式各样的训练。有些制订计划的人已经为将来的“强制再训练”，也就是定期取消智力合格的工人的资格，制订了计划；所谓“预制的综合性大学”的规划，就是一个例子。所有这些计划都包含着一个永久的“*numerus clausus*”，以保证为了资本的增值而对学生的分配能有必要的选择。当然，这些计划对真正的文化发展的“掌握”与资本主义经济计划所提供关于真正经济发展的准确预测是不相上下的。在另外一方面，这样一种“计划”当然证实了学生生活和智力劳动的异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于智力上合格的劳动力的增加了的需求，决不局限于生产过程的需要。在当前，智力劳动的发展有双重的性质，这种双重性质是与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的两种基本发展趋势相适应的——一方面，由于技术革新的加速，固定资本的周转期较短；另外一方面，对社会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各个方面急于要求得系统的控制。智力劳动之一天天与生产过程相结合，是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前一个特征相适应的；智力劳动一天天与上层建筑的制度和生产力的管理（包括工厂管理和劳动力的“管理”在内）的结合，是与后者相适应的。<sup>[43]</sup>

与生产过程相结合的、在智力上合格的劳动力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与管理制度和上层建筑制度相结合的、智力上合格的劳动力所处的社会地位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不能够降而成为那些个人之间或集团之间的区别，这些集团的物质存在是奠基于剩余价值的创造，和从剩余价值中接受收入的那些人，尽管毫无疑问，这一条区分线在确定智力上合格的劳动力那每一个特殊

部门的社会利益方面，是起了作用的。但是，有决定意义的区别仍然是结构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生产领域、行政管理和上层建筑每一个专业集团的特殊地位在其意识的形成中所具有的。

所有这些集团都从职业上参预了从劳动力商品中榨取剩余价值或以劳动力保留不变资本的监督活动，这些集团的社会地位，典型地导致出它们的功用与企业家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总的完全一致。甚至还可以这么说，这种完全一致就是这些集团在工厂或在社会上的特殊功能表现的先决条件。系统地同情工人并与工人团结一致的那些时间和动力专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是不能好好从事他们的工作的；如果他们不能胜任来量测时间或动力的话，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失业；换句话说，他们不得不要么改变他们的态度，要么改换他们的职业。法律方面的官员如果协助政治犯人逃跑，就没有什么机会谋到一种职业并且会失掉他们的工作。同样情况最终也适用于工厂的医生、工厂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交通手段的管理人员、资产阶级警察的指挥员以及国家机器的其他一切高级官员。相比之下，那些智力上合格而又从事直接生产过程或者再生产过程的工人们，或者其社会功能不一定与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的阶级利益发生冲突的那些人——例如人寿保险公司的医生或受雇于地方当局的社会工人——更不会主观地站在资方的阶级利益那一边，他们更为可能的是站在无产阶级阶级利益这一边。在资本积累的各个领域和在上层建筑中，包括管理工作领域本身在内，日趋技术化、专业化和合理化等可以导致智力上合格劳动者中两个集团的增长。当然，大学里的专家政治改革家们希望利用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物质分工，以便分离并重新结合有造反精神的学生团体，而且毫无疑问，他们能够部分地达到他们的目的。在另外一方面，学生造反的标志之一正是反对过分专业化、反对不科学的、有缺陷的教育制度。设法克服“专家白痴”，

就是争取对社会总体有所了解。如果他们在大学中获得了这样一种理解，那么，胜任的工业医生、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中层行政人员，甚至实际上包括法官，就可以暴露、动摇并威胁这种制度。比如说，医生就可以拒绝把疾病诊断书限制到这样一个数目，这个数目适宜于企业家的赚钱理由，并且可以以保护靠工资维持生活者个人健康为理由来特别关怀这些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换句话说，医生按照一个诚实的医生来工作，而不是象一个资方的代理人那样。

既然这种“革命的职业实践”仅只局限于少数几个工业医生，那么，结果他们就会失掉他们的职业。在另外一方面，如果越来越多的医生都想从资方这种控制中自我解脱出来，那么，在这一特殊的劳动力市场的力量关系，就会变成这样：即刻的辞退可以被制止。这样一种发展前途在主观上的先决条件，将是保有革命的社会信念（这种信念可以从大学中获得），并且拒绝任何一种与资产阶级社会的逐渐合并。对于这样一种职业方面的战争性在客观方面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是参加一个革命组织，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因为，革命的职业实践，难免是一种部分的实践。这种实践只有当它在整个社会革命实践中扎下了根的时候，才能保持在政治上是革命的。

将这种分析扩大到智力上合格的劳动者的一个特殊的阶层，那是很有趣的，这个特殊阶层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那些人。总的说来，这一阶层还不能算作生产性劳动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是它增加了个人的和社会的劳动能力的潜力——换句话说，即使是它对于一种特殊商品的形成，也就是合格劳动力这一商品的形成，作出了生产性的贡献。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客观地说，教师是工资劳动者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44〕而他们能觉得他们是属于这一阶级的，因而也就相应地办事。如果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工会组织，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如果这种情况导致主观上支持无产阶级的事业的话，那么，在这里，“革命的职业实践”对于削弱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也能够作出重大的贡献。支持资产阶级国家的教育制度，可以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来取代。青年人可以被鼓励进行独立思考，并且在集体团结中进行活动，而不是被训练成为驯服的臣民，成为受个人成就意识形态所支配的、受过训练的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这样一种实践必然会导致与统治阶级的尖锐的冲突，而且最终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工作方式也不可能调和，这是不证而自明的。

这样，从科学上看合格的劳动力及其归并入资本主义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较之其刚刚出现时，具有潜在的、更为普遍的性质。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科学在双重意义上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它提高了人们从被奴役到阶级剥削、商品生产和社会劳动分工中获得自由的物质上的可能性。它也潜在地有利于工人从上层建筑操纵和意识形态异化中解放出来。要把作为物质财富来源的科学作为革命意识来源的科学加以分离，那是越来越变得困难了，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所有的科学都越来越变成了资本的囚犯，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则起来造反以反对他们所受的束缚。<sup>[45]</sup>这种造反可以局限为一种专家政治的性质，有两个人试图表达这样的类似看法，在西方是加尔布雷思(Galbraith, J. K.)，在东方是罗布尔(Eugen Lobl)，他们把科学家描绘为物质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因而也是经济和国家的天然管理者（也就是客观的统治者）。<sup>[46]</sup>但是，这同一种造反也可以取得一种激进的、不调和的性质，如果这种造反与工人运动融合在一起，也就是与解放整个劳动力的革命斗争融合在一起的话。

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以其加速了的技术革新及伴随而来的智力

合格劳动力的大幅度扩大发展，驱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达到了极度。劳动的社会化也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因为整个社会和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全部积累的结果，越来越变成了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领域中每一个特殊生产过程的直接的先决条件。随着全面自动化的完成，这一点将实际上得到实现。这种社会化了的生产的私人占有，会导致这样引人注目的矛盾：人类所具有的这种大规模的科学技术“资本”，是从属于实际资本增值的种种条件的，并因而远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或者只是以一种歪曲了的、零零碎碎的形式而接近于他们。只有当生产力最终摆脱了围绕着他们的那一层私人占有的外壳之后，大部分至今仍沉睡于当代科学中的那些革命力量才能够被充分利用来服务于劳动力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

是不是智力上合格劳动力的日趋引进到实际生产过程中，会随之带来越来越多的不合格的体力劳动，以致使智力方面的工资劳动者与无产阶级相结合的趋势，会荒谬地遇到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之间越来越多地发生冲突这样的障碍呢？从经验上来回答这一问题，那是很困难的，因为，有几种矛盾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肩并肩地在发生着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分枝的不平衡的发展，而且，职业方面的统计只是给出了这些分岔过程的总的数字。对全球结果的分析表明，越来越工业化引起了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数的绝对增长，而越来越自动化则引起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数缩减；越来越机械化和半自动化在既损害了技术工人，又损害了非技术工人的情况下增加了半技术工人的数目，〔47〕而充分自动化则缩减半技术工人的数目，并且还产生了一种新的、技术高超的多价工人势力。〔48〕尤其是受自动化发展影响最深的那些生产分枝，比如说化学工业，已经露出了在劳动力总数中技术工人数字的上升，而不同于平均趋势。在充分自动化了的工

厂中，工人与机关雇员之间的差别，大部分已经失掉了意义，并且在契约和处境的正式条件方面，较之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操作地位方面，更趋于一致。<sup>[49]</sup>

直到现在，在这一领域中最严肃的长期规划，是由布赖特（Bright, James R.）制订出来的，布赖特对机械化的十七个连续阶段进行了研究，而且在最后的一个阶段（充分自动化阶段，工资劳动者只发挥控制的功能），他发现了一种知识和责任减缩的倾向，尽管较之半自动化和非自动化工业，这些仍处在较高的水平之上。<sup>[50]</sup>只以经验资料为基础的这种分析，证实了这么一个理论上的假设：作为资本增值的俘虏的晚期资本主义自动化，最终还是制造出了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劳动力不合格情况。换句话说，工业所要求的资格将趋于逐步降低，降低到低于科学上和技术上可能的程度，尽管这种资格的平均水平，仍会保持在资本主义曾要求过的以前的那种水平之上。无论如何应该加以强调的是，第三次技术革命所包含的那种劳动和生产过程的根本转化以及半自动化和自动化的加速，不但包含着资本主义所使用的那些机器的改变，而且也包含着技艺和活劳动力的能力的改变——既关系到设备的种种修改，也关系到资本增值的越来越多的困难。至少说，在充分自动化的工厂里，传统技艺的衰落是伴之以工厂内部劳动力的较大的流动性和可塑性的。大体上说来，这使得生产者对于全部生产过程的明确理解与控制成为可能，而这些生产过程在以传送带和局部化劳动为基础的工厂里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集体劳动者”那提高了的平均技艺水平，在资本主义下所采取的形式只是每一个工人的平均技艺略有提高，同时，少数高级生产者的技艺则有显著的提高（多能技师和维修工人）。

对于合格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概念方面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最为困难而又争论不休的题目之一。<sup>[51]</sup>我们可以同

意罗特和堪佐的观点，罗特和堪佐认为教育费用是社会收入的一些扣除，而不是社会资本的一种支出。<sup>[52]</sup>毫无疑问，用在教育方面的岁入提高了社会的劳动能力，并确实形成了某种必要的劳动条件，<sup>[53]</sup>但是，它本身并不能直接创造价值。因此，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资本将只是作为例外情况而投资于教育事业的有选择的一些部门。但是，在这里并没有理论规律，因为，马克思曾明确地强调，资本是可能投资于这些“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sup>[54]</sup>对比之下，说教育费用并不能“直接”确定“合格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值的主张，是与马克思在这一方面的观点彻底矛盾的。阿尔特维特尔（Altvater, E.）对这一论点的批评，在这一方面是正确的，尽管他自己也没能很好地区分开“合格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值与“这种资格的生产费用的发展”之间的差别。罗特害怕跌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矛盾中（工资确定商品价值，而商品价值又确定工资），这种顾虑变得毫无根据，如果我们不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这一公式——“这些服务进入了它的生产和再生产费用中”——而只看其表面的话。<sup>[55]</sup>很显然，马克思并不是说，“合格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值，只是取决于它的资格的费用。它的价值是取决于它的整个再生产费用，这种费用包括生理的因素、道德历史方面的因素，以及再生产这种资格的费用。<sup>[56]</sup>

正是因为教育经费是由国家来支付的——通过其收入的再分配——而且，教育制度并不构成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本的一个投资领域，所以在下面二者之间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是因为要加速技术革新的需要而对这一部门在量方面的增长有一种客观的要求，另一方面，“多种资本”不愿意以增加剩余价值的非积累部分（税收）来担负这种扩大的必要的费用。所以，教育经费的社会化就意味着资方企图以通过从工人和雇员的收入中扣税而支援靠工资维持生活者的办法，把这些花费尽可能地转嫁到靠工资维

持生活者的身上去。这一矛盾在资本家阶级内部重新又产生出来了，在那里，以剥削廉价劳动力（手工业者、小的企业和工业中的落后部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那些部门，当然要抵抗教育费用的主要增长，而大公司和先进的工业准备以所谓在企业内部搞在职训练的办法来支付一部分教育费用。<sup>[57]</sup>

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者雅诺西（Janossy, Franz）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高度合格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得到发展，最终是平均水平以上的经济增长率的决定性的障碍，这种结论是双重地错误的。<sup>[58]</sup>一方面，没有理由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在使职业结构适应其经济的技术需要方面的那种不可否认的迟滞，会意味着这种适应是不可能的。在垄断增值这一紧急关头的末尾，资本也将通行于教育系统中；到最终能够阻止这一发展的唯一力量，就是工人阶级，不是中间阶层或者较薄弱的资本主义集团。<sup>[59]</sup>第二点是这样，正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利润率的长期趋势，越来越少地依赖“多种资本”职业分配和劳动资格的特殊需要，而越来越多地依赖整个劳动力商品的供应和需求的一般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依赖社会平均剩余价值率，<sup>[60]</sup>这种剩余价值率部分地取决于产业后备军的波动。产业后备军的再生产比晚期资本主义长期增长趋势的特殊资格形式的再生产要重要得多。确实是这样，甚至可以这么说，典型的晚期资本主义公司越来越与劳动资格的特殊形式毫不相干了，因为，随着技术革新的加速，这些形式必然会在一个工人的一生中要改变若干次；它还尤其对综合教育感兴趣，综合教育可以培养多种工艺的“天才”和适应能力。德国工程学校的经验和日本的高等技术教育表明，晚期资本主义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很可能满足其对于智力上合格的劳动力的需要。晚期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矛盾，并不在于其教育制度在结构上的发展不足，而是在于其更新的增值危机，在于靠工资维持生

活的人越来越起而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一种暴动，这种暴动也同样可以越来越扩展到智力生产者那里，这并不是因为教育不发达，而是因为它从属于资本的需要，这越来越正面地与自由创造活动发生冲突。

## 注 释

- [1] 见波劳克对自动化的描述：波劳克前引著作，第十六页。
-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七〇三——七〇四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三五五页）。根据卡特（C.F. Carter）和威廉斯（B.R. Williams）的看法，直到十九世纪结尾，随着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的发展，革新才变得与科学知识直接联系起来，而且，科学的训练也成了发明家所不可缺少的了：《投资与革新》，伦敦，第十二页。
- [3] 很显然，不能认为它们外源的因素，而是经济发展总体中的一些功能（尤其是资本的积累、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在这一方面，参见约赛夫·菲立普斯：《劳动份额与工资平等》，载“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一九六〇年五月号，第一八八页。
- [4] 莱比锡马克思大学一个权威性集体编写了一部《为了科学的科学》，（柏林，一九六八年），这部书对于科学的社会基础和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功能，进行了有趣的分析（第七十页）。关于科学史的内在逻辑，参见汤姆斯·库恩（Thoma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纽约，一九六四年。但是，库恩很不应当地忽视了科学与劳动和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关于科学史的社会决定因素，参见伯纳尔（J. D. Bernal）：《科学的社会功能》，伦敦，一九三九年，《历史上的科学》，伦敦，一九六九年，以及里莱（S. Lilley）：《科学史的社会方面》，载《科学史国际档案》，第二期，第三七六页。
- [5] 约翰·代鲍尔德（John Diebold）：《人与计算机》，纽约，一九七〇年；汤姆斯·库恩前引著作，第七十二——七十四、一〇六——一〇八等页；《科学的科学》，第九——十页，等。
- [6] “自从三十年代初期发明光电池以来，自动化的一种原始形式就成

为可能的了。高度的自动化控制是在一九四〇年之前，在电力站、炼油厂以及一些化学过程中作成的。而且，很有可能的是，金属制造工业的自动化在技术上也是可能的，尽管，当然会出现一种经济方面的畸形。在战争期间以及在战后最初那些年里，电子学的迅速发展，增加了与自动化有关的知识；这是不是将会足以减少它在工业上的应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无论如何……与资本设备相比的话，劳动变得更加昂贵了，这一点也鼓励了自动化的应用和发展。”

萨尔特前引著作，第二十五页。

- [7] 在制造工业中第一家完全自动化的工厂，就是洛克福特军火工厂，这家工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作好了生产准备。古德曼前引著作，第一〇四——一〇五页。
- [8] 弗朗克·盖尔莫尔 (Frank G. Gilmore) 和理查德·布朗登堡 (Richard C. Brandenburg): 《公司计划剖析》，载“哈佛商业评论”，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月号。
- [9] 在这一方面，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起的作用，例如可参见埃德温·曼斯菲尔德，《技术变化经济学》，伦敦，一九六九年，第四十五页。
- [10] 列翁纳德·西尔克 (Leonard S. Silk): 《研究工作革命》，纽约，一九六〇年，第五十四页；曼斯菲尔德前引著作，第四十五页。
- [11] 来源同上，第四十五页。
- [12] 西尔克在前引著作，第五十四——五十五页中，在“有组织的调查研究者”与“有组织的科学家”之间，作出了区别。
- [13] 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私人的研究和费用，不是国家的费用，国家费用从某种程度而言，不受赢利性的局限。
- [14] 列昂捷夫在西尔克前引著作中所作的《导言》，第十二——十四页。
- [15] 西尔克前引著作，第三页。
- [16] 弗里曼: 《化学加工工厂：革新与世界市场》，载“全国经济研究评论”，第四十五期，一九六八年八月，第二十九——三十页。
- [17] “巴黎国家银行经济评论”，一九七四年四月号。
- [18] 在这里所指的研究和发展范围，总是与产品的制造和消费不可分割的那些，而不是属于所谓销售费用（例如广告研究），也不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社会条件相适应的那些。
- [19] 保罗·塞罗斯·拉比尼: 《Oligopoloe Progresso Tecnico》都灵、

- 一九六七年，第二二六页。久克斯、萨涅尔斯和斯蒂勒曼 (Jewkes, Sawers & Stillenman)：《发明的根源》，伦敦，一九六九年，第一二八、一五二页。在一九六一年，美国有一万一千家公司的研究和发  
展投资作了记录，但是，这些费用的86%只是这些公司中的391家提  
供的，而且，单单四家大公司就占研究和发  
展整个费用的22%以上：  
理查德·奈尔逊 (Richard R. Nelson)、莫尔顿·皮克 (Merton J. Peck) 和艾德瓦尔德·卡拉契克 (Edward D. Kalachek)：《技术、  
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布鲁金斯研究所，一九六七年。
- [20] 久克斯、萨涅尔斯和斯蒂勒曼前引著作第一五五页，詹姆斯·布赖特 (James R. Bright) (编)：《公司水平的技术计划》，波士顿，一  
九六二年，第六十一页。
- [21] 关于制药工业，参见《新苏黎世报》，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和六  
月三十日；莱芬逊：《多国制药工业》，日内瓦，一九七三年，“产生  
医学突破的，只是基础研究，这些突破是工业引以为荣的，并且也证  
实了它的经济价值。应用研究产生了特殊的产品或改进了制法。但  
是，发展面稍微超过了修补剂量、配方和生产过程，以便追上专利并  
提出新的可销售的命题。”第二十五——二十六页。
-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一七四页以下。
- [2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六九四页。
- [24]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第一五六——一五七页(中译本，人  
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第一册，第一四七页)。
- [25] 在这一方面，引人入胜的分析和例证可从下面一部书中找到，即高尔  
顿·威尔斯 (Gordon Wills)、大卫·阿什顿 (David Ashton) 和伯  
纳尔德·泰勒 (Bernard Taylor) (编)《技术预测与公司战略》，布莱  
德福特，一九六九年，英国公司里奥—廷托锌公司 (Rio Tinto Zin  
c)，可能是以其少见的高效率而驰名，它有一个规模巨大的新的熔炼  
厂，开在格劳塞斯特郡 (Gloucestershire)，据称是全世界最现代化，  
但它却是一个计划欠周的惊人的例证。由于整个地区都被铅的烟雾  
所污染，这个工厂必须关闭几个月以便重建。很多环境污染现象都  
可以追踪到技术计划的欠佳。
- [26] 久克斯、萨涅尔斯和斯蒂勒曼前引著作，第四十——六十页处处可  
见，第七十三页。

- [27] 一九〇〇年,美国专利中的80%掌握在个人手中;这一百分比到一九五七年降到了40%,到一九五六——一九六〇年,又降到了36.5%。克劳斯·舒尔茨-汉森(Klaus Schulz-Hansen),《电力工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柏林,一九七〇年,第八十一页。
- [28] 罗伯特·恰尔皮(Robert Charpie)谈到了科学活动每年累进增长率为7%。他也强调了雨后春笋般的科学出版物,其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的人口或工业化的增长率。罗伯特·恰尔皮:《技术革新与国际经济》,载毛利斯·哥尔兹米斯(编):《技术革新与经济》,第一页。也见代鲍尔德前引著作,第三十三——三十四页。
- [29] 奈尔逊、皮克和卡拉契克在前引著作中(第八十五、八十七页)指出,由大公司的利润目标所确定的R费用和D费用的方向,主要是指向这样一些规划,这些规划提供的是快速的利润,而不是进行基础研究(它在R和D方面所用的私人花费总额中只占4%),从而转移了并阻碍了技术的发展。
- [30] 西尔克前引著作,第一五八页;久克斯、萨涅尔斯和斯蒂勒曼前引著作,第一九七页。莱芬逊前引著作,第四十四页。这些费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纯粹是由私人支付的,但在今天,其中大约有60%是由国家来支付,这一事实对其数额的增长是没有差别的。研究费用日趋社会化的一些理由,在阿尔特维特尔的著作中有所讨论,见阿尔特维特尔和胡伊斯肯(F. Huisken)(编):《教育部门的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埃尔兰根,一九七一年,第三五六——三五七页。
- [31] “商业周刊”,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32] 伯纳尔:《历史上的科学》,第一二四八页;《为了科学的科学》,第四十二、一〇二——一〇五、二六二——二六三页。这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出版的一种重要研究著作即所谓《利契达报告》的一个主要的错误。利契达(Richta)把科学看作是经济进程中一种“残余因素”,他认为科学是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并不体现在机器和工具上。人类劳动力的知识和经验——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而且也包括普通意义上的智慧能力——毫无疑问是这些生产力的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它们生产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里),或者生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么,它们就只有一种生产的“效果”。在这些生产之外,它们仍然只是一种潜在

的生产力，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生产力。

- [33] 马克思关于已经变为直接生产力的知识的公式，可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一书的一节中找到，这一节讨论的主题是“资产阶级生产底基础（价值尺度）与其发展自身之间的矛盾。”《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七〇四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三五五页）。这一节说的一点也不含糊：“固定资本底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底条件本身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底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七〇六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三五八页）。
- [34] 哈比森（F. H. Harbison）和迈尔斯（C. A. Myers）：《教育、人力与经济增长》，引自布劳格（M. Blaug）（编）：《教育经济学》，第二卷，哈芒兹沃尔斯，一九六九年，第四十一页。
- [3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未发表）。
- [36] 阿尔特维特尔，见阿尔特维特尔和胡伊斯肯前引著作，第五十九——六十二、三五八——三六三页。也见奈尔逊、皮克和卡拉契克前引著作，第十页，他们研究了教育、训练与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雅诺西在他的著作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 [37] 来源同上，第三六七——三六八页。
- [38] 这一过程主要包括智力胜任职业的较高收入的设计，某种收入范围只不过是一种长期的推断。但尼森对“人类资本”的整个意识形态分析，受到了阿尔特维特尔和胡伊斯肯彻底的批判，见阿尔特维特尔和胡伊斯肯前引著作，第二九八——三〇〇页。
- [39] 例如可参见布劳格的一篇文章的有特点的题目：《教育投资的利润率》，第一卷，伦敦，一九六八年，第二一五页。
- [40] 资本利息的实际计算，自然是对附加价值产品的计算，这种产品企业家们由于具有高质量的劳动力而可以占有，但是企业家本身并不担负产生这种资格的费用，或者只是通过他们的捐税而部分地、间接地担负那种费用。
- [41]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雅诺西前引著作第二一九——二二一页。
- [42] 参见所谓“物色人才者”的活动，这些人答应在某一公司给予确切工

- 资数目的办法来征召毕业的学生。关于这种“劳动市场”，已经有了一些专门的研究，例如格伦·凯因（Glen Cain）、理查德·弗利曼（Richard Freeman）和李·汉森（Lee Hansen）：《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劳动市场分析》，巴尔的摩，一九七三年。
- [43] 在一九七三年，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公司的全部“最主要的经理”中，据说有77%接受过高等教育训练。“新苏黎世报”，一九七三年十月四日。
- [44] 试比较马克思的说法：“每一个生产劳动者都是雇佣劳动者，但不能由此就说，每一个雇佣劳动者都是生产劳动者。……同一工人可以从事同一劳动……来为产业资本家服务或为直接消费者服务，等等。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雇佣劳动者或短工；但在一种情况下他是生产劳动者，在另一种情况下他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在一种情况下他生产资本，在另一种情况下不生产资本。”《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一三〇、一三八——一四〇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一〇七、一一二页）。
- [45]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论述这一矛盾的另外一个方面：即下面两者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为了劳动过程中个人责任的增加在自动化和智力合格劳动方面的固有倾向，另一方面是晚期资本主义在资本增值过程中向进一步包括智力劳动方面发展所受到的固有限制。
- [46] 尤金·罗布尔：《脑力劳动——财富的真正源泉》，维也纳，一九六八年。
- [47] 关于这一种倾向，有很多经验方面的证据。在整个西德工业界，半技术工人的百分比，从一九五一年的28%增长到一九六〇年的36.4%和一九六九年的37%，而技术工人的百分比，则从一九五一年的47.6%下降到一九六〇年的40.6%和一九六九年的42.8%。非技术工人的百分比从一九五一年的24.4%，下降到一九六〇年的23%和一九六九年的20.2%。见沃尔夫·胡恩德（Wolf Hund）：《精神劳动与社会形态》，法兰克福，一九七三年，第一〇三页。根据塞布利希特（Siebriecht）的报告，一九五一——一九五七年期间，半技术特殊工人的百分比，从29%增长到了32.4%，技术工人则从47.6%降低到了44.8%，而非技术工人，从24.4%降到了22.8%。《自动化——冒险与机会》，第一卷，第三八三页。

- [48] 皮叶·纳维尔，见纳维尔——弗利德曼前引著作，第三八一页。
- [49] 这导致工人们提高他们渴望“雇员”地位（包括解雇前一个月通知和支付月薪）的要求，并以工会行动而取得了成功。
- [50] 詹姆斯·布赖特：《美国对现代各种职业的工资调查》，载《德国和美国自动化和技术的发展》，法兰克福，一九六三年，第一五九——一六八页。
- [51] 罗曼·罗斯多夫斯基在前引著作第二卷第五九七——六一四页中，对于以前关于胜任劳动和不胜任劳动与前一个退向后一个方式之间的关系讨论，作了一个总结。也见罗伯特·罗托恩（Robert Rowthorn）：《马克思体系中的复杂劳动》，载努辛格尔（H. Nutzinger）和乌尔斯台特尔（E. Wulstetter）（编）：《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危机》，法兰克福，一九七四年，第一二九页以下。
- [52] 罗特和堪佐前引著作，第七十一——七十六页。
- [53]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五三三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一五八页）：“因此，一切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只要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还不能由资本自身来建立，因而必须开支该国——政府金库中的一部分收入来建立，所以尽管这些劳动者提高了资本底生产力，却并不是生产的劳动者。”
- [5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五三二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一五七页）：“最高度的资本发展水平是社会生产过程底一般条件不是由社会所得底扣除额或由国家底赋税来建立——因为在这样情况之下，作为劳动基金而出现的乃是所得而不是资本，同时劳动者虽然是跟其他工资劳动者一样的自由工资劳动者，但在经济上却处于另外一种情况之下——而是由作为资本的资本来建立的。”也参照《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第四一〇——四一一页，在那里，马克思谈到了作为生产劳动者的私立学校的教师，他们使得开办这所学校的资本家更富裕了。但在同一卷的第一六七——一六八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第一册，第一五九——一六〇页）我们也读到了这么一段：“有一些服务，是训练、保持劳动能力，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等等的，总之，是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或者仅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的，例如学校教师的服务（只要他是‘产业上必要的’或有用的）、医生的服务

(只要他能保护健康,保持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购买这些服务,也就是购买提供服务也会生出一种‘可以出卖的商品等等’,即提供劳动能力本身来代替自己的服务,这些服务应加入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因此,很明显,医生和教师的劳动不直接创造用来支付他们报酬的基金,尽管他们的劳动加入一般说来是创造一切价值的那个基金的生产费用,即加入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

- [55] 阿尔特维特尔和胡伊斯肯前引著作,第二五六、二九四——二九五页。
- [56] 罗斯多夫斯基前引著作,第六一二——六一四页。也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一九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一卷,第五六一页):“此外,在劳动力价值的决定上,又还有其他两个因素参加进来。一个是劳动力的发展费用,那随生产方式而变,另一个是劳动力的自然差别,也就是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的区别,成年劳动力和未成年劳动力的区别。”
- [57] 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对工科学院和学徒制度的态度,参见阿尔特维特尔和胡伊斯肯前引著作,第一六二——一六五、一七三页。
- [58] 雅诺西:《经济奇迹的结束》,法兰克福,一九六九年,第二三四——二三五、二五〇、二五二——二五四等页。
- [59] 在一九四五——一九六五年期间的“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中,主要倾向是在特定的一些经济部门中争取提高工资,这些经济部门存在着劳动力缺乏的现象,另外,还要在产业后备军缩减的条件下分散整个劳动力。
- [60] 对于雅诺西那部很有刺激性并且很有价值的著作,我们在这里还不能提出一种批评。我们只能指出,在他的著作的第二四六——二四七页——正象他这部著作的整个结论那样——他把价值计算与价格计算混为一谈了,从而就跌入了无法摆脱的矛盾之中。如果某一工业部门A所雇用的工人数目从8,000缩减到了1,000,而劳动时间保持不变,那么,新创造出来的价值(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将会跌到其以前水平的12.5%。反过来,如果在一个企业部门B中,工人人数从2,000增加到了9,000,就是说增加了450%,那么,新创造的价值也将提高450%。但是在这一例子中,新创造价值的总额(收入)将保

持不变，也就是在两种情况下都是  $10,000x$ （在这里， $x$  = 每个工人在一小时内完成工作量的数额），因为增加的劳动生产力在商品价值的跌落方面，也有所表现。市场波动可以对这一价值额进行再分配，但不能有所增加。这一点被雅诺西的通货膨胀价格计算法掩盖了，这最终在“国民收入”中产生了一个十二倍的增长额。在这里，商品价格似乎是取决于工资而不是取决于价值，而在一个部门的工资，只是在市场的基础上才加了倍，换句话说，与劳动力商品价值毫无关系。

## 第九章

### 持久的军火经济与晚期资本主义

自三十年代末以来，武器的生产在帝国主义经济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帝国主义经济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不受阻碍的武装。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说明，这种持久军火经济的趋势在可见的将来会衰退。因此，我们正面对着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这种标志必须用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来加以说明。尤其是晚期资本主义某种特殊的经济面貌——这种经济面貌使它与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些早期阶段有所区别——与持久的军火费用这一现象相关到何种程度，我们必须加以探讨，同时，如果军火费用现象坚持下去的话，那么，这些经济面貌是不是也将对整个晚期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继续发生作用，这我们也必须加以探讨。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历史中，在有关武器生产和军事开支方面，作为经济现象，肯定是没有什麼特殊新鲜的。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的改朝换代的战争中，武器的生产是原始积累的一个主要来源，而且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接生婆之一。<sup>〔1〕</sup>作为加速工业化或者扩大资本主义市场的一种刺激因素，军火支出和战争在整个现代史中的加速工业化或扩大资本主义市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例如可比较一下一七九三年之后英国工业的兴起；在拿破仑征服时期，法国的战争生产；大不列颠、法兰西和俄罗斯之间的克里米亚斗争；作为明治时期的日本的工业化主要

杠杆的军备；等等）。〔2〕在帝国主义时期开始之后，军事开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二十年中，对于加速扩大生产，也同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3〕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这些时期中，没有哪一个时期的军火生产曾表现出这样一个既长久而又不受阻碍的上升倾向，或吸收每年生产总额中这么大的一部分（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或国民总产值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每年创造出来的新价值或每年商品生产价值的一部分）。根据威尔玛(Vilmar Fritze)的计算，以十亿金元来表示的全世界每年军备开支，从一九〇一—一九一四年时期的四十亿金元增加到一九四五—一九五五年时期的一百三十亿金元。〔4〕因此，这证明我们说这是从量到质的一种变化是对的；增加了的军火开支总额毫无疑问在经济方面已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质量。我们只需列举出一个数字以说明这一点：在一九六一年，武器生产高达全世界投资总额的接近一半（总资本形态或者纯投资加上进行中的固定资本增值）。〔5〕

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军火生产和军事开支的比例，经历了下面的发展过程（只考虑直接的军事费用，没考虑间接军事费用）：〔6〕

1939	1.5%	1950	5.7%
1940	2.7%	1951	13.4%
1941	11.1%	1952	13.5%
1942	31.5%	1953	13.6%
1943	42.8%	1954	11.5%
1944	42.5%	1955	9.9%
1945	36.6%	1956	9.8%
1946	11.4%	1957	10.2%
1947	6.2%	1958	10.4%
1948	4.3%	1959	9.7%
1949	5.0%	1960	9.1%

1961	9.3%	1967	9.1%
1962	9.4%	1968	9.7%
1963	8.8%	1969	9.0%
1964	8.1%	1970	8.3%
1965	7.6%	1971	7.5%
1966	7.9%		

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时期中的军事开支，可以估计如下：

#### 国防现时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百分比（现时价格）〔7〕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联合王国	6.3%	7.7%	6.3%	5.9%	4.9%
法 国	5.8%	4.9%	5.4%	4.0%	3.3%
西 德	4.5%	3.3%	3.2%	3.9%	3.2%
意 大 利	3.2% (°)	2.8%	2.5%	2.5%	3.6%
(°) 1951					

#### 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年军事费用 永久价格每年平均百分比的变化

美 国	+ 6.2%
日 本	+ 3.9% (°)
联合王国	+ 1.3%
法 国	+ 4.2%
西 德	+ 5.8%
意 大 利	+ 4.1% (°) 1951—70

现在，我们需要作的是来探讨这一庞大的军事开支对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最可靠的办法可能是在一种

永久的、大量的军火预算的帮助之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最重要的那些内部矛盾或那些困难的动力，加以分析。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把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加以改变。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分为两个部分：第Ⅰ大部类包括生产手段；第Ⅱ大部类包括消费品。我们现在把这种计划改变成三个部分，在这两大部类之外，增加一大部类，即第Ⅲ大部类：生产破坏手段。〔8〕我们作出这样的区别是对的，因为第Ⅲ大部类不象第Ⅰ大部类和第Ⅱ大部类那样，它生产出来的商品并不进入生产物质因素的再生产过程（取代并扩大生产手段和已使用的劳动力），而且与这些因素也不能互相交换，情况实际上肯定是如此，例如不能与资本家阶级和为这一阶级服务的那些人非生产性地吸收的消费品互相交换。

## I 军火生产和实现的困难

第Ⅰ大部类和第Ⅱ大部类中越来越高的资本有机组成，会导致实现的种种困难，因为，在生产手段的生产中创造的消费品购买力（工资总额），随着技术过程的发展，增长得比在消费品生产中对生产出来生产手段的需求的增长要慢一些。第Ⅰ大部类创造出来的消费品的购买力，不是以实现第Ⅱ大部类生产的——而不是在第Ⅱ大部类内流通的——商品的总价值。除非是这些消费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换句话说，剩余价值在损害第Ⅱ大部类的情况下在第Ⅰ大部类中重新分配〔9〕——不然的话，消费品将会保留一部分售不出去的残余，正象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米海尔 (Lugan-Baranovsky Mikhail) 和奥图·鲍威尔那熟悉的计划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下面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由于越来越高的资本有机组成，雇用的新工人就比较少了，因而，社会消费也不

能扩大到足以吸收第Ⅱ大部类所生产的全部商品生产。如果剩余价值率有所增长，或者如果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积累部分比以前生产时期的积累部分为大的话，那么，同样的不平衡也一定会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从这些计划所预见到的那种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因为，由技术进步所引起的两大部类之间交换关系的不成比例，一定也会破坏掉以前的比例关系。”〔10〕那么，第Ⅲ大部类的出现，是不是能超越这些实现的困难，或者说，不顾越来越高的资本有机组成而在第Ⅰ大部类与第Ⅱ大部类之间重新建立起比例关系呢？

第Ⅲ大部类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作到这一点：

$$\text{II } C + \text{II } S\beta + \text{III } C + \text{III } \beta = \text{IV} + \text{IS}\alpha + \text{IS}\gamma + \text{III } V + \text{III } S\alpha + \text{III } S\gamma,$$

（其中剩余价值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为 $\alpha$ ，这是非生产性的消费；一部分为 $\beta$ ，这是不变资本中的积累；另一部分为 $\gamma$ ，这是可变资本中的积累）。但是，我们知道，由于越来越高的资本有机组成的缘故， $\text{II } C + \text{II } S\beta$ 将会大于 $\text{IV} + \text{IS}\alpha + \text{IS}\gamma$ （这正是消费品能有一种销售不掉的残余部分的那种原因）。就平等工作这一公式来看， $\text{III } V + \text{III } S\alpha + \text{III } S\gamma$ 将因而必然要大于 $\text{III } C + \text{III } S\beta$ ，换句话说，由于资本有机组成的减退，军火部分最终势必成为一种特点。很显然，在正常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也许，一次毁灭性战争的最后阶段是个例外）。这就证明，由资本有机组成所引起的实现的种种困难，并不是军火工业所能够提供一种解决办法的。

让我们举出鲍威尔计划中的数字例子。在第一个生产周期中，我们得到下列两大部类的商品价值：

$$\text{I: } 120,000C + 50,000V + 50,000S = 220,000 \quad \text{I}$$

$$\text{II: } 80,000C + 50,000V + 50,000S = 160,000 \quad \text{II}$$

鲍威尔假定两大部类中每一个部类的剩余价值的百分之七十五（37,500个价值单位）被资本家以非生产性方式消费掉了，

10,000 个价值单位积累在不变资本中，2,500个价值单位积累在可变资本中。<sup>[11]</sup>这一体系是平衡的，因为第Ⅱ大部类从第Ⅰ大部类那儿购买  $80,000C + 10,000S\beta = 90,000$ ，与此同时，它又向第Ⅰ大部类售出  $50,000V + 37,500S\alpha + 2,500S\gamma = 90,000$ 。如果剩余价值率和资本家非生产性消费保持不变的话，那么，第二个生产周期的商品价值，将会有下列的比例：

$$\text{I: } 130,000C + 52,500V + 52,500S = 235,000 \text{ I}$$

$$\text{II: } 90,000C + 52,500V + 52,500S = 195,000 \text{ II}$$

因此，这一体系是不平衡的，因为，尽管第Ⅱ大部类从第Ⅰ大部类购买 90,000C 再加上多于 12,000S $\beta$ （也就是总和在102,000价值单位以上），以保证资本有机组成的进一步增长，但它只能销售给这一大部类 52,000V + 37,500S $\alpha$  再加上少于 3,000S $\gamma$ ，也就是说总和为不到 93,000 个价值单位。因此，消费品就出现了一个大约10,000 个价值单位左右的销售不掉的残余。在鲍威尔的计划中，这一些残余消失了，这是因为，第Ⅱ大部类在第一个周期中实现了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积累于第Ⅰ大部类的第二个周期中了（换句话说，第Ⅱ大部类所生产的商品价值要想得到充分实现，只有当它保持相当程度地低于它在这一大部类正常积累过程的情况下所该有的程度，才能办到）。<sup>[12]</sup>

如果我们从第Ⅲ大部类（破坏性商品的生产）的兴起来寻求解决那些实现困难的办法，而不是从鲍威尔的计划中寻求（鲍威尔的计划是与马克思再生产计划的逻辑相矛盾的），那么，我们只能找到这么一个解决办法，如果三个大部类的生产价值在第二个生产周期中，大体上作如下的发展的话：

$$\text{I: } 126,000C + 51,500V + 51,500S = 229,000 \text{ I}$$

$$\text{II: } 86,000C + 51,500V + 51,500S = 189,000 \text{ II}$$

$$\text{III: } 4,000C + 1,000V + 7,000S = 12,000 \text{ III}$$

关于第 I 大部类和第 II 大部类的这一假设，保留了不变的剩余价值率和不变的资本家非生产性消费的种种条件。现在，第 II 大部类向第 I 大部类出售的消费品价值为  $51,000V + 375,000S\alpha + 4,000S\gamma$ 。同时，它还向第 III 大部类销售消费品，价值达  $4,000V + 3,375S\alpha + 125S\gamma$ 。这样一来，在第 II 大部类以外实现的商品价值总额，就达到 100,500 个价值单位。在这些价值单位中，第 II 大部类因需要代替 C 而购回了 86,000 个价值单位，并购回了 10,000 个价值单位以应积累额外生产手段之需。第 II 大部类所实现的 4,500 个剩余价值单位，被国家以赋税形式吮吸而去，并用以从第 III 大部类中购买了 4,500 个价值单位的破坏手段。第 I 大部类向第 II 大部类出售  $86,000 + 10,000$  价值单位的生产手段，向第 III 大部类出售  $4,000 + 500$  个价值单位的生产手段。关于通过这种出售而实现的 100,500 个价值单位，第 I 大部类从第 II 大部类中购买了 51,000 价值单位的消费品，以便再生产用来生产这种生产手段的劳动力，购买了 37,500 个价值单位的消费品以供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还购买了 4,000 个价值单位的消费品以作为额外可变资本积累的等价物。在第 I 大部类中实现的 7,500 个剩余价值单位，被国家作为赋税扣除掉，并购回了 7,500 个价值单位的破坏手段。这样一来，在第 III 大部类中生产的破坏手段的总价值，是借助于  $4,500 + 7,500$  这种双重的赋税扣除而实现的。

这种数字方面的例子说明，“持久的军火部分”的兴起，只能在下列这种进一步的先决条件下，解决第 II 大部类中生产的商品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购买武器和破坏性物品所需的全部购买力，是从剩余价值总额中选出来的，而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则保持原样未加触动。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观点来看，这种先决条件并没有任何意义。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令人不可想象的是，较之第 I 大部类

和第Ⅱ大部类更低的一种资本有机组成，竟能持久地流行于武器部门（而且，正如从上列代数式中可以看出的那样，这种有机组成还会以与第Ⅱ大部类的资本有机组成增长的同样比例下跌）。更令人不可想象的是，资本家居然还会组织武器的生产，以求增加工资的社会总额，而不是企图降低这种总额。

但是，这种增长是合乎逻辑地掩蔽在通过军火工业以“解决”实现问题这种观念之中。因为，如果我们把不包括军火生产部分在内的第二个生产周期，与包括军火生产部分在内的第二个生产周期加以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尽管生产价值仍然保持不变为430,000，但是，工资总额已从105,000增长到了107,000。为了生产同样的价值，资本家支付了更多的工资，即使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逻辑是相冲突的。这也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实现的困难的最终解决办法，只能靠增加对消费品在货币方面有效的需求。这样一种发展是与历史现实不相适应的，正象它与分析逻辑不相适应那样，这一事实已无需在这里加以说明了。我们在第五章中已经表明，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和战后经济，都伴随着生产工人的消费在国民生产总额中所占份额的显著缩减，也就是说，都伴随着剩余价值率的相当的提高。因此，当技术日趋进步的时候，持久的军火工业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那种实现问题。军火费用实际上是与“工资的开发”相当呢，还是与“剩余价值的开发”相当，这些常见的辩论在阐述这一问题的错误方式中，有其根源：它们企图与静止范畴包含一个运动，一种变化。从形式的观点来看，从工资中任何长期的“扣除”，都会构成剩余价值的提高。因此，不论是工资的扣除也好，为给军火费用拨款而使剩余价值直接异化也好，都意味着军备费用是从剩余价值中拨出来的。这样一个公式在关于这一进展的动力方面，最终没有给我们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它并没有回答这么个

问题：拨款给军火预算的赋税，是不是改变了剩余价值与工资总额之间的全部关系，如果说改变了，那么，改变的方向如何。因此，要提出的正确的问题是有关工资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来自军火费用的剩余价值率的发展。如果这些费用能导致纯工资(工人的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下跌，那么，毫无疑问，军事费用是在“牺牲工人阶级”的情况下筹措资金的，也就是从工资的衰减中筹措资金。如果从工资里抽出的那种增加了的军事赋税导致纯工资的一种长期的衰减以作为总工资额的一种比例，那么，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这是劳动力这一商品价值的衰减，因为，这种价值最终只能由商品的包装来代表，并由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来购买，而不是由“工资总额”的范畴来代表，这种范畴与工人的消费是毫不相干的。

在这一意义上，都留重人、巴兰和斯威茨以及吉德隆(Kidron, Michael)等都错了，他们认为军事费用只是一种“向剩余价值课的赋税”，或者是“社会剩余生产的费用”。<sup>[13]</sup>相比之下，罗莎·卢森堡是很正确的，她在对军火费用进行分析时写道：“作为可变资本流通的某些货币，在这种周期之外流传开了，而在国库中，它代表一种新的需求。当然，对赋税的技术来说，事情的顺序是很不相同的，因为，直接赋税的总量实际上是由资方缴给国家的，而且通过资本家出售他们的商品作为他们的价值的一部分，这些赋税又拨给了资本家。但是，就经济方面而言，并没有什么区别。关键的问题是货币的数量及其可变资本的功能，首先应该协调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交换关系。其次，如果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分别作为商品的出售者和购买者而发生交换的话，那么，这种货币将会转手而作为赋税交给了国家。资方已经付诸流通的这种货币，在与劳动力的交换中，第一次完成了它的基本功能，但是接着由于国家的调停，它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工作。作为一种新的购买力，

既不属于劳方，也不属于资方，它在一个特殊的生产分枝部门中（这个部门既不迎合资本家，也不迎合工人阶级），变得对新的产品发生兴趣，这样一来，它就给资方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来创造并实现剩余价值。我们以前认为这样的事情是当然的：从工人那里敲诈来的间接赋税，被用来支付官员的费用和养活军队，这时候我们发现，工人阶级在消费中的‘节省’，就意味着是工人阶级而不是资本家被迫来偿付资本家阶级及其阶级统治工具的这些食客们的个人消费。这一变化从剩余价值转向了可变资本，而且，相应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变得有利于资本主义化的目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从工人那里敲诈来的这些赋税，当它们用于军火制造时，它们怎样给资方提供了新的积累机会。以间接赋税为基础，军国主义实际上在以两种方式起作用。它以降低工人阶级正常生活标准的方法，既保证了资方能维持一个常备军队以作为资本主义统治的一种机构，又保证能为进一步积累开拓一个广阔的领域。”〔14〕

如果情况真是如此，而且我们同时也接受了罗斯多尔斯基的观点，这一观点是以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和鲍威尔的计划为基础（同时也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为基础），那就是实现问题最终总是在于对冻结在第Ⅱ大部类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实现起来的困难，那么，持久的军火工业显然不能够解决这一困难。

## Ⅰ 军火生产与利润率下跌的趋势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所固有的积累困难，最终在于平均利润率下跌的趋势，这是由于资本有机组成增长了缘故。持久的军火工业能解决这种困难吗？很显然，只有当下列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才行。

第一个条件是，如果第Ⅲ大部类的资本有机组成低于第Ⅰ大

部类和第Ⅱ大部类，并因而如果一种持久的军火工业能降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组成的话。在正常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假设是完全不现实的；正相反，第Ⅲ大部类的资本有机组成在正常情况下是高于社会平均数的。它等同于使用最贵重机器的第Ⅰ大部类的重工业部分的有机组成。人们也不能说，持久军火费用会降低不变资本的价格。

第二个条件是，如果第Ⅲ大部类的出现与它没有出现时的正常水平相比之下，能导致剩余价值率的持久增长的话。在这里，我们也需要对两种情况加以区分：

a. 第Ⅲ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增长到超过社会平均数到这么个程度，它可以有助于这一平均数的增长。例如，如果在上列价值计划中的第二个生产周期采取下面这种形式的话，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text{I: } 126,000\text{C} + 51,500\text{V} + 51,500\text{S} = 229,000 \quad \text{II}$$

$$\text{II: } 86,000\text{C} + 51,500\text{V} + 51,500\text{S} = 189,000 \quad \text{II}$$

$$\text{III: } 4,000\text{C} + 1,000\text{V} + 7,000\text{S} = 12,000 \quad \text{III}$$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第Ⅲ大部类的原有形式有了变化的话： $4,000\text{C} + 4,000\text{V} + 4,000\text{S} = 12,000$ 。于是，社会利润率就会从33.3%增长到34.4%，也就是，在没有军火工业的情况下利润率从第一个生产周期到第二个生产周期的降落（从33.3%降到32.3%），将会由于第Ⅲ大部类而转变成为利润率从33.3%上涨到34.4%。增长量之所以相对地小，那只是由于这样一种事实：军火部门仍只代表社会生产的很小一个部分（在我们这个例子中还不到3%）。如果“持久军火预算”的规模意义深远地增长了（比如说增长到占国民总生产的10%或15%），那么，来自第Ⅲ大部类剩余价值率增长的社会利润率的上涨，将会远为更加明显。

很显然，第Ⅲ大部类剩余价值率的这种特殊的增长，不可能

是相对剩余价值提高的结果。后者是第Ⅱ大部类生产力增长的结果，换句话说，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衰减的结果（不可与真正工资混为一谈），因为，现在一小批特殊的消费品可以用劳动日的较少的一部分生产出来，这样就加长了剩余劳动持续期。这样，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决不能是第Ⅲ大部类所特有的一种特征，而将为整个工业确定劳动力商品的价值。

这样一来，我们在我们那数字例子中所讨论的，是第Ⅲ大部类中剩余价值率的一种增长，因为，在这一部类中从事劳动的劳动力，是由远远低于其价值的价值来偿付或“购买”的。而且，在“正常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差异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只在一种例外的情况下才能出现，那就是：当第Ⅲ大部类的生产不是由“自由的”工人来从事的，而是由奴隶劳动来从事的（各种各样的犯人），正象希特勒的战争经济的末期阶段那样。“偿付”劳动力而远远低于其价值所产生的结果，只能是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的迅速降低。<sup>[15]</sup>这种结果是一种逻辑，这种逻辑是正常的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完全生疏的——这是一种降低再生产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之下，由于第Ⅲ大部类过分膨胀的结果，对劳动力商品的毁灭性的掠夺，然后是对社会固定资本的毁灭性的掠夺，导致扩大再生产物质因素的毁坏。

b. 第Ⅲ大部类或持久的军火生产的兴起提高了全面的社会平均剩余价值率（因而并不单单是第Ⅲ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既然第Ⅲ大部类的建立本身并不能扩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那么，这一条件只有在持久军火生产是由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相对衰落来提供资金的时候，才能实现（所以是，只有在工人的实际工资和体力消费都低于如果工人没有为了军备制造提供资金而支付的那些赋税时的情况）。这是资本主义军火费用的正常状态，如果在工资方面所征收的赋税和间接赋税（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在相当程

度上给它提供资金的话。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直接的难题。正如我们已经强调过的那样，军火经济就其本来性质而言，其所具有的资本有机组成要高于第Ⅰ大部类和第Ⅱ大部类的社会平均额。因此，正常地说，持久的军火预算对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产生一种矛盾的影响。它以提高平均资本有机组成的方式加速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它又以通过对工资课税的提高和消费品价格水平的提高而确定剩余价值率增长的方式，阻碍了同一个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两种影响可以互相抵消，所以到最终——还是在“正常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持久军火工业的发展在其对平均利润率的波动所发挥的影响方面，将会趋向于中立。只有在战争经济和（或）法西斯主义以及工人阶级分裂的“不正常的”条件下，第Ⅲ大部类的发展才能在剩余价值率方面引起如此明显的增长（尽管就业水平很高，对工资还是有相对的和绝对的向下的压力），以致其步伐较之其本身存在所创造的社会的资本有机组成的增长为更快。<sup>[16]</sup>

如果不是第二个生产周期：

$$\begin{array}{l} \text{I: } 130,000\text{C} + 52,500\text{V} + 52,500\text{S} = 235,000 \quad \text{I} \\ \text{II: } 90,000\text{C} + 52,500\text{V} + 52,500\text{S} = 195,000 \quad \text{II} \end{array} \left. \vphantom{\begin{array}{l} \text{I} \\ \text{II} \end{array}} \right\} 430,000$$

我们假设下面第二个生产周期，其中包括第Ⅲ大部类：

$$\begin{array}{l} \text{I: } 126,000\text{C} + 50,000\text{V} + 52,000\text{S} = 228,000 \quad \text{I} \\ \text{II: } 84,000\text{C} + 50,000\text{V} + 52,000\text{S} = 186,000 \quad \text{II} \\ \text{III: } 10,000\text{C} + 2,500\text{V} + 3,500\text{S} = 16,000 \quad \text{III} \end{array} \left. \vphantom{\begin{array}{l} \text{I} \\ \text{II} \\ \text{III} \end{array}} \right\} 430,000$$

以下面的价值生产接替第一个生产周期：

$$\begin{array}{l} \text{I: } 120,000\text{C} + 50,000\text{V} + 50,000\text{S} = 220,000 \quad \text{I} \\ \text{II: } 80,000\text{C} + 50,000\text{V} + 50,000\text{S} = 180,000 \quad \text{II} \end{array} \left. \vphantom{\begin{array}{l} \text{I} \\ \text{II} \end{array}} \right\} 400,000$$

于是，尽管社会资本有机组成已经从2上升到2.14，而平均利润率与此同时却仍保持在33.3%不变。

$$\frac{100,000S}{200,000C + 100,000V} \text{ 是第一个生产周期。}$$

而第二个生产周期则是：

$$\frac{107,500S}{220,000C + 102,500V}$$

这是下面的事实造成的结果，这个事实就是：剩余价值率已经从100%增长到了104%，因为，名义工资已经削减了相当于5,000个价值单位，这是通过征税以便给国家购买军用物品提供资金，而不是给工人来购买消费品。第Ⅲ大部类的量越大，社会平均资本有机组成增长得越快，剩余价值率也就必然会更加直线上升而无需相对剩余价值的提高，以抵制平均利润率不可避免的下跌。这将会很快意味着工资总额的绝对下降，这种下降随着在“正常的”条件下就业的上升，被认为是不很可能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例如，如果从第二个生产周期到第三个生产周期，社会不变资本总额增长了15%，或者说从220,000个价值单位增长到253,000个价值单位，同时，社会生产总额的价值增长了7.5%，从430,000增长到462,250，那么，可变资本总额就必然会从102,500降到93,755，如果平均利润率保持在33.3%不变的话。已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将会采用类似于下面的形式：

$$\left. \begin{array}{l} \text{I: } 138,000C + 44,387.5V + 54,737.5S = 237,125 \quad \text{I} \\ \text{II: } 90,000C + 44,387.5V + 54,737.5S = 189,125 \quad \text{II} \\ \text{III: } 25,000C + 5,000V + 6,000S = 36,000 \quad \text{III} \end{array} \right\} 462,250$$

在这里，工资总额不会出现绝对的下降，但是，通过课税和价格上涨而从工人那里吮吸来的名义工资部分，将会增长到21,700个价值单位，也就是，增长到没有这种敲诈的工资总额的大约20%。很明显，如果没有露骨的法西斯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彻底分裂，这种状态的事情是很难作到的。

英国经济学家吉德隆有这么一种主张：军火费用由于抓住了

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因而最终确实是有利于积累过程的。那么，我们怎样来对待这一主张呢？吉德隆的论点是这样：“（马克思）的模式是一种封闭式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所有的输出都以投资物品或工资物品的形式，作为输入而流回转来了。中间没有什么漏隙。但从原则上讲，一个漏隙就可以把发展的强制性从其最重要的结果中隔绝。……如果‘着重资本’的商品被撤去了，那么，提高就会放慢一点，并且——根据漏隙的量和组成——甚至还可以停止或者倒退。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平均利润率就不会有什么减退，我们也没有理由期待越来越猛烈的暴跌等等。实际上，资本主义从来都没有形成一个封闭式的体系。战争和市场暴跌已经毁坏了大量的生产。资本输出已经长时期地转移并冻结了其余的量。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大部分资本已经从军火生产中渗透出来了。在整个有机组成和利润率的下降中，这些漏隙中的每一个都起到了放慢增长的作用。”〔17〕

这种模糊的“漏隙”范畴，把各种各样的不同现象都混为一谈了。市场暴跌以贬值而摧毁了资本，而贬了值的资本很显然就意味着利润率的增长（以有不变的剩余价值率之故）。一般地说来，战争决不会使资本贬值（除非是战败，甚至即是这样，那也只不过是失败的影响造成的结果）。只有当战争摧毁了资本的时候（也就是确实摧毁了资本），战争才能被看作是一种“漏隙”，这种漏隙放慢了利润率跌落的趋势。资本输出只是阻碍了平均利润率的下跌，如果资本输出是投资于资本平均有机组成较低的那些国家的话。换句话说，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都没有神秘的“漏隙”可言，而只是有一种利润率的古典式的增长，这是由于资本的有机组成的减缩造成的结果，包括资本的被摧毁（带有形毁坏或不带有形毁坏的价值毁坏）。

当吉德隆把这种“漏隙”概念应用到军备方面的時候，他显然

是把生产过程（作为劳动和增值的联合过程）与再生产过程（这种再生产过程并不构成剩余价值实现和资本积累过程的一个单位，也不构成所有已生产商品重转回生产过程的过程的一个单位）两者混为一谈了。如果投资于生产的各个分枝部门的资本已经增值了，而且在其控制下的商品已经按其生产价格销售了，那么，来自这种资本的剩余价值就已经实现了，不管已出售的商品是否进入再生产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并无“贬值”问题可言。无产阶级在“奢侈品”的生产或武器的生产中所创造出来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额），进入了整个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活动，正象为了重新组织劳动力而用在生产手段的生产或者消费品的生产的那种剩余劳动那样。

吉德隆把武器的生产与危机或战争或与向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作了对比，如果这种对比有任何道理的话，那么就必需表明，这种生产所代表的资本投资，其有机组成要低于在第Ⅰ大部类和第Ⅱ大部类的。<sup>[18]</sup>当然，吉德隆对这种论点不能作任何证实。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那种持久军火制造会放慢资本有机组成增长速度并因而放慢利润率下降速度的主张，完全是空的。<sup>[19]</sup>吉德隆在他的著作《大战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Western Capitalism Since the War）》中，作为证据的代替向权威呼吁：据说拉迪斯劳斯·封·波尔特吉耶威茨（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已经说明，第Ⅲ大部类（在封·波尔特吉耶威茨就是“奢侈品生产”）的资本组成对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没有什么影响。<sup>[20]</sup>事实上，封·波尔特吉耶威茨确实提出了这一种主张。<sup>[21]</sup>但是，这种主张是以对生产价格的性质的误解为基础的，封·波尔特吉耶威茨把它与“黄金价格”混淆起来了。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价格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价格”（商品价值用黄金数量的表达，并在供应和需求的影响下围绕那种价值在波动，也就是在市场价格的影响

之下)；这些价格只不过是社会剩余价值在各种各样生产分枝部门中重新分配的结果而已。实际上，封·波尔特吉耶威茨必须放弃马克思的这种论点：生产价格的总额等于价值总额；换句话说，他的解释使得价值（花费劳动的社会必需量）在商品流通过程和利润率等同化过程中，武断地并且神秘地“消失”或者“出现”。实际上他正在退回到一种矛盾中去，这种矛盾，马克思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中已经加以纠正了。这一矛盾是有关李嘉图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不足，有关李嘉图没有能理解抽象的、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性质。因此，李嘉图作出了一种虚假的结论：只有工人的生存手段日趋廉价，才能创造出利润率的增长。<sup>[22]</sup>斯拉发是吉德隆所信赖的第二个权威，他像李嘉图一样，也跌进了这同样的错误泥坑中。

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马克思明确地批评了封·波尔特吉耶威茨为了支持其假设而从李嘉图那里引来的一段话。马克思首先引用了李嘉图《原理》一书第七章中的一段话：“在本书中，我始终力图证明：工资不降低，利润率就决不会提高；用工资购买的各种必需品不跌价，工资就不能持久降低。因此，如果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大或机器的改良，工人消费的食物和其它必需品能按较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利润就会提高。如果我们不自己种植谷物，不自己制造工人所用的衣服和其它必需品，而是发现一个新的市场，可以用较低廉的价格从那里取得这些商品，工资就会降低，利润就会提高；但是，如果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大或机器的改良而以较低廉的价格取得的商品仅仅是供富人消费的商品，利润率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动。葡萄酒、天鹅绒、丝绸及其它贵重商品的价格即使降低50%，工资率也不会受到影响，因而利润也会保持不变。”<sup>[23]</sup>（着重点系著者所加）然后，马克思评论到：“我们看到，整个这一段都写得极为草率。但是，撇开这些形式上的缺

点不谈，这一切，就象在整个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这种研究中一样，只有在把‘利润率’读成‘剩余价值率’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即使对奢侈品来说，上述改良也可以提高一般利润率，因为这些生产领域的利润率，同其它一切生产领域的利润率一样，也参加一切特殊利润率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的过程。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上述种种影响，不变资本的价值同可变资本相比降低了，或者周转时间的长度缩短了（就是说，流通过程有了变化），那末，利润率就会提高。其次，李嘉图在这里对于对外贸易的影响作了非常片面的解释。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非常重要的一项是产品发展成为商品，而这同市场的扩大，同世界市场的建立，因而同对外贸易，有极为重要的联系。”〔24〕

此后，马克思开始论述李嘉图的错误根源，这些错误后来拉迪斯劳斯·封·波尔特吉耶威茨又重复了一次，后来，米契尔·吉德隆又抄了一次：“如果工作日既定（或者说，如果在不同生产部门只有工作日长度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为不同种类的劳动的特点抵销），那末，一般剩余价值率，即一般剩余劳动率也是既定的，因为工资平均起来是相同的。李嘉图念念不忘这一点。所以，他把这种一般剩余价值率同一般利润率混淆起来了。我已经指出，在一般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商品按各自的价值出卖，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必然是完全不同的。

一般利润率是用社会的（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除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而得出来的；因此，每一个别生产部门的每一笔资本，都表现为具有同一〔671〕有机构成（不论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构成来说，还是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构成来说）的总资本的相应部分。……显然，一般利润率的出现、实现和确立，使得价值必然转化为不同于价值的费用价格。李嘉图却相反，他假定价值和费用价格是等同的，因为他把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混

涌起来了。因此，他一点也没有想到，早在有可能谈论一般利润率以前，确立一般利润率的过程已经引起商品价格的普遍变动。他把这种利润率当作一种最初的东西，因此在他的著作里它甚至包含在价值规定中。”〔25〕马克思继续评论道：“由于李嘉图对利润率抱着完全错误的观点，他就根本不懂得对外贸易在不直接降低工人食物价格时所发生的影响。他看不到，对于象英国这样的国家，取得〔673〕较低廉的工业用原料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前面指出的那样，〔用较低廉的原料制成的产品〕价格虽然下跌，利润率却会提高，相反，〔用较贵的原料制成的产品〕价格上涨了，利润率却可能降低，即使工资在这两种情况下保持不变，也是如此。……利润率不是取决于单位商品的价格，而是取决于用一定的资本能够实现的剩余劳动量。李嘉图在其他地方对市场的重要意义也估计不足，因为他不了解货币的本质。”〔26〕

在马克思看来，创造价值的是抽象劳动。这种劳动是整个社会劳动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生产出商品来，这种商品不论其使用价值而在市场上找到了它的等价物，因为，它满足了一种社会需要。从价值形态的观点来看，这种需要究竟可追源于工人或是资本家，或国家或非资本家的生产者等，那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因此，不管个别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因而也不管这些商品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的地位），价值生产的总额要取决于商品生产的总额。这样一来，社会利润率就要依赖无报酬劳动的总量——剩余劳动——这种劳动总量是由社会资本使之投入商品生产活动的，不论这种情况是发生于哪个部门。如果一个部门的资本有机组成的提高（比如说武器制造业），与不变的剩余劳动量相比的话，可以导致资本总额的增長，那么，这就可以造成平均利润率下降的结果而不管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消费之间的关系或消费与积累之

间的关系。如果不变资本的减少或剩余价值额的增长在与它使之投入活动的剩余劳动总额相对比之下，能使集体社会资本价值的比例下降的话，那么，社会利润率就会提高而不管在已生产出来使用价值各种范畴比例关系中最终要发生的那些变化。在这种意义上，第Ⅲ大部类以军火生产形式的扩大，只会提高利润率（或放慢利润率的下跌），如果它所具有的资本有机组成低于商品生产的其他分枝部门的话（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或者在剩余价值率方面直接或间接引起急剧增高，其急剧程度较之没有它的存在时为更甚（正如在前面说明过的那样，这在极有限的条件下才有可能）。〔27〕

## Ⅱ 军火生产与资本增值的困难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了某种成熟的水平的时候，就会出现第三个基本矛盾，这个矛盾就是资本增值的日趋困难，这表现在已不再能有生产意义地进行投资的剩余资本这一现象中。自从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开始以来，这一点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很明显的，并且在一九一三——一九四〇（一九四五年）年期间，变得尤其突出。有这样一些理论，这些理论把军火费用基本上看作是解决实现困难或放慢平均利润率下降速度的一种手段，与这些理论相对比的话，军备工业的特殊功能应该置于这样的特殊情况下来加以看待。

假定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中，社会总生产量用 400,000 个价值单位来表示，与此同时还存在着 60,000 个价值单位的呆滞资本。生产的价值结构如下：

$$\begin{array}{l} \text{I: } 120,000\text{C} + 50,000\text{V} + 50,000\text{S} = 220,000 \\ \text{II: } 80,000\text{C} + 50,000\text{V} + 50,000\text{S} = 180,000 \end{array} \quad \left. \begin{array}{l} \text{I} \\ \text{II} \end{array} \right\} 400,000$$

同样也假设，在资本家非生产性地消费掉的那 37,500S 中（每一部类 37,500），有 3,000 是表示 60,000 呆滞资本作为其在剩余价值总额中所占份额的利息的。<sup>[28]</sup>现在，如果这 60,000 是逐渐投资于第Ⅲ大部类的，其本身获得平均利润 33%（也就是说，使这么多工人从事工作，致使剩余价值总额增加 20,000 个价值单位），那么，就资本家阶级而言，显然是有一个经济扩大。投资的资本总额增加了；商品生产总量及其价值也增加了；已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额也增加了；就业率提高了；而且，国民收入也较以前为高。

只要在经济中还有尚未使用的储备——这是“持久军火工业”的起点——那么，额外那 80,000 个价值单位的特殊使用价值就不会创造出特殊的问题来（换句话说，就是这么个事实不会生出特殊问题：第Ⅲ大部类生产的商品既不参与不变资本的重建与扩大，也不用来组织并扩大活的劳动力）。于是，关于下面这个等式，就没有什么必然的情况了：

$$I C + I V + I S = I C + II C + III C + \Delta C (I + II + III)$$

因为，第Ⅲ大部类中所使用的额外资本，没有必要使用新创造出来的生产手段。它可以只吸收尚未充分使用的现有生产能力（或者对新创造生产手段提出要求，而同时允许第Ⅱ大部类现有的生产手段的生产通过对现有生产能力的更充分使用而继续生产，或者吸收现有的物质原料）。这样，第二个生产周期：

$$I : 120,000C + 50,000V + 50,000S = 220,000 \quad I$$

$$II : 80,000C + 50,000V + 50,000S = 180,000 \quad II$$

$$III : 45,000C + 15,000V + 15,000S = 75,000 \quad III$$

就是完全可能的，甚至还能发展成为第三个生产周期：

$$I : 126,000C + 51,500V + 51,500S = 229,000 \quad I$$

$$II : 84,000C + 51,500V + 51,500S = 187,000 \quad II$$

$$\text{III: } 50,000\text{C} + 18,000\text{V} + 18,000\text{S} = 86,000 \quad \text{III}$$

没有任何必要来替换已花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总额（在第二个生产周期为 245,000 个价值单位，在第三个生产周期为 260,000 个价值单位），再加上不变资本现有产危以斥为不变资本的积累所必需的那些价值（在第二生产周期为 220,000，在第三生产周期为 229,000）。

现有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实现也同样没有给予资本的积累以充分的保证，因为，加速扩大的整个过程是由于现在已有的货币资本的增值，而不是由于以前的增值。如果所有的剩余资本都逐渐地而不是突然地转入了第Ⅲ大部类的生产，那么，一种加速的资本积累就可能发生，这种积累处于现有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之外，直到最后，整个剩余资本全被拉入增值过程为止。这就意味着，新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总额，可以由再一次投入流通和生产的剩余资本部分地加以调整，正象额外使用的部分机器和原料，并不是出自现有的生产，而是出自以前的一个计划遗留下来的尚未使用的原料那样。但是，可以肯定，整个商品价值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任何一个商品的所有主都不会以低于商品的价值价格把商品售出。一旦我们放弃了这样的幻想：三个大部类中每一部类都只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公司，而且，一旦我们想象，比如说，暂时停滞不用的以前的那些工厂，都又重新投入了生产，那么，剩余资本的这种重新投入生产，在再生产计划的逻辑方面不会产生任何理论问题。

剩余资本如果要保证是“有利可图”的，那么，它只能再一次作生产性的投资。额外的要求最初是由国家引起的，部分是通过赋税，部分是通过公债。在这一点上，科兹里克 (Kozlik Adolf) 是正确的。<sup>[29]</sup>通货膨胀只要能导致商品生产的扩大以及它所产生的收入的增多，那么，它事实上就能够刺激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

发展（只要机器、原料和劳动力的足够储备是方便的）。当然，科兹里克说这样的话是错误的，他说到军火经济对资本的“毁坏”或“粉碎”。因为，以前变呆滞而现在又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资本，远远不是被“毁坏了”，而是增值了。

海因宾格尔 (Heininger Horst) 的下列断言，也同样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他说：“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新近还有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指出，军备竞赛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最终损害了经济发展。”〔30〕这一概念甚至根本就不能与剩余资本的中心问题相提并论。〔31〕

当机器、原料和劳动力的现有储备全部都吸收进了生产过程的时候，那么，资本增值的基本困难就再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这些比例性的公式现在又恢复了它们的正确性，而这些公式是从这样的假设出发的：每一个大部类都可以向其他大部类购买商品，这种商品只以商品价值售与后者。因此，第Ⅲ大部类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必须在从社会剩余价值总额和社会工资总额的扣除额之外，得到资助。如果我们为了简便起见，假设国家从工资和剩余价值方面征收同样的税率  $X$ （大约 25% 左右）的话，那么，我们可得到以下公式：

$$\text{Ⅲ} = \text{Ⅰ} \text{VX} + \text{Ⅰ} \text{SX} + \text{Ⅱ} \text{SX} + \text{Ⅲ} \text{VX} + \text{Ⅲ} \text{SX}$$

我们也可以把Ⅲ的价值全部写出来：

$$\begin{aligned} \text{Ⅲ} \text{C} + \text{Ⅲ} \text{V} + \text{Ⅲ} \text{S} &= \text{Ⅰ} \text{VX} + \text{Ⅰ} \text{SX} + \text{Ⅱ} \text{VX} + \text{Ⅱ} \text{SX} \\ &+ \text{Ⅲ} \text{VX} + \text{Ⅲ} \text{SX} \end{aligned}$$

这使我们得出：

$$\begin{aligned} \text{Ⅲ} \text{C} + \text{Ⅲ} \text{V}(1 - X) + \text{Ⅲ} \text{S}(1 - X) &= \text{Ⅰ} \text{VX} + \text{Ⅰ} \text{SX} \\ &+ \text{Ⅱ} \text{VX} + \text{Ⅱ} \text{SX} \end{aligned}$$

或，如果  $X = 25\%$ ，则：

$$\text{Ⅲ} \text{C} + \text{Ⅲ} \text{V} \text{ 的 } 75\% + \text{Ⅲ} \text{S} \text{ 的 } 75\%$$

$$= \text{I V 的 } 25\% + \text{I S 的 } 25\% + \text{II V 的 } 25\% + \text{II S 的 } 25\%$$

换句话说，为了使这一体系保持平衡，持久军火生产的量必须是这样：用于军备方面的不变资本的量，加上受雇于这一大部类的工人的纯工资，再加上军火制造商的纯利润，三者的总和既不能高于也不能低于其他两大部类中对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所征收的赋税。这样，两大部类之间古典的比例性等式就改变如下：

$$\text{I O} + \text{I V} + \text{I S} = \text{I O} + \text{II O} + \text{III C} + \text{I S}(1-X)\beta \\ + \text{II S}(1-X)\beta + \text{III S}(1-X)\beta$$

这使我们得出：

$$\text{I V} + \text{I S}X + \text{I S}(1-X)\alpha, \gamma = \text{II O} + \text{III O} \\ + \text{II S}(1-X)\beta + \text{III S}(1-X)\beta。$$

这就意味着，受雇于第 I 大部类的工人的工资额，加上这一部类所创造出来而又不投资于新的不变资本的剩余价值总额（包括赋税因而也包括剩余价值额），都必须相等于另外两个大部类所产生的新的生产手段的需求量。既然这种需求量是既来源于第 II 大部类，也来源于第 III 大部类，那么，这一等式就事实上也适用于工资额和剩余价值额，而与纯工资和纯剩余价值相对立（只有在 O 项积累的剩余价值除外），这种纯工资和纯剩余价值只能与第 II 大部类的商品相交换，而不能与第 III 大部类的商品相交换。

技术的日趋进步、资本有机组成的日趋增长和剩余价值率的日趋提高，必然要破坏这些平衡的条件，正象它们在包含两个大部类的一种体系中所作的那样，这一事实是受这一制度的内在逻辑所制约的，这一点我们在本章的第一个部分已经论述过了。对工资和剩余价值所征收的赋税，毕竟只是个附带现象，它预测了剩余价值已经完全实现了，而且工资也都全部付给了——换句话说，第 I 大部类和第 II 大部类的生产都是按比例，并没有剩下

来的销售不掉的商品。现在，要保持以第Ⅱ大部类为一方，第Ⅰ大部类和第Ⅱ大部类为另一方，两方之间的确切比例，甚至还有额外的困难。这当然并不是意味着，持久军火生产只有在有过剩的资本、呆滞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力失业的时候，才会对经济周期发生影响。即使充分就业已经达到了之后，它在下述情况之下，也会在所谓战争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三个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变化，不能保证扩大再生产的必要物质因素，而且还会有生产倒退的周期；并且在“正常的”和平时期的条件下也有影响：一个持久的军火生产计划改变了整个社会工资与整个社会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关系——其方式是导致社会剩余价值率的提高。随着就业率的提高和工资额的增长（不但工资总额，而且还包括纯工资额），这种情况肯定是可能出现的，这从下列数字例子中可以看出：

第一个周期（各社会阶级的收入总额）：

$$\text{I: } 120,000\text{C} + 48,500\text{V} + 48,500\text{S}$$

$$\text{II: } 80,000\text{C} + 48,500\text{V} + 48,500\text{S}$$

$$\text{III: } 10,000\text{C} + \frac{3,000\text{v}}{100,000} + \frac{3,000\text{S}}{100,000}$$

购买军火生产的 16,000 个价值单位的总价值，是由税收来资助的，它占去了工人收入的 10% 和剩余价值（资本家的收入）的 6%。于是，第一个生产周期的最后景象就成了下面这种样子：

第一个周期（社会各阶级纯收入）：

$$\text{I: } 120,000\text{C} + 43,650 \text{ 纯 V} + 45,590 \text{ 纯 S} + 7,760 \text{ 购买 III 的税}$$

$$\text{II: } 80,000\text{C} + 43,650 \text{ 纯 V} + 45,590 \text{ 纯 S} + 7,760 \text{ 购买 III 的税}$$

$$\text{III: } 10,000\text{C} + 2,700 \text{ 纯 V} + 2,820 \text{ 纯 S} + 480 \text{ 购买 III 的税}$$

$$\frac{\quad}{90,000} \quad \frac{\quad}{94,000} \quad \frac{\quad}{16,000}$$

第二个周期（社会各阶级收入总额）：

$$\text{I: } 123,000\text{C} + 50,000\text{V} + 50,000\text{S}$$

$$\text{II: } 82,000\text{C} + 50,000\text{V} + 50,000\text{S}$$

$$\text{III: } \frac{12,000\text{C} + 4,000\text{V} + 4,000\text{S}}{104,000} \quad \frac{12,000\text{C} + 4,000\text{V} + 4,000\text{S}}{104,000}$$

购买军火生产的 20,000 个价值单位的总价值，是由税收来资助的，它占去了工人收入的 12%，而只占资本家收入的 7%。这样，在第二个周期中，价值和收入分配的最后景象，就成了如下形式：

第二个周期（社会各阶级纯收入）：

$$\text{I: } 123,000\text{C} + 44,000 \text{ 纯 V} + 46,400 \text{ 纯 S} + 9,600 \text{ 购买 III 的税}$$

$$\text{II: } 82,000\text{C} + 44,000 \text{ 纯 V} + 46,400 \text{ 纯 S} + 9,600 \text{ 购买 III 的税}$$

$$\text{III: } 12,000\text{C} + 3,500 \text{ 纯 V} + 3,700 \text{ 纯 S} + 800 \text{ 购买 III 的税}$$

$$\frac{91,500}{96,500} \quad \frac{96,500}{20,000}$$

工资总额从一个周期到下一个周期，增长了 4,000 个价值单位。纯工资额增长了 2,500 个价值单位。而社会剩余价值率却从 104.4% 增长到 105.5%。

持久军事费用也意味着军备公司利润的再分配，这些公司如果不是全部也大多数是属于第 I 大部类，并且还是有损于第 II 大部类中的那些公司的。如果我们假定从事第 III 大部类生产的所有公司可以降到第 I 大部类的那些公司的地步，那么，后者在第一个周期中所获得的纯剩余价值（48,410 个价值单位），就与第 I 大部类剩余价值额接近于相等，而在第二个周期中获得的（50,100 个价值单位），就超过了第 I 大部类在第一和第二周期中的剩余价值额。<sup>[32]</sup>所以，从第二个周期之后，资本家的军备费用就单独

由第Ⅱ大部类的资本家来满足，而工人阶级所付出的军火费用则与剩余价值的增长额相当。因此，第Ⅰ大部类中的资本家从军备生产中获得双重的利润——这是有损于工人阶级也有损于第Ⅱ大部类的资本家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罗莎·卢森堡写出下面一段话时，是多么地正确：“农民和中间偏下的各阶级在正常情况下所积存起来的钱，直到这些钱积存得足以向储蓄银行和其他银行投资为止，这些钱现在被解放出来，以构成一种有效需要和投资的机会。而且，个体的和小人物群众要求各式各样的商品，这在不同的时期会变得有影响，并往往由国家那无所不包的、同类的需要来加以满足。对这种需求的满足成了最高水平大工业的一个先决条件。它要求剩余价值生产和积累要有最为有利的条件。消费者的分散的购买力以向军队供应的政府契约的形式而作大批量的集中，而且，在不受各种变化和个人消费的主观波动的影响的情况下，它几乎可以自动调节并有节奏地增长。资本本身最终控制着这种军国主义生产的自动化的、有节奏的运动，其方式是通过立法和报刊，而报刊的功能就是制造所谓的‘舆论’。这就是这一资本主义积累的特殊领域最初看来可能无限发展的原因。为了扩大市场、为了给资本建立工作基地的所有其他意图，主要地都要依赖资本所不能控制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但是军国主义生产却代表着这么一个领域，这个领域的规律的、渐进的扩展，似乎主要取决于资本本身。”〔33〕

#### Ⅳ 军火经济和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变化

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的整个战后时期，持久军火生产不但是

剩余资本问题的最重要的解决办法之一，而且也是，甚至更为重要地是技术革新加速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剂，<sup>[34]</sup>为什么能如此呢，前面的分析提供了部分的解释。军火竞赛以及一些非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刺激剂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持久军火工业最终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危机和崩溃的趋势中立化，并且给它保证了一个相对高的增长。

以马克思学说为基础而对这一问题给予肯定答案的第一批政治经济学家，是纳塔里·莫斯克夫斯卡 (Natalie Moszkowska)

(一九四三年) 和瓦尔特·欧克斯 (Walter Oakes) (一九四四年)。后来，欧克斯以万斯 (T.N.Vance) 的笔名系统地论述了这一论题，并且创造了“持久战争经济”这一概念——尽管第一次有特点地使用这一术语的是摩托兵一级上将、后来的国防部部长查尔斯·威尔逊 (Charles E. Wilson)，那是在一九四四年一月。

莫斯克夫斯卡的论点是这样：“民用工业和消费品生产的扩大发展能力，要依靠全人口的生活水平而定。如果这一点受到了限制，那么，生产者和消费品工业也会受到类似的限制。这样一来，在民用工业方面作有利可图的投资的可能性，就受到了局限。资本的增长比它的增值的机会要迅速得多。较小量资本追求的活动领域，不必依赖群众那种不足的购买力；它需要的是有无限投资可能性的生产领域。资方梦寐以求的这种领域，在战争工业中出现了。由于消费品生产因群众购买力所限而不能充分发展，资本就必须越来越使自己适应杀人武器的生产——即使是在平时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其他任何领域可供它来投资。如果上升的资本主义发展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商品工业，那么，衰落的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会被迫来首先发展军火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由于缺乏金钱方面有效的需求和滞销而越来越受到了阻碍。战争工业的发展则根本不受这些个阻碍。以战争的先决条件为基

础的军备工业，可以以完全不同的速率来发展，并可以以以前毫无所知甚至不敢想象的一种动力发展。”<sup>[35]</sup>莫斯克夫斯卡继续说：“资本主义之侵入非资本主义领域，就象工业上使用技术发明那样，只能延缓危机。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么，甚至较这更尖锐的危机也有可能发生。但是，当军火生产要求过分资本积累的时候，情况并不是如此。在那里，资本被吸收而根本不需要在生产者或消费者商品工业方面扩大民用生产的能力，或者提高社会购买力。因为，在市场上对军备工业的产品，既没有需求，也没有供应。军火工业既不供应市场，也不依赖市场吸收其产品的能力。在这里，国家既提供了订单，也提取了交货。……但是，军火工业的扩大，并没有废除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危险。以危机的形式而发生爆炸的危险，被以战争形式而发生爆炸的危险所代替。”<sup>[36]</sup>实际上，莫斯克夫斯卡在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在持久军火经济的刺激下的发展方面，只看到了两种限制：对整个人口的绝对不同情（也就是倒退再生产的限制，在这种限制下，第Ⅱ大部类的生产的过分跌落，使得劳动力从生理上的重新组织，成为不可能，因而在第Ⅲ大部类的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方面，引起了激烈的暴跌）；和就一种军火经济而言，发动真正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或多或少是不可避免的倾向。

在万斯看来，持久军火经济主要代表一种达到较高就业水平的机制。资本的日趋积累，不是导致越来越多的失业，而是确定了生活水平的下降。<sup>[37]</sup>持久军火经济也能够暂时抓住资本有机组成的增长，尽管并不是最终如此。<sup>[38]</sup>资本有机组成的增长以及相应的平均利润率下跌的趋势，在万斯看来，仍然是悬挂在持久战争经济之上的“达摩克里斯宝剑”。

可见，万斯是比莫斯克夫斯卡较为谨慎的，但是，他们俩共同犯了一种基本的错误：他们俩把第Ⅲ大部类从其对第Ⅰ大部类

和第Ⅱ大部类所产生的影响分割开来，因而他们对“持久的军火经济”在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中所产生的长期影响，不能加以分析。姑且不论倒退再生产的边缘例子（其最终阶段是一种战争经济），说“持久军火经济”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这很明显是不真实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也只不过是达到一种目的的一种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对资本家而言，目的仍然是利润的实现、为赢利目的的资本积累，而不是单单神话般的为积累而喜爱积累。军火经济的发展越是威胁着要降低主要公司的利润额（换句话说，它所确定的税率越高），这些公司对其进一步扩大的抵抗，就越是强烈。<sup>[39]</sup>在任何情况之下，既然扩大中的军火经济确定了剩余价值在损害越来越多的其他资本家的情况下在少数公司中的再分配，那么，第Ⅲ大部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税率在某种最高限度之外的进一步增长），将会彻底遮蔽很多资本家的利润，并以破产来威胁他们这个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所以，军火经济在某种限度之外的任何发展，都必然会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大大地加强政治的、社会的紧张状态和斗争，正象它必然会加强资方与劳方之间在相对而言高就业的“市场”条件方面的冲突一样，而这恰恰是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因此，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安全的，那就是——公开的战争和法西斯主义除外——持久军火经济的扩大，一定会遭到客观上的、内部的社会限制的困扰。

我们可以排除莫斯克夫斯卡和万斯的假设，这种假设认为，在“持久军火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就业是与生活标准的日趋下降相结合的——这一假设与资本主义逻辑彻底相对立，也与资本主义把劳动力转化成为其价格要受市场条件影响的一种商品的作法，彻底对立，而且，这一假设甚至也没有被第三帝国的发展所证实。在这里，这两位著作家都很明显地把增长中的剩余价值率与下跌中的实际工资混淆在一起了。<sup>[40]</sup>一旦这种假设被排除了，

那么，自动的结果就是，暂时限制了资本主义周期性波动的“军火周期”，在第Ⅱ大部类和第Ⅰ大部类的资本积累方面，必然也有一种刺激的效果，而这将会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再生产出每次资本主义繁荣的古典式特征：过度积累、利润率下降、能力运用的衰退，等等。在第十三章中，我们将要说明，持久通货膨胀怎样代表了晚期资本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军火费用怎样只是对通货膨胀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日趋衰退的一部分）负责；以及通货膨胀最终是怎样坚定地奔向了任何军火经济都无法加以中止的那种灾难。

与万斯的意见相对立，我们的意见是，就整个历史而言，持久军火经济加速了而不是阻挠了深入的技术革新，因而也加速了资本有机组成的增长（万斯在别的地方还说了与此相对立的话，这时他错误地把一种战争经济与军火经济混为一谈了）。〔41〕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技术革新及其一切相应的结果，也将从第Ⅲ大部类传播到第Ⅰ大部类和第Ⅱ大部类中去。〔42〕也不可避免的是，在军火经济领域本身，正是由于军火费用的增加放慢下来了，所以将会出现一种明显的转变，从原料的购买和薪金的支付转变为支付研究和发展费用，这将会降低在晚期资本主义全面经济中军火经济的“危机衰减”功能。因为，这项费用的减速增长确定了每项额外支出中对“增加（毁坏）利润”的追求。〔43〕在这一方面，海因宁格尔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证明：〔44〕

美国军费（不包括空间费用） 军事研究费用所占份额

1939/40	15 亿美元	0.2%
1944/45	812 亿美元	1.7%
1952/53	504 亿美元	5.5%
1957/58	442 亿美元	10.2%

1960/61	475 亿美元	16.2%
1962/63	530 亿美元	16.0%
1963/64	554 亿美元	16.6% (22.4% 包括空间 研究; 1960/61 的 类似百分数将是 17.6%)

下面两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

美国耐用品工业销售的利润中军火购买所占的份额：

1955	1958	1960	1961	1962
9%	9.1%	7.6%	7.8%	7.8%

美国消费总额中军火消费所占份额

	钢	铜	铅
1948	?	?	6%
1952	?	17.8%	30.0%
1954	9.7%	6.5%	?
1955	3.0%	2.3%	14.5%
1959	1.8%	1.9%	13.6%
1960	1.2%	?	9.8%
1962	1.5%	?	43.0%

吉德隆也正确地发现：“军事费用最高限度的存在，从另一个原因来看，是重要的。它提供了大量的刺激因素来提高生产力，并导致军火工业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而且与一般的工程实践脱离了关系。……资本以及技术越来越在军火工业方面集中，随之而来的是这种专业化，<sup>[45]</sup>而且这部分地也是这种集中的结果。从两

种计算来看，它们即使在相对费用的同一水平，也变得不能巩固充分就业。在一个衰减的方面并假定还存在某种民用生产力的副产品，这使得这种需要更为确切，那么，它们作为一个分支的力量就变得越来越成问题了。”〔46〕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持久军火经济最终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任何基本矛盾，并且也不能排除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危机的任何压力。甚至它对通向危机的这些矛盾和压力的暂时缓冲作用，也只能在有损于它们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转移的情况下发生——尤其是从实际生产过剩的领域转向通货膨胀和能力过剩的领域的时候。最终这一转移也越来越不那么成功了，这一点我们将在论述持久的通货膨胀的一章里，加以说明。在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这一个“长波”中，“持久军火经济”对于资本的加速积累，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它并不是这一长波的基本决定性因素。

当然，没有必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并低估“持久军火经济”在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影响。可以肯定，它并不是象舞台上扭转乾坤的人物那样，可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制中完成一个质的变化。可以肯定，它在经济上的特殊影响就是最终自我解体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所有一般的特征：努力奋斗以提高剩余价值率、使不变资本费用廉价、缩短资本的周转期和完成剩余资本的增值。因为，到最终资本没有其他办法能逃脱它的命运——利润率下降。但是，下面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是真实的：不论是由于卢森堡所描述的理由，还是由于军火生产创造出了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并不缩减或威胁第Ⅰ大部类和第Ⅱ大部类所生产的任何商品的市场〔47〕（甚至还为某些商品保证了一个长期的扩大销售），大资本对这种国家费用的形式都表示了特殊的喜爱和偏好，如果与所有其他的相对比的话，尤其是所谓

“社会的”费用，这种形式迟早会导致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提高。<sup>[48]</sup>在这一方面，关于第Ⅲ大部类生产的特殊经济一面，波尔鲁 (Perroux Francois) 作了很恰当的说明：“对军备的额外需求不能等同于对投资商品的额外需求。在正常的工业经济中，对投资商品的额外需求，如果从商业观点来看原料能保持在最适当的水平的话，就会为市场或为真正的资本商品的生产，生产出补充的产品来。在军备这一方面，额外生产中的较大一部分由于商品的性质而被贮藏起来了。原子弹、大炮、枪支弹药和部队装备等并不出现在市场上。……除了它在消费品方面的影响之外，军备的价格水平与恢复市场平衡的种种势力，并没有结合在一起。”<sup>[49]</sup>

这反过来又在关于第Ⅲ大部类的价格形态方面，引起一些复杂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在关于军备公司与其他垄断集团之间的利润率（或垄断的剩余利润率）的等同化方面，引起一些复杂的问题。<sup>[50]</sup>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清楚的是，对外和对内的政策、社会的和经济的势力，在使得“持久军火经济”兴起方面，配合得多么密切。这一个互相关联的过程试图来证明，在这个似乎有点成问题的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因素，不是经济因素。这两者互相依赖的一个例子当然就是“军事工业综合企业”——军火公司、军事指挥官和资产阶级政客的亲密的大熔合。<sup>[51]</sup>所以，威尔玛强调下面一点是对的：“军火经济的巨大发展，不但要归功于军备工业的特殊利润集团，而且也要归功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帝国主义的扩张趋势（继之而来的周期性利益）。”<sup>[52]</sup>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持久军火经济”的发展，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也起到了十分具体的作用，以保护大量的美国国外资本投资，以维护“自由世界”的“自由资本投资”和“自由的利润回国”，而且还保证美国垄断资本“自由地”接近一系列重要的原料。一九五七年，得克萨斯

科(Texaco)董事会董事长就直率地宣称,在他看来,美国政府的基本任务就是“既在国内,又在国外创造一种政治的、金融的气候……以利于国外投资”!〔53〕威尔玛强调这一点也是正确的:军备公司在这一整个过程中,起了特别积极的作用。

军火运输在世界贸易中的越来越大的重要意义,也不能低估——附带说一句,这种商业表明,如果不把武器生产当作商品生产来对待,而且,如果不把在这一方面的投资看作是一种资本积累,那该是多么愚蠢。在一九五五年,世界市场的军火出口总额,约为二十二亿美元。在一九六二——一九六八年,平均数已经是五十八亿美元,其中苏联占二十亿美元。〔54〕

持久军火经济的整个现象,当然是生动地突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质,这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的时候,已经加以暴露了。一种制度在二十五年中,在破坏性手段的生产方面经常挥霍其现有经济资源的这么一大部分,一个人该怎样来看待这样一种制度呢?

## 注 释

- 〔1〕 例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七五一页;约赛夫·库利舍尔(Josef Kuliseher):《经济通史》,第二卷,第三六一页;《法国社会经济史》,第二卷,第二六九—二七六、三一〇—三二一页。
- 〔2〕 乔治·哈尔加顿:(George W.F. Hallgarten):《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帝国主义》,第五十三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三七五页;汤玛斯·斯米士:《日本的政治变化和工业发展》,第四页;洛克伍德前引著作,第十八—十九页。
- 〔3〕 厄尔尼斯特·凯莫尔(Ernest Kaemmel):《金融史》,柏林,一九六六年,第三三〇—三三一、三五〇页。
- 〔4〕 弗里茨·威尔玛:《晚期资本主义的武装和解除武装》,第二十八页。
- 〔5〕 联合国:《解除武装的经济和社会结果》,纽约,一九六二年,第三页。

- 〔6〕 直接军事费用不包括退伍军人的福利和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费用。一九五二—一九六五年的数字引自：美国商务部：《美国国民收入和产品：一九二九—一九六五年》。一九五二年以前的数字引自：万斯，《永久的战争经济》，第八页。万斯的数字与官方的估计并不完全符合，而且自一九四一年起，与后来美国商务部所计算的，每年要高出约1.5%。一九六〇年之后，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支出应当包括在内，从一九六三年以后，这将使国民生产总值对上述数字每年约增加0.5—0.7。
- 〔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利润，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和国防费用国家表格中的资料计算而成；《世界武装和解除武装》，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鉴，一九七二年，表格4.4和4.9。
- 〔8〕 米海尔·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在他一九〇一年出版的著作《英国商业危机历史和理论的研究》中，第一次利用了第Ⅲ部类。但是，他应用这一说法，只局限于指奢侈品的生产（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以及指简单的再生产。在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我们是作为军火部门使用第Ⅲ部类，以说明退缩性再生产的可能性的。为了作概念方面的澄清，我们必须强调，这第三个部类是严格地局限于军火（武器和弹药），并不包括一切的军事费用。如果军队给士兵购买毛毯子式兵营，那么很明显，这是在购买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制造的商品，而不是第Ⅲ部类制造的商品。对比之下，如果买来的机器是为了生产武器，而且，在军火工业中雇用的工人用他们的工资购买消费品，那么，第Ⅲ部类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是从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中交换商品了。我们的分析是关于这种交换对整个社会流通所发生的影响，而不是军事预算中的影响或为了军事预算的影响。
- 〔9〕 马克思在研究再生产时，显然已经排除了这些假设：见《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六八页。
- 〔10〕 罗斯多尔斯基：《历史根源》，第三五八页。
- 〔11〕 奥图·鲍威尔：《资本的积累》，载“新时代”，卷31/1，一九一三年，第八三六页。
- 〔12〕 “这样一种生产手段生产的过度膨胀而没有相应的社会消费的增长，那是鲍威尔计划的不屈不挠的结果，但是与马克思理论的精神，肯定是不相一致的。马克思强调说，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没有因为其本身

- 原因而发生，而只是由于生产领域的需要才发生，而生产领域的产品则进入个体的消费。”罗斯多尔斯基：《历史根源》，第五九二页。
- [13] 都留重人：《Adonde va el capitalismo》，巴塞罗那，一九六七年，第三十一页。保尔·巴兰和保尔·斯威茨：《垄断资本》，第一七八页。米契尔·吉德隆：《战争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伦敦，一九六八年，第三十九页。
- [14] 罗莎·卢森堡：《资本的积累》，第四六三一—四六四页。有一种假设说，国家国库岁入只是出自工资的扣除额，这种不现实的假设当然必须加以反对。赋税既针对工资，也针对剩余价值，只有其缩减这些收入总额的具体方式——换句话说，它们是怎样修改剩余价值与工资之间的关系——才能告诉我们军火费用是不是已经缩减了相对工资。马克思明白地指出，国家通过税收的费用，与工资总额和剩余价值应符合。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第四〇六页，《资本论》第一卷，第七五六页。海因宁格尔评论说：“国家占有各种收入来源（即利润、工资和简单商品生产者的剩余产品等）”，并且利用这些来源“为着寄生性国家消费的一种特殊形式……根据金融寡头政治的唯一阶级利益。”豪斯特·海因宁格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第一一九页。
- [15] 罗莎·卢森堡理解并预言了这一点。见她在《资本积累》第四六四页所作的脚注。
- [16] 通过一般的技术革新的加速，可以间接地作到这一点，这种技术革新的加速的结果，也会加速第Ⅰ部类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参见第五、第七和第八章。
- [17] 米契尔·吉德隆：《马奇诺马克思主义》，载“国际社会主义”，第三十六期，第三十三页。
- [18] 这就会是吉德隆的意思：“既然向资本抽税以支持军费开支，那么，可以用其他方法进行进一步投资的资源就被剥夺了。……由于这种花费的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大量的就业，而且作为其直接结果，增长率又是最高的，那么，这种抽税的抑制性后果（？）并不是十分明显的。但是，这种后果并不是没有。如果资本对其全部税前利润的投资不加理会国家在必要时所产生的需要（？），那么，增长率就会更

加高得多(！)”第(三十九页)我们可以认为是吉德隆作出了这样一个确实令人震惊的发现：军火经济是放慢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在这个一般的讨论中，他忘记了关系这一因素。只有在军火工业的利润率高于第Ⅰ和第Ⅱ部类的利润率的时候，经济资源向第Ⅲ部门的转移才能刹住平均利润率的跌落。只有在第Ⅲ部类中的资本积累，以比第Ⅰ和第Ⅱ部类较慢的步伐进行时，这种转移才意味着放慢了平均积累率或增长率。军用品的生产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进行这种生产的目的在于利润，这种生产决不是破坏价值或资本的一种形式。

- [19] 克利斯·哈尔曼(Chris Harman)断言，资本之流入第Ⅲ部类，把资本从第Ⅰ和第Ⅱ部类中带走了，如果资本在那里投资的话，就会提高有机组成。(保尔·斯威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的第二三三页中，也作了类似的断言)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忘记了这种资本在第Ⅲ部类中进行投资也能提高那里的有机组成。那么，这究竟怎样使平均利润率停止下降，始终是一个谜：克利斯·哈尔曼，《厄尔奈斯特·曼德尔的矛盾》，载“国际社会主义”，第四十一期，第三十九页。思想家统尼·克里夫断言，战争经济以其对资本的破坏或使资本的贬值，排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障碍并且避开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统尼·克里夫，《俄罗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第一七四页)。这同一倾向的其他一些代表人物都争辩说，用来购买武器的剩余价值，并不是积累了的剩余价值。当然，那是正确的。但是可以肯定，用于修建军火工厂和生产武器的剩余价值，就是积累了的剩余价值。在购买武器之前，必然有把武器作为商品的武器生产。坚持“持久的军火经济”这一观念，并把这一观念当作抑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机制的那些人，忽略了这种基本事实。

- [20] 米契尔·吉德隆：《战争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第四十六—四十七页。

- [21] 拉迪斯劳斯·封·波尔特吉耶威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关于理论结构基础的校正》，载《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一九〇七年七月号，第三二七页。

- [22] 李嘉图不理解劳动力的双重性质：价值的保存者和价值的创造者。他之所以象亚当·斯密那样，不能抓住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之间的差别这一问题，其原因就在此。这使得他——正象后来使得斯拉法那样

——得出了这样的一贯结论：只有提高了劳动力的价值（但不是提高了资本的有机组成），才能够降低利润率（在他看来，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是同一个东西）。当然，如果工作日和劳动力商品价值保持不变的话，那么，剩余价值率只是作为第Ⅱ部类的发展的一种功能而升降的（第Ⅱ部类生产工人的消费品，并为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服务）。相比之下，利润率也要依赖资本有机组成的发展。

- [23] 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第四二二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第二册，第四八〇页）。
- [24] 来源同上，第四二三页（中译本同上，第二册，第四八一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25] 来源同上，第四三三一—四三四页（中译本同上，第二册，第四九二—四九三页）。
- [26] 来源同上，第四三七页（中译本同上，第二册，第四九六一—四九七页）。
- [27] 封·波尔特吉耶威茨和斯拉法提出了对所谓转化问题（价值转化成为价格）的新李嘉图式“解法”，从雅菲(David Yaffe)：《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值与价格》（载“革命的共产主义者”，第一期，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可以找到对这种“解法”的一个很精辟的批评。
- [28] 在这里，我们不能研究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生产性资本的所有主会被迫把他们所掌握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放弃给呆滞资本的所有主。那是与资本家阶级内部劳动分工的复杂性、与生产性资本从它那里得到的长期的结构方面的好处不可分的。为了简便起见，让我们假定，生产性资本家给呆滞资本付出利息，因为他们把呆滞资本看作是一种社会保留基金，这种基金在必要时是能够而且必须动用的。
- [29] 阿道尔夫·科兹里克：《资本主义的消费》，第三三九—三四〇页。
- [30] 海因宁格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第一〇七页。
- [31] 很明显，自从“冷战”结束之后，官方理论家的大转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不是理论方面的。他们的目的是要证明，在垄断资本主义中，裁军是可能的，因为这种裁军是苏维埃外交所希望的。
- [32] 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这种现实假设的程度：根据美国官方资料，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预算年度，交付国防部的总额达227亿美元，其中只包括20亿美元的轻工业商品（还包括农产品在内）和服务部门

的十八亿美元,而其余全部均来自第I部类的公司(美国国会,《军事获得条件和供应在经济部门背景材料》)。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资料:《政府与技术革新》(第二十七页),五十年代末美国的“政府市场”是十分之九航空工业“最终需求”的唯一购买者,也是五分之一的有色金属工业、一半以上的电子和化学工业和百分之三十五以上无线电通讯和科学仪器工业等的唯一购买者。

- [33] 罗莎·卢森堡:《资本的积累》,第四六五—四六六页。保尔·麦蒂克在不同的解释中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他断言,“由国家所鼓励的生产”(包括军火生产在内),只不过是增加消费,而不是资本的积累(《马克思与凯恩斯》第一一七—一一八页)。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还指出,军火生产不仅仅是一种“浪费的生产”,而且也协助了积累过程的再一次加速(来源同上,第一三七—一三八页)。麦蒂克在对巴兰和斯威茨的《垄断资本》进行批判的时候,甚至更为明确地说:“当国家为了生产不可销售的(?)商品而把劳动与未加利用的资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的真正功能是什么呢?赋税只是岁入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由于市场的交易而实现的。如果这些从资本中排除了,那么,它们就会降低利润,不管这些利润是被消耗掉了呢,还是作为追加资本进行投资了。如果都不是以这两种方式使用的,那么,未利用的资本仍然将以货币的形式作为私人的窖藏物而存在。这样一来,它就无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如果国家用它来资助不赢利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消耗的话,那么,它也就作不到这一点了。除了对资本主义毫无意义的一种货币窖藏之外,还出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毫无意义的商品生产和服务。但是仍然是有区别的:在没有赋税的情况下,资本将具有货币窖藏的作用,这种窖藏由于赋税而被没收了。”(载赫尔曼宁、芒特和罗尔绍森 Hermanin、Monte、Rolshausen 编):《垄断资本——论保尔·巴兰和保尔·斯威茨的著作》,法兰克福,一九六九年,第五十四—五十五页。麦蒂克没有理解到,他说的“被没收了的货币窖藏”已经被军火生产所取代,这种军火生产是一种吸收了额外剩余劳动并从而创造了额外剩余价值的商品生产——这种军火生产取自一种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不会产生一丝一毫的剩余价值。这就是增长了了的资本贬值,它导致增长了了的资本积累,因此,就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它决不是“毫无意义的”,只要剩余资本还存在——

- 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在军火生产中进行投资的资本没有从为了生产而应用于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资本中撤退出来。
- [34] 都留重人前引著作第三十三页;詹姆斯·奥康诺尔:《国家的财政危机》,纽约,一九七三年,第一一三页。
- [35] 纳塔里·莫斯克夫斯卡:《晚期资本主义的动力学》,第一一七——一一八页。
- [36] 来源同上,第一七九——一八〇页。
- [37] 万斯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地错了,正象他所作的一个假设也是错误的那样:在私人资本输出方面有一种持久的、结构方面的衰退。见《持久的战争经济》,第十二页。
- [38] 来源同上,第三十二页。
- [39] 大人物如一度曾任美国太平洋部队和朝鲜战争总司令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 Arthur),当他后来成为雷明顿——兰德公司董事的时候,在对斯佩里·兰德公司股票持有人的一次讲话中(一九五七年),还抱怨说,美国政府在美国人口中制造的“永久性焦虑精神病”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求“过度的国防开支”,这种开支将给各个公司增加不可承担的赋税。
- [40] 在第五章中,我们已经表明了第三帝国剩余价值率的急剧增长。但是,德国失业的衰减,导使每小时名义工资大约增长了25%(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四二年之间),而大部分都被生活费用的提高、消费品质量的变坏、工资扣除额的增加等等所排除。查尔斯·贝特尔海姆:《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经济》,第二一〇、二二二——二二四页。
- [41] 万斯:《持久的战争经济》,第三十二页。
- [42] “军火合同在最初给追加投资构成一种刺激,但是,从生产力不断增长的观点来看,必须有一个不断增长的开支,来保证新建工厂某种程度的使用,并且,甚至单单是军事费用的稳定,也有导致能力过剩的威胁。”西奥多·普拉格尔(Theodor Prager):《是经济奇迹吗?》,第一三三页。
- [43] 在这一方面参见马考姆·霍格(Malcolm W. Hoag)对兰德公司的研究:《军事生产功能中的利润增长》,载罗兰·麦克吉安(Roland N. McKean)(编)《国防经济学中的问题》,纽约,一九六七年。
- [44]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第一三九、一四三——一四四页。

- [45] 马雷·威登保姆 (Murray Weidenbaum) 指出, 90%的军用品构成了在特别建筑的工厂中生产的特殊商品。《军火工业的和平利益》, 载“原子时代”, 第五期, 一九六四年, 第一三三页。
- [46] 米契尔·吉德隆:《战争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 第五十五页。巴兰和斯威茨在更早一些时候提出过这同样的看法, 见前引著作第二一四—二一五页。
- [47] 弗里茨·威尔玛(前引著作第一九三—二〇六页) 讨论了六十年代早期有关军火工业可能再转变为“和平”工业问题的一场辩论。他对比了这样一些著作家如巴德(Baade)的乐观主义的和部分辩解的观点和列昂捷夫的比较谨慎的意见。真正的问题集中在牵涉到一切再转换的购买力转移问题上: 要维持一个很高的剩余价值率, 需要一种转移, 如果没有这种转移, 资本主义投资活动以及依赖这种投资活动的就业水平将会立刻骤然跌落, 那么, 究竟什么样的转移类型才是合适的呢? 塞莫尔·米尔曼(Seymour Melman)因此提出建议, 保持“国家”是顾客, 而电子工业是生产者, 而且生产转换成为这样的机器, 即对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根本没有影响: 运输控制装置、电子学习机器、医疗设备。其他一些规划谈到了废物处理以及控制空气和水污染的一些自动体系。
- [48] 都留重人前引著作第三十九页; 威尔玛前引著作, 第六十、二〇九—二一六页, 以及其他著作家的著作。
- [49] 波尔鲁:《和平共处》, Ⅱ, 第五〇〇页。
- [50] 在这方面参见奥立弗·威廉森(Oliver R. Williamson):《防护契约的经济学: 刺激与行动》, 载罗兰·麦克吉安(编):《防护经济学问题》; 莫尔顿·皮克和弗里德里克·舍若尔:《武器的获得过程: 一种经济分析》波士顿, 一九六二年。
- [51] 最初使用这一个词儿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D. D. Eisenhower)在他的向美洲国家的告别演说中(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从那以后, “军事工业综合企业”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在文献中出现, 例如: 夫利德·库克的《福利国家》, 这我们在一些地方已经引用过几次了; 加尔布雷思的《怎样控制军事》。美国参议员普鲁克斯迈尔(Proxmire)也写过一本关于这一问题的书:《荒地的报告》, 纽约, 一九七〇年。也见塞莫尔·米尔曼:《五角形资本主义》, 纽约, 一九七〇年, 和考夫曼

(Kaufman R.);《战争投机商》，印地安纳波里斯。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九年，在获得主要国防合同的四十三家大公司中工作的前高级军官（上校以上）数目，从721名增加到2,072名。

- [52] 威尔玛，《晚期资本主义的武装和解除武装》，第四十七页。
- [53] 这一条以及其他很多条引语，均见理查德·巴尼特(Richard Barnett)，《战争的根源》，巴尔的摩，一九七三年，第二〇〇页以下。
- [54] 这些估计数字均取自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这一研究所出版的一部著作探讨了整个这一问题：《军火贸易与第三世界》，斯德哥尔摩，一九七一年；斯坦利(J. Stanley)和皮尔顿(M. Pearton)，《国际军火贸易》，伦敦，一九七二年；乌利希·阿尔布列希特(Ulrich Albrecht)，《武器贸易》，慕尼黑，一九七一年。

## 第十章

### 资本的国际积聚和集中

资本就其性质而言，不允许对它的扩大有任何地理上的限制。<sup>〔1〕</sup>它在历史上的上升时期曾经导致地区性界限的拉平和大的国家市场的形成，这奠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基础。但是，资本刚刚伸进了生产领域，其扩大发展马上就把国家的限制扫除净尽了。它要设法为它的所有商品创造一个真正的世界市场，而不止是为了奢侈品创造世界市场，这种奢侈品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在国际间进行贸易了。资本主义大工业使得廉价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这种廉价大规模生产在这种过程中，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武器，但不是唯一的一种武器。作为资产阶级奴仆的国家，不得不使用政治上的、有时是军事上的力量来排除前资本主义各个阶级和国家所代表的各种障碍，以利于资本主义商品输出的不受限制的扩大发展。就连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最“自由的”和最“纯粹”资产阶级国家，也从来没有排除这种高压统治的运用，以便取得国际市场。只要回忆一下下列这些例子就足够了：英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动的几次鸦片战争、英国征服印度并巩固其统治的战争、美国在墨西哥的扩张性战争、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所进行的战争，等等。

这样，资本在国家扩大与在国际扩大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种联合结构，这在资产阶级要在国际范围内使用力量时所持的矛盾态度中反映了出来。在最后的分析中，这种关系是

不平衡规律和联合发展的一种表达，这种联合发展正如在第二章中已经说明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资本有一种天生的趋势，就是把国际扩大与国内市场的形成与巩固结合起来。所以，根据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条件，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把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都一起结合在一个有机整体之中了。〔2〕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一个新的范围既加给了国内的与国际的扩大之间的关系，也加给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与为了经济目的而对国家高压统治的故意使用之间的关系。资本在一个国家水平上的积聚——由于第二次技术革命和随之而来的资本积累的明显增长而加速了，而这种资本积累是在那个时期的增长部门为有效竞争所必需的——越来越导致资本的集中。这就意味着互相竞争着的“不同的资本”数目的根本缩减，一直到整个工业分枝都控制在少数托拉斯、公司和垄断集团为止，而普通的价格协议也改变了这些垄断集团的经济行为。于是，作为结果的竞争趋势并因而还有压缩了的国内市场的扩大，就倾向产生过分资本主义化、越来越多的资本输出和日渐增长的资本主义利息，这不但要有间歇性的炮舰远征以保证商品输出的通畅的渠道，而且为了资本输出，还要对新的投资领域实行永久性的军事占领和控制。帝国主义列强在整个世界之划分势力范围，这本身就是在国内市场资本主义竞争收缩的一种结果，这种划分导致了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竞争的加强，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敌视，而且还导致世界市场定期重新分配，包括动用武装力量重新分配——一言以蔽之也就是用帝国主义战争来重新分配的倾向。〔3〕

但是，在二十世纪，随着资本主义总的结构危机的爆发，以十月革命在俄罗斯的胜利为标志，一大片地区被从资本主义世界

市场上去掉了。此后的长期趋势，就是进一步限制资本积累的地理领域，到十九世纪结尾，随着中国的结合，这一限制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进军算走到了尽头。到这时，国际竞争越来越从国外市场转回到帝国主义的本国。现在，这些国家逐渐开始转变，从国际资本竞争的主体转变为国际竞争的客体，这已变得很清楚，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或大战之后。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国家的强制力量既为了保证能顺利收集国外的垄断剩余利润，又为了保证在国内资本积累顺利进行的条件，因而在经济中的干预更加直接了当了。这一步骤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sup>[5]</sup>

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一个特征是相对的国际资本稳定。资本的积聚仍然主要是在国内的；资本的集中尤其如此。当然，即使是在这个阶段，主要的趋势还被另外一种相反的趋势所交错，这个相反趋势就是资本向国际方面运动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是从几个大的金融集团中产生的，而在国际上国家贷款的重要性方面有所表现。劳动力在国际上越来越大的流动性，尤其是在所谓白人居民殖民地，也被伴之以某种程度的国际资本流动性，特别是在北美。在地中海区域，不仅仅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出口商品，而且还有西欧的资本，都越来越凭借国债间接深入到埃及和奥托曼帝国 (Ottoman Empire)，这样就为后来帝国主义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打下了基础。<sup>[6]</sup>但是总的来说，国际间的这种资本流动性的规模，仍然是很小的，这首先是因为，在那时国内市场对资本积累的扩大，还没有实际的限制，而且，在前帝国主义时期，国内资本投资的安全性，较之在国外投资要大得多，以致在国外任何利润率的差异，都被周围环境的没把握性所抵消掉了。

在古典的帝国主义时期，资本的积聚在性质方面已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资本投资已成为积累

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而且，殖民地剩余利润所作出的贡献也在稳步增加。资本的国际流动性突然之间大踏步发展，因为，古典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由于主要国内销售领域的垄断化而使得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尤其是在重工业方面的情况，越来越强迫资本的积累走向国际方面。但是，帝国主义的古典时期是以大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强烈的竞争性斗争为标志的，在这种斗争中，对于地理区域（国内市场加上殖民地）的军事上的、政治上的控制，对于它们在世界市场中所占份额的保护或者扩大，提供了一种基础。<sup>〔7〕</sup>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资本的国际积聚主要没有采用资本的国际集中的形式，而是采取了有裂纹的、国家的帝国主义垄断集团的形式，这些垄断集团在商品、原料和资本的国际市场上作为互相反对的敌手而斗争着。只是在极为稀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真正的国际资本溶合在一起。<sup>〔8〕</sup>古典的垄断只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进行合并，而在国际范围内，它就满足于暂时的协议（国际卡特尔等等）。资本的国家范围内的集中是由于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而得到了促进并加快发展了，这种集中无情地消灭了比较弱小的公司，而国家的干预却越来越被用来保证垄断集团的剩余利润。对比之下，国际协议却有时遭到破坏，因为这种协议最终顶不住国际方面的经济危机、工商业衰退和战争，或顶不住由不平衡发展规律所确定的资本主义各种势力之间关系的改变。<sup>〔9〕</sup>这并不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没有在垄断意义上的多国公司，这种公司的商品生产中有一个重要部分是在它们本国之外生产的。垄断着原料的那些帝国主义康采恩，几乎全部属于这一范畴。指出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就连在帝国主义宗主国本身保证其产量的大部分的这些垄断集团——比如说美国石油工业中的洛克菲勒集团——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对于外国生产基地，而不是外国市场，发展了

一种控制战略。但是，这些整个过程是发生在资本的国际积聚和国家集中的结构中的，并没有意义深远的那种资本在国际间的互相渗透，也没有严重地影响到制造部门本身。而且，从纯数量的观点来看，多国公司在资本输出过程中所占的分量，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在一九一四年，所有国际资本运动中几乎有90%采用了有价证券投资形式，而在今天，这种流动的75%是由多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组成的。<sup>[10]</sup>

当然，在一八九〇年与一九四〇年之间，这一主要趋势有一些例外情况。有两个英荷大公司，荷兰皇家壳牌公司 (Royal Dutch Shell) 和尤尼莱佛公司 (Unilever) 就是资本国际溶合的产物。瑞士有几家公司例如霍夫曼-拉-罗契公司和捏塞尔斯公司 (Hoffmann La Roche, Nestles)，其生产远远超出了国界。瑞典的克鲁格尔公司 (Kreuger) 在垮台之前，也属于这一类。比利时和法国的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合作用来给俄罗斯建造钢铁工业，而且在某些领域中，这种合作关系还以更大的规模，一直继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但是，这些个别例外在特色方面包括：1) 小而重量特殊但又相对而言具有相当资本财富的那些国家，这些国家越来越不能追求一种独立的帝国主义世界政策，尽管由于它们具有相对过剩资本，而与此同时它们需要增加他们的国际投资（荷兰、比利时，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有瑞士和瑞典）；2) 对于大的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力量还不是生死攸关的那些领域。例如，意义深远的是，当帝国化学工业公司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和德国法本工业公司 (IG-Farben) 在英国和德国形成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远远不是不重要的那些主要的外国股票持有者（例如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索尔维 [Solvay] 甚至是最大的单一股票持有者）<sup>[11]</sup>，被排除在这个大资本集团的控制之外，而不是包括在这一公司的领导班子之内。

虽然布哈林在这一问题上有时候有点摇摆不定，但是，他还是正确地抓住了这么一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要加上一句：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帝国主义时期，“国际组织”（国际公司和卡特尔）的重要性，“决不是象它乍一看起来那么大”。〔12〕在布哈林看来，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趋势，还是被资本民族化的过程所胜过的。〔13〕“‘民族经济’被转化成了一种单一的、大联合的托拉斯，参与这种托拉斯的都是那些金融集团和国家。这样的一些形态，我们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14〕按照布哈林的看法，（古典的）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是这些“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而不是资本的国际溶合。

第三次技术革命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形成，在这一方面表明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自此之后，资本的国际积聚开始发展成为资本的国际集中。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跨国公司成了大资本有决定意义的组织形式。在这一过程中起了特殊作用并且协助我们弄清楚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公司的发展与在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公司的发展之间在数量方面的差别的那些力量，是下列这些：

1. 第三次技术革命所释放出来的那些生产力的新的发展，已经到达了一种高度，在这一程度上，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有利可图的生产，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这不仅仅是由于国内市场的限制，而且也由于大量资本需要应用在生产方面。空间工业，或超声波运输飞机的制造，而也有明天更为可能的“抗污染工业”，都是在西欧这一过程的古典的绝对例子。集成电路的生产虽然是在欧洲的很多国家开始的，但是现在在整个西欧，能够有利可图的发展的，只有一家生产者，这种集成电路的生产是这同一趋势的相对的例子。在其他很多领域中也有证据说明，当代的生产力正在冲破民族国家的结构，因为，某些商品生产赢利的最低限度门槛，必须包括与某些国家市场相称的产品系

列。<sup>[15]</sup>比如说，如果在今天只有一架机器的话，这架机器以合理的速度和负荷可以生产供一千万消费者消费的火柴；另一台机器可以生产供两千五百万个消费者消费的电灯泡；只有一家炼油厂，这家炼油厂可供一千五百万个使用者的石油消费；等等。<sup>[16]</sup>像瑞典这样一个国家，其国内市场（国内消费）只允许一家卷烟厂最低限度最适度能力的30%，一家电冰箱厂的50%，和一家酿酒厂的70%。就连在加拿大，其国内市场也太小，不允许一家电冰箱厂使用最低限度的最适度生产能力。<sup>[17]</sup>这样，生产力的国际化就为资本的国际化创造了基础。除了其他之外，下面一种事实表明了这一点：国际工人运动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实际上发生在这同一个国际公司的内部（除了其他的不谈，例如在别处组装的汽车零件的出口、汽车备件等等）。生产力的提高所施加的在结构方面的压力，使得很多庞大研究计划的费用超出了中等国家财政手段能力之外，迫使这些中等国家在政府资助研究工作方面，朝着国际协调、国际合作、国际劳动分工的方向发展。出现多国公司的另外一个刺激因素，是向垂直联合方面发展的紧迫性，这是资本集中的动力之一。但是，这样一种垂直联合越来越必须包括处在完全不能相比的国家中的生产基地的联合，这当然要适应于原料来源、技术革新和资本在全世界的积累等的不平衡的发展。

2.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越来越发展的积累和积聚，使得更多的资本通过它们所实现的剩余利润而便于控制市场的公司和垄断公司所使用。其造成的结果是自我资助并过分资本主义化。<sup>[18]</sup>但是，既然垄断资本消灭价格竞争是很典型的，那么，销售和产量的增长，在国内就变得越来越受限制了。其结果也是急需一个大的公司扩大到国内市场之外，以便为它们的产品取得出路。这种扩大沿着两条道路发展：分化并联合国内市场的各个部分，<sup>[19]</sup>和专业化并分化世界市场的产品。为了长期利润最高限度

化的理由（大系列的优点、内部和外部的经济规模和市场控制等），它是这些趋势中的第二个趋势，这种趋势支配着占统治地位的大公司以世界规模来进行生产和销售。化学工业提供了一个范例。瑞士的大康采恩西拔公司（Ciba）（现在叫做西拔·格吉公司Ciba-Geigy）渗入了光化学生产（除了其他一些原因之外，由于它吸取了英国伊尔福特公司（Ilfort Company），并从而进入了听觉视觉装备的领域和印制、生产军用空中摄影设备的领域。规模很大的药剂公司已经侵入了食品工业（布里斯托尔·迈尔斯 Bristol Myers）、化妆用品领域（罗契 Roche，艾丽-莉莉 Eli-Lilly，罗素乌克兰夫 Roussel-Uclaf）以及医疗和药物设备领域（约翰逊和约翰逊 Johnson and Johnson，罗契 Roche）。〔20〕

3.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剩余利润最主要的形式是技术剩余利润（技术租金）。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技术革新的加速，都是为了追求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过程，这种新产品和新生产过程包括固有的对资本扩大的冒险，因为研究和发展需要大量的费用，而且，新产品和新生产过程还要求对新制造出来的商品有最大限度的产和销。〔21〕美国化学工业界一位发言人毫不含糊地声称：“为了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差额，新的产品和新的专业必须持续不断地发现，这和新产品和新专业可以提供高额的利润差额，而同一类型中较老的产品就一降而成为有较低利润差额的化学商品。”〔22〕这种压力反过来又给国际生产提供一个强烈的刺激，它也受到相对而言便于接近大的市场（大的城市区域人口密集处所）这一条件的鼓励。〔23〕因此，以生产专业化为基础的国际劳动分工的一种新的形式，现在就适应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的多国公司。〔24〕这些多国公司也试图从购买原料、设备、土地和建筑以及劳动力等的国际价格差别中获取利润，并且还从购买它们工厂中生产出来商品的市场价格的差别中获取利润，以便在全世界的范

国内尽量扩大它们的垄断剩余利润。<sup>[25]</sup>汽车工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欧洲的公司和日本的公司统治了美国的小轿车市场；某些公司，例如摩尔西德斯 (Mercedes)、沃尔沃 (Volvo)、BMW、阿尔法·罗米欧 (Alfa-Romeo)、西特罗因 (Citroen) 等美国公司，统治了欧洲大型车辆和豪华型的汽车；有些特殊的公司专门生产中型的轿车，另外一些公司则专门生产轻型的或重型的运货车，等等。

4. 社会政治力量（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持续不断的革命骚动）以及经济力量（原料生产从早期工业技术向先进的工业技术的转化；生产这种原料的日趋发展的化学方法而不是天然方法，等等）已经引起了向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资本输出的相对缩减。结果，过剩资本这时就主要徘徊于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这又进一步促使多国公司的发展。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资本流动主要起源于美国和英国，但是，欧洲大陆和日本的资本在今天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输出运动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本身，对于资本的国际联结的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比如在欧洲，分离的“民族的”欧洲公司要抵抗它们那些美国对手的竞争的能力，如果没有这种国际联结的话，就会受到很大的威胁。<sup>[26]</sup>

5. 各种各样帝国主义列强（或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它们所追求的保护贸易主义或半保护贸易主义的政策，增强了用资本输出以取代商品输出的现今的趋势，以便来克服这些关税的限制。所以，美国和英国的公司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已经建立起了很多分枝机构，以保护它们在市场中所占份额不受欧洲经济共同体对于来自第三国输出的普通关税的影响。这个因素在大公司要在本国之外建立生产单位的最早的努力中，已经发挥过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里弗尔兄弟公司 (Lever Brothers)、拜尔公司

(Bayer) 或贾根斯公司 (Jurgens) (乌尼勒弗尔的最初子公司之一), 就是这么实践的。到今天, 美国贸易政策中的新保护贸易政策倾向——几年来已经颇为明显, 但在尼克松 (Nixon Richard)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的讲话中更加刺耳——同样可以加速欧洲资本和日本资本向美国的输出。国际货币体系的越来越严重的不稳定性, 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它对不可预测的交换率的波动, 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恐惧, 而且对商品输出的扩大也起着一种制动器的作用, 而与此同时, 对生产基地国际化的资本输出还起着刺激作用。<sup>[27]</sup>

6. 对伴随着资本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日趋集中而来的资本的专业化控制和“合理化”控制, 鼓励直接对外投资, 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 它允许资本家在“纯粹”再生产活动的领域中越来越专业化, 并且允许根据客观标准, 不论是国家标准还是国际标准, 以侧重于新的投资。操纵市场竞争的逻辑及其与技术进步的联结, 在同样的方向起着作用, 因为对某些产品而言, 除了世界市场之外, “正常市场”的问题已不复存在。一家公司从国家的水平向国际水平的自我发展, 在“多种资本”方面适应着已经概括论述过的“一般资本”的客观发展趋势。<sup>[28]</sup>

德国一家大公司罗伯特·布什 (Robert Bosch GmbH) 的经理委员会主席最近总结了这些经济考虑, 这些考虑确定了他的公司向国际发展的如下决定:

1. 当代的一些市场, 这种市场往往使消费区域中的商品生产成为必要, 其理由包括运输费用、供应的安全、产品对地方需求的适应、就业和销售地区的结构问题;

2. 各种生产因素, 其中不但包括原料和能源, 尤其还包括劳动力, 其最大限度的结合, 是使生产成本最低限度化的一个先决条件;

3. 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发展，其中包含着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因素，并且还要求国际协调；

4. 风险的分配，当现有趋势是朝着利润降低、困难增多的方向发展时，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目标。

有几个数字足以说明这种生产国际化区别于剩余价值实现的规模。如果我们把一个“国际公司”作这样的界说：在它的总周转额、投资、生产或雇用中，最低限度有 25% 是在其本国之外或在其中管理之外，那么，美国的二百家最大的公司中，有七十五到八十五家属于这个范畴，欧洲最大的二百家公司也属于这一范畴。<sup>[29]</sup>在一百七十六家美国最大的康采恩中，有七十一家平均有三分之一的雇员居住在外国。<sup>[30]</sup>在一九六七年，十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的一千三百亿美元的出口额，在同样这些国家的这些公司的子公司和国外生产中心的营业额（二千四百亿美元）中，完全超过了一半。一九七一年，多国公司在其本国领土之外据说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高达三千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世界贸易的总价值。<sup>[31]</sup>根据马格多夫 (magdoff, Harry) 的意见，在一九六五年，美国公司利润中有 22% 来自这些公司的国外股票。<sup>[32]</sup>一九七二年初，已被描述为多国公司的所有公司的营业总额，根据我们上述的定义，据估计在三千亿与四千五百亿美元之间——换句话说，大约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生产总额的 15% 至 20%。<sup>[33]</sup>由于在过去这十年中，这种营业量的增长较之社会生产总额的增长率快了一倍，因此，它在后者中所占的份额在下一个十年中将会提高到占 28% 至 40%，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而这看来是不会继续下去的。

但是，在谈到资本向国际集中的趋势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它的不同形式之间作出区别，并且必须把“多国公司”这一概念描述得更确切一些或者把它作相对物来描述。资本集中就意味集中的

指挥权，或者说，对生产手段的集中控制——换句话说，就是集中的私人所有。股票是否在国际间广泛地分散到了小的或中等程度的股票持有者手里，这在目前的上下文里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下面那种情况是资本主义联合股票公司和整个垄断资本的一个臭名远扬的特征：在任何主要的公司里拥有大量资本的话，就有权指挥更大量的资本。

所以，资本的国际集中就意味着对原属不同国家来源和不同国家控制的资本的集中指挥。这种集中可以相应地采用两种形式：或者是，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有主的大公司和大企业，可以在单一的帝国主义阶级的控制之下（比如布尔机器公司 Machines Bull 之被通用电气公司 General Electric 所吸收、菲尼克斯工厂 Phoenix Works 之被福尔斯通公司 Firestone 所吸收、比利时 ACEC 公司之被威斯汀豪斯公司 Westinghouse 所吸收，等等）；或者是在另一方面，有不同国家所有主的大公司大企业，可以互相交织在一个国际公司内部，而控制权不必落入任何单一势力所有主的手里，例如 AGFA 和格瓦尔特 (Gevaert) 的混合体、伊姆敦—霍什—道尔特芒特—豪德尔—胡敦 (Ijmuiden-Hoesch-Dortmund-Horder-Hutten) 之联合合并、登楼普—皮尔里 (Dunlop-Pirelli) 和 AEG—桑努西 (AEG-Zanussi) 混合体以及 VFW—福克尔 (VFW-Fokker, 德国与荷兰飞机托拉斯) 联合体等。<sup>[34]</sup>

美国有些大公司在很多国家已经创建了分枝机构和子公司（例如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福特汽车公司 Ford、埃索标准公司 Esso Standard、得克萨科公司 Texaco、威斯汀豪斯公司 Westinghouse、通用电气公司 General Electric 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等），这些公司显然不包括在真正的国际资本溶合的范畴之内，因为这些公司的资本的根源以及控制，其性质都毫不含糊地是一个国家的。北美洲的这些

公司就象大英帝国古典的英国康采恩的那些公司那样，代表着资本的国际积聚，因为，这些公司已经积累的资本中有越来越多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来自在本国以外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35〕它们并不代表资本的国际集中。这种国际集中只有在这样的時候才能发生：当这些公司在它们的国际活动过程中，吸收了各个国家的地方性的公司和企业的时候。

为了澄清资本国际集中的长期发展趋势及其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在下面这些情况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别是极为重要的：剩余价值实现的国际化（商品的销售）、剩余价值生产的国际化（商品的生产）、劳动力商品的购买的国际化（或这一商品的特别市场）、以及指挥资本的权力的国际化，而这种权力的最终基础，常常是资本所有制的国际化。

剩余价值实现的国际化，也就是商品的销售，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一种趋势，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中，却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在发展。就广义而言，这种国际化从十九世纪初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就一直在发展（也就是，输出说明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工业产量的增长额）；从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五年，它又缩退了；随着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到来，它又一次得到发展，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达到的相对水平（换句话说就是按人口平均的输出额），一直到一九六〇年才追上。〔36〕

在过去，在实际制造工业中只有剩余价值生产的边际国际化，这还是在原料领域之外。在今天，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它成了资本国际化的真正新的、特殊的一个方面。现在，一大部分的大公司在地球上很多国家花费它们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论是在它们直接控制下的分枝公司，还是在其与其他公司的联合商业冒险中，也不论是在外国公司在外国建立而后来又购买过来的那些企业，还是在外国康采恩交织在其中的那种大规模的多国公司。

这种发展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就开始了的，尤其是在美国石油、汽车和电力仪器工业等方面，到了今天，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这一现象第一次实际上为资本竞争提供了直接国际结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电子工业方面，美国一些最重要的计算机公司之间的国际竞争领域）。〔37〕

劳动力商品购买的国际化，是剩余价值生产国际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尽管这两者在机制方式方面不一定完全一致。一方面是由于在国外生产可以不用很多外国劳动力而进行，尤其是在高度机械化或高度自动化工业的那些企业或分枝部门中。在另一方面，可能有大批的劳动力国际流动以寻求职业，而不一定作之以生产基地及生产基地所有权的国际化：我们可以看一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南斯拉夫、土耳其和摩洛哥等国劳动力大批地流向西欧，特别是流向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国家，而西欧工业的所有制关系并无任何改变。在一种意义上，这两种流动，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并不是平行的或互相补足的（这与它们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趋势是相对立的），而是互相冲突的。劳动力从不发达的边缘地区流向西欧工业中心地区的真正原因就是，资本并没有（或者没有充分地）流出这些中心地区而流向那些边缘地区。〔38〕

指挥资本权力的国际化，即实际上的资本集中，往往意味着所有权的转换，或者是从一个国家转换为另一个国家，或者从一个国家的资本所有主集团转换为几个集团。在这里也一样，流行的是不平衡的规律和联合的发展。资本的国际集中从必要性方面和机制方面来看，都与生产的国际化或生产者的国际化或商品销售的国际化，不相一致。只有当生产国际化导致资本所有制国际化——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国际改变——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谈到指挥资本权力的国际化。〔39〕使得资本能够行使一种真正的国

际指挥权力的物质基础结构，只有由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其用户直通电路设备、喷气式飞机以及其他的设备，才能创造出来。

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与资本国际集中之间的三种类型的关系，在这里必须加以区分清楚。资本的国际集中也许会伴之以一个单一国家势力在国际方面的扩大。这一种倾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可以看出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及其后果方面，这一种倾向在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军事霸权方面，也有引人注意的表现。它基本上适应于资本国际集中的两个主要形式的第一种形式：由一个单一国家资本家阶级所有主对于国际生产仪器越来越多的股票的有决定意义的控制，外国资本家也参加进来，但充其量只是一种低级的伙伴。一个单一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越来越大的国际力量，是与一个单一国家资本所有主集团在整个国际资本领域中越来越高的国际霸权，相一致的。

资本的国际集中也可以伴随着各种各样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力量的逐渐解除，并伴随着一种新的、联合的、超国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势力的兴起。看来，这个变种对西欧经济共同体地区而言，如果说不是必定的，至少说是可能的，这个变种是与资本国际集中的第二个主要形式相一致的：资本的国际溶合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资本家特殊集团占据优势地位。正象任何一种霸主地位都不能为这些真正的多国公司所容忍那样，与这种资本形式相一致的国家形式，最终不能包含着一个单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称霸，也不能包含着一些主权的民族国家的松散的联合。它必须采用超国家的、联合的国家形式，其特征是关键性的绝对权力的转移。

把在这一方面的纯经济势力看成是绝对的，并且使这些经济势力脱离整个历史环境，那肯定将会铸成大错。资产阶级国家功能所要保护的，不仅仅是资本持有主的直接经济利益——或者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每一个发展阶段中的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家集团。为了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事实上它还必须把它的活动扩大到上层建筑的一切领域，这项任务作起来如果不慎重地考虑到每一个特殊民族的民族方面的、文化方面的特征，那会遇到很多困难的。<sup>[40]</sup>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经济功能被推向前景推到如此远的程度——被为了取得对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所有阶段越来越大的控制的那种强制力——以致在某些条件下，垄断资本会毫无疑问地把超民族的联邦与民族国家文化活动之间的某种劳动分工，考虑为一种较小的罪恶活动。不应该忘记的是，比如说在美国，凡是牵涉到教育、宗教信仰和文化的的所有问题，都是——自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来——一直掌握在个别州的手里，而不是掌握在联邦政府的手里。除此以外，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对教育问题和文化问题加以调整，也决不是不可能的（可看一下瑞士联邦的州制度）。

在西欧，向创建一个超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方向发展的压倒一切的紧迫感——如果资本国际集中事实上采用了资本在欧洲水平上的溶合这种占优势的形式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树立霸权的话——正是来源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经济功能。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经济规划最终与资本的多国溶合是水火不相容的。<sup>[41]</sup>不是前者把后者强拉回来，尤其是在危机时期或大衰退时期，就是后者势必会创造出一种与其自身相适合的国际规划的形式。<sup>[42]</sup>

这两个选择对象之间的选择，最终势必出现关于反周期经济政策问题的焦点，因为，与多国公司利益相一致的反危机和衰退的斗争，只在一国范围内进行，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它只能是国际的。既然反周期政策的工具包括有货币设备、信贷设备、预算设备、赋税设备和关税设备，那么，这种政策最终就必须在手头

备有统一的国际货币，和在信贷、预算和赋税方面的统一的国际标准（共同的国际贸易政策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已经成为现实）。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具有处理税务和财政事务的权力并且还有行政约束权力以加强其权威性——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政权的话——那么，要想有一种共同的货币、共同的预算、共同的税务制度和共同的公共事业规划，最终是不可能的。<sup>[43]</sup>还应该指出的是，大的多国公司也会创造出一个多国资本市场，这个多国资本市场无论如何会使得残存的国家货币、国家信贷政策和国家的预算和赋税等等，越来越成为问题。<sup>[44]</sup>

国际资本集中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第三个可能的变体是前者相对地说无视后者。在这一方面常举的例子特别有英国、加拿大和某些荷兰的大公司。<sup>[45]</sup>通常强调的是，这些公司已经使它们的活动国际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并且在这么多的国家里生产并实现剩余价值，以致它们对它们祖国的经济和社会局面的发展，大部分都变得漠不关心了。<sup>[46]</sup>

不必否认这一变种的存在，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看作不过是上面简述的两个主要变种之间的一种中间体而已。因为，经过进一步仔细分析，在这些“国家不关心的”公司作用的不同方面，我们必须作出区别来。有这样的情况，这些公司在这样的一些国家经营，这些国家的政权本身是这么脆弱，以致它对移居国外的康采恩对额外利润的追求，毫无抵抗能力：这最终只是在被英国资本所控制的那些半殖民地国家，情况才是如此。或者有这样的情况，这些公司在这样一些国家经营，在这些国家中，介入经济的国家政权是独立于这些国家的。随着国际竞争和资本集中的进一步深化，上述第一组国家将会倾向于越来越利用它们手头现有的政权力量来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抵制可能有的竞争者。但是，在上述第二组国家方面，那些“国家不关心的”公司的地

位，就会变得一天比一天受到在本地政权机器中享有真正支援的那些公司的威胁。于是，这些公司在放弃它们对国家漠不关心的态度之前，在它们寻求控制它们的本国政府或控制它们经营主体处于其管界以内的那个地方政权之前，那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如果它们失败了，那么，这些一度持“漠不关心”态度的公司，就不得不对于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低估国家的作用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它们最终将会倒向它们的竞争者。<sup>[47]</sup>

这样，从对这第三个变体的考虑中可以得出的唯一意义深远的结论就是，即使是没有资本所有制的国际化，剩余价值生产的日趋国际化也能导使大公司的“非国有化”。换句话说，如果一家公司，比如飞利浦斯电气无线电公司 (Phillips) 或英国石油公司 (British Petroleum) 要把它的活动的主要部分转移到北美洲去，那么，它对于加拿大或美国经济局面的兴趣，就大于对英国或欧洲的兴趣，因此，它就会比利用英国国家机器更多地利用北美洲的国家机器，以追求其经济利益，而且，也许通过它与“纯粹”北美洲康采恩的合并，它本身将会最终变成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里，在建立起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之外，不允许我们来探讨这样一种“移民”的可能性。但是，这样一种演变总是会导使我们绕一个弯路而又回到前两个变体方面。

所有那些著作家们都象莱芬逊那样，把多国公司当作压倒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巨人，并且心照不宣地假定一种概念，这一概念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时极为流行，那就是：大资本已不再需要顾虑在销售或利润实现方面有什么严重的困难，或有什么主要的社会危机，<sup>[48]</sup>而且，即使在所谓“商业衰退”时期，大资本的投资活动仍可进行而不受任何损害。换句话说，他们只是简单地预测，国家干预经济活动以掌握尖锐的、周期性的结构方面的危机或控制阶级斗争的大爆发，已没有进一步的必

要。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西德的工商业衰退、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的暴动、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意大利的“灼热的秋天”、一九六九——一九七一年美国工商业的衰退以及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全世界范围的工商业衰退等，都表明了这种假设的不现实性。事实上，现在可以作出的一个肯定的预言是这样：多国公司不但需要一个国家，而且还需要这样的一种国家，这种国家实际上比“阶级的”民族国家还要更加强大，以便使它们至少能够部分地克服那些经济方面的和社会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周期性地威胁着它们那庞大的资本。

在国际资本集中与晚近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可能有的关系的这三种变体，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为帝国主义宗主国政治体系的国际结构提供了三种可能有的模式：

1. 超帝国主义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单一的帝国主义势力具有这样一种霸主地位，以致其他各种帝国主义势力都丧失了其真正的独立性，并且落到了半殖民地小股势力的地位。归根结底，这样一种过程不能只依赖超帝国主义势力的军事霸权——这是一种只有美帝国主义才具有的优势——而必须对最重要的生产基地、资本积聚、银行和其他地方的其他各种金融组织，努力达到直接所有和直接控制的地步。如果没有这样的直接控制，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直接处置资本的权力，那么就根本不能保证，不平衡的发展规律归根结底不会再一次对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势力的经济关系加以改变，致使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军事霸权本身受到损害。

主张这种“超帝国主义”概念的人当然看到了那些主要的美国国际公司是真正的——潜在的或实际上的——世界市场的统治者。<sup>[49]</sup>他们对于欧洲的大公司和日本的大公司最终与它的那美国对手进行有效竞争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些欧洲的和日

本的大公司被认为在技术上太落后,所具有的资本力量也太单薄,或“经营管理”技术太缺乏。<sup>[50]</sup>或者,他们怀疑这些欧洲的和日本的公司的政治意志,即使它们也许能够进行“纯经济的”竞争,以抗拒美国的竞争的话,因为,这样一种阻塞也许可能给当代世界帝国主义的军事和政治中心以致命的打击,从而也最终地打击了它们的自身。<sup>[51]</sup>在这一方面,普兰察斯(Poulantzas, Nicoso)的这样一种论点:我们自己已经被“领土的”统计学错误地引导到了低估美国资本(包括以欧洲为基地的美国公司)霸权的地步,这一论点是典型的,但它却是没有基础的。<sup>[52]</sup>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论点总是以为不同国家的资本家集团(美国的、欧洲的或日本的)所拥有的各个国际公司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飞利浦斯电气无线电公司、菲亚特(Fiat)公司、ICI公司、西门子公司(Siemens)或罗恩——普林克公司(Rhone-Poulenc),都是归欧洲资本家所有的,正象三菱公司、日立公司、松下公司和索尼公司归日本资本家所有,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艾克松公司(Exxon)、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或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之归美国资本家所有那样。

2. **极端帝国主义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国际资本溶合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不同国籍的资本所有主之间的一切经济利益的实际差别,都消失了。所有主要的资本家都已经将他们的资本所有、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实现和资本积累(新的投资)加以扩大,非常平稳地扩大到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以致他们对于任何国家的特殊局面、阶级斗争的特殊情况、政治发展的“民族”特点等等,一概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sup>4</sup>附带说一句,世界经济的这种彻头彻尾的国际化,也将意味着国家经济循环的总的消失。在这种不测事件中,唯一可以保留下来的,就是多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本身也将不复存在——换

句话说，竞争将会从其在民族国家中的起点，最终解放出来。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就不会“消亡下去”，消失的只不过是它那作为帝国主义之间竞争工具的功能而已。它那作为保护一切帝国主义资本所有主共同利益而不使之受经济危机威胁、不使之遭受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暴动的威胁、不使之遭受殖民地人民造反的威胁以及不使之遭受外部非帝国主义国家势力的威胁的主要武器的功能，将会较之以前更加明显。只不过这样一种国家已不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而是一种超国家的、帝国主义的“世界国家”而已。主张这样一种多国公司越来越对资产阶级国家权力持“漠不关心”态度的论点的人中，有很多都非常接近于这种初生的“极端帝国主义”概念。莱芬逊的情况，尤其如此。〔53〕

3. 持续的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模式，采取一种新的、有历史意义的形式。在这一模式中，尽管资本的国际溶合已经发展到足以用较少数目的帝国主义超级势力以取代较大数目的、独立的、大的帝国主义势力，但是，资本不平衡发展的反作用阻止而不能形成一个资本利益的真正的、全球性的共同体。资本溶合作到了大陆范围的水平，从而大陆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越发加强了。近来的这种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如果与列宁所分析的、古典的帝国主义相对比的话，其新颖之处首先在于这样一种事实：在国际帝国主义经济中，只有三个世界列强在互相对抗，那就是：美帝国主义（大体上包括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内）、日本帝国主义、〔54〕和西欧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或是独立发展，或是与美国大公司相溶合——很可能将会确定这一竞争性斗争的最后结果。其次，当然还有这么一种事实，在眼前这种基本上对资本不利的社会政治世界局面中，全球性的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大战，已经变得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变得极其不

太可能了。当然，这并不排除这些可能性：或是地区性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可以说是由代理人代为进行）、或是新的殖民地掠夺性战争、或是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反革命战争——更不用说为反对官僚主义化了的工人国家而进行的世界核战争的危險了。

人所共知的是，卡尔·考茨基第一次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所有世界列强之间会出现“极端帝国主义的谅解”。他提出这一点首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sup>〔55〕</sup>也是人所共知的是，列宁怎样尖锐地驳斥了考茨基。<sup>〔56〕</sup>尼科劳斯(Nicolaus, Martin)也谴责本书作者踩着“考茨基的脚印”正视了欧洲各个列强溶合成为一个欧洲帝国主义超级强国的可能性。<sup>〔57〕</sup>这种类似，纯粹是形式上的，而且是肤浅的。考茨基的远景是各种帝国主义矛盾的逐渐削弱，从而导致“极端帝国主义”。我们的远景则完全相反。它正视的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都加强了：在宗主国与半殖民地国家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对抗；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对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加强。正是帝国主义之间各种矛盾的这种加深，一定会在某些帝国主义势力的觉醒中，给它带来一种合并的倾向。这些帝国主义势力已经不再能继续进行竞争性的斗争了。考茨基的分析坚定地导向一些改良主义的、辩解的结论，而相比之下，我们的分析的逻辑的顶点，是更加强调在宗主国中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革命的任务。<sup>〔58〕</sup>

当然，列宁本人也决没有排除资本进一步的国际积聚和国际集中的可能性——其中包括那些大的帝国主义列强的资本在内。事实上，列宁明确地声称，长期的历史趋势是“合乎逻辑地”向单一的世界托拉斯的方向发展。但是他深信，在这一发展到达其最后结论之前很久，帝国主义将会崩溃，这既是由于其内部各种矛盾也是由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为反对它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所

造成的结果。<sup>[59]</sup>我们赞同这种意见，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推迟，使得多种帝国主义势力类型简化成为三种“超级势力”成为可能的，如果不是一定的话。

因此，在上面列出的三种模式中的最后一种模式，迄今是最有可能的，至少在可见的将来是如此。作为最后的分析，这些模式中的每一种模式的个别实现，要依赖资本国际集中所采取的主要形式是什么，不论军事势力或政治势力的短时自主份量可能有多么大。

超帝国主义之能够实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办到：称霸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垄断资本在其最重要的、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内部，取得资本所有权达到有决定性意义的程度。到目前为止，美国帝国主义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日本，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这些国家的金融资本大部分仍独立于其美国对手之外。美国的银行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只起一种边际功用。尽管美国的工业资本的所有权是较大的进口额，尤其是在那些所谓的发展中的部门中，有时还超过了平均数，但是，其在资本投资总额现在所占的份额，估计略略超过10—15%。而且，这一份额不受阻碍地增长的趋势，也并不明显；看来勿宁说有拉平之势。所以，直到现在还决不能说，西欧的国家和日本已经降到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这些国家在贸易、外交和军事方面都在寻求独立的政策，即使是这种独立权是在为反对共同的阶级敌人而在共同联盟的结构中行使的。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联盟完全符合于所有资本家阶级的共同利益，决不是只符合于美国帝国主义的特殊利益。的确，还应该指出的是，自从五十年代初期以来，美帝国主义及其西欧和日本对手之间的势力关系，在不断地向不利于美国帝国主义而有利于西欧和日本的方向演变。<sup>[60]</sup>

美国——西欧——日本经济势力关系的演变<sup>[61]</sup>

## 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

	1953	1963	1970
美 国	52%	44%	40.5%
欧洲经济共同体	16%	21.1%	22%
联合王国	10%	6.4%	5%
日 本	2%	5.3%	9.5%

## 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百分比

	1953	1963	1970
美 国	21%	17%	15.5%
欧洲经济共同体	19.3%	27.8%	32%
联合王国	9.7%	8.7%	7%
日 本	1.7%	4%	7%

## 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和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

	1953	1963	1970
美 国	43%	25%	8.3%
欧洲经济共同体	11.5%	29.5%	37.0%
联合王国	5%	4.3%	3.5%
日 本	1.5%	3.0%	11.2%

## 资本主义国外投资总额百分比

	1960	1971
美 国	59.1%	52.0%
联合王国	24.5%	14.5%
法 国	4.7%	5.8%
西 德	1.1%	4.4%
日 本	0.1%	2.7%
瑞 士		4.1%
加 拿 大		3.6%
荷 兰		2.2%
瑞 典		2.1%
比 利 时		2.0%
意 大 利		2.0%

然而，在这一领域中的发展，还没有达到终了阶段。国际间资本竞争的势头，在一些年中会越来越剧烈，迟早必然会导向资本国际集中在质量上更高的阶段。<sup>[62]</sup>据估计，目前重要的国际公司的数目大约是 800。波尔缪特尔<sup>3</sup>(Perlmutter) 曾预言，大约到一九八五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将要由三百家这样的公司来统治。莱兹(Lattes Robert) 在他那似乎有点印象派作风的著作中预言，大约有六十家多国公司来分担世界市场。<sup>[63]</sup>这些公司只是美国的公司吗？或者一方面是美国公司，而另一方面则还有欧洲的和日本的公司，或者另一方面还有欧洲的公司、日欧的公司和日美的公司？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会解决超帝国主义这一模式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这一问题。如果宗主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进一步推迟的话，那么，一切事情最终都要依靠资本国际集中的这两种主要形式到底哪一个形式最终能取得胜利。

很明白的是，美国的所谓多国公司进入这种强化了了的竞争性

斗争的新阶段，与它们的对手相比，有两个重要的有利条件：在现阶段，它们平均具有大得多的资本资源（比它们那最重要的竞争对手要大上三四倍），并且，它们手头还有一个强大得多的国家可资利用。它们的西欧对手和日本对手如果也同样经历一个迅速的国际合并过程，并且在资本所有制的规模和生产能力方面达到与其最大的美国对手相等的水平，并且，至少在西欧，建立起一个与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处于同等地位的联邦的话，那么，它们仅仅能够存活下来而已。所以，欧洲经济共同体在下次或下下次经济衰退中的命运，大概就可以确定一个独立的西欧超级强国出现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因而也就确定了美国超级帝国主义实现的机会。

极端帝国主义模式要想变成现实，首先就必须有一种较今天所出现的前景在程度上要高得多的国际资本集中。特别是这预示了这样的情况：欧洲和日本的大的股票持有主们大规模地参预管理最重要的美国公司，这种情况暗示出美国对这些公司的所有权减少到了相对而言少数股票权的程度。在今天，这一点似乎比欧洲和日本大公司所有制类型的对等减少更为未必可能了。<sup>[64]</sup>

下述这种情况肯定是真实的：欧洲和日本向美国市场输出的迅速加强——这在今天对世界市场所起的中心作用，就像英国国内市场在一七八〇——一八八〇年时期所作的一样——是伴之以一种倾向的，这种倾向就是欧洲和日本资本向美国的投资渠道越来越宽阔。尽管这种运动现时的重要性还不象美国资本之投资于西欧那样，但是决不能把它轻看为无关宏旨。除了一些欧洲公司直接向美国投资之外，某些美国公司被欧洲公司所吸收的一些著名的例子，也应该提一提。英国石油公司取得了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Ohio)事实上的控制权，并在阿拉斯加石油公司(Alaskan Oil)有很大的股本。菲亚特公司现在对艾利

Deutsche Bank、比利时的通用银行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Banque 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银行 Amsterdam-Rotterdam Bank)，这个国际公司除了别的之外，已创建了一个欧洲信贷银行 (Banque Europe'anne de Crédit Moyen) 以及在美国的一家普通金融公司欧美银行公司 (European-American Banking Corporation) 和在太平洋中的一家联合企业欧洲——太平洋金融公司 (Euro-Pacific Finance Corporation)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南非)；

——C. G. B. 集团，这个集团联合了德国的商业银行 (Commerzbank)、法国的里昂信贷银行 (Crédit Lyonnais)、意大利的罗马银行 (Banco di Roma) 以及西班牙的美西银行 (Banco Hispano Americano)，其方式接近于合并，并被认为与伦敦的劳埃德银行 (Lloyd's Bank) 是有关联的。

——第三个集团是欧洲银行 (Société Financière Européenne)，这个集团确实有一个美国伙伴，那就是美洲银行 (Bank of America)，但是，这个伙伴在这个国际财团中仅仅起次要的作用。这个财团主要是欧洲的，它联合了巴尔克莱银行 (Barclay's Bank, 英国)、荷兰阿尔格曼尼银行 (Algemene Bank Nederland, 荷兰)、德累斯顿银行 (Dresdner Bank, 德国)、布鲁塞尔银行 (Banque de Bruxelles, 比利时)、国民劳动银行 (Banco Nazionale del Lavoro, 意大利) 和巴黎国民银行 (Banque Nationale de Paris, 法国)。这些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总额超过了 800 亿美元——比全世界任何其他银行或金融集团的都要大。这一集团——美洲银行除外！——与拉丁美洲各种各样的伙伴们一起，在那个大陆上创建了一个国际财团，名字叫做欧洲拉丁美洲银行 (Euro-Latin-american Bank 或 Hulabank)。

——只有第四个集团，即所谓“奥利安集团 (Orion Group)”，

可以认为是非欧洲的。除了美国的曼哈顿大通银行 (Chase Manhattan Bank) 之外, 这个集团还包括加拿大皇家银行 (Royal Bank of Canada)、威斯敏斯特国民银行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大不列颠) 和西德意志地产银行 (Westdeutsche Landesbank, 德国)。

一九七〇年, 第五个重要的银行集团形成了, 那就是国际联合银行 (United International Bank)。这一财团是由下列银行组成的: 罗马银行 (Banco di Roma)、米司与霍普银行 (Mees and Hope)、新苏格兰银行 (Bank of Nova Scotia)、拜耳·海波台克与威塞尔银行 (Bayerische Hypothek-und-Wechselbank)、法国外贸银行 (Banque Francaise du Commerce Exterieur) 和瑞德信贷银行 (Crédit du Nord)。有一家美国银行, 克罗克国民银行 (Crocker-Citizens National Bank) 参加了这一国际财团, 但其作用很小 (14.3%)。欧洲的商业银行家在合作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苏伊士金融公司 (Compagnie Financière de Suez) 与摩根·格伦菲尔股票公司 (Morgan Grenfell Holdings) 之间新近达成协议这一例子, 足以说明这一点。一九七四年春天, 巴黎荷兰银行 (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瑞士信用准备银行 (Schweizerische Kreditanstalt) 和法国的法国银行公司 (Société Générale) 为支援新的能源计划而建立了一个公司, 名字叫芬纳格公司 (Finerg)。比利时的银行总公司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Banque)、英国的密德兰银行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银行接着也决定参加进芬纳格公司。所有这些多国金融集团的主要特征, 就是它们有能力允准庞大的多国公司的庞大的信贷。因此, 它们同时也就是资本国际集中的一种产物, 并且是真正的国际资本市场出现的一种产物。<sup>[67]</sup>

直到现在, 资本向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直接渗透, 还进行得

十分缓慢，这一点也不错。在一九六一年与一九六九年之间，几个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公司之间，发生了总数为 257 次的溶合，而在成员国公司与第三国公司之间的溶合，则达 820 次之多，并且在同一个国家公司之间的溶合次数，达到了 1861 次之多。法律上和组织上的各种困难——这些困难最终是与西欧联邦的缺少相适应的——在推迟资本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互相渗透方面，起了一种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欧洲不同国家公司之间的合作，就比完全溶合要发展得迅速。例子有许多，比如乌尼达塔公司 (Unidata)，这是一个计算机国际财团，是由飞利浦斯电气无线电公司 (荷兰)、西门子公司 (西德) 和国际计算机公司 (法国) 共同创办的；另外还有犹罗迪夫公司 (Eurodif) 和乌伦科公司 (Urenco)，这是建设浓缩铀工厂的，浓缩铀是核反应堆的燃料。

国际帝国主义经济的发展步伐越是放慢下来，那么，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越变得尖锐。资本的国际竞争越是残忍，那么，这些社会矛盾就会越趋尖锐化，随之而来的是每一个个别的帝国主义阶级要以既牺牲其自身的工人的利益、也牺牲其对手的利益的方式来解决其特殊的矛盾和各种困难——换句话说，就是将这些矛盾和困难输出给它们的竞争对手。在未来的岁月中，强化阶级斗争的结果，将会反过来共同确定资本国际集中的步伐和形式。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是从指向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转而指向对于生产手段的控制的进攻和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攻，那么，工人阶级对于资本国际集中的各种变体的姿态，就会越加独立，工人阶级对于所谓“罪恶较少”政策路线，就会越要避免，而且在西欧，在美国霸权、“大西洋共同体”的计划、作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超级势力或欧洲过多小国的持续的欧洲联邦之间的冲突中，工人阶级将会更加清醒；而且，工人

斯——查姆勃尔斯公司(Allis Chambers)的筑路设备部门还拥有类似的控制权。奥里维蒂公司(Olivetti)购买了安德伍德公司(Underwood)。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在提倡共同规划,这种规划把全世界许多工业巨子都联系在一起了,这也是真实的情况。除此之外,受“大西洋”意识形态所鼓励的院外集团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以便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形成一种日趋紧密的利益集团和资本的联锁经营。但是,竞争的无情的命令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行动中,超出了世界公民身份的政治见识和观念。在今天,加强国际竞争性斗争的主要趋势,并不是使大资本以一种世界规模进行合并,而是一些帝国主义形态在其互相对抗中进一步强固。

帝国主义之间继续对抗的这种模式,在三种模式中看来似乎是最有可能最现实的了。即使有这么一种附带条件也是如此,这个附带条件就是,资本的国际溶合在西欧和日本必须以某种速度来进行,以便保卫这些地区各个帝国主义阶级的独立性不受美国帝国主义的损害。<sup>[65]</sup>最后,这第三个模式的较大的可能性是与这样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国际集中的第二种主要形式是否能有效地对付第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在未来的数十年中,资本的国际集中是不是将采用这样一种联合的形式:一方面是美国控制的公司,另一方面是在国际间溶合的多国公司。

在欧洲金融资本内部向一种利益集团和互相参预发展的趋势,在这一方面是特别重要的。迄今控制了西欧的,正是这一种趋势,正如莱芬逊所认为的那样,<sup>[66]</sup>而不是在欧洲和美国大银行和大金融集团之间的利益共同体的出现。在那四家最重要的多国金融利益共同体中,有两家完全是欧洲的:

——欧洲银行国际公司(European Banks' International Company)(英国的密德兰银行 Midland Bank、德国的德意志银行

阶级就会更加有信心地更加有活力地确定他们自己的立场——赞成欧洲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经济发展放慢而国际竞争又强化了的情况之下，对于资本的国际集中问题的任何暂时解决办法，都只能在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办到。因为，最终确定每一个这种解决办法的，就是在垄断部门中平均利润率的突然增长，而且在未来的岁月中，要想作到任何一种这样的增长，只能靠提高剩余价值率才能作到，换句话说，只能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西欧的工人阶级以及后来北美和日本的无产阶级，将会抵制这种剥削的加强，这一事实从最近四年来的实际经验中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在美国本国内还可望发生对实际工资的更加野蛮的攻击。美国之所以能在数十年中维持其物质差异，是由于它在生产力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到今天，在很多生产分枝部门中，这种领先地位正在消失。在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五年期间，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美国为每年2.6%，而在西欧则为4%，在日本则为6.8%。在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九年这一期间，这些数字分别为：1.7%、4.5%和10.6%。<sup>[68]</sup>在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劳动生产力在美国完全停止了增长。在这样一些情况之下，美国资本对降低工资差别有迫切的兴趣。所以，在一九六八年，美国、比利时和日本钢铁工业中每个雇员的产量相同，而每小时的工资费用，在美国则等于比利时的二倍，并且等于日本的四倍。<sup>[69]</sup>

资本的国际集中必须这样来理解：资方企图冲破民族国家这一历史障碍，正象国家的（到明天也许是超国家的）经济计划代表着这样一种企图，就是企图部分地拆除私有制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私人占有的那些障碍那样。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两者都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限度以内超越资本。<sup>[70]</sup>因此，这二者都

只不过是更高的水平上重新生产这一生产方式的种种内在矛盾，特别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扎根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所有矛盾中。适应资本日趋国际化需要的国际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压力，必然会在国家范围内与经济发生冲突，并因而——经过一个经济的非常增长阶段之后——加深了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对危机的敏感性，至于发生冲突到何种程度和加深敏感性到何种程度，我们将在本书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中加以说明。但是，我们首先必须分析一下晚期资本主义的新的组织形式对于宗主国经济与半殖民地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第十一章），然后再分析一下其对生产领域与分配领域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影响（第十二章）。

## 注 释

- [1] “固然，世界市场本身，也形成这个生产方式的（指资本主义的——著者）基础。不过另一方面，这个生产方式固有的按不断扩大的规模来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也促进着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并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三二八页（应为第三三三页——译者）（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三七三页）。
- [2] 马克思很明确地指出，英国资本主义的棉纺纱业的飞跃发展，“不只温室般地助长了”以美国南部各州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资本论》，第一卷，第四四三页（中译本第一卷，第四七六——四七七页）。在这一方面，也见艾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伦敦，一九六四年，第一六九——一七七、一八六——一九一、一九四——一九六页。
- [3] 令人感兴趣的是，列宁在他对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所作的注解中，批评了希法亭对金融资本所下的定义是统治了工业的银行资本，并且把生产领域中的内在发展，作为他自己进行分析的起点：《列宁全集》，

第三十九卷，第三三八页。

- [4] 尤金·瓦尔加最先使用了“资本主义衰退期”这一观念，见他的同名著作：《资本主义衰退期》，汉堡，一九二二年。
- [5] 关于国家对晚期资本主义利润——尤其是对垄断利润——的保证，参见厄尔尼斯特·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第五〇一——五〇七页。
- [6] 关于埃及，见大卫·兰茨：《银行家与帕夏》，伦敦，一九五八年；关于土耳其，见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现代土耳其的出现》，牛津，一九六八年，第四五二页。
- [7] “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因，既在于购买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条件，也在于最终的销售条件。通常有三个问题与之有关：原料市场与劳动力问题；资本投资的新领域问题；最后是市场问题。”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第二五六页。
- [8] 当布哈林第一次提出资本集中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在国家集中与国际集中之间作出基本区别（《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第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三——六十页）。但是，后来他对这一问题更为清楚了。
- [9] 参见布哈林：《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第六十页。瓦尔加和门德尔森（L. Mendelsonn）（编）：《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新资料》，纽约，一九四〇年，第一六七页。
- [10] 拉伊芒德·弗尔农：《海湾的主权》，伦敦，一九七一年，第三十七、四〇——四十一页；克利斯托弗·图根达特（Christopher Tugendhat）：《多国公司》，伦敦，一九七三年，第三十八页。
- [11] 乔治·斯托金（George W. Stocking）、麦伦·瓦特金斯（Myron W. Watkins）：《行动中的卡特尔》，纽约，一九四六年，第四三一页。
- [12] 布哈林：《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第六十页。布哈林也从世界经济方面的古典著作中引用了一个有特色的句子，即从萨托利乌斯·封·瓦尔特尔绍森（Sartorius Von Waltershausen）的《外国投资的国民经济体系》，柏林，一九〇七年，第一〇〇页：“似乎不会出现生产集中管理的国际公司。”相比之下，伯纳德·哈尔姆斯（Bernard Harms）正确地识别出了生产国际化的萌芽，见《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九一二年六月。

- [13] 布哈林：《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第六十一、五十三页以下。
- [14] 来源同上，第一一七——一二〇页。也见布哈林：《转化期间的经济》，第一〇——一三页。
- [15] 布朗 (A. J. Brown) 提供了下面的有趣数字：一个现代的炼铁炉可以生产出的铁，足够一个有一百万居民的工业社会之用；一个现代的钢厂所生产的钢，足够一个有二至三百万居民的类似社会之用；一个持续生产的轧钢厂可供应两千万居民的社会之用；一个特殊产品例如宽带钢和磁化钢板等的轧钢厂可供应更多的人口。布朗：《世界经济概观》，伦敦，一九六五年，第一二五页。
- [16] 来源同上，第一二六——一二七页。不但在实际生产中情况是如此，而且在运输领域中也是如此。这样，北大西洋航线大规模的集装箱体系的运用，就被“大西洋集装箱航线”所取代，这一航线是由来自四个不同国度的六家欧洲轮船运输公司组成的（大西洋航运公司、康纳德航运公司、荷兰——美国航运公司、瑞典大西洋航运公司、瑞典——美国航运公司以及华伦尼乌斯航运公司）。这些航运公司中，没有一家能够独力担负得了包含在这种技术转化中的那些费用和冒险。
- [17] 最低限度的最适度生产能力是一种水平，如低于这个水平之下，单位生产成本就开始增加。参见舍若尔：《工业工厂规模的决定因素》，载“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一九七三年五月，第一四一页。
- [18]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第五一一——五二一页。
- [19]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这一倾向所采取的最重要的形式，就是所谓的“联合大企业”。关于这一现象的一项彻底的分析，载在“美国经济评论”，第十一卷第二期，一九七一年五月。也见弗勒尔 (W. F. Fuelle)：《联合大企业合并的理论》，载“经济学季刊”，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号。在一九六五——一九六九年期间，在美国有 80% 以上的公司合并者，这导致了联合大企业的出现，而在一九四八——一九五三年间，则只有 52%。安纳-玛丽·库姆普斯 (Anne-Marie Kumps) 和米契尔·卡顿·戴利特布尔 (Michel Cardon de Lichtbuer)：《联合大企业的集中》，载“经济生活的反映和前景”，一九七一年第二期。

- [20] “新苏黎世报”，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企业”，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 [21] 斯蒂芬·海莫尔(Stephen H. Hymer)：《多国公司的效率(矛盾)》，载《美国经济评论》，一九七〇年五月号，第六十卷，第二期，第四四五页。
- [22] 贝克曼(J. Bachman)：《化学工业的经济学》，华盛顿，一九七〇年，第二一五页。
- [23] 查尔斯·金德伯格在《美国的国外商业》第十四页中强调指出，主要公司操作半径迅速发展的两个先决条件是，前已存在的国家工业高度集中和由于招牌响亮而产生的很大的国际销售可能性。这回答了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尔(Robert L. Heilbroner)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玻璃和车辆有广泛的“国际生产”，而机具和造船却没有。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尔：《多国公司与民族国家》，载“纽约图书评论”，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一日。
- [24] 查尔斯·金德伯格：《欧洲战后的发展》，第一一四页；弗尔农前引著作第七十一——八十二页。
- [25]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本迪克斯(Bendix)一直在使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装配汽车收音机在世界市场上出售。福特(Ford)为欧洲的其他地方制造汽车而在荷兰制造防护钢板，在德国制造拖拉机部件，并且为了在美国的装配工厂使用而在英国为小型汽车模型制造电动机。辛格尔(Singer)在苏格兰、加拿大、日本和美国交叉运输其多种式样、多种模型的缝纫机，在市场和成本因素许可的情况下集中生产不同的型号。”弗尔农：《海湾的主权》，第一一〇页。其他一些例子，见图根达特：《多国公司》，第一三九、一四二和一四九页。
- [26] 关于对这里所牵涉到的一些问题的彻底探索，见拙著：《欧洲对美国？》，伦敦，一九七〇年。近些年来，日本资本输出的迅速增长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在一九六七年以前，每年输出平均数字从来没有超过一亿至二亿美元。此后就跳跃增长，至一九六八年增至四亿美元，一九六九年增至六亿七千万美元，一九七〇年增至九亿一千三百万美元，到一九七一年就超过了十亿美元。日本国外投资价值总额，现在已经超过了一百亿美元大关。单单欧洲直接在美国的投资就从一九六六年的六十亿美元，增至一九七一年的一百亿美元；欧洲在美国的长期

- 有价证券投资从一九六六年的一百一十五亿美元增到一九七一年的二百六十亿美元。
- [27] 查尔斯·金德伯格：《美国的国外商业》，第一八八——一八九页。莱芬逊：《资本、通货膨胀与多国公司》，第三十六、五十四——五十五等页。
- [28] 关于多国公司在大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发展中的根源，参见斯蒂芬·海莫尔前引著作，第四四二——四四三页；阿尔弗利德·钱德勒：《战略与结构》，第四十二——五十一、三二四页。这些著作家们都认为多种分工公司起了一种重要作用，即作为“国家”公司与“国际”公司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而多种分工公司是三十年代才出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变得普遍起来）。
- [29] 西德尼·鲁尔夫 (Sidney E. Rolfe) 和瓦尔特·丹尼姆 (Walter Danim) (编)：《世界经济中的多国公司》，纽约，一九七〇年，第十七页。
- [30] 肯尼特·西芒兹 (Kenneth Simmonds) 和考特尼·布朗 (Courtney Brown)：《世界商业：诺言与问题》，纽约，一九六九年，第四十九页。
- [31] 图根达特：《多国公司》，第二十一页。
- [32] 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前引著作，第二十一页；哈里·马格多夫前引著作，第一五九页。
- [33] 较低的估计是诺曼·麦克拉 (Norman Mac Rae) 作出的：《国际商业的未来》，载“经济学家”，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较高的估计是美国商业巨头阿萨·罗斯 (Arthur Ross) 作出的：《多国康采恩的倾向》，载《Gottlieb Duttweiler-Institute—Topics》，第三年，第五期，一九七二年五月。
- [34] 国际资本联合方面有一个例子：国际股票的销售把所有权的类型“冲淡”到了这个地步，以致原来的“创建国家”对这一公司已经失去了控制。据说瑞士大公司雀巢奶品公司甚至荷兰的飞利浦斯电气无线电公司的情况就是如此。到底情况是否真的如此，我们表示怀疑。
- [35] 在国外证券中——这种证券对有关公司的影响(或控制)是无比的——进行的大量的“有价证券投资”，是没有国际集中的国际资本积聚的一种特殊的晚期资本主义形式(它在“古典的”帝国主义时期已经以胚

胎的形式存在了)。这样一来，欧洲资本家在美国公司中已经占有总额为260亿美元的证券，而他们在这些美国公司的管理方面是无份的。而欧洲资本输出到美国去的——从此以后——主要都是有价证券投资。美国资本输出到西欧的，主要都是在欧洲的直接投资。

- [36] 根据拉马丁·伊茨(Lamartine Yates)的估计，按人口平均世界贸易一九三七年低于一九一三年(-7%)，而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六三年这一时期按人口平均世界贸易每十年的平均增长率则为8%。但是，在世界产量出口份额整个一个世纪都在上升(据说已经从一八〇〇年的3%增长到了一九一三年的33%)的同时，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衰减时期；甚至在一九六三年，这时它还是22%，它仍然还没有恢复到它一九一三年的水平。西蒙·库兹尼茨：《各国经济增长的量的方面》，第四——九页。
- [37] 根据国内和国外生产的个别比例，把国际操作的国家公司与国际公司加以区别，是可取的，而且，根据其个别所有权的类型，把国际公司(由单一国家的资本来控制)与多国类型的公司加以区别，也是可取的。金德伯格：《美国的国外商业》，第一八〇——一八四页。
- [38]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大量欧洲移民向所谓白人居住殖民地移居的时候，劳动力和资本也沿着同一方向在旅行——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向太平洋移居、印度人和黎巴嫩人之分别向东非和西非移居以及地中海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小量移居活动等，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当代从东欧和南欧之向大陆西部移居的情况，则是劳动力之移动方向与资本的方向相反。
- [39] 资本所有权必须作这样的理解：即对资本的控制，这种所有权的基础，可以是在资本总额中占相对说较小比例的股票。根据金德伯格的观点，美国公司所占有的股票不超过其国外分枝公司的60%。《美国的国外商业》，第三十一页。这可与这样的事实相对比：在国外操作的美公司中，有1,851个高级管理职位，外国人只占其中的1.6%。图根达特正确地评论道：“现代多国公司的最明显不过的特征，就是它的中心方向。不管公司的规模有多么大，也不管其分公司在全球分布的有多么多，其一切操作都要与中心相协调一致。”《多国公司》，第三十一页。
- [40] 对于这种非经济上层建筑因素的特殊强调，说明了法国戴高乐派紧紧

抓住欧洲“小国”原则的原因，并且说明了他们反对“没有灵魂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官员们所代表的那种“超国籍论”。

- [41] 这就是近几年来我们表达下面这种观点的原因：欧洲经济共同体还不是最终“不可改变的”，而且仍然可以成为一次严重的普遍衰退的牺牲品。
- [42] 后者必须在一种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第一，就量而言——换句话说，就是一种经济计划类型，这种类型可以由国家把大量的反周期资源动员起来，以对付危机时刻的实现困难以及大公司例如西门子、菲利普斯、菲亚特公司或卜内门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等所经历过的销售困难；第二，就质而言——换句话说，就是一种经济计划类型，这种类型能够消除特殊的地方性利益而为最大的跨国公司谋取更广泛的利益。
- [43] 蒂波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曾指出：结构方面的危机和失业危机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出现。他还争辩说，因此，共同就业和基础结构政策(或者一种公共工程政策)，也将最终证明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是不可避免的：《经济理论与西欧一体化》，伦敦，一九六七年，第九十七—九十八页。
- [44] 某些著作家已经指出了跨国公司近些年来在挫败一些国家稳定利息和通货率的企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例如可参见莱芬逊前引著作第三十六—三十七、七十—七十一页；图根达特前引著作，第一六一页。我们将在本书第十三章和十四章中讨论这一问题。
- [45] 罗伯特·罗托恩(与斯蒂芬·海莫尔合作)：《国际大商业：一九五七—一九六七年》，剑桥，一九七一年，第六十二—六十三、七十四页。
- [46] 见罗伯特·罗托恩：《帝国主义：团结或对手?》，载“新左派评论”，第六十九期(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月号)，第四十六—四十七页。罗宾·马雷(Robin Murray)在《资本国际化与民族国家》(载“新左派评论”，第六十七期(一九七一年五月—六月号)，第一〇四—一〇八页)中承认了这种矛盾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晚期资本主义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他并没有注意到，大公司因而必须寻求一种适合其需要的国家势力。
- [47] 在一九七四年的衰退时期，甚至连规模非常大的公司比如英国的雷兰

德汽车公司或西特罗因公司等之所以幸免于破产，就靠的是其本国政府的资助。但是，这些正好是在西欧民族国家仍然能够支持的限度之下的一些大公司。多国公司比如菲利普斯、卜内门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西门子、菲亚特或罗尼普伦等如果有严重的财政危机的话，其所需的资助的规模，远非资本主义欧洲任何一个单一民族政府所能负担得起的。

- [48]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本书第十五章和十七章。
- [49] 见巴兰和斯威茨：《垄断资本》，哈里·马格多夫：《帝国主义时代》。
- [50] 这是包含在金·堆克斯·塞尔万·什莱伯尔的《美国的挑战》中的一个警告，如果欧洲资本的合并延期而且西欧的政治统一不能具体化的话。
- [51] 马丁·尼科劳斯在其与我们争辩的著作《帝国主义的目标》（柏林，一九七一年）中，发展了这一论点。
- [52] 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伦敦，一九七五年，第五十一—五十七页。
- [53] 莱芬逊前引著作，第一〇三—一〇六页。
- [54]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在大西洋地区日本的大公司，参见斯蒂芬·海莫尔：《美国多国公司与日本在大西洋的竞争》（为大西洋会议而准备的讲演稿，智利，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三日）。蒙作者将手稿见惠。赫尔曼·卡恩在《超级大国日本的出现》（伦敦，一九七一年）中，讨论这同一主题，但是，这本书的特点是著者那无限制推断的典型的倾向。日本资本在南朝鲜（占67%）和泰国（占37.3%，而美国则占16.2%）是主要的外国投资者，在新加坡则居第二位；见“远东经济评论”，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三日。
- [55] 卡尔·考茨基：《帝国主义》，载“新时代”，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一日：“因此，就纯粹经济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通过另一阶段而活下去是不可能的，这另一阶段即卡特化转化成外交政策：这是一个超帝国主义阶段，当然，我们要竭力为反对这一阶段而斗争，正象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所作的那样，但是这一阶段的危险在于另外一个方面，而不在于军备竞赛和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见考茨基这篇文章的英译文，载“新左派评论”第五十九期，一九七〇年一月—二月号，第四十六页。

- [56] 见列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七六四—七七二页。
- [57] 尼科劳斯：《帝国主义的目标》。
- [58] 见我们对马丁·尼科劳斯的答复：《帝国主义的矛盾》，柏林，一九七一年。
- [59] “值得怀疑的是发展方向会是这样的：一个单一的世界托拉斯，它将毫无例外地吞下一切企业和所有国家。但是，这一发展方向是以这样的侧重点、这样的步伐、这样的矛盾、冲突和震动——不但是经济上的而且还是政治上的、国家方面的等等——而进行的，那就是，在一个单一的世界托拉斯形成之前，在个别国家金融资本形成一个‘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盟之前，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会爆炸，资本主义将会走向它的反面。”列宁：《布哈林〈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的序言》，第十四页。
- [60] 关于这种变换的经验方面的证据，见拙著：《欧洲对美国？》在那里所提供的资料主要指的是生产能力，与此同时，新近的一些发展已经突出了资本输出的不同的步伐。在今天，西德和日本的资本输出，发展速度要比美国的快得多。
- [61] 前三个表：米契尔·巴拉特——布朗：《从劳工第一主义到社会主义》，诺丁汉，一九七二年，第一一〇页，除去一九七三年二月黄金和持有外币一栏，见“国立研究所经济评论”，一九七三年五月号，第九十九页。第四个表：一九六〇年的估计，见马格多夫前引著作，第五十六页；一九七一年的估计，见《多国公司和世界的发展》，联合国，纽约，一九七三年，第一四四页。
- [62] 大家公认的是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在遭受能力过剩和结构危机严重的重工业的某些分枝部门中，可能形成一种“世界卡特尔”，来阻止倾销和“夸大了的”投资，从而稳定世界的价格。在这里，我们尤其注意钢铁工业。
- [63] 见“相互影响”，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号，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尔所引，见前引著作第二十二页；罗伯特·莱兹：《亿万美元》，巴黎，一九六九年，第十页。莱兹引用了一个预言，预言是美国全国工业会议委员会所作，根据这一预言，美国国民生产总额的20%将会控制在欧洲和日本公司手里，而西欧和日本的国民生产总额中，有25%在一九七五

- 年是被美国公司所控制的（第三十七——三十八页）。
- [64] 应当强调的是，在国际公司商业活动日趋“行星化”的过程中，欧洲特别是西德的公司，在一段时间内已经将其生产基地转移到东亚（比如转移到新加坡、香港和南朝鲜），目的是为了在其与日本公司的竞争性斗争中，剥削地方的廉价劳动力的利益。见莱芬逊前引著作，第九十五——九十九页。
- [65] 布哈林完全承认资本国际溶合的重要性，即使如此，那也是他那时的一种暂时现象：“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出现了利益集团的团结一致。这就是越来越多的‘参与’和资金筹措，也就是由于共同的安全所有权，各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具有集体的财产。”《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第六十二页。
- [66] 莱芬逊前引著作，第一——二页。
- [67] 见米契尔·封·克莱姆的有趣的分析：《联合银行的兴起》，载“哈佛商业评论”，一九七一年五月——六月号。这一汇编列出了约五十家国际财团。其中欧洲的（包括美国参与非常少的那些在内）和欧—美混合的，数目大致相等。但是，在那些占最高联合资本的财团中，欧洲的联合财团是迄今最重要的。
- [68] 哈维·布鲁克斯（Harvey Brooks）：《美国的技术领先正在发生什么？》，“哈佛商业评论”，一九七二年五月——六月号。
- [69] 国际冶金工人联合会：《Alljährliche Erhebung über Lohn-und Arbeitsbedingungen, Produktion und Beschäftigte in der wichtigsten Zweigen der Metallindustrie》，一九六八年，第十二——十三、二页。
- [70]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四一七页。

## 第十一章

### 新殖民主义与不等价交换

资本的国际运动经常产生生产力的国际差异并扩大这种差异，同时，其本身也受这种差异的进一步确定，而这种生产力的国际差异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特征。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未被利用的原料和劳动力还有大量的储存而未被拖入剩余价值的生产中。这些储存与早期工业化国家大量现成的过剩资本相结合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资本从宗主国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输出这种情况。在古典的帝国主义时期，剩余利润的主要形式源于宗主国与殖民地利润率之间的差异。

现在，让我们来简略地回顾一下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在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所投资资本利润率实际差异的根源。

1. 生产原料、粮食、奢侈品的殖民地种植园以及殖民地矿山的平均资本有机组成，实际上低于宗主国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平均资本有机组成。

2. 殖民地的平均剩余价值率也往往超过宗主国的平均剩余价值率，特别是由于殖民地地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可以超越宗主国所可能有的各种限制。（当然，尽管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远远落后于宗主国地区的。）而且，殖民地劳动力的价值不但相对地降低了，并甚至最终也绝对地降低了，正象在十八世纪中叶与十九世纪中叶之间在西方所曾经发生过的那种情况一样。

3. 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使得劳动商品的价格更进一步降

落得低于其在殖民地的价值。而在宗主国家的工资，自十九世纪的后半叶以来的经济繁荣周期中都提高了，甚至在危机周期中也从来不曾低于前一次危机或前一次繁荣时的水平，殖民地的工资在每一个危机阶段都系统地降低，在下一次繁荣周期也不能再恢复到其危机前的水平（殖民地的工资往往在经济高涨阶段根本无所增长）。〔1〕

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社会功能中有一部分直接费用必须由宗主国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额中加以资助，因而也就相应地降低了生产性资本的平均利润，殖民主义制度将这一部分直接费用转换成了殖民地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的剩余生产（本地各社会阶级的收入，比如大的土地所有主、农民、工匠和商人等）。例如地方赋税就包括了殖民地行政管理费用和某些基础工程的费用。〔2〕这就使得生产性投资资本的纯利润率有可能常有相当的增长。

在古典的帝国主义时期，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这种平均利润率的实际差异所造成的结果，并不是殖民地国家资本积累的加速，而是殖民地国家资本积累的放慢，因为，在这些国家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相当一部分的剩余价值（不光是剩余利润，而是一切利润）都被从殖民地国家吸到了宗主国家去了，这些剩余价值在这些宗主国里或是被用来增加积累，或是被作为剩余税收而被分散。

除了这些剩余利润之外，宗主国家还有一种进一步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机制，那就是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在帝国主义阶段开始之后已经变成了一般的规律（中间曾有两次被打断，即两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也就是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和一九四〇——一九五三年两个时期）。这种不等价交换就意味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倾向于用数量越来越多的土生土长的劳动（或劳动产品）来交换数量不变的宗主国劳动（或劳动产

品)。进出口交换比率的这种长期发展，是这一种倾向的尺度，尽管其他一些决定因素也发生了影响：这些因素中有垄断资本对原料市场的控制以及这些物质由帝国主义的大公司从宗主国家中进行的殖民主义生产等等。

虽然要作出统计方面的计算是很困难的，但是，下述情况还是很清楚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在大战期间，不等价交换就数量而言，其重要性是小于殖民地剩余利润的直接生产和转变的。因此，殖民地剩余利润是那个时期宗主国对第三世界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而不等价交换只是一种次要的形式。在这里提出估计数字不是很容易的；这些数字充其量只能代表一个大概数字。我们首先从这样一个事实开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是大不列颠，大不列颠从国外资本投资中每年所获得的收入大约是两亿英镑——人所共知这不仅仅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而且也在一些工业化了的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这一数字可以与下面的资料加以对比。在一九一〇——一九一三年期间，英国国外的进出口交换比率与一八七一——一八七四年期间的几乎一样。在四分之一世纪期间，这种比率一直比一八七三——一八九三年间的“大萧条”以前的时期更为对英国有利，尽管对联合王国最有利的时期只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此后，进出口交换比率的发展就不再对大不列颠有利了。<sup>[3]</sup> 在一八八〇年与一九一四年之间，英国对外贸易有不到50%是与不列颠帝国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进行的（人所共知，我们还必须在这一数字中加上东欧的一些数字），<sup>[4]</sup> 而这一对外贸易总额，在一九一三年为十三亿英镑。我们可以假定，从这一时期进出口交换比率的不等价交换中所取得的利润不超过20%（出口高于“国内的”价值10%，进口低于“殖民地的”价值10%）。根据这一假设所给出的利润大约为一亿三千万英镑，而对比之下资本收入则为两亿英

镑。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这个比例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不等价交换成了殖民剥削的主要形式，而殖民地剩余利润的直接生产则只起一种次要的作用。萨米尔·阿敏曾作过这样的估计：由于“不等价交换”的结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所招致的损失总额，在六十年代中期每年大约为 220 亿美元。<sup>[5]</sup> 这一数字可以与一九六四年私人对外资本投资的收入总额加以对比，这一年的收入总额是 120 亿美元。<sup>[6]</sup>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形势相比的话，那么这个对比是很明显的（不应该忘记的是，自从二十年代以来，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产品的进出口交换比率方面曾发生过一种相当严重的恶化情况，<sup>[7]</sup> 而这一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帝国主义全盛期，其意义是不那么大的）。

这一变化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国际资本运动的一系列结构方面的转变，是紧密相关的，而这些转变我们已经简略地讨论过了。资本输出的主流已不再是从宗主国家输往殖民地去，而是在宗主国本身之间了。在不发达的国家，外国投资的重点已经从纯粹的原料生产一变而为消费品的制造。当地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已经使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引进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是专门设计来使利润和股息向宗主国转移更加困难的。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企图提高这些工人和贫苦农民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比例，这种剩余价值的增长完全是为他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帝国主义的公司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这种企图并不是没有取得成功。在不发达国家中那种受着帝国主义影响的从直接统治向间接统治的过渡，以及政治独立的普遍化，使得土生土长的统治阶级至少能够资助剩余价值生产的一部分间接费用，这一部分费用在以前必须由他们所占有的非资本主义剩余生产中从剩余价值本身来加以满足——换句话说，这些费用中的一部分已经转变成了帝国主义资本。<sup>[8]</sup>

多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帝国主义内部重点的转向机器、设备和车辆的输出，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把这种趋势看作是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一种“战术方面的”反应。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晚期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一种“有机的”产物。<sup>(9)</sup> 主要多国公司的世界范围的战略，包括对控制半殖民地那有限的、但逐渐在扩大的内部市场的无可置疑的兴趣，即便是说那是为了取得对这些市场的将来的控制。这一过程趋向于剥夺所谓“民族的”资产阶级对制造工业的统治，而土生土长的资本、外国的资本、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结合在一起的联合冒险，成了帝国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或新殖民主义阶段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sup>(10)</sup>

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七年三月，印度所有外国公司已登记纯资产增长了八亿六千万卢比（资产总额为二十五亿卢比），单单在制造业中，在一九五六年与一九六四年期间建立起来的联合冒险事业就代表了初始资本的二十亿卢比以上，其中有八亿以及一些更大得多的资产是由外国人控制的。在一九六七年，美国多国公司在拉丁美洲参与了五百五十个以上的联合冒险事业。但是，在这一领域中的真正的、大规模的先驱，是在汽车工业、化学工业、电机工业和钢铁工业方面的欧洲多国公司。在非洲，尤尼莱佛公司（Unilever）及其地方性的分公司已经在一些国家，例如尼日利亚越来越多地建立起了联合冒险事业。日本的多国公司正在东亚和东南亚、中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广泛地摹仿这种类型。一个例子是两千亿日元的一家石油化学工厂，这个工厂住友公司正在与新加坡政府一起作为冒险事业而修建，年产乙烯三十万吨。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一个国际的联合冒险事业，这就是在沙特阿拉伯的厄尔儒贝尔（Al Jubayl）以八亿美元的巨款建造一个钢铁联合企业的规划，其资本结构如下所示：皮特罗敏公司（Petromin，

沙特阿拉伯国有公司)占50%，马康纳公司(Marcona, 归犹他国际公司控制, 是一家美国公司)占20%，胡戈芬斯·伊姆敦—霍什—道尔特芒特—豪德尔—胡敦联合公司(Hoogovens IJmuiden-Hoesch-Dortmund Hörder-Hutten Union, 荷兰德国钢铁公司)占12.5%，日本钢铁公司和日本钢管公司(日本公司)占12.5%。<sup>[11]</sup>

正是由于所有这些原故，在不发达国家中直接生产出来的殖民地剩余利润，尽管在不列颠帝国主义这一特殊的情况下其绝对意义还一直是很大的，<sup>[12]</sup>但是相对于主要帝国主义公司的利润总额来看的话，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其重要性已在逐渐消失。但是，在这一方面经常引用的那些数字，应该从三个方面证明是合格的。第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公司往往能够将在半殖民地国家或殖民地国家直接生产出来的利润的一部分加以掩盖而把这一部分利润说成是产生于宗主国家。这种作法的最为人所知的例子是石油工业、铝土矿和有色金属工业，这些工业的原料是以天然状态从不发达国家中输出，在宗主国家地区加工以适应工业上的用途的。在这些领域中的帝国主义公司利用人工手段来压低从有关半殖民地的输出价格，以便在计算上驱除掉在半殖民地国家中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这一部分剩余价值只能在精炼油、铝、铜、锡等等的出售价格中表现出来。<sup>[13]</sup>既然我们所说的这些公司都是联合的垄断企业，它们控制了从原料的实际选取一直到出售给制造工业的所有生产和分配阶段，那么，利润究竟是表现为选取公司的利润，还是运输企业或精炼企业的利润，对它们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价值总额中有一部分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统计数字中表明为大原料公司在国内市场上生产的利润，而实际上这一部分剩余价值并不是宗主国工人创造出来的，而是半殖民地国家的生产者创造出来的。<sup>[14]</sup>

既然这一点关系到了同一个多国公司的那些分公司之间的工

作，那么，不受任何个别的“利润最高限度化”支配的“转移价格”就得到了公认，这种价格显然是有利于掩蔽利润的。在举出的那些例子中有一个例子，例如在哥伦比亚，医药多国公司的一些子公司所付出的价格，较从母公司进口商品的正常出口价格多155%。另外据报告，在橡胶工业方面，转移价格高出正常输出价格40%，而在电子工业方面，竟高出258%到1100%。同样，跨国公司半殖民地子公司的输出价格，也可以大大地“压低”。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对这些作法的一项研究表明，被考查的子公司中有75%左右它们输出产品的价格与地方公司类似产品所收受的价格相比的话，被压低了约50%。<sup>[15]</sup>

第二方面，出自不等价交换的剩余利润本身，往往只是直接生产出来的殖民地剩余利润的一种伪装形式。如果垂直联合托拉斯从殖民地原料输出到宗主国，然后，又将用这种原料制造出来的成品货物从宗主国输出到半殖民地去，情况就正是如此。<sup>[16]</sup>此外，如果在半殖民地国家与宗主国之间，同样国际公司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可以有主要的国际价格差别的话，那么，在这个半殖民地就完全可以有在宗主国伪装成为一种输出利润的剩余利润直接生产。

第三方面，在半殖民地国家伪装为储备因而在帝国主义公司的平衡表格中不作为利润的那种新积累起来剩余价值总额，也必须加进殖民地利润和殖民地剩余利润的总额中去。<sup>[17]</sup>

但是，即使是所有这些情况都考虑进去了，毫无疑问的是，在今天，直接生产出来的殖民地剩余利润总额，作为帝国主义剥削第三世界的一种形式，其重要性仍然小于不等价交换。有关拉丁美洲的资料，很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在那里，在一九五——一九六六年期间，大陆出口利润的损失，远远超过了通过外国公司利润的资本不断外流。<sup>[18]</sup>

那么，作为不等价交换基础的价值得失或得，是从哪里来的呢？马克思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明白的答案，这种答案代表着将一般的劳动价值学说应用于国际贸易方面。<sup>[19]</sup>在资本主义时代，<sup>[20]</sup>不等价交换归根结底导源于不等价劳动量的交换。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的内部，大体说来不等价交换有两个来源：

1. 这样一个事实：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被认为优于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而其生产的价值也就较多一些。或者换个说法也一样，在一个国家市场内的情况是这样，不太强和生产能力较差的劳动力得到正常的报酬，因此，较强的和生产能力较高的劳动力就获得较高的报酬）。

2. 这样一个事实：在世界市场上根本没有利润率平等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市场上，不同国家的生产价格（平均利润率）肩并肩地并存着，并且以上文第二章中所描述过的方式互相连接在一起。<sup>[21]</sup>

阿菲利·艾曼纽尔（Arphiri Emmanuel）和萨米尔·阿敏从鲁尔·普利比什（Raul Prebisch）<sup>[22]</sup>最初提出的一些论点出发，借助于将马克思和李嘉图结合在一起而绕过工资费用<sup>[23]</sup>的一种折衷主义理论，试图来澄清这个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著作中是可以相当令人满意而又直接地加以解决的。从此，艾曼纽尔和阿敏就被许许多多矛盾所困扰，在这里，我们将讨论这些矛盾中的某几个矛盾。这两位著作家都是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的，即劳动力的国际稳定和资本的国际流动是存在的。其逻辑推论就是利润率的国际平等化<sup>[24]</sup>——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统一生产价格的形成。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资本将会正常地以最低的工资流入这些国家。这样一种假设远远没有对结构方面的不发达状况作出任何说明，而是

暗示了——在古典的、李嘉图学派的意义上——这种不发达的不可能性；这种假设可以用来表明，为什么那些有高工资的国家经历了工业化，而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却相对说来只有很少的工业。<sup>[25]</sup>

利润率国际平等这一假设，不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经验上讲，都是不能成立的。从理论上讲，它预测了资本的完善的国际流动——事实上，所有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平等化，是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但是，这种平等化与控制着这种发展的那种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规律，是彻头彻尾相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平等的发展条件，确定了内部市场的不平等的规模和资本积累的不平衡的步伐。<sup>[26]</sup>在这种意义上，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在国际上的广泛的区别——这是阿非利·艾曼纽尔正确地强调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世界劳动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因为，资本的逻辑正常地驱使它转向这样一些地区，在那里它具有最大的增值前景。这样，对于这种不发达性质根源问题，艾曼纽尔和阿敏所提出的答案，给出了一个谜：在资本增值前景并不是最有利的地方，工资最低，而且，一百年来，资本并没有大规模地从高工资的国家逃向低工资的国家，这种情况怎么发生的呢？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国内市场”问题、资本积累的异化问题、剩余价值的转化问题以及现存社会结构加之于“内部的”资本积累的严格限制问题。<sup>[27]</sup>低工资是由于大规模的产业后备军和大量的就业不充分所造成的，因此，这种低工资起了阻碍资本积累的作用，而且只能用国际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来加以解释。<sup>[28]</sup>然而，所有这些现象都恰恰预测了有限的而不是一般的资本国际流动。从经验方面讲，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各个不同地区利润率方面巨大的种种差异，要提出证据是很容易的。美国官方机构对

美国公司国外资本投资利润率所作的各种计算，明确地肯定了马克思对不同的国际利润率的古典的论点——主要是作为不同的资本有机组成的一种功能——即使奠定这些计算基础的利润率概念很自然地与马克思本人的概念并不一致。一九六七年，这些投资的利润在欧洲为 7.4%，在拉丁美洲为 12.3%，在亚洲为 14%，在非洲为 19.7%。

在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和一九七二这三个年头，美国国外投资的官方利润率在殖民地国家分别为 20.1%、21.8% 和 22.3%，在帝国主义国家则分别为 13%、13.5% 和 15%。<sup>[29]</sup> 这些数字都是以宣布的利润额为基础的；由于利润掩蔽情况的发展，在半殖民地国家比在帝国主义国家要严重得多，那么，可以肯定，前者是低于真正数字的。缪勒 (Ron Muller) 引用的哥伦比亚医药公司的例子，公司宣布的利润率是 6.7%，而其真正的利润率则为 136%。

从艾曼纽尔的假设中产生出来的各种矛盾，在他的那些数字例子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他在这些数字例子中，除了某些例外情况之外，<sup>[30]</sup> 他都假定资本的有机组成在殖民地是高于宗主国的。<sup>[31]</sup> 他甚至连提都没有提一下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精神相一致的一个起作用的假设——即，一个小得多的资本额存在于不发达国家中，这是一个低得多的资本有机组成和一种较低的剩余价值率<sup>[32]</sup>——这一假设的结尾处决没有抵销了这种较低的资本有机组成的影响。除此以外，这一假设还完全符合上个世纪国际资本的实际发展状况。这可以归纳为类似下面的这个公式（在公式中，A 表示发达的国家，B 表示不发达的国家）：

A 输出货件的价值：

$$5,000C + 4,000V + 4,000S = 13,000; \text{ 利润率为 } 44\%.$$

B 输出货件的价值：

$200C + 2,000V + 1,800S = 4,000$ ; 利润率为 82%。

如果利润率有等同化的情况的话，那么，在 B 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就会在实际上被转移到了 A。这两种输出货件的“国际生产价格”就会成为如下结构：

A:  $5,000C + 4,000V + 4,680Pr = 13,680$  生产价格

B:  $200C + 2,000V + 1,120Pr = 3,320$  生产价格

“国际平均利润率”将是 ±52%。宗主国资本的额外利润相对而言就会很少，而殖民地资本剩余价值的损失将会很大；<sup>[33]</sup>事实上，这是符合经验方面的类型的。但是，这种等同化的先决条件，将是资本从 A 到 B 的不断地、明显地外流，A 所输出产品的需求，相对衰减，B 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迅速增长。如果没有这些运动，就不会有“利润率的国际等同化”，相对而言很少资本会流向 B，而且，作为“不等价交换”的一种结果有利于 A 而使 B 遭受的价值损失，将会放慢 B 方面生产资本的积累。那么，恰恰就是生产性资本积累的这种较慢的步伐，说明了在 B 方面就业不充分的原故——换句话说，就是说明了艾曼纽尔用作他那论辩起点的低工资。<sup>[34]</sup>

同样，艾曼纽尔运用价值的一种折衷理论和对宏观经济总体不加批判的说法，一直在设法怀疑列宁主义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反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为了寻求殖民地剩余价值，越来越多的资本在从帝国主义国家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输出。<sup>[35]</sup>他进行了这样的计算：即使有大规模的收入从殖民地流向宗主国，也根本没有纯粹的资本输出，而且，即使不谈这一点，以非分配利润的有规律的再投资为基础的外国投资的实际增长，其所表明的年利润率只有 3%。在这里，艾曼纽尔犯了两个分析方面的错误，对这么明智的一位经济学家说来，这两个错误是令人吃惊的。首先，他把长期资本流动与短期收入流动混

为一谈了——而所有严肃的收付平衡分析，都是把这两种利益加以区分的。如果靠投资生活的人的子孙把在美国铁路方面股份或在印度债券的利息和股息寄回一亿英镑，那么，这个数字就可以“抵销”英国企业家和金融家在南非金矿、马来亚橡胶种植园或波斯的油田新投资的一亿英镑。但是，这一等式并不是把这些新的企业从经济实际之外想象出来的，即使这些企业在过于简单化的统计数字中并不存在。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资本家要在南非、马来亚、或波斯投资而不在英国投资？艾曼纽尔没有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要了一个花招把这一问题避开了。<sup>[36]</sup>其次，艾曼纽尔忘记了这一情况：外面收入之流向英国代表了海外投资的一种额外收入，这种收入是在再投资利润之上的。如果我们把英国的资本家及其雇员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消耗的利润，也加在这两个范畴之中，从而保持了伊姆拉(Imlah)所作的古典的估计，纠正了艾曼纽尔那稍为不准确的数字，那么，英国在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四年期间的年利润率较之艾曼纽尔所说的仅仅3%，更接近于10%。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些外国投资出现在第一种情况中，说明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真情。

克利斯蒂安·帕劳克斯(Christian Palloix)已经正确地看出了艾曼纽尔的论据的某些缺点，<sup>[37]</sup>但是，他也不能解决不等价交换这一问题，这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是因为他持有折衷的价值理论。<sup>[38]</sup>

帕劳克斯在对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者帕维尔(T. Pavel)<sup>[39]</sup>所作的一些分析——这些分析大部分是对苏维埃官僚主义对外贸易政策的一种辩解——进行考查的过程中，把“国际价值”解释为工业化国家的“较低的价值”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较高的价值”的平均数，<sup>[40]</sup>这样，他就得出了下面这种公式，式中的“V”表示价值，“a”表示输出，“b”表示输入，“1”表示不发

达国，“2”表示工业化国家，“V'”表示“国际价值”：

$$\begin{aligned} V_1a > V'a > V_2a \\ V_1b > V'b > V_2b \end{aligned}$$

他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这样，“帕维尔所忘记的是，已经放弃了a的生产的发达国家2，在输入那种产品(差异为  $V'a - V_2a$ ) 时有所损失，而在输入其他产品(差异为  $V'b - V_2b$ ) 时则确有所获得。我们可以把同样的道理应用到不发达国家1中去。来自国际专业化的所得或剩余的分配，对各方面都是有利的。并无转移可言。”〔41〕

首先，即使从数字的角度来看，从这一公式得出的结论也是不正确的：只有在两种差异( $V'a - V_2a$ ) 与 ( $V'b - V_2b$ ) 完全相同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而这种情况决不是这种公式所暗示的。其次，这一结论暗示出了李嘉图的“和谐”假说，根据这种假说，母体国家的资本为了取得更大的利润而“制订出”应当怎样来把宗主国已经现存的生产向全世界加以重新分配的计划。当然，在真正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是相反的情况：母体国家的这些资本企图按照国内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增值的需要，向国际方面扩展。说由于棉花生产在这些地方更为“有利可图”，因而英国棉纺工业该“转移”到美国、印度或埃及，这种意见是荒谬的。这些国家的棉花生产是由于英国纺织工业的扩大而创造出来的。但是，母体国家的所谓“损失”不复存在了，母体国家本来可以生产出来这些商品，这些商品它现在的进口价格和出口价格同样价廉。第三点，这两种国家从对外贸易中都可以获得的“相对利益”，被用作没有价值转移这一事实的一种证明。但是，马克思在反驳李嘉图的时候所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两种国家的“相对利益”再加上价值的一种转移，两者可以同时共存。〔42〕

因此，如果将帕劳克斯的公式按照其应当作的那样来加以订

正的话：

$$V'_a = V'_b \text{ 如果}$$

$$V_{1a} > V'_a \text{ 和}$$

$$V'_b > V_{2b}$$

那么，立刻就可以看出，价值的一种转移，也就是不同的劳动量的交换，事实上发生了。

在我们在批评艾曼纽尔的时候所使用的那个数字例子的帮助下，现在我们可以更确切地说明“不等价交换”的涵意。我们再一次假定输出生产的价值结构，在帝国主义国家为：

$$5,000C + 4,000V + 4,000S = 13,000$$

在不发达国家为：

$$200C + 2,000V + 1,800S = 4,000$$

为了避免论证中不必要的复杂情况，我们将另外介绍三种简化的假设：

1. 这些“价值”与国际价值，即世界市场价值，完全一致。
2. 不发达国家将其全部出口货件输往帝国主义国家。
3. 两种国家之间的贸易平衡是均衡的，而且，支付平衡的一切项目仍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内，这些项目是附加于从半殖民地向宗主国的价值转移的。

因此，半殖民地以价值达 40 亿法郎的货物来交换帝国主义宗主国同样价值的货物。国际价值的等价物（世界市场价值），在世界市场上将采取下面这种形式：

$$\begin{aligned} & 1,538_c A + 1,231_v A + 1,231_s A \\ & = 200CB + 2,000VB + 1,800SB。 \end{aligned}$$

相等的国际价值与相等的国际价值相交换。那么，“不等价交换”藏在这种等价物之后的什么地方呢？我们从这么个事实中可以找到它；这些相等的国际价值代表着不等量的劳动。在从宗

主国输出的货件中，我们假设大约有三亿个工作小时；而相比之下，从半殖民地输出的货件包含——让我们假设——大约十二亿个工作小时。

这两种劳动量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反映了工资方面的差异（这样一种理论将会把我们带回到马克思甚至李嘉图以前，带到亚当·斯密那原始劳动价值学说的各种矛盾中去）。我们假定在两种国家中平均工作日的长度是一样的，而且，半殖民地国家这十二亿个工作小时工作的工人数目（大约为 600,000）等于宗主国三亿工作小时所需工人数（大约为 150,000）的四倍。货币工资（每个工人的可变资本）在 A 将为 8,207 法郎，在 B 将为 3,333 法郎。与工作小时 3 亿个与 12 亿个之间的比例相比的话，这种 1:2.5 的比例已经是区别很大了。但其本身对这两种情况的实际工资，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不等价交换存在于 3 亿工作小时的产品与 12 亿工作小时的产品交换中，换句话说，存在这么一种事实中：在世界市场上，发达国家的工作小时较之落后国家的工作小时更为集中并具有更大的生产能力。包含着不等量劳动的这种等量国际商品价值的交换是不是暗示着一种国际价值转换呢？粗粗看上去，这个问题也许会作为一种纯语义问题而不予理会。如果作静态的、孤立的观察，那么，究竟是世界市场还是国内市场被看作是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从理论上讲，对马克思说来，第二种是正确的结构）。在前者的情况下，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价值的转换，因为，在市场上没有报酬或没被承认的劳动力，也就是社会上浪费的劳动力，并没有创造价值。在第二种情况下，可以说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上所必需的劳动力（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力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在国际上被承认的比较少，但事实上仍然是有充分的价值创造力的。

但是，如果我们从静态观点移向一种动态观点的话——这是与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严格应用相一致的唯一的观点——那么，情景就会彻底改观。国家 A 处置一种劳动潜力，这种潜力要受确切限制的约束：生产、消费和积累（扩大再生产）都要由工作小时总数来严格确定。假定在 A 中每年生产总额的价值为 500 亿法郎，新创造出来的价值为 308 亿法郎，这样，输出货件就大约代表年生产的 26%，并且，输出货件从半殖民地交换来的商品，大约占新创造出来的价值的 11.55%（为了避免把这个例子弄得复杂，我们假定年生产、输出货件和向半殖民地输出的商品等都具有一种相同的价值结构）。使国家 A 中所具有的活劳动力和价值创造劳动力的工时总数大体上为 26 亿个（130 万生产劳动者每年工作 50 周，每周工作 40 个小时）。

现在，如果没有任何不等价交换的话，那么，A 就必须为从半殖民地输入的货件偿付 12 亿个工作小时，而不是 3 亿个工作小时。那只能对这种输入的一部分加以实现。最低限度在消费和积累资源方面，将会出现一种很明显的缩减。<sup>[43]</sup>经济增长将会慢下来。在这一种意义上，“价值国际转移”的那种公式，必然会具有具体的重要意义。通过价值国际转移（劳动量的转移）的这种“不等价交换”，必然会被在 B 中积累起来但又属于宗主国资本家并被这些资本家所挤干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所进一步扩大，同样也必然会被由于不发达而给 B 造成的、以“国际服务”的支付（运输费和保险费等）为形式的实际负担所进一步扩大。<sup>[44]</sup>因此，不等价交换导致一种价值转移（劳动量的转移，也就是经济资源），这种转移并不与价值规律相违背，而是价值规律造成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利润率的国际均等化，而是尽管没有这种均等化也如此。

在我们看来，对不等价交换根源的这种分析，既符合马克思

的价值理论，也符合实际历史过程的情况。这种分析能使我们理解并说明较高利润率与较低工资的肩并肩的共同存在、不发达国家中的资本积累与劳动生产力以及宗主国以牺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利益而获得的相对的富足，其富足方式是依靠在世界市场上不均等劳动量交换所引起的价值转移。

在艾曼纽尔的著作中有一个附录是关于与贝特尔海姆的那次论战的批判性研究，这个研究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以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在对宗主国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间的发展的差异性作深入解释的各种因素。艾曼纽尔认为工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独立的可变量”。〔45〕在不发达国家，低工资导致了“加强劳动”的投资，这种投资又扩大了它们的生产力与宗主国生产力之间的差别。〔46〕在宗主国家，十九世纪末尾时发展起来的工会组织（劳动力商品供应的垄断组织），使得实际工资的长期增长成为可能。〔47〕这种情况在宗主国又产生了向加强劳动经济发展的紧迫感。这样一来，生产力的差别与其说是工资差别的原因，不如说是工资差别的结果。

贝特尔海姆反对这种论点，并且和我们一样，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的一种修正。在他看来，作为不等价交换的基础的，是劳动生产力的不平等发展和半殖民地所特有的那种生产关系，在半殖民地国家里，除了其他那些原因之外，输出部门中的很多生产者，都是从半无产阶级的阶层中招募来的，这些生产者来从事工资劳动的目的，只是要取得一些补充的收入，以弥补他们在农业方面维持生活手段的不足，因此，他们的工资可以降低到远远低于维持生活的最低限度，而勿需来确定这一半无产阶级的实际生活条件。贝特尔海姆反对艾曼纽尔这种工资和需要的发展相对自主的论点，他主张马克思所坚持的看法，那就是，消费和工资领域的发展，最终往往取决于生产领域的发展。〔48〕

这一论战的双方都犯了错误，他们都试图人为地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那综合性的、不可分割的发展，分割成为各自独立的、各种各样的逻辑系列。无可置疑的一种事实是，大约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在不发达国家和宗主国家，工资一直受着各种不同发展趋势的约束，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国际经济发展已发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工资差别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才构成了一种关键性的因素，这种因素确定了世界经济的整个结构而不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约束。正好相反，工资水平越来越多的偏离的本身，与其说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总趋势的原因，不如说是这种总趋势的结果。工资的长期发展是依赖于产业后备军的长期发展趋势和在消费品方面和农业方面劳动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趋势的。这些又取决于两种因素：劳动力的供应和需求的起点以及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第一种因素说明，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的所谓“空旷”殖民地中（之所以空旷，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是因为对这些殖民地原来居民的系统地灭绝之故），工资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比较高一些。第二种因素说明，西欧各国在十八世纪中叶与十九世纪中叶之间，工资为什么展现出了一种长期降低的趋势，并说明这一趋势为什么随后从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又倒转了过来。

由于资本的积累主要是靠在国内市场上对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社会阶级进行分裂而进行的，它所摧毁的职业较之创造的职业为少，因此，产业后备军有增长的趋势，而工人也就不能组成一个强大的工会运动——换句话说，不能形成一种在劳动力商品市场上的相对垄断供应，也不能把新的需要的满足与社会公认的生活标准（劳动力价值）结合成为一体。所以，实际工资最终还是降低了。但是，一旦资本积累主要通过前资本主义各阶级在国内市场上的置换而停止向前发展，并且转而向国外市场扩张的时

候，那么，它在宗主国家所创造出来的职业就多于它所摧毁的，这是因为它从此以后所摧毁的职业，都是在不发达的国家内。<sup>[49]</sup>正是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在宗主国家这种长期趋势现在变成了产业后备军逐渐削减的趋势，而在不发达国家则又变成了产业后备军逐渐膨胀的趋势，这反过来又说明了，为什么世界的这两个部分的实际工资越来越不一致。在半殖民地和宗主国关于工资的这两条偏离的轨道，远远不是独立的变量，而是互相决定的。因为，这两条轨道代表着资本积累那单一的、世界规模过程的两种互相补足的<sup>运动</sup>，或者说，代表着这一过程在支配资本方面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所发生的反响的两个基本方面。各种各样著作家都使用过的、关于相互确定的资本主义核心的发达和资本外围的不发达的那个公式，是完全贴切的。<sup>[50]</sup>

艾曼纽尔作为他的论点的证据而引用了一种偏离例子，这个偏离例子存在于下面两类国家之间：一类国家是专搞农业生产的，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一类国家的工资很高；另一类国家例如阿尔及利亚和葡萄牙，尽管这些国家已经与世界市场结成一体，并且也同样专搞农业输出，但仍然保持为不发达国家，工资很低。<sup>[51]</sup>这一种偏离的例子如果用我们的论点来加以解释，要比用艾曼纽尔那重复而又迂回的办法来解释合理得多，他那种迂回办法是通过在不发达国家中把需要，因而也就是把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限制”在维持生活的生理上的最低限度。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空旷”的国家里，全部人口从一开始就被结合进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在这个人口中主要包括有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些独立生产者本身就是他们那些生产手段的所有主（极端廉价的和免费的土地财产，这些地产是取之不尽的），因此，这些人口从一开始就保证有一个很高的生活水平，劳动力商品的价格不得不与这种生活水平进行竞争，以便能够使工资劳动者实际产生出来。

相比之下在葡萄牙和阿尔及利亚，总人口却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领域之外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缓慢置换，导使土生土长人口越来越感到高兴，这些人口变得乐于以更低的价格来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目的是想至少部分地忍受地租、高利贷和赋税所加给他们越来越重的压迫重担。因此，随着本地手工业的破坏和本地农民之离开他们的土地，最终伴之而来的，是产业后备军的长期增长，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要限制工资和需要，而不是合理地发展它们。

贝特尔海姆与艾曼纽尔则不同，贝特尔海姆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对差别作为他的出发点，并且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对差别作为半殖民地和宗主国基本的偏离发展趋势的根源，他这么作在方法论方面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没有足够地考虑到后者对前者所发生的影响的具体形式，这些形式已经抓住了或稳步地加宽了生产力的差距。有些历史资料表明了为什么工业化首先在西欧取得成功，而不是在中国、印度或拉丁美洲取得成功，光引用这些资料是不够的。这些资料——这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分析得更为彻底——只说明了初始的差别。然而，这种差别最终可以归结起来，比如在日本所实际发生的情况，日本的工业化较英格蘭晚了一个世纪：到今天，日本的平均劳动生产力已经达到了大不列颠的水平，如果不是已经超过了大不列颠的话。

这样，最初的生产力差距不足以说明当代的悬殊。还必须加上世界经济为抓住并加宽这种差别而在200年中所起作用的方式。贝特尔海姆谈到了这一方面，谈到了资本主义核心和外围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状况，这种状况确定了劳动生产力的不均等的水平。但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维持生活的水平相比，更加不是一种独立的变量，而最终只不过是代表生产性资本积累特殊步伐的一种结果和特殊的资本有机组成，贝特尔

海姆的论证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即生产力的差异并不早于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一种产物，把我们带回了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积累问题。这一问题如不理解下面的情况，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保证宗主国工业资本积累在所谓第三世界工业资本积累方面设置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障碍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特殊结构，尤其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但也部分地包括早于帝国主义的时代。

“不等价交换”问题，最终要上溯到各个不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结构问题。在这一方面，我们完全同意艾曼纽尔、帕劳克斯和阿敏的意见。在这些著作家面前，我们要指出，在这些国家对资本积累的各种不利影响，必须归之于社会原因，这些原因被帝国主义的影响弄得更有力量了。<sup>[52]</sup>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同意安德烈·刚德尔·佛朗克的基本论点：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产生了宗主国“过分发达”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不发达”的并存关系。我们与佛朗克的分歧出自他对一些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容许了后者的依赖性：他是从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方面来认识这些机制的（他把这些机制与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从属性关系混为一谈了）；而我们是从前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结合来认识这些机制的，而这种生产关系是这些国家社会结构的特征。<sup>[53]</sup>佛朗克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尤其是在他那尚未发表的著作《资本主义不发达理论的形成(Toward a Capitalist Underdevelopment)》中，他至少作出了部分的努力来考虑对他以前的著作所作的证实了的批评意见。现在，他强调的是与世界市场一体化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某些地区土地和劳动力的毁灭性剥削的反响。<sup>[54]</sup>佛朗克所举出的一些例子毫无疑问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他对“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使用，却是不确切的。他对这一概念的实际理解是生产的“技术”或“组织”，而不是生产

的社会关系。<sup>[55]</sup>但是，需要包括在他的分析中，以便抓住“不发达的发达”这种机制的，正是这种生产关系，而那种机制正是由于其与世界市场一体化的特殊形式而阻碍了前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体。<sup>[56]</sup>但是，由于佛朗克并没有把社会生产关系加以考虑，所以他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了输出而进行的商品生产的扩大，不能完成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同样的累积过程，就象在帝国主义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和“白人统治的国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而这种情况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进行了精辟的分析。答案可以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去找，而这种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保证，社会剩余生产的主要份额并没有用于生产的目的。换句话说，资本积累是有，但是它包括有（1）外国资本，（2）货币资本（通常是非生产性的投资），而并不是工业资本。<sup>[57]</sup>

同样的逻辑说明了十九世纪南美洲和北美洲不同的发展，这种偏离的发展把许多经济史家都弄糊涂了。<sup>[58]</sup>这当然不能用种族或气候来加以解释，它来源于北美经济中小规模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商品企业的优势地位，而相对的在南美则是大规模的农业庄园占优势地位，这种庄园有的与印第安人的 *Comunidades* 的自然经济相结合，有的则不与之相结合。在第一种情况之下，资本的积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是由顽强复兴的小农场主来进行的，除了别的原因之外，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尽管有雄厚的自然资源，但在十九世纪却并不是全世界占优势的工业化国家。<sup>[59]</sup>由北美洲农民相对高的最低限度生活水平和长期劳动力缺乏所确定的高水平的实际工资，反过来又从一开始就导致一种较高的机械化水平，并因而最终导致更高的工业化潜力。但是，一直到边界消失之后，使得小农民阶级在受到竞争的威胁时不能逃到未被占用的领土上去，一直到欧洲产业后备军的大规模移民为这种迅速

工业化创造出了必需的劳动力之后，这种情况才变为现实。

对比之下，拉丁美洲那特殊的农业结构，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一种水平低得多的工资和所受限制多得多的国内市场。在最初阶段，这种结构也许曾经胜任于世界市场产品的早期工业化（比如古巴的蔗糖工业），或本地各统治阶级的奢侈品（比如在南美洲制造某些纺织品），其规模大致相当于早期加拿大的工业化水平。但是，它在那时还不能进而充分工业化，因为，在庄园中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即使在进行，但也进行得十分缓慢，而同时本地人口中的大部分也还没有被拉进商品流通的扩大过程中。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并没有给这种发展的差异或生产力的差异，带来任何变化，正象它并没有消除“不等价交换”那样。正相反，帝国主义宗主国对半殖民地的剥削源泉，在今天比以往更为丰富多彩了。只是在形式方面有一种双重的变化：首先，殖民地的剩余利润份额与通过“不等价交换”的价值转换相对的话，经历了一种衰减；其次，国际间劳动分工在缓慢地向这方面移动：以轻工业品来交换机器、设备和车辆，除了以食品和原料来交换工业消费品的那种“古典的”不等价交换之外。但是，价值的转移并不是固定在物质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上的，也不是固定在工业化的一种特殊程度上的，而是与资本积累、劳动生产力和剩余价值率的各种水平的差异性紧密相关联的。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有了一种总的均匀化状况的时候，剩余利润的泉源才会发生干涸。如果没有这种均匀化状况，一切变动都只是不发达的形式，而不是其内容。

今天，在半殖民地所可以见到的那种越来越多的资本积累，是一种特殊的积累。它是工业资本从原料领域移向制造工业领域的那种积累，但总的说来，它比在宗主国占优势的那种技术或工业化类型要落后一两个阶段。正如我们已经说明了的，这是有局

限的国内市场、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以及以陈旧的机器（也就是以西方工业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之所以被丢弃是由于固定资本的迅速过时之故）、陈旧设备，特别是专为这个国家生产的那种陈旧设备（其本身也是被市场的狭隘性所确定，也就是被小生产系列所确定，这种小生产系列不能使最现代化设备所必需的资本达到增值）而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所造成的必然结果。<sup>〔60〕</sup>

弗尔农(Vernon Raymond)认为，“据了解，某些企业已经扭过头去使用它们在比较发达的市场上已经由于进一步发展而废弃不用的产品和生产过程。”引证了各种调查之后，他接着说，“在六十年代初期，美国企业在墨西哥、波多黎各(Puerto Rico)的一些子公司使用旧设备的趋势，是十分强烈的。”苏布拉哈曼尼亚姆(Subrahmaniam K. K.)也同样明确地断言：“我们遇到过一些例子，就是已经被外国废弃的技术，输进了印度。作为导体，锗之替代硅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日本和德国在十至十五年以前就放弃了锗……同样，铸造车间的一些外国技师也认为，连续铸造是战后可接受的一种发展，真空浇铸和真空铸造法是新的技术。但是，很少人为这些方法进行冒险。”<sup>〔61〕</sup>

亚克斯·高弗尔纳(Jacques Gouverneur)利用了独立前刚果工业的资料，他既从理论上也从经验上表明，国内市场的小规模和本地工资的低水平（这是由产业后备军决定的），迫使资本主义公司使用不太理想的技术，即使随着时间的前进而这种技术有所改进。<sup>〔62〕</sup>有些地方尽管使用了最理想的技术（这种情况在半殖民地例如在阿根廷，只是一种例外发生的情况），但是这种新技术的利用率也很低：在阿根廷，在一九六一——一九六四年期间，金属加工工业（包括机器工业在内）的平均能力利用率为50.1%，在机器和电气仪表工业的利用率则为47.7%。<sup>〔63〕</sup>

至于谈到半殖民地的工业化问题，看来似乎是各种矛盾的责

备往往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国际资本的。因为，它们也同时被谴责使用了废弃的技术和超现代化的“资本集中”的工厂，这种工厂并不能增加就业机会，但却包含了大规模的、垄断的过高定价，原因是能力利用率没有达到最高限度。但是，如果经济分析为道德上的愤慨所代替的话，那么，那种明显的矛盾就消失了。没有理由不顾半殖民地经济利益的均衡发展而去谴责多国公司的。因为，在半殖民地所流行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下，保证这两种罪恶在半殖民地外国公司的操作中联合起来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竞争的迫切性。

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个是，用陈旧技术生产出来的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一直不能与宗主国所生产出来的工业品进行严肃的竞争。因此，在半殖民地的输出，仍然是集中在原料方面的要多于整个本地的产品。<sup>[64]</sup>但是，由于这个原料方面已经失掉了它在“古典的”帝国主义时期曾一度享有的、在世界市场上的相对垄断地位，<sup>[65]</sup>所以，半殖民地所输出的、由制造业或早期工业技术所生产出来那种原料的价格，就有朝着在宗主国以最新技术生产出来的原料的生产价格降落趋势。这种情况就迫使半殖民地进口越来越多的昂贵的机器，甚至从宗主国输入更多的昂贵的备用零件，以便能达到进一步的工业化。<sup>[66]</sup>在世界市场上，宗主国此时成了机器和设备品的垄断销售者，而半殖民地已经丧失了它们那作为原料的垄断销售者的地位，<sup>[67]</sup>这样一来，通过半殖民地贸易条件的恶化，价值从一个地区向另外一个地区的稳步转移就形成了。

但是，自从一九七二年以来，商品的基本价格发生了新的提高——这部分地是取决于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的短期投机和通货膨胀的突然激增，但也部分地反映了实际上的相对短缺，这种短缺是由于在最初生产部门中资本投资率比以前长期的制造部门

的资本投资率要缓慢而引起的。<sup>[68]</sup>这种新的价格上扬在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中，不会被全部消除的；它将能够使得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改善他们的地位，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也在金融方面和经济方面成为帝国主义的小伙伴。美帝国主义之越来越依赖一整系列的原料输入，<sup>[69]</sup>使得这个帝国主义最大的强国由于这些变化，较之过去（即当美国本身也是基础产品的主要世界输出国的时候）更为脆弱，并且能够引起主要的、新的军事冲突。

其次，世界市场仍然继续以一种虹吸管似地在起作用，它不仅把正在进行中的剩余价值，而且还把资本主义化了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资本，从半殖民地转移到宗主国家去。人所共知的是，伴随着半殖民地初期工业化而来的半殖民地在支付平衡方面的长期赤字，是被所谓的“发展援助”加以补偿的，但是，这种援助只不过暴露了它的这样一种性质：它是一种对从帝国主义国家输出机器的垄断集团的国家援助。<sup>[70]</sup>由于这样的转让物反过来又导致一种越来越大的债务负担，所以，半殖民地输出的利润总额中的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必须转化成为利润，再次输出到宗主国家去。在一九七二年年末，半殖民地积累起来的未清偿债务已达1,000亿美元。现在，债务部门吸收的输出岁入，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占31.5%，在乌拉圭占37.5%，在巴基斯坦占25%，在印度占24.1%，在阿根廷占22.2%，在阿富汗占20.4%，在土耳其占18.8%。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资本对半殖民地制造业的渗透及其与本地的所谓“民族资产阶级”资本的越来越多的溶合，就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所拥有的资本中越来越多的一部分落入了帝国主义康采恩的手中（即使是这种情况往往被以各种伪装，例如本地的被雇作挡箭牌的人和各种各样的联合冒险形式，这些形式往往与国家、民族或国际机构联合在一起）。伴随着这种过程的是以这样

一些形式的伪装的资本外流，比如付给国际专家和技师以高额报酬。随着本地工业化的发展，这样一些专家和技师的重要性日益增大，因为，与原料生产相比之下，制造业无论如何是要更多地依赖外国技术的。〔71〕

下面的统计数字鲜明地暴露了在半殖民地群众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达到了什么程度：〔72〕

	每年每人 国民生产总 值、单位美 元	40%最穷 收入户收入 在国民生产 总值中所占 比例	40%最穷 收入户每年 每人的收入	20%最富 收入户每年 每人的收入
肯尼亚(1969)	136	10%	34	462.4
塞拉里昂(1968)	159	9.6%	38.8	540.6
菲律宾(1971)	239	11.6%	65.1	642.6
突尼斯(1970)	239	11.4%	70.4	675.8
厄瓜多尔(1970)	277	6.5%	46.2	1018.0
马来西亚(1970)	330	11.6%	91.2	924.0
土耳其(1968)	282	9.3%	70.0	857.3
巴西(1970)	390	10.0%	97.5	1200.0
秘鲁(1971)	480	6.5%	79	1440.0
南非(1965)	669	6.5%	104.8	1940.0

收入的实际差别，比这些统计数字所表明的要大得多，因为，人口中处于顶端的1%或2%将拥有超过“中产阶级”的收入，而“中产阶级”中有20%其本身是高于穷人的。其结果就是“国内市场”的分割制度，这种分割了的国内市场有自我再生之倾向。

众所公认的是有必要强调一下这一点，即在一个部门中具有一种相反的倾向：加强劳动的工业生产成品，这种工业可以用相对地说廉价的机器设备进行操作。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半殖民地廉

价劳动力的这一方便条件，可以允许为输出而生产轻工业成品的一种工业进一步发展，这种轻工业成品可以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而在半殖民地国家，伴随着廉价劳动力这一方便条件的，是符合资本所有主利益的基础结构和“社会正常化”。对初始阶段的增长的仅有的一些限制，是运输费用造成的。这一现象导致为了美国在南朝鲜、香港和台湾的市场而生产晶体管仪器，为了北美和西欧的市场而生产亚洲的纺织品和非洲的罐头食品，以及钟表工业转移到半殖民地国家去。<sup>(73)</sup>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国际承包业务：胜家公司(Singer)在远东有一百二十家工厂来生产或组装其产品，而瑞士的钟表制造商在毛里求斯有代理人等等。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工资差别就意味着在半殖民地所投资本的一种剩余利润，而不是在宗主国投资的剩余利润。但是，对于这一趋势的扩大，也有一些限制。加强劳动力的工业分枝部门与加强资本的半自动化或自动化分枝部门相比的话，其总的经济意义在今天正在衰减，而垄断资本并没有任何刺激因素把这种加强资本的半自动化或自动化工业分枝部门转移到半殖民地国家去。宗主国垄断资本已经取得了对半殖民地那新的、加强劳动分枝生产部门的部分的或全部的控制。某些半殖民地在这个世界上由于工资的有利条件而取得的剩余价值，就这样归入了宗主国垄断资本的腰包。所以，经常发生的事情无非是在帝国主义公司本身的轨道内部的一种补偿安排而已，也就是一种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有利于参与了这种新的输出业务的那些垄断资本，而不利于未参与这项业务的那些垄断资本，并不是对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任何一种真正的再分配。轻工业子公司向具备廉价劳动力国家转移的趋势越是得到发展，那么，包括在这些子公司内或直接受其影响的那些宗主国资本家之间的相应的竞争性斗争，就越会变得更为尖锐。这种斗争将会采取越来越合理化和

自动化的形式，并将因而消除生产费用的暂时差别，这种差别是由于工资水平的不同造成的，而现在这种工资水平的不同却是对不发达国家有利的——换句话说，它将消除迄今在这些国家所形成的剩余利润。一些国家例如巴西（外资诱导的）和伊朗（石油收入支援的）的工业化相对进程，是不可否认的。其势头已造成了这些国家的自主的金融资本，这种资本不但在国内很活跃，而且在国际上也很活跃，并还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西方帝国主义，不论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西方帝国主义靠得多么紧密。典型地伴随着这一种现象的，是重工业的某种发展（钢铁工业、石油化学工业）。但是，把这种情况说成是“亚帝国主义”，那是不正确的。一个帝国主义结构本身的存在，必须具备一系列的特征，而金融资本的出现，只不过是这些特征之一。就巴西而论，其他那些要素中大部分都明显地并不具备，伊朗就更不必去说了，只要这些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它们就会保持这种状态，因为，国内市场在压缩、本地农业方面是落后的，而且金融家、实业家和技术官僚的利益是与土地所有主、高利贷者、买办和外国公司的利益缠结在一起的。<sup>[74]</sup>

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制度之下，半殖民地人民的命运在这些民族的越来越营养不足的情况下，披上了最悲惨的形式。在三十年代时，它们还可以每年输出谷物产品 1400 万吨。到了六十年代，它们不得不每年进口 1000 万吨的谷物产品，而且，到了七十年代的后半期，这种进口风险的总量比前还要大得多。这既不是由于人口的爆炸，也不是由于缺乏深谋远虑，而是由于帝国主义所强加的社会经济结构。越来越多的土地面积都被转换来生产出口作物，这是为了迎合宗主国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本地人口的需要。单单非洲，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七年之间，咖啡产量增长了 300%。农村的日趋无产阶级化以及越来越多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在

土地上劳动生产潜力与平均劳动生产力之间创造出了日趋严重的迟滞状态。阶级的日趋分化和国内市场之停滞在“中产阶级”要求的水平之下，造成的结果是生产资源的巨大浪费。越来越依赖进口的技术，对这种技术不顾其环境结果而不负责任地、胡乱地应用，造成社会的、生态方面的灾难。<sup>〔75〕</sup>对帝国主义粮食输出的日趋依赖，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已经通过更高的价格，如有必要的话，通过人工诱导的短缺而被化为货币了。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的饥荒就与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主要谷物出口商限制产量的一些决定，有着直接的关系。

有决定意义的事实仍然是，在晚期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时期，正象在“古典的”帝国主义时期一样，在世界市场的结构内，不发达国家的任何彻底的工业化，都是不可能的。<sup>〔76〕</sup>发展、工业化和生产力在地区之间的差别，一直在扩大。在这样一些条件之下，保证在半殖民地国家有一种永久性社会危机状况的一切机制，将继续发挥作用；这些国家的劳动阶层，将不得不把殖民地革命推向这一点。在这里，以主要的生产手段和社会剩余生产的社会化为手段来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获得解放，使得农业问题的解决和全面工业化的取得，成为可能的事情了。当然，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完成。

## 注 释

〔1〕 见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证实这一论点的各种来源，第四五七——四五八页；也见迈因特(H. Myint)：《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伦敦，一九六四年，第五十三页。也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七八六——七九三页。

〔2〕 贡特尔·考尔梅(Gunter Kohlmey)：《‘Karl Marx’ Theorie von den internationalen Werten, mit einigen Schlussfolgerungen für

die Preisbildung im Aussenhandel zwischen den sozialistischen Staaten》，载《政治经济问题》，第五卷，柏林。

- 〔3〕 米契尔·巴拉特—布朗：《帝国主义以后》，第七十六页。另外一方面，伊姆拉(Imlah)宣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期间，贸易条件在对英国有利的情况下改进了约20%：《联合王国的贸易条件》，载“历史杂志”，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号。
- 〔4〕 巴拉特—布朗前引著作，第一一〇页。
- 〔5〕 萨米尔·阿敏：《世界范围的积累》，巴黎，一九七〇年，第七十六页。
- 〔6〕 《英国看不见的收入》，看不见输出委员会的报告，伦敦，一九六七年，第二十七页。
- 〔7〕 阿敏在前引著作的第九十—九十一页中，对一些熟悉的来源作了总结。在一九五四—一九六五年期间，“第三世界”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据估计达到19%；在一九二八—一九六五年期间，在拉丁美洲据计算恶化程度为68%（委内瑞拉除外）。根据联合国的计算，对“第三世界”各国不利的贸易条件恶化程度，在一八七六—一八八〇年与一九三八年期间为40%。联合国：《不发达国家进出口的相对价格》，纽约，一九六二年，第二十二页。
- 〔8〕 见艾曼纽尔前引著作，第二二八—二二九页。
- 〔9〕 我们在六十年代初就在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预言了这一倾向：第四八〇—四八一页。这一点在干预的十年中被完全证实了。
- 〔10〕 我们对这一倾向已经作了详尽的分析，见拙著：《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民族资产阶级》，载“Cuarta Internacional”，第二期，一九七一年二月号。其基础主要是来自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的资料。关于秘鲁的一项类似分析，见安尼巴尔·奎加诺(Anibal Quijano)，《秘鲁的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每月评论”，第二十三卷，第三期，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月号。
- 〔11〕 苏布拉哈曼尼亚姆：《资本和技术的输入》，新德里，一九七二年，第四十四—四十五、六十四—六十五页；弗尔农前引著作第一四一页；“商业周刊”，一九七四年八月三日。
- 〔1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从外国资本投资中获取的每年收入达15,100万英镑（一九〇六—一九一〇年的平均数），和18,800万英镑

(一九一一——一九一三年的平均数)。在一九二六——一九三〇年期间,这个数字进一步增长到了2,4500万英镑,但此后到一九三四——一九三八年又跌到了17,000万英镑(贬了值的通货)。到一九六五年,总收入达到了接近10亿英镑,净收入达到了45,000万英镑(总收入与净收入之间差别的大大扩大,是由于这样一种事实:大批的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国的资本,这时已在英国投资);看不见输出委员会的报告:《英国看不见的收入》,伦敦,一九六七年,第二十一——二十三页。如果我们估计英镑的购买力大约等于其一九一四年购买力的25%的话,那么,英国外国资本投资就从一九一四年的大约20,000万黄金英镑增长到了一九六五年的大约25,000万黄金英镑,而相比之下,纯收入则从18,800万黄金英镑降到了12,500万黄金英镑。

- [13] 皮叶·加里:《一九七〇年的帝国主义》,第三十三页。马格多夫在前引著作第一四五——一四七页中强调了美国政府为了阻拦半殖民地国家原料加工而使用的保护性关税。
- [14] 在这里所包含的不是不等价交换,而是已公布收入的“再分配”。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工人生产出来的这种剩余价值,事实上已经得到了实现。关于在商品销售价格低于“民族的”生产价格的那种不等价交换的情况下,价值中的某一部分或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未被实现。
- [15] 代尔·威格尔(Dale Weigel):《多国公司的多国观点》,载“金融与发展”,第十一卷,第三期,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戎纳德·缪勒:《多国公司与第三世界的不发达》,载威尔伯尔(C.K. Wilber)(编):《发达与不发达的政治经济学》,纽约,一九七四年。
- [16] 典型的例子是铝业公司的例子,以及铝制成品(包括飞机)向出产铝土矿的国家再输出。
- [17] 应该强调的是,在半殖民地国家“投资”的外国资本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并不包括真正的资本输出,而是包括了未分配的利润(就是当地工资工人生产出来的利润)。关于拉丁美洲,据西奥顿尼奥·多斯·桑托斯(前引著作第七十七页)的估计,美国公司再投资利润总额,在一九四六——一九六七年期间,有44亿美元,而新输出的资本则为54亿美元。而在这同一时期,美国资本从拉丁美洲寄回美国的倒有148亿美元。
- [18] 多斯·桑托斯在前引著作,第七十五——七十六页中,引用了拉丁美洲

经济委员会出版的一项计算，根据这一项计算，从一九五一——一九六六年贸易条件的恶化，使拉丁美洲（包括古巴在内）损失总额达264亿美元，或者说，等于向宗主国外流的利润的二倍。这个数目大于拉丁美洲在这一时期所接受的全部“经济援助”。必须要记住的是，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计算，这些援助中不到一半代表为这一大陆的真正的新经济资源的输入。（前引资料第六十五页）。

- [19] 阿敏认为（见前引著作第一〇六、一五七页），马克思从来没有关心十九世纪“全世界范围积累”的问题，他的根据只不过是从关于印度未来的一篇政治论文中引来的一句话，他根本没有注意《资本论》、《政治经济批判大纲》（草稿）、《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中的很多章节，这些章节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加以引用，来讨论对外贸易的作用，即作为从不发达国家向较发达国家转移价值的一种手段。
- [20] 以有别于在高利贷者和商人资本时代的“不对价值的不等价交换”。见厄尔奈斯特·曼德尔：《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 and 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载《追随一种理论——关于马克思〈资本论〉论文集》，法兰克福，一九六七年。
- [21] 考尔梅在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我们上面已引过）把马克思关于国际生产价格（价值）的理论，作了总结，这个总结总地说来是正确的，即使如此，其第二部分及其关于“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和“国际价格形态”的参考意见中，也包含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相容的观点。
- [22] 鲁尔·普利比什：《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问题》，纽约，一九五〇年。
- [23] 这样一来，例如阿敏（前引著作第六十四页）就发展了李嘉图的这一典型论点：价格的一般水平与名义工资是成比例的。这种断言找不着任何经验上的证据，它直接导致了臭名昭著的“工资——价格螺旋形”的幻想。美国的名义工资比欧洲经济共同体高出一倍还要多，但是，它决没有导致价格水平等于西欧的两倍。
- [24] 克利斯蒂安·帕劳克斯在《开放经济的增长问题》（巴黎，一九六九年，第一〇〇页）中宣言，马克思支持这一论点。他提到了《资本论》中的一段（第三卷，第二三二——二三三页），这一段他显然误解了。马克思只不过是说，较高的殖民地利润高到这种程度：1. 利润可以寄回国去，2. 没有垄断集团存在，这样的利润进入了祖国利润率的均

- 等化，也就是提高了那里的平均利润率，这是很明显的，但决不能证明殖民地的利润率将会因而被压低到祖国的水平。因为在那里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就势必会对资本的自由国际运动不加限制，而这根本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其他与此不同的话，不然的话，资本输出和在外贸方面的资本投资就不会是阻止平均利润率下跌的一个办法了。
- [25] 大家公认的是，阿敏在这一问题上持摇摆态度，有时候，他坚持国际均等化的观念（比如前引著作第三十四、一三六页），但在另外一方面又否认这种观念（来源同上，第一二三——一二四、一五六——一五七页）。
- [26] 阿敏很明显地强调了这一点（来源同上，第一〇三、一七一、一八九等页），但与艾曼纽尔的论点发生了彻底的矛盾，这他还是想结合进他自己的理论中去。
- [27] 见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
- [28] 帕劳克斯发展了一个类似的论点（前引著作第一一三页）。
- [29] 奈尔森（E.L.Nelson）和库特勒（F.Cutler），《一九六七年美国国际投资的形势》，载“现代商业研究”，第四十八卷，第十期，一九六八年十月，第二十四——二十五页；“现代商业研究”，一九七三年九月。在刚果独立之前的最后几年，在刚果的比利时殖民地公司获取的利润率等于活跃于比利时的公司的两倍。这些殖民地公司只拥有所有比利时公司股份总额的16%，但却获取了这些公司利润总额的足足三分之一。
- [30] 艾曼纽尔前引著作，第五十二——五十五页。但是，在这些情况之下，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作者甚至想使不变工资与不变剩余价值率相对等，而没有注意到由于有日趋提高的资本有机组成，不变的剩余价值率实际上就意味着实际工资的猛增，因为它就意味着第Ⅰ部类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显然提高。
- [31] 艾曼纽尔前引著作第五十五——六十三、七十三——八十、一六一——一六三、一六五、一七〇——一七一、一八九——一九三、二〇三——二〇五页。在第七十三、八十四和二〇五页，殖民地资本有机组成比宗主国高五倍。
- [32] 这一点正常地被马克思预料到了，因为他假定宗主国有高得多的劳动

生产力，因而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间的关系将会加强，换句话说，对劳动力的剥削率就将提高，而且，工人将会以比落后国家更短工作日中的更小的一部分就可以再生产他的实际工资（即使工资提高了）。问题的整个这一个方面都被艾曼纽尔忽视了。

- [33] 阿敏凭他对“不等价交换”结果的经验方面的计算，得到了一个类似的结论。（前引著作第七十六页）。
- [34] 弗朗茨·海因克拉莫尔特(Franz Hinkelammert) 在《Teoría de la Dialectica del Desarrollo Desigual》，载“Cuadernos de la Realidad Nacional”（第六期，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中，同意我们这样的观点：就业不充分是不发达的关键，而且，较低的工资是失业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失业的原因。
- [35] 阿菲利·艾曼纽尔：《白人民族殖民主义与投资帝国主义》，载“新左派评论”第七十三期，一九七二年五月——六月号。
- [36] 米契尔·巴拉特——布朗也反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尽管是以其他的经验立场来反对的），他复制了一个表格，表明了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时期，资本和收入出入英国的情况。《帝国主义之后》，伦敦，一九六三年。资本的日趋外流是很明显的：从一八七〇——一八七九年这十年每年资本输出平均占国民收入的4.5%增长到一八八五——一八九四年这十年的6%、一八九五——一九〇四这十年的6.25%和一九〇五——一九一三年的8%以上。有几个时期，海外纯资本投资比国内纯资本投资还要多——比如说，一八八五——一八九四年（占国民收入6%，而国内投资则只占4%）、一九〇五——一九一三年（占8.5%而国内只占4.5%）。岁入从这些投资中的外流逐步增加，从七十年代每年平均五千万英镑增长到九十年代末的一亿英镑、一九〇六——一九一〇年期间的一亿五千万英镑和一九一一——一九一三年期间的一亿八千八百万英镑；《英国看不见的收入》，看不见输出委员会，第二十一——二十一页。
- [37] 见帕劳克斯前引著作第一一二——一四页。
- [38] 在我们看来，这可以追踪到帕劳克斯对巴兰关于“剩余”观点的不加批判的接受。下面事实表明了他的混淆程度：帕劳克斯用这一观点至少说明五种不同的情况：1. 剩余 = 在国内市场销售不掉的过剩商品（第三十六——四十、一一九等页）；2. 农业剩余产品（第四十——四

十二、七十一——七十二页)；3. 在这样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的工业剩余产品：一部分工业产品不能来自工业生产的收入——货币有效需求——来实现(比如第四十七——四十八、六十九——七十页)；4. 剩余利润或阻碍平均利润率下跌的利润(第六十三、六十五、七十九——八十一、九十九页)；5. 剩余价值额以及(!)非生产性销售费用和国家费用(第二二二页)，也就是在巴兰和斯威茨的“垄断资本”意义下的剩余。

[39] 帕维尔：《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有效性和收益的正确计算》，载“经济研究”，一〇六——一〇七期，一九五七年，第二十九页。

[40] 我们已经讨论了这样的问题，即“国际价值”是不是总是符合于“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劳动生产力”(见本书第二章)。这一观念本身往往是没有意义的，一种商品只是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生产出来的，那么，这种商品的“平均世界市场价值”是什么呢？

[41] 帕劳克斯前引著作，第九十五页。

[4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八七二——八七三页。

[43] 安德烈·刚德尔·佛朗克：在《论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理论》(第一〇九页)中已经指出了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输出剩余价值在支援英国投资方面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44] 佛朗克在同上著作(第一〇五——一〇六、一〇〇——一〇一页)中强调了在“古典的”帝国主义时代这一因素的重要性。

[45] 艾曼纽尔前引著作，第六十四——六十七页以下。

[46] 在艾曼纽尔看来(来源同上，第二六五——二六七页)，在帝国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各种差别，不足以说明工资的各种差别。阿敏甚至还断言，大公司在“最高劳动生产力”条件下制造的产品，有75%是半殖民地的输出品。但是，很明显的是，甚至在半殖民地用现代技术组织起来的矿山和种植园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在宗主国制造工业的工厂生产力水平，都有明显的差别。

[47] 艾曼纽尔前引著作，第一一九——一二三页。

[48] 贝特尔海姆，见艾曼纽尔前引著作，第二八七——二九三页。

[49] 见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类似反映见海因克拉莫尔特前引著作，第六十四——六十八页。

[50] 海因克拉莫尔特前引著作，第三十七页。

- [51] 艾曼纽尔前引著作，第一二四——一二五、二六五页。
- [52] 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第四七二——四七六页。
- [53] 乔治·诺瓦克 (George Novack) 对佛朗克的理论在这一方面的缺点有一个很好的批评，见《拉丁美洲混合形态与永久革命》，载《历史的理解》，纽约，一九七二年。厄尔涅斯多·拉克鲁 (《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载“新左派评论”，第六十七期，一九七一年五月一六月号，第十九页) 争论的一个论点与诺瓦克的类似，也与我们的类似。但是，他也许并没有清楚地区别封建、半封建和半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因此，他没有强调，不发达国家在宗主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系列阶段中，越来越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一体化，对于依赖国的生产关系，有各种各样的反响。
- [54] 佛朗克：《论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理论》，第三十一——三十二页。
- [55] 海因克拉莫尔特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他断言，半殖民地可以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们的生产关系是取决于它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体化的” (前引著作，第六十八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工资劳动和资本的特殊关系——换句话说，劳动力转换成为商品，生产手段转换成为资本。只要这一转换没有普遍化，那么，就没有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尽管有资本的称霸 (它作为商人、高利贷者和银行资本来剥削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而不是作为雇用工资劳动和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工业或农业生产性资本)，而且也不管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体化。
- [56] 一个有趣的类似是十六世纪以后东欧 (东德) 封建农业生产的巩固，这正是为了世界市场而扩大生产的结果。
- [57] 见阿敏对不发达国家资本积累三重曲解的精辟的分析 (前引著作第一九八页)，这种曲解是由于不发达国家屈从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要、屈从于宗主国在其资本贬值中的利益的结果。
- [58] 佛朗克：《论不发达的理论》，第三十七——四十八页。
- [59] 关于美国早期发展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依赖，和正是为了这个原因美国北部和西部各州在农业方面的“专业化”，见乔治·诺瓦克：《美国资本主义：民族的或国际的？》，载《美国历史论文集》，纽约，一九六九年，第十五——十六页；佛朗克：《论不发达的理论》，第三十七——四十、四十七页。

- [60] 也见汽车工业的那些臭名昭著的例子，这些例子表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公司所生产的汽车，比在美国本土要贵一倍，用的是作废了的“新”机器，这种机器是专门为了小的系列而制造的。芬斯特 (Leo Fenster)：《墨西哥的汽车骗局》，载“民族”，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伯纳德·芒克 (Bernard Munk)：《满意保护的福利费：拉丁美洲的汽车工业》，载“政治经济学杂志”。
- [61] 弗尔农前引著作，第一八〇页；苏布拉哈曼尼亚姆前引著作，第一七〇——一七一页。
- [62] 亚克斯·高弗尔纳：《不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和因素比例》，牛津，一九七一年，第二十一——二十一、二十六、一一九页。在比利时和刚果混凝土公司资本/劳动的比例之间的对比，提供了一九三〇年两家刚果公司资本/劳动比例的情况：这两家公司分别所占，不到比利时比例的23%和41%；而在一九五六——一九六〇年，这个数字分别为50%和32%。（前引著作第一〇三页）。这种资本/劳动比例，是与马克思的资本有机组成有关的，尽管二者决不是等同的。
- [63] 见皮叶·萨拉马 (Pierre Salama)：《论不发达问题》，巴黎，一九七二年，第一五四页。
- [64] 一九六五年，从不发达国家输出的大约400亿美元中，只有40亿（即10%）美元是工业产品（其中六亿美元是加工的农业产品）；《皮尔森报告》，第三七〇、三六七页。但与此同时，工业生产已经提高到超过了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20%。
- [65] 在一九七一年，美国从半殖民地进口的原料占80%，但日本进口的只有60%，英国和意大利进口的占50%，西德和比利时进口的占42%。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照会评论道，一九七三年的商品繁荣“所造成的结果，对发达国家的好处，大大超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它为发达国家额外多赚了290亿美元，而为不发达国家额外赚的则只有110亿美元，石油出口国不在此例。
- [66] 安尼巴尔·奎加诺：《Redefinicion de la Dependencia y Proceso de Marginalizacion en America Latina》，第四十三——四十四页。
- [67] 考尔梅前引著作，第七十一——七十一页。这意味着从“不等价交换”中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增长的剩余利润的一部分，符合于“技术租金”——换句话说，符合于晚期资本主义剩余利润的典型形式。

- [68]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年度报告：《国际商业：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日内瓦，一九七四年。这一报告表明了美国基本产品部门的投资与制造业投资之间的不相符合处。第三十二页。
- [69] 在一九五〇年与一九七〇年期间，美国国内铝土矿消费的进口份额，从64%增长到85%，锡从77%增长到98%，锌从38%增长到59%，钾从13%增长到42%，铁矿沙从8%增长到30%，硫磺从2%增长到15%。铬的进口额达国内消费的100%。据记录缩减的有：镍从94%减为90%，钨从24%减为21%，铜从31%减为17%。见理查德·巴尼特和戎纳德·缪勒：《全球范围：多用公司的势力》，纽约，一九七四年。
- [70] 这从发展援助大比例的双边性质可以看出来。在被描述为援助的公债中，在一九六一年有66%是双边的，一九六六年有85%是双边的，一九七一年有71%是双边的。但在最近，公共“发展援助”的比例与私人资本向半殖民地的输出相比的话，出现了一种新的倒转情况。一九七三年，前面那个范畴第一次低于后者——94亿美元，而后者则为109亿美元。当然，这与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的新的原料价格繁荣，不是没有关系的。
- [71] 海因克拉莫尔特前引著作，第九十三——九十五页。智利的例子表明了技术依赖性在近十年间增长的程度。而在一九三七年，所有专利的34.5%仍然掌握在国家手里，这一比例到一九四七年跌到了20%，到一九五八年跌到了11%，到一九六七年又跌到了5.5%：缪勒前引著作。
- [72] 见蒙泰克·辛·阿鲁瓦利亚 (Montek Singh Ahluwalia, 《收入的不平等：问题的某些方面》，载“财政与发展”，第三期，一九七四年。也见萨拉马前引著作，第八十五——八十六页。
- [73] 一九七三年中，在新加坡的外国公司中有八十六家分公司，在香港差不多有二百五十家。日本公司在南朝鲜建立起了四百家分公司。
- [74] 对于“亚帝国主义”这一观念的精彩批判，见皮叶·萨拉马的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第十六——十七期，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月号，第七十七——七十九页。
- [75] 见关于生态学国际发展一九六八年会议的不朽报告，塔菲·法瓦 (M. Taghi Farvar) 和约翰·米尔敦 (John Milton) (编)：《不慎的技术》，

华盛顿，一九七一年。这次会议提出的一些论文预见到了萨海尔灾难。埃及阿斯旺大坝新灌溉系统和在南亚的一些灾难性的错误，都被强调了，湄公河三角洲工程的那种即使不是更严重也是同样严重的危险，也受到了谴责。

- [76]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一九七二年年度报告指出，在一九五〇年与一九七〇年之间，农业方面的这些“雇员”（说半雇员可能更确切一些）的绝对数字，实际增加的，在日本除外的亚洲东部为0.8%，在非洲为1.2%。

## 第十二章

### 服务部门的发展、“消费社会” 和剩余价值的实现

作为商品一般化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意义为社会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sup>〔1〕</sup>在这一方面最明显的历史现象就是农业和手工业的有进步意义的划分，乡村和城镇的划分，这种划分最终演变成为消费品（第Ⅱ大部类）和生产手段（第Ⅰ大部类）两个对立的東西。但是，劳动分工的不可阻挡的发展，最终也逐渐分解了经济上这两大基础部门的严格分离状态。因为，正象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一劳永逸地破坏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统一那样，它也把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生产领域之间一整套的环节给分解了，并且还经常渗透到简单的商品生产和纯使用价值的生产领域中去，这种纯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从前资本主义社会演变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过程中存活下来。

如果劳动分工的这一发展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是工业本身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自从第二次技术革命以来，它也开始对农业施加直接的影响。自从工业方面对农业原料出现大规模需求以来，并且自从城市对肉类产品出现大规模需求以来，农业企业一直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化。<sup>〔2〕</sup>与这一专业化相并行发展的，现在又出现了——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农业大危机之后的中欧和西欧，已经有了从外国输入廉价农产品的竞争——土地耕作与畜牧业的一般分化和畜牧业本身专业化

的一般分化。

但是总的说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整个过程，在农业方面的发展比在工业方面的要慢一些。农业方面的机械化和农业方面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都落后于工业方面的，除了其他一些原因之外，这是因为地租把为这种机械化所必需的资本掠去了相当的一部分。但是，正如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曾预言过的那样，〔3〕机器和化学药品的全部力量确是比较晚地才打击了农业，特别是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那次大危机的冲击之下（那次大危机在农业方面似乎开始的还略早一些）。〔4〕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至少在其第一次“潜在扩大的长波”中，其特征是在农业方面的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比在工业方面的要更大一些。

西德在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年期间，农业方面劳动生产力总额（每一个劳动力单位的总产量）、净劳动生产力（每一个劳动力单位的净产量）和“有效劳动生产力”（每一个劳动力单位的价值创造），增长了四倍。〔5〕这样的一种增长率远远比工业方面的增长率为高。在美国，农业方面每一个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的每年增长率，在一九三七——一九四八年期间为 3.8%（而外界农业则为 1.9%），在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期间为 5.7%（而外界农业则为 2.6%），在一九五五——一九七〇年期间为 6.0%。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控制之下，农业方面劳动生产力的逐步提高所采取的形式是越来越多地把农业企业更换成为纯资本主义的企业——换句话说，就是简单商品生产的面积或生产使用价值的个体小农企业面积的根本上的缩减。大资本对农业的大规模征服又反过来加速了农业方面的劳动社会分工，这种劳动社会分工所达到的质量阶段要高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年代或古典的帝国主义时期。当代农业这种综合转变过程的所有特征——日趋提高的劳动生产

力；大资本的渗透；大规模的企业；加速了的劳动分工——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农业日趋工业化。

这一现象的重要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在农业方面机械和农药的日渐使用，就意味着农业生产过程向另一种生产过程的转变，这种生产过程在每一个方面都和工业生产过程相类似，〔6〕在那里，在竞争的压力之下，降低生产成本的经常的企图，表现在解放出活的劳动力并代之以机器，也表现在劳动组织的改善以及机器和农药的改进，而这些构成了生产的先决条件。〔7〕农业就是这样被拖进了加速技术革新、〔8〕削减花在农业机器方面固定资本周转期的大漩涡之中。举例说吧，日本农业机械研究所新近研制了一种自动的“耕种收割机”，这种机器“可用作各种农活：从插秧到除草、喷洒杀虫药、收割和打谷。这一农活在正常状况下每公顷需要 300 个每人每小时工作量，而使用这种机器，只需 16 个小时就可以完成。”〔9〕这样一些革新在下述二者之间也产生出新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的固定（和流通的）组成部分的周转期，另一方面是购买土地所使用的组成部分的周转期，这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变得要受土地投机特殊规律的约束。

但是第二点，农业的日趋工业化也意味着，整个生产领域越来越脱离了实际农业以及在食品工业方面转变成为“纯粹”工业的那些部门。〔10〕尽管按照工业方式组织起来的养鸡业仍然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过渡的形式，但是，加工和保存牛奶和肉类的工厂、水果和蔬菜罐头工厂以及生产冷冻食品和干燥食品的工厂，都确实实是与生产长统袜子或家具的大规模企业相类似的。

整个生产领域脱离实际农业的这种情况，说明了为什么在劳动人口中农业所占份额的减少，远远超过了平均消费中食物所占的份额。在大多数工业先进的国家中，后者仍然波动于 20% 与 30% 之间，与此同时，那些从事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在大多数国

家的劳动人口中已经降至10%以下，而且在某些国家例如在大不列颠或者美国，降低到了5%以下。但是，如果我们把食品工业（这是所有工业国家中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的雇员也包括在从事“农业”的那些人之内，那么，这个百分比将会加倍还要多。<sup>[11]</sup>

平民就业总人数中积极从事农业人数所占的百分比

	1950	1960	1970
美国	13.5%	8.3%	4.4%
日本	46.7%	30.2%	17.4%
联合王国	5.6%	4.1%	2.9%
西德	24.7%	14.0%	9.0%
法国 <sup>[12]</sup>	36.0% <sup>[※]</sup>	22.4%	14.0%
			[※]1946

在农业方面劳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结合着食品消费那缓慢得多的增长和对某些大宗项目的需求的毫无弹性，已经在相对的农产品价格方面导致了迅速的跌落，这已经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些商品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古典的价值结构和价格结构。如果国际竞争保持下去的话，那么，在西欧的大部分国家里，农业土地的绝对地租以及级差地租就会消失，在北美洲农业面积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里所发生的情况，就是这一种的。<sup>[13]</sup>

在世界市场上，往往有某种主要价格的持久波动，这反映了原料的摇摆不定和某些主要商品会出现突然的短缺现象。在价值方面，这些波动可以确定在北美洲、澳大利亚或阿根廷的那些大面积不太肥沃土地的生产价格，是不是将会突然来确定市场价格。由于生产不能调整以适应这些突然发生的波动，而且农民们

总在害怕长期的生产过剩，而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干预，较常见的是奖励限制生产而不是扩大生产，所以，生产事实上并不是迅速扩大到这些不太肥沃的地区来的，而且，有较高产量的土地（不论是由于天然肥沃还是由于使用了较多的资本投资，或者两者兼有），也只是在偶然例外的情况下给其所有主提供一种真正的地租。<sup>[14]</sup>这就是为什么向资本主义大规模直接耕作发展的紧迫感，在这样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变成了最突出的因素，因为，在当代的资本主义农业中，已没有任何剩余利润是高于平均利润的（这也是非垄断<sup>[15]</sup>部门的平均利润），而与此同时，就连这种平均利润也只能使不变资本高度利用才能取得。在这些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农业企业中，有很多企业的资本有机组成与工业方面的平均数是相同的或相近的，这一事实也同样说明了资本主义地租消失的趋势。有趣的是，这一趋势并不一定伴随着土地价格的降低（人口减少的乡村和已经变成草地的田地除外）。一个原因是，土地仍然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因素，而且，如果它是私人财产，那么它就具有相应的价格——所以，地租并没有完全消失。其次，土地价格提高到了这样的程度，有些土地面积从农业的目的变成了住宅或修路的目的，而且，这些土地面积就以这样的非直接形式被拖进了土地投机中去，这既是永久性通货膨胀的一个结果，又是它的一种动力。

然而，相对农业价格的降低并不能自动地导使小农民的消失。即使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也是如此。在高度失业或粮食短缺的一些时期，“回到土地上去”的情况还暂时是可能的。在另外一方面，如果农民相对收入的迅速降低正好与城市里对劳动力越来越多的需求相重合，正好与农业价格与工业价格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与农民的收入与工业方面工资劳动者的收入之间的越来越大的差距相重合的话，<sup>[16]</sup>那么，从土地向外逃离将会采取压倒一

切的比例，从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一直到一九六五年的“潜在扩大长波”中，在西欧和北美发生的情况就正是如此。

在劳动力日趋客观社会化然而商品生产一般化的条件下，越来越明显的劳动分工只能在向集中发展的趋势压过了向分散发展的趋势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集中的过程有双重的性质：既有技术上的性质，也有经济上的性质。就技术而言，日趋发展的劳动分工只能由于中介功能的发展扩大，因而使商业、运输业和服务性行业各部门获得总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扩大，才能与劳动过程日趋客观社会化结合在一起。<sup>[17]</sup>就经济上而言，集中过程要想在资本的日益集中方面有所表现，就必须采取这样的形式，即大公司、多国公司和联合大企业的垂直一体化形式。

原本联合在一起的那些生产活动的分离，使得中介功能扩大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如果手工业变得与农业相分离了，那么，农民的劳动工具和消费品就必须获得调节的保障，这些工具和消费品原本是他们用手制作的，而且，工匠们原来自己生产出来的食物，这时也必须保证能通过贸易来加以调节。这些中介功能的扩大，有造成越来越多独立性结果的倾向。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最终会导致在这两者之间插入独立的贸易。商品生产越是变得普遍化，劳动分工越是变得更先进，那么，为了保证持续生产和持续销售，这些中介功能就越是必须系统化和合理化。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缩短资本周转期方面发展的趋势，要想变成为现实，只有使资本（商业资本和现金资本）能够越来越控制这些中介功能。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和在古典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向这些中介领域的渗透，主要只限于流通过程：商业、运输和银行资本调节并缩短了第 I 大部类与第 II 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将原

料和机器分别运交消费品工业和农业)、第Ⅰ大部类中不同企业与工业分枝部门之间的交换(原料的互相供应和机器供给制造生产手段的工业)以及第Ⅱ大部类与消费者群众之间的交换(食品、工业消费品和奢侈品之向靠工资维持生活者和资本家的销售)。<sup>[18]</sup>国际劳动分工和劳动的客观国际社会化越是先进,那么,运输体系和国际贸易领域与国际信贷体系中的中介功能,就越加重要。在资本主义的这两个时期中,信贷体系向实际私人消费的渗透,只限于一些悲惨的情况(典当和高利贷);只是到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它才严重地扩大到了美国购买持久消费品的低支付区域(在欧洲和日本,信贷体系向私人消费领域的这一新的扩大,一直到晚期资本主义的到来才变成为典型的)。<sup>[19]</sup>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因而也就是劳动分工,在这种调节领域中也取得了一种新的尺度。在这里也是相当晚于在农业方面,机械化的胜利尤其是受到了电子学和控制论的激励。电子运算和计算机取代了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大量的职员和簿记人员。自动售货商店和自动售货机取代了男女售货员的地位。附有专家的综合性医院或大公司中的工厂医生取代了统着各科的独立开业医生;独立的开业律师让位给了律师协会或银行、企业和公共机构的法律顾问。具有特殊资格的劳动力出售者与私人收入花费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在十九世纪时仍然是占优势的,马克思也曾彻底地分析过这种关系,<sup>[20]</sup>这种关系越来越转变成一种资本主义性的服务关系,但与此同时也客观地变成了一种社会化了的服务关系。私人裁缝被成衣工业所取代,修鞋匠被大百货商店、鞋店和工厂的修理部所取代,厨子被自动服务饭店里的大量生产的预制食物所取代或被专从事预制食物的工业的分枝部门所取代,保姆或打杂女工被她们的功用的机械化所取代,其形式是真空除尘器、洗衣机、洗碗盘机等等。

这种客观的社会化服务在这些方面特别表现得明显，在那里的基础结构中需要最轻微程度的合理化，这是高额的固定费用和建筑费用所造成的结果。在十九世纪中叶，短途运输、家庭取暖、照明、用水和一般的动力供应，还仍然是纯私有的。在技术落后的殖民地地区，这些项目甚至为对当地居民进行专制统治提供了一个主要的源泉，因为当地居民不得不给他们的殖民主人提供私人服务，而这些殖民主人对待这些“砍柴挑水的人”的方式，与罗马帝国的奴隶主不相上下。资本之渗透到这一领域，主要是通过电气化，这一渗透就意味着固定资本的庞大支出和私人冒险事业的有利性的相应降低；这种变化越来越导致公共火车和郊区铁路、电力站、煤气和自来水管道的建设，这些设施在今天，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就是一种统治。个人的、活的家庭奴隶，被社会化了的、死的机械奴隶所取代。

当然，这一发展不应该加以夸大。在一个到处充满着渴望得到刺激的商品生产社会里，作为一种次要的倾向，它经常在创造它本身的否定。专作煤炭和木柴贸易的数以千计的小企业，被少数几家多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所取代了。但是，为了能够到达数以亿计的消费者手里，这些大公司反过来必须鼓励建立起无数的石油加油站和汽车库。电气、自来水和煤气等的服务加以集中并重新组织成公共工厂，直接服务于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但是，在这些能源与最终消费者之间起调节作用的那些多得无法计算的仪器，反过来也需要修理工、管子工、电工和其他手艺人，以完成它们的功能。商品越是廉价，也就是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时间越是短，那么，与生产费用相比的话，管理和修理费用就越是变得多，而且，相对而言为完成这一功能所必需的合格劳动力也就越是昂贵。<sup>[21]</sup>但是，这种否定的性质，必须停留在次要的地位上，因为，一旦在大规模的集中过程中任何具体的差距似乎变得

“有利可图”，那么，它立刻就会吸引资本，这将至少作到利润的平均化，并且会逐步地消灭小规模私有的康采恩。规模巨大的修理企业趋向于取代个体的管子工，正象大百货商店取代小店铺、大银行取代私人钱庄那样。客观上集中化过程的中介环节和代理商，其本身也在集中化。

晚期资本主义远远不是代表一种“工业化后的社会”，它在历史上第一次构成了一般的、无所不包的工业化。机械化、标准化、过度专业化和劳动力分组化，在过去只确定实际工业中商品生产的领域，现在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sup>[22]</sup>农业正象工业那样逐步地变成工业化，<sup>[23]</sup>流通领域变得正象生产领域一样，再创造也变得正象劳动组织一样，这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特征。再生产领域的工业化构成了这一发展的顶点。计算机为私人资本主义靠投机生活的人计算出了“理想的”股票份额，并且为大公司新的工厂计算出了“理想的”位置。电视使得学校机械化了，也就是使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机械化了。<sup>[24]</sup>电视影片和电视资料取代了书籍和报纸。大学、音乐院校和博物馆等的“有利性”，也开始以砖瓦厂、螺丝厂所用的同样的方式来加以计算了。<sup>[25]</sup>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倾向都是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基本标志相一致的：过度资本主义化的一种现象，或不用作投资的剩余资本，由利润率的长期跌落而发生作用，并加速了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过渡。由于相对地说“资本”是缺乏的，那么，它当然会集中在商品生产传统领域中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上。但是，如果资本是逐渐积累而成为越来越多的丰富数量的，而且，社会资本中有相当一部分已不再能增值，那么，新的资本额就会越来越渗透进这样一些领域，这些领域从它们并不创造剩余价值这一意义来说，都是非生产性的，在那里，它将会取代私人劳动和小企业，其不屈不挠的程度，正象它在二百年或一百年以前，在工业生产中

所作过的那样。

资本广泛地渗透到流通、服务和再生产诸领域中去，反过来又可以导使剩余价值额有所增加：

1. 部分地从工业资本本身接过一些生产性功能，比如在运输业就是如此；<sup>(26)</sup>

2. 加速流通生产性资本的周转期，比如在商业信贷方面就是如此；

3. 减少间接生产费用，比如在基础结构方面就是如此；<sup>(27)</sup>

4. 扩大商品生产的界限——换句话说，以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的销售来代替个体服务项目和私人收入的交换。

保姆、私人厨子和私人裁缝等并不能创造任何剩余价值；但是，真空除尘器、集中供暖系统、私人消费的电气和大量生产的预煮食物等等的生产，却是商品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直接的资本主义形式，这与其他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一样。因此，垄断资本决不会反对资本向所谓服务性部门的渗入，即使是这种渗入毫无疑问会降低平均利润率，因为这种增长了剩余价值额必然会被大量的社会投资额分去一部分，这种投资额增加较多。此外，稳步增长的呆滞资本额的集合体以下面这种前景对大公司构成了一种威胁：这种呆滞资本最终不会总是满足于这种平均利息，有可能被迫再一次试图冲入垄断部门，从而使竞争复活并威胁到了垄断的剩余利润。过剩资本转移到服务部门，有助于防止这一变化。

最后，垄断资本对于社会所有部门集中资本主义化和工业化的整个发展过程，没有理由怀有敌意，因为，它本身也参与了这一过程——至少说当“新的”资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即为投资开创了新的领域和为了试验新的产品，这样，这些新领域的“有用性”，就得到了保证。在营养和分配领域中资本的

积聚和集中，使得一些大公司能够出现，这些大公司是钢铁托拉斯和电气托拉斯的对手（尤尼莱佛公司、雀巢奶品公司〔Nestle〕和通用食品公司〔General Food〕）。大公司掌握着分配单位（饭店由酿酒厂控制，加油站由石油托拉斯控制，等等），或者在百货商店领域或运输体系中取得大规模的创始权（航空公司、轮船公司、节假日营业）。联合大企业会不加挑选地联合钢铁生产、航空路线、人造黄油生产、电机制造、保险公司、土地投机和大百货商店，以便为最大的、可能的资本总额取得平均利润率，使特殊投资的冒险性达到最低限度，甚至利用合理化管理和边缘投机的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以使这一联合大企业的资本整体取得剩余利润。<sup>〔28〕</sup>

大量资本在工业本身已经不能增值了，如果这种大量资本是扩大所谓的服务部门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先进的消费差异性，尤其是靠工资维持生活者和工人阶级的消费差异性，就是资本积累的这些新形式和新领域的一种补充先决条件。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在其胚胎中就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而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一书中对它作了如下的描述：“但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上面，不论在任何的点上，消费都是以交换作媒介的，而且劳动绝对不能为劳动者创造直接的使用价值。自身就是交换价值而又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乃是这种生产底真实基础。好吧。首先，工资劳动者和奴隶迥然不同，他自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流通中心，是一个交换者，是交换价值底创造者和通过交换以维持交换价值的人。第一：通过当作工资来使用的那部分资本和活劳动能力间的交换，在资本重新脱离生产过程加入流通以前或者在资本自身还没有开始流通过为以前，这一部分资本底交换价值便直接地实现出来了。第二：对于每一位资本家来说，除开他自己的劳动者以外，一切其他的劳动者，一

律都不表现为劳动者而表现为消费者，表现为交换价值（工资）或货币底占有者，他们拿货币去和他的商品相交换。他们都是流通中心，交换行为是从这些流通中心出发的，资本底交换价值是靠这些流通中心维持下去的。他们在比例上构成极大部分的消费者——虽然并不象普通所想像的那样大，假使我们只考虑狭义的产业劳动者的话。他们的人数——产业人口的人数——越多，他们所支配的货币数量越大，为资本所提供的交换范围便越广。我们已经看到了，资本底倾向本来就在于尽可能地扩大产业人口底数量。”〔29〕

在这里，马克思似乎是预见到了“消费社会”。从历史上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大，就意味着货币工资的普遍扩大，也意味着工业消费品的所谓“国内市场”的同样的大规模扩大，而这种扩大是由资本本身的积累所引起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考虑商品流通领域的这种扩大呢，这种扩大在无产阶级的需要（生活标准方面）和资本的增值和实现问题方面，包括了靠工资维持生活者本身？在工业化国家里，无产阶级的现金有效需求的差异性，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当西方国家的产业后备军开始经历一种长期衰退的时候，就已经在逐渐发展了，这种差异性是来自下面这些主要根源的：

1. 工人阶级实际工资中“纯粹”生存手段所占份额的长期衰减。根据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一点是与为取得劳动力商品中价值组成部分的趋势相适应的，这种劳动力商品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都被确定来取代它以及具有纯生理限定的那种组成部分。当这种发展趋势增加速度的时候——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情况就是如此——越来越大的工人消费的差异性就伴之以永久性的农业危机。农产品的需求似乎是达到了饱和状态；在某些食物方面甚至出现了过剩状态。工人对食物以外消费

品的需求的增长，被伴之以农业方面就业的迅速衰减和小农民企业的遭到摧毁。<sup>[30]</sup>

2. 作为一种生产单位的无产阶级家庭越来越被取代，甚至作为消费单位的无产阶级家庭也有被取代的趋势。预煮食物和罐头食物、成衣、真空吸尘器等越来越多的市场，和各种各样家庭电气设备的越来越多的需求，与家庭中有直接使用价值商品生产的迅速衰减，是相一致的，而这些零活原本是由工人的妻子、母亲和女儿来完成的：做饭、洗衣做衣以及整个家庭的一些服务项目，即热力、整洁和洗涮等等。由于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是越来越靠由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商品和资本主义方式组织并提供的服务来完成的，那么，个体家庭的物质基础，在消费领域中也消失了。<sup>[31]</sup>

这一发展也是与一种经济上的紧张状态相一致的：那就是，妇女越来越多的职业活动，这是一个方面（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长期发展趋势，尽管它在中期是可能辨认出不同的波动来，这与实际商业周期的摇摆是相一致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工人阶级的学习时期越来越加长了（也就是再生产劳动力资格的社会过程加长了）。这种经济强制性是与资本主义发展矛盾的内在逻辑相一致的。一方面，由于商品生产的不断扩大，也由于使这些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成为必要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资本不得不降低个别商品的价值。因而，它就得努力在整个人口中刺激新的消费需要，包括工人阶级在内。在另外一方面，剩余价值的生产、利润的实现和资本的积累，仍然是其一切努力的最终目的；因而就有一种永久性的压力来限制工资、使工资保持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所产生的一切消费新需要所必不可少的水平之下。家庭消费的需要与个体男性工人工资之间的越来越不一致，导致已婚妇女失业率提高，这样就保证了工资劳动的全面的扩大。<sup>[32]</sup>

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资本对于使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家庭与资产阶级社会一体化明显地感到有兴趣的时候，它的长期发展趋势倾向于瓦解这种类型的家庭，作法是使已婚妇女与工资劳动力一体化、使妇女在家庭中所完成的任务转化成为用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服务性行业、或者用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来取代她们在家庭中所要完成的任务。无产阶级家庭妇女担负着无偿的劳动，这种劳动长期以来一直是工人劳动力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无偿劳动的交换与资本并不相抵触，也不能直接产生剩余价值。它所采取的形式是一种投入的资金，这种资金由工资的一部分加以补偿，而工资是工人出卖其劳动力而交换来的。<sup>[33]</sup>在极端的情况下可以这么说，如果无产阶级家庭妇女的无偿劳动突然间完全消失的话，那么，社会的剩余价值就可能减少，因为，为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最低工资这时就必然要提高。用工资购买的商品将会更多，工人购买的家庭以外的服务，也将会更多。但是，如果以前的家庭妇女现在加入了工资劳动者的群众中去，那么，她就提高了已生产社会剩余价值的总额，从而也就扩大了商品生产领域和资本积累。如果这些额外生产出来的商品中，有一部分是用她那额外工资所购买去的，以替代她以前在家庭中所担负的无偿劳动服务，那么，这完全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因为，这是有利于利润的实现和扩大再生产的。

3. 由于近代工人阶级地位的提高和斗争而取得的无产阶级在文化方面的一些成就（书籍、报纸、自我教育、体育运动和组织等等），失去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那些积极主动性和自动性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他们在古典帝国主义时期的特点（尤其明显的是在德国，在一八九〇——一九三三年期间），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拖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中。书籍是由出版商来出版，而不是由工人合作社来出版；资产阶级的报纸

和电视取代了社会主义的报纸；商业化了的假日、旅游和体育运动等取代了由年青的工人协会组织起来的文娱活动；等等。将无产阶级所得到的文化需要重新吸收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去，这导致了工人阶级文娱领域的一种广泛的再度私有化<sup>[34]</sup>。这对这样一种趋势是一种尖锐的突破：这种趋势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古典帝国主义时期说来是典型的，并在向无产阶级集体行动和团结领域的不断扩大方面发展。

4. 直接用经济方法强制购买某些额外的商品和服务，如果不强制的话，劳动力商品就实际上不可能售出，其再生产手段也不可能买进（这一点必须与间接的、社会操纵的那些强制，比如说广告之类的那种强制，严格地加以区分开）。因此，从经济上来讲，普通靠工资维持生活者在今天根本不可能步行去上班、不可能没有参加一项健康保险计划、不可能仍然使用私人生产出来的木炭以代替煤球、石油、瓦斯或者电力。在这种经济强制的两个方面之间，必须作出区别来。一方面，劳动强度的实际增加，使得一种较高的消费水平成为必要的（除了其他东西之外，例如质量较高的食物、较大的肉食消费量等等），如果劳动力要重新组织起来的话。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集合式大都会的日趋扩大，把家庭与工作之间的流通时间，拉长到了这样的程度，使得节省时间的消费品也同样变成了这种劳动力实际重新构成的一个条件。私人车辆运输方面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在这一方面的集体性公共运输网是并不存在或者是发展不够的（例如在美国的许多地区）。

5. 消费的差异性或由于社会压力（广告等）而消费的商品的扩大。这些商品中有很大部分可以认为大多是毫无用处的（卧室中的矫揉造作装饰），如果不是有损于健康的话（香烟类）。将以前的许多奢侈品转变成为群众的消费品，通常会导致这些商品质量的系统的降低。<sup>[35]</sup>在实现剩余价值方面的种种困难，会使壑

断资本越来越趋向于永久性地改变商品的形式，从合理消费的观点来看，这些改变所采用的方式往往是毫无意义的。<sup>[36]</sup>在这一方面，卡伊 (Kay Geoffrey) 谈到了商品“消费期”缩短的问题，这种商品如果是耐久的或半耐久的消费品的话，随之而来的就是质量的变坏。<sup>[37]</sup>

6. 靠工资维持生活者的需要（生活标准）的真正扩大，这种扩大代表着他们的文化和文明水平的提高。归根结底这一点可以实际追踪到对较长的文娱时间的彻底掌握，不论是量的方面（更短的工作周、周末休息、假日照付工资、较早的领取养老金年龄、较长的教育等）还是质的方面（文化需要的真正扩大，扩大到这种程度：不是琐碎的，并且资本主义商业化不能使他们感到不满足）。需要的这种真正的扩大，是资本的必要文明功能的必然结果。对所谓的“消费者社会”的任何抵制，都是开历史的倒车，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倒向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并从历史唯物主义倒向唯心主义，而这种“消费者社会”在对资本主义消费的商业化和非人性化进行正当的谴责之外，向一般的消费和需要的历史性的扩大，发起了进攻（也就是从对社会的批判向对文明的批判发展）。马克思完全欣赏并强调了资本的文明功能，<sup>[38]</sup>他认为这种功能是“丰富个性”的物质基础的必要的准备。下面一段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一书，这一段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观点：“但作为永不休止地追求一般财富形态的热烈愿望，资本则鞭策劳动超脱其天然需要的界限，为发展丰富多彩的个性创造出种种物质的要素，而这样的个性不论在生产或在消费上面都是同样地全面的，因而这些个人底劳动已经不再是劳动了，而是充分发展起来的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间自然必然性和它的直接形态都消逝了，因为代替天然需要的是为历史所创造的需要。”<sup>[39]</sup>

所以，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抵制资本主义的“消费者社会”决

不暗示着抵制整个需要的扩大和差异性，或者使这些需要倒退到原始的天然状态；社会主义者的目的一定是为全人类发展一种“丰富的个性”。在这种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抵制资本主义的“消费者社会”只能意味着：抵制所有那些消费和生产的形式，这些形式继续限制人类的发展，使得人类的发展成为狭隘而又片面。这种理性的抵制试图倒转商品生产与人类劳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取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形式，因此，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并不是为每一个生产个体单位（工厂或公司）创造最大限度的物质生产和最大限度的私人利润，而是为个体人创造自我活动的最适宜条件。<sup>[40]</sup>物品生产必须受这一目标的约束，这就意味着，凡是有损于人类健康和人类自然环境的生产形式和劳动形式，都要加以消除，即使是孤立地看这种形式是“有利可图的”。与此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人也是一种物质的存在，也有物质的需要，人要完成“丰富个性”的充分发展，决不能通过苦行主义、自我惩罚和人为的自我限制，而是只能通过人类消费的理性的发展，这种发展是自觉地有所控制并且自觉地（也就是民主地）受到人类集体利益的约束。

马克思本人也审慎地指出，有必要制订出一个需要的体系，这种体系与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而在某些集体中兜售货色的新苦行主义并无任何瓜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马克思说：“于是探索整个的自然界，借以发现物体新的有用的性能；普遍地交换一切国家和一切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采用新的（人工的）加工于自然物体的方法，借此赋与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从一切方面去查勘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旧有物体底新的有用属性，例如旧有物体用作原料的新属性等等，所以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同样也要发现、创造而且满足由社会自身所产生出来的新欲望，培养群居的人所有的一切特

性，培养人类底欲望，使人类成为尽可能地欲望丰富的人类，把人类作为尽可能地全面的和普遍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为要使人能从事于多方面的享乐，人类便必须有能力享乐，因而必须使他有很高程度的教育）——因为多才多艺和具有多方面社会关系的人，同样是以资本作基础的生产所必需的条件。这不但是分工和创建新生产部门的问题，或创造在性质上焕然一新的剩余时间的问题；而且还要从一定的生产自身中分化出生产新使用价值的劳动；发展起一种不断扩大的、包罗各色各样劳动和生产的体系；与其相适应的是一种日益扩大的和日益丰富的欲望体系。由此可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万能的产业（即创造剩余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另一方面又创造出一种普遍发掘自然特性和人类特性的体系，一种普遍的功利体系，科学自身及其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属性都同样表现为这个体系底体现者，而这正是超越这种社会生产和社会交换圈子的自在的更高级的东西（An-sich-Höheres），有资格为自己而存在的东西（Für sich-selbst-Berechtigtes）。”〔41〕马克思进一步写道：“奢侈是自然需要底反面。自然的需要就是把个人自身贬低为一个自然主体的那样需要。产业底发展扬弃了这种自然需要，同样也扬弃了那种奢侈——但这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面纯然是通过矛盾来进行的，因为它自己也只能定下一种特殊的社会标准以区别必要和奢侈。关于需要体制和劳动体制的问题，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来处理呢？随着研究底进展，这个问题便会自然而然地解决的。”〔42〕

在这里，没有必要来说明：发展和区分物质消费的可能性，不能是无所限制的；“丰富”这一概念是属于真正的物质和历史范畴的，而不是属于一种唯心的或乌托邦的观念；而且，缺乏的消失和以缺乏为基础的一种经济，作为一种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在这里，同样也没有必要试图给一种

理性类型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这种理性类型是消费发展的类型，或创造性生产活动与被动的物品消费之间的区别的类型（一个人不能以消费一个冰激凌或一件衬衫那样的方式来“消费”一架钢琴、一本科学书、一种友谊或一种风景）。〔43〕

货物的实际消费越是充分满足，其数量之扩大就变得越是无理性，越是对人类无关紧要，并且进而退化成为纯奢侈、对生命的厌恶（可与公元一世纪至三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和十八世纪的颓废法庭官僚作一比较）。〔44〕在这一方面，有必要抓住作为大量生产商品的消费的那种物质消费发展的双重性质。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曾强调指出，与资本主义创造出大规模生产的同时，它还确定了产品的单方面的、厚重的性质，这种性质强加给它了一种社会特性，这种特性与社会情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其与使用价值的直接关系（这被认为是来满足生产者的需要），则看来象是偶然的、不相干的、不重要的东西。〔45〕这种消费范围似乎完全没有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那些崇拜者例如扎恩(Zahn Ernest)所注意到，扎恩认为这些“货物”和“服务”作为“文化货物”和“文明服务”而全面地商业化，无任何可怀疑之处，并且天真地忘记了（可是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么天真呢？），这些货物的生产是要受资本主义事业的利润动机所约束的。〔46〕这样的辩护士一方面断言，在现在，“购买者群众”是至高无上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承认，“新广告”的突出特征是，这些“至高无上的消费者”首先必须被说服他们有新的需要。

然而，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尽管无产阶级的消费也有相当的扩大，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不到的是，使这种消费以与劳动生产力相同的速率来增长。使资本增值和积累资本的强制力——换句话说就是竞争和生产手段的私有——迫使它作不到这一点。因此，如果在长期中，消费在价值方面的发展较在生产

力方面为缓慢——这完全表现在增长中的资本有机组成的规律中（因为，如果资本总额中可变部分有一种长期衰减趋势的话，那么，来自第Ⅱ大部类对商品的需求就不能以与来自第Ⅰ大部类对商品需求的同样速率来增长了）——那么，包含在消费品中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或消费品社会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个别资本家说来，似乎是十分现实的事情——就是除了这个资本家自己的工人之外，还把所有无产阶级都作为具有可以无限制增长的购买力的潜在顾主来看待——而对于作为整体的资本家阶级，则是毫无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禁止把国民收入中更大的份额分配给无产阶级。因为，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所作的解释，“但是产品底数量却以相同的比例增加起来——如果不是这样，那一定是有新的资本被解放出来了，同样也有劳动被解放出来了，它们没有加入流通过程。可是随着产品数量底增加，为去实现包含在这些产品中间的劳动时间所感到的困难也在同一程度上增加了——因为对消费的要求提高了。”〔47〕这就是对两种特殊服务的巨大发展所作的解释——这两种服务就是，广告和市场研究为一方面，消费者信贷为另一方面——这两种服务的功能就是探索出这些限制并突破这些限制。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消费领域中，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扩大相伴而来的，是这两个方面那高于平均水平的扩展。

销售、分配和管理费用的大量增长（在美国，这些费用已经吸收了国民收入的50%以上），是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越来越多的实现困难的正确无误的说法。与此同时，它也是这种生产方式在其历史性的衰退阶段的浪费性质的明显的证据。〔48〕尽管这些费用的一部分可以认为从社会角度来看是正当的——就是有利于有益使用价值实际消费的那些费用——并且，甚至在资本主义制度被

推翻之后如果不浪费生产者、消费者的时间和能力的话，这些费用也不能够缩减（不规则的供应、不完全的储存、对新产品不充分的知识），但是，可以不加犹豫地接受的是，这些费用的大部分并不是由消费者的利益来决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些特殊条件和矛盾来决定的（资本增值和竞争的强制作用，也就是生产手段的私有财产）。

如果把一整套复杂关系考虑在内的话，那么，剩余价值总额或利润率所受销售费用巨大增长的确切影响，才能够计算出来。首先，一般商业资本的一个特征，也部分地是在这一服务部门领域中所投资本的一个特征：其目的是缩短流通生产资本的周转期，从而能够扩大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额。这样，它在社会剩余价值总额中所占份额——即这样一个事实，在服务部门所投的资本能获得平均利润——由于它进入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故与剩余价值生产的增长是相一致的。其次，服务部门的成本费用（建筑物、仪器、车辆、工资和薪金），不能从现有剩余价值生产中得到满足，而是从社会资本（也就是在过去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中得到满足。这些费用由部分集合社会资本的再建来重新偿付，而不是由发掘现有的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来偿付。只有服务部门的这种利润，构成了现有剩余价值生产的一部分。很高的那种销售费用对大公司自然增长的利润额或利润率所施加的限制，其决定性程度并不是象吉尔曼所错误地假设的那么利害。<sup>[49]</sup>寄生于这种大规模的增长的，是社会资本的非生产性浪费，并不是现有剩余价值生产中相当一部分的浪费。剩余资本的非生产性花费当然就意味着，社会剩余价值总额如果以生产性方式花出去的话，是会更大大一些的。但是它是非生产性方式花出去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实际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已经从大工业公司中减去了。

十九世纪的私人服务部门基本上包含着特殊劳动力私人出售者与资本主义岁入之间的交换；这对于确定剩余价值总额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的再分配。在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中，流通领域中的服务部门基本上包含着社会资本总额中非生产性消费掉的一个特殊部分的所有主与总收入所有主（既包括资本家也包括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并没有参与剩余价值总额的直接确定，但是对这种确定却具有重要的间接意义，因为，它可以缩短流通资本的周转期而有助于剩余价值总额的提高。对于资本积累的影响，就是将呆滞资本的一部分释放出来以参与社会剩余价值总额的分配。但是，这种参与最终只能发掘两个泉源：它的发生必然要使剩余价值的那个部分付出代价，这个部分被分配于生产性资本的所有主之中（这样一来，由于提高了资本总额而降低了平均利润率，在这个资本总额中剩余价值总额必然还会被分割），<sup>[51]</sup> 或者是由工资来付出代价——换句话说，也就是提高剩余价值率（除了其他情况之外，要通过实际工资的相对缩减，而这是消费价格增长的一个结果）。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消费信贷的明显扩大也给实现剩余价值的越来越多的困难，提供了类似的证据。在美国，私人债务的庞大的数额，不仅仅构成了耐久消费品部门扩大的经济基础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筑活动大规模扩大的经济基础，而且它也是永久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基础。这种债务现象证明，尽管技术革新加速了，投资增长了和永久性军备加强了，晚期资本主义在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矛盾方面，其能力并没有大于早期资本主义或古典的垄断资本主义——即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无限制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对“最终消费者”（一天多似一天地包括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的需求和消费

加以限制的趋势。当然，这一矛盾是与资本本身的增值规律相一致的。

服务部门扩大这一显然类似的概念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典型的观念，所以，我们必须分析这一概念那些矛盾的构成因素。服务部门扩大包括：

1. 中介功能总的扩大的趋势，这是劳动分工越来越发展与劳动力越来越客观社会化两者相对立的结果。这一扩大中的一部分是由技术决定的，因此，其寿命将超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运输网和分配网的扩大、由消费者付出代价的机器维护和修理设备等等）。

2. 既包括销售费用（广告、市场、某种程度昂贵的包装以及类似的非生产性花费），也包括消费信贷的巨大发展的趋势。服务部门在这一方面的发展，绝大多数是由社会确定的而不是由技术确定的；这一发展来源于剩余价值实现的越来越多的困难，并且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一般化商品生产的消失而消失。

3. 发展劳动人口文化、教育需要的可能性（教育、医药卫生、文娱活动），有利于纯粹的商品消费，这是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力和对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相应限制创造出来的（以及越来越明显的消费差别）。与这些需要相适应的这些服务，并不是单独地与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特殊形式结合在一起而不可分的，而且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推翻之前，也不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大家都知道，不论是这些服务的那种适合于谋取私人利润的商业性质，还是这些服务的内容，都将经历一种基本的变化：它们不是操纵实际的人类需要并使之异化，而是将受到实际人类需要的约束。按照这种趋势，这些“服务”的独立操作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会被废弃，因为所有的男男女女都逐步变得能够操作这些服务项目了。个体的专业形式将会保留下来，但是，对于文化教育的

各种服务项目，社会不会再区分为“生产性的”操作者和被动的消费者了。

4. 商品生产的扩大，这已根本不是所谓“服务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在过去大多是私有性质的某些生产形式日趋集中化的一种结果。电力、煤气、成品饭食和电动家庭用具等都是物质商品，这些商品的生产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决不是服务项目的销售。<sup>[51]</sup>

5. 非生产性雇用的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数增长了，因为，资本向流通领域和服务领域的大规模渗透，给不再能有生产意义投资的资本提供了机会，以便能至少获得非垄断部门的平均利润，而不是只获得平均利息。这一人数增长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向过度资本主义化发展趋势的一个最终结果。<sup>[52]</sup>

这样，作为晚期资本主义典型事物的资本主义服务部门的扩大，以其自身的方式总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主要的矛盾。它反映了社会技术和科学生产力的巨大扩展和生产者文化、教育需要的相应增长，正如它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这种扩展所采用的对抗性形式。因为，伴随着它而来的，是越来越加过度资本主义化(资本增值的诸般困难)、实现剩余利润的越来越多的困难、物质价值的越来越多的浪费以及工人在他们的生产力和消费领域方面的越来越趋异化和畸形。

投资于服务部门的这种资本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呢？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在这一方面所使用的劳动力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呢？只要投资于服务项目的资本是限界性质的，<sup>[53]</sup>那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所进行的分析说来，就只是次要的。但是，一旦晚期资本主义服务部门扩大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它吸收了社会资本总额的相当一部分，那么，生产性资本的确切界限的正确定义，就是有了最大的

重要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这一公式对这一定义说来是不适当的。尽管其本身是正确的，但它仍然是一种重复。它并没有回答生产劳动的界限问题，而只是把这一问题以另一种形式加以重新铸造而已。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就存在有些困难，《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论》第二卷之间，就有某种不一致之处。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强调了亚当·斯密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及我们所理解的资本关系的作用，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仍然摇摆于两种假设之间：一种假设是只有参预了直接商品生产的劳动——从而参预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性的；<sup>[54]</sup>另一种假设是，任何一种劳动，只要是用资本购买的（以资本交换而不是赋税），都可以算作是生产性的。<sup>[55]</sup>在“生产劳动概念”这个章节里——这个章节是考茨基作为《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的附录而出版的——这两个定义仍然还是互相混淆不清的。<sup>[56]</sup>从这一章节来看，马克思生产劳动概念的实际模糊程度是很清楚的，在这里，马克思——与《资本论》完全相对立——是把商业方面的中间人包括在生产劳动者的范畴之内的，如果这些中间人实行工资劳动的话。<sup>[57]</sup>

在《资本论》的第二卷中，马克思给生产者下的定义是，参加物质商品生产因而参加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工人。现在，他清楚地说，并不是与资本交换的所有劳动都一定是生产性的——以工资劳动开始而被雇用于流通领域中（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sup>[58]</sup>这样一来，马克思对于亚当·斯密在考虑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时把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方式的反驳，就在他在《剩余价值学说》中对亚当·斯密的批评之外，得到了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供了一个一般规律的连贯性的公式，这个一般规律确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劳动的新领

域：“如果一种功能本身是非生产性的，不过是再生产上一个必要的要素，现在因分工之故，由多数人的副业变为少数人的专业，变为他们的专门事业，这种功能本身的性质还是不会改变。”〔59〕

所以，如果工资劳动仍然在功能上是非生产性的，即使它构成了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的因素，那么，这一规律就可能更加适用于在再生产中甚至没有起直接作用的那种劳动类型。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岁入人员服务的交换，由于并不导致商品生产，会突然之间变成了生产性的，而只是因为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商业而被组织起来并且是从事工资劳动的。甚至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运输工业内部对于下面两者还是加以区分的：一者是人员的远征——这包括在人员服务与岁入之间的非生产性交换——二者是货物的远征——这增加了货物的交换价值，因而是生产性的。〔60〕如果连用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交通运输也是非生产性的，那么，用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洗衣业、音乐会、马戏团、诊疗所和法律顾问处等，就可能更加不是生产性的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用下面的公式作为生产资本与流通资本之间的巧妙的区分线：“由单纯价值形态变化，由观念地考察的流通而起的各种流通费用，不会加入到商品的价值中去。”〔61〕“所以，在假设的场合，储存品形成（在这里，那是非自愿的）的费用虽然只是由于形式转化的迟滞和必要，但还是和第一节所述的各种费用有区别，因为它们的目的本身不是价值的形态变化，而是价值的保存。这种价值存在于当作产品，当作使用价值的商品中，只有通过产品的保存，使用价值本身的保存，方才能够保存。在这场合，使用价值不会提高，也不会增加，却反而会减少。不过它的减少会受到限制，并且它会被保存下来。垫付的商品中的价值，在这个场合，也没有增进。不过有新的劳动

——物质化的劳动和活的劳动——加进去了。”〔62〕最后：“产品总量不会因运输而增大。产品自然属性因运输而起的变化，除了若干例外，不是预期的效果，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害。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它的消费中实现，并且它的消费可能就会使位置的变化，从而使运输工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所以，投在运输工业上的生产资本，会部分地由运输工具的价值移转，部分地由运输劳动的价值追加，而把价值加到被运输的产品中去。”〔63〕

这样，生产资本与流通资本之间的界限就存在于下述两种工资劳动之间：一种工资劳动提高了、变化了或保留了一种使用价值，或者为使用价值的实现所不可缺少；另一种工资劳动与使用价值没有区别，也就是与商品形式本身无区别，但只是来源于所包括的特殊需要，也就是改变了（而不是创造了）交换价值的形式。〔64〕因此，将马克思的这个定义加以扩大的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服务资本——只要它不是错误地与生产商品的资本相混淆不清的话——与流通资本相比较，并不是更有生产性的。〔65〕

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果。从资本家阶级的全面利益的立场来看，晚期资本主义服务部门的扩大，充其量是一种较小的罪恶。它对呆滞剩余资本的存在是可取的，但在这样一种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罪恶：它对于剩余价值总额的增长没有什么直接的作用，只不过以缩短资本的周转期而在一种轻微程度上间接地有助于剩余价值的增长而已。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必然是将呆滞资本转换成服务资本，并且与此同时，以生产资本来取代服务资本，换句话说，以商品取代服务；运输服务代之以私人车辆；戏曲和电影服务代之以私人的电视机；到明天，电视节目和教育也将代之以视频暗盒。〔66〕没有必要来强调这种堆积如山的商

品的不可估量的增长，对环境所具有的危險。

资本寿命之长于物质用品的饱和状态，不会更甚于资本寿命之长于物质生产中活劳动力的消除。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社会服务和文化服务之扩大——这可能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发达造成的——为什么会局限于这样一些限度之内——这些限度之狭隘程度正与自动化发展之狭隘程度一样——其原因就在于此。在发展的某种程度上，这二者都将突破资本增值的整个过程，并且随之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正是为了这种种原因，服务部门的进一步发展，不会降低平均的社会资本有机组成，并从而产生一种平均利润率增长的趋势。恰恰相反，随着资本主义服务部门而自然增长的整个社会剩余价值的这一小部分，是生产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个扣除部分，而不是一个附加部分。不证自明的是，随着商品生产整个领域自动化的完成，一种大规模的社会收入将会消失。在只有各种服务性行业组成的一种社会中，整个无产阶级都变成了非生产性的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不再生产商品了），这种社会将面临着这么个问题：这些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不能够用他们的工资只是来购买“资本主义的各项服务”，因为他们首先必须要吃、要喝、要穿、要住，而且在他们能够去看病、去修鞋子<sup>[67]</sup>或者去假日旅行之前，他们必须先保证他们的能源。因此，投资于“服务性企业”的资本，几乎不能作到“增值”。如果全部由自动化过程生产出来的物品，不再是销售，而是免费分配，那么，已经以这种方式保证了生活标准的群众，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劳动力出租给“服务性企业”，要想说出其理由，就困难了。换句话说，这样一种方案与资本主义就没有什么瓜葛了。

## 注 释

- 〔1〕 “因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前提，所以，手工制造业的分工，规定社会内部的分工要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反之，手工制造业的分工也会发生反作用，使社会的分工发展并且增加。劳动工具分化了，生产这种工具的职业就会愈益分化。只要一种从前当作主要职业或辅助职业，和其他职业结合在一起，而由同一个生产者去经营的职业，现在为手工制造业的经营所掌握，分裂和互相独立的现象就会立即发生。并且，只要一种商品一个特别的生产阶段为手工制造业的经营所掌握，它的不同各个生产阶段就也会变成不同的独立的职业。……在这里，我们还不要进一步论证，分工方法除了侵入经济领域，还会侵入社会其他一切领域，并且到处为专业化，专门化的发展，和人的分解打下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五三——三五四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一卷，第三七五——三七六页）。
- 〔2〕 卡尔·考茨基：《农业问题》，我们在这儿参考的是法文版：《La Question Agraire》，巴黎，一九〇〇年，第四十二页。
- 〔3〕 “以后，生产率无论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增长起来，虽然速度不同。但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不平衡必定开始缩小，就是说，农业生产率必定比工业生产率相对地增长得快。”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第一一〇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第二卷，第一一六页）。
- 〔4〕 这一农业危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已经变得很明显了，而且，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间的减弱之后，又以新的势头爆发出来。关于这一问题，见尤金·瓦尔加：《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政治后果》，法兰克福，一九六九年，第七十七、二六一——二七四页。
- 〔5〕 材料系由汉斯·伊姆勒（Hans Immler）提供给著者的，其基础是彼得·鲁比什（Peter Hrubesch）的著作：《一九五〇/五一年——一九六四/六五年度西德农业生产力发展测量的输出输入指数》，载“农业报告”，一九六七年，第四十五卷，第三——四期；一九六五——一九七〇年的资料来自联邦“两个德国间”关系协调部。

- 〔6〕 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这么个事实上：自从一九四八年以来，美国农业建筑除外的不变资本每年花费，一直高于“土地资本花费”（计算方法是每一地区在某一时期流行的土地价格乘以平均抵押利息率）。从一九四四年以来，整个资本消费总额超过了农业方面的劳动收入，从一九四八年以来，单是每年使用的不变资本（也就是除去“土地资本的花费”）高于劳动收入。海尔德·蒂姆伯莱克—韦伯尔（Hilde Timberlake-Weber）：《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农业调整问题》，载《农业报告》，一九六三年新论集，第四十一卷，第三—四期，第五七六—五七七页。而在一九五〇年，美国农场花费了127亿美元的流通不变资本和25亿美元的固定不变资本（折旧费），总计达152亿美元，而其净收入则为169亿美元；一九七〇年，美国农场分别花费了流通不变资本246亿美元和固定不变资本65亿美元，而其纯收入则为225亿美元；《美国统计摘要》，一九七一年，第五八一页。
- 〔7〕 克利拉斯（F.W.J. Kriellaars）：《Landbouwproblematiek bij economische groei》，雷登，一九六五年，第二十一页。在一九五〇年与一九七〇年期间，农业机械和设备（包括农场主私有的汽车在内）的价值，从120亿美元增至340亿美元。与此同时，农业人口从2,300万减少到了960万，活跃于农业的人员从960万减少到了230万（在一九七〇年，所谓活跃于农业的人口中，有40%被雇用于农业之外）。
- 〔8〕 考克雷恩（W.W. Cochrane）估计，一九四〇—一九五八年期间，美国农业产量的增长中，有80%必须归功于技术的进步（其他一些著作家估计的百分比是比较接近于30%）。他进一步解释说：“新知识的雨露洒遍了大地，技术革命横扫了农业，这不是一件只与机器和设备有紧密关系的狭隘问题——这是一种广阔的事物，其中包含着劳动和管理技术的改进、重新定位置、商品企业的重新组合和区域专业化以及农场对新技术的采用。”考克雷恩：《农业技术，国外剩余处理和国内供应控制》，载“农业经济杂志”，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号，第八八七页。
- 〔9〕 “日本时报”，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
- 〔10〕 在农业商品进行工业加工时加进去的价值所代表的粮食总价值的份额，可以高于50%（克利拉斯前引著作，第十五页）。海姆斯特拉（S.J. Hiemstra）：《美国今年为食物要花费多少？》（载“农业形

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号，第十一页)中指出，在一九五〇——一九六二年期间，粮食加工商和销售商获得美国平均家庭计划中可处理收入的12%，而实际农场主所得在这一收入中所占份额，从8%降到了5%。在可处理收入中食物花费的份额，从25%降到了19%。在一九七〇年，农场主所得到的消费者的支出，面粉和面包制品只占有19%，蔬菜和水果占25%，消费者的全部农产品支出，占39%。

- [1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澳大利亚经济研究》，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第十一页；关于一九五〇年的日本情况，见 Masayoshi Namiki 《一八七二——一九六五年日本的农业人口》，第四十页。
- [12] 关于一九四六年的法国情况，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一九五四年欧洲经济形势的研究》，日内瓦，一九五五年，第二〇七页。
- [13] 美国的农场数在一九二〇年与一九四五年期间，摇摆于600万个左右，到一九七〇年已减少到了290万个。其中有180万个是维持生活农场和谷物分益制农场；换句话说，只有110万个农场是为了市场而生产的。一九六四年，87万个农场占了农业总销售额的84.4%，每个农场的营业额平均为34,000美元（其余的根本未达到这一平均数）。有200万个农场的销售额只有4,000美元或更少。只有142,000个农场的营业额是超过40,000美元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这么认为：地租在90%的美国农场中实际上已经消失了。
- [14] 原料主要价格的突然增长，伴之以级差地租的同样的突然增长。比如在南非金矿黄金价格在自由市场猛增之后的情况就是如此。在中东石油产地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一九七四年中，一天生产一桶石油所必需的投资就各不相同，在中东为100英镑，在北海为1,200—1,300英镑，在美国的沥青砂和沥青片岩层则为3,000—4,000英镑。没有必要来强调在中东石油租金的最后规模。
- [15] 关于与垄断的公司相对比农场主所处的结构方面较弱的地位，参见克利拉斯前引著作第二十八——三十一页。在一九五〇年与一九六〇年期间，美国农业机械的生产摇摆于60和100指标之间；其价格提高了30%。钢铁生产摇摆于90和120指标之间；其价格提高了50%。农业生产摇摆于100和125指标之间；支付给农场主的价格相对之下下跌了约20%。
- [16] 在美国，农业方面每个工作小时的收入在一九四八年仍占产业工人平

均每小时工资的75%，而到一九五七年，这个比例数下跌到了30%。  
蒂姆伯莱克——韦伯尔前引著作，第五七六页。

- [17] 我们下文分析所谓服务部门经济结构的各种区别，中间人的功能在社会劳动分工的日趋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大了，这种功能可以归因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从事贸易、运输、储藏、信贷、银行和保险的那些企业，这种功能只构成了服务部门的一个部分，社会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把这种功能看作是从事各种活动的一种大杂烩，从纯商品的生产者（煤气、水和电力生产）一直到包括纯寄生者和流氓无赖。
-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六章。
- [19] 关于作为实现困难的一种临时解决办法和作为通货膨胀主要来源之一的消费信贷的意义，参见本书第十三章。
- [20]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第一五七——一六一页。
- [21] 受雇于修理行业的那些人的较高收入来自两个主要来源：（1）这一领域劳动力商品的较高的价值，这种价值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比较长的学徒期，学徒期是取决于越来越高的应用复杂性；（2）这样一种事实：这一种劳动力价格可以保持在高于其价值水平一个长时期，因为有一种高得不相称的需求增长。突然使用数以百万计的电气器械，已经产生了对修理人员的需求，这种需求只能逐渐来满足，这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是由于需要一个很长的学徒期，也由于这一职业结构的呆滞作风。
- [22] 这种进一步专业化和半分工的典型例子是，全能电工被无线电和电视修理工所取代，全能管子工被暖气专门修理工所取代，以及诸如此类。但是，这里也可能会出现一种“集中”重新组织的新的“一致”劳动，比如说，就象在大宅院里“一般干杂活的人”的情况那样。
- [23]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考茨基已经分析了在农业方面工业化的萌芽。见《农业问题》，第四四二——四四三页。
- [24] 随着见像暗盒的兴起，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表现于教育部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为可能的了。
- [25] 开始生产直接影印机的大公司，接替了出版社，并且开始生产教育方面的资料。北美航空制造业（原文如此——著者）包括在纯饮用水的生产中。通用电气公司参加了一家叫做通用学习公司的创立，以便为生产“教育商品”作好准备。里斯科——波尔加芒 (Leasco-Pergamon)

正在计划成立一个庞大的资料库，以便出售“系统的科学情报”。

- 〔26〕 在这里，一种额外的商品生产来源可能会在晚期资本主义中出现，比如在集装箱的生产中就是如此。
- 〔27〕 虽然阿尔特维特尔的《社会生产与经济的合理性》（法兰克福，一九六九年）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各种问题的，它也包含有外部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有用的出发点和资本主义的直接费用的某些有用的出发点。
- 〔28〕 所以，灵一泰姆科—伏特联合大企业联合了一条航线、一个钢铁托拉斯、一家电子公司、一家银行、一家保险公司、一家体育用品企业和一家化学工厂……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真正的标志。但在其他联合大企业也是如此，服务企业（或传送企业）起着重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臭名昭著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中可以发现：国际交通仪器、汽车出租公司、饭店（舍拉顿）、消费信贷、退休金管理等等。甚至一家大的面包店也属于这一家联合大企业。西洛克斯——西蒂联合大企业是由生产和保持照像复制机、消费信贷、爱克斯放射仪器、办公家具和问候卡片等建立起来的。
- 〔29〕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四一九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二十一——二十二页）。也见同一著作的第二八二——二八七页，这一段我们在本书第五章中已经引用了。
- 〔30〕 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种事实：许多豪华食品个体贸易价格的陡增（这是由于分配和销售价格上涨造成的结果），人为地限制了工资劳动者的消费。充足供应只是在销路稳定商品方面才是绝对的。规定食物的最适宜条件在“富裕”国家无产阶级的营养中，当然是根本得不到保证。
- 〔31〕 明显的“青少年”市场的兴起、工人阶级青年在工人阶级家庭以外的越来越大的消费以及领取退休金的一代人与成年一代人的越来越脱离等等为这种情况提供了证据。现在没有必要来强调这种分散化（被忽视的儿童、寂寞的成年人、老年人时光虚耗）在心灵上所造成的严重损伤。
- 〔32〕 关于这一种现象在产业劳动后备军的数量和波动方面所造成的影响，见本书第五章。

- [33] 见瓦利·塞康伯(Wally Secombe)的有趣论文:《资本主义的家务工作》,载“新左派评论”,第八十三期,一九七三年一月——二月号。
- [34] 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例如杜马泽迪尔(D. Dumazedier)的《走向闲暇的文明》,巴黎,一九六二年,或弗拉斯德(J. Fourastie)的《四万个小时》,巴黎,一九六五年,肯定都强调了平均劳动生产力与扩大自由时间可能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他们典型地在分析上犯了两个错误:(1)他们想象一个与资本主义的特殊社会结构不相干的所谓“大规模消费动力学”,而且认为后者而不是前者是文娱领域中量的结构和质的结构方面的决定因素;(2)他们都不了解自由时间的社会行为主要是要靠各种生产关系;谴责异化劳动的那些群众,在他们的自由时间中,不会突然发挥其创造性的。
- [35] 见拉尔夫·纳德尔(Ralph Nader)出版或鼓励的那些已经很丰富的资料。
- [36] 见安德烈·高尔兹(André Gorz):《劳动分工批判》,巴黎,一九七三年,第二五八页。关于制药工业,美国的克弗维尔报告(Kefauver Report)估计,实际生产成本只占批发价格的32%。莱芬逊计算出实际生产成本为批发价格的39%,为零售价格的不到20%。《多国制药工业》,第二十九页。
- [37] 卡伊前引著作,第一六五——一六六页。
- [38]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四〇九——四一〇页。
- [39] 来源同上,第三二五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二分册,第一〇三——一〇四页)。
- [40]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六十七——六十八页。
- [4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四〇九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九——十页)。
- [4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五二八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一五二页)。
- [43] 马克思在他早期的著作里很明显地强调了消费与创造性活动之间的关系。他也明显地反对禁欲主义,见《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卷,第二六〇——二六一页;也见同一卷的第二五六——二五七页。
- [44] 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描述统治阶级的享受

- 为朝生暮死的个人，疯狂而无目的地打发时光的人，并且强调指出，那种奢侈的财富是与对人的轻视相关联的。见卡尔·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斯特鲁伊克（D.J. Struik）（编），伦敦，一九七〇年，第一五六页。
- 〔45〕 见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一八六页。
- 〔46〕 厄尔尼斯特·扎恩：《繁荣的社会学》，慕尼黑，一九六四年，第三十五——三十六、六十四——七十一、八十五页。
- 〔47〕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大纲》（草稿），第四二二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二十五页）。
- 〔48〕 见巴兰和斯威茨在《垄断资本》中有关这一问题的精彩的一段话。
- 〔49〕 约赛夫·吉尔曼：《下跌的利润率》。
- 〔50〕 垄断集团为取得剩余利润的倾向和相应的两种平均利润率形态——一个是非垄断化部门，一个是垄断化的部门——适应了大资本为了解除利润损失的需要，这种利润损失是由于非生产性资本在非垄断部门中增加了。
- 〔51〕 电影、电视广播以及通讯手段的生产，在资本主义中也是物质商品生产。如果这种生产是由工资劳动者进行的，那么，从资本主义意义来看，它也是生产性的，也就是能生产剩余价值。电视广播向数以百万计的观众“播送”，这不是一种商品生产，而是一种社会化的服务。因此，这并不产生额外的剩余价值。
- 〔52〕 皮叶·纳维尔第一个指出了通向工资劳动的普遍化的基本倾向，这种普遍化扎根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服务部门的扩大。
- 〔53〕 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第一六〇——一六一、四一〇页。
- 〔54〕 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第一七二——一七三、一八五页。
- 〔55〕 来源同上，第一五七、一六六、一八五——一八六、二〇〇页。
- 〔56〕 来源同上，第四一〇页：“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生产工人即生产资本的工人的特点，是他们的劳动物化在商品中，物化在物质财富中。”（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第一册，第四四二页）见第四〇六、四一一页上对比的段落。
- 〔57〕 来源同上，第二一八——二一九页。

- [58]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一二七页。
- [59] 来源同上，第一三一页（应为一三四页——译者）（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第二卷，第一二四页）。为了对比，参见有关资本主义非物质生产的章节，见《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一四四——一四六页。很明显，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二卷之前，对于为资本家操作的生产性工资劳动与非生产性工资劳动之间的界限划分，是颇犹豫的。
- [60]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第四一二——四一三页。
- [61]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一三九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第二卷，第一三〇页）。也见第一五二页关于“价值形式的变化”，马克思理解在生产过程之外，从商品到货币和从货币到商品的那种变形。
- [62] 来源同上，第一四一页（应为一四二页——译者。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第二卷，第一三三——一三四页）。
- [63] 来源同上，第一五三页（中译本同上，第一四五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64] 在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我们写道：“一般地讲，人们可以这样说：一切劳动，凡是创造、更改或保存使用价值或对使用价值的实现在技术上不可缺少者，均为生产性劳动，也就是说，它提高了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第一九一页。）这就是要在生产性劳动和在流通领域中所使用的劳动之间，作出区别，而经常注意到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这一定义完全符合于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下的定义，从上文所引的章节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只有一点除外：“提高了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应读作“增添了交换价值”，或更好一些是读作“增添价值”）。因此，阿尔特维特尔在宣称下面的意见时，是错误的：“曼德尔给生产性劳动所下的定义，根本不符合马克思的观念”，“甚至倒退到了亚当·斯密的复杂概念以前”，见阿尔特维特尔和胡伊斯肯前引著作第二四九页。他似乎并没有理解我们参考着马克思的意见正在试图回答的这个问题的性质：恰就是在生产性领域为一方面，流通和服务领域为另外一方面，这两方面之间的那条区分线。
- [65] 对这一问题最包罗宏富的研究，是雅克斯·纳格尔斯（Jacques Nagels）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演变中的集体性劳动和生产性劳动》，布

鲁塞尔，一九七四年。对个体资本家来说，一切工资劳动——甚至在流通和服务部门中的——显然都是生产性的，因为这种劳动使得他占有整个社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66〕 这就是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对“私人富裕”与“公共贫困”之间的两分法讨论的理性核心，但是，这个问题他不能够完全理解，因为他反对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

〔67〕 纳格尔斯前引著作的第二五六页中包括了对耐久消费品的修理商店，这种商店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那就是在经济中的生产性部门而不是在“服务性”或分配部门中雇用工资劳动者，因为，这种修理对这些商品使用价值的实现是不可缺少的。

## 第十三章

### 持久的通货膨胀

货币表明了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社会劳动潜力被分裂成了互相之间独立发挥作用的私人劳动，生产者只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的交换才发生了社会接触，而这些劳动产品采取的是商品形式，这些商品是有交换价值，而且，只有在这种交换价值以货币的形式独立地面对着这些商品的时候，普遍化了的商品生产才是可能的。<sup>〔1〕</sup>这样一来，货币既是商品生产者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的基础，又是这样一种事实的基础：这样一种社会特性只有通过商品交换、市场和对价值生产的私人占有这样一条迂回的道路，才能普遍流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就是：通过资本来占有剩余价值）。“由于这种代替，银行制度又指出了，货币事实上不过是劳动和它的产品的社会性质的一个特殊表现，但这个性质，和私有生产的基础相对立，结局总是要表现为一物，总是要在其他各种商品的旁边，表现为一种特别的商品”。<sup>〔2〕</sup>

商品生产劳动的社会特性并不是作为一种演绎资料给出来的，这个事实使得货币原料，换句话说使得体现在一种特殊商品中的价值之中的价值——一种普遍等价物，成为必不可的了。<sup>〔3〕</sup>马克思说明了为什么“劳动货币”不能够在商品生产社会中作为商品的普遍等价物来发挥作用，而这种“劳动货币”只能表明劳动时间（“价值”）的一个特殊数目。<sup>〔4〕</sup>正是由于马克思克服了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价值学说<sup>〔5〕</sup>与决定“货币价值”的数量理论之间的

传统的二元论观点——这种观点从李嘉图的学说中还是可以见到的——他才能够能够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种前后一贯的、统一的经济学理论。

任何一种企图想用“惯例”〔6〕、国家强制或者只是“商品价值反映”等等来把“货币价值”的这种决定作用归之于其他根源，而不是归之于货币商品的商品价值（黄金或者黄金和白银），都必然会导致尖锐的矛盾。这一点除了从其他例子之外，可以从鲁多尔夫·希法亭的例子中明显地看出来。希法亭在其所著《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中直接从商品生产总和（全部流通商品的价值总额）发展成了一种“社会必需流通价值”理论。〔7〕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8〕考茨基就曾经对这种货币理论的基本错误进行过分析，尽管他未曾把他的批评贯彻下去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来。〔9〕

希法亭从全部流通商品的价值的不调和的总额出发，他忽略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基础，那就是：“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别，即用生产产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商品和它所要交换的劳动时间底产品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需要第三种商品，作为表现各商品实在交换价值的尺度。因为价格不等于价值，所以决定价值的因素——劳动时间——不能是表现价格的因素；因为〔假使那样〕，劳动时间就要同时成为决定者和非决定者，既表现为等于其自身的东西又表现为不等于其自身的东西了。”〔10〕

这样一来，希法亭的公式：“所有商品价值总额”除以货币流通速度，在两个意义上是没有意义的：第一是因为“所有商品价值总额”代表了不同类的劳动量总额，这种劳动量总额只能用交换和种种特殊比例而被降低到社会必需劳动时间；第二是因为这样一种劳动量不能够被除以流通货币的速度：五百万个劳动小时被除以每年流通二十五次的金币或钞票，这是个毫无意义的

公式。

大家公认的是，如果“所有商品价值总额”被“所有商品价格总额”所取代的话<sup>[11]</sup>，如果都认为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货币形式）的话，那么，价格总额就可以被看作是商品的可变价值与货币商品也就是与货币物质的可变价值之间的一种关系。对于货币问题所作的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都必须从对这样一种关系的分析出发。<sup>[12]</sup>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符合于三种不同的发展规律的三种不同的货币形式，作出了区分：

1. 纯金属货币。由于纯金属货币——为了使我们的分析简单扼要，我们只将黄金货币作为金属货币——具有一种内在的价值（其中包含有社会必要劳动的量），所以，其流通量要取决于流通商品价值的动力和要实现的偿付能力。如果商品价值总额跌落了（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或由于生产的缩减），而黄金价值仍然保持不变，那么，黄金货币的流通就会减少，或者是，商品价格就会跌落，而且，黄金货币将会由于越来越多的囤积而被抽回。如果商品价值上涨了（由于生产的增长或生产的稳定或由于劳动生产力的下降），而黄金价值仍保持不变，那么，黄金货币的流通就会增加（囤积的黄金将会投入流通）。反之，如果由于金矿的劳动生产力突然增长而使黄金价格跌落，那么，如果商品价值总额不发生什么变化的话，其他商品的价格就将上涨。如果由于金矿的劳动生产力突然下降而使黄金价值上涨的话，那么，如果商品价值总额保持不变的话，价格就将下跌。<sup>[13]</sup>然而，这些例子都是少有的和介乎二者之间的。关键是取决于商品价格的流通货币总量（最终取决于所有商品价值总额与黄金价值之间的关系）除以黄金货币流通速度。其自动变量往往是流通和商品价值；黄金货币的涌入流通或涌出流通，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需要的一种功能。

2. 货币标志，也就是可兑换的纸币（或小的银币），这种纸币用来代替纯金货币以节约流通手段并扩大信用。应用于黄金货币的同样规律也应用于这种纸币，唯一的条件是这种标志不能够连续成批地发行。如果这个条件得到了尊重，那么，这种货币就“跟金币一模一样”，而且也象金币那样，可以随时从流通中抽回，此后再投入流通中去。但是，如果这种货币标志发行量大于相应的黄金量，那么，这种可兑换的纸币就会自动贬值。比如，一盎司黄金等于一吨钢铁，这相当于已知的劳动量；那么，如果一盎司黄金是由一百六十个德国马克来代表，而不是用八十一个德国马克来代表，而这又决不能改变黄金或钢铁的价值。但是，额外货币标志的发行意味着每十个德国马克的纸币这时代表着以前黄金量的一半。结果，其价值就降低了一半——换句话说，钢铁的价格（以纸币计）提高了一倍。〔14〕

3. 有强制交换率而不能兑换的纸币。总的说来，适用于可兑换纸币的同样规律，也适用于这种纸币，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由于商品价值和黄金价值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已不再是直接的关系了，那么，就只能在事后来确定这种纸币究竟在客观上代表多少黄金，而这将从这种纸币与黄金（在“自由”市场上或者在“黑”市上）和外币的交换率来表明。

因此，通货膨胀只在纸币的情况之下才是一种有意义的概念。〔15〕所谓“黄金膨胀”云者，同“钢铁膨胀”一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这里，正确的概念并不是膨胀，而是商品价值的跌落。不错，在一八四九年之后或者在一八九〇年之后（在德兰士瓦，对黄金生产氰化物处理方法的使用），贵重金属价值的突然大规模降低，正象在十六世纪时所发生过的那样，导致了价格的上涨，这种上涨与纸币的大规模膨胀相类似。但是，可以立刻看出有一种重要的差别。当黄金的价值在跌落时，它仍然可以窖藏；

相比之下，纸币在贬了值之后，仍然典型地保持流通，并且对窖藏的形成，它越来越变得无用。<sup>〔16〕</sup>因此，我们最多只能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把“膨胀”一词应用于金属货币，那就是在硬币的黄金含量降低了的时候，也就是说，在铸币时掺进了假的时候。但是，这种情况正好与这么个规律相符合，这就是硬币已不能再作窖藏而仍然以与格列沙姆(Gresham)的著名规律相一致的方式保持流通。因此，霍夫曼(Werner Hofmann)的意见是错误的，他声称，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垄断占优势的情况相吻合的生活费用日渐提高，标志着“长期通货膨胀”的开始。<sup>〔17〕</sup>那个时代物价的上涨，还可以用其他一些因素来作解释，其中尤其包括这么个因素：由于生产成本的降低，黄金的价值下跌了。<sup>〔18〕</sup>关于“长期通货膨胀”，我们可以说最早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而且，更准确地说来，只是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的经济大危机被克服之后。

在使用黄金货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纸币的通货膨胀是随着国家消费的过度增大而首先出现的，而国家消费的过度增大是由于战争和重整军备而引起的（当预算赤字开始由使用印刷机来弥补的时候）<sup>〔19〕</sup>。通货膨胀作为在商品生产和流通实际过程的结构内部扩大信贷活动的一种机制，既遭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抵制，也遭到了资本主义政治家的抵制，他们都认为它是不可靠的。<sup>〔20〕</sup>这种观点所持的理由是这样，即只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可以恢复正常的平衡，对这一过程的任何一种“人为的”干预企图，都终将给经济恢复造成危险，并且会增加危机的矛盾和原因。<sup>〔21〕</sup>

毫无疑问，对货币的这种“正统的”观念，也包含着一点真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除了其他作用之外，以一种特殊资本的大规模贬值的方式完成了促进资本总额增值的客观的功能

(尽管有较高的资本有机组成)。生产和虚构资本的这种贬值，并不是平稳地出现的，也不是与每一个个别企业的资本投资成比例的。那是一个选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上先进的企业能生存下来，而落后的、虚假的康采恩就都被彻底消灭了。有中等生产能力的一些工厂虽然逃脱了破产，但是它们所受的打击，比大工厂还更甚。这样一来，生产过剩的这种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种适当的机制，这种机制作为在决定商品价值的商品生产中的一种社会必需劳动时间，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还可以消灭以一阵破产浪潮而客观地浪费社会劳动力的那些公司，以便使已经发达了的再生产重新进行而不顾商品价值的减少。在繁荣和“热火”方面已经涨上去的价格，这时也都向商品价值降低方面调整，而剩余利润也就大部分被排除了。与此同时，生产过剩的这种危机，也是(象我们上文已注意到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周期性地以资本的贬值而使平均利润率重新增长，并且使剩余价值率提高。这反过来也允许在“大的”公司中加强劳动生产力，从而也就出现了个体资本的剩余利润。

如果膨胀的信贷和通货膨胀能够预防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卫生”的话——换句话说，如果能抢先在价格方面进行周期性投资，在市场价格方面向商品价值方面进行周期性的调整(即生产价格方面调整)——那么，已经降低到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以下的整个系列资本主义企业才可能在一个较长时期中避免它们的资本的贬值或破产。于是，要将“健康的”企业与患病的或完全虚伪的企业加以区分，就很困难了。<sup>[22]</sup>但是，这样一种形势只能使生产能力与货币有效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性最终得到增加。因此，它包含着一种延缓垮台的危险。<sup>[23]</sup>

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那次大经济危机的冲击、那次危机的范围和持续时间，不可避免地会导使占优势的经济方面的意识

形态进行修正。因为，现在资产阶级经济政策所优先考虑的问题已经有了改变。货币不稳定性的长期威胁，现在被认为比永久失业和生产停滞的短期危险和中期危险所造成的威胁为轻。从资本增值这一角度来看，这一变化无疑已经证实了。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资产阶级就以一种新的态度作出了一些重大的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其余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在战后的时期作了这种考虑。因为，各种社会势力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变化就意味着如果再发生大规模失业，在这时就等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灾难性的社会危机。

正是由于所有这些原故，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政府的最重要的那些集团，都一个接着一个地选择了永久性的、制度化了的通货膨胀，作为克服或预防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已经经历过的那种暴风雨般的经济危机。由凯恩斯开创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革命”，就是这种优先变化的一种意识形态方面有意识的表达。当时有许多声明可以用来说明，讨论帝国主义经济政策的有意识的转变，是很适宜的。<sup>[24]</sup>我们在这里只需引用这些声明中的一个，这一个声明是凯恩斯本人提出的：“除非在全世界范围内提高贷款费用，此外，并没有提高世界物价的有效手段。……因此，第一个步骤就是关于当局的积极性，而且，如果要想足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并且制止住这种迅速恶化的话，大概就必须大规模地进行、坚定地有组织地进行。……某些迄今还追随着这些论据的大儒学派的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除了进行一次战争之外，没有什么可以使之暴跌而告终。因为直到如今，战争一直是政府大规模贷款费用的唯一的目的。……我希望，我们的政府将会表明，这个国家甚至在和平任务方面也是生气勃勃的。”<sup>[25]</sup>

就技术而言，永久性通货膨胀是自十九世纪末尾以来随着银行票据的扩大而开始出现的。可兑换的纸币（黄金的标志）是在

上世纪作为保证流通信贷的一种手段而发行的。发行纸币的数量随着需要贴现的汇票的数量不同而大有区别，也就是说，它与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眼前需要是紧密相适应的。这样的纸币只能作为通过投机来扩大信贷的一种手段而产生出来：在这一方面采取主动的主要是商业资本。一旦在现金账目方面所允许的实际透支越来越变得扩大的时候，形势就变了。<sup>[26]</sup>现在，银行信贷的创造在商品的实际流通中变得更加不受束缚了；其主动性已从商业资本移向了生产领域中的大公司。这些大公司这时可以借助于它们那些往来账户的透支而为生产取得信贷，也就是说，它们可以通过银行票据而取得信贷。<sup>[27]</sup>这样一来，货币的数额就变成了一个倒转过来的金字塔，它有三个组成部分，而不是有两个组成部分：基础部分是黄金，在黄金之上是一层比较宽阔的纸币，在纸币之上依次又是一层更加宽阔的银行票据。

但是，只要主要的银行当局对货币总额的控制仍然要服从于以金本位为基础的财政正统性的规律，那么，生产货币方法的扩大就仍然是一种为了节约流通杂费而设计出来的纯技术问题。“凯恩斯式的革命”不仅仅是改变了形式，而且也改变了生产货币的内容。从此以后，银行票据或存款加上银行现金往来账目上的透支就变成了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

在最初，由于凯恩斯以及与凯恩斯有类似观点的德国其他货币理论家们的敦促，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转化方面采取了主动。赤字财政——换句话说就是利用预算方面的赤字来产生额外的“货币有效需求”——是这个国家采用的长期战略。作为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的公共消费，其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变得更为明显了。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那个新的“低调扩大的长波”中，国家的实际消费虽然仍是大量的，但在持久通货膨胀的动力方面，最终变得居于次要的地位。从此以后，通货膨胀

的主要根源就变成了在由银行拨给私人企业并由中央银行和政府担负的往来账目中透支的扩大——换句话说就是拨给资本主义公司的生产信贷和给普通家庭的消费信贷（尤其是为了购买房屋和持久的消费品）。这样说来，今天的持久通货膨胀就是信贷货币的持久通货膨胀或者就是创造货币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适合于晚期资本主义长期促进扩大再生产（实现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的另一手段）。

对于当代持久通货膨胀的根源和性质的这种说明，仍然遭到许多引用马克思主义的集团的抵制。他们顽固地拘泥于这样一种概念，即军事费用仍然是通货膨胀唯一的或者至少说是主要的根源。可是，数字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只需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美国经济中下列一系列不同的总计数字加以比较，就足够了：〔28〕

年份	A	B	C	B占A 的%	C占A 的%
	国民生产总 值（十亿美元）	公债	私债		
1946	208.5	269.4	153.1	129.4	73.6
1950	284.8	239.4	276.8	84.0	97.2
1955	398.0	269.8	392.2	67.8	98.5
1960	503.7	301.0	566.1	59.7	112.4
1965	684.9	367.6	870.4	53.7	127.1
1969	932.1	380.0	1,247.3	40.8	133.8
1973	1,294.9	600.0	1,700.0	46.3	131.2
1974	1,395.0	700.0	2,000.0	50.0	140.0

为了说得更清楚一些，只要再讲一下这么一点就够了：美国在一九二五年与一九四五年间的私债总额，几乎是保持稳定的

(一九二五年是一三一二亿美元，一九四五年是一三九七亿美元)；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这个数字才大大地扩大。在西德，纸币的流通从一九五五年的一百四十亿德国马克增长到一九七三年的四百七十五亿德国马克，但是，银行向国内公司和私人的贷款额，在这同一时期，则是从六百三十亿到六百三十一亿德国马克。在日本，纸币的流通从一九五〇年的四二二〇亿日元增长到一九七〇年的五五五六〇亿日元，但是，银行贷款的增长则是从一九五二年的两万五千亿日元到一九七〇年的三十九万五千亿日元。比利时是一个相对而言军事负担较少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情况也值得一谈。在一九六二——一九七一年期间，银行对公共企业的贷款高达两千一百亿比利时法郎，也就是说，几乎增长了一倍，但是，银行向私人经济的贷款，则为从七百二十亿比利时法郎增至三千四百亿比利时法郎，也就是几乎增长了五倍。可是就在这同一时期内，国民生产总值以稳定价格计，提高了约55%。那么，这一信贷的通货膨胀性质是很明显的。

在显然是生产过剩的时候——工商业衰退——与传统的类型相对比的话，价格已经停止下跌，并且实际上甚至还在继续上涨，在这个时候，当代的人就开始越来越意识到了持久通货膨胀这一现象。当然，那次大危机已经导致了物价的一落千丈，其程度是以往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各次危机闻所未闻的。一九三八年的那次危机，也类似地导致了物价的暴跌。

在一九四〇——一九四六年间普遍的物价上涨之后，一种矛盾的发展开始了：与所期望的各种情况相反，在战后年代的初期，物价是直线上升，只有美国除外，在美国，在一九四九年的工商业衰退中，物价是下跌了——尽管只是微微下跌。于是，“朝鲜战争的繁荣”给予物价以一种新的推动。在美国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的工商业衰退，每一次都伴随着零售价

格的进一步提高的时候(在一九五三年,批发价格再一次略微降低了一点),“持久通货膨胀”的影响就变得明显了。在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的工商业衰退中,物价的持续提高特别明显,到一九七四年的工商业衰退时,物价的提高甚至还更明显。

这样就产生了用来描述“缓慢的通货膨胀”的一整套新的术语,这反映了一种推迟了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晚期资本主义事实上已经在持久通货膨胀的条件下生活了三十多年。早在一九五八年,加尔布雷思就已经指出过:“由于被眼前的态度和目标所迫,我们不得不设法在一种生产力的情况下来操纵经济,我们知道,在这种生产力情况下,通货膨胀决不能被看作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而必须被看作是一种正常的前景。”〔29〕

怎样来证明信贷的扩大或信贷票据(银行票据)的扩大,具有一种通货膨胀的效果呢?这种通货膨胀又怎样来衡量呢?乍一看,回答这种问题似乎很简单:用商品价格的的增长就行。但是,这种简单化回答有跌入希法亭循环推理之坑的危险。既然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那么,货币膨胀就不能自动地从增长的价格来推断。商品价格往往表明两种商品价值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两种商品价值就是某种特殊商品和黄金。我们必须把这一种关系的双方互相之间的关系和发展,作为我们分析的基础。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也应当牢记在心,这个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凯恩斯学派正确地指出来了。作为货币有效需求的购买力的货币,不应该只是与现有商品生产的流动相对比;因为它也有一种活动的效果——换句话说,它本身就可以恢复一定数量商品的流动性。〔30〕这一功能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银行体系或中心银行体系被用来产生额外的交换手段而大批未销售商品仍然留在手边,那么,这种额外货币额的效果就会提高价格而不一定需要通货膨胀。〔31〕因为,它不只是协助现有商品生产的交换,

而且也能促成到期偿付的结算，这样，它就能使原来因为销售不掉而退出流通的那些商品，再投入流通。凯恩斯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已经发展了这样一种总的论点：额外流通或支付手段的创造，如果所有的“生产因素”都能充分利用的话，就只有通货膨胀的效果。<sup>[32]</sup>

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有大量的未销售货物和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的话，同时，如果生产体系在全速运转的话，那么，额外数量的纸币和银行票据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凯恩斯学派的论点只是部分地正确。其基本缺点在于它没有能充分地对合计数字区别应用，也在于它相信自动的、不调和的反应。在工商业衰退和危机时期增加货币数量，会提高消费品的销售量（尽管即使这样，也不一定是按照一种特殊固定的比例），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也有人盼望市场能够长期的扩大，而且利润率能够提高，那么就只会导致生产投资的增长（尤其是资本家在工商业衰退的开始阶段认为它过底的话）。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或者没有达到企业家所追求的程度，那么，私人投资也就不会发生或者达不到所期望的数量。<sup>[33]</sup>因此，各种形式的国家消费、预算赤字以及税收减免等等的收益增殖效果，在不同的联合中有很大的区别。生产性投资——也就是导致生产价值提高的那些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相比，其收益增殖效果要高得多。在某些情况之下，实际上只是代表呆滞资本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变的那些经济交易的收益增殖效果——例如，为了使变卖财物而出售证券以便购买空地以进行投机或出售空地以购买证券——即使有的话，也非常小，对于经济上的成交总额只有微小的增长。因此，有必要使三种趋向互相关联起来，以便更加确实地来说明信贷扩大的通货膨胀效果：

1. 与资本主义世界商品生产的发展相对比，黄金工业中劳动

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和用黄金所表示的商品价格的长期发展趋势；

2. 与生产总值相对比（也就是生产额乘以平均商品价值），货币量的发展，注意到了货币流通的速率；

3. 原料和农产品的价格、工业成品的价格、国外市场上的价格以及世界市场上的出口价格等等，价格发展的种种结构问题，也就是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各种发展。

后者将会告诉我们，信贷货币通货膨胀是晚期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特殊需要的产物呢，还是只是资本增值和实现剩余价值的一般困难。这一点很可以在这里作个预言：从货币和价值理论这一观点来看，“成本促成通货膨胀”这一命题，无法得到证明。<sup>[34]</sup>只有当有一种流动性的剩余价值的时候，各公司才能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自动地将成本的增长转移给销售价格，也就是转移给了消费者。<sup>[35]</sup>在对比之下，如果在工资提高时货币数量保持不变，或者只是根据生产的增长来进行调整，那么，在某些国家，即使没有竞争，提高了的成本也不能导致价格的上涨。马克思有这样一条原理：在一定的商品产量和商品价值的情况下，工资的增长只会缩减利润而不能提高价格。马克思的这一原理在通货稳定的条件下是绝对正确的。<sup>[36]</sup>“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这一论点之后面潜伏的是什么，这不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对工资提高的客观效果的分析问题，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公司的货币量是有保证的，这种货币量是转变已经增长了的生产所必然需要的，对这种情况的观察，由于银行票据的关系，对消费者说来还是值得的。<sup>[37]</sup>这就意味着，那并不是一种“过度的”工资需求，而是银行制度和货币的创造对于垄断资本的利益的特殊的一种适应，这种垄断资本构成了价格增长的技术原因。持久通货膨胀是晚期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种机制，这一机制是为了在相对迅速的

资本积累和相对高水平的就业的一些关键条件下，用以制止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迅速下降的。<sup>[38]</sup>

在黄金工业中，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只能间接地加以计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南非洲金矿中“劳动费用”要占“开矿费用”（生产费用）的85%左右。这些数字与马克思的可变资本与生产费用的范畴并不相符合，因为，毫无疑问，“劳动费用”范畴掩盖了一部分剩余价值，掩盖的形式是白人监工和经理的高额薪金。比如在一九〇七年，这些金矿中的白人职员17,697名得到的薪金总额是594万英镑，而165,000名有色劳动者所得的工资总额则只有980万英镑的货币和以货代款，以作为他们出卖劳动力的价格。黄金生产大约达到了纯金234,000公斤。工作年（全部人力每年投入劳动量总额）的数目大约为183,000。在一九四〇年，工作年数字曾达到400,000，而纯金产量也曾达到400,000公斤。这样，与一九〇七年相对比的话，纯金每公斤所投入的活的劳动力略有增长。现有情报不能说明投入的死的劳动力（不变资本），但肯定死的劳动力也增长了。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黄金生产的平均劳动生产力充其量是停滞的，最可能的是略有减低。<sup>[39]</sup>

在一九六七年，同样的400,000个劳动单位所生产的比一九四〇年的多了两倍以上；达到了950,000公斤的纯金。与此同时，生产每一吨的费用总额提高到了8.36美元（贬值的美元），而在一九〇七年每吨矿砂则为6.14美元，一九四〇年则为5.15美元。<sup>[40]</sup>在一九七三年，相应数字是：400,000名工人和监工生产出黄金852,000公斤，每吨矿砂生产费用为14.7美元（一九七三年贬了值的美元），这个美元数大致相当于一九四〇年4.05美元的美元价值。由于每周工作小时数也有所减少，切合实际的估计应该是这样：在一九〇七年与一九六七年之间，每克黄金的价值

减了一半；由于一九七三年工作周进一步缩短了，可以认为，这种价值仍然为一九〇七年的价值的一半左右。在南非生产的黄金价值的减低50%，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可以追溯到奥兰治自由邦 (Orange Free State)、克鲁格斯多普 (Klerksdorp)、艾温德尔 (Ewander) 和法威斯特兰德 (Farwestrand) 等地的最贫矿的关闭和新的、富矿的开发，这使得南非金矿每吨矿砂产金量从一九五五年的6.67克增长到一九六五年的10.78克。除此之外，某些技术上的重大改进，也引进了金矿开采方面。〔41〕

一九六七年以来，在自由市场上“黄金价格”的暴涨（也就是美元和其他通货的暴跌），已经使南非金矿发生了一些重大的结构方面的变化。产量较小的一些金矿都恢复了开采，或者已经提高了产量。最富金矿的产量都缩减了。矿砂中的含金量已经降到了10.11克，而且还要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每吨矿砂的纯收入已经从一九七〇年的3.9兰特，提高到一九七二年头九个月的20.7兰特（在一九七四年秋，一个兰特值1.4~1.5美元）。南非矿工的工资已经提高得超过了不足温饱的水平，这是由于工资低微所造成的长期缺乏劳动力的结果（在一九七四年，矿工中只有22.5%是在南非联邦国内征募来的；矿中其余劳动力都是外国侨民）。每一轮班的工资从一九七〇年的0.3兰特增长到一九七四年底的1.6兰特。可是在这同时，劳动生产力现在正在开始提高，因为自动化在较大规模地引进；在几年之内，矿山所有主希望只以现有劳动力的一半生产出比现在更多的黄金。总而言之，一克黄金的价值现在正在开始向下跌，正象所有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那样。〔42〕

在一九〇七——一九六七年这同一期间帝国主义商品生产总额中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计算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在美国的制造工业方面，工作时数在一九〇七年与一九六七年之间增加了

71%；对比之下，生产指数的增长是900%以上（从指数80增至738）。这就意味着劳动力提高了520%。在农业方面，在一九〇七年与一九六七年之间，工作时数大约降低了三分之二（从指数95降到32），而生产则增长了77%。<sup>[43]</sup>因此，在这六十年中，农业方面劳动生产力增长了540%，与工业方面增长的百分数几乎相同。

在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中，一九〇七——一九一四年期间劳动生产力的增长，与美国的相等，而一九一四——一九四〇年期间的增长，就比美国的小得多，但是在一九四七——一九六七年期间的增长，又比美国大得多。<sup>[44]</sup>因此，在美国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与帝国主义世界商品生产总额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之间，不应当有什么主要的差别。这就意味着，各帝国主义国家生产出来的平均商品价值，在今天要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五至六倍。假定有这样事实：黄金价值自那时以来已降低了约50%，那么，商品的黄金价格平均应该比一九〇七年的低三倍。<sup>[45]</sup>可是事实上，用纸币所表示的商品价格却比一九〇七年的高了三倍。这样，货币的这种九倍贬值完成了一种明确的客观功能：掩盖了用黄金量表示的商品价值的实际降低，因为，商品价格的迅速而又完整的跌落，最终会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在缺乏地理方面扩张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不能够发挥作用。<sup>[46]</sup>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瓦尔加（Varga）、鲍威尔和考茨基之间造成了一个有趣的讨论，这个问题就是：黄金本身的生产的增长是否产生商品的（黄金）价格的提高？<sup>[47]</sup>在我们看来，就严格应用劳动价值学说这一观点而论，这次辩论双方所提出的论据，都是虚假的。瓦尔加的论点是中心银行可以用固定“黄金价格”的办法阻止黄金生产提高价格，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考茨基和鲍威尔都令人信服地反驳

了这种论点。<sup>[48]</sup>考茨基则坚持黄金的特殊性，其目的是要说明，黄金生产的提高，代表着一种额外的全面需求——换句话说，代表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市场的一种扩大。黄金生产是一种“万能等价物”的生产，这种等价物作为一种个别商品，不但具有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为珠宝商以及其他的人），而且另外还具有一种很特殊的使用价值，即可以交换一切商品。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黄金决不会变成“卖不掉的”商品。这是正确而勿需进一步论证的。但是，考茨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黄金生产额的增加只能导致货币资本的增加<sup>[49]</sup>，而且，黄金的特殊性质恰恰就在于它并不需要投入流通而也能以一种珠宝的形式而被储藏。所以，不能够自动确定——正象考茨基所假定的那样——黄金的年产量将会随着其本身的价值来提高商品的需求总量。这要由额外的黄金数量是否与流通相结合来定，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特定联合中，看它与商品生产量、货币的流通速度、信贷的数量（偿付除了交换功能之外还要遇上这种货币）等等的结合情况来确定。

在一九二九年与一九三九年期间，黄金生产几乎增加了一倍，而资本主义世界的需求总额并没有明显的增长。额外的黄金流入了美国的现金储备而被储存起来了。只有黄金价值的一种降低才导致了用黄金表示的商品价格的增加。在从一八九三——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的“黄金时代”生活费用的提高中，起了主要作用的恰恰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黄金价值的降低，而不是黄金产量的增加。

从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结尾的这个期间，流通和支付手段（货币总量）的发展，是可以准确地看出来的（此后我们将只讨论美国的经济，因为美国经济是晚期资本主义中最典型的一个部分）。根据著名的弗利德曼——什瓦茨

(Friedman, Miltoni, Schwartz; Anna Jacobson) 系列,<sup>[50]</sup>货币量(不包括长期的银行往来账目)从一九一五年的指数100增加到一九二九年的指数215,也就是增加了115%。在这同一时期,工业生产增长了70%,而农业生产则稳定不变。根据弗利德曼和什瓦茨的看法,在这一时期,货币流通速度也略微有所加快。但是,在从一九二九年之后的危机期间,后者降低了30%以上,而黄金量则再一次增加了25%。<sup>[51]</sup>我们发现,与这些数字相应的情况是,批发价格水平一九三九年只比一九一五年高10%(零售价格水平往往表明反映黄金价格的某种时间滞差,而零售价格水平是一九三九年高于一九一六年10%)。当然,如果流通纸币在二十四年中只是大约丧失其购买力的10%(还不到每年的0.4%),那么,人们几乎说不出什么长期的通货膨胀。

如果我们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发展情况与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三九年的发展情况加以对比的话,那么,情况就会彻底改变。在一九四五年与一九六七年期间,货币量增加了大约90%;<sup>[52]</sup>到一九六七年,货币量高于一九二九年的七倍,高于一九〇七年的九倍。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间,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了一倍,再一次达到了一九二九年的节奏。可是,一九六七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只等于一九二九年的四倍,而农业生产大约只提高了45%。在这里,与商品生产的任何成比例增长都不相应的一种膨胀货币量的存在,是准确无误的。因此,一九六七年的平均价格水平等于一九二九年的两倍,等于一九〇七年的三倍。因此,货币量的增长,也就是纸币和银行票据的增长,就是美元膨胀的毫不含糊的、直接的技术原因。货币量的增长比物质生产量的增长要快得多——向相反的方向运动,达到商品总额的价值(黄金价格)的暴跌。

对各种价格系列的不同的动力作最终的对比,将会使我们能

够洞察晚期资本主义持久通货膨胀的具体机制。在一九六七年，在美国的批发价格指数为 106.2，而一九二九年则只有 52.1，一九四五年则为 57.9；一九六七年的零售（消费价格）价格指数是 115.4，而一九二九年则为 59.7，一九四五年为 62.7。一九七三年的相应指数为 142.3 和 152.9。这样看来，两个系列似乎有一种大致平行的发展。可是，如果将下列事实加以考虑的话，这种明显的对应就会发生变化：

1. 在一九五八年与一九六四年间，美国的批发价格几乎是稳定的（一九五八年的指数为 100.4，一九六四年为 100.5）。即使是在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四年间，也只不过增长了 3.5%，也就是还不到每年的 0.5%。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六年间，批发价格的稳定性也是绝对的。在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四年的整个期间，美国批发价格指数只在一个年头增长了，就是那个“繁荣”年头，一九五六年。

2. 相比之下，在这同一时期，消费品价格则在不可阻止地上涨。只是在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间，这种上涨不太明显。在其他所有年份中，每年的增长都超过了 1%。在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四年的整个期间，零售价格上涨了 17.6 点，而批发价格则只增加了 3.8 点。

3. 在一九六七年，农场直接供应的食物的批发价格指数以及化学制品和橡胶制品的批发价格指数，都低于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的。纺织品、纸制品、家具和家庭电器用具等在这十年期间的批发价格，或是显示出一种低于平均水平的增长，或是保持不变。对比之下，机器、金属制品和木材等，其批发价格则涨过了平均水平。

4. 从一九六八年开始，批发价格的所有主要方面都发生了不可阻拦的上涨，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变成了累积的而且加速了。

但是，甚至在那一年之后，个别批发价格还有所波动。比如，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木料价格有大幅度的下降，家庭电器设备的价格也略有降低。家庭电器设备的商品的批发价格，在一九七〇年低于一九五〇年水平的30%，低于一九六〇年水平的25%。

类似的情景也出现在消费品方面。在一九五七——一九六七年期间，食品、纺织品、家具和家庭用的电器用具等的零售价格，其上涨要低于平均生活费用指数（尽管大大高于这一分支的批发价格）。相对之下，服务费用（尤其是卫生和娱乐费用，也包括所谓“固定的”物品），其上涨则高于平均水平。

如果把在这同一时期原料价格在世界市场上降低的实际不可阻拦的趋势——这种趋势只在一九七三年才颠倒过来——进一步加之于这些系列的话，那么，货币贬值的结构就会成为如下状况：

1. 从一种黄金通货到一种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能向垄断资本保证满足它创造银行票据所需的货币量——的过渡，可以使得大的资本主义公司能够在相对的市场控制（垄断竞争、价格控制）的条件下，提高它们在繁荣时期逐步销售的商品的价格，并且在衰退时期能使商品价格保持稳定。<sup>[53]</sup>假如伴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而劳动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这就意味着它们的利润差额的扩大（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这就会导致“被支配的价格”和一种相当高的自筹资金率。<sup>[54]</sup>构成这种“被支配的价格”的那种政策，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对市场波动的先发控制，也就是在大公司本身（相对于它们的理论家）认为不可避免的那些衰退期间制订出方案来。因此，米恩斯（Means Gardiner O.）已经作了这样的计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钢铁公司所介绍的超过平均价格增长，把“打破平衡点”（也就是通过赢利关所必需的能力的最低限

度的应用) 压低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一九六〇年的下半年, 由于工商业衰退的结果, 这家公司只应用了其能力的 47% (!) 而所获取的纯利润与它在一九五三年的繁荣时期其能力的 98% 都在应用时所获取纯利润几乎一样。〔55〕

2. 使用价值量的明显增长——这种增长甚至比作为它的基础的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还要更快一些——对晚期资本主义利润的实现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在销售费用和消费信贷的直线上升方面都有所表现。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 既然在零售贸易的领域中并没有意义重大的外国竞争, 那么, 这些流通费用的明显增长(往往使货币量有相应的增加), 都可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下面是国内市场的消费价格与出口价格的发展的一个比较

(以一九七〇年的指数为 100), 这个比较也说明哪一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已经成功地在世界市场上使它们的出口份额增加了:〔56〕

	消费价格		出口价格	
	1969	1973	1969	1973
美国	94	123	95	124
西德	93	119	98	104
日本	93	124	95	107
联合王国	94	128	94	125
法国	95	120	91	118
意大利	95	123	95	108 (1972)
比利时	96	118	95	99 (1972)
荷兰	96	126	96	107

3. 更高程度的垄断将会在边沿方面允许更大的价格增高。在批发价格这一领域中, 第 I 大部类的这些增高将会高于第 II 大部类的。相反的是: 劳动生产力的相对增长(商品价值及其黄金价格的下跌), 将会相应地限制价格上涨的范围。因此, 在这样一

些部门，这些部门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开始以来就以生产力的特殊快速增长而著称(农业、化学工业和电器应用工业)，其价格的增长要低于这样一些部门，这些部门的机械化程度较低(建筑业和服务业)。<sup>[57]</sup>但是，在劳动生产力增长率高于平均水平的那些部门中价格的相对稳定，其本身所表明的持久的通货膨胀，与价格上涨较快的那些部门——这些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是比较缓慢的——所表明的是一样的。

所以，很明显的是，持久的通货膨胀决不能使价值规律无效。在现在，这一规律只是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发生作用，在这种特殊条件下，纸币的价值(购买力)脱离了它的黄金基础而经常在缩减。既然持久的“缓慢通货膨胀”不能一变而为“快速的通货膨胀”，那么，加重了的结构方面的生产过剩就完全可能导致某些部门的价格下跌；甚至将来批发价格的总的下跌的可能性，也不能被排除。在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间原料的迅速增长——这在那个时期通货膨胀的加速中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也由于世界的工商业衰退而被这些价格的相当的降低所接替。<sup>[58]</sup>

在这里出现了两个相关的问题需要作出回答。服务部门的臃肿(此外还有不直接创造价值的所有活动的臃肿，也就是国家机器以及流通领域的臃肿)是不是持久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呢？在我们对持久通货膨胀所作的说明与弗利德曼或鲁厄夫(Rueff Jacques)那传统的数量理论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对于服务部门(或一切非生产性的费用)的通货膨胀影响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可以求助于一种算术的例子。我们假设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每年的价值生产为如下的结构：

$$I: 10,000C + 5,000V + 5,000S = 20,000 \quad \text{生产手段}$$

$$II: 5,000C + 3,000V + 3,000S = 11,000 \quad \text{消费手段}$$

在第 I 大部类创造出来的 5,000 个剩余价值单位中，3,750 个

作了积累，1,250个被非生产性地消费掉了。在第Ⅱ大部类中，3,000个剩余价值单位中，有2,250个单位作为积累了。因此，在生产总额为11,000个单位的消费手段中，10,000个被当即消费掉了（8,000个是工人消费掉的，2,000个是资本家及其随员们消费掉的），1,000个被留作下一年度扩大再生产之用（为了雇用额外的劳动力）。可以用作不变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的有5,000个单位的生产手段。

现在让我们假设，除了这两个部门之外，还有第三个部门——即服务部门——这一部门已出现并已进行服务总价格为3,600个价值单位。假设服务部门并不购买任何机器和建筑物等等（这种假设只是为了简化计算，它很容易由于服务与第Ⅰ大部类商品之间的交换而不适用），那么，这个体系就可维持平衡——换句话说，没有什么能够打乱已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与为了实现这种价值而从生产中出现的购买力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2,700个单位的消费者购买力被用来购买这些服务项目而不是购买消费品，如果900个单位的服务项目在受雇于服务部门的那些人中进行交换，如果从而变得方便的那些消费品被雇佣于服务部门的那些人所购买并用来生产他们的劳动力。

现在，供和求之间的平衡，如下式：

供	求
20,000 生产手段	10,000 替换 C I 5,000 替换 C I 3,125 扩大再生产 C I 1,875 扩大再生产 C I

11,000 消费手段	3,750	工人 部类 I
	2,250	工人 部类 II
	812.5	资本家 部类 I
	487.5	资本家 部类 II
	625	扩大再生产储备部类 I
	375	扩大再生产储备部类 II (59)
	2,700	服务部门雇员
	3,600 服务项目	1,250
	750	工人 部类 II
	437.5	资本家 部类 I
	262.5	资本家 部类 II
	900	服务项目, 在本部门中交换

这个假设是这样：工人花费他们实际工资的 25%，资本家将其剩余价值的 35% 非生产性地花掉，用于服务项目而不是消费品，而从事于服务部门的那些人也同样在服务项目中花费他们的实际工资的 25%。那么，这一平衡条件在经济中意味着什么呢？它说明这样一种情况：只要这一部门雇员的购买力恰恰相等于生产工人的购买力加上为交换服务项目而不是交换商品而非生产性地花掉的剩余价值，那么，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实际服务部门就不一定是通货膨胀性的。如果这一等式的第二部分被描绘成“消费收入”，这种消费收入是从商品生产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如果我们预先假定服务部门中雇员的每人平均收入与受雇于生产中的那些人的收入相等的话，我们就获得下面一个公式，这个公式虽很简单，但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却是很重要的。这一体系可以与加强了的服务部门保持平衡——那就是避免持久的通货膨胀——如果服务项目在消费方面的份额等于劳动人口中服务部门雇员的份额的话。更切合实际地说，这个等式的第二部分必须乘以一个系数，这个系数表明了服务部门平均收入与生产领域的平均收入之间的关系。

“服务部门的生产力”这一概念可以通过这一弯路来加以分析（当然，对劳动价值学说的严格应用，避免不加引号地对这样一种概念的任何使用，因为，正象我们在第十二章中所表明的那样，就真正的意义而言，服务部门与流通领域相比的话，并不更具有“生产性”，也就是说，并不是更能创造价值和生产剩余价值）。〔60〕如果这一等式因为服务部门的臃肿而无效，如果在整个劳动人口中，这一部门的雇员的份额乘以收入系数 1.1 而大约达到 50 个单位，而服务项目的消费份额只有 40 个单位，那么，服务部类中就会留下过量的收入，这种过量收入要么导致消费品市场的提高（如果它只是花费在这些商品上的话），要么对整个经济发生一种通货膨胀的效果，因为，这一收入中的一部分也试图购买生产手段。在这样一些特殊的条件下，服务部门的臃肿因而就产生了通货膨胀的效果。〔61〕这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规律的一个特殊的例子而已，即，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任何部门的不平衡都会产生通货膨胀的效果，如果货币数量的增长缓慢下来或者束缚了特殊部门经济资源（耗尽的劳动量）的迅速调整为货币有效需求的其他的类型。〔62〕

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持久的通货膨胀，我们所作的说明与货币数量理论这种当代的说法，是否完全一样或者相类似呢？不可否认的是，确有某些相类似之处；但是，这种相类之处在用之于纸币方面的时候，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中已经有了。〔6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写道：“因此，纸票的量决定于它们在流通中所代表的金货币的量，而因为它们只有代表金货币才成为价值符号，所以它们的价值只是决定于它们的量。可见，流通的金量，决定于商品价格，相反，流通的纸票的价值则完全决定于它自身的量。国家发行强制通用的纸币（我们这里讲的只是这种纸币），这种干预，似乎废除了经济规律。过去国家规

定造币局价格只是给金的一定重量起一个教名，而制造铸币，只是把自己的印记加在金上，现在国家似乎用自己的印记的魔术点纸成金。因为纸票有强制通用的效力，所以谁也不能阻止国家任意把大量纸票硬塞到流通中去，并在它们上面印上任意的铸币名称，如一镑，五镑，二十镑。纸币一进入流通，就不可能再抛出来，因为不仅国境界碑阻止它们流出，而且它们在流通之外，便失去一切价值，不论是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它们离开自己的职能存在，就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可是，国家的这种权力纯粹是假象。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结束。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的支配。如果1,400万镑是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的数额，而国家把21,000万张名义为一镑的纸票投入流通，那末这21,000万张纸票就变为1,400万镑金的代表。这就好比国家用镑票来代表其价值只等于金的1/15的另一种金属，或者用镑票来代表其重量只等于从前1/15的金。除了价格标准的名称改变外，什么也没有改变，而这种名称自然是约定俗成的，无论它直接地由于铸币含金量改变而产生，或间接地由于按照新的，较低的价格标准所需要的量增发纸票而产生。既然现在‘镑’的名称是指只相当于以前的1/15的金量，一切商品的价格就会增加到以前的十五倍。”

马克思应用于纸币方面的货币理论与古典的或现代的货币数量理论之间的基本差别，<sup>[64]</sup>就在这样一点上：虽然马克思把某种程度的自治归之于流通领域，但是在他看来，基本的数量还在于生产领域，或者在于由价值规律所确定的支付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客观需要，而且，货币数量的任何增加，只要与这个数量作一对比，就能确定货币单位价值的损失。

这有两层重要的含意。第一，货币的社会需要量并不是固定

不变的，而是在工业周期中上下波动的。流通失调的时候与流通活跃的时候相比，前者所需货币量要大得多，因为立刻应支付的款项增加了。在这样的时刻，即使所需货币量有一个相当大的增长，也未必就会导致价格的上涨。<sup>[65]</sup>第二，商业周期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生产资本的活动，也就是所期望的实际利润率，而不是货币的数量。这就意味着，在工商业衰退或不景气的时候，即使有额外的货币量，也不能自动地刺激生产、就业、尤其是投资，就象弗利德曼及其学派在一九七一年上半年他们的（以及美国资本的）费用中所发现的那样，那时候，尽管货币量增长了6%，而生产和就业仍然是停滞的。<sup>[66]</sup>同样的现象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在英国也发生了，那时希思（Edward Heath）政府的对私人企业信贷限制的取消，根本没有导致生产性投资的增长。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中旬，对制造工业的银行信贷总额与一九七〇年的平均水平一样——这个数字也考虑进了价格方面的膨胀，它等于“实际信贷”（这一总额的购买力）的意义重大的降低。这些例证清楚地表明，认为银行允许信贷货币扩大的能力是持久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错误的。主要动力来自大公司，来自大公司利用信贷货币扩大的能力，以便随时准备取得适合于它们那些积累和实现的规划的货币量。这样，晚期资本主义的持久通货膨胀在掩盖商品价值降低、便于资本积累、隐蔽剩余价值率的增高以及以其信贷的扩大以暂时解决其实现困难等方面的作用，最终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限制。于是，缓慢通货膨胀就停止发挥作用或者转换成快速通货膨胀。在下一章我们讨论晚期资本主义工业循环的特殊形式时，将分析这些限制。

## 注 释

-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一四〇——一四一、一四三——一四四、一六五页。
-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五九三页（应为第六〇七页——译者）（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七一一——七一二页）。
- 〔3〕 马克思：“各个人底产品和活动必须首先转化为交换价值形态、转化为货币，然后他们才能在这种实物形态下取得并证明他们的社会权力。这种必然性本身证明两件事情：（1）个人现在只能为社会而生产，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产；（2）个人底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生产，不是在其成员间彼此分工的那个社团所进行的生产。”《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五十八页（应为第一五八页——译者），（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一分册，第九十五页）。也见《资本论》第三卷，第五〇三——五〇四页。
- 〔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一三六——一四〇、一五三——一五六页。《政治经济学批判》，第八十三——八十六页。
- 〔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七一——一七九页。
- 〔6〕 马克思：“正象国家那样，货币也不是通过契约而产生的。它产生于交换之中，而且是在交换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它是交换底产物”。《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一六五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一分册，第一〇四页）。
- 〔7〕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二十九——三十页。
- 〔8〕 列宁对希法亭的货币理论，只用了一个简单的词作为裁决：“不对”。《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第三三四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第三七〇页）。
- 〔9〕 卡尔·考茨基：《黄金、纸和商品》，载“新时代”，卷 31/31，第二十四期，第八三七页。对于希法亭货币理论其他的中肯的批评，见苏赞尼·戴布隆霍夫（Suzanne de Brunhoff），《货币的贡献》，巴黎，一九七一年，第八十三页。可是，这部书没有提到马克思关于货币理论的主要因素，不比考茨基提得多。

- 〔1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一三九——一四〇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一分册，第七十一——七十二页）。马克思在最末一句之下划了线。
- 〔11〕 马克思从他对货币下的一般定义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商品只有在已经有了理想的价格的时候，才能进入流通：《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一九三页。希法亭没有理解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对抗关系，这一点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批判过了，他的错误与这一点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导使他提出了一个万能卡特尔的<sup>1</sup>错误假设，这种卡特尔的成比例的生产将使之能避免发生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布哈林也跟着他走这个方向。
- 〔12〕 “金要充当价值尺度，就必须是一个潜在可变的价值，因为它只有作为劳动时间的化身才能变成其他商品的等价物，而同一劳动时间又随着实在劳动的生产力的变动而实现在同一些使用价值的不同量上。”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六十七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第五十一页）。
- 〔13〕 严格地说，这只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中介必须通过投资于金矿的资本与其余的资本之间的利润率等同化才能发生出来。关于这一问题，见奥图·鲍威尔：《黄金生产与贫乏》，载“新时代”，卷 30/2，第二十七期，第四页。
- 〔14〕 重复一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不同于在简单的商品生产中——互相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是因为，货币有效需求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的分配、生产价格的动力学以及资本积累的发展，在利润率的波动之后，每一个都必须在这些部门中加以探讨。
- 〔15〕 可兑换的纸币的膨胀性发行，最终变成不可兑换的了，因为否则的话，由于黄金储备消失而将会有外汇支付全面垮台的危险。这正是从一九六九年以来，官方是从一九七一年八月以来，美元所实际发生的情况。
- 〔16〕 但是，由于各国通货膨胀率的不相同，已经丧失掉部分购买力但还没有贬值到其他低通货地步的纸币，还可以用作窖藏。美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六十年代中期的情况，正是如此。
- 〔17〕 沃尔诺·霍夫曼：《长期的通货膨胀》，柏林，一九六二年，第十一——十

一页。

- [18] 关于这一问题,比如可参见卡尔·考茨基:《黄金生产的变化和贫乏的变化特性》,“新时代”增刊第十六期,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在本章的后面,我们还将再讨论关于这一问题的一次讨论,这次讨论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在尤金·瓦尔加、卡尔·考茨基和奥图·鲍威尔之间发生的。
- [19] 关于这一问题,比如可参见尤金·瓦尔加:《经济战争中的黄金和资本》,载“新时代”,卷34/1,第八一五页;同一作者:《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经济问题》,维也纳,一九二〇年;也见瓦尔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危机》,第二版,汉堡,一九二二年,第十一、十六、二十三——二十五等页。
- [20] 例如,阿尔夫利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经济学原理》,伦敦,一九二一年,第五九四——五九五、七〇九——七一〇页。
- [21] 在这一方面的一位典型人物就是用心很好的皮古(A. C. Pigou),“福利经济学”之父,他在经济大危机的前夕,还在竭力为这样一种论点在争辩:用降低工资的办法,危机是可以防止的,因为这样一来,可以鼓励企业家来增加他们的投资。
- [22] 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写道:“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激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币,给一切诈骗者以他们所缺的资本,并按商品原来的名义价值,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购买进来,就被医治好。”《资本论》第三卷,第四九〇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五六九页)。也见同上来源,第五〇三——五〇四页。自从六十年代以来,我们显然都正在亲眼看见这样一种形势:美国宾夕法尼亚中央公司的破产,以及这样一些大公司的突然垮台而破产:英国雷兰德公司、西特罗因公司和东洋工业公司等,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得救,只是由于政府或银行的庞大的抢救活动(克莱斯勒是否能逃脱一次类似的命运,尚不得确定)。如果没有前几年的膨胀性繁荣,那么,这些公司的无利可图性,将会更快地变得明显。
- [23] 封·海克(F. A. Von Hayek)编有苏达·申诺伊(Sudha R. Shenoy)的著作选集《抓住老虎尾巴——凯恩斯学派对通货膨胀的赠物》,伦敦,一九七二年。从这部选集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凯恩斯和凯恩斯主

义“正统新古典主义”批评的很好的总结。这样一种论点似乎最终是不可挑战的。凯恩斯主义最终会由于通货膨胀而引起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危机这位作者已经以模范的顽强性提出来了四十年了。唯一的问题是，对海克说来，这会导致在魔鬼与蓝色深海之间进行一次熟悉的抉择。为了最终阻止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位政治经济学家坚持主张一种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解除这同一个经济危机。回顾下一九四五——一九五〇年的世界，就足以理解，为什么胜利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政府不能认为这样一种抉择在世界上是现实的，甚至是善意的。凯恩斯对他的批评者的典型答复是这样一句话：“最终我们都会死的”，这是法国贵族著名格言“身后是非谁管得”的一种反响。这是一种受历史谴责的阶级的世界观，不是对历史未来充满信心的阶级的世界观。

- [24] 霍夫曼在前引著作第二十六——二十九页中，列举了“持久通货膨胀”的起源和证明的几个来源。
- [25] 凯恩斯：《繁荣的手段》，伦敦，一九三三年，第十九、二十二页。
- [26] 银行资本在这种变化中有一种特殊的利息，这给银行提供了更大利润的机会。关于这一方面问题，参见萨伊尔斯 (R. S. Sayers)：《现代银行学》，牛津，一九六七年，第二六七——二七〇页。
- [27] 比如可参见熊彼特早在一九一二年就提出的看法：“由于信贷（熊彼特在这里指的是生产或企业信贷，以区别于流通信贷——著者）不能脱离过去企业造成的结果，或总的来说过去发展创造出来的储备和购买力，那么，它就只能包含特别创造出来的信贷支付手段，这种信贷支付手段既不能以严格意义的货币来支持，也不能用已经存在的产品来支持。……信贷只能在它是主要的（也就是企业信贷——著者）这一种情况下，才能从新创造出来的支付手段中被转让。”《经济发展的理论》，纽约，一九六一年，第一〇六页。
- [28] 国民生产总值和私人债务，见《总统经济报告》，一九七〇年二月，和《当前商业研究》，一九七〇年五月，引自“每月评论”，一九七〇年九月，第五页。国家债务，一九六九年：见欧洲经济共同体发表的统计资料。
- [29] 《富裕社会》，第二〇四页。关于整个这一问题，见盖尔斯·约尔丹 (Gilles Jourdain) 和雅克斯·瓦利尔 (Jacques Valier)：《资产阶级

- 对通货膨胀的解释的失败》，载“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期，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二月号，第五十六——五十八页。
- 〔30〕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伦敦，一九三六年，第一一七——一一九、一二六——一二八、三〇〇——三〇三页。
- 〔31〕 马克思对于庇尔的一八四四年银行法持的是嘲讽的态度，这个银行法在危机时期阻止了货币量的临时扩大。《资本论》，第三卷，第五一三——五三三、五三七页。也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八五页。
- 〔32〕 “膨胀间隙”论点是凯恩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第一次提出来的，见《怎样支付战争费用》，纽约，一九四〇年。其中一些要素在他的《一般理论》中已经出现了（第三〇二——三〇三页）。
- 〔33〕 这就是罗斯福新政部分失败的原因，也是下面这个事实的原因：在第三帝国统治下，生产性民用投资在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期间，没有受到明显的刺激，尽管国家费用有了大大的提高（见本书第五章）。
- 〔34〕 关于“通货膨胀费用的理论”，参见派什(F. W. Paish)：《收入政策的极限》，载派什和亨尼赛(J. Hennessy)：《收入的政策》，经济事务研究所，伦敦，一九六八年，第十三页。布鲁曼(F. S. Brooman)：《宏观经济学》，伦敦，一九六三年，第二三四——二四七页。
- 〔35〕 说明这一理论缺点的，还有很多其他的论据。类似的价格增长还可以见于这样的工业分枝部门：这些部门工资费用占35%，并且占生产成本总额的1%；一般说来，较高的工资增长是由于以前生活费用的增长而引起的。关于对这种“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理论的反驳，见盖尔斯·约尔丹和雅克斯·瓦利尔前引著作第五十八——六十七页。
- 〔36〕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一八页。
- 〔37〕 所以，通货膨胀就明显地具有双重的功能：它允许剩余价值率增长，与此同时又由于货币工资增长而掩盖了相对工资额的下降。因此，通货膨胀中的货币工资增加是该谴责的。比如，可参见英国“自由主义的”经济新闻工作者萨缪尔·布利坦(Samuel Brittan)的研究著作：《一九五一——一九六四年保守党政府的财政部》。布利坦一方面宣称他本人是稳定货币工资的热烈的支持者(第一五〇页)，而同时又劝工人们不要把生活费用与生活标准混为一谈。但是他没有说明，如果货币工资连生活费用的增长都不能补偿的话，那么，生活标准怎么来提

- 高呢。很显然，布利坦是为牺牲工人工资的快速增长来辩护的，换句话说，就是使工人阶级吃亏而强制节约，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率。
- 〔38〕 雅考伯·莫利斯(Jacob Morris)写道：“通货膨胀在一个时期……为产业后备军准备了一种替代物，以作为资本主义维持其剥削权力一种方式”：《通货膨胀》，载“每月评论”，一九七三年九月号，第二十五卷，第四期。这只在有限范围内是正确的。在本书第五章和第十四章中，我们试图说明，在“扩张的长波”中，在持久的通货膨胀条件下，劳动后备军的波动正象过去一样，对实际工资的演变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率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仍然正确的是，如果没有这种持久通货膨胀的存在的话，那么，这些反响就会更凶猛得多。
- 〔39〕 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采矿方面，由于必须钻越来越深的矿层，在某一矿床收入减缩的规律是很流行的。可以考虑一下对这种事有兴趣的某人的下列声明，这一声明对金矿不同产量的动力学暴露了一些情况：“在第七十五届年会上(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矿务会议——著者)——这次会议是一九六五年六月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退休主席安德森(C. B. Anderson)在关于成本越来越高的一部分讲话中说：……‘我将再一次强调，在每碾磨一吨矿石的工作费用中，每增加一分钱，都要从付报酬到不付报酬的种类中改变每一个矿的矿石数量——不论这是一个新矿还是老矿，也不论是低级生产者还是高级生产者。……这个矿也许会停止开采，也可能是永久停止开采。……此外，个别矿的寿命会越来越缩短，整个金矿工业衰落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接近了。’”矿业局/美国内务部，《地区报告：国际矿业年鉴，一九六五年》，第四卷，华盛顿，一九六六年。
- 〔40〕 南非金矿资料，一九〇七年，米尔(A. Mill)(编)：《采矿工业》，第十九卷，纽约，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关于一九四〇年，“工程和采矿杂志”，第一四二卷(一九四一年)，第二期，第六十八页。关于一九六七年，矿业局/美国内务部，《矿业年鉴：一九六七年》，华盛顿，一九六八年，第五四四页。
- 〔41〕 见矿业局/美国内务部，《矿业年鉴：一九六七年》，第一——二卷，华盛顿，一九六八年，第五三六页。
- 〔42〕 “新苏黎世报”的统计资料，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一日。

- [43] 一九〇七年至一九六五年的资料系来自美国商务部/普查署：《长期经济增长》，在美国统计摘要每年官方资料的帮助之下，我们将这些资料扩展到了一九六七年。
- [44] 关于最后一个阶段，见当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出版物，引自纽苏斯·布兰德 (Neususs Blande) 和阿尔特维特尔：《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与世界通货危机》，载“阶级斗争问题”，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
- [45] 这一估计——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当然只有在商品同样包装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对于尚未生产的商品，或者在一九〇七年只是小量生产而且质量完全不同的商品，对这样的商品的长期价值发展进行估计，那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对于全球性生产的商品，这种估计的意义很大。
- [46] 商品价格的长期、快速跌落，除了引起别的情况外，还会引起信贷体系的停顿；因为，即使有很低的名义利息率，那么，实际利息也势必由于黄金价值的每年增加而提高。公债和银行资本总的说来将会比工业和商业资本的利润为高。现在的商品跌价将会大大地阻碍商业资本的功能。由于工人对名义工资跌落的抵抗较之他们对生活费用上涨的反应要明显地迅速而又强烈得多，群众性压力将会发展——为资本所恐惧——成为实际工资的长期增长，这只能用大规模失业来使之中立化。
- [47] 尤金·瓦尔加：《黄金生产与贫乏》，载“新时代”，卷XXX/1，第七期，第二一二页。尤金·瓦尔加：《黄金生产与贫乏》，载“新时代”，卷XXX/1，第十六期，第五五七页。奥图·鲍威尔：《黄金生产与贫乏》，载“新时代”，卷XXX/2，第四和九页。卡尔·考茨基：《黄金、纸和商品》和《黄金生产的变化和贫乏的变化特性》（见上文）。
- [48] 就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观点来看，在当代经济文献中所使用的“黄金价格”这一整个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商品的价格表现在它们的货币价值也就是黄金方面，而黄金不但是价值的尺度，而且还是价格的标准。因此，“黄金价格”就表现为用黄金表现的黄金价值。这种表现的实际意义就是通货的“价值”，也就是通货单位所代表的黄金的数量。这样一个公式：“黄金价格是三十五美元一盎司”，其实际意思就是：“一美元代表一盎司黄金的1/35”。
- [49] 见马克思：“我们这里考察的货币资本的积累，既然不是商业信用的

流发生停滞的表现,也不是实际流通手段或再生产当事人的准备资本已有节约的表现。把这两种情况撇开不说,货币资本的积累,还能由异常的金的流入而生,例如一八五二年和一八五三年,由于澳大利亚和加里福尼亚新金矿的发现,就发生过这种情形。”《资本论》第三卷,第五〇一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五八三页)。

- 〔50〕 米尔顿·弗利德曼和安纳·雅考伯森·什瓦茨:《美国的货币统计》,纽约,一九七〇年。
- 〔51〕 对正统的“纯”数量货币理论的一个漂亮的驳斥!与其原则相反,货币流通速度不能是这样:货币数量的一种有意义的增加,可以由其速度的减慢而中性化,如果取决于商业周期的商品流通和资本积累的需要,不能以老的速度来“吸收”这额外的货币数量的话。
- 〔52〕 弗利德曼和什瓦茨前引著作。
- 〔53〕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加迪纳尔·米恩斯:《价格力量与公共利益》,纽约,一九六二年;什瓦茨曼(D. Schwartzmann):《垄断对价格的影响》,载“政治经济学杂志”,一九五九年八月号。根据米恩斯的意见,在一九五三年与一九六二年间价格增长的85%可以追踪到高度集中的生产分枝部门。斯蒂格勒(Stigler)和肯达尔(Kindahl)引用了一些甚至在垄断化部门中也有的价格波动数字,对“有管理的价格”的重要性,提出了疑问:《工业价格的行为》,纽约,一九七〇年。可是,米恩斯从不否认这一点。他令人信服地表明(在斯蒂格勒自己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在十八个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部门中,价格的波动比五十个垄断化部门中的要大得多,而且,后者中的大部分是反周期的:《有管理价格论点的证实》,载“美国经济评论”,一九七二年六月号。
- 〔54〕 在这些条件下,莱芬逊在下面两者之间所作的区别,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由于垄断而使之成为可能的价格增长与由于增加了的资本积累的需要而使之成为必要的价格增长(前引著作,第三十页)。垄断资本能够作到高于平均水平的边际利润(技术上的剩余利润),这种利润保证了为加速技术革新所必需的高的自筹资金率,这一事实与银行或中心银行体系所追求的创造货币的通货膨胀政策一道,构成了一种单一的复杂“结构”。这些只是形成了晚期资本主义同一个特殊结构的不

同的方面而已。

- 〔55〕 米恩斯：《价格力量与公共利益》，第一四八页。关于六十年代西德一家化学大垄断资本的一种类似的表现，见艾克·布莱什米特 (Aike Bleeschmidt)、盖哈德·霍夫曼 (Gerhard Hoffmann)、利因豪德·封·德·马维茨 (Reinhold von der Marwitz)：《集中、国际市场发展和国家干预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协作实例》，兰波尔海姆，一九七四年，第二十三页。
- 〔56〕 萨维斯坦迪根拉特 (Sachverständigenrat)：《一九七四年年鉴》，第二二〇——二二一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通货膨胀》(一九七〇年第二十二页)也提供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九年时期的一个类似的研究。
- 〔57〕 根据波尔鲁的看法(见《输入的通货膨胀和行业的结构》，载波尔鲁、但尼采 (Jean Denizet) 和亨利·鲍古因纳 (Henri Bourguinat)：《通货膨胀、美元、欧洲美元》，巴黎，一九七一年，第一〇八页)，根据有关西方国家的材料，在一九五八——一九六八年这十年间，值得分析研究的价格增长中，大约有 70% 到 90% 可以追踪到服务业和建筑业的价格增长。
- 〔58〕 这对美国是很明白的，美国的输入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5%。其他明显的例子是日本、加拿大和法国，这三国一九七三年的输入价格分别增长了高于其一九七〇年水平的 6%、12% 和 13%，而生活费用与一九七〇年相比的话，则只增长了 24%、16% 和 20%。
- 〔59〕 由于服务业不能“生产”储备，需要积累的消费品的数量既包含有雇用额外“生产性”劳动者必需的消费品的价值，也包含有已经交换为服务的那一部分额外可变资本的等量价值。
- 〔60〕 “服务工业越来越大的重要性代表着这种经济中一种主要的结构变化。它是这样一个部门，在这个部门里，生产力提高得非常慢，因为自动化很困难，而且在这个部门里，更多的资本投资和劳动力……将用来生产非耐用的主观服务，其中很少能表示生活费用指标。”查尔斯·莱芬逊前引著作，第二十八页。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通货膨胀》，在一九五八——一九六八年期间，服务部门每年价格平均增长率，两倍于在美国、西德、大不列颠、法兰西和意大利等国工业品的增长率。

- [61] 同样的规律经过细节修改之后，也可应用于非生产性支付所包括的那种方式，比如通过赋税的军备。这种规律帮助理解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持久通货膨胀的程度，用下面的事实可以加以测量：受雇于美国服务领域（除了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之外）的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的人数，在一九五〇年与一九七〇年期间，从占赚工资雇员总人数的50.3%，增加到了占60.6%，而在美国公民平均消费中，服务业的份额，在这同一时期只从32.7%增加到42.6%（这包括煤气、水和电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商品，这个数字大约会是29.5%和38.5%）。在其他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活跃于服务部门有收益受雇平民所占分数，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〇年期间，日本是从33.2%增至46.9%，不列颠是从42%增至50.6%，西德是从32.5%增至40.7%。
- [62] 波尔鲁前引著作，第一一七页以下。在这一方面，可注意查尔斯·舒尔策(Charles Schultze)提出的那个有趣的论点，即为响应需求转移而在某些部门中的价格增长，并没有伴随以需求相对衰减为标志的其他部门的价格减缩（由于垄断条件）；查尔斯·舒尔策：《美国新近的通货膨胀》，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研究论文1，华盛顿，一九五九年。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也同样可应用于服务领域中高于平均水平的价格增长。在这里，虽然我们不能进一步讨论半殖民地的持久通货膨胀问题，它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垄断进口价格的不断增长。关于这一问题，参见海克托·马拉维·马达(Hector Malavé Mata)：《通货膨胀的辩证法》，委内瑞拉，一九七二年（附有广泛参考书目），这部著作记录了如下情况：在一九五六年与一九七〇年间，委内瑞拉国内商品物价指数只增长了19.4%，而进口商品则增长62.1%（第二七九页）。关于这同一问题，更普遍的是参见安尼巴尔·品脱(Anibal Pinto)：《通货膨胀：结构的提高》，墨西哥，一九七三年。
- [63]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一九——一二〇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第一〇〇——一〇一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64] 除了这个基本区别之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区别，例如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原理，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一原理是必须加以反对的。然而，如果把这种速度看作是一种可变量而非不变量的话，那么，在费舍尔的著名公式： $\frac{M \cdot V}{T} = P$ 中，货币量就不再是仅有的变

量了,而且,有两个变量的这一公式,就只是表达了一种算术的重复。关于数量理论的更精密的说法,比如芝加哥学派的那些说法,已经放弃了货币流通不变速度的这一论点。例如参见米尔敦·弗利德曼前引著作第五十一页。

- [65] 直到最近,芝加哥学派还满怀信心地宣布了相反意见:米尔敦·弗利德曼前引著作,第二三五页。弗利德曼的整篇论文《货币与商业周期》(来源同上,第一八九—二三五页),是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
- [66] 更原始的是雅克斯·鲁厄夫的观点,他迄今仍然相信金本位的自我调整:“这是一种绝对的、不可抗拒的机制,因为,它只有在达到了它那必要的目标之后,才停止发生作用。”《通货膨胀的时代》,巴黎,一九六七年,第五十四页。在金本位时期,经济危机只是短期的,这一断言是与一八七三——一八九三年的长期不景气是相矛盾的。

## 第十四章

### 晚期资本主义的工业循环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大工业自从在世界市场取得统治地位以来，其发展一直具有这一生产方式所独有的周期性循环的性质，其中有衰退、高涨、繁荣、过分繁荣、崩溃、不景气等等一系列的阶段。<sup>〔1〕</sup>马克思虽然并没遗留下来关于工业循环和生产过剩危机的完整的理论，<sup>〔2〕</sup>可是，从他那些最重要的著作中还是可以推导出这种理论的轮廓的。<sup>〔3〕</sup>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引用了马克思著作的一些章节，在那些章节中，马克思明确地否认对危机所作的任何单一理由的解释，坚持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种矛盾的结合。在这个意义上，平均利润率的循环运动毫无疑问地是资本主义生产循环运动最清楚的表现形式，它最终总结了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矛盾发展。

经济高涨只有在利润率增长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而增长的利润率也反过来为市场的新的扩大和这种高涨的加强创造各种条件。但是，在这种发展过程达到某一点的时候，已经增加了的资本有机组成和对可以销售给“最终消费者”的商品数量的限制，必然都会降低利润率并使市场产生一种相对的收缩。于是，这些矛盾就过分发展而成为一种生产过剩的危机。利润率的下降导致投资的缩减，这又使得这种低落转而成为衰退。资本的贬值和渐趋合理化以及越来越多的失业现象（这提高了剩余价值率），使得利润率又一次提高。产量的下降和库存的枯竭使得市场能有新的扩

大，这种市场重新扩大与利润率的恢复相结合，重新刺激企业家的投资活动并从而掀起一个生产高涨。

毫无疑问，利润率的循环运动是与生产和再生产整个过程的种种因素的不平衡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个高涨阶段，利润率在第 I 大部类的增长比在第 II 大部类要快一些，从而使得资本向第 I 大部类流动，投资活动也就大幅度增加，因而形成一种繁荣。相反，虽然生产过剩（或者能力过剩）在出现在第 I 大部类之前就首先出现在第 II 大部类了，可是其最尖锐的形式却是表现在第 I 大部类，而不是在第 II 大部类。这样，在崩溃之后的不景气期间，对生产的再度刺激绝大多数都发生在第 II 大部类，在这里，利润率的下降比第 I 大部类要轻。

第 I 大部类较第 II 大部类有更大的发展，这一事实只不过是资本有机组成的增长的一种全面的社会表现。相反，在衰退期间第 I 大部类生产的下降比第 II 大部类的更为严重，这个事实归根结蒂是利润率跌落和资本贬值的一种表现。在这里，如果只是追究整个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与资本的每一个价值部分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发展的话，那将是多余的。重要之点在于，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其不成比例的性质——并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的无政府性和资本家之间的缺乏各种协议，就象希法亭和布哈林所假定的那样，〔4〕而且也扎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矛盾的先天的规律。它是起源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对抗性，起源于在利润率不发生明显降低的情况下，“最终消费者”的消费与社会生产能力以同样比例增长的不可能性，〔5〕也起源于完全消除资本主义竞争的不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在出现能力过剩的第一个迹象时就抑制投资，因为，在技术上领先的那些公司继续在寻求剩余价值和市场的更大的份额。为了排除生产方面的循环运动，不仅仅必须有稳定的增长并因而有稳定的投资率——换句话说，不

仅要有一般的卡特尔,而且还要有永远安全的一般卡特尔,这就意味着要取消私有、要取消在投资和积累活动中的一切独立性——而且还要能使每一个个别消费者购买力的分配,能够按照每一种产品的生产和价值的动力学来进行完善的调整。这些条件将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和商品生产本身的废除。〔6〕

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就会继续按照循环类型发展。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仍然是如此,从经验上来说明这一点很容易。美国经济在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九——一九七一年以及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的衰退,是众所周知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发生了类似的低落。很久以来人们都相信西德是一个例外。〔7〕但是,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的衰退在相反方面提供了一个明显的证据,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冬天紧接着出现了第二次衰退,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又出现了第三次衰退。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每一阶段,经济循环都有其特殊的性质。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八年的经济危机暴露了很多迹象,这些迹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些迹象都不同,这一点儿也不是由于随着中国之合并进了世界市场而资本主义在地理方面的扩张已经宣告结束的原故,而俄国革命的胜利甚至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减缩。同样,有必要来考查一下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循环的那些特征。

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雅诺西发展了一种论点:长期的平均增长率是存在的,只有战争的毁灭才能破坏这种增长率(导致一个随之而来的“重新建设”时期,这个时期的增长率要高于平均水平),这一论点是决不能令人满意的。〔8〕即使不顾这样的事实: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德和日本超过平均水平的增长率几乎不能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破坏来加以解释,剩下的基本现实是

在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加速了的增长率，而这与任何一种“重新建设”当然都毫无任何关系。

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我们选择了两个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这两个因素在我们看来可以说明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五）——一九六六年之间那个“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第一，工人阶级遭到的有历史意义的失败，使得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能够提高剩余价值率。第二，由此引起的资本积累的增加（投资活动）以及技术革新步伐的加速和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导致了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在国际范围内，资本扩大再生产市场的长期扩张，尽管还有地理方面的限制。

持久的通货膨胀与这种“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呢？它协助晚期资本主义缓解其内部矛盾的各种影响，能达到什么程度呢？它能够无限期地这么作吗？作为商品价值的万能等价物，货币是社会必需劳动量的对应价值。所以与此同时，它也是对现在或将来整个社会劳动资源的一部分的一种要求。〔9〕根据劳动价值理论，货币的这种定义直接可以表明这么一点：货币的贬值（就是与既定劳动量相对应的货币符号的增加）对于要分配的劳动量总额没有任何直接影响；它只能决定这些劳动量的再分配。多于要分配的劳动量就不能够得到分配。但是，由于生产过剩的危机的特征恰恰是由这么一种事实表明的：即主要的劳动生产力（劳动力和机器）被闲置不用，所以，如果能导致生产增长也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增长的话，那么，膨胀性的货币创造在某种条件下就可以刺激资本的积累。这样，它也可以导致要分配的劳动量总额的增长。〔10〕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情况只能在如果它能促进利润率增长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换句话说，就是在国民收入中降低工资份额的条件下才能发生。凯恩斯比他的那些“改良主义”门徒们更明智、更愤世嫉俗，他对这一点是十分坦

率的。

由于货币贬值和信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以不受阻碍的价格增殖（这可以与价值的降低很好地相适应）来掩盖事情的这一情况，所以有必要来探讨一下通货膨胀、利润率、靠工资维持生活者的实际收入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前一章中已经谈到过的，持久通货膨胀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它为大公司提供了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这包括把呆滞资本转化成为生产资本，既然借出的货币资本是出自银行的实际存款的。只要透支总额超过了自动出现的存款总额，那么，这一转化就变成了从信贷货币向货币资本的转化。<sup>(1)</sup>这种信贷货币究竟是代表“纯粹的”货币资本、信贷货币呢，还是代表“虚构资本”呢，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有点拜占廷式的了：它实际上是发展了的货币资本，并且（以其通货膨胀率）部分地贬值了。既然这种货币资本被用来购买劳动力和生产手段，并从而被转化为生产资本，那么，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中也就不发生实际的增长——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财富也就增长了。

我们以前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军火生产——就象商品生产那样——可以提高剩余价值额，如果呆滞资本被转化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的话；如果呆滞资本被转化为不是生产军火，而是生产进入再生产过程的使用价值，那么，这同样的结论当然就更应当是如此了。

认为缓慢通货膨胀只能导致现有的工资和价格总额的再分配的这种错觉来源于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假设：劳动力和生产手段都已经充分使用了，而且，整个社会资本都已经再度转化成了获得平均利润的资本了。如果我们摒弃掉这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假设——这种假设与一九三〇——一九四〇年或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形势都不相符合——那么，这种神秘

事物是很容易解释的。

我们假设每年社会生产的价值结构如下式所示：

$$\text{I: } 10,000\text{O} + 5,000\text{V} + 5,000\text{S} = 20,000 \quad \text{生产资料}$$

$$\text{II: } 8,000\text{O} + 4,000\text{V} + 4,000\text{S} = 16,000 \quad \text{消费资料}$$

我们是处在一种衰退状态之下。大量的机器和原料都没有使用，工人阶级的失业现象普遍存在。现在，国家（或者银行体系）以向消费者和企业发放信贷的方式使 4,500 个单位的纸币投入流通。<sup>[12]</sup>由于某种不需在此说明的理由（例如在持续的危机中消费品的储存已经耗尽），这首先导致了消费资料价格的上涨。这样造成的结果，我们假定，是工人的实际收入降低了 15%（如果商品能值 36,000 个价值单位而相对于 40,500 个纸币单位，那么，纸币平均单位就出现了 12.5% 的贬值。可是，这当然并不是意味着贬值纸币的所有商品价格都提高了同样的百分比）。这样一来，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就提高了，这种提高就能说服资本家将他们手中积累的额外货币量（货币资本量）拿来投资——换句话说，就是用这种资本来使机器开动，来购买失业的劳动力。现在，如果由于一种较高的就业水平，工人在弥补他们在工资购买力的损失方面，获得成功的话，并且，如果额外的那 4,500 个货币资本单位也以同样比例作为原来生产资本加以分配的话，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sup>[13]</sup>就会出现一种价值产品，其结构如下：

$$\text{I: } 11,667\text{O} + 5,833\text{V} + 5,833\text{S} = 23,333 \quad \text{生产资料}$$

$$\text{II: } 9,333\text{O} + 4,677\text{V} + 4,677\text{S} = 18,677 \quad \text{消费资料}$$

因此，既然最初情况已不是价值生产的再分配，而是价值生产的一种扩大（也包括剩余价值在内），这种扩大只是由于额外货币的出现才发生作用。那么，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在这一扩大结束时所存在的困难将会与衰退时所出现的困难相同，只不过是有一种更高的程度上而已。不论在哪里，只要生产的后备力量易于得

到，那么，货币的膨胀性创造就会象整个信贷体系那样发挥同样的功能。它可以使得生产力的发展超过私有财产的限制，而与此同时，它又在这两者之间以进一步发展了的规模，再生产出固有的矛盾，只不过是在一定的时期之后，“信用制度所以会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不过因为性质上本来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拉紧到了最极端的限界；它所以会被拉紧到这个程度，又因为社会资本有一个巨大的部分，是由那些和亲手操作，因此会小心权衡本人私有资本限界的所有者全然不同的非所有者使用。因此，不过指出了这个事实：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价值增殖，不过在一定限度以内允许有现实的自由的发展，所以，事实上是生产的一个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信用制度加速了各种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把这些当作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使它们发展到一定程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也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炸——危机——因而也加速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14〕

我们已经强调，资本主义企业透支信贷的发展体现了膨胀性货币创造的最重要的根源，因而也体现了持久通货膨胀本身的最重要的根源。这在“生产信贷”的主要形式方面引起了一种变化。〔15〕在古典的帝国主义时期，它采取股票的形式在资本市场上出售并以银行作为中介或者由银行来购买，而在新近的“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的阶段，它的形式主要是透支信贷。持久的通货膨胀可以确保大公司以供应充分的银行票据的办法，通过“管理价格”而获得自筹资金的手段。这从而至少在某些有决定性作用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中改变了这些大公司与银行资本之间的关系。我们从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急剧增长中，已经看出了对于“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的主要刺

激因素，而这种急剧增长并不是由持久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尽管它持久的通货膨胀对这种急剧增长起到了调节和延长的作用。就概念而言，在缓和危机方面膨胀性货币创造的作用，必须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一方面是利用它来抑制在某种程度上生产过剩危机的累积特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利用国家契约手段来限制私人投资量盲目性。

如果国家对于经济根本不进行干预，那么，货币有效需求的下降比例就会大于就业的下降比例。失业率达到6%或10%就意味着消费品的销售额将以同样的百分比下降，<sup>[16]</sup>这就会依次导致第Ⅱ大部类生产的削减、第Ⅱ大部类向第Ⅰ大部类订货的削减，然后造成第Ⅰ大部类解雇工人的后果，这样一来就具备了崩溃的累积性质。但是，如果国家以通货膨胀的手段将额外的收入分配给失业者——比如分配工人平均工资的60%——那么，6%的失业率只会引起消费品的货币有效需求降低2.4%，如果是10%的失业率，则只会降低4%。第Ⅱ大部类产量的下降这样一来就会比在“古典的”循环中要少得多，<sup>[17]</sup>因而第Ⅱ大部类向第Ⅰ大部类订货的下降幅度也就少得多。这样，生产过剩古典危机的累积过程，将会受到抑制。

在生产过剩和衰退时期，额外收入的创造对购买消费资料所发生的影响，或多或少是自发的，但是，增加国家投资对于生产资料的销售所发生的影响，却远非如此。

如果消费品产量降低5%能够造成使生产资料的订货减少20%的后果的话，那么，国家契约的增加也不会自动地导致私人投资的增长。这些投资已被削减，不仅仅是由于第Ⅰ大部类订货和销售量的下降的结果，而且特别是由于利润率的下降和存在能力过剩的缘故。国家在这个部类中某些工业分枝的越来越多的契约，不一定能诱使这些部门掀起一个投资浪潮。在第Ⅱ大部类中

更加受限制的销售停滞方面,情况更是如此。膨胀性的信贷货币的创造的唯一影响就是抑制第Ⅱ大部类销售额的下降。但是,抑制销售额下降与扩大销售额决不是一码事。如果第Ⅱ大部类能够依赖销售量扩大的话,那么,它就只需寻求提高其生产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向生产固定资本的第Ⅰ大部类的各个分枝部门去订货。这样,国家增加投资就不能象在第Ⅱ大部类那样有效地抑制第Ⅰ大部类产量的下降。在危机期间,膨胀性货币创造对第Ⅰ和第Ⅱ大部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影响揭示了所谓反循环政策的局限性——即使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理想的”条件之下。还没有任何一个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克服这些局限性方面获得成功。

可是,现在我们遇到了分析方面的一个难题。如果在一方面说,生产过剩本身就是“最终消费者”的需求那种相对有限性质所造成的一种结果,而在另一方面说,通货膨胀使得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消费者广大群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更进一步降低的话,那么,生产过剩的危机怎么会被膨胀性货币创造所推迟或延缓呢?这个难题是与过去二十五年来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可以分四个过程来加以解决:

1. 如果持久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消费资料的“销售不掉的残余部分”〔18〕继续扩大,从而使积累率受到降低的威胁的话,就会出现一种消费信贷的扩大,也就是说,消费商品可以越来越多地用来交换信贷货币,而不是交换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真正收入。这一办法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和在“古典的”帝国主义时期,都很少被用过,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被广泛地使用,尤其是在美国〔19〕——但也在其他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从下表关于美国消费债务增长的数字可以看到这一点;〔20〕

(单位十亿美元)	1946	1955	1969	1973	1974
A. 可任意处理的 家庭收入	160.0	275.3	629.6	903.7	860 ±
B. 完全保有地产 家庭的抵押债	23.0	88.2	266.8	465.9	600 ±
C. 消费债	8.4	38.8	127.5	173.5	200 ±
D. 家庭私债总额	31.4	127.0	389.3	649.4	800 ±
D 占 A 的%	19.6%	46.1%	61.8%	71.8%	93%

2. 由于持久的通货膨胀而造成的对实际利润种种困难的另外一种反应，是出口率的增加——换句话说，就是试图以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来克服国内市场的相对滞销。

毫无疑问，自从五十年代开始以来，世界贸易的大幅度扩大，也有助于对危机的抑制，这种大幅度扩大在某些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超过了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并最终扭转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贸易的长期停滞状态。<sup>[21]</sup>在一九五三——一九六三年这一时期，以固定价格计算的工业产量在整个资本主义各国增长了62%，而以固定价格计算，这些国家的出口则增加了82%；在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期间，工业生产增长了65%，而出口增长了111%。<sup>[22]</sup>很显然，这种扩大所采取的形式是特殊的帝国主义国家或生产分枝部门的出口份额的不平衡发展；因为，如果各个国家或工业分枝部门的进口份额都相同的话，那么，它们就只能把它们在出口方面的所获丧失在国内市场上。但是，事情决不是这样。在一九六九年，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互相购买的所有机器和设备中，有26.6%是进口的。但是，大不列颠的百分数只是15.8%，西德只是18%，法国只是20.2%，而其他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则高达49.7%，其他欧洲自由贸易地区的国家则高达45%。在耐久消费品方面，进口份额分别是：大不列颠12.2%，法国

20.8%，西德 22.1%，其余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 52.1%，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其余国家则为 59.1%。制造品进口的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在一九五九年与一九六九年之间的比例关系，在法国是 2.83，在大不列颠是 2.51，在意大利是 2，在美国是 1.86，而在西德则是 1.45，在日本则是 1.23。这些数字准确无误地表明了哪些帝国主义强国从世界市场的扩大中（世界出口额）获得的利益最多。<sup>[23]</sup>把世界贸易中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所占份额的灾难性的降低放在心上，把国际商业中粮食和原料所占份额的同样明显的降低也放在心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最为生气勃勃的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发展的工业生产中出口所占份额的这种增长，相当于世界市场的再分配和有利于帝国主义制造业（尤其是技术最发达的那些国家和生产分枝部门）产品的长期相对购买力的替换，并且相当于对简单商品生产的产品、农产品、传统的原料产品以及消费品“轻”工业的一种歧视。

3. 上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中世界贸易的平均扩张率之所以能够出现，只是由于国际通货量的增长超过了黄金生产的增长。以美国支付赤字的平衡为基础的黄金——汇兑本位制（实际上是黄金——美元本位制），从一九五八年起成了以年率 4% 增长的国际支付手段不断扩大的一种办法。黄金——美元本位制创造出了一种信贷货币国际膨胀体制，这种体制同时也保护并发展了信贷货币的“国内”膨胀体制。<sup>[24]</sup>

4. 持久的通货膨胀对于不断发展的生产中的价格演变所发生的影响，由于有相当多的实际财富储备而受到了限制。纸币的贬值导致一些物质价值的储备物的“流通化”，这些储备物如位置优越的建筑基地、<sup>[25]</sup>艺术品、<sup>[26]</sup>黄金、贵金属和骨董等，这些物品都在日渐发展的生产之外，越来越多地投入了流通的过程。当

然，这种“物质价值的流通化”的投机性质，由于对虚拟资本<sup>[27]</sup>特别是股份的膨胀性再度估价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些储备物的数量越大，从累积性的通货膨胀向快速通货膨胀的变化就越小。但是，这些储备物投入流通的数量越大，投机性质的增长也就越快，因而价格的上涨也就越利害，累积膨胀的发展趋势也就更要加快——换句话说，快速通货膨胀的危险性也会越大。

特别是在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的膨胀性繁荣期间，发生一次就质量而言更大的投机浪潮<sup>[28]</sup>——不但包括了上面列举的那些实际价值，而且也包括了很多基本商品和通货。这次投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系列金融社团、地产公司和次要银行的垮台（在美国有富兰克林银行，在西德有赫尔斯塔银行，在意大利有辛杜纳集团），这就标志着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工商业衰退的开始。但是，与此同时证券市场价格还在明显地跌落，其中包括很多种原料价格、建筑用地价格（建筑用地价格在英国在直到一九七四年中的十二个月中降低了40%）和某类型的绘画，这一事实就证明，通货膨胀在性质上还没有发展到快速阶段。下表是对通货膨胀加速的探讨。<sup>[29]</sup>

消费品价格年增长率

	平 均				
	1960—65	1968	1969	1970	1971
美 国	1.3%	4.2%	5.4%	5.9%	4.3%
日 本	6.2%	5.5%	5.2%	7.6%	6.3%
联合王国	3.6%	4.8%	5.4%	6.4%	9.5%
西 德	2.8%	1.6%	1.9%	3.4%	5.3%
法 国	3.8%	4.8%	6.4%	5.3%	5.5%
意 大 利	4.9%	1.3%	2.6%	5.0%	5.0%

	1972	1973	1974 (上半年)	1974 (第三季度)
美 国	3.3%	6.2%	10.2%	11.6%
日 本	4.3%	11.7%	23.0%	23.4%
联合王国	7.0%	9.2%	14.2%	17.0%
西 德	5.5%	6.9%	7.3%	7.0%
法 国	5.9%	7.3%	12.5%	14.6%
意 大 利	5.5%	10.8%	14.8%	20.8%

这样，这种通词的这四种可能性固有的矛盾性质，就变得明显易见了。不论是消费信贷那不成比例的扩大也好，物质价值<sup>[30]</sup>或股份的投机价格的增长也好，都不可避免地趋向于产生通货膨胀，并且，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首先是把通货膨胀变为一种累积过程，然后再把它变为一种快速发展过程。但是，通货膨胀从缓慢发展到快速发展的过渡，标志着过剩的货币从一种有限刺激转化成为一种生产桎梏：在通货膨胀的快速发展情况下，资本终止了其从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变。它越来越多地离开了流通领域，而这时，越来越多的商品就积存起来了。这也就意味着生产在缩减，而且资本的积累也在迅速缩减（即使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如此，即在通货膨胀迅速发展的时候，可变资本的贬值较之不变资本要快得多，所以，剩余价值率所受的影响是有利于资本的）。

如果通货膨胀的这种加速代表着对资本积累的一种危险的话，那么，它对实现利润的困难的第二种解决办法就构成了更加突出的矛盾。那一种通货膨胀越是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加速发展，那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中要保持其现有份额的机会就越少——更谈不上增加这种机会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上涨中的价格以其对国内市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必然会对出口价格发生影响。<sup>[31]</sup>

如果利润率受到了威胁——这往往发生在实际充分就业达到

之前<sup>[32]</sup>——那么，货币方面的贬值会开始在经济各个部门中的社会资本的分配方面引起结构上的变化。一般说来，一种通货膨胀环境能促进信贷的累积扩大，因为，每一个资本家都会这么算计：今天用信贷来购买，到明天用贬了值的货币来偿还，这样，货币的贬值就对他们有利可图。这就说明了一种看起来似乎很奇怪的现象：在通货膨胀发展的时候，银行借出的货币数量一天比一天多，有时候还可能出现促使利息提高的“货币短缺”的现象。通货膨胀本身可以不断地满足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并使得创造信贷和货币的旋塞关闭的话，会对企业造成更大的风险：它往往意味着向衰退的迅速转变。在另外一方面，在对货币资本的日趋增长的需求与奠定晚期资本主义基础的（也包括“古典的”帝国主义）过分资本主义化之间，就没有什么矛盾可言了。

有相当一部分的银行信贷并不是来自“纯粹的”货币创造，而是出自银行系统之外的存款的积累。<sup>[33]</sup>同样明显的长期银行存款的增长，表明了实际上的过分资本主义化到底达到了怎样的程度。<sup>[34]</sup>透支信贷的双重作用（不但有创造通货膨胀性货币的作用，而且也有使呆滞资本转化成生产资本的古典媒介作用），决不能加以忽视。

但是，持久的通货膨胀不仅能使短期的利率提高，而且它还有长期的后果。货币资本的所有主和借出者一天天对货币的贬值逐渐习以为常，并且开始区分名义利息与实际利息，劳动力商品的出售者也是如此，他们在持久的通货膨胀时期，也学会了区分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如果通货每年丧失其购买力的5%，那么，每年利息的4%将使资本本身受到损害；它将会变成“负的实际利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货币资本的贷款将会彻底枯竭。因此，如果名义利息与平均通货膨胀率和实际利息总额相等的话，那么，在价格长期上涨的情况下，它就会有一种上升的倾向。<sup>[35]</sup>但是，

如果利率最终还是提高了，<sup>[36]</sup>而利润率仍在波动，那么，企业家的利润就会突然缩减。名义利率的日渐提高与持久的通货膨胀会一道来禁止整个长期的投资规划，也就是说，由于技术革新的加速发展，既加强了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也无限地推迟了由于周转期太长而过于担风险的某些计划。

为了缓和危机而进行的膨胀性的货币创造与世界市场的日趋尖锐的竞争相结合，使得工业循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扩张”阶段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而这种运动形式是与信贷周期联锁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那个时候有金本位制而且中心银行只是从边缘方面来干预信贷的发展，信贷周期是完全依赖工业循环的。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如果制度化了的通货膨胀使得货币领域更能够独立自主，并且能够独立地采取行动——与工业循环背道而驰——来缓和事态的波动的话，那么，暂时与工业循环有所区别的一种信贷循环就会出现。到这时候，信贷货币就可以刺激国内经济上升达到某种程度，超过了这种程度，就有损害有关国家所控制的世界市场的份额的危险。如果达到了这个地步，就必须尽可能迅速地加以遏止。英国经济在战后第一届保守党政府时期的“停停走走”类型，就是这种相对独立自主信贷循环的一个典型的例子。<sup>[37]</sup>但是，在过去二十年到二十五年间，美国经济——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西德经济——也有类似的工业循环与信贷循环相联锁的特点。<sup>[38]</sup>当然，即使把信贷循环作为一种独立的运动，它对实际工业循环而言，也不是彻底独立自主的。信贷循环要受中央银行体系和政府的信贷政策的制约，而这种政策要在短期信贷扩大或信贷限制之间作出选择。但是，中央银行的种种决定也不能毫无限制地由私人储蓄银行来应用——这些决定除了受别的限制之外，还要受私人储蓄银行私人利润利息的限制（在法国，国有银行也以同样的原则办事）。这使得一种复杂的

机制发生了作用，在这一机制中，银行存款的发展、行情的发展和公共资金的收益等起着重要的作用。被认为由于流动性的提高——比如说——而获得加强的种种信贷限制，可以由银行通过对其资产的重新组合而加以克服。<sup>[39]</sup>美国银行界战胜美国政府以剥削欧洲——美元市场来限制信贷的政策的方法，现在是尽人皆知的。政府的一种有效的信贷限制就意味着对私人银行行动自由的严加限制——因而也是对追逐利润的严加限制。如果不对通货严加控制——换句话说，如果不对资本的国际运动加以种种限制，从而废除通货的任意的可兑换性，那么，这种政策最终是不可能实行的。<sup>[40]</sup>这样一来，在下述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一方面是有有效的信贷循环，这种信贷循环的目的，必须包括维护或扩大一个国家对世界市场所占有的份额；另一方面是同一世界市场的扩大，这种扩大的基础是通货的可兑换性和国际信贷货币的膨胀性。归根到底，这两者是不可调和的。信贷循环不可能与其对剩余价值率的反响分割开来——换句话说，不可能与其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影响分割开来。信贷的扩大导致生产的迅速增长，这种信贷扩大缩减了劳动后备军并从而经过某种程度的缩减之后，会有利于实际工资的提高。通货膨胀将会阻碍这种提高，但不能阻止这种提高。如果资本要设法保护剩余价值率的话——更不用说要提高剩余价值率了——那么，它就必须重新组织一个劳动后备军。可是，如果不对信贷加以种种限制，不对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加以种种限制，这一点是不可能作到的。保迪(Boddy R.)和克罗蒂(Orotty, J.)在对美国非金融公司的利润与工资(包括白领工人的工资在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之后，确认了这一规律。<sup>[41]</sup>在连续商业循环的第一阶段(从工商业衰退的低潮时到中等程度的扩大)即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七——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一——一九七〇年，这一部分有迅速上涨之势——一九五

三——一九五七年为从10%到16%；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为从9.8%到14.3%；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年为从10%到16.7%。在这一循环的第二个阶段，跌落也同样迅速——直到接着而来的衰退之前。举例说吧，从一九六五年的16.7%降落到了一九六九年的9%，而衰退只是从一九七〇年才开始。如果说保迪——克罗蒂部分与剩余价值率不完全相一致的话，它只是一个大致的指标。

自从一九四〇年以来，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这一个基本的难题一直在“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的表皮下面，不断地发挥着作用。第三次技术革命因为在不变资本的重要因素成本方面引起了高于平均水平的降低，从而导致了资本有机组成的进一步提高，尽管其提高的程度不象“独立自主”这一流行语所能暗示的那么大。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国际工人阶级遭到惨重失败使得剩余价值率所可能达到的那个高度，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再重复一次。正相反，作为资本积累大幅度增长的必然结果的产业后备军的长期减缩，使得工人阶级能够周期性地削减剩余价值率。所以，除了刚才讨论过的短期的危机时的波动之外，一个对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侵蚀过程出现了，这一过程整个贯穿了“正常的”缩短了工业循环。所以，信贷循环方面的张力提高了。为了保护这一体系免受生产过剩危机和资本扩大的威胁，独立自主的货币创造越来越变得必要了。通货膨胀率也就开始加速发展。

与此同时，不平衡的发展规律一直在继续起作用，使得在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竞争的各种势力的国际关系，发生变化。美国帝国主义正在逐渐地丧失其对欧洲和日本对手在生产力方面的领导地位。它在世界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正在减缩。最近，美国企图改变这种长期的发展趋势，其所采用的方式是向其帝国主义对手逐步增加资本输出，并且在其竞争对手的经济内部获得大量的资本所有权以提高资本的国际集中程度。但是，在西欧和日本资本

的长期快速积累，不可避免地就意味着——除了加速美元的贬值之外——从西欧和日本向美国输出资本的机会，要比美国向西欧和日本输出资本的机会为多。美国帝国主义为了把它自己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曾试图运用向其竞争对手施加压力以迫使对手们重新估价它们的通货，但是归根结蒂这只能导致西欧和日本的资本输出，与美国相比更进一步加速的结果。

尽管信贷循环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性，并且很多决定的“政治”性也约束着它，它究竟能够把工业循环的决定性压力改正得少到什么程度，这可以从能力利用的循环运动看得出来，这种循环运动在晚期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向这一制度固有的生产过剩趋势发展方面的表现，比在滞销货物的激增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能力过剩的循环性质不论在美国还是在西德，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从下面的估算中可以看得到。

#### 美国：制造业每年能力使用率〔42〕

循环高潮期	循环低潮期
1952: 94%	1953: 76%
1955: 90%	1958: 74%
1959: 82%	1961: 79%
1966: 91%	1970: 75%
1973 夏季: 87.5%	1975 三月: 65%

#### 西德：制造业能力使用率〔43〕

循环高潮期	循环低潮期
1960 秋季: 93%	1959 年初: 87%
1965 年初: 88%	1963 年初: 81%
1970 年初: 95%	1967 年初: 77%
1973 年中: 93%	1971 年底: 88%
	1974 年底: 88%

但是，这一运动给信贷体系树立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限制。如果大量的过剩能力已经存在的话，那么，即使银行系统和（或）国家投入最大量的信贷货币，也不会对这些部门中的私人投资导致什么刺激因素。<sup>〔44〕</sup>这样一来，私人投资的联合缩减就变成不可避免的了，于是就产生了衰退。所以说，通货膨胀充其量只能限制衰退的范围，或者阻止衰退的累积性的发展。

如果结构方面的长期能力过剩在这时又加之于联合的周期性能力过剩——这很清楚地说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刺激作用正在趋于终结——那么，信贷循环减缓工业循环的能力还会进一步减少。毫无疑问，在今天，恰恰就是这种结构方面的能力过剩存在于钢铁工业、煤矿工业、纺织工业、日用电器工业、汽车制造工业，也可能还存在于电子仪器和石油化学工业。<sup>〔45〕</sup>

这样，所有这些证据都指明了信贷循环的相对独立性的衰退，因而也都指明了缓慢通货膨胀限制生产过剩危机那累积影响的能力。这只不过是下面这种事实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这种事实就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与“具有潜在停滞倾向的长波”之间的转折点，现在正在我们的身后，即将到来。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到这种明显变化的迹象。第一个方面，当日渐增多的债务负担开始对现时购买力有所限制的时候，膨胀性的信贷创造的刺激性冲击就不再有效了。这一现象不但在美国经济内部可以看出，而且在美国经济以外也可以看出，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中。

在美国，累积的债务负担既直接威胁着家庭可任意使用的收入（消费品的购买力），也直接威胁着公司的流动性，因此，这一转折点很快就会达到。每年支付的利息、抵押的偿还、消费信贷及其偿还等，在一九四六年构成了美国家庭可任意使用的收入总额

的 5.9%，在一九五〇年构成这一收入的 11.8%，一九六五年构成了 18.6%，一九六九年构成了 22.8%。在这里，信贷的创造很显然已达到了其顶点。正象蛇要吞食它自己的尾巴那样，现有额外信贷总额只是刚刚弥补了过去信贷的每年债务负担——换句话说，在现在用之于正在发展的商品购买和服务项目的可任意使用收入，并不比没有信贷扩大时为高。在一九六五年与一九六九年之间，抵押和消费债务增加了 880 亿美元，而消费者要偿付的利息和偿付款项则增加了 550 亿美元。在一九六九年，这两个总额之间的差异稍高于可任意使用的家庭收入总额的 5%。<sup>[46]</sup>

更为不祥的是公司流动性的发展。现金资产(包括银行存款)和公债与债务的比例从一九四六年的 73.4%，到一九五一年降到了 54.8%，到一九六一年降到了 38.4%，到一九六九年降到了 19.3%，而且在美国非金融公司方面，在一九七四年初降到了 18% 以下。这就意味着，在一九七四年以现金资产或准现金资产计，债务增加了五倍以上。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公司(每个公司资产在一亿美元以上)的流动性是优于它们那些较小的对手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相反。在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一日，资产少于 100 万美元的公司的流动率是 31%，资产在 100 万美元与 200 万美元之间的公司的流动率是 24%，资产在 500 万美元与一亿美元之间的公司的流动率是 22%，而那些资产超过一亿美元的公司的流动率为 19%。<sup>[47]</sup>很明显，在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中如果没有直接的否定反响——也就是，如果没有产生快速通货膨胀的话——那么，这一颗通货膨胀的螺丝就不能再进一步拧紧了。

其他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也都经历了股份公司流动性衰退的类似趋势。在大不列颠，银行向工业和商业公司贷款总额在一九五八年与一九六七年之间增加了四倍，而这些公司资产总额只提高了 30%。作为这种偏离造成的结果，纯资产从 31 亿英镑降到了

9.75 亿英镑。<sup>[48]</sup> 公司流动性的降低也从自筹资金的下跌比率中暴露出来了——法国的情况我们上文已经引用了。在日本，非分配利润与资本总额的比率，从一九五九年的 15.7% 降低到了一九六二年的 10.7%、一九六四年的 9.1% 和一九七〇年的 8.6%。<sup>[49]</sup>

第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信贷循环的相对国家独立自主性对于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已经构成了一种直接威胁，分裂并削弱了在布雷顿森林 (Bretton Woods) 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且越来越严重地阻碍着这一体系被后继体系的替代。

在金本位时代，这种黄色金属可以同时并且一致地完成三重功能：价值的尺度、价格的标准和世界通货。金本位的机制使得工业循环实际上免除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影响，或者免除了代表整个资本利益的代理机构那些审慎的“调整的企图”。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平衡的发展规律和资本的相对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大不列颠，然后是美国）周期性危机在某些紧急关头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引起的反响。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金本位明显地顺利进行，并不是由于什么“独立自主的过程”，那种顺利运行的基础在于英国工业、英国资本和英国货币的优越的生产力和长期的稳定。正是因为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信任英镑（也就是信任英国资本主义的稳定性），正是因为英镑钞票可以购买人所追求的英国货，也正是因为以英镑表示的政府公债给予公债的持有者取得未来英国资本剩余价值的权利，所以，英镑才“与黄金一样有用”，而且，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际上是英国金镑本位为基础的，尽管英格兰银行 (Bank of England) 的实际黄金储备是微不足道的。<sup>[50]</sup>

当最重要的那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阶层选择了在工业循环中进行主动的、大规模的干预，以便利用信贷的创造

来缓和危机的时候，其所造成的最初结果是进一步分裂了世界贸易，这是由于国际流动性收缩的缘故。<sup>[51]</sup>现在已经与黄金脱离了关系的一些主要纸币，已不再被接受作为国际支付手段了，世界市场分裂成了一些自给自足的经济集团，在这些经济集团之间，商品的直接交换开始增加，从而就排除了发展信贷以扩大世界贸易的可能性（除了其他情况之外）。<sup>[52]</sup>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由货币创造而对国内市场的再刺激，并没有伴之以世界贸易的同等的扩大。的确，后者甚至还有衰退之虞。<sup>[53]</sup>

在布雷顿森林，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的帝国主义列强建立了一种国际货币体系，这一体系之设计，是为了给膨胀性信贷扩大的国际表现提供基础的，而膨胀性信贷扩大在这时已经在国家范围内被接受了。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好，还是资产阶级政客们也好，他们都相信，关键的问题是流动性的扩大——继续创造额外的支付手段。<sup>[54]</sup>由于黄金供应的增加太慢，而且黄金的分配也太不平衡，无法解决国际流动性的问题，于是就产生了另一种体系，这种体系把一种特殊的纸币提高到与黄金并行的世界货币的地位；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具体的历史形势是这样：只有美元可以起到这种作用。<sup>[55]</sup>

新的体系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个是美元向黄金的可转换性（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受到了一九三四年在美元贬值时黄金显然的过高增值的促进），这种可转换性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央银行能够与黄金一道使用美元来掩护它们国内的货币；第二个是美国经济中大规模的生产储备（和生产力的领先），这就意味着美元所有权在外国政府和外国资本家手中的积累，不但不成任何问题，而且是他们完全称心如意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年，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问题，并不是美元的充足，而是美元的短缺。<sup>[56]</sup>

因此，美国政府的马歇尔计划和类似的“美援”计划，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所发生的影响，与凯恩斯政策在国内经济中所发生的影响十分相近：大量的额外购买力投入了国际领域，这——即使有大量未加利用的能力——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世界贸易的大幅度扩大。<sup>[57]</sup>资本扩大再生产在国际范围内的加强，以及剩余价值率的直线上升和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冲击，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增长的累积过程，国内的工业循环（被地方性信贷循环所缓和）可以对这种累积过程发生一种限制性但又不是灾难性的影响。反而言之，既然工业循环现在要受信贷创造循环的约束——从而受国家政府政治决议的约束——那么，此后它在国际上就变得不是同时发生的了。<sup>[58]</sup>其结果就是使得一个国家的工业循环运动能够进一步缓和另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循环。于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衰退就典型地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繁荣相一致，而且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渐扩大的市场的越来越多的输出，也使得那个帝国主义国家对其国内市场需求衰退的反响，受到了限制。<sup>[59]</sup>

为了促进世界贸易的扩大发展而在布雷顿森林制订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整个基本原理被颠倒了，因为，这一体系的一些支柱已经开始解体。而且，这些支柱的解体还并不是偶然或者错误造成的结果；它是同一个固有的逻辑的必然产物，信贷货币在国际间的扩大发展原本也是这同一逻辑的产物。

我们已经知道，美元膨胀的边际加速是美国经济避免生产过剩的严重经济危机的主要的先决条件。但是，加速了的美元膨胀就意味着美国支付赤字平衡的恶化，并意味着对固定兑换率的黄金美元汇兑比值的越来越大的威胁。从两方面来说，美元对黄金的可变换性越来越遭到了削弱。归根结底，其正式废除就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除此之外，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导致美国商品与美国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对手的商品之间的竞争能力日趋下降。<sup>〔60〕</sup>因之，其他工业强国的资本家们对于握有钞票来购买当前美国货和将来美国货的兴趣，一天比一天少了。<sup>〔61〕</sup>这些美元纸币只有在购买美国资本的时候，才是有用的。其结果就是有退回到黄金本位之虞。但是，这种倒退将意味着退回到萦绕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那些同样的问题，但在社会政治条件下，对于世界资本是远远更为不祥。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表明，以使用纸币美元作为世界通货为基础的整个国际信贷扩大，<sup>〔62〕</sup>可以象小孩子用纸牌搭的房子那样倒塌掉。这是国内信贷扩大越来越大的不安全感的一种标志。这两种现象之间，有一种明显而又深刻的联系。很显然，它两者之间的联结关系就在于美元作为美国工业循环缓冲的功能与美元作为世界通货的功能之间的矛盾关系上。它的前一种功能暗示着一种长期的通货膨胀；而它的后一种功能则暗示一种最高限度的稳定。只要美元的膨胀十分温和，而且美国的劳动生产力并未受到挑战，那么，这一体系就不可能存活下去。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恰恰被“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给慢慢排除掉了。这给其余世界的资本家们没有留下进一步的选择余地：以美国——这是世界市场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生产过剩危机为代价来购买美元的稳定，就等于排除了他们所依赖的那个分枝部门。

现在的货币危机，在于这样一种事实：抑制战后长期繁荣的全部机制所发生的影响，必然会增加销售的困难和国内市场资本的增值，并从而加重国际间的竞争。其结果就是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斗争中，某些特殊的帝国主义利益集团的发展越来越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国内贸易、关税和货币政策，并从而越来越谴责作为一种国际交换媒介而符合于某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货币的那种特殊功用。在今天，世界经济的不安全性，在加强了的国际竞争中

有所表现，这反过来也符合于美国优势的相对衰退。

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很为典型的一种矛盾的局面，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在这样的局面中，国际信贷的扩大恰恰在其最为需要的那个时刻而有枯竭的危险。既然在资本主义世界，生产是以高速度在扩大的，那么，国际支付手段的发展——这在美国的支付平衡中是美元膨胀和赤字的一种功能——就可以保持在某种限度之内。但是，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制造业中存在着增长率的下落和能力过剩情况的增长，于是，国际支付手段的扩大就应该加速以便动员生产后备力量。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刻，国际信贷扩大有失灵之虞，因为归根结底，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中没有一个是愿意接受这种“贬了值的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仲裁手段。<sup>[63]</sup>这个矛盾的部分解决办法是利用“纸币黄金”，也就是国际信贷货币，这种信贷货币只通用于中央银行之间，而且与任何国家货币都毫不相干。但是，“国际流动”问题在这些方面的一个真正的长期的解决办法，受到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的阻碍，这种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把“纸币黄金”本身的分配变成了列强国际关系的一种功能，而且，由于这种分配的迂回过程，这种竞争还再一次把各国货币的膨胀拉回到国际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领域来。根据上面的分析，那种不能兑现的纸币，只能在一个国家的结构内部强加于商品所有主和货币权所有主。世界纸币将会使一种单一的世界政府成为必要的。正如我们在第十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和作为特殊资本主义互相对抗各集团自我保护的一种工具的国家功能——换句话说，就是资本主义竞争和私有财产或“多种资本”的现象——使得这样的世界在可以见到的未来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们在这里指出下面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现在的形势与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世界货币体系在某一方面是完全不同的，这个

方面指明了当代资本主义深刻的结构危机。在那个时期，英格兰银行还可以在不高于每年进口5%的水平上保持黄金储备。如果英格兰银行愿意增加其黄金供应的话，那么，它可以随时出售英国政府公债或股票来购买黄金。<sup>[64]</sup>只是在生产过剩的危机期间，黄金才不得不抛出流通，那只是在一个短的时期而且只占到期总支付额的微不足道的一点比例。可是到今天，情况已经不复如此，现在中央银行必须经常握有黄金和外币储备与国家出口的更高得多的比率。<sup>[65]</sup>这一变化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世界资本自足的局面已经发生了永久性的动摇，尽管（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国际信贷货币有了长期的扩大。<sup>[66]</sup>

工商业衰退越变得深刻、越变得普遍化，那么，信贷的注入就必须加多，银行票据供应也必须进一步扩大，以阻止这种衰退恶化而成为全面的不景气——这样一来，危险性就更加增大了：通货膨胀和投机将会脱离资产阶级国家的控制，以一种无法控制的方式冲向银行恐慌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垮台。<sup>[67]</sup>在一九七四年，有几家次要的银行的失败，已经把国际资产阶级带到了这样恐慌的边缘，在那个时候，普遍地从大银行提取存款就可以煽起这种类型的崩溃。只是由于那些主要的中央银行和那些最大的储蓄银行作出了集体的、清醒的决定，立刻协助处于危险状态的所有金融机构，这次崩溃才告避免。很显然，这些金融中心的储备有足够的力量成功地作到这次抢救活动。但是，如果这些最大的银行中有几家本身也受到了偿付问题的冲击，尤其是如果这些冲击是同时发生的或者是在一个短期内发生的，那么，情况就会不同。因此才有施之于国际资本的压力，以便改善世界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并采取措施来保证长期的复苏，这说明，在具有威胁性的债务金字塔的任何进一步扩大，都有放置一个制动器的必要。因之，在所有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要同时对信贷加以强制的限制。

因之，一系列普遍化了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直到现在，对信贷扩大的各种限制和货币供应的增长情况，其相对性究竟如何，从下列的数字可以看出来：

一九七四年三——六月的变化与前一年相比所占的百分比

	货币供应 $M_1^*$	$M_1$ + 时 间 四年中存款	银行贷款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1974年前半年)
西 德	+44.4%	+ 8.8%	+ 8.3%	+ 1.5%
联合王国	+ 1.2%	+21.8%	+31.4%	- 1.5%
法 国	+ 9.9%	+15.8%	+19.9%	+5.0%
意 大 利	+20.6%	+22.6%	缺	+7.5%
美 国	+ 5.3%	+ 8.4%	+18.4%	- 0.5%
日 本	+ 5.3%	+ 3.1%	+ 3.0%	- 3.0%

\* 纸币 + 即期存款

无论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从缓慢向快速发展而对资本的限制也好，或是巩固国际信贷货币进一步发展的不可能性也好，都说明了这么一个事实：大大扩大的生产能力与世界市场上销售和资本增值的有限可能性之间的矛盾，正在开始形成越来越严重的爆炸形式。这种形式很清楚地指明，“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正在走向终结。尽管晚期资本主义有庞大的非生产性支出，特别是在军备方面，尽管晚期资本主义的销售机器膨胀了，尽管晚期资本主义的负债大大地增加了，持久通货膨胀也大大严重了，但是，晚期资本主义一直未能，现在仍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些基本矛盾。它只能暂时地缓和并控制一下这些矛盾，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把这一制度内部涌现出来的那种爆炸性压力还加以扩大了。

将信贷循环与工业循环之间的关系加以倒转的那种危险的理

辑，现在可以从工业循环在国际上越来越多同时发生的新近迹象日渐增多这一情况中看出来。国际通货体系的危机，正在坚定不移地侵蚀着国家经济决定的自主性——除非危险地倒转而为与世界市场隔绝的自给自足状况，就象三十年代发生过的那样。在扩大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引进一种通货联盟的那些企图，<sup>[68]</sup>也将使得最重要的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货自主性，大大地削弱。多国公司势力的不断增长，也正在这同一个方向发挥作用。

据估计，多国公司——它们在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控制了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约20%，控制了世界贸易的约30%——在一九七〇年拥有流动货财约300—350亿美元（纸币和应付存款）——也就是说，等于美国国家黄金和货币储备的三倍。在一九七二年初，它们拥有欧洲美元的50%，这个数字在那个时候增加到了600亿美元。<sup>[69]</sup>到一九七四年末，欧洲美元借贷达到了1850亿美元；而且，由于政府所持有的石油美元的注入，多国公司所持有的比例似乎在降低的时候，这些公司所登记的资产总额，与一九七二年相比，却进一步明显地增长了。因此，多国公司迫切需要形成一个在国际上有组织的货币市场，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也一点不奇怪的是，它们为了保护自己而反对突然的交换损失，反对通货再引进或资本控制的威胁，或者反对关税义务的增加。<sup>[70]</sup>它们的所作所为只符合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那种逻辑，这种生产方式是以私有财产和竞争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而这种“国家主权”归根结底必须隶属于资本的全面利益。但是，这同一种逻辑不仅有避免损失的倾向，而且也有使利润尽量扩大的倾向——换句话说，也就是倾向于货币投机以便迅速获取金融利益，从而使得货币资本的庞大数额发生不断的国际转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固定交换率的垮台以及浮动交换率及其大幅度变化的一般的引进（在苏黎世，美元波动于

3.76 瑞士法郎与 2.67 瑞士法郎之间——也就是说，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之间，提高了 25% 以上），使这种通货投机大大地增加了，这种通货投机原先是要适应官价交换率发生突然变化的（贬值或再度评价）。“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当英镑的贬值似乎是很迫切的时候……在（布鲁克—利摩尔 Brooke-Remmer）调查所包括的英国为外国所拥有的 115 家子公司中——这些家子公司在以前的三年或四年中没有支付红利——有 30% 是如此。这 115 家子公司中有 25% 减免了它们收入的百分之百以上，这就意味着取用了它们那积累起来的利润。有几家子公司实际上把它们所持有的所有收入都寄回国去了，有一家子公司的利润，每年大约有七十万英镑，这家子公司单在一九六四年这一年向其母公司所支付的红利就有三百万英镑。在一九六七年，当英镑最终发生贬值的时候，在一直到十一月的危机的这些月份中，发生了另一个高红利的支付浪潮。在法国，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sup>(71)</sup>

帝国主义列强工业循环中这种越来越多的同时发生事情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在国际范围内劳动客观的社会主义化的日越严重。一方面是这种国际化，另一方面是在资本越来越国际集中的条件下的私人占有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坚持，这两者之间的对抗——换句话说，就是劳动的国际社会主义化与国内财产竞争和资本的国家体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变成了大嚷大叫的事情。资本增值、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这既是一九四〇（四五）——一九六五年“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的原因，又是其结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国际范围内加速了这种客观的劳动社会主义化。在制造工业中，劳动的国际分工的发展，正如第十章中所述，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已经达到的水平。世界市场价格一致化的趋向，也已经超出了原料、半成品、各种

食品和大规模生产的轻工业消费品(比如纺织品等)的传统结构。在今天,可以说有一种准确无误的趋势,使得耐用消费品的价格、运输手段和某些机器和设备元件等都变得一致化,即使是对这一过程还有十分重大的对抗性。<sup>[72]</sup>在这种情况下,结构方面能力过剩的普遍现象必然会同时发生;一个工业要想以转向对外出口来避免在国内的销售量下降和竞争能力的下降,那是越来越困难了;而使用通货操纵以获取短期的出口利益,有演变成为一般商业战争的威胁。

这样,对工业循环的分析,就证实了我们在前面的一些篇章中所作出的那些主要的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经济扩大,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任何一个基本的、内在的矛盾。受平均利润率的周期性摆动所制约的投资的周期性摆动,仍然是一个规律。使用联锁的信贷循环来缓和工业循环,只能在下面的情况之下收到有限期间的效果,那就是,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引起的加速扩张的有利情况下,并且还要付出货币持久贬值的代价,付出对国际货币体系有越来越大的破坏性的代价。

在全国范围内反循环货币创造的能效所受的限制越大,保证国际信贷货币的稳定创造的困难越多(即创造适用的国际流动性),那么,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非同时发生的循环,就越是要集中而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新的同时发生的工业循环,这种工业循环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普遍的工商业衰退。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的平均增长率越是缓慢,那么,越来越短暂的繁荣阶段和越来越长久的衰退和相对停滞阶段,就越会有到来的威胁。

从“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到“具有潜在停滞倾向的长波”之间的过渡,在今天正在加深国际间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已经不再是摆脱掉各种社会对抗,而是要把改

善各国资本主义工业竞争斗争的费用转嫁到在这些工业中受雇的靠工资生活的人的身上。持久的充分就业的神话，一天一天不灵了。政治一体化和政治诱惑所没有完成的，现在都由产业后备军的重建和工人运动的民主自由的取消来完成了（除了其他情况之外，还有政府对罢工的镇压和对罢工权利的压制）。关于剩余价值率的斗争转向了经济和社会动力的中心，正象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一直到三十年代那段时期的情况那样。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的学说也必须包括对于在当代的阶级斗争中，晚期资产阶级国家和晚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 注 释

- 〔1〕 在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第十一章中（第三四二页），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已经进行了特别的分析和说明，在这里我们不想再重复在那里已经说过的话了。
- 〔2〕 这一点的理由是，马克思对生产过剩的分析，根据《资本论》的原写作计划，计划包括在尚未写成的第六部分即论述竞争和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中。有各种各样的迹象表明，甚至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第三卷的时候，他仍然还在坚持这一计划：见第二六一、三六三页。
- 〔3〕 在这一方面，最重要的章节是：《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第二编，第四九二—丑四六页；《资本论》第二卷，第一八五—一八六、三一五—三一八、四八〇—四八一、四六七—四六九页；《资本论》第三卷，第二三六—二六一、四三一—四三二、四七一—四七二、四七七—四八二页。
- 〔4〕 我们来回顾一下《资本论》第三卷中著名的一段话：“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的限制。”见第四八四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五六一页）。
- 〔5〕 从生产的扩大与资本的贬值之间的对抗也如此，“总的说来，矛盾是

由这点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一种绝对发展生产力的倾向，而不管价值如何，不管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把保存现有资本价值，最大限度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它的价值不断加速地增加）当作目标。”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四四页（当为二四九页——译者）（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二七一页）。

- 〔6〕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马克思明确了这样一点，不是以社会所有为基础而是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一般经济调整，将代表一种类型的“专制主义”而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了：“于是银行成为总买主兼总卖主。银行可以不发行银行券而开支票，甚至可以不开支票而使用简单的银行往来账。某人卖给银行多少商品价值，他就有权利从银行那里取得同一数额的其它商品底价值。银行还需要具备第二种功能，那就是正确地确定每一件商品底交换价值，即物化它们之中的劳动时间。但银行的功能并不能就此结束。它必须规定制造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即使用平均的产业上的手段去生产商品所必需的时间。然而即使如此，也还不够。银行不但需要规定制造一定数量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因而必须为生产者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劳动都具有同一的生产率（因而还要平均地分配劳动手段并安排劳动手段），并且它还应当规定各种不同生产部门所利用的劳动量。后一种功能很必要，因为为了实现交换价值，使银行底货币能够真正兑现，那就要保证全国的生产，并使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这样才能满足交换者底需求。不仅如此。最重要的交换不是商品交换，而是劳动与商品的交换。……劳动者不是把他们的劳动卖给银行，而是从银行那里取得他们的全部劳动产品底交换价值。这样较为仔细地看一下，就可以看出，这种银行不但是总买主兼总卖主，而且还是生产者。其实，这种银行简直就是管理生产的专制政府和领导分配的女总管。否则，它实际上不过是为共同劳动的社会记账和算账的一个会计处罢了。”《政治经济批判大纲》（草稿），第一五五——一五六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一分册，第九十——九一页）。

- 〔7〕实际上，德国甚至在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衰退之前，就已经有几次危机性的波动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有一个周期性高峰，一九

五九年和一九六三年有一个周期性低潮)。但是,在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衰退之前,这些次的摇摆已经表现在各式各样的增长率中,而不是表现在一种绝对的生产衰退中。但是必须记住,在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的周期性低潮中,机床工业中就发生了产量的绝对衰减,而且从战争结束以来,工业投资总额第一次降下来了。

- [8] 雅诺西前引著作,第十六页。
- [9] 约尔丹和瓦利尔:《资产阶级对通货膨胀的解释的失败》,第四十页。
- [10] 因此,麦蒂克是错误的,他在另外对巴兰和斯威茨的《垄断资本》的正确批评中,他排除了下面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资本积累可以因限制政府对“非销售商品的生产”的干预而接受国家创造货币的刺激——这种现象压缩而成为一个分配问题。保尔·麦蒂克:《马克思主义与垄断资本》,载赫尔曼宁、芒特和罗尔绍森(编)《垄断资本——论保尔·巴兰和保尔·斯威茨的著作》,法兰克福,一九六九年,第五十二页。
- [11] 在恩格斯编的《资本论》第三卷由恩格斯本人插进的一些段落中,有时候他给透支作了界说(也就是银行票据的创造):《资本论》,第三卷,第四一九、四四五——四四七页。
- [12] 或者给失业者分发由通货膨胀赤字财政产生的纸币。额外货币创造的技术机制,并不是重要的。
- [13] 为了不致于不适当地使计算复杂化,我们在这里有意识地避开了插入的中间阶段,比如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在第一阶段中产生的剩余价值的某些部分,比如说50%——现在由于在流通领域中通过再分配岁入而增长了——已经积累起来了,从而以超过100%的剩余价值率而表现出了特征;或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新商品已出现于市场上,取代了纸币的贬值,并与原来剩余价值率的重建正好相符合,这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这样,我们就说到了第四阶段,这个阶段中就等于扩大规模的起始位置。
-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四一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五〇七页)。
- [15] 关于流通和生产信贷之间的区别,见希法亭:《金融资本》,第七十七——七十九页。希法亭把生产信贷称作“银行信贷”和“资本信贷”。我们觉得“生产信贷”含意比较清楚,因此在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使用它。企业信贷也在类似情况下用来表达这一点。卡尔·仁

纳 (Karl Renner) 在给予公司以额外流通资本的“公司信贷”与给予公司以额外的固定资本的“投资信贷”之间，作出了分别（前引著作第二二八——二三二页）。虽然这种区别对“古典的”帝国主义是对的，但是，当透支信贷的扩大继续允许大垄断资本把短期贷款转变为中期的甚至伪装起来的长期贷款的时候，它就丧失了它的力量。

- [16]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消费品的销售都有一种统一跌落趋势。由于在基本食品、租金等等方面的花费几乎已经不能再压缩了，那么，赚取工资者名义收入的任何缩减，都会在耐用消费品的销售方面，导致不成比例的猛跌。这些情况给消费支出引进了一种因素，这种因素不象资本主义初期的情况那样，是更要取决于商业周期的。
- [17] 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给出的数字（第五三一——五三二页），这些数字把部门周转的缩减、耐用消费品的销售以及美国战后几次衰退头九个月的工业生产（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与战前最后两次危机中的跌落，作了对比。这些数字准确无误地表明，这种危机的起始，与典型的“古典”危机完全相同。它是已经发生变化的危机的累积发展。
- [18] 这种销售不掉的残余，不一定需要生产；它也可以采取能力过剩的形式。另外一方面，垄断资本还可以对需求量的提高作出反作用，即不必提高价格，而是延迟交货日期。见查诺威茨 (Zarnowitz)：《未完成的订单、价格变化和商业波动》，载“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号。
- [19] 这就是美国战后繁荣有时候被称作“建筑繁荣”的原故：“抵押繁荣”该是更精确的描绘。
- [20] 《流动性的长期低落》，载“每月评论”，第二十二卷，第四期，一九七〇年九月号，第六页。关于一九七三年，见《一九七三年美国统计摘要》。
- [21]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六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化学纤维生产（美国、日本、西德、大不列颠、法国、意大利），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九年这十年中，从 225 万吨增至 556 万 5 千吨；而这些国家的化学纤维出口额，则从 336,000 吨增至 1,239,000 吨。换句话说，出口份额从 14.9% 增至 22.3%。除了美国之外，所有竞争者都增加了出口额。
- [22] 布莱什米特——霍夫曼——封·德·马维茨前引著作，第四十五页。

- [2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货膨胀》，第一〇九、九十八页。
- [24] 金·但尼采：《十年纪事》，载波尔鲁、但尼采和鲍古因纳前引著作，第五十五页。
- [25] 在一九六三年与一九七一年之间，英国和威尔士建筑地基的价格增长了140%以上：“金融时报”，一九七二年一月八日。在法国，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八年间，已出售的建筑地基价格增长了四倍半：“世界报”，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
- [26] 阿萨·霍诺一范·高(Arthur Honer-van Gogh)写了一篇关于作为商品的艺术作品的有趣而含有讽刺意味的文章：《Der Umsatz geht um in der Kunst》，载“国际信托新闻”，第三十七期，巴塞尔，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艺术作品价值的每年增长率，平均至少为10%。在纯投机领域中（作为一种投资来购买绘画以图再度销售），价格增长高达5,000%的情况，在三十年中也发生过。在美国和西德，已经产生了“艺术投资协会”。有一种这样的资金也作为副业而经营邮票和佳酿酒。关于艺术品贸易的“自我服务商店”（科隆和巴塞尔市场）和艺术的日趋工业化，参见“世界报”，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据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〇年期间，艺术作品价格加倍增长的情况如下：现代绘画，增长二十九倍；古代名家绘画作品，增长二十二倍；印象派绘画作品，增长十八倍；古代名家油画，增长七倍；十八世纪意大利家具，增长七倍；同一时期的荷兰家具，增长五倍半。
- [27] 关于这种虚拟资本的概念，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四五四—四六〇、四六六和四六七页。
- [28] 关于日本的情况，参见Tasuku Noguchi《日本的最新投机》，载“资本主义”，一九七三年，第二期。
- [29] 格林—苏特克利夫(Glyn-Sutcliffe)前引著作，第九十五页；萨维斯坦迪根拉特：《一九七四年年鉴》，第十六页。
- [30] 在结合于流通中的物质价值与为了资本再生产而出售的商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前一领域中的投机价格增长，最终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价格，只要货币供应的膨胀性扩张仍在继续。这些联系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建筑地基和土地的价格及其对建筑成本或住房费用和租金所发生的影响。例如，西德在一九六二年与一九七三年期间

的生活费用增长了44.3%，工业原料的生产价格增长了28%，但是，私人住房价格增长了87.1%，工业建筑物的价格增长了93.6%，建筑地基的价格甚至增长了171.3%；《一九七四年年鉴》，第二八〇——二八一页。在日本，一九七四年城区建筑地基价格比一九五五年的水平超过了22.9倍之多，而消费品价格指数，只比一九五五年的高出2.1倍。

- [31] 关于交换率、膨胀率和竞争能力的变化交织情况，见克利斯特尔·纽萨斯(Christel Neasuss)、阿尔特维特尔和布兰克(Blanke)前引著作。
- [32] 在整个战后的美国经济史中，尽管也有偶而的“过分热火”，但是，制造业的应用能力从来没有超过94%，而且，在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七一年这二十四年中，竟有六年的应用率为90%或稍多。
- [33] 膨胀性的银行票据创造，可以减少到在银行给予的信贷总额与银行存款总额(在西德叫做“货币资本形态”)之间加以区别即可。在一九六三——一九七〇年期间，在西德这两者之间的差额总数，达到了330亿西德马克(在一九六八年，货币资本形态超过了所允许的信贷)。
- [34] 在美国，长期银行存款——定期存款——(这种存款不变为透支信贷)在从一九一五年的40亿美元和一九二九年的200亿美元，增长到一九六四年的320亿美元，一九五六年的500亿美元，一九六三年的1,060亿美元和一九六七年的接近1,800亿美元。
- [35] 正统的凯恩斯追随者们对这一点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把利息率看作是流动性优先的一种功能，而且，现金就象贷款被通货膨胀贬值一样，当然也会贬值。见哈罗德(R. F. Harrod)，《货币》，伦敦，一九六九年，第一七八——一八一页。但是，这只是说明了流动性优先论的缺点，这种缺点与靠投资生活的人的思想是相符合的(这是凯恩斯时代英国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的特征)；但与正常的、普通资本家的态度是决不相符合的。后者是要考虑他们那呆滞资本的投资的形式，而不是要不要投资。假如有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那么，恰恰是在通货膨胀的时候，货币贬值才为物质价值、股份等等的“优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动机，把货币资本的需求具体化的那些资本家必须以提供一种较高利息率的方法来使得这一动机中性化。
- [36] 在美国，短期商业贷款的平均利息率在过去三十年中增长了三倍以上。在美国北部和东部的大工业城市中，一九四〇年是2%左右，一

九五〇年是 2.7%；一九六〇年是 5.2%；一九六七年前半年是 6.4%。但是在一九六七年，6.4%的名义利息只相当于实际利息的 2.5%左右。

- [37] 比如可参见萨缪尔·布利坦：《一九五四——一九六四年保守党政府的财政部》，第二八九——二九二页。但是，还应该补充的是，信贷周期在大不列颠是无效的，或实际上没有与实际工业周期相冲突。在这一方面，见道(Dow)：《英国经济的管理》，伦敦，一九六四年。
- [38] 所以，艾森豪威尔政府限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导致了一种更低的平均增长率。在肯尼迪——约翰逊时代，加速的通货膨胀鼓励了加速的增长。尼克松(Nixon)限制通货膨胀的企图导致了一次衰退，然后，他又不得不用破记录数量的“赤字开销”来对付这次衰退。
- [39] 关于这一问题，见苏赞尼·戴布隆霍夫：《货币的贡献》，第一三二——一四七页；格尔德菲尔德(S. M. Goldfeld)：《商业银行行为与经济活动》，阿姆斯特丹，一九六六年。
- [40] 金·但尼采，载波尔鲁、但尼采和鲍古因纳前引著作，第六十二页。也见德国联邦银行一九七一年年度报告。
- [41] 保迪和克罗蒂：《阶级冲突、凯恩斯主义政治和商业周期》，“每月评论”，一九七四年十月号。
- [42] 《一九六二年一月致国会的总统经济报告》，华盛顿，一九六二年。《美国统计摘要》，一九六八年，第七一九页。《当前商业研究》。
- [43] 《综合经济发展的专家意见》，见《一九六九年年鉴》，德鲁克萨赫，VI/110，德意志联邦议会，六，选举期；《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年鉴》，斯图特加特，一九七一年；《一九七四年年鉴》，一九七四年。
- [44] 人们会问：通货膨胀怎么会同时与巨大的未利用能力结合起来呢？这种结合只有在抽象集合体固定下来的原始量货币理论的情况下，才是不可思议的。一旦研究了货币供应的特殊结构，包括创造货币的结构在内，那么，为什么额外消费收入，比如说，不能在飞机或某些机器的需求方面保证增长的原故，就很清楚了。如果有主要的价格增长和就业的不稳定性，那么，额外消费收入就不一定会促进消费耐用品的销售和生产。
- [45] 在一九七二年初，西欧聚氯乙烯塑料的生产能力，有 20% 未被利用：“金融时报”，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六日。世界制铝工业也是这同样的百

分比：“新苏黎世报”，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在一个短暂的繁荣之后，在一九七四年末，每一种迹象都表明合成纤维方面会有一个新的、世界范围的能力过剩，这一次也严重地影响到了日本的垄断资本。见“商业周报”，一九七四年十月五日；“远东经济评论”，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46] 《流动性的长期衰减》，载“每月评论”，第二十二卷，第四期，一九七〇年九月号，第六页。
- [47] 来源同上，第六页。
- [48] 贝因：《货币供应的控制》，伦敦，一九七一年，第一〇九——一一〇页。
- [49] 阿丹姆斯(T. Adams)和霍什(L. Hoshi)：《新日本金融史》，东京，一九七二年，第三四五页。
- [50] 见马塞劳·戴塞科(Marcello De Cecco)的有趣著作：《一八九〇——一九一四年的国际财政经济》，巴里，一九七一年，第一四五——一四九、一六三——一七四页。戴塞科正确地把一八九〇——一九一四年期间的世界货币体系描绘为黄金交换本位而不是“纯”金本位。
- [51] 特里芬为三十年代通货可变换性的垮台和世界贸易的暴跌，发展了下面的解释：“1. 广泛利用中央银行的发行力量，以承认国家本身的赤字，并且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这种扩大信贷与国家货币当局的愿望相符合，甚至只是符合现有的条例，也要广泛利用其他银行的信贷扩大；2. 不愿意以现有的价格和交换率（这种价格和交换率与对货币当局很方便的黄金数量和外汇资源是相一致的），使这种信贷政策完全隶属于竞争性价格和成本类型以及完全外在类型的保存或恢复。”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纽海文，一九六一年，第二十九页。
- [52] 在一九二八年与一九三八年期间，黄金储备与每年世界进口量之间的比例，从35%增为110%。扩大了的黄金生产被储存起来了，因为世界市场上衰减的商品流通量，不能吸收这些黄金。
- [53] 德国的情况是最清楚不过的。工业生产指数在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期间增长了90%，而第三帝国（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输出，一九三八年只比一九三三年的高10%。在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诸年间，输出甚至还绝对缩减了。但在美国也是如此，一九三七年的工业产量超过了一九二九年，而输出仍然只等于一九二九年水平的不

- 到60%。
- [54] 关于在这一方面的凯恩斯信念，见哈罗德：《货币》，第一七八——一七九页。
- [55] 一九四〇年与一九四五年间，黄金生产下跌了40%，而在一九四五年与一九四九年则停滞不前。在一九四五年，美国单独就拥有世界黄金全部储量的75%。世界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例如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印度等，根本就不拥有黄金。为什么要决定让英镑也起那种不可避免要失败的通货储备的作用，见艾尔玛·阿尔特维特尔：《世界货币危机》，法兰克福，一九六九年，第四十九——五十页。
- [56] 迟至一九五二年，国际支付银行年度报告还包含着对进一步扩大世界贸易道路上所遇到的主要困难的如下说明：“可兑换性势必需要足够数量的美元，而且，为作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欧洲各国应当有足量的货物出售，并以竞争性价格出售，而第二个条件就是，应当能够销售这些商品，其方式是使得这些国家能赚到它们所必需的美元或其他的通货。”《第二十二届年度报告》，巴塞尔，一九五二年六月九日，第二六四页。特里芬以更远大的辩证眼光在四年之后又提出警告说，美国收支平衡方面出现的越来越大的赤字，将使得美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危及国际流动性的进一步扩展。
- [57] 这也对美国有利，这一事实可以从美国输出额的大规模扩大看出来：美国输出从一九四五年的95亿美元增长到一九五三年的157亿美元，也就是增长了66%，而在这同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还不到20%，工业生产增长了30%。
- [58] 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自我批评地指出，在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我们低估了这种缺乏同时性的意义：第五二九页。但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对这一错误作了必要的纠正，我们预言了总衰退的严重后果，这种后果会同时影响到大多数或全部帝国主义国家。
- [59] 在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西德的衰退。但是，大不列颠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的衰退的反响，也被输出的增长给减弱了，这促进了英镑的贬值。
- [60] 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这并没有受到在通货或流通领域中的一些现象的鼓励，但却受到了生产领域中激烈变化的鼓励。在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五年期间美元的通货膨胀率，较之德国马克或日元的相对贬值要

低得多。在这一时期，美元的购买力丧失了6.8%，而德国马克则丧失15.1%，日元则丧失34%。尽管如此，美国与日本的贸易平衡，早在一九六四年就积下了赤字，与西德则早在一九六五年就积下了赤字。因为，西德的工业在一九五三——一九六五年期间，劳动生产力增长了100%，而在美国工业方面则只增长了50%。

- [61] 这并不适用于半殖民地的资本家，很明显，半殖民地资本家仍在继续吃着缺乏美元而不是美元过剩的苦头。
- [62] 欧洲美元体系是在六十年代的后半期兴起来的，这一体系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这一国际信贷货币体系。由于美国信贷限制的结果，美国公司开始以相当高的利息从欧洲公司（包括美国公司的欧洲分公司）手中，也从中央银行手中借贷美元。这些美元使美国信贷进一步扩大，从而扩大了美国支付平衡中的赤字，从而扩大了美元向欧洲的外流，在那里，它们一方面导致了在欧洲通货方面纸币和信贷货币的流通扩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欧洲美元的进一步扩大。关于这整个繁忙现象，见保尔·艾因齐格（Paul Einzig）：《欧洲美元体系》，伦敦，一九六七年。欧洲美元体系是企图创造出一个统一利息率的国际短期货币资本市场。它既适应了资本的日趋国际化，也适应了这一国际化与国家信贷货币周期之间的矛盾。这一点在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间变得尤其明显，当时美国为了改善其支付平衡，提高了其国内的利息率，这导致全世界范围内的利息率提高，而对美国的支付平衡并无任何改善（关于欧洲美元市场问题、欧洲借款、国际公司、国际货币和资本市场及其与国家信贷周期的脱离等等，也可参见查尔斯·金德伯格所著《欧洲与美元》〔剑桥，美国，一九六六年〕一书的第一章，但是，金德伯格企图尽量缩小美元的危机）。
- [63] 在这一方面，但尼采分析欧洲美元历史的三个阶段，很有特征。第一个阶段，在欧洲银行与美国银行的竞争中，欧洲银行设法付给它们的存款以较美国银行为高的利息，而给它们的债务人则以较美国为低的利息。第二个阶段，美国银行，尤其是美国多国公司的外国分公司，是围绕着美国政府加给的对信贷和资本输出的种种限制而转向这种国际货币市场的。欧洲和日本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股票，由于欧洲美元市场而被“再私有化了”。但在第三个阶段，利息率迅速下跌，而且欧洲美元资本又流回到中央银行中来（特别是德国联邦银行）。对于

私人所有主，欧洲和日本私人银行和多国公司没有任何适当的理由来保持纸币美元存款，这种存款利息很低而且正在贬值。从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九年底，非美国中央银行的美元股票，从156亿美元下降到了119亿美元，而欧洲美元的私人持有额，则从157亿美元增至282亿美元。但是，从一九六九年底到一九七二年一月底，欧洲和日本中央银行的美元财产增长了接近360亿美元。但尼采前引著作，第七十一—七十八页。“新苏黎世报”，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日。

[64] 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第三十一页。

[65] 约翰逊(H.G. Johnson)声称：世界通货体系的危机发展成了黄金交换本位的性质——换句话说，就是独立于商业周期发展之外，独立于帝国主义间势力关系之外。即使非美国中央银行要使得它们那通货储备的黄金——美元关系保持不变，它们也得吸收越来越多的现有黄金生产，因而就长期而论，也威胁着美元的可变换性。《国际货币体系的理论问题》，载库伯(R.N. Cooper) (编)：《国际金融》，伦敦，一九六九年，第三二三—三二六页。但是，约翰逊本人指出下面一点而对这一难题表明了一个显然的解法：美国可能使用其他帝国主义的通货和黄金一道来弥补美元。如果这种情况并未发生，那么，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到它们的通货的未来的那种不信任，是互相的。反过来说，这种不信任也不是纯粹主观的，而是与全世界范围的持久通货膨胀和货币制度的日趋增长的不稳定性密切相关的。

[66] 见马克思：“但是，正是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发展，它一方面把一切货币资本驱往生产的用途（也就是说把一切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阶段，把金属准备减少到最小限度，使它不复能完成各种原来要由它完成的功能。并且，也就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使它整个机体发生这种神经过敏的现象。在生产比较更不发达的阶段上，货币贮藏少于平均标准或多于平均标准，都是一件比较没有关系的事情。另一方面，甚至一个非常显著的金的流出，也只要它不是发生在产业周期的紧急时期，相对地说，就不会有什么影响。……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轴。金属准备又是这个银行的枢轴。我在第一卷第三章论述支付手段时已经指出，由信用制度到货币制度的激变是一种必然现象。杜克和欧维斯坦双方都承认，必须让现实财富忍受最大的牺牲，以便在紧急时期维持这个金属的基础。

争论的中心不过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不过是这种不可避免的事应该以更合理一点还是更不合理一点的办法去对付。一个定额的和总生产相比显得非常微小的金属量，竟被认为是整个体系的枢轴。把这个有关金属在危机中作为枢轴的特性的骇人听闻的说明撇开不说，也还由此生出了这样一个美妙的理论上的二元论。……但是金和银又是怎样和别的财富形式相区别呢？不是由于价值的大小（因为这是由其中物质化的劳动量决定），而是由于这个事实：它们是作为财富的社会性质的独立体现和表现。”《资本论》第三卷，第五七二页以下（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六六九——六七〇页）。

- [67] 关于有关这一点在美国的恐惧，见《银行发展过份了吗？》，载“商业周刊”，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一九六七年与一九七四年之间，银行拥有的资本——储备——与其全部财产之间的比率，从7%降到了5%。银行贷款与其全部财产之间的比率，在这同一时期，从65%提高到了75%（现在则接近80%）。除此之外，银行越来越恐惧它们的主要债务人的偿付能力：“公司资本和现金财产在过去四年中都提高了约30%，银行在商业方面和工业方面的贷款却提高了60%。在过去四年中，个人收入提高了不到50%，但是，银行掌握的分期摊付信贷债务则提高了70%。”
- [68] 假如在扩大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内有越来越不平衡的地区发展等这些条件，那么，一个实际的欧洲通货联盟或是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即收入向相对的边缘和衰减区域具体转化时的一种压力，或是在这些领域中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在目前，资本是否准备支付这种收入转换的价格（或者说价格的一部分），还不一定。
- [69] 图根达特前引著作，第一六一页，“世界报”，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 [70] 胡维尔公司已宣布：由于英国、丹麦和芬兰的通货在一九六七年的贬值，该公司遭受损失达6800万英镑。见图根达特前引著作，第一六四页。这一声明似乎有点夸大。
- [71] 图根达特前引著作，第一六六页。关于多国公司的通货投机，见同上来源，第一六七——一七六页。这些公司操纵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转换价格的能力，往往使它们得以逃避甚至最严格的政府管制。
- [72] 通货价值对等的操纵和倾销实践在这一抵抗中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

## 第十五章

### 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

国家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它起源于某些上层建筑活动调解物质生产的日趋独立自主，其功用是要维持一种阶级结构和生产关系。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出发点，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差异〔1〕——换句话说，就是这样一种洞察力：一个国家所执行的那些功能并不一定需要转移为与社会成员总体相分离的一种机器，但是只是在历史决定的特殊条件下，才能有这样的变化。正是这样一种论点使得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与关于国家起源、功能和未来的一切其他学说有所区别。并不是上层建筑的一切功能全都跌入了国家的范围之内，更不用说那样一些功能，这些功能是符合于从属阶级的利益的（例如原来的各统治阶级或被统治的各革命阶级）。关于国家统治的各种上层建筑功能可以笼统地总括为对社会结构的保护和再生产（基本的生产关系），因为这并不是由经济的自动过程达到的。因此，在今天，并不是国家的全部功能都是“纯粹”上层建筑的；也不是说，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就是如此。国家的这一个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其理由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讨论。

国家的主要功能可分为下列几类：

1) 提供那些一般的生产条件，这些条件是占统治地位阶级成员的私人活动所不能保证的。〔2〕

2) 利用军队、警察、法院和监狱体系来对付来自被统治阶级

或统治阶级中某些特别部分的对现存生产方式的任何威胁。

3) 使各个被统治阶级一体化以保证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始终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保证各个被剥削阶级最终接受他们自己的剥削而无需立刻使用对他们的镇压（因为他们相信那是不可避免的，或认为那是“较轻的罪恶”，或认为那是“优越的势力”，或者甚至不认为那是一种剥削）。

用高压统治办法（军队、警察、法律、惩罚体系）以强制执行统治阶级统治的镇压功能，是国家的尺度。这种尺度，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最精密的考查。后来，卢卡克斯(Lukacs, Georg)和葛兰西更加强了其一体化功能，他们基本上把它归之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很明显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主要以高压为基础的阶级统治就等于一种防守不住的永久性内战状态。<sup>[3]</sup>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或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中，这种一体化功能的执行主要是通过不同的意识形态的：<sup>[4]</sup>巫术和宗教仪式、哲学和伦理、法律和政治；尽管上列这些不同的上层建筑实践每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说，在每一个阶级社会中都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这些一体化功能的再生产和发展是通过教育、教诲、文化和交际手段而达到的——但是最主要还是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范畴达到的，<sup>[5]</sup>这种思想范畴是每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所特有的。

有鉴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样一种方式已经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探讨，在这一方式中，国家的那些高压的和一体化功能，既是清楚的也是联锁的一种机制，<sup>[6]</sup>那么，对于在“总生产条件的规定”这一标题之下所构成的功能的分析，是很不够充分的。后者与国家的其他两种主要功能是有不同的，其不同在于它是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一种直接中介。<sup>[7]</sup>国家在功能方面的这一领域主要包括：实际生产过程的一般技术先决条件的保证（交通运输手段、邮政服务等等）；这同一生产过程一般社会先决条件的提

供（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法律和稳定的秩序、国内市场和领土、现行货币制度等），以及这些智力劳动形式的不断再生产，这种智力劳动形式是经济生产所必不可少的，尽管它们本身并不隶属于直接的劳动过程（比如，天文学、地理学、水力学的发展和亚洲生产方式中其他各种应用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就某种程度而言对古代自然科学的研究；保持一种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能够满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的各种需要，等等）。

国家的起源是与私有财产的起源相一致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与私有和公有社会领域之间的分离，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分离是简单商品生产所固有的，同时，它与社会劳动能力之分裂成为独立的、私有的劳动过程联系在一起。<sup>〔8〕</sup>但是，这样一种关系不应该加以夸大。国家比资本要古老，国家的各种功能也不可能直接导源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那些功能。国家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中的一些特殊形式所起的作用，与它的这样一些功能是很不相同的，这些功能包括保证为发展商品生产所必需的法律安全类型。在那些社会中的私有财产所采取的形式是对土地的私人占有，而不是对商品的私人占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家保证了土地所有主之间的相互关系，保证了土地所有主之间的联盟以对付国内的以及国外的敌人（比如说，对付“国内的”被剥削阶级，这些被剥削阶级不属于这一群落：首先是被征服了的部落，后来是奴隶，等等）。<sup>〔9〕</sup>这样一种国家即使说对于简单商品生产的逻辑在实际上不是经常有害的，那么，它对于简单商品生产的逻辑也是完全不适当的，更不用说对于资本的原始积累了。它的暴君权力往往长期阻碍商品生产的发展，比如系统的没收等等。因此，适应于商品所有主利益的私有权利，其初始往往是与公社权利共存的，而这种公社权利是为了保护部落或村落的稳定

性，不受货币经济的分解影响而产生的。

直到原始的高利贷积累和商业资本达到了某种成熟阶段，从基本上改变了老的既得利益阶级与新的既得利益阶级之间的关系，并且由货币资本的发展而削弱了政治统治的传统形式，直到这时，国家本身才越来越变成了先进的资本积累的一种工具，并且越来越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催生婆。马克思对于在改朝换代的战争中、在海军和殖民地的扩张中，在重商主义时，在法定延长正常工作日和限制正常工资中，以及在制造业国家主办等方面，国家债务和政府合同所起作用进行的分析，在这一方面说是经典的。<sup>[10]</sup>因此，直接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性质来设法推断国家的功能和性质，那是不正确的。<sup>[11]</sup>

资产阶级国家是专制主义国家的一种直接产物，这种国家是由资产阶级对政治权力及其行政机器的取得而产生出来的。<sup>[12]</sup>但是，它也是对后者的一种否定。因为，在工业资本胜利地上升时期的古典的资产阶级国家，是一种典型的“弱国”——因为，伴随着资产阶级国家而来的是专制主义国家经济干涉主义的系统的破坏，这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由发展。现在，资本的统治是与资本主义以前所有阶级统治形式有所不同的，这种区别是由这样一种事实产生出来的：它并不是以经济以外的强制和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而是以“自由的”交换关系为基础的，<sup>[13]</sup>这种交换关系掩盖了无产阶级的经济依赖和隶属关系（与生产手段和生存相分离开了），并赋予它以自由和平等的外貌。既然这些交换关系通常被直接生产者给变得国内化了，<sup>[14]</sup>尤其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条件之下，那么，经济统治和资本扩张越是不受限制，资产阶级就越是能够避免直接运用武力来镇压工人阶级，并且允许国家权力减少到安全功能的最低限度。这在这样一些资产阶级国家尤其是如此：这些国家在资本主义竞争时期在内部机器方面是“最薄弱

的”，这些国家有英国、美国、比利时和荷兰等。而正相反，资产阶级国家在国内如果掌握了比较强大的行政机器，例如在拿破仑一世(Napoleon I)之后的法兰西，这并不是强有力的一种标志，而是地方资产阶级相对软弱的一个标志，不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15〕

但是，资产阶级国家与所有以往的一切阶级统治形式都是有所区别的，其区别在于一个特殊的资产阶级社会，这种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公共的和私有的社会领域的隔离，这种隔离是商品生产统一的普遍化、私有财产制和所有人之间竞争的结果。因此，个别起作用的资本家要想代表资本的总利益，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极端困难的，而这种困难是很正常的——对比之下，如果在一个封建国家，比如说，只需凭一个最有威权的单一的主子，皇帝，就可以作到这一点。“资本家阶级在统治，但是它并没有管理。它只满足于给政府下达命令。”〔16〕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竞争就不可避免地确定了使国家机器向独立自主方向发展的趋势，以便使它够象一个“理想的总资本家”那样来发挥作用，〔17〕为了保护、团结并扩大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利益来服务，以反对在实际世界上“多种资本”构成的那种“实际上的总资本家”的那些互相冲突着的利益。“资本本身在其行动中并不能产生其存在的社会性质；它需要另外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以它为基础，但又不受它的那些局限性的限制，因而这种制度的行动并不取决于生产（它自己的）剩余价值的那种需要。‘在资产阶级社会之旁和之外’的这一另外的制度，可以在资本的不受影响的基础上按照被资本忽略了的那些内在的必要性来办事……这样，我们所见到的国家，就既不单单是一种政治工具，也不是一种被取代了的资本制度。它只能被认为是为保存‘在竞争之旁和之外’的资本的社会存

在的一种特殊形式。”〔18〕

由“保留资本的社会存在”所保证的那些经济功能，包括这样几点：保持普遍有效的法律关系、通货信托问题、超出本地市场或区域市场规模的一种市场的扩大以及为本地资本创造出一种用以反对外来资本家、保护本地资本家特殊竞争利益的一种防御工具——换句话说，这是建立一整套国家法律、通货、市场、军队和习俗制度。但是，这些不可避免的功能的花费，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对于胜利的资产阶级而言，为了维持国家所需要的赋税，似乎是剩余价值中一部分的纯粹的浪费，这一部分剩余价值本来可以用来从事生产的。因此，上升的工业资产阶级经常要设法来严格控制国家的花费，并且对国家开支的任何增加，都要提出疑问或加以抵制。

在资产阶级社会，国家权力的独立自主化是私有财产占统治地位和资本主义竞争的结果；但是，这同一个占统治地位也阻止它不能更加成比例地发展，其原因是：“理想的总资本家”的那些决定，在它们超越那些特别资本家互相冲突的竞争利益的时候，其对于这些资本家的影响，既不是“无价值的”，也不是中性的。国家作出的有关赋税、铁路或预算分配等方面的每一项决议，都对竞争有影响，并且都会影响到剩余价值全面的社会再分配，都会发生是有利于这一资本家集团或那一资本家集团的问题。因此，所有的资本集团都不得不在政治上变得十分活跃，不单单是为了把它们本身的观点与集体的阶级利益结合起来，而且也是要维护它们的特殊利益。〔19〕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议会在资本主义竞争时期的“古典的”功能，是体现共同的阶级利益，其所用形式是给予每一个资本家集团平等的机会来维护其集团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不使这些阶级利益集团感到这是经济以外的压力或纯粹的命令。就这一观点来看，资产阶级的议会共和制无可争辩地是资产

阶级国家的“理想的形式”，因为，它最好地反映了“多种资本的竞争”与“资本总的社会利益和性质”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辩证统一。〔20〕

从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势必既使资产阶级对待国家的主观态度发生改变，也使得国家在执行其中心任务中所履行的客观功能发生变化。〔21〕垄断集团的出现使得宗主国产生了一种永久性的积累过剩的趋势，并且也产生了向资本输出发展的相应的趋势，以及将世界划分成为殖民统治区域和在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下的势力范围的趋势。这就产生了军火开支的陡增和军国主义的发展。这些又反过来导使国家机器的更大的发展，其中包括一些社会收入越来越转向了国家手里。〔22〕当然，军火费用是有双重的功能，维护每一个宗主国反对帝国主义竞争对手（以及殖民地人民）的特殊利益，并且提供了一个进一步积累资本的根源。

与此同时，至少在西欧，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相一致的是工人阶级运动政治影响的增长，这明显地反映在普遍选举权的逐渐获得及其被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应用。这一发展对资产阶级国家在其帝国主义阶段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出现给国家的一体化功能提供了进一步的紧迫感和尺度。对于靠工资生活的人来说，作为劳动力商品出售者，形式上平等的幻想，由于作为一个公民或选民的形式上平等的幻想而在这时越来越得到了加强——掩盖了接近政治权力的基本不平等，这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间经济势力大大不平等的一种结果。因此，把大量工人阶级政党结合进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中去，资产阶级可以从这种形式中获得相当的好处，因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尚未对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地位，构成直接的威胁。〔23〕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代表以及后来的共产党代表大量地进入资产阶级的议会中就意味着，这些议会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它们作为资产阶级内部各竞争利益集团之间的仲裁者的作用。这样，保证继续在政治上统治资本的任务，就逐渐从议会转移到了国家行政机构的上层。<sup>[24]</sup>从此以后，国家机器中日趋集中化的政治权力的趋势，就都是对这些发展的一种反应。这也是在资本主义竞争时期存在的那种形势的一种倒转。而国家机器作为一种阶级在以前为保持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而采取政治上没收等的自主行动，<sup>[25]</sup>成了例外的行动，现在，这种行动比较常见的是采取这样的形式，比如军事独裁、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社会立法的一般的扩大，这种扩大在帝国主义时期获得了特别大的刺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一种让步，这种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发动的，而这种让步是为了维护资本的统治地位以反对劳方的更激烈的进攻。但是与此同时，这也符合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扩大再生产的总的利益，以保证劳动力的重新组成，劳动力组织因遭到极度剥削，已经受到了威胁。社会立法的扩大倾向对于社会创造价值在公共预算中的有意义的再分配，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公共预算不得不吸收越来越大的社会收入以便扩大了规模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一个适宜的物质基础。

此后，关于“社会国家”的一切幻想，都是以对这一倾向进行武断的推断为基础的，他们错误地相信，有一个倾向于劳方而远离资方的、日趋增长的国民收入再分配。<sup>[26]</sup>当然，事实是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任何这样一种再分配所招致的平均利润率的下降，都会不但危及扩大了再生产，而且也危及简单的再生产；它还将引起一场投资家的罢工，一次资本的抽逃和大规

模的失业。

关于“通过再分配社会化”的可能性的种种幻想，典型地不过是改良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这种改良主义的逻辑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各种利润的实际稳定化的一个彻底的计划。这样一个计划通常会包括对工人阶级消费的周期的限制，以便提高利润率并从而“刺激投资”。

国家功能的进一步扩大，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那是晚期资本主义三个主要特征所造成的一种结果：固定资本周转期的缩短、技术革新的加速以及由于第三次技术革命资本积累主要规划费用的大量增长，以及在所需庞大数量资本的增值中，任何迟延或失败的冒险性的相应的增长。这些压力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一种倾向，不但倾向于国家经济计划的生长，而且也倾向于在生产过程数目的稳步增长中国家冒险费用和损失的社会化的增长。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有一种天生的倾向，将更多的生产部门或再生产部门联合到国家所资助的“总生产条件”中。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费用的社会化，那么，这些部门就会根本不能够满足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需要。

“总生产条件”领域的这种扩大，完全是资本固有倾向性的一种反应，正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所描述的那样：“固定资本直接产生的成果越少，越少参加直接的生产过程，则相对的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必须也越多；这样才能多建设铁道、运河、导水管、电报等等，比较少制造直接用于直接生产过程里面的机械。”〔28〕这一倾向的直接例子是越来越多地应用国家预算来包括研究和发展费用，和国家为拨款或补助核动力发电站、喷气式飞机和每一种庞大的工业计划所支出的费用。这一倾向的间接例子是生产原料的那些特殊工业的国有化提供了廉价的

原料，这从而就给私有部门提供了隐蔽的津贴。这样一来，国家资本就象私人资本的支柱那样在发挥作用（尤其是对于垄断资本是如此）。〔29〕下面这个表格表明了发电工业怎样以较低的价格保证了大工业消费者的供应，从而服务于垄断资本家的利益。〔30〕

一九七三年某些国家电力平均价格每一千瓦小时的美分数\*

	手工业	手工业 + 小规模 工业	大规 模工 业	超过平均 应用的大 规模工业
法 国	3.01	2.38	2.19	1.75
大不列颠东北电力部门	2.36	2.24		
西北电力部门			1.85	1.72
意 大 利	2.33	2.00	1.77	1.56
美国（田纳西河流域）	1.67	1.37	1.09	0.92

※ 四个购买者的等级 =

I：50KW/12,500KWh 低压

II：150KW/45,000KWh 低压

III：500KW/180,000KWh 高压

IV：1,000KW/450,000KWh 高压

资本增值越来越困难重重（过于资本主义化、积累过剩），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国家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至少部分地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军火工业、“环境保护工业”、海外“援助”和基础结构工程等方面，给这一资本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提供额外的机会（所谓“有利可图”，就是由国家保证或由国家补助来赚钱）。

晚期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标志，就是社会制度越来越倾向于爆炸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这种危机直接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危机处理”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功能方面的重

要性，正象它在“总生产条件”大大扩大范围方面所负的责任一样，或者正象它为了保证剩余资本能够更迅速增值所作的各种努力那样。就经济方面而言，这种“危机处理”包括了政府反循环政策的整个武器库，这些反循环政策是专门设计来阻止或者至少能尽可能长久地延缓象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那样规模的、灾难性的大萧条的到来。就社会方面而言，它包含着一种永久性的努力，以系统地打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方式来躲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日趋严重的危机。这样，国家就布署了一种庞大的意识形态操作机器，把工人作为一种消费者、“社会伙伴”或“公民”（事实上就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支持者）等等，“联合”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去。它经常设法转移叛乱，把叛乱转移成为在这种制度下可以达到的一些改革，并且设法削弱工人阶级在工厂和在经济方面的团结基础（例如使用计算工资和支付工资的新方法、在本地工人与移入工人之间制造紧张关系、组织各种分享委员会和协商委员会以及公布收入政策或“社会契约”等等）。对于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所有因素，或是由垄断资本直接控制，或是由晚期资本主义国家间接控制，这种越来越严密控制的总的压力，是防止社会危机威胁到这一制度的共同需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也是为晚期资本主义积累和增值过程提供经济保障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日趋膨胀和日趋自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资本顺利增值和剩余价值顺利实现越来越感困难的必然结果。这些情况反映了资本家在以自动经济方法扩大或巩固其统治的能力方面，越来越缺乏信心。<sup>[31]</sup>这些情况也与资方与劳方之间阶级斗争的加强关联在一起——换句话说，与工人阶级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完全和被动从属关系中越来越解放出来关联在一起，与工人阶级间或在政治冲突中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出现这一情况相关联在一起。这些情况与下述这些社会矛盾的恶化是相适

应的：帝国主义宗主国内部的矛盾、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作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制度与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  
在半殖民地国家中统治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家的干预越大，那么，这一制度已被一种无可医疗的疾病所侵袭的这种情况就越变得明显。

在这一方面，普兰察斯新近提出的这样一种概念：在资本主义的目前阶段，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功能是政治性的，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则是“经济性的”，这只是一种要将紧密地互相依赖的阶级机制加以分离的学院式的、人为的企图。<sup>〔32〕</sup>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同时把资产阶级国家的直接经济作用、使工人阶级非政治化的运动和对于技术决定、有无限权威的经济的迷信，结合在一起，而对这种经济的迷信，据说能够克服阶级对抗、保证不受阻碍地增长，稳步提高消费，并从而产生一种“多元论的”社会。毫无疑问，“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客观功能，就是试图来解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客观需要恰恰适应于国家越来越强迫在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中进行干预，并且还冒这样的风险，那就是这种干预将会在全面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使工人阶级受到教育，而社会的财富是工人阶级生产的——这可能对晚期资本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要从这种整个的复合体中将一个因素分离出来并宣称它是主要的一个方面，那从理智来看是一种毫无用处的消遣。<sup>〔33〕</sup>

在这一经济中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作用的增长，使它能够更好地进一步地控制社会收入。换句话说，资本总额中被国家用于再分配、被花掉和用于投资的那一小部分，稳步地增加了。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膨胀对整个资本说来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但还是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一部分资本的国有化，只有以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才是有意义的，如果资产阶

---

 国家消费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sup>(34)</sup>


---

1913	7.1%
1929	8.1%
1940	12.4%
1950	24.6%
1955	27.8%
1960	28.1%
1965	30.0%
1970	33.2%

---

公共消费总额（包括国家保险）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德国（一九四八年以后只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1913	15.7%
1928	27.6%
1950	37.5%
1959	39.5%
1961	40.0%
1969	42.5%

---

级不导致私人资本利益跌落，而是导致私人资本利益稳定，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导致私人资本利益增长。同样，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到国家预算，决不能允许导致剩余价值率的长期缩减，或威胁到资本的增值；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最理想的预算是能够使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增长。

因此，最终能够发生的情况就是由剩余价值和工资（“间接工资”）等小部分的集中来进行的一种“水平的”再分配——其效果是保证某些花费在实际上能得到实现，这些花费对维护资产阶级社会是重要的，但并不包含在两个主要的收入集团的私人花费之内。

巴尔金 (Parkin Frank) 氏对于一九三五年与一九六〇年之间西方国家人口赋税负担的影响和收入差异的演变,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完全证实了上述这种“再分配”的各种限制,尽管在这些国家中还存在着特别先进的社会安全体系。<sup>[35]</sup>就连国家国民收入的这种“水平的”再分配的可能性,也要依靠客观的种种条件,例如生产的总增长率、利润率的发展,各阶级之间力量的种种关系,国家履行其功能的范围和必要私人利益的干预程度等等。如果这些条件表明了逐渐的变化(更不用说突然的变化了),比如自“迅速增长的长波”结束后所毫无疑问地发生的那样,那么,其结果就是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地方性的财政危机。<sup>[36]</sup>一旦这种情况开始了,上列国家的那些特殊功能就不能够同时都被履行。于是,国家的永久的“危机处理”就变成了国家的一种永久的危机。

在另外一方面,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在集中和再分配社会剩余价值的那些份额方面的那种越来越大的经济作用,使得它越来越成为所有资本家集团,甚至个别的资本家,直接的关怀对象,这对其作出各项决定是有影响的。在很多情况之下,在这一方面的成功或者失败可以决定个别资本家的兴旺或垮台:最明显的是在这样情况之下,即国家是唯一的顾客,而生产是国家所签订合同的一种功能。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接合——“理想的总资本”利用这种接合的具体过程在其各种功能的范围之内建立起有决定意义的优势——对于很多资本家集团(最终是对于所有资本家集团)来说,其有关命运的重要性超过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往的任何阶段所具有的。在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一般功能及其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特殊变化进行研究时,直接产生了两组问题。第一组问题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阶级利益在政治目标中是怎样和在哪里系统地提出并具体化了的?第二组问题是,经济势力和意识形态统治是怎样转化成为对国家机器的控

制的？换句话说，由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广泛地使用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所以假设从形式上看各种条件都是“不利的”，那么，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成为执行资本家阶级经济政策和社会政治政策的适当工具，究竟能到什么程度？

资本主义从竞争时期向垄断时期的过渡，就意味着在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方面的一个质的飞跃，这种飞跃势必要确定资产阶级利益从议会这种政治舞台向其他一些领域的转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上层的更大的重要性（“部长们的上任和辞职；警察和长期秘书则留任”）只不过是这种转变的一种表现。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所进行的干预范围的大大扩大，法律、政令、命令和各种条例的几何级数的增加，都意味着职业政客们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理解这种新的立法的全部意义和效果，更不必说来系统地阐述了。其结果就是这样：在“管理”这一意义上的“政府”，其本身也变成了服从劳动分工规律的一种职业。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阶级的私下院外活动就取得了大大提高了的重要性。这种活动往往就是各种新的政府措施概念的根源，或者是修正这些措施的概念的根源，而且，实际上这些活动几乎经常起到最终决定的作用。其结果就是，真正的谈判发生在这些压力集团与国家管理机构之间（也许政府就是个中间人）的机会，比发生在政党之间更为常见。<sup>[37]</sup>在这一方面，院外活动集团、雇主组织和真正的垄断组织之间，应当加以区别。院外活动集团代表的是资本家特殊集团、工商业个别分支、银行资本、出口公司（相对于国内的生产者）等等的局部利益。在许多国家的雇主组织，代表的是小公司和中等规模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大公司的利益。严格意义上的垄断组织可以控制这么巨大的金融和经济权力，至于它们可以运用其自身的权利直接干预国家和政府一级那些正在形成和正在作出的政治决定。<sup>[38]</sup>在具体例子方面，那往往需要说

明资本对国家发生私人影响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形式，是怎样相联接、怎样相交叉、又怎样发生冲突的。所得的结果并不总是一致的，但是，那将可以得到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为了使资本增值而促进或巩固总的条件这一意义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尽管它同时还可能对资产阶级更加重要的一些部门的特殊利益，造成威胁。

所以说，资产阶级阶级利益连接的这种非官方的“再度私有化”，是与资本的日趋积聚和集中相对应的。它是晚期资产阶级国家越来越自主、越来越膨胀的一个不可分离的影子。当它所发挥影响的那些决定对整个资产阶级来说已经不再是次要的，而是有历史意义的、战略的选择的时候，它的重要性达到了最高点。美国大资产阶级在作出全面的战略决定并系统阐述其阶级利益时，采取的是什么方法，多姆霍夫 (Domhoff, William) 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sup>[39]</sup>最常见的是整个过程在官方国家机构的领域之外公开（虽然一些主要的政客将被包含在其内），而且居间还有一些基金会、“政策规划小组”、“智囊团”等等直到特殊的一些“完成任务势力集团”，这些组织对国家机器或对政府的某些特定分支机构“提出”某些决定，或“建议”采用某些决定。

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私人结合与国家技术管理机器方面的各种政治决定的日趋集中是并列的，这种并列关系在大公司与政府的高级（最高级）机构之间的个人联合方面，导致了一种“综合体”，而这种“综合体”在很多国家现在已经占有了统治地位。说大资本家已经大部分退出了直接政治统治，这种主张只能在严格的限制之下才可以接受，而且也只是在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sup>[40]</sup>在美国、大不列颠和日本，国家机器的领导人与主要大公司突出代表人物之间的默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有充分的文件可资证明（在大不列颠有一些例外情况，就是工党内阁，但是即

是在这里，他们与经济中上层管理向“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是准确无误的)。〔41〕如果这种个人联合在法国、意大利和西德不是那么明显的话，〔42〕那么，其道理就在于大资本家是十分愿意把常规的日常工作（比如在一些大公司本身）交给专家和经理——在这里就是交给职业的政客们——在基本的战略决定方面集中力量则更佳。

资产阶级对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机器控制的居间调节具体机制是什么呢？对国家机器在财政方面和经济方面的直接统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即控制社会剩余生产的社会阶级，也将控制其所资助的上层建筑——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得到公认，这在新近关于这一主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越来越强调得少了。国家机器对于短期银行信贷的依赖（这种依赖在今天比以往为更甚）以及连“强大的”戴高乐主义国家或美国政府在对付突然的、短期的国际资本运动的软弱无力，都再明显不过地暗示：将国家与垄断资本牵连在一起的“金链”，远远没有消失，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废除。然而，仍然正确的是，对于大资本政治统治的任何描述，只要局限于这种统治只是对这一类型国家发生直接而又明显的影响，那么，这种描述就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下面这些因素，在任何考虑资本政治统治的复杂性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在内。虽然国家机器个别成员的阶级根源与国家的阶级性质不能等同起来，然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还是具有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秩序相适应的一种等级组织的性质，〔43〕这种等级组织的上层官员几乎毫无例外地不是出自资产阶级背景，就是与资产阶级合为一体。〔44〕英国对于其不列颠国家机器提供了一些有说服力的数字：英国的六十三万名文职官员中，有作出决定权的实际上只不过有两千五百名。根据美国分析理论家金斯莱（Kingsley, J. Donald）的描述，他们都是“永久性政客”的“文职行政人

员”，〔45〕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从资本家阶级中的特殊阶层中征召而来的。〔46〕在法国，梅瑙(Meynaud Jean)已经指出，在一九六二年，被接纳入国家行政学校（这个学校是专门为法国国家机器高级职位培养人员的）的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属于“全国人口中最既得利益的集团的”。〔47〕

但是，决定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是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不仅仅是它那种等级组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结构保证了这种国家——即使它是最为“民主的”——能起这种作用，而且只能是这种作用。〔48〕因为，这种结构是被资产阶级双重决定的。第一，把国家机器向执行地位的促进，是经过一个长长的选择过程过滤的，在这个选择过程中，这种促进对于符合于能保证成功的资产阶级行动的总的准则，〔49〕就职业而论并不是那么胜任愉快的——正象在很多帝国主义国家那样，如果不是那些大的“占统治地位的”政党之一的一个彻底的成员的话。由于这种选择本身就包含着无情的清洗，并且既灌输了竞争精神，也灌输了向统治意识形态的移情作用，那么，任何一个人，如果他对现存社会秩序及其思想和行动准则持抵制和抗拒态度而在事物的通常情况下能爬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上层，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坚定的、积极的和平主义者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成为将军的，而且，绝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也不会成为总参谋长的。如果想象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可以用使资本主义社会作社会主义的转变，其虚幻程度就象设想一支军队会在“和平主义将军们”的帮助下瓦解那样。

当然，一般说来必须要经常记住的是，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占有社会剩余生产的那个阶级将会控制在其上所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50〕从制度上来保护私有财产并从法律上使私有财产合法化的资产阶级国家，其功能在“正常的”时期，必然会充满全人口中

绝大多数人的信仰和行为的典型结构。因此，它对于从职业上在国家机器本身内部被雇用的那些社会成员，施加更加强有力的影响。<sup>[51]</sup>因为，资产阶级的总的意识形态，在“平静时期”，在普遍化商品生产的劳动分工、分散工作和商品拜物教的结构内部，不可避免地要对工人阶级始终占很大的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基本神话”都被人口中的大多数所接受，认为是不需证明的问题，其原因就是这些“基本神话”在现存社会关系中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资产阶级国家制度那种巨大的一体化势力，当然就很容易理解了。通过各种联合委员会而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共生的现象，典型地使得很多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干部和工会领导干部与这一种制度意见相一致，如果不是使他們与晚期资本主义完全串通共谋的话。<sup>[52]</sup>资产阶级国家作为资本家阶级利益一种武器的严格的工具化，既迷惑了这一悲喜剧的演员，也迷惑了这一悲喜剧的观众和受害者，其方式是把国家形象神秘化，作为阶级之间的一个仲裁者、“国家利益”的一个代表以及一切“多元势力”的功绩的中立的和仁慈的裁判。<sup>[53]</sup>

这一工具化在实际上发挥作用的方式，可以用关于大不列颠经济计划起源的一项叙述来加以说明，这项叙述是由一位著名的自由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提供的，而且，这位评论家天真地把这项叙述作为资本主义在英国向“混合经济”“转化”的一个证据：“当劳埃德（Lloyd, Selwyn）（保守党财政大臣）进入财政部的时候，他已经认为，政府开支的长期计划象他所相信的其他事情一样，是一种‘普通常识’。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底，在布里顿（Brighton）召开了一次英国工业联合会会议，这次会议是考虑‘下一个五年计划’的<sup>[54]</sup>，这次会议使劳埃德转而相信，计划对私人经济方面也是可以有所贡献的……参加这次布里顿会议的人有一百二十一个主要的商人和三十一位客人，其中包括政府某些部的部长、国有

化企业的首脑和几位经济学家。<sup>[55]</sup>……在一九六〇年，财政部的某些积极态度的分子在与英国工业联合会毫不相干的情况下，已经对给英国工业加一点活力这样一些新的观念发生的兴趣。……还有极少数的一些官员认为，值得把个别企业已经在工作的那些预报和计划合在一起，以便看看它们合在一起是否适当。”<sup>[56]</sup>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关晚期资产阶级国家各种功能的论述，除了由“主要商人”提出、经高级文职官员强调并由资产阶级政客贯彻执行的这些战略决议的坦率报道之外，要想再找到对这种马克思主义论述更明显的肯定，那是很困难的。

第二，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取决于权力划分和职业官僚的一些原则——换句话说，就是取决于永久阻止工人阶级群众对于权力的任何直接运用（自我管理）。这样一种结构，充其量能构成一种间接的民主——以人民的代表进行统治而不是由人民本身来统治；<sup>[57]</sup>但是在实际上，就连这一点在性质上也纯粹是形式上的，因为，靠工资生活者的绝大多数要取得他们实际行使他们那民主自由权的物质手段，在经济上他们是软弱无力的。这种软弱无力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产不平等的直接结果，而且也是异化和劳动分散的直接结果，这种劳动分散经常对工人的觉悟发生影响。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只能在集体的情况下才能提高并发生作用，而投票站则只承认每一个工人是一个分离的、分散的个人。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是专门来管理现行社会制度的——或充其量而言，以一种“可接受的”，换句话说就是可吸收的改革来修饰这个现行社会制度。其功能天生是保守的。一个国家机器如果不来保持社会政治秩序，其不可想象就象一个灭火器不是熄灭火焰而是喷发火焰那样。象这样一种保守的制度理所当然地完全不可能孕育对于现存社会制度任何激进的改变因素，更不必说实行任何激进的变化了。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行政部门的

官员可以变成专家,反之,专家也可以变成行政部门的官员。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严格地限制他们对于部分的问题,只能作“合理的”解决;他们必须受这种意识形态的约束,以便以一种从社会角度来看(而不是从技术角度来看)胜任的方式来行使他们的那些功能。对于这一规律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就是那些反垄断措施的命运,这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分支部门中常常加以介绍以“保护公众”(即使不是保护“社会的总利益”,也是保护“资本的总利益”)。因为,这些措施实际上已经典型地转变成了对垄断集团有利的措施,或者说对资本的特殊集团有利的措施:“就连用最好的意愿管理得最好的那些机构,也不断地依赖它们所管理的那种工业。管理者必须依靠被管理者,只是因为需要基本情报以便作出决定。一旦这些决定已经作出了,那么,在整个一个企业中的执行,如果严格从事的话,就会压倒这个企业的职员——但通常不是严格从事的。”〔58〕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这种从结构上从基本上讲的保守性质,使它在维持和保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成了一种有效的工具,这种保守性质最清楚不过地表现这样的时刻,即当这些生产关系在革命前的危机中或在革命危机中直接受到了威胁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无产阶级周期性地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正式的、严格的控制中爆发出来。于是,无产阶级就有特点地、本能地使现存生产关系发生激进的转化,以利于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目的,或者甚至转化得利于选举运动的主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斗争的自由发展就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直接的挑战。

资产阶级面对这种危险的时候,还会继续使用花招。它也许会答应或制定一些改革,以便创造出一种基本变化的暂时印象,而不允许真正的社会革命得到发展。〔59〕但是到最后,它还会不得不采用野蛮暴力的最后手段。到这时,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真实本

性就突然地、毫不含糊地暴露出来了。就基本而言，它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一个武装集团”，严阵以待来维护一个社会阶级的政治统治。如果有必要的话，它会宣布处于“内战状态”，就象一九七三年智利的情况那样，这时，它的行动显然已经变成对其本国工人阶级的一种攻击，而它的机器已经成为内战的一种工具。纯技术集团已经证实了的那种从征兵到职业军队的过渡，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镇压制度的扩大和惩罚性立法的扩大，都可以进一步肯定这么一点：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无处不在准备并进行武装以对付这种“意外的情况”，并且不会束手无策地滑进爆炸性的社会危机中去的。〔60〕

晚期资本主义发展暴力独裁的极端形式的倾向，总的说来，在一些例外的情况下已经出现，比如已经产生了法西斯国家，或者准法西斯的统治，例如西班牙和智利的军事制度，这种军事制度也要设法扑灭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并且对无产阶级进行分化。但是，我们还是应当从垄断资本主义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以看见的一些趋势中，得出有关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总的发展的一些结论。在今天，这种运动明显地是在向“强大的国家”的方向发展，对民主自由强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这种民主自由在过去，在各种条件都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工人运动最为有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关于这一发展的基本原因，已经在本书第五章和第七章中加以说明了。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由停滞控制的长波”之中。关于剩余价值的主要斗争烈火，在前一个“发展的长波”的结尾已经燃烧起来了，而且，目前经济增长率的减速，只能使这些斗争烈火更具有爆炸性。事实上，晚期资本主义本身那整个有特点的经营方式，更进一步地使那些斗争深化了，而其经济计划技术和对私人工业的公共补助，使无产阶级在整个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

——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政治方面——的阶级斗争中，受到了永久的教育。

现在，工人阶级有可能以直接的群众性行动和群众性罢工，潜在地使用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来解决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各种内部矛盾所引起的那些深刻的社会问题。<sup>〔61〕</sup>但是，这一无产阶级力量的运用越来越与晚期资本主义固有的另一个倾向相冲突，这另一倾向就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一切因素都处在垄断资本及其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工会组织的工资斗争、不受限制的罢工权利、“正常的”出版自由、集合结社自由和游行示威权利等——所有这些都越来越变得使晚期资本主义不能容忍了。因此，所有这些都必须按照法律被国家加以限制、削弱并废除。维护并扩大这些权利的斗争，不仅仅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真正阶级性质，以及反过来对于作为一种真正自由社会形式的无产阶级工人委员会民主的优越性等发展了比较深刻的理解，而且也为在争取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势力的决定性斗争中，进一步提供了群众性的动力，其方式是不断地表明：工人阶级不能够在每一个工厂分别突破资方的统治，而只有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来突破这种统治。这一解放的先决条件是，生产者联合起来取得政治权力并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 注 释

〔1〕 国家理论大纲是考夫勒下述精彩著作中的最薄弱部分：《晚期资本主义的技术合理性》，法兰克福，一九七一年。考夫勒低估了日趋自动化这一因素，其结果是，尽管他谴责了把国家与社会简单地等同起来的观点，但是，他又有把这一观点从后门再引进来的倾向。

〔2〕 最著名的例证是在所谓亚洲生产方式中的伟大的灌溉系统和在近古

时期庞大数量的谷物供应向罗马和其他大城市的运输。“一般生产条件”的公式可以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五三三页中找到。也见恩格斯：“而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反杜林论》，第三八六页（中译本见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一八页。

- 〔3〕拿破仑在这件事情方面是专家，他创作了这样一句格言：只要不坐在刺刀上，用刺刀可以干一切事情。
- 〔4〕尼科斯·普兰察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伦敦，一九七三年，第二一一——二一三页。
- 〔5〕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情况下，主要流行的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商品拜物教的规律，通过这种规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披上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表象；《资本论》，第一卷，第七十二页。
- 〔6〕见普兰察斯前引著作（第二〇四——二〇六页）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批判。
- 〔7〕关于这些问题，见沃尔夫刚·缪勒（Wolfgang Müller）和克利斯特尔·纽萨斯的有趣著作：《在雇佣劳动和资本方面的社会国家幻想和矛盾》，载“社会主义政治”，第六/七期，一九七〇年六月，以及艾尔玛·阿尔特维特尔：《国家干预问题》，载“阶级斗争问题”，第三期。
- 〔8〕见巴苏卡尼：《权利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巴黎，一九七〇年。这部著作发展了这样一种论点：法律只不过是私人商品拥有主之间的冲突的神秘化形式，因此，如果没有私人财产及其契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简单的商品生产，就没有法律。
- 〔9〕见马克思对上古国家的出现的叙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四七五——四七六页。
- 〔10〕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七五一页。
- 〔11〕迪特尔·拉普尔（Dieter Lapple）的著作：《国家与总的生产条件》（西伯林，一九七三年），是一部很有趣而有用的著作，其主要局限是过于直接导源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商品生产规律，而没有适当研究一下其与具体阶级斗争和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竞争冲突的关系。
- 〔12〕见马克思对法国国家的著名的论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七〇页。

- [13] 马克思：“已经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将会打破一切抵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将会把劳动供求规律，因而把工资，限制在一个和资本价值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中；经济关系的无言的强制，将会使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胜利完成。非经济性质的直接的暴力固然总是使用着，但不过例外地使用了。”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七三七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一卷，第八一三—八一四页）。
- [14] 卢卡克斯在《历史与阶级觉悟》（伦敦，一九七一年）中，至少承认这么一点：工人从这种交换关系国际化的过程中解放他们自己，是可能的。关于晚期资本主义，考夫勒指出：“在享乐主义与苦行主义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中，与现存社会条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调和，需要有强大的精神方面的支持。国际化过程能提供这种支持，而控制觉悟才能作到国际化。”前引著作，第八十五页。
- [15]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分析了古典波拿巴主义依赖法国小农民的情况，波拿巴主义并从而适应了在农村方面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在同一著作中，马克思明白地写道：“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二〇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一卷，第六三〇页）。
- [16] 这是七十年前考茨基的论述。
- [17] “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八六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一八页。）
- [18] 阿尔特维特尔：《国家干预问题》。
- [19] 当然，“政治活动”的这两个方面之间，经常有一种相互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并不是机械的或单方面的。例如美国银行家布雷·哈蒙德（Bray Hammond）已表明，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关于美国银行制度的争论，从某种程度而言，与纽约和费城资本家集团之间物质利益的那些冲突，是有联系的。见《美国从革命到内战的银行与政治》，普林斯顿，一九五七年。

- [20] 卡尔·马克思：“议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两派（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地进行统治的中立地盘。它并且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它们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五三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一卷，第六七〇页）。
- [21] 马克思：“当资本力量微弱的时候，它还要寻求过去的生产方式或者随着它的出现而日益消逝的生产方式的支持。它一旦感到自己强大了，便立即抛却这样的支持，按照它自己的规律行动。它一旦开始感到而且意识到它自身成为发展底障碍，它便求助于这样的方式，以解除自身的困难，这些方式看来似乎是假借自由竞争底限制以完成资本底统治，但在同时却预告了资本底解体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底解体。”《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六五一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二九七——二九八页）。
- [22] 希法亭和卢森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这从本书前面的引文中就可以看出来，而伯恩斯坦是“修正主义者”中的第一个制造了这样一种幻想：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可以逐渐由以“全体成员的平等权利”为基础的民主主义来取而代之（前引著作第一七七页），这种民主主义在阶级之间或在阶级妥协的保证人之间是中立的。
- [23] 但是，这一点与资产阶级的“自然的”发展是决不相一致的，这种自然发展更加倾向于使“积极”政治权力与私有财产的私有制成为一体，换句话说，更倾向于把工资劳动者从参政权中排除出去。这不仅仅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一个多世纪事情的普遍状况，而是几乎是所有人宣称的信念，其中包括从洛克（Locke）到康德（Kant）的那些最勇敢的资产阶级理论家。见考夫勒：《资产阶级社会史》，豪尔，一九四八年，第四三七、四四三——四四四、四六二页。
- [24] 关于这一问题，见约希姆·黑尔什（Joachim Hirsch）在《科学技术发展与政治制度》（法兰克福，一九七一年，第二四二页以下）中所作的分析及所附广泛的参考资料。
- [25] 见马克思对波拿巴主义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三二页。
- [26] 这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结构统一体的不理解。我们

从拉宾斯基(P. Lapinski)的《“社会国家”——阶段、倾向及其发展》(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四期，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号，第三七七页)中，可以发现对于“社会国家”这种幻想的有趣的早期批判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时经济的阶级合作原因。

- [27] 卡尔·仁纳早在一九二四年就对“作为社会主义起点的流通”作了界说，见《经济总过程与社会主义化》，第三四八、三七九页。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英国的改良主义文献，都是以类似这种幻想为基础的。
- [2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七〇七——七〇八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三五九页)。
- [29] 马克思使用“国家资本”这一概念只是在这种含意下：资本从国家掌握的工资劳动那里得到增值：“要是政府在矿山、铁道等等上面雇用生产的工资雇佣劳动，作为产业资本家来发生作用”。《资本论》，第二卷，第九十七页(应为第一〇〇页——译者)(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第二卷第八十六页)。
- [30] 《国营公用事业》，摘自“新苏黎世报”，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 [31] 这与马克思对资本分析的逻辑完全一致，它明确地强调：“最高度的资本发展水平是社会生产过程底一般条件，不是由社会所得的扣除额，或由国家的赋税来建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五三二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一五七页)。
- [32] 普兰察斯前引著作，第二一一页。
- [33] 普兰察斯的著作正象考夫勒的著作那样，其特点是总的低估了直接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考夫勒的论点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结，经理如果不是唯一地也主要地是与大资产阶级联结在一起(前引著作第七十六、八十三页)，这种论点忽视了一个主要之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存的最终安全决不能由地位或收入来保证，而只能由资本所有权来保证；因此，经理们也不得不来取得这种所有权，从而在维护保卫这种财产的社会秩序方面，与大资产阶级一道也拥有普通的物质利益。
- [34] 关于美国，见美国商务部关于战前资料：《长期经济增长》，战后资料：《美国统计摘要》，一九七一年。这两种资料并不是完全类似的，因为战前的估计是国家购买商品和服务(所以其中包括了国家雇员的

- 薪金)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而战后的估计则为国家花费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关于西德,见《唯物主义国家理论的要害》,法兰克福,一九七三年。
- [35] 弗朗克·巴尔金:《阶级不平等与社会秩序》,一九七一年,第一一七页。关于法国、英国、丹麦和美国形势的早期估计,见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第十章。
- [36] 见詹姆斯·奥康诺尔的基本著作:《国家的国库危机》,纽约,一九七三年。
- [37] 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是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比利时西奥·勒菲弗耳(Théo Lefevre)的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联合政府发动了一次关税改革运动,当赞成或反对这种改革的运动席卷议会、报章杂志和公众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大金融集团正在用幕后商谈的办法与有关部的文官和技术专家商谈来解决这个最后还是通过了的修正计划。一个大大缩小了的关税改革“被改变”来反对新的银行条例,这项改革允许银行信贷在有利于私人因而有利于银行的情况下大大发展。
- [38] 比如参见,安东尼·萨姆普逊(Anthony Sampson):《主权国家——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秘史》,伦敦,一九七三年。在这个公司所干预决定的无数的政治决定中,我们可以单独提出法国“反美”第五共和国计划的官方规定,这些规定保证:一九七〇——一九七五年每条线路电话费用,在法国的要等于英国或西德的二倍——更有利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
- [39] 威廉·多姆霍夫:《美国社团状况与阶级斗争》,载哈里斯(F. Harris)(编):《少数人的袋子里:美国财富的分配》,纽约,一九七四年。在对外政策领域内,多姆霍夫讨论了一些“非官方”实体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比如:对外政策协会、世界事务理事会和对外关系理事会等在形成美国资产阶级“舆论”方面的作用,多姆霍夫还讨论了这些实体与最大的公司和金融集团之间的关系。
- [40] 比如可参见考夫勒前引著作,第五十五页。
- [41] 在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第十四章中,我们引用了很多关于这种个人联合的例证——新近被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任命举来以从事美国副总统的竞选。理查德·巴尼特估计,在一九四〇——一九六七年期间,在美国政府最高职位任职的九十

一人中，有七十人是来自高级金融和大工业界的。反之，无数个以前的外交家和部长们在退休之后都在私人公司中任高级职务。参见《战争的根源》，第一七九、二〇〇页。

- [42] 但是，有必要记住蓬皮杜(Pompidou)与罗斯契尔德(Rothschild)集团以及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与什尼德·克鲁索(Schneider-Creusot)集团的个人联系，以及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内各个派别与菲亚特汽车和飞机制造公司、蒙特迪森(Montedison)公司、国家石油公司等互相联系。
- [43]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一六九——一七〇页。
- [44] 因为他们的薪金的多寡允许他们积累资本。
- [45] 唐纳德·金斯莱：《代议制民主》，俄亥俄，一九四四年，引自萨缪尔·布利坦：《保守党政府的财政部》，伦敦，一九六四年，第十九——二十页。
- [46] 布利坦前引著作，第二十、二十三页。这位作者描述他们的背景是这样：即“非商业的中产阶级”，他们“倾向于有小量的私人收入，以投资于政府公债或其他固定利息的公债券”。但同时他又说：“他们不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马克思错误地相信他们已经占据了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就是资本所有主的阶级——布利坦所描述的高级文官的家属，毫无疑问是属于这一阶级的。他显然把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与其经济上处于统治上层的人混淆不分了。我们已经说明了为什么这一上层往往不直接运用其权力的缘故。
- [47] 金·梅瑙：《专家治国论》，巴黎，一九六四年，第五十一页。
- [48] 没有理解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性质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一切改良主义者和新改良主义者，包括那些“心地最善良”的改良主义者在内的主要错误；他们是“超出这一制度”的改良主义的辩护士，他们坚持“反垄断联盟”这一观念。
- [49] 布利坦前引著作，第三十三、五十八、七十六页。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伦敦，一九六九年，第一二〇——一二九页。
- [50] 马克思和恩格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

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九六〇年，第三十九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第四十二页）。

- [51] 证实这一规律的一个很好的例外，是社会立法所创造的劳动监督者提供的，这些监督者的官方活动必然总是会受到限制，因为他们的功能并不能保卫私人财产和私人利润的利益集团，而是侵犯了他们。
- [52] 关于这一问题，见米利班德的著作的整个第七章，这一章中包括有美国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尔教授的下列模范的评论：“我们当代意识形态气候的明显特点就是，‘持异议的’集团，包括劳动集团、政府集团或学院集团，都在设法把他们关于社会变化的建议，加以调节，以便限制现行商业秩序的适应性。”（来源同上，第二一四页）。
- [53] 加尔布雷思：《美国的资本主义：抵消力量的概念》（伦敦，一九五六年），是这种神秘化论点的很好的例子。
- [54] 萨缪尔·布利坦前引著作，第二一六页。
- [55] 来源同上，第二一七页。
- [56] 来源同上，第二一九页。
- [57] “专家们”——而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学家——公开地并含有讽刺意味地承认的代议制民主制这种纯形式特征的程度，在美国选举中“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发展中表现了出来。弗里德里希·波劳克将后者的重要性总结如下：“选举区经常备有候选人的像片和对目前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在那个时候似乎是最可取的，不管它符合社会原则和社会利益的程度有多么微小。这种蛊惑民心的政客的诡计，是以直觉和强调的能力为基础的，因而也可以说是处在手工操作阶段，看来这些诡计要被自动程序的高度合理化的方法来取代了。据认为，选民中的绝大多数只是以纲领式的方式来理解每一个个别问题的，他们不能够判断一个候选人是不是也的确应该得到选民们通过选票在他身上所表达的信任。他们象顾客一样被操纵着，他们那种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自由……可能在个别情况下是存在的，但是这种自由对作为一个集团的消费者来说，则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应用。”（来源同上，第三四五——三四六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58] “纽约图书评论”，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从科尔科(Kolko)论述美国铁路情况的著作中，从马克·格林(Mark Green)的《垄断制造商》

(纽约, 一九七三年)中, 可以发现许多例子。关于这种广泛流传的实践的更早一些的例子, 见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第十四章。

- [59] 一个例子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口号: “社会主义在前进!” 这是在威玛会议的时候专门来说服工人接受理事会骗人的话, 理事会单独就能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到一九一九年一月作到社会主义化。
- [60] 这种准备的理想试验场地, 是“民主政府”的殖民战争, 比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英国在马来亚或北爱尔兰、美国在越南等。
- [61] 在过去的十年, 在西欧半政治性和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和总罢工曲线, 已经上升, 从比利时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的总罢工, 到法国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总罢工, 到意大利一九六九年的群众性罢工, 再到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四年英国矿工的两次罢工。

## 第十六章

### 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意识形态

正象在上升的资本主义胜利进军时，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深信竞争的好处和无限威力那样，衰落资本主义的后卫战斗行动，伴随的是普遍宣称组织起来的优点。<sup>〔1〕</sup>对于这种“组织起来的信念”的最明显的说法，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的那种晚期资本主义的理想，在这个“有组织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有其职位（并保持其职位），与此同时，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管理人员在保证经济能稳步地、持续地增长，把这种增长的利益或多或少“平均地”分给所有的社会阶级，并且缓和经济和社会体系中越来越多的部门对于“纯粹”市场经济的各种反响。“强烈个人主义的工业先驱”被“专家小组”所取代，<sup>〔2〕</sup>而“金融巨头”也被无个性特征的董事会所取代（同时会产生官僚主义的工作人员，有时甚至会产生工会领导人）。深信技术的无限威力，这是晚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显示了现存社会秩序逐步消除一切危机机会的能力、对一切矛盾找出“技术”解决办法的能力和联合各个叛逆的社会阶级的能力以及避免政治爆炸的能力。“工业以后的社会”<sup>〔3〕</sup>这种观念——据认为这种观念的社会结构是由“理性功能”的准则来统治的——也适应这同样的意识形态倾向。在“高级的”知识界，它表现为一种静态的结构主义，这种结构主义继承了黑格尔的总体范畴，但又不是运动范畴，并且采用了所有社会形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有机再生

产的范畴，但又不包括其必然解体的范畴。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事件在法国曾给予这些理论以毁灭性的打击，这并不是偶然的，从那以后，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得到恢复。

尽管这种意识形态有很多种说法，下面考夫勒（Kofler Leo）氏缕列的一些论点，即使不是在“技术理性”的所有建议者共同的，也是在这些建议者的绝大部分中共同的：

“1. 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凝结成为不可战胜势力的一种自主的力量。

2. 对世界的传统观点，在功能思想和行动领域之外构成为‘价值体系’的人和历史，都被压抑而成为毫无意义，或者在公众意识中不再起任何重要的作用。这一个‘反意识形态化’过程是技术理性化的结果，这个结果韦伯尔（Weber Max）在其所著《世界的清醒》中已经预见到了。

3. 不能向现存社会制度提出挑战，因为现存社会制度具有技术上的理性，紧急问题只能由专家的功能处理来加以解决，因此，群众是愿意赞同现有社会秩序的。

4. 生产和消费的技术机制对需要的逐步满足，使普通人更加赞成被合并并处于从属地位。

5. 传统的阶级统治让位给了无个性特征的技术统治，或至少让位给了一种官僚国家，这种国家在集团之间或阶级之间是中立的，并是以技术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党政治变成了肤浅的，与假想对手所作的拳击赛，舍尔斯基（Schelsky）特别强调这一论点。”〔4〕

组织的意识形态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直接反映，资产阶级社会如果没有国家的调节作用是不会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生存下去的。但是，它在前面已经分析的上层建筑各种向工业化发展活动的趋势中，还有更深的根子——和更大的调节作用。〔5〕这些活

动中有许多在今天已经在工业方面组织起来了：它们为市场而生产，其目的是扩大利润。流行艺术、电视电影和录音机工业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一方面的典型的现象。

对于被俘虏的个人来说，看来似乎不可能冲破这座社会监狱，这种被俘个人的整个一生都从属于各种市场规律——不但是在生产领域中（例如在十九世纪），而且也在消费领域、娱乐领域、文化领域、艺术领域、教育领域以及个人关系的领域等。“每日的经验”使得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秩序那不可更改性质的新宿命论意识形态得到了加强并日趋内在化。所剩下的就只是逃避的幻想——通过性欲和药物，这些也都是工业化了的。一度人的命运，似乎是完全预先注定了的。<sup>〔6〕</sup>但是，晚期资本主义在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完全组织起来的社会。它不过是一种组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杂交混合体而已。交换价值与资本主义竞争根本没有废止。这种经济远远不是奠基于人类所需使用价值的计划生产之上。利润的追求和资本增值的追求，仍然是整个经济过程以及不可避免要产生的一切有待解决的矛盾的原动力。在这个私有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结构中，经济由国家指挥、由国家领导只不过是为了临时弥补一下裂缝和暂时延缓一下发生爆炸而已。但是，在这种外观的后面，衰亡正在发展。

对所有的矛盾都加以废止、调解或者压制的论点——一切意识形态的目的——<sup>〔7〕</sup>其本身也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它的客观功能也不过是说服异化了的劳动的受害者，进行反叛是毫无意义的。正因为如此，那就当然无法解释新的、周期性的反叛风暴，除非用心理学上的老生常谈来解释。然而，正象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那样，它不单单是一种“欺骗”，而是它所神秘化的那种现实的一种特殊的、由社会决定的反映。

“技术理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可以作为一种神秘事物揭示出

来，这种神秘事物在四个连续的方面掩盖了社会现实及其种种矛盾。

第一方面，正象考夫勒已经说明的那样，它代表着使抽象事物具体化的一个典型的范例。认为技术万能的所有资产阶级理论家和自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都抬高技术万能，说它是完全独立于人类一切目的和决定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按照自然规律的那种自主方式进行而独立于阶级结构和阶级统治。<sup>〔8〕</sup>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极端重要的、在自然历史与人类历史之间的那种差别，实际上不见了。所以，哈贝尔玛斯(Habermas, Jurgen)同意了盖伦(Gehlen)的这样的论点：劳动手段补足了人类生理上的能力缺陷，但他得出了这样一种错误的结论：“既然人类天性的组织是不变的，而且，我们还必须靠社会劳动和劳动替代物的工具来维持我们的生存，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看到我们怎么会把技术——的确是我们的技术——抛弃掉，而去找在质量上不同的另外一种。”<sup>〔9〕</sup>处在一种感情之后的，是一种天真的或辩解的信念，即只有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技术才能够代替简单体力劳动的不足之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大浪费，成了任何这样一种观点的讽刺，而哈贝尔玛斯当然也不能提供任何证据。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男子和妇女越来越多地从机械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并且逐渐展现了他们的才能，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发展一种能满足“富裕个体”需要的技术，这一直是一个谜。与哈贝尔玛斯形成对比的是，科门诺尔(Commenor, Barry)已经根据化学肥料的误用、洗涤剂的推广和空气污染等例证，有说服力地表明，对环境的这些威胁，并不是由于任何一种“技术上的需要”，而是由于私人利益集团作出的有害的技术决定——从人类利益的角度来看，是有害的。他得出了下面的这种结论：“地球遭到污染，既不是由于人类是某种特别肮脏的动物，也不是由于我们人类的人数过多。错

误在于人类社会——在于这个社会为取得、分配并使用人类劳动从这个星球的资源中挖掘出来的财富所选择的那些作法。一旦这一危机的社会根源被澄清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些适宜的行动来加以解决。”〔10〕阶级利益和现存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的规律（包括竞争的种种规律，这种竞争规律的“意外事件”的总和，在特定市场的任何一个特定时间，产生出最强大的竞争者），在今天，统治着基本的技术决定。在这里，举出其作用的另一个例证就够了。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城市杂乱无章的畸形发展，一直是社会条件的毫不含乎的产物：土地的私有；不动产的投机；城镇计划系统地隶属于私有企业“增长部门”的发展；各项社会服务的普遍的发展不足。这些社会条件远远没有由任何一种技术逻辑加以中止或使之中立化，这些社会条件反过来也决定了技术的发展不足——比如在建筑工业中工业方法的落后——和畸形发展（高层大楼、居住城市等等）。〔11〕

第二方面，“技术理性”这种意识形态是不完备的，因而其内在也是不相连贯的。它根本没有考虑到非理性主义的传播和向迷信、神秘主义和厌世思想等方面的倒退现象，而这些是与晚期资本主义中“技术理性”的所谓胜利相伴而来的。〔12〕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群众的越来越熟练的技术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在工厂命令、经济和国家方面那种僵化了的等级结构，这两者产生出一种实用主义的、辩解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把“专家”的理想化与对“教育”和“文化”的怀疑主义结合了起来。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以对人类那种不可改悔的罪恶和侵略“本性”的“肯定”，取代了对人类可臻完善性的那种天真的信念，而这种天真的信念正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升资产阶级的一个特征。粗糙的新达尔文主义（劳伦茨 Lorenz, Konrad）、深刻的文化和文明的悲观主义以

及对人类的基本厌恶思想，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全面评价，对“技术理性”这种意识形态起到了一种辅助作用。〔13〕

“理性破坏”的幼芽——这最早出现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时期的开端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法西斯或秘密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开花结果的发展。〔14〕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有对真正科学的奉承，有专家的光辉，有对空间旅行的崇拜，非理性主义仍然以种种不同的形式而得到发展。有启发意义的是，非理性主义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现在已经以普遍的规模在传播，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国家大多数仍然是被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统治着的。“较低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现象，比如商业性占星学的大规模发展、算命和麻醉作用等等，也应该以这同样的眼光来对待。〔15〕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进一步灌输这种思想：努力争取成功并机械地屈从于“技术权威”，这往往产生神经上的紧张状态。这样一些行为方式，及其对批判思想或批判意识的消除、对盲目照办和盲目服从的训练，就可能以方便或习惯为理由而创造出接受半法西斯野蛮命令的那些危险的先决条件。〔16〕

第三方面，“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以宣称这种制度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基本的社会经济矛盾的方式，把晚期资本主义给神秘化了。本书是要来设法表明，晚期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作到这一点。事实上，所谓工人阶级向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体化”，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资方不能够在工人所处的那种工作地位上把工人加以“一体化”，并且作为一种“自我实现”的手段给工人提供创造性的而不是异化了的劳动。自从一九六八年法国的五月反叛以来，在欧洲以及在欧洲以外所发生的事件，都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17〕当对资本主义制度怀有认真的、深刻的敌意的那些思想家们宣称，帝国主义国

家的无产阶级在向现存的社会秩序挑战中是软弱无力的时候，他们自己那种悲剧性的错误判断，使他们成了那种庞大的意识形态机器的一个不自觉的齿轮，这种意识形态机器是统治阶级创造来达到这样一种重要目的的，即说服工人阶级，要改变社会是毫无希望的。这种错误判断的根源，在于晚期资本主义的那些“胜利”比较少，更多的是在于对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那种官僚主义堕落的失望，<sup>[18]</sup>还在于错误地估计了无产阶级阶级觉悟衰落的短暂性。在阿多诺（Adorno, Theodor）写下面一段话的时候，那完全是对事实的一种悲剧性的误解：“假革命的姿态是从技术上和军事上讲自发革命的不可能性的补足物，这一点封·开姆普斯基（Von Kempster, Jürgen）在多年以前就指出过了。用街垒来反对控制着炸弹的那些人，那是滑稽可笑的；所以说，人们是在玩街垒，而主人们暂时让玩街垒的人任意玩。”<sup>[19]</sup>阿多诺没有理解，“军事技术”并不能独立地应用于参加了社会活动的活着的人们。最终分析起来，奥斯威辛（Auschwitz）和广岛的悲剧并不是技术的产物，而是各种社会势力的各种关系的产物——换句话说，这种悲剧是一九一七年之后国际无产阶级有历史意义的大失败的（临时的）界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面和大规模的消灭，在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内是不再可能的了。越南战争表明，“主人们”可以调度的并不是“军事技术”，而是美国人民对于限制了武器类型的那种战争的越来越大的反抗。与此同时，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学生“玩”的那些街垒，引起了一千万工人、雇员和技师的一次群众性大罢工，并且反过来也证明了，即使某种政治和社会势力有某种平衡，在大街上使用杀人的镇压手段也变得是不可能或不可行的了。根据这些经验，可以断言，被统治者的群众性的反抗或群众性的反叛，只能由于统治者的暂时容忍才能爆发，这种断言不仅仅不符合历史事实地使统治者的权力绝对化了，而

且还客观上协助这些统治者来说服被统治者，被统治者没有力量进行激进的反叛，因而激进的反叛也就是毫无用处的。在今天，资方所控制的统治工具中最为有效的工具，正是这样的信念——而不是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sup>[20]</sup>

拜倒于技术偶像前的那些哲学家们，过高估计了晚期资本主义作到与工人一体化的能力的那些哲学家们，当他们设法证明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作任何群众反抗是毫无希望的时候，他们典型地忘记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那种基本矛盾，而正是这种基本矛盾撕裂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些哲学家们在下面这个事实上制造了很大的混乱：资方成功地把“一切东西”都转变成了商品，其中包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这种情况无疑是正确的：出版商对他们的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是“迟钝的”，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文献大量发行的越来越多的利润中，看出了做好生意的机会，但是无论是谁，如果他认为这种现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一体化”进了“商品世界”，那么，他就是拒绝看到这种情况：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和个别的消费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特殊使用价值所持的态度，根本就不是“没有价值的”或“中立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大量传播——即使是通过市场——最终意味着反资本主义意识的大规模形成（或提高）。以这样的方式变成为商品的意识形态产品，有失掉其作为巩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功能的危险，这是由于所出售使用价值性质的缘故。

“意识形态一体化过程”矛盾性质的最新近的例证，是由这种情况提供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国家工业对环境所产生的危险性。从商品和价值的生产角度来看，这种发展可以毫无疑问地为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开辟新的市场，一个完整的“生态学工业”现在正处在露头的过程中。<sup>[21]</sup>但是，如果只是感觉到了问题的眼前这一个方面，而没有同时也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对环境产

生威胁的性质的系统解释——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一种影响，这种影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是不可能克服掉的——可以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强大的武器（不仅仅是在“抽象理论”的领域之内，而且也作为一种“刺激行动”和群众性的动员），那么，这就是以盲目的态度来对待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复杂性的。

这就使我们来谈谈第四方面，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在这个方面，可以认为“技术理性”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神秘的事物”。

卢卡克斯在韦伯尔之后发展了这种资本主义理性的观念，<sup>[22]</sup>这种观念事实上是部分理性与全面非理性的一种矛盾混合体。<sup>[23]</sup>因为，由商品生产普遍化所产生出来的对于经济过程精确计算和精确确定数量的压力，是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这道不可逾越的障碍的，是反对竞争的，也是反对要精确确定实际包含在商品生产中的社会必需劳动量作为结果的不可能性的。

这一矛盾在下面这种事实中也有所表现：企业家以“合理计算”为基础所采取的微观经济措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与这些计算相冲突的宏观经济结果。每一次投资激增都会导致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资本积累的任何一次加速，最终都会导致资本的贬值。企业家以压低生产成本的方法来提高“他的”利润率的每一个企图，最终都会导致平均利润率的降低。如果经济理性最终被当作一种劳动时间的节省<sup>[24]</sup>——节省人的劳动力——那么，资本主义在部分理性与全面非理性之间的固有的矛盾，就会在下面这个悖论中重新出现：在工厂或公司中强迫节省最大量的人类劳动力，就会导致整个社会人类劳动力的越来越多的浪费。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的真正偶像，就是对任何全面的来龙去脉都是盲目态度的“专家”；这种技术专长在哲学上的对立面，就是新实证主义。

哥迪利尔(Godelier, Maurice)对于兰格(Lange, Oskar)和其他

一些著作家的批评，肯定是正确的，他批评他们把导源于韦伯尔的“经济理性”观念给绝对化了，并批评他们要求从经济和社会具体结构中抽象出来的“理性行为”具有普遍有效的规律。<sup>[25]</sup>然而，哥迪利尔这么作是错误的：他规避了整个经济理性的问题，其方式是替换了“全面的社会理性”这一观念——这在每一种社会秩序中都不同而且是取决于其特殊结构的。<sup>[26]</sup>有关满足人类合理需要和个人最适宜自我发展条件的劳动生产力准则，为不同的社会制度进行比较提供了一种完全适用的尺度；的确，如果没有这种尺度的话，人类进程观念就失掉了任何物质的基础。归根结蒂，资本主义那部分理性与全面非理性之间的矛盾，忽略了资本最大限度增值与男子、妇女最适宜自我实现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一书中进行了巧妙的分析，毫无疑问，其中包含有目的论的尺度，因为，人类的行动往往是有目的的。<sup>[27]</sup>部分理性与全面非理性之间的对立，在这样两种计算类型之间的矛盾中被固定下来了——最大限度的节约手段与所达到的最适宜的结果。在今天，交换价值手段的自主是成功的。部分理性往往包含着为了个别公司有利可图的各种已付经济资源的最好的联合。因此，它排除了“没有价格（或价格很低）”的一切东西。当然，即使就纯经济而论，它也远远低于“成本”和“利润”的社会“普遍化”。<sup>[28]</sup>关于部分理性与全面非理性之间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矛盾，表达得最清楚的，莫过于美国军火生产中“日趋增长的经济效果和武器效能”这一观念了——换句话说，就是用“节省人类劳动”的最大的可能性，来努力组织人类集体的核自杀。接受这种任务委托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舍若尔（Scherer, Frederick）已经作出了这种悲哀的自白：“这本书的一种基本的政策前提，更直接地困扰着我：在先进武器发展和生产计划的行动中，功效是一个可望得到的目标。是否真是如此，还根本没有

确定。获得武器的进展也许已经过于有效了。可以肯定，也有一些是能效很差的。但是，尽管有这些差的，这种过程已经为人类自我毁灭而给予人类的力量过于大了。……我相信，这种军备竞赛继续下去的话，由于偶然性、逐步升级、计算错误或疯狂等而冒核战争的那种已经很严重的危险性，不会减少而很可能会增加。……提高武器获得过程的效能，肯定不会有用，而且，由于使我们对武器计划所要求的经济牺牲的敏感性迟钝了，这将能够削弱那些决策者的发展计划和更具有远见卓识的普通公民的发展计划。”〔29〕说了这些话之后，这同一作者继续他那四百页的书，内容是关于在大规模毁灭武器的生产和获取方面的“经济效果”。

对技术崇拜意识形态的限制不能与晚期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非理性相提并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有典型意义的那种市场无政府主义与国家干预论的混杂结合，确实倾向于腐蚀传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某些主要基础，而不用具有相当力量的任何一种基本东西来取代那些基础。一个以私有商品所有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使得同等级位的两者之间的经济契约成了这种社会整个法律制度的中心。〔30〕出自契约形式上平等的那些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概念，会影响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每一个领域。受私有商品所有主之间的经济契约调节的那些关系，也与早期出自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社会的那些限制地位的关系结合在一起（即出于封建生产方式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种种关系）。关于后者的意识形态，其基础在于特殊集团的“特殊权力”的原则，而不是形式上平等的那种原则。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特征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商品关系与前资本主义的主仆关系并列：臭名昭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南非尼德兰泽·荷伏尔姆德·克尔克（Nederlandse Hervormde Kerk）把耶稣教教义按照种族隔离法所保证的物质剥削制度，转化成为一种维护白种人“特权”的全面的意识形态。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和垄断集团对经济生活干预的规模，使得商品所有主那种形式上的平等，越来越变成空虚的了。于是，特殊所有主集团的“特权”就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有契约加以维护，或者在实际上被容忍了。<sup>[31]</sup>国家补助和保证利润的制度，从外表来看，似乎与工人阶级通过斗争赢得的福利措施，在形式上相似或部分相似。这样一来，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传统特征的法律准则，就逐渐被颠倒了。在十九世纪，普通资本家理所当然地尊重法律，那是为了和平秩序、安静以及其自身的商业利益，而二十世纪的普通资本家，即使不是在实际上违犯法律，也是越来越生活在法律的边缘上。在现在，这被认为是不可更改的了。<sup>[32]</sup>在经济方面，法律条例数量的绝对增长，使这种演变实际上变成不可避免的了。<sup>[33]</sup>

在今天，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度膨胀，给每一个公民导致了沉重的赋税负担（也就是给每一个商品所有主），对于这些公民（或商品所有主），“总收入”这一范畴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资本家或资本主义公司在赋税方面所支付的，不能够直接由他们积累成为资本，即使是国家国库收入的相当一大部分，“最终”也以国家合同或国家补助的形式，又流回到他们中去，这样给还他们的数目，还要大于他们付出的数目。偷税、漏税成了资本主义公司的一种艺术技巧。今后的经院经济学家们对于漏税的“权利”，可以心照不宣；公共财政方面的学术论文一再地辩论这样的问题，过高的直接税率是反生产的，因为这种税率被漏税现象的或多或少的增加给中立化了。<sup>[34]</sup>这样一来，市场无政府主义与国家干预论的奇妙结合，就被忠实地反映在晚期资本主义公司的各种实践中了：它们二者都设法使它们缴出的税款越少越好，并且希望国家与它们签订更多的契约、供给它们更多的补助和有保障的利润，而这些预测了国家税收的快速增长。这样一种矛盾关系充满了整

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它重新产生了行为、思想和道德的各种形式，来支撑在一个腐朽的商品生产社会中的资本增值，而这些形式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或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很典型的。有一种形式上法律平等和法律上或实际上不平等（限于阶层的特权）的混杂体不但在各种经济势力商品所有主的心理观念方面，而也在这些商品所有主的实际关系中，发展了起来，这种发展揭示出了古典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经历的一些变化。由水门事件和田中角荣事件——这些现象曾经与资本主义的早期或与“不发达国家”联系在一起——暴露出来的在最先进工业国家上层政客中这些极端的腐朽形式的新的发展和普遍化，充分证实了这样一种转化。其中有不少甚至还被官僚主义者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或合法的。例如，美国国内税务署曾允许一些公司把作为“通常的、必要的商业花费”而付给外国官员的贿赂扣除。<sup>[35]</sup>

因此，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性，可以从晚期资本主义基础结构的一些特征中推断出来。这些意识形态在文化史中的根源和特点，我们决不能否认。但是，如果我们对它们加以探索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些意识形态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又具有了重要意义，而这个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是它们在十九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或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在“古典的”帝国主义时代，是从来不知道的，这一点仍有待于进一步说明。

※            ※            ※

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理论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代表人物，就象那些最有洞察力的资产阶级著作家那样，没有理解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的动力。因之，他们就得出了这样的错误结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已经越来越少了。较巴兰和斯威茨的情况更甚的是，这对于意识形态作用这一学派的著作家说来，是一个

问题,而不单单是一个理论上的错误。因为,这些理论家们——他们都属于各“官方的”共产党——的主要意图,是要维护这样一种论点: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并不是资方与劳方之间的矛盾(资方与所有反资本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世界阵营”之间的矛盾。于是,这种“主要矛盾”的功能,就是削弱“资本主义世界阵营”的内在矛盾(方法是强迫垄断资本来“自我适应”),直到这样一个伟大的日子到来,即“社会主义阵营”的平均劳动生产力(或平均生活水平,或按人口的平均生产)超过了“资本主义阵营”,而且,西方世界的广大群众在这一成就的影响下,都变得转向了社会主义。<sup>[36]</sup>

追踪这种概念的根源,并不困难:它是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列宁关于在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与隔离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端之间的关系这种概念的否定。<sup>[37]</sup>这种概念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也同样是很明显的:它的设计是用来证实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是附属苏维埃官僚主义的外交花招的,并且是用来以一种“反垄断主义联盟”那局限于民主要求的一种斗争来取代反资本主义的过渡要求的。<sup>[38]</sup>帝国主义时代,按照列宁的意见,对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是“腐朽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唯一能证明这一政策正确的,可能是这种“腐朽性”已经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缓慢能力所取代,以解除其各种矛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功能,将能证明情况确系如此。

这种公式本身就是导源于列宁的,列宁基本上是用它来描述德意志帝国的战时经济的,这见于列宁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一些著作中。在列宁的一生中,它没有用之于共产国际的纲领性文件中,尽管它确实在他为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九年纲领的第二次草稿中出现过。<sup>[39]</sup>反对这一公式的意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这一概念原本是列宁提出以描述一九一四——

一九一九年间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这一概念在当前的使用，其意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从来都没有新的阶段。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或者最早是从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的大危机以来），这恰恰是个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是有必要加以说明的。第二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公式夸大地侧重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方面，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现阶段的基本特征，应该用资本本身的内在逻辑来加以解释，而不应该用国家的作用来加以解释。

当然，如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公式得到了对晚期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支持的话，那么，这些反对意见就都是次要的。如果不同的公式的内容是相同的，那么，对不同公式的争论就会是毫无意义的。在这里，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理论加以批判，是必要的，这并不是由于它的名字，而是由于它的实质。这种批判决不会由于下面这种事实而更容易一些，这个事实就是这一理论有许许多多的变种。在这里，我们将只讨论其中的三种：即苏联、德国和法国等的三种作法。

维克多·切普拉科夫 (Victor Cheprakov) 的著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过是五十年代以来在苏联出版的长长一连串官方专题论文中的最后的一篇，这是在原本出自瓦尔加的一个论点的鼓励之下写出来的。<sup>[41]</sup> 这部著作缺乏科学的准确性而且理论上模糊不清，这就是它抛弃一切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价值所在。切普拉科夫随心所欲地宣称，每一种趋势都会产生它的反趋势，但是于此同时，他又完全无视任何主要发展方向的存在（这种主要发展方向是取决于有关过程各种矛盾的内在逻辑）。这样一来，切普拉科夫一方面看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种固有矛盾的产物，而同时在另外一方面，他又认为它是垄断资本主义对“各种势力的新关系”的一种反应（资产阶级在国际方面和国内

方面的削弱和反资本主义势力的加强)。<sup>[42]</sup>同样,在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就包含有国家机器与垄断集团之间的有机熔合之义,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在另外一方面,这同一种国家机器却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自主”,而且,它与垄断资本家集团之间,还存在“一些矛盾”。<sup>[43]</sup>有的时候,“在一方面——在另外一方面”这种明智的折衷主义,将会在一个简单的句子中被发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其总危机和崩溃时期,就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在这时候,为了扩大垄断资本的再生产,从而为了达到对剩余利润的新的垄断,垄断集团与国家的熔合,已经成为必要的了。”<sup>[44]</sup>帝国主义的垮台在其扩大再生产和新的剩余利润的完成中,有所表现,这种垮台是诡辩术的一个小小的杰作。

切普拉科夫的基本论点是这样: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功能是积累,或者说,扩大再生产<sup>[45]</sup>与他那很多的次要看法是不能调和的,这些次要看法比如有: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不取消其内容。归根结蒂,这不过是在假马克思主义词藻掩盖下,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这一要求的重复而已:国家干预和国家计划“基本上”消除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竞争。但是,在下面两者之间的区别方面,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一方面是表达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大垄断公司的私人积累是越来越不可缺少的一种工具(一种加速器),另一方面则声称,在资本积累方面确实起到主要作用的是国家本身,而不是这些垄断集团。

切普拉科夫的这种折衷主义的各种矛盾,集中地表现在他从他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进行的分析所得出的战略结论中。他一方面宣称:“当前的帝国主义使得无产阶级群众不仅仅是面对着孤立的企业家,而且越来越多地面对着整个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执行垄断集团的政策,工人阶级就与国家机器发生了直接的冲突。”<sup>[46]</sup>但是在另外的地方,他又坚定地写道:“垄

断资本主义之转变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越来越导致垄断集团与资产阶级中非垄断阶层的分离。”〔47〕而且尤有进者，“民主势力本身的任务，就是从垄断集团手里夺取作为调节国家手段的（经济）管理权，而且，一旦这种管理权经过转化之后，再利用这种管理权来反对垄断集团。”〔48〕其论证最终导致这样一种煽动性的号召：“民主的纲领要求国家干预以限制（1）垄断资本处理生产手段的自由权利，并且保证工人阶级参预（1）对企业的管理。”〔49〕

切普拉科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在这里毫不含糊地都讲出来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已经与垄断集团熔合成了一体，那么，它怎么会能突然来“剥夺垄断集团的权力”呢？国家对经济管理的目的就是保证垄断集团的剩余利润，那么，它怎么会能“限制”资本家对生产手段处理的权力呢？一种经济怎么会同时被“引导”来满足需要并追逐利润呢？在资产阶级中，准备放弃他们追逐私有利润的那个神秘的非垄断化阶层在什么地方呢？〔50〕或者说，以“联合反垄断联盟”为借口、可能也要使工人阶级服从的那个目的，是不是符合“善良”资本家那种赚取利润的心思呢？

切普拉科夫不过是重复了一些陈词滥调，与他相对比的话，东德的著作家龚德尔(Gundel)、海因宁格尔、赫斯(Hess)和齐尚(Zieschang)在他们的著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中，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真实的情况。除了其他情况之外，他们考虑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国家运用的资本的动员形式（切普拉科夫把这一点与资本积累和资本增值混为一谈了）、考虑了长期军备和经济计划对竞争和利润率所发生的各种反响。〔51〕但是与此同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修正主义倾向，也被这些理论家发展得比切普拉科夫更清楚、表达得更明白。我们引用三节就足够了：

“对于各种反垄断势力来说，在为了反对垄断集团的经济和

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中,对(国家支出)所采取形式所发生的影响,是最为重要的目的之一。尽管国家支出协助垄断集团维护他们的权利,但与此同时,现实也表明,这一种支出的增长把他们驱赶到了歌德(Goethe Wolfgang)的巫师徒弟所处的地位,这个徒弟最终无法摆脱他所乞灵的那些神灵。”〔52〕再:“由国家干预造成对金融寡头政治权力的这种支援,同时也给反垄断势力提供了影响到生产(↓)、分配和经济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国家——在这里有金融寡头的这种新的垄断形式所造成的缺点——并不单单是一种器官,这种器官与资本拴在一起并受资本的统治,比如说就象一个垄断企业那样。作为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一种工具,帝国主义国家还包括着全面的社会面貌(由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这些社会面貌必须得到更大的注意〔原文如此〕),因而不仅仅是垄断势力的唯一的器官。正象不同的利益集团那样,政治和经济群集和势力集团在其活动中都有所表现……所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为反垄断势力创造了种种的新的可能性,以影响国家垄断政策。”最后:“与此同时,由于国家支出代表着庞大的国家资本(?)或社会资本的最高的、最终的形式,工人阶级及其众多的联盟和组织,根据其自身的立场,具有真正的、客观的机会来影响国家支出及其所采取的形式。”〔53〕

国家支出不能被描述为资本(肯定不能被描述为国家资本),这一事实是勿需证明的。如果国家负担了私人企业主的损失,或给予私人企业主补助以助成垄断利润,那么,它并没有使任何“国家资本”增值,而是耗费了一些国家岁入来使私人资本增值。把国家支出总额作为资本提供出来(而实际上这些国家支出中的大部分都是再分配的剩余价值,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作为税收而消费掉的),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与巴兰和斯威茨在计算他们那“剩余价值”时所犯的错误,是相类似的。但是,工人阶级怎么

能取得对“资方”（即使是国家资本）按照“其本身的立场”“所采取的形式”的影响力呢？难道这种立场恰恰包含着以强制压低剩余价值率的办法来使资本增值，不是更加困难了吗？资本主义经济不按照资本增值的规律办事，而按照其他规律办事，那可能吗？垄断集团要求国家条例来保证他们的利润，而工人阶级仍可以使用同样的国家垄断条例（在同样的国家机器中，也就是不必事先推翻这种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工人阶级的国家），但其目标却与垄断集团利益截然相反，这两者能相提并论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结构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个结构，在这种理论中都不见了——这正象在“庸俗的”改良主义理论中那样。

东德的这些著作家们在他们那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所列出的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很正确的：“现在出现的紧迫的问题，是新的经济关系的影响，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发展的那些探索中所描述的新表现和新联系的影响。要提出这一问题，当然就得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当前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问题。”〔54〕但是，在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之后，他们并没有给予任何解答。的确，他们甚至没有冒险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发展”可能加深这些矛盾，这是切普拉科夫一再宣称的一个发现，但他并没有给这一发现提出任何理由。由于他们把自己局限在下面的那些印象主义的观点之中，那么，他们怎么会能得出这种结论呢？“而且，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我们可以指望国民收入的相对的迅速增长。”〔55〕（归根结蒂？永远？不受增值和实现的困难的支配？）。东德的另外一位经济学家阿尔夫莱德·列姆尼茨（Alfred Lemnitz）说得更为明白：“随着国家垄断节制的增长，在经济规律（比如价值规律）的作用中会出现某种变化的倾向。”〔56〕他继续说道：“国家垄断控制的主要目的，是从内部稳定资本主义制

度（保证迅速地扩大再生产，同时保持一种高水平的就业并加速经济中的结构变化，这种结构变化是在技术革命的过程中出现的，由于竞争的日趋激烈而使之成为必要），这种国家垄断控制在个别国家之间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平衡发展中，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57〕但是，全部的问题恰恰就是国家——“国家垄断控制”——是不是能保证高水平的就业、是不是能加速经济中的结构变化，归根结蒂。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由保尔·波卡拉(Paul Boccard)主编，法国一些共产主义者经济学家的一部论文集，名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部著作不仅内容包罗宏富，而且是迄今探讨这一主题在理论上最精炼、最严肃的一部著作。〔58〕与此同时，这部法国著作较之它那东德或俄国的类似著作，其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理论的辩护作用，更具有独创性；在这里，它是专门来证明法国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法国共产党主张，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一个“先进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59〕

这些法国共产党作家们在这部书中提出很多有趣的分析，其中包括独立自主、积累过度、通货膨胀、计划技术的意识形态含意以及生产力的国际主义化。但是，他们完全忽略了晚期资本主义的中心特点——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所有矛盾的发展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危机。由于他们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一种“客观的适应”，〔60〕而且还由于他们希望把这种“适应”在“先进的民主主义”阶段转变得对工人阶级有利，他们对下面一种事实丧失了任何真正的意识：对劳动力的剥削，其根源恰恰就在这些生产关系。〔61〕怎样把这种剥削驱赶掉而不用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这仍然是一个谜。〔62〕

还应该强调的是，波卡拉及其同事们似乎忽视了马克思关于

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整个基础：那就是，资本主义（不论是“自由的”或是“垄断的”、是早期的或晚期的资本主义）是在商品普遍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这部巨大的论文集中，商品生产的各种矛盾，完全居于次要的地位；在主题为“剥夺垄断集团的权力”这一部分中，商品生产的那些矛盾，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sup>[63]</sup>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先进的民主主义”阶段，仍然完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度之内。此外，一个彻底的商品生产马克思主义集团将会很不愉快地责备这些法国共产党著作家，因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这一观念当然已经被提高为对苏联官僚主义统治辩解的主要依据。

## 注 释

- [1] 这些过程决不是“不证自明的”并且自然而然被接受的，这一事实甚至用语言的历史也可加以说明。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从属性，与由大资本所控制的机器的从属性，都同样与“人的天性”不相适应。仍然从事自然经济的农民们的那种被凌辱的呼声，到十九世纪也还有共鸣：商品贸易与盗窃和欺诈是同意语。今天的组织者和计划者正象那个时候的商人一样，被看作是骗子。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组织”与“盗窃”之间的识别问题（这导源于战时经济和监牢营），在通常的用法中顽强地在坚持进行，在这里，“计划”仍然与“浪费”是等同的。例如参见扎恩前引著作之第七十二页以下。
- [2] 加尔布雷思的《新的工业国家》及其对“技术专体制”万能的信念，是这一概念的原始模型。
- [3] 参见但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工业以后社会的到来》，纽约，一九七三年。
- [4] 考夫勒前引著作，第七十四页。
- [5] 参见本书第十二章。
- [6] 见赫伯特·马丘斯 (Herbert Marcuse) 《一维的人》，伦敦，一九六四年，尤其其中第六和第七两章。

- [7] 但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格伦科，一九六〇年）中，似乎是第一个提出这一概念。
- [8] 这一虚伪而又具体化的技术概念，可以追溯到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一二六、一三一、一四八——一五〇诸页），并且老早就被卢卡克斯批判过。马丘斯在《一维的人》中非常接近于提出一种类似的科学具体化概念。
- [9] 哈贝尔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知识》，法兰克福，一九六九年，第五十六——五十七页。
- [10] 巴利·科门诺尔《最终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伦敦，一九七二年，第一七八页。
- [11]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例如对城市计划问题进行过深入探索的亨利·莱菲夫列（Henri Lefebvrl）等，都是技术统治和专门知识盲目信仰的激烈反对者。参见其所著《向控制人类方向发展》，巴黎，一九七一年；也见卡斯特曼（Casterman）《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巴黎，一九七二年。
- [12] 关于这一问题，考夫勒也提供了一个出色的分析研究（见上引他们著作的第六十四——六十五页以及其他地方）。对比之下，他并没有讨论“技术理性”这一意识形态其他的两个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方面，而这是我们在下面要进行讨论的。
- [13] 很明显，人类在今天正在经历着原子的毁灭，在原子毁灭的阴影之下的生活，给日趋播散的致命的非理性主义提供了特殊肥沃的土地。
- [14] 参见卢卡克斯《理性的破坏》，纽维德，一九六二年。
- [15] 在这里，大规模的心理挫败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心理上的挫败是消费满足以消费的系统教导所引起的——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么，持久的消费增长就会是不可能的。
- [16] 见米尔格拉姆教授（Prof. Milgram）的那些令人生畏的试验：《服从上级》，伦敦，一九七四年。
- [17] 这一问题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还要进一步讨论。
- [18] 统治的意识形态在其对东方集团的评价中，徘徊于“极权主义理论”与“集中理论”之间，实际上使其本身适合于占优势的“冷战”的“需要”，换句话说，就是适于资本的需要。
- [19] 西奥多·阿多诺《理论与实践》，载《标语——危机模型（二）》，法兰

- 克福，一九六九年，第一八一页。
- [20] 法兰克福学派争取要达到的那个死目标（在这个目标中，赫伯特·马丘斯也发现他自己处在法国五月事件的面前），是这样一种论点的直接结果，这一论点就是，一体化了的工人阶级，最终不能够有社会觉悟和社会行动。这一问题我们在《列宁与无产阶级阶级觉悟问题》中已经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该文收在这个集子中：《列宁、革命和政治》，法兰克福，一九七〇年。
- [21] 见詹姆斯·利奇微《政治学与生态学》，纽约，一九七〇年。
- [22] 卢卡克斯《历史与阶级觉悟》，第八十八页以下。
- [23] 卢卡克斯与他的许多弟子不同，他肯定是理解这一点的。“很明显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结构要依靠下面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受所有个别现象的严格规律约束的一种需要，另一方面是整个过程的相对的非理性”；《历史与阶级觉悟》，第一〇二页。但是，有时候他也使这种“相对的非理性”主要指生产过剩的危机。
- [24] “真正的经济——节约——在于节约劳动时间；即最低限度的、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生产成本；但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所以决不是放弃享受，而是要发展生产底力量和能力；因此既要发展享受底能力，又要发展享受底手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英文版第七一一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三六四页）。
- [25] 毛利斯·哥迪利尔《经济学中的理性与非理性》，伦敦，一九七二年，第十五——二十四页。哥迪利尔的论辩是反驳奥斯卡·兰格的这一著作的：《政治经济学》，牛津，一九六三年。
- [26] 哥迪利尔前引著作第二九一页。
- [27] 比如参见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四八七——四八八页。
- [28] 早在一九三六年，厄尔斯特·布劳赫（Ernst Bloch）就预见到了当代对“技术理性”的讨论，他那时写道：“正象要知布丁之味就得吃一吃，检验理论就得实践那样，由数学使之成为可能的技术实践，在证实这一领域中的资产阶级计算方面，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技术也使事故的数目增加了，而且，从方法学来看，一次技术事故相当于一次经济危机——那就是说，数学计算也以抽象的一种方

式而不是以具体的物质媒介方式而与其目的有关联。”《物质问题的历史与实质》，法兰克福，一九七二年，第四三三——四三四页。也见《根本的希望》，法兰克福，一九五九年，第八一一页，在这里，技术事故和经济危机上溯到了“人与其行动物质实体的那种难于调整的抽象关系。”

- [29] 舍若尔《武器的取得过程：经济的刺激》，波士顿，一九六四年，第Ⅴ、Ⅹ页。
- [30] 巴苏卡尼 (E. B. Pasukanis) 《权利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巴黎，一九七〇年，第一一〇——一一一页。
- [31] 希法亭早在一九一四年就已经察觉到了这一发展，见《国家政权组织》载“新时代”，卷32/2，第一四〇页以下。
- [32] “以能满足当代那种经过发展了的天理良心为条件来判断”“正确”与“错误”的那种商业，根本不能生存下来。我们不能期望任何一家公司会为社会利益而服务，除非也同时服务于它的自身利益，或是由于对利润的期望，或是由于要避免惩罚。……即使是法律的强制性，就共同思想而言，也常常被作为在政府与公司之间的争夺中的一种因素，而不是“正确”与“错误”的一种描述。联邦贸易委员会、粮食局和药物局以及其他政府机构中，充满着那些可敬的（1）公司的纪录，这些公司当它们认为它们可以摆脱掉法律的时候，它们就毫不犹豫地去破坏法律或者滥用法律。甚至公司的经理期望着要被破获，如果他们经过计算，他们最终必须偿付的罚款额，只占他们因违犯法律而同时能够获取的利润的一部分的话，他们也要违犯法律，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少见的。”阿伯特·卡尔，《行政部门存有天良吗？》，载“哈佛商业评论”，一九七〇年七——八月号，第六十三页。（重点系著者所加）。也见路易斯·芬克尔斯坦因 (Louis Finkelstein) 《商人道德的失败》，载“幸福”，一九五八年九月号。
- [33] “商业周刊”一九七二年三月第十八期上，刊载了一篇文章，文章说明了为什么国家立法活动的大规模增长和公司生产的越来越大的差异性，使得每一家大公司对国家发生直接影响，成为必不可少的原因。这同一篇文章还强调，这种影响的施加，并不单单是通过职业方面的疏通，而且也通过公司首脑本人的直接干预。
- [34] 参见赖特·米尔斯 (Wright Mills) 前引著作第三四三页以下。也见

夫利德·库克《腐败的土地》，伦敦，一九六七年。

[35] 罗伯特·英格勒(Robert Engler)《石油政治学》，第四五七页。

[36]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宣称：“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现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站在现时代的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苏联共产党新纲领》，载阿萨·门德尔(Arthur P. Mendel) (编)：《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纽约，一九六五年，第三七二——三七三页（中译本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六一年，第一六五页）。另外：“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取得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它的主要成果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胜利了的社会主义以自己的榜样正在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者的思想革命化，鼓舞他们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大大地改善这种斗争的条件。”来源同上，第三九七页（中译本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版本同上，第一九〇页）。最后：“在最近十年（一九六一——一九七〇年）里，苏联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时，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将超过最强大、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来源同上，第四二二页（中译本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版本同上，第二一六页）。“这样一来，苏联将成为具有世界上最短的、同时生产效率最高的和报酬最高的工作日的国家。”来源同上，第九十七页（页码疑有误——译者（中译本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版本同上，第二四一页））。

[37] 关于这一个问题，列宁有很多个声明：“我们维护的不是大国主义（俄国遗留下来的除了大俄罗斯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不是民族利益，我们肯定地说，社会主义的利益，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列宁全集》，英文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七八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第二十七卷，第三五一页）。“那时我们知道，只有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的胜利才会巩固，因为我们开始我们的事业时，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

- 革命上的。”《列宁全集》，英文版，第三十一卷，第三九七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第三十一卷，第三五八页）。
- [38] 这不是讨论下面这一问题的地方：在帝国主义时期各帝国主义国家民主的和过渡的需求之间的关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对民主自由的任何剥夺，并且要求扩大这些民主自由。但是，他们也向工人们阐明，真正的、有意义的民主，如果不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国家，那是不可能作到的，而且，只有在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结构中才能作到。他们尤其将坚决反对任何这样的倾向，即将工人从反资本主义阶级目标的斗争中拉回来，其借口是这一斗争的时机“尚未成熟”、“跳越了”“民主的阶段”或“危及了”“反垄断联盟”。这一倾向涣散了工人阶级并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
- [39] 《列宁全集》，英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二二页。
- [40] 伍尔诺尔·皮特罗夫斯基（Werner Petrowsky）对这一理论的连续变体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分析。见其论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发展》，载“阶级斗争问题”，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第一期，第一二五页以下。
- [41] 维克多·切普拉科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莫斯科，一九六九年；库辛年（V. Kuusinen）（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莫斯科，一九六一年，第三二一页。
- [42] 切普拉科夫上引著作，第十五、十六——十八页。
- [43] 出处同上，第十六、九十六、一一九、一二〇、四二八页。
- [44] 出处同上，第十七页。
- [45] 出处同上，第十五页。
- [46] 出处同上，第四二七页。
- [47] 出处同上，第四二七页。
- [48] 出处同上，第四六〇页。
- [49] 出处同上，第四六〇页。
- [50] 如果想到切普拉科夫在另外一个地方强调说：“对‘自由放任’的紧靠更甚于对垄断紧靠的这些非垄断阶层，基本上是反革命的”，那么，切普拉科夫的论据的矛盾，就变得更加显眼了。
- [51] 鲁迪·龚德尔、豪斯特·海因宁格尔、彼得·赫斯和库尔特·齐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柏林，一九六七年，第十七页。

- [52] 出处同上，第四十页。
- [53] 出处同上，第五十页。
- [54] 出处同上，第三一七页。
- [55] 出处同上，第三二六页。
- [56] 阿尔夫莱德·列姆尼茨《西德的联邦共和国——一个垄断的国家》，第十一卷，一九六四年，第九十一页。
- [57] 出处同上，第三五一页。
- [58] 保尔·波卡拉（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两卷本），巴黎，一九六九年。
- [59] 出处同上，第一卷，第一八五——一九二页，第二卷，第三八八——四四〇页。
- [60] 出处同上，第一卷，第一五七——一五九页、一八三页。罗吉尔·加罗迪 (Roger Garaudy) 《社会主义的转折点》，伦敦，一九七〇年。加罗迪在此书中提供了一个类似的观点。
- [61] 波卡拉及其著作家同事们在谈到“异样的”（原文如此）生产关系时（第一卷，第九一页、第二卷第三四二、三六三——三六七页），很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这么一种事实：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立场来看，这不但是修正主义的概念，而且还是个毫无意义的概念。经济的发挥作用，不能够同时既按照竞争规律和从此中产生的积累压力，又按照满足需要所产生的质量方面不同的规律。
- [62] 在这一方面，切普拉科克是比较诚实的。他坦率地表明，“一般的民主转化，并不能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上引著作第四五六页）。在波卡拉及其同志方面，他们承认：“在现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现在的形式，把整个社会掩盖在一个结构之中，在这个结构中，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关联着的。”（前引著作第一卷，第一八一页）。完全不可理解的是，垄断资本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会能“被剥夺了权力”——如果不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话。
- [63] 商品经济问题只是在与货币和通货膨胀问题有关的情况下才被分析的（前引著作第一卷第三九〇——四〇一页）。在讨论“先进的民主主义”时，并没有提到它。确实如此，一种“合理的生产组织”通过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国有化，轻而易举地宣布为可能的（出处同上，第二卷第三六一页）。

## 第十七章

### 晚期资本主义概说

现在出现的，是下述的问题。资本本身的发展规律怎样来说明私人和国家控制经济的越来越多的那些企图呢？怎样来说明这种控制的最高限度呢——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矛盾之不能克服呢？换句话说：“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普遍化商品生产之间的连环应该怎样来说明并加以分析呢？

截止目前为止，试图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说明——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总的失败原因，可以说就是由于忽略了这一连环——换句话说，就是不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于股份公司的那个著名的公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在现象上，它也是作为这样的一个矛盾来表现。它在一定部门内形成了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在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的形式上，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寄生虫，并由公司的创立、股票的发行和股票的买卖，引出了一整个体系的欺骗和诈欺。那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统制的私有的生产。”〔1〕同样，马克思还说：“信用制度所以会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不过因为性质上本来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拉紧到了最极端的限界；它所以会被拉紧到这个程度，又因为社会资本有一个巨大的

部分，是由那些和亲手操作，因此会小心权衡本人私有资本界限的所有者全然不同的非所有者使用。由此，不过指出了这个事实：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价值增殖，不过在一定程度以内允许有现实的自由的发展，所以，事实上是生产的一个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2〕

除了那些教条主义分子之外——这些教条主义分子自己满足于宣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如果不是从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的大萧条以来的话），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发生变化——实际上所有想说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努力，都表明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么一个假定：私人和国家统治经济都在设法将这一生产方式的内在经济矛盾排除掉或使之暂时不起作用。这一论点的一些变种——从“混合经济”的种种理论到那些“工业社会”的种种理论——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尽管有千变万化，它们仍然趋于共同的结论。

在这种意义上，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不论是公开宣称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的——都可以追踪到一个连续的世系，溯源到资本主义矛盾逐渐缓和论的最初理论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溶解成“混合经济”论的最初理论家。这一学派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伯恩斯坦(Bernstein, Eduard)。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卢恩塔尔(Lowenthal, Richard)和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斯特拉契(Strachey John)和克罗斯兰(Crosland Anthony)继承并传播了这一传统一直到我们这一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当代的政治经济学中。〔3〕当然，晚期资本主义的“官方的”理论本身，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表达。通常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一阶段占统治地位的专家治国论意识形态，公开赞扬专家们具有解

决一切爆炸性冲突的能力，并且具有使各种对抗的社会阶级在现存社会秩序中一体化的能力，这种意识形态是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技术和经济计划的特殊功能相适应的。因此，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就成了上文讨论的晚期资本主义总的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旨。在这种意义上，它是目前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的先决条件。它试图对经济和社会所作的种种解释，其性质即使不是完全相同的，也是十分相象的，所以，发现这一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它们都是同一个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晚期资本主义的专家治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物，它们的著作家们忠实地反映了它们这种背景的思想上的结构，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示这同样类型的偏见或盲目性。

在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的这一方面，类似的错误应该或是归之于有一部分未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或是归之于工人阶级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共同观点，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这种国际社会地位（东方的共产主义官僚、西方和日本的社会民主党官僚和工会组织的官僚）。

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总的性质这一问题，把社会或社会政治领域从经济领域中作任何武断的分割，都不能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sup>〔4〕</sup>把资本关系仅仅降低为工厂的一种等级结构，那就是忽略了这种生产方式整体的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资本主义在商品生产普遍化和竞争中都有其根源。私有制——也就是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中，处理生产手段的权力被分割成了许多独立自主的中心，其结果就形成了私有劳动组织——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也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不断积累资本的竞争性强制力的根本原因。<sup>〔5〕</sup>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社会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一切行动规律，都导源于此。

剥削现象存在于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一切社会形态和生产方

式。商品生产普遍化明确地表明了特殊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当然，其中包含着劳动力之转化成为商品以及生产手段之转化成为资本。

所以，晚期资本主义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或者只是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或者是落后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一种竞争的制度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用一种主要的尺度来加以测量。政府对经济的统治，或“垄断集团的力量”，或两者加在一起，能够最终或持久地取消掉价值规律的作用吗？

如果说，这是可能的，那就等于是说，当前的社会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么，经济过程就不再取决于在人的背后发挥作用的那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了，而要取决于垄断集团和国家的那些有意识的、有计划的或武断的〔6〕决定了。如果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仍然在发生，那么，这并不是由于这一制度固有的各种力量所致，而只是由于“指导这种经济”的那些人的主观错误或知识不足所致。那么，经济统治方面这样一些错误的完全消除和真正无危机的“工业社会”的出现，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在另外一方面，如果政府和垄断集团“对经济的统治”，只不过是要价值规律的效果偏离正道并暂时减弱（归根结蒂也就是延缓）的话，那么，价值规律的作用就不可避免地必然会贯穿到底。如果确是如此的话，那么，危机就一直是这一制度所固有的。西方“工业社会”的长期发展，将继续处在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统治之下。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其性质仍然无可辩驳地是资本主义的。

本书一直是要来证实后面这一论点的。现在，我们将要来综述一下前面分析过的那些不相连的和连续的主题，并且来说明一下在整个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所通行的价值规律的通行方式。

在一个商品生产的社会里，价值规律有双重的作用。

1)它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统治着经济资源（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经济各个领域的分配，这样就可以保证周期性的平衡以及或多或少的生产和再生产。〔7〕

2)它保证了这种分配能够适应或至少大体上适应“最终消费者”的需求结构（消费结构，即下述这些方面的所谓“社会服务”：个人、家庭；以及更广泛的消费单位——本地的、区域的、国家的以及接近国际间的一些社会团体等）。〔8〕

据我们所知，价值规律只是在简单商品生产过程中直接通过商品的交换价值发挥作用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它被利润率的均等化加以调停——换句话说，就是被资本之间的竞争加以调停。利润并不是在敌对资本之间与每一种可变资本所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成比例地分配的，而是与每一个独立自主的公司所动用的资本总额成比例的。正是这个缘故，以应用更多的机器而提高了平均劳动生产力的资本，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是由生产力“落后的”那些资本生产出来的。资本将会从低于平均利润率的那些领域流向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那些领域中去。这就会导致经济资源进行有利于后面这些领域的再分配，一直到这样的时候出现为止：在后面这些领域中生产的扩大降低了市场价格和利润，而且，前面那些领域生产的衰减提高了价格和利润。但是，交换价值的这种再分配，必须与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对使用价值的需求结构相一致。在这里，有两种情况可以分别加以考虑。

如果总的来说以低于平均利润率水平生产出来的商品，在“最终消费者”的需求结构中仍然保留着它们的份额，那么，资本从这一生产领域中向外的流动，就只会是暂时的。在这一生产领域中所使用的生产力的削减，就会意味着产量降低到了需求量以

下。于是，价格的上涨就会导致利润率的提高，这就会再一次吸引资本以“更加现代化”的组成流到这一领域中来。整个过程的结局归根结蒂只不过是生产力结构或资本的有机组成对平均社会生活水平的一种适应，而这种平均社会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也提高了。

然而，如果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外流的过程，与“最终使用者”在牺牲这一生产领域所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情况下发生的消费结构改变恰相一致的话，〔9〕那么，资本从这一领域的外流，就会是一劳永逸的。在不平衡期——或调整期——的结尾时，投资于这一生产领域的社会劳动资源，其份额将比资本流动以前为小。（不用说，如果生产总额有重大的增长，那么，这种较小份额就可以很好地适应于其资本绝对额的增长，并且归根结蒂将被伴之以较高的资本有机组成。）资本的外流，是由于这一事实造成的：这一生产领域的利润率已经降到了社会平均数之下，而这一情况也不过是下面这一事实的一种表现：由于消费需求结构的一种改变，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给有关这一生产领域分配了经济资源总额中的较小的一部分归其使用。

这种一般的理论分析直接暴露了垄断集团的功能或垄断集团的剩余利润，以及垄断集团所受的限制。垄断集团的功能就是以使资本流入或流出某一生产领域发生困难的办法，来阻止（或无限期地延缓）利润率的均等化。垄断集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受到了限制；在这种均等化最终阻止不住的时候，也就是在专门设计来阻止这种均等化的各种方法都达不到目的的时候。

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有别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并不是说，在垄断资本主义之前就没有垄断资本，也不是说，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就没有竞争。这一概念指的是，竞争与垄断的新的、特殊的结合，〔10〕这种结合导源于资本积聚和集中在质方面的提高。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多种资本”那

相当小的价值，使得要想在更长的时期内保持剩余利润，几乎是不可能的——垄断土地所有制除外，在这里，进入生产领域的障碍都被忽略了。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中——晚期资本主义本身在这种制度中也不过是其一个方面而已——对进入垄断领域提供一个令人生畏的障碍并从而扩大了剩余利润占有期限的，正是“垄断集团”那庞大的规模，换句话说，正是它那“多种资本”中某些资本积累而成的庞然大物提供的障碍。(11)

本书讨论垄断问题，较多地强调生产方面，而强调市场方面则较少。当然，所谓垄断，往往首先就意味着消除价格竞争的能力——也就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对市场的控制。但是最终分析起来，市场控制要取决于生产领域中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取决于市场发生的事情或金融家与经理们的共谋集会所作的事情。如果垄断的市场控制手段所取得的剩余利润，把足够多的竞争对手吸引到同一个工业领域中来，那么，垄断局面就会趋向于消失，剩余利润也会随之消失。“经济以外的高压统治”不能够在某一个生产领域或市场的某一方面，在一个合理的时间范围内，阻止这种竞争的再出现（尽管我们不应该低估立法者和政客们的阴谋诡计，这些人常常遵循垄断集团的命令设法来保证这一点）。下面这个简单的事实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如果另外一个资本家需要十亿美元来与一个垄断资本家相竞争，那么，要筹措这一笔款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而且，在正常情况之下大银行也不会借贷给你这笔款项，大银行与垄断资本家也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垄断资本家就趋向靠终生的经济事实而获得稳定，而不必靠“经济之外的”手段。但是，也不会无限长的一个时期内总是保持稳定。垄断资本家不能够把他们自己从价值规律的作用中解脱出来。竞争本身最终必然会进行下去，尽管不一定是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垄断剩余利润往往要受到腐蚀。

让我们首先从交换价值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一，就是这样一种论点：在生产过程中由社会处理的新价值（收入）的总量，是由所使用的劳动总量来加以固定或预先确定的。这种量在流通过程中可以被重新分配，但是不能够增加或者减少。生产价格的总额一直是与价值总额相等的。<sup>[12]</sup>如果垄断集团本身取得了持久的垄断剩余利润，那么，这种剩余利润只能有两个来源，或者来自这两者的结合体：要么是来自非垄断生产领域所掌握的利润总额的削减，也就是说将其利润率削减至社会平均水平以下；要么是来自社会剩余价值率的增长（劳动力商品价值的一种削减，这当然不一定必须伴之以实际工资的降低）。但是，这两种过程都造成了中等的——而且是长期的——效果，这种效果不可避免地会削弱或削减垄断集团的利润。

社会平均剩余价值的增长，会造成两种互相矛盾的结果，这种结果最终必然会使得社会利润率降低——换句话说，就是使得社会资本总额与社会剩余价值总量之间的关系变坏。这在一方面导致了资本积累的增加；在另一方面，导致在劳动力社会消费总额中，活劳动力所占份额下降。但是，由于只有活的劳动力才能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在资本有机组成的增长——这是由加速积累引起的——超过剩余价值率增长之前，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到了那一点，利润率——包括垄断资本的利润率——就会再一次开始下降。

如果把利润率的这种下降，单单局限在非垄断化生产领域，是不是可能呢？这一问题把我们带到了垄断剩余利润的第二个可能的来源：在有利于垄断资本的情况下，对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重新加以分配。为了简单明了起见，我们将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第 I 部类全部都是由垄断资本组成的，而自由竞争则仍然控制着

整个第Ⅱ部类。我们进一步假设：生产最初有下面的价值结构，剩余价值率恒等于100%，和一个增长中的资本有机组成：

$$\text{I: } 4,000\text{C} + 1,500\text{V} + 1,500\text{S} = 7,000 \quad \text{I}$$

$$\text{II: } 2,000\text{C} + 1,200\text{V} + 1,200\text{S} = 4,400 \quad \text{II}$$

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在两个部门之间的利润率的均等化，将会造成下列连续循环中的生产价格：

#### 第一个循环

$$\text{I: } 4,000\text{C} + 1,500\text{V} + 1,750 \text{ 利润} = 7,205 \quad \text{生产手段。}$$

$$\text{II: } 2,000\text{C} + 1,200\text{V} + 995 \text{ 利润} = 4,195 \quad \text{消费手段。}$$

#### 第二个循环

$$\text{I: } 4,905\text{C} + 1,800\text{V} + 2,060 \text{ 利润} = 8,765 \quad \text{生产手段。}$$

$$\text{II: } 2,300\text{C} + 1,400\text{V} + 1,140 \text{ 利润} = 4,840 \quad \text{消费手段。}$$

#### 第三个循环

$$\text{I: } 6,005\text{C} + 2,160\text{V} + 2,450 \text{ 利润} = 10,615 \quad \text{生产手段。}$$

$$\text{II: } 2,760\text{C} + 1,600\text{V} + 1,310 \text{ 利润} = 5,670 \quad \text{消费手段。}^{[13]}$$

现在，假如利润率的均等化在第一个循环中不是31%、在第二个循环中不是30.7%、在第三个循环中不是30%，等等，如果第Ⅰ部类要设法取得40%的稳定垄断率，那么，价值的重新分配结构，将会如下：

#### 第一个循环

$$\text{I: } 4,000\text{C} + 1,500\text{V} + 2,200 \text{ 利润} = 7,700 \quad \text{生产手段。}$$

$$\text{II: } 2,000\text{C} + 1,200\text{V} + 500 \text{ 利润} = 3,700 \quad \text{消费手段。}$$

## 第二个循环

I:  $5,350C + 1,850V + 2880 \text{ 利润} = 10,080$  生产手段。

II:  $2,350C + 1,250V + 220 \text{ 利润} = 3,820$  消费手段。〔14〕

## 第三个循环

I:  $7,610C + 2,070V + 3,370 \text{ 利润} = 13,050$  生产手段。

II:  $2,460C + 1,300V + 0 \text{ 利润} = 3,760$  消费手段。〔15〕

在第三个循环中，要达到 40% 的垄断率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就连非垄断部门，也根本无利润可言——那就是，如果那里的生产停顿的话——垄断部门的利润率将降低到  $3370/9680$ ，或在 35% 以下。

如果我们放弃垄断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率——即以 40% 而超过 30%——这一假设，并使垄断利润率更接近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即 35%，那么，这种利润率也不能持续下去的这一事实，在第六个循环中而不是在第三个循环中，就变得明显了，如下所示：〔16〕

## 第一个循环

I:  $4,000C + 1,500V + 1,925 \text{ 利润} = 7,425$  生产手段。

II:  $2,000C + 1,200V + 775 \text{ 利润} = 3,975$  消费手段。

## 第二个循环

I:  $5,025C + 1,900V + 2,424 \text{ 利润} = 9,349$  生产手段。

II:  $2,400C + 1,425V + 901 \text{ 利润} = 4,726$  消费手段。

## 第三个循环

I:  $6,449C + 2,400V + 3,097$  利润 = 11,846 生产手段。

II:  $2,900C + 1,626V + 929$  利润 = 5,455 消费手段。

#### 第四个循环

I:  $8,417C + 2,929V + 3,971$  利润 = 15,317 生产手段。

II:  $3,429C + 1,826V + 784$  利润 = 6,039 消费手段。

#### 第五个循环

I:  $11,388C + 3,429V + 5,186$  利润 = 20,003 生产手段。

II:  $3,929C + 2,010V + 253$  利润 = 6,192 消费手段。

#### 第六个循环

I:  $15,924C + 3,779V + 5,842$  利润

II:  $4,079C + 2,063V + 0$  利润

即使在第六个循环非垄断部门中，资本的增值完全停顿了一——这就意味着在这一部门中的生产已经停顿——垄断部门也不再能取得 35% 的垄断利润率了：利润率甚至会跌到初始平均利润率水平 31% 之下，精确地说，就是跌到 29.6%。

现在，让我们放弃我们的一个初始的简化了的假设，即不变的剩余价值率。随着剩余价值率的增长，维持垄断利润率的不可能性，将会被推延到第七、第八或第九个循环，视增长的速度而定。同样，如果在社会资本分配中（在两大部类之间、在 C 和 V 之间，等等），初始比例发生了变化的话，那么，垄断利润率下跌的速度，也将发生变化。所有这些考虑，都将使我们能够给发展规律下一种更为精确的定义，但并不是把它废弃；垄断利润高过平均利润水平越多，垄断化部门越多，那么，垄断利润向最初社

会平均利润水平就必然会下跌得越快，或者与之一起衰退。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只能延迟这一规律的进展，但是却不能废弃这一规律。

换个方式来说：只有在垄断化的部门仍然只是控制着生产领域中相当小的一部分的时候，垄断利润才能高过平均利润水平。垄断部门越是扩大，垄断利润与平均利润之间的差距，也就变得越小。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垄断部门将那些继续存在“自由竞争”的部门全部吸收，对垄断化了的部门并不是有利的。确实如此，垄断资本甚至还由于经济中创造出非垄断化部门而坐收其利。在这一方面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同意那些已经用不着了的中小型企业，订立所谓的转包合同。古典的例子是汽车工业。但是，在今天，转包合同制已经扩展到了大多数垄断化了的部门中。一九六五年，西德垄断集团控制的转包公司数目是这样：德国通用电气公司——30,000家，西门子公司——30,000家；克虏伯公司——23,000家；戴姆勒—本茨公司——18,000家；拜耳公司——17,500家；巴登苯胺苏打公司——10,000家；奥佩耳汽车厂——7,800家。<sup>[17]</sup>

巴兰和斯威茨在论述垄断资本中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没有抓住整个社会剩余价值有限量加给垄断利润的种种限制。他们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企图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与以凯恩斯“总需求”概念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结合起来。<sup>[18]</sup>巴兰和斯威茨之所谓“剩余”，包括了一切总收入，这种总收入相当于两倍甚至三倍以上的社会收入的再分配。这样，他们的概念很快就失去了一切严谨性。它不能被用来证明以下两者之间的对立：一方面是所谓“剩余增长的倾向”，另一方面是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倾向的规律，或马克思的剩余价值量增长倾向的假设。这些量值根本是不能相比的。而且，由于下面这个事实，使得他们的分析甚

至更加困难了：巴兰和斯威茨在他们的“剩余”概念中，进一步包括了剩余资本。

巴兰和斯威茨有这样一个假设：垄断资本能够使销售价格保持稳定（而成本价格则下跌）——“剩余增长”的主要根源——这种假设使他们得出了永远是投资过多的结论。这样，大多数垄断资本就变成了既独立于一般的销售市场，也独立于货币和金融市场。在这里，巴兰和斯威茨很明显地是从一种联合现象进行了推断。在“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中，垄断资本自筹资金率往往有一种直线上升情况。但是，一旦平均利润率再一次开始下降，那么，社团自筹资金率马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很明显的是，斯威茨作为《垄断资本》一书的作者而顽强地坚持大公司金融完全独立自主这一论点的同时，在他作为“每月评论”杂志编辑的作用中，他应该正确地理解并描述这一种现象——尽管有一九六九——一九七一年的证据。<sup>[19]</sup>

现在，让我们用使用价值这种观点来考虑一下这一问题。剩余价值从非垄断化部门向垄断化部门的系统转移，如果不引起严重的混乱，就不可能持续多长时间，只有一种特殊情况除外：就是当伴随着这种转移的是消费结构的改变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在货币有效需求从非垄断部门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消费，转变成为与这一转移或多或少成相同比例在垄断领域中生产出来的那种使用价值消费的时候。在第十二章里，我们已经说明了这种转变事实上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在牺牲农业、纺织业、制鞋业、木材业以及类似的一些分支行业的情况下，发生了。<sup>[20]</sup>但是，尽管这样一种倾向毫无疑问是存在的，然而这一问题的情况暴露了针对垄断资本的种种困难。因为，垄断资本不但必须要使得对非垄断部门生产出来的货物的需求，能够长期地、相对地衰减——这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温带国家，食

物的消耗或衣着不可能减少到零——而且也要保证，这种衰减的发生要与社会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过程成严格相应的比例。在这里，没有必要再来强调，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一点是不可能办到的。〔21〕

如果垄断资本对货币有效需求总额中的一部分的那种越来越多的僵硬性所作的反应，是设法正式吞并那些非垄断化生产分枝部门，〔22〕那么，这自然就会导使垄断部门与非垄断部门相比之下的扩张，而这就意味着与利润总额对比之下，剩余利润额的减缩。其结果将会造成一种倾向，即垄断利润率进一步向平均利润率方面衰减。

在对比之下，如果有利于垄断部门这种剩余价值转移，与消费结构的特殊转化不相一致，那么，其结果在非垄断部门造成的积累迟滞，将会导致这些部门所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相对缺乏。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上涨，不仅是绝对地上涨，而且对于垄断资本所生产出来的货物而言，也相对地上涨，而且，这样一来，在剩余价值的转移方面将会出现一个周期性的衰退。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的压力如果必须伴随以在非垄断领域中的积累加速的话，就决定了利润率的均等化——换句话说，也就是伴随以这些非垄断部门的资本有机组成向垄断部门资本有机组成方面的调整。在非垄断的原料生产或农业方面的某些领域中，这种过程确实是周期性地发生了。

垄断资本取得稳定的、垄断剩余利润的长期能力——也就是从价值规律的影响下退却，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调节这种规律的各种资本之间的竞争中退却——因而也就随着它们为它们的商品取得长期市场的能力而俯仰升沉，这不但与整个货币有效需求成比例，而且也与在垄断部门中由于垄断资本的积累而使使用价值生产提高了的生产能力成比例。正如加尔布雷思所说的那样，广

告业的巨大发展、市场研究和销售活动等，可以看作是以适当的数量以取得这种特殊需要的一种企图。<sup>[23]</sup>作出这样一些努力的合理性，至少说是可疑的。但是，其所造成的结果是明确无误的：归根结蒂，在任何一个生产分支中，没有任何一个垄断集团能够成功地退出价值规律的影响范围。在初始阶段，有人曾获得过相当不小的垄断利润，但自那之后，所有垄断集团都迟早要经过在销售方面的周期性衰退阶段。因此，它们都受到了永久性能力过剩的危险或在销售方面一个相对结构衰退的威胁，如果说这些威胁还没有来临的话。某些资产阶级著作家和另外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家们所声称的那种垄断资本获得利润长期稳定性的能力，完全是一种神话。<sup>[24]</sup>

如果垄断资本为其特殊商品的销售，得不到长期的增长，那么，竞争就会全部复发，甚至在垄断集团之间发生。垄断剩余利润跌落的威胁——也就是垄断利润率向平均利润率的接近，这也要受衰落倾向的约束——如果要想避免的话，只有既使市场长期扩展，也使生产差异性长期扩大才能办到。生产差异性也受下面这种事实的大大促进：垄断公司有限制生产的倾向，而其资本和生产能力之增长，则有较平均为更快的倾向，这恰恰是占有剩余利润的结果。因此，它们都面临着一个生产能力运用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用生产多样化的办法暂时得到解决。“在一种需求之下，如果平均花费维持不变的话，那么，垄断公司在其原来生产的能力扩张方面投资，那是不合理的，除非作为一种手段来抢先参与或发动一次争取更大市场份额的斗争。……假如需求曲线没有变化，并且不顾在降低成本改进措施方面的投资——这种改进措施只在较后的阶段也提出这同样的问题——那么，只剩下在新产品方面的投资。……向多样化发展的倾向也会更加强烈，对原来产品需求的伸缩性越低，过剩能力也就越高，而且，公司

生产设备的专业化程度，也就越低。”〔25〕

这就是向下列一些情况发展倾向的理由：研究和发展活动的大规模增长、技术革新的加速、不停地寻求技术的“租金”、国际资本集中——跨国公司——为了在特殊商品需求中避免联合方面特别是结构方面相对衰减的种种危险所作的种种努力，以及联合大企业的形成等等。这一过程越是向前发展，垄断资本所生产出来的货物的包装便越是接近于构成社会生产的整个范围，垄断剩余利润就越是倾向于变得更小，而且，垄断利润率也就越是要调整得接近于平均利润率。垄断集团就是这样越来越被拖进了这种平均利润率跌落倾向的大漩涡之中。

斯威茨争辩说，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垄断资本也可以从较高利润率的领域中流向较低利润率的那些领域；对一个大公司说来，关键的考虑是额外投资的额外利润。〔26〕很明显的是，垄断集团在为其新资本挑选投资领域时，其所享受的独立自主权较之十九世纪那些公司为大。但是，斯威茨没有看到，这种独立自主是有某种限度的。如果额外资本系统地投资于低于平均利润率的那些领域，或者甚至投资于平均利润率的那些领域，那么，这些垄断集团的利润总额就要降低。一个公司如果采取了这种作法，那么，它的自筹资金能力以及最终也包括其增长率，都将遭到衰减，如果与其对手相对比的话。其整个竞争地位，从而就会被削弱。恰恰就是当我们描述大公司独立自主的限制的时候，描述大公司不得不长期在其下经营的那种广泛的不稳定性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价值规律的那些影响。〔27〕

垄断公司总的来说能够从古典的价格竞争中撤退，这个事实本身当然并不是一个新的发现；它是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主要论据之一。但是，加尔布雷思的这种论点：大公司从价格竞争压力之下的“解放”，就等于大公司从市场和市场规律中的

“解放”，<sup>[28]</sup>其基础是建立在双重的混乱之上的。第一，这种论点混淆了短期和长期的最大限度利润；第二，它把价格竞争与总的竞争混为一谈了。

就经验而论，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价格行为，可以总结成为两个方面：管理价格领域和竞争价格领域。<sup>[29]</sup>但是，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也是相当可观的。垄断部门内部的竞争，其目的在于使（财产）增长的最大限度化，这种竞争经常寻求技术革新以降低成本，寻求产品多样化以扩大出路；因而这种竞争经常倾向于威胁两个相邻垄断集团或敌对垄断集团之间界线。对某一特定产品的需求一旦垮台了，那么，甚至连垄断集团也不得不对价格的降低让步。在竞争价格方面则相反，大批竞争者之间的价格协议，可以对不利的市场形势寻求临时的补偿。这种协议不会在任何时候总是有效；但在短期中是可以奏效的。

加尔布雷思从垄断公司的成长出发，这是很正确的。但是，如果不是竞争的话，这种紧迫感是从哪儿产生出来的呢？加尔布雷思对这种紧迫感的解释是，把它归之于控制“技术专家体制”的那些人的道德信念或爱国信念。加尔布雷思的这种企图，我们不可以严肃对待。<sup>[30]</sup>当然，垄断公司之间的竞争，其所采取的形式确实与十九世纪中那些棉布制造商对手们所采取的形式不同，或者也确与二十世纪初蔬菜商人所采取的形式有别。但是，除了这种垄断竞争之外，是什么强迫这些公司不断地降低它们的生产成本？是什么强迫它们持续地追求技术革新？是什么强迫它们不间断地生产“新的”产品？又是什么强迫它们不知疲倦地扩大它们的经营领域？难道说，这种成长的紧迫感不是包含着一种最大限度自筹资金的紧迫感吗？反过来说，如果不是长期的利润最大限度扩大化，这些能办到吗？<sup>[31]</sup>

如果垄断集团成长的紧迫感是由于垄断集团要保持竞争状态

的那种紧迫感——换句话说，是由于它们不能够从价值规律的影响下退出来——那么，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一书<sup>[32]</sup>中所提出那个“双重利润率”问题，就变得可以理解了。这一说法经历了某些集团的尖锐的攻击。<sup>[33]</sup>然而，从垄断资本主义的整个时期的经验，其中包括从一八九〇年到一九四〇年的“古典的”帝国主义时期的经验在内，可以很容易地证实这一点。这种“双重利润率”的根源和功能，都来自垄断资本的那一种性质。这种性质的最后一着就是往往从性质上使得资本之流入某些部门，变得更加困难，并从而阻止了剩余利润不能进入一般的利润均等化过程中。

但是，资本之流入某一部门的阻塞状况，往往只是相对的，而从不是绝对的。从一方面来说，剩余利润通过垄断价格所取得的成就，会典型地导致相对的或绝对的市场停滞，并且最终会把替代产品带进来。<sup>[34]</sup>从另一方面来说，各个敌对的资本抵挡不住高额剩余利润的引诱。因此，垄断部门中的竞争，可以受到一些限制，但不能被消除掉。实际上，这两种势力都导使剩余利润集中——换句话说，它们产生一种向垄断剩余利润均等化发展的倾向。如果某一种垄断资本超过了所有垄断资本的这种平均利润率，那么，尽管有种种困难，资本还是要流入这一垄断资本所控制的那个部门中去，并且从而会降低那里的剩余利润（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子工业就是这一方面的很好的例证）。<sup>[35]</sup>如果某些垄断资本的剩余利润降到了平均数值以下，那么，它们可以用提高垄断价格的方法，把剩余利润提高到一般标准而不会引起重大的抵抗。

然而，由于资本在这同一时期里仍然在自由地来回流动于非垄断各个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利润率必然会有一种均等化的趋向。所以，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平均利

润率，这两种平均利润率被平均剩余利润率互相分离来：一种是在垄断部门方面，另一种是在非垄断部门方面。

贝因 (Bain Joe S.) 已经表明，在一九三六——一九四〇年期间，从事一些工业分枝的那些主要的企业——其中八家最大的公司生产总产量的 70% 以上——出现了一种利润率，这种利润率比在垄断化较轻的那些工业分枝的利润率要高出相当多（前者平均为 12.1%，而后者则为 6.9%）。下面的估计是毋庸置疑的，即两种平均利润率是实际上存在的，而且两者最终合为一体了。

工业分枝 <sup>(36)</sup>	1958	1968	1972
整个制造工业的平均 利润率：	10.9%	12.1%	10.6%
<u>高于平均利润率：</u>			
飞机制造业	17.8%	14.2%	7.4%
化学工业	13.2%	13.3%	12.9%
电机工业	12.6%	12.2%	10.8%
汽车制造业	12.5%	15.1%	14.5%
石油工业	12.4%	12.3%	8.6%
科学仪器工业	12.0%	16.6%	14.3%
<u>低于平均利润率：</u>			
金属加工工业	9.3%	11.7%	11.0%
造纸和印刷工业	8.9%	9.7%	9.0%
食品工业	8.6%	10.8%	11.2%
纺织品和衣着工业	4.8%	8.8%	7.5%

关于这些统计数字，应该作两点说明。第一点，如果我们把一些特殊的例子去掉，比如说把飞机工业去掉（飞机工业深受军事开支波动的影响），那么，每个分枝内部的长期相似点是很明显的。一九七二年炼油工业的例子，显然是个例外；但是，除了一九七二年之外，在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期间，这一工业在

每一个单独年份中都达到了高于平均利润率的水平，并且在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间，以惊人的规模补偿了它在前一年的那种例外低的利润率。另外一点，剩余利润率最终有降低的倾向。这一点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出来：所有工业分枝的平均利润率与最富竞争性的工业分枝之间的区别，已经减少了：比如在纺织工业方面，一九五八年的差异是 $-6.1\%$ ，一九六八年是 $-3.3\%$ ，一九七二年是 $-3.1\%$ ；在印刷工业方面，一九五八年是 $-2\%$ ，一九六八年是 $-2.4\%$ ，而一九七二年则是 $-1.16\%$ 。(37)

我们已经知道，垄断资本有扩大其经营领域的倾向，这一倾向归根结蒂必然会减少剩余利润的总量。两个“平均利润率”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出现，其最终结果是阻碍而不是废弃整个社会平均利润率形成的过程。在自由竞争的年代，利润率达到一种平均值通常需要七年或十年的时间一个循环，但是，现在垄断资本的相对经济力量，对这一均等化过程制造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完成那一过程需要较多的时间。

如果一八九三年之后的经济发展“长波”就是垄断部门与非垄断部门之间利润率均等化所需的时期，那将是符合本书的一个基本的假设的。每一个“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就其性质而言（作为一个扩张阶段），其特点已被非垄断部门的暂时扩大标明了，也就是说，被剩余利润增长的可能性标明了。在这一长波的最后阶段，尤其是在紧随其后的“具有潜在停滞倾向的长波”中，相比之下，在资本的积聚和集中速度方面，是有增长的。非垄断部门的活动范围缩小了。因而在这些部门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总额，有所减少，而且剩余利润的来源也有相应的收缩。这样，垄断利润就比较接近于平均利润的水平。但是，我们不愿意进一步详述这一假设；那应该是另外一种探索的主题。

每一件事都说明了这么个事实：垄断平均利润率并不是一种

空洞的、抽象的东西，而是在各公司心目中明显存在的东西。因此，有些公司的首脑已经十分坦率地表明，他们把某种利润率看作是“正常的”，并且使他们的价格核算（在垄断市场上！）去适应这种利润率。加迪纳·米恩斯认为这是“投资的利润率目标”，这种说法兰齐罗蒂(Lanzillotti)曾经在美国制造工业中进行过研究。在一九四七——一九五五年期间，据说在通用汽车公司、尼莫尔杜邦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占20%，联合炭素及碳化物公司占18%，新泽西美孚油公司占了16%（在这一例子中，平均利润率确实已经实现了）。当然，大公司也可能作出错误的计算。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可能使得他们所期望的垄断平均利润率，最终达不到，而且，也还将有一个平均利润率的均等化。高度集中的合成纤维工业提供了一个例证。在这一部门中，十四个康采恩掌握着资本主义世界总产量的80%（在美国有杜邦公司、美国人造丝公司和孟山都化学公司；在英国的有考陶尔德公司和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在日本有东洋化学纤维公司、东洋纺织公司和旭化学工业公司；在法国有罗尼普伦工厂；在意大利有蒙特迪森公司和斯尼亚·维斯科萨公司；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西德和瑞士的有阿克佐公司；在西德的有赫希斯特公司和拜耳公司）。一公斤聚酯线的价格，从一九七〇年的1.25先令跌到了一九七二年的0.8先令。结果也造成了利润率的大跌。<sup>[38]</sup>

艾尔玛·阿尔特维特尔尖锐地批评了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有两种平均利润率这一论点，这两种就是：非垄断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和垄断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在考虑阿尔特维特尔的论点的时候，有必要在下面两者之间作出区别来：一方面是他对一些著作家例如毛里斯·杜勃(Maurice Dobb)和瓦尔加等所提出关于这些平均值两重性的正当理由的批评，另一方面是他作出的这样一个结论：这两种平均值是不存在的，因为，价值规律只允许有一个平

均利润率，这个平均利润率正象它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那样，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得到了实现，只不过是速度比较慢、中间间隔比较长一些而已。阿尔特维特尔的反驳是从这里出发的：他宣称，在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两种利润率均等化运动的存在就表明了“永久性的”垄断的可能性，并且从而把资本主义经济分解成了两个“社会”，而不单单是分解成为两个部门。<sup>[39]</sup>但是，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推断。

在垄断部门和非垄断部门中，两种平均利润率的出现，是取决于单一价值规律作用的单一均等化运动的产物。资本继续不断地从利润低于平均水平的部门流入利润高于平均水平的部门中去。两种平均利润率的出现，同时表明了这种均等化的单一运动和在完成这种运动时由“进口关卡”所设置的障碍，而这种障碍是巨大的障碍。

把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均等化过程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的均等化过程混为一谈，那就是尽力缩小那些障碍，并且是把垄断资本从马克思主义分析中消除了。由于垄断资本的存在而否认这一均等化过程的作用，那就是认为后者可以通过经济以外的高压统治、操纵、欺诈或国家干预等而无限期地躲避开价值规律的约束，从而也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事实上，正是利润率向均等化发展的内在推力与垄断资本给这种均等化设置的可怕的障碍的结合，造成了出现两种平均利润率的结果，这两种利润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肩并肩地存在着，这种并存关系只在最终的时期才趋向于集中。我们完全同意阿尔特维特尔的这样的看法：在商品生产、私有财产和“多种资本”的条件下，“永久的垄断”根本不能够存在。正象我们在前面已经强调过的那样，在垄断部门中出现一种平均的垄断剩余利润率，与价值规律的作用不但不发生矛盾，恰恰相反，是与之相适应的。如果投资

于一个垄断部门的资本——例如汽车制造业——施行一种不变的价格增长——尽管成本降低了——从而使垄断剩余利润高过了其他垄断部门的平均剩余利润水平，那么，价值规律就将对它施加双倍的相反的压力。

a) 由于受到这些巨额的超额利润，额外资本将会流向汽车制造业。这就会产生出相对的能力过剩（或生产过剩），从而就会降低剩余利润率。但是，为了创建一个新的汽车公司，需要数以亿计的美元，所以，只有其他垄断资本集团的资本能够参与这一均等化运动。小商人不能收集到足够的资本来创建一个新的汽车公司，从而从那个部门的剩余利润中获取利润。<sup>[40]</sup>这就是一种垄断平均剩余利润率出现的主要机制。

b) 定价过高的这些商品的销售量，将会要么绝对削减，要么与没有过高定价时相比（或者与销售众所期望的相比，至少是相对地削减。因为，价值规律也以社会需求的调节来压低“过剩的”剩余利润。事实上这正是一九七四年国际汽车制造业大规模实际发生的情况。在向制造商人销售基本产品或半成品产品的垄断资本方面——例如美国的大型钢铁公司——计算过高定价的技术替代的可能性，是很明显的，这也会造成需求量减少和垄断平均剩余利润均等化的结果。甚至在制造业的领域中，就潜在可能而言，同样情况也是如此。

关于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中，两种平均利润率共存的这些具体的论据，阿尔特维特尔没有给予任何回答。当他从对其他著作家的批评方面转向形成他自己对垄断剩余利润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时候，他的处境的矛盾，表现得极其明显。“对价值规律的修改只能意味着价值运动所固有的各种倾向在运动过程中强加诸其本身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循环，而是一些个循环。”<sup>[41]</sup>阿尔特维特尔本人也正确地指出，“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商业循环

的期限也已经从七至十一年缩短为四至六年了。从而“一些循环”至少就意味着八至十二年，可能是十二至十八年，如果不是十六至二十四年的话。在阿尔特维特尔看来，价值规律的作用的“修改”，就是在这一秩序的相当长的时期中，剩余利润一直是“固定的”。但是，在这一段时间中，垄断剩余利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剩余利润能不受任何束缚地发挥作用吗？——换句话说，剩余利润能够年复一年、一个循环接一个循环地“增长”吗？如果阿尔特维特尔采取这样的立场的话（他并没有采取这样的立场），那就意味着又回复到了他正确地反对的那种观念——垄断资本可以从价值规律的任何影响中解脱其自身大约二十五年左右。难道说，垄断资本的运动完全是偶然的或任意的吗？而且，这样一种论点将会否定价值规律对剩余利润的任何客观的调整。要避免这些站不住脚的结论，要保持这么一种基本的地位：在一系列连续的贸易循环中，垄断资本即使在其继续占有剩余利润的时候，也不能从价值规律的作用中自我解脱出来，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接受这样一种论点，即在垄断部门和非垄断部门中，头两种不同的平均利润率在其——归根结蒂——合并成为一个单一的平均利润率之前，已经形成了。

我们相信，阿尔特维特尔所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把垄断现象与由于技术（专利）和市场因素造成的对资本自由运动产生的障碍，不适当地等同起来了，也在于他对于由垄断资本的大小所造成利润率均等化各种障碍的认识——换句话说，就是对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程度的认识。如果在某一个工业部门，真正的竞争有必要积聚十亿或十五亿美元，这一事实本身变成了资本移入或移出这一部门的最大的障碍，因此也是利润率有效均等化的最大的障碍。<sup>[42]</sup>所包含资本的大小在同一时间内说明了几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些部门中，竞争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加以有效的限制，为

什么当同样大小的一些资本互相对抗的时候，竞争烈火会突然再度点燃起来（有时候十分猛烈），为什么这种竞争必须局限于这种大小的资本。偶而也有一个较小的“局外资本”可以进入一个垄断部门。但是，这种例外立刻可以证实这么个规律：这个较小的“局外资本”会被垄断资本所吸收。

不应该忘记的是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平均利润率是一个经济的“终生事实”，它进入了资本家的意识中，并构成了他们的核算基础。<sup>〔43〕</sup>因此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哪个“平均利润率”构成了垄断资本家核算的基础？是只在每十六年或二十四年变成现实的一种抽象的“一般平均数”吗？或者是那种垄断的平均剩余利润率，这种平均剩余利润率我们已经知道也不过是垄断资本家加之于他们那生产成本的15—20%的“预期利润率”？马克思本人提出了剩余利润率均等化的问题，尽管那是与地租问题相关联的。“如果商品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不会碰到阻碍，地租就会完全分解为级差地租，也就是说，一切地租就将以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对一部分资本家所给的、现在由地主占有的剩余利润的平均化为限。所以，在这里，地租也就在个别利润率的不一致上，有它的确定的价值限界，这种不一致则是由于生产价格要由一般利润率调节的事实。如果土地所有权会在商品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平均化上成为障碍，并占去绝对地租，这种绝对地租也会由土地产品的价值在它的生产价格以上的余额，也就是，由商品所含的剩余价值在按一般利润率应归各个资本的利润率以上的余额，受到限制。这个差额于是也形成地租的限界；地租也仍然只是已经规定的并且已经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确定部分。

最后，如果剩余价值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的过程会在不同生产部门内碰到人为的垄断或自然的垄断，并且特别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的障碍，以致有一个垄断价格成为可能，并提高到那种受垄

断影响的商品的生产价格和价值以上，那个由商品价值规定的限界也仍然不会因此废止。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不过会把另一些商品生产者的利润的一部分，转移到那些拥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上面来。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间的分配，因此将会间接受到一种局部的扰乱，但这个剩余价值本身的限界会仍旧不变。”〔44〕

在关于垄断资本调整经济的私人打算方面的实际情况，同样也可应用于国家调整。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对这种调整的社会功能，进行分析。在本书第十五章里，我们已经试图表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仍然与它在十九世纪时一样——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个国家最终只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整体”），特别是只能代表资产阶级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阶层。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是国家调整的经济功能，换句话说，就是它那把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一劳永逸地从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中解脱出来的所说的能力。在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干预可以总括成三个要点：刺激、通货膨胀和援助。在本书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中，我们已经讨论了以创造货币或信贷的办法来和缓工业循环的企图。在最适宜的情况下，在这儿，国家行动受到政府干预的限制，来增加就业或鼓励能力的应用而没用流通手段和银行票据的通货膨胀，这正象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毫无疑问是有效的。但是，其效果由于两种原因而暂时受到了限制。第一种原因是，它只能具有一种刺激性的影响，如果它同时能提高剩余价值率的话——从而也就自动地加大了实现的种种困难，达到了它能改善资本扩张条件的程度。（总的对资本说来，这就等于在扩大再生产的一系列循环中“失去”一个循环）。第二种原因是，对周期性循环波动范围的暂时性限制，也减少了寻求整个资本的危机的正面结果。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力或赢利性水平之下经营的很多种企业，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它们

摆脱债务困境的时间将较长一些。这使得资本总额的贬值过程放慢了，但与此同时，这也阻碍了平均利润率的逐步增高，而这种增高是这样的贬值引起的结果。因此，即使是在经济中非通货膨胀国家干预的这种最适宜的情况下，其结果也没能减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矛盾，更不用说消除这些矛盾了：它只不过是推迟了这些矛盾的爆发时间而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国家对经济的这种刺激干预，其效果与十九世纪古典的货币和信贷体系所产生的效果相类似。

但是，基于上面进一步论述的理由，二十世纪实际上从未发生过这么一个例子：即在爆发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之后，一个政府以这样的“最适宜的”方式来抑制一次经济高涨。在现存的那些刺激经济的例证中，截至目前为止，每一个例证都是膨胀性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我们已经加以论述过了，凯恩斯本人对这一原因十分熟悉。<sup>[45]</sup>在资本主义条件之下，仅仅刺激消费需求，是根本无用的：首先，它降低了剩余价值率，从而也就降低了利润率，其次，它并没有增加企业家的投资活动——有一个可能的例外就是第Ⅱ大部类支出的有限增加。但是，如果不但希望增加“最终消费者”的货币有效需求，而且也希望提高全面的投资总额，那么，它要作到这一点，就只能保证其投资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那些投资，不发生竞争——换句话说，就是不夺取私人资本主义企业那些已经受到限制的市场。这样，国家投资只有在创造了“额外的市场”的情况下，才能对经济高涨起到促进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军备的生产和公共事业已经起到了这种作用。

但是，国家促进新的使用价值或“服务”的生产，并不是事情的终结。问题现在出在剩余价值的分配或资本的增值方面。如果这种国家支出全部是由赋税来资助的，那么，普遍需求方面还仍然是没有任何变化，而且，国家投资只能导致在私人部分的销售

方面的相对的缩减——如果不是绝对的缩减的话。只有这些投资至少说在某种程度上在购买力方面造成直接的、名义上增长的后果的时候——也就是使额外支付手段进入流通——它们对经济才能具有一种刺激的效果(赤字财政)。但是,这些投资并没有使流通商品数量的增加达到其创造额外支付手段的相同的程度,因此,这些投资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种通货膨胀的倾向。

因此,具体地说来,为了刺激经济高涨(以克服或限制一次危机)的国家干预,总是经常会导致通货膨胀。这个问题我们在本书第十三章中已经作了论述,没有必要再重新讨论这个题目了。除此之外,我们在本书第九章中,对军备生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所发生的影响,也已经进行了分析,也就是说,通货膨胀不能够削弱这些运动规律,或者说,不能消除这些运动规律。所以在这里也是如此,由国家节制来延缓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爆发的效果,逐渐与加深这些矛盾的那些效果,合而为一了。

国家的补助活动,在资产阶级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一般条件的保证人的功能中,已经萌芽了,这在本书第十五章中已经加以探讨了。在公共事业或基础结构领域中的任何政府活动,都会创造出有利资本总额增值的“自由货物”和服务。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把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的间接消费责任移交给国家的时候,这一阶级也获得价值不少,如果资助这一活动的手段,并非唯一地出自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的话。这样,小的独立生产者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小资产阶级的所得税,以及无产阶级的工资总额,都通过社会(国家)资本扩张的迂回路线而完成了一种社会收入再分配的任务,而这种再分配任务可以导致剩余价值生产的增长。在这种意义上,资产阶级国家越来越多的基础结构活动本身,就等于给私人资本以越来越多的资助。因此,这是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危机的一种表现——因为,在上升资本主义的全

盛期，资本设法来限制国家的活动，甚至包括在为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一般条件的国家作用的活动，而不是来扩大这种国家活动。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尤其是在其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这种结构上的危机越是变得尖锐，国家补助活动发展的规模也就越大。当然，这种活动是与工业循环的各个阶段互相关联在一起的；在资本增值的恶化时期，这种活动就飞速地增加，〔46〕而在平均利润率暂时高涨的时期，这种活动就相应地缩减。这样，国家在扩大基础结构方面的活动，就既取决于结构方面的因素，也取决于循环方面的因素。这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在下面两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典型的对立：一方面是整个资产阶级在这些部门中的利益，这种利益要依靠在反循环方面对这种开支的运用；另一方面是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利益（包括个体垄断资本的利润在内），这种利益限定在主要的国家契约方面，而这些契约是寻求在前几年预先制订规划，因此，就赞成一种永久性的基础结构方面的政策，以保证这些利益集团本身的生产能力，能够得到持续应用。〔47〕

在这里，有必要在政府资助的不同形式之间，作出区别来——那就是分为间接的和直接的两种。〔48〕国家向资方的间接资助，可以与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相结合起来，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生产原料、能源或半制成商品的某些工业分枝的国有化，导使这一公共部门生产出来的商品，以低于平均利润率的水平——如果不足以蚀本的情况的话——销售给私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在国有化部门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就转移到了私人资本方面，这与对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一般资助，或者与私人资本所占有的利润额的一般增长，有同样的效果。〔49〕

使 A 等于国有化部门（比如在大不列颠、法国或意大利），B 为私有部门。这两种部门中价值的创造，成下面的比例：

$$A: 2,000C + 1,000V + 1,000S = 4,000$$

$$B: 6,000O + 3,000V + 3,000S = 12,000$$

现在，如果 A 部门中生产出来的商品（这些商品全都被作为 B 部门的不变资本的因素），以 3,000 出售给 B，那么，B 部门将占有 A 部门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 1,000 个单位，而这种资助将会使私有资本的利润率从 33.3% 增长到 44.4%。

然而，即使是在私人资本利益方面，国有化的工业分枝也肯定能作到扩大再生产（尽管不一定每一个工业分枝都如此，其扩大率也不一定与经济中私有部门的完全相同）。〔50〕所以，从它们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总额中缩减掉的那些，必须至少有一部分要用其他手段来加以补偿，如果这种间接资助体系不至于导致赢利性从国有化部门中系统地消失的话。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需要的劳动量，最终只能从下面几种渠道获得：要么牺牲工资（通过更重地向靠工资维持生活者征收总收入的捐税），要么牺牲小规模独立生产者，要么牺牲在其他方面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所以，归根结蒂间接资助体系要么导致社会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要么导致有利于某些资本家集团而不利于其余资本家集团的社会剩余价值再分配。间接资助也可以采取向国家契约索取过度利润的形式。这种利润可以通过牺牲不为国家工作私有公司的利益的剩余价值转化而取得，或通过对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提高赋税的办法而取得，或者通过所有这些变体的联合而取得。

直接资助通常采用的形式是国家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损失包下来，或保证额外利润，或资助某种生产成本，例如研究和发展方面的开支等。〔51〕这种直接资助也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或者是社会剩余价值率提高，或是社会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这一制度固有的那些矛盾，用这种办法根本不能解决。正相反，这些矛盾将遍布于剩余价值率任何一种增长的另外一面——这必须经常处于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的限制之下——而且由于利润在生产资本的各个

分枝中的分配而仍然保持不发生变化。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经济中的干预——这种干预可分成刺激、信贷货币的膨胀性创造和对私人资本的资助等若干类——是毫无意义或无足轻重的。它在一种双重意义上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首先，在指导社会剩余价值总额在工业的各种分枝中的分配方面，资本总额一般票据交换所的作用，在古典的垄断资本主义年代，主要是由银行和金融资本来完成的，而现在则越来越由国家和大垄断集团的联合行动来完成。其次，国家在经济方面越来越多的干预，归根结蒂只下面这种事实的一种表现形式：劳动力客观社会化和生产力社会化的目前的程度，不仅仅划时代地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冲突，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已经在此时此地变得与这种生产资料私有制直接不能共存。这样就发生了这样一种倾向：国家对经济中越来越多原本是生产性的领域，进行干预，目的是创造出生产的先决条件，这种先决条件私人资本已经不能够加以保证了。这些倾向从实际基础结构以及教育和行政领域，扩大到了原料生产的某些分枝部门、运输体系甚至一些生产的分枝部门，这些部门在技术上已经“飞跃”得太快了（例如核子动力站）。

国家对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节制的特性，以及其为现有资本的扩张、投资和分配而作为中央票据交换所的功能，就在于这种干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相互连系。经济一直是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为基础的，它仍然处于价值规律遥控的束缚之下，并且继续受制于资本增值的紧迫感，从而受制于资本增长的紧迫感。在这样的结构之中，国家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任何一种矛盾或任何一种运动规律，归根结蒂都不能有所减少，更不用说消除了。由于作为最后的一招它一直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它就更加不能作到这一点了。尽管它会常常保卫垄断资本的特殊

利益，但是它不能在这么个限度之外来这么作，那就是不使危及这一制度的生存。国家决不会“生产垄断利润”或者甚至会负责这种扩大再生产。

归根结蒂，国家不能够同时既改善了资本增值的各种条件，又减少了利润实现的种种困难。如果利润率下跌了，那么，即使市场仍在扩大，资本的积累也会发生下跌。如果利润率很高，或者正在上涨，那么，如果同时还发生了市场的相对紧缩或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下降，资本的积累还是会缓慢下来的。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即私人节制经济与国家节制经济结合起来，最终达到利润率上涨同时市场又扩大这样的一种奇迹（在两大部类中生产能力都能高度利用）。新近，麦蒂克（Mattick Paul）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家最终不能够成功地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种种困难。<sup>[52]</sup>但是，他是用一种虚假的论据而达到这一正确结论的，因为，他断言：国家的开支包含着从剩余价值总额中的一个扣除额，从而阻碍了资本的积累。这从两个方面来看是错误的。我们已经指明，事实上国家开支能够提高剩余价值率，从而加速资本积累，而不是放慢资本积累。可是，麦蒂克的主要错误，也就是新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那种错误：他是从那个不言而喻的假设出发的，这个假设就是：充分就业是会流行的，因此，所有资本都可以投资并获得平均利润率。这个假设是不适用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如果作这样的假设：一部分过多积累的资本只能获得平均利润，也就是说，从剩余价值生产这一观点来看的话，这种资本是呆滞的，那么，这种资本之用来生产军火或由国家购买的基础结构的设备，就完全能够增加剩余价值总额，从而也就加速了资本积累，即使国家购买时所用的款项，一部分是靠赤字财政，一部分是通过赋税。对未来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的权利，与当前剩余价值的增高，是根本不能相容的，既然扩大再生

产实际上确实是发生了。甚至连并不进入再生产过程的商品生产，也能够提高已经生产出来剩余价值总额。

在本书的开头，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里，我们简略地预期性地论述了晚期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中所处的地位和价值规律统治其固有矛盾的方式。现在，我们可以阐明并总结一下我们的主要发现。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时候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剩余价值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这一提高由于不变资本一些重要因素的价格的显著跌落而在继续发展。这就使得“总的资本”能够克服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下降或停滞。其结果就是资本积累的加速（长期军火经济也进一步促进），这种加速现在利用了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发展成熟了一些发明和革新，从而发动了第三次技术革命。

在这些特殊的条件下，加速了的资本积累在两种意义上促进了利润率。第一，劳动力稳步地得到了解放，因此，剩余价值率可以保持在一个高的水平上。第二，不变资本因素的花费有了进一步的减少，因此，资本有机组成的增长较之乍看外貌要更加缓慢而又稳健。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利润率一直保持在相对高的水平之上。结果，生产力的长期提高，使得晚期资本主义突出出来了。但是，这样一种发展情况在世界资本各个部分中，并不是平均分布的。资本家阶级中的一个部分——即使是一个不太重要的部分——在这个期间被完全剥夺了机会。<sup>[53]</sup>在各个帝国主义宗主国家里，一系列垄断资本在所谓“增长部门”中站住了脚，并且取得了大量的技术方面的剩余利润，这种剩余利润就某种程度而言，由于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不等价交换而扩大了。加速了的资本积累主要就发生在这些部门中——这些部门是扩张性的“长波”的真正“担负者”——这就导致了需求结构的一种变化，从而使一些生产领域遭受了利润的相对的或绝对的缩减：烟

煤矿、农业、传统纺织工业（甚至包括部分成衣工业）、小零售商等等。但是，快速发展可以使应用在这些分枝中的劳动力转移到晚期资本主义的增长部门中去（工业和各种服务业），因此，“扩张性的长波”就具备了工业化新浪潮的性质（在广度方面，尤其是在这些国家，例如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美国南部诸州、西班牙，以及几个半殖民地比如巴西、墨西哥、香港和新加坡；在深度方面，如农业的“工业化”、会计、银行体系、某些服务部门和建筑部门）。但是，正是由于用这种办法取得的巨大的垄断剩余利润，那些增长部门由于资本积累率而愈加显著，这种资本积累率超过了“最终消费者”一方面需求发展或社会需求全面结构的改变。这样，一个日渐发展的能力过剩，就从主要负责长期“繁荣”的那些部门中出现了，这种能力过剩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停滞或衰退生产部门中已经变得很明显的那种能力过剩相似。

信贷的扩大、批发和零售贸易的“工业化”、服务行业的扩展、在运输和无线电通讯部门中以及在诸如存货控制各种活动中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种种革新等，都使得流动资本的运转相对地加速，这进一步有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利润率增长。<sup>[54]</sup>因此，固定资本投资规划的日趋增长的花费、建设新的工厂和生产联合企业所需时间的加长、自筹资金率的缩减和向信贷收缩方向发展倾向的加强等，都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周转期的缩短，有所限制，并倾向于在不能作生产性经营的条件下，使资本越来越多地变成固定资本，这样，又反过来使利润率再次衰减。

在比较重要的那些帝国主义国家中，长期的超过平均增长率同时也就意味着吸收了工业后备军——尽管有大量输入的外国工人从半资本主义世界输向晚期资本主义的各个中心。这样一来，利润率也就受到了剩余价值率降低的威胁，而资本有机组成的长

期增长——不管多么缓慢——不可避免地会对它产生进一步的不利的影响。第三次技术革命、固定资本缩短了的周转期、在要求文化和技术资格有更高水平的劳动力再生产的越来越大的重要性、研究和发展的越来越大的重要性等，其本身都越来越由国家来资助，所有这些因素联合在一起，产生一种紧迫感，那就是在公司内部向更大的经济计划发展，在整个社会向经济规划方面发展。生产联合体系的更大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产生了私人 and 公共经济节制和社会控制的越来越大的必要性。但是，生产的商品性质和向资本增值发展的紧迫感所造成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限制了这种节制的效力。归根结蒂，垄断剩余利润和平均利润率、特殊商品市场和专业企业的增长率，仍然是摇摆不定，并且受着价值规律的制约。

要节制工业循环的越来越多的那些企图，迄今只是由于那些帝国主义列强各种各样民族货币区域的相对独立自主性，才获得了成功。由于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美元，可以作为一种世界货币而与黄金并驾齐驱地发挥作用，那么，这种相对的独立自主性才得与世界市场的稳步扩大和谐共存。<sup>[55]</sup>美元购买力的逐步腐蚀，其本身就是由于在美国国内的资本增值和实现剩余价值的种种困难引起的，这种购买力的腐蚀现在已经削弱了美元作为一种世界货币的功能。这反过来又危及了国家操纵的货币的整个体系，并且使这种体系越来越有必要恢复成世界市场上被普遍接受的万能等价物，这种等价物不受“资本总额”中国家占有部分的干预。在节制商业循环方面的“国家的”货币和信贷政策的作用，因而就有被决定性地削弱的危险。这一威胁也正在变成现实，并达到了这种程度：在新的一次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加速扩张的“长波”已经导致了资本加速积聚并集中的新的阶段，这种新阶段使得跨国公司具有了晚期资本主义企业的那种有决定性意义的组

织形式。晚期资产阶级国家对这一种组织形式所发生的影响，比对于去年或以前的“国家的”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影响，要小得多。由于生产力发展速度超过了国家发展速度，那么，生产力发展速度也会逐渐超过国家在控制工业循环并推动经济繁荣和发展的作用方面的发展速度。垄断资本越是认为它们在国内已经摆脱了价值规律的束缚，那么，它们在国际上受价值规律的约束就越是严重。

最后，由对于技术剩余利润并占有这种剩余利润的追求所引起的整个经济过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两极，积累了庞大的爆炸性物质。在今天，国际资本的运动，越来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而国际资本市场并不存在任何一致性（也没有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生产关系均匀化）。其结果就是这样：宗主国的居民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居民之间在生产力、收入和繁荣等方面的差别，一天比一天悬殊，因而增加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中求解放的革命运动。第三次技术革命已经在宗主国劳动群众的需要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包括在工作形式和工作内容方面质的变化的需要；但是，晚期资本主义并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在今天，更使它作不到这一点的是，争取剩余价值率的普遍斗争的爆发，甚至已经强使它在实际上来否认以前给予无产阶级那些“权利”（尤其是充分就业和工资谈判的自主权）。因此，在宗主国家内，各种社会矛盾和紧张状态在日渐加深。其根源在于社会危机的日趋普遍化，这种社会危机普遍化的根源，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来加以讨论。

## 注 释

-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四三八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五〇四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2〕 来源同上，第四四一页（中译本同上，第三卷，第五〇七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3〕 “宁可说产生了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比前一个问题清楚。那就是，在地理上广阔的世界市场结合着交通运输所需时间的大大缩短，是否增加了夜晚干扰的可能性，而且，欧洲工业国家财富的大大增长结合着现代信贷制度的灵活性和工业卡特尔的兴起，是否减缩了地方性的或特殊的干扰对一般商业形势发生的反响，至少说在较早期的那种经济危机之前很长一段时期，可以认为是全然不大可能的。”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斯图加特，一九二一年，第一一三——一一四页。也见卢恩塔尔（保尔·塞伦，(Paul Sering)：《资本主义的未来》，第三版，努恩堡，一九四八年（第一版在一九四六年）；约翰·斯特拉契：《当代资本主义》，伦敦，一九五六年，第一——四十二页。约赛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纽约，一九六二年），也值得一提。在这部著作的第一三一——一三四页（这部书首先在一九四二年发表），熊彼特预言了加尔布雷思的这一论点：资本主义企业家和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将会消失。
- 〔4〕 在这样一些理论家看来，这一分离是很明显的，这些理论家一方面宣告了资本主义解决其经济困难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又承认资本主义对社会领域各种危机的敏感性，而这种敏感性是产生于剩余价值生产者与从这些生产者手中把剩余价值掠夺去的那些人之间的难以克服的矛盾的。
- 〔5〕 在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过渡社会的生产关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或者要理解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的社会性质时，这一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们的下一部著作，将专门来研究这一问题。德国共产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责怪我们，说我们支持一种“集

中”理论，这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有意歪曲的产物。和我们的志趣相投的同志们一道，我们已经经常地强调了晚期资本主义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经济的基本不同的社会性质。要使得这两者相似，在前者需要进行一次社会革命，在后者需要进行一次社会的反革命。

- [6] 持这种观点的有大量的文献。比如：卡尔·凯森说，“大公司的经理（他称之为不负责任的寡头）拥有广泛的、不受市场势力限制的决定权……因此，经理要考虑的，正是经理决定要考虑的。”《现代公司的社会意义》，载“美国经济评论”，一九五七年五月号，第三一六页。伯尔利关于“垄断集团的社会意识”的理论，和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家》，都是以类似的幻想为基础的。作为对比见英国人的清醒分析，卡特(C. F. Carter)和威廉斯(B. R. Williams)：“看来在我们进行过研究的战后时期严重的不稳定性的程度，其中包含着重大的预言努力（预言革新投资的成功——著者），通常是很小的。……这种“不重要的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就是公司以过剩需求或贫乏供应而投入革新的程度，或工厂和机器供应者的企业投入革新的程度。……事实上这是一个乐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革新是在直接需要或对未来经常保持希望的压力之下向前发展的。”《革新的投资》，伦敦，一九六九年，第九十九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同样情况也可明显地谈及每一个“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比如从一八九三年到一九一三年这一阶段。
- [7] 保尔·麦蒂克正确地批判了希法亭的这一观点：价值规律的这一作用，适应于一种历史的“客观条件”，而不是适应于经济资源在各种各样生产分支部门符合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方式的逻辑的特殊分配。见《马克思与凯恩斯》，伦敦，一九六九年，第三十二——三十五页。
-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一八三页以下。
- [9] 不管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发生在资本外流之前（例如在烟煤矿山），还是同时发生（例如在棉花方面），还是在其后发生（例如在冶铜工业）。
- [10] 见马克思：“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竞争者逐渐变成垄断资本家。如果垄断资本家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资

本家来说，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垄断资本家间的竞争就愈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哲学的贫困》，莫斯科，一九五六年，第一五二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一七八——一七九页）。

- [11] 一九五〇年，美国十家最大的制造公司拥有所有制造公司财产的39.7%，一九七〇年则拥有48.9%。拥有一亿美元以上财产的700家大公司只占有所有公司财产的0.1%，在一九五〇年，它们拥有所有财产的一半，在一九七〇年，它们拥有所有财产的三分之二。拥有十亿美元或更多美元财产的制造公司，在一九七二年为115家：这115家公司控制着所有财产的51%，获取所有利润的56%。
- [12] 马克思：“因此，利润率将会在一切生产部门内相等，也就是会说平均化，和这些中位生产部门，即有资本平均构成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相等。”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七三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一七九页）。
- [13] 在第一个周期中，第Ⅰ部类中500个利润单位和第Ⅱ部类中495个利润单位，都被无所生产地消费掉了。在第二个周期中，第Ⅰ部类的600个利润单位和第Ⅱ部类中480个利润单位也被这样消费掉了。
- [14] 在第一个周期中，第Ⅰ部类利润的分配如下：无所生产而消费掉500个单位，投资于C的有1,350个单位，投资于V的有350个单位；在第Ⅱ部类中，无所生产消费掉100个单位，积累于C的有350个单位，积累于V的有50个单位。
- [15] 在第二个周期中，利润的分配情况如下：在第Ⅰ部类，无所生产消费掉400个单位，积累于C的有2,260个单位，积累于V的有220个单位；在第Ⅱ部类中，无所生产消费掉50个单位，积累于C的有120个单位，积累于V的有50个单位。
- [16] 在第一个周期中，利润的分配如下：第Ⅰ部类，无所生产消费掉400个单位，积累于C的有1,025个单位，积累于V的有500个单位；第Ⅱ部类，无所生产消费掉150个单位，积累于C的有400个单位，积累于V的有225个单位。在第二个周期中：第Ⅰ部类，无所生产消费掉1,500个单位，积累于C的有1,424个单位，积累于V的有500个单位；第Ⅱ部类，无所生产消费掉200个单位，积累于C的有500个单位，积累于V的有201个单位。在第三个周期中：第Ⅰ部

类，无所生产消费掉 300 个单位，积累于 C 的有 1968 个单位，积累于 V 的有 529 个单位；第 II 部类，无所生产消费掉 200 个单位，积累于 C 的有 529 个单位，积累于 V 的有 200 个单位。在第四个周期中：第 I 部类，无所生产消费掉 1,500 个单位，积累于 C 的有 2,971 个单位，积累于 V 的有 500 个单位；第 II 部类，无所生产消费掉 200 个单位，积累于 C 的有 500 个单位，积累于 V 的有 184 个单位。在第五个周期中：第 I 部类，无所生产消费掉 300 个单位，积累于 C 的有 4,536 个单位，积累于 V 的有 350 个单位；第 II 部类，无所生产消费掉 50 个单位，积累于 C 的有 150 个单位，积累于 V 的有 53 个单位。

- [17] 胡夫什米德 (J. Huffscheid): 《联邦共和国的资本、集中和政治经济政策》，法兰克福，一九六九年，第七十页。有三位意大利著作家使用了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格纳省 (Emilia Romagna) 金属加工工业的例子，以表明：手工业的残余和小规模的工业企业（这些仍然雇用着这一部门工人总数的一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依赖大公司的政策，并且还可以用这些企业中的更严重的剥削——更大的剩余价值生产——来加以说明。见加里巴尔迪、里纳尔迪尼和查皮里 (Garibaldi, Rinaldini and Zappelli): 《Un'Analisi sull' Impresa Minore in Emilia——Ristrutturazione Capitalistica e Sfruttamento Operaio》，“Fabbrica e Stato”，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七二年三月——四月号，第二十九页以下。
- [18] 在本书第十二、十三和十四章中，我们已经分析了这种“剩余”概念的各种缺点和矛盾。著者还写有两篇文章，更深入地批判巴兰和斯威茨的著作，这两篇文章和其他一些著作家的批判文章收在一个集子里，题为《垄断资本——评保尔·巴兰和保尔·斯威茨的著作》，法兰克福，一九六九年。
- [19] 巴兰和斯威茨：《垄断资本》，第十五——二十页。“每月评论”，第二十二卷，第四期，一九七〇年九月；斯威茨发表在“每月评论”上的一篇文章，第二十三卷，第六期，一九七一年十一月。
- [20] 比如参见卡特尔 (Anne P. Carter): 《美国经济的结构变化》。
- [21] 参见我们对于抗危机“总卡特尔”这种概念的批判和本书第一章和第十四章有关的马克思引文。布哈林有一个错误的信念：金融资本可以

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至少在单一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如此（《转化时期的经济学》，第五页），造成这一错误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没有理解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他没能理解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资本不能把几百种不同的使用价值在数以百万计的、有个人收入的独立消费者中，“组织”成为成比例分配。

- [22] 这在美国过去二十年中一天多似一天地发生于纺纱织布工业、食品工业和小零售商业中——在西欧和日本是在过去十年到十五年中。
- [23] 见加尔布雷思：《新的工业国家》，第十八章。
- [24] 巴兰和斯威茨也争辩道，大公司最终也已大部分退出了任何一种竞争（《垄断资本》，第四十七、五十一、七十四——七十五页）。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系列公司与三十年以后的一系列公司相对比的话，就显示出第三次技术革命和经济各个不同部门与个体公司增长率的主要变化，往往会增加大公司的脆弱性并减弱大公司的竞争能力。新近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美国得克萨斯仪器公司提供的：得克萨斯仪器公司最初从其微型电路获得大量的剩余利润（主要是技术租金），然后，当资本流入这一分支部门并导致价格暴跌的时候，该公司突然又失去了这种剩余利润。制造大型计算机的控股资料公司也遭受同样的挫折。关于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美国电子工业的危机，见“世界报”，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
- [25] 莫尔哈夫(Merhav)前引著作，第八十八——八十九页。
- [26] 保尔·斯威茨：《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载“每月评论”，第二十三卷，第十一期，一九七二年四月号。塞罗克斯公司为这一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照像复制部分赚了大利，它的教育设备部分赚的是普通的利润，而它的计算机部分则是赔钱经营，而且在这种形势下已不可能继续下去了。Nubuo Kanayama：《不可理解的相遇》，载“东方经济学家”，第四十卷，第七四〇期，一九七二年六月号。
- [27] 加迪纳尔·米恩斯以下面清醒的话描述了美国钢铁工业公司作出决定自主权的限度：“钢铁价格负责公司在确定钢铁价格方面有一个自主权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想定什么价格就定什么价格。很明显，如果一个企业要维持健康地经营并继续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其生产功能，那么，价格就必须包括它的成本并且产生一些利润。同样，价格负责公司也不能确定并保持其主要跟随者认为过高的价格。在一个销

售商市场上，较小的公司可以向负责价格公司收取一点溢价；而在一个购买市场上，它们可以把价格订得低于负责价格公司的价格。地域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差别也同样会有所发展。但就主要方面而言，在两种必要利润限制与竞争追随者之间，有一个自主权限，在这个权限之内，负责价格的公司可以自主作出决定。”《制定价格权力与公共利益》，纽约，一九六二年，第四十四页。

- [28] 加尔布雷思：《新的工业国家》，第一二三一—一二八、二六八—二六九等页。
- [29] 关于“管理价格”的辩论，参见第十三章。
- [30] 加尔布雷思断言，主要专家的职业是极为有保障的，也就是不受周期性摇摆和利润率降低的“约束”，这不论从经验方面还是从理论方面都不能得到证明。那不过是对特殊的危机倾向的一个推断，不过是一个特别长期经济繁荣所产生的幻觉的一种产物（美国经济在一九六一年与一九六九年间，没有经历过任何真正的衰退）。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公司中任何一个雇员，不论其职位多么高，都不会有一种与高级文官相等的那种安全的收入。不仅仅是如果利润跌落得过于利害他会失去他的位置，而且，如果公司不得不大裁员或破产的话，那么，他也会失去他的位置。在本书写作的时候，美国已有六万五千个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失业，在某些领域占很高的比例。（“世界报”，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新工业国家”有一些奇怪的“主人”，他们自力更生地取得他们每日的面包。如果所有赚取薪金的人的特点，都表现在这种基本的职位不安全性上的话，那么，他们要取得真正的经济安全性的唯一手段，就在于取得私有财产，也就是资本（股票、不动产等等）。换句话说，“技术结构”行为，基本上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而不是取决于什么社会经济动机——更不必说什么美学动机了。
- [31] 就基本而言，“技术结构”观念似乎不过是布哈林那种“经营革命”的一种精炼的说法。下面从塞伦（卢恩塔尔）的《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摘引的一段话，说明了加尔布雷思的概念所实际具有的创见是多么有限：“越来越高的生产科学性所造成的结果是更加专业化、更加需要受过长期专门训练的人员。现代大规模生产的组织工作和随之而来的国家管理工作，由于组织领域的扩大化而更趋复杂化而不是简单

化了。……因此，形成一个职业等级的倾向，在现代生产中就象在现代国家中那样，是固有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等级制度的轮廓是怎样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伪装之下产生出来的，大多数资本主义所有者失去了他们的作用，正象企业家也失去了他们的执行功能那样。”前引著作，第六十七——六十八页。

- [32]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第四二三——四二六页。
- [33] 比如一个集体作者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载“论辩”，第十二卷，第五十七期，一九七〇年五月，第二二三——二二四页。
- [34] “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新的竞争、产品代用品、完全新技术等的威胁。就连最大的商人对他们那垄断地位也可能感到比理论家假定他们应该感到的更加不安全。”绍尔利·帕特森教授：《公司控制与资本主义》，载“经济学季刊”，一九六五年二月，第十页。在美国，钢铁系统过高的价格维持了三十多年之久，这一情况导致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渐以轻金属和塑料用作工业和建筑材料以代替钢铁。卡特：《美国经济中的结构变化》，第八十四页以下。
- [35] 在美国，许多经验方面的探索证实了在垄断价格和利润巩固的情况下进入经济某些部门的各种“困难”所起的重要作用，并证实了这些困难总是相对的这一事实。参见贝因(Joe S. Bain)：《通向新竞争的障碍》；理查德·奈尔逊、莫尔顿·皮克和卡拉契克：《技术、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第七十——七十一页，加迪纳尔·米恩斯：《价格力量与公共利益》，第二三〇页以下。
- [36] 贝因(Joe S. Bain)：《利润率与工业集中的关系：一九三六——一九四〇年的美国制造业》，载“经济学季刊”，一九五一年八月；J. S. 贝因：《通向新竞争的障碍》，哈佛，一九六五年，第一九五页。《美国统计摘要》，一九六一年、一九七一年，关于一九七二年的情况，见《美国统计摘要》，一九七三年。
- [37] 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把使用部门利润率作为垄断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据正确吗？严格地说，需要两种标准的联合来确定垄断剩余利润：部门差异和规模差异。规模本身并不是垄断条件的保证。在竞争性的部门中，就连规模巨大的公司也不能作到垄断控制，如果在总销售额

中所占比例过小，或者公司总数太大，那么，价格竞争就不能消除的话。理想的为垄断化而联合是汽车工业的联合：公司数目既少，每个公司的规模又很大。

〔38〕 米恩斯前引著作，第二四〇页。“经理杂志”，一九七二年六月。

〔39〕 艾尔玛·阿尔特维特尔：《垄断利润与平均利润》（草稿），第二——四页。

〔40〕 在这里，资本指明了公司的经营组织形式，而不是股份所有权。一个小制造商或甚至一个杂货商当然也可以购买汽车公司的股票。这并不需要数以亿计的美元。但是反过来说，他也得不到垄断的剩余利润，他只能得到他的股票现有价值的平均利息率，甚至连这个也得不到。

〔41〕 阿尔特维特尔前引著作，第十六、二十一——二十二页。

〔42〕 可以这么说，由于石油价格的猛涨而在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对帝国主义市场的剧烈震荡，造成的后果是资本大量涌进石油部门（随后涌进整个能源部门），并且明显地从汽车制造部门中外流。但是规模很小的那种汽车工业以及那些因资本大规模外流的灾难性受牵连者，都获得了同样多的国家资助来限制这种外流——经济中竞争部门所受的限制并不是规模一样大小。

〔43〕 “在这里，基本的观念是平均利润本身。这个观念是，各等量资本，必须在相同的时间内生出一样大的利润。这个观念又有别一个观念作为基础：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都要比例于各自的量，来分配社会总资本从劳动者那里榨出的总剩余价值；或者说，每个资本都只当作总资本的部分，每个资本家事实上都当作总企业的一个股东，比例于各人自己所有的资本股分的大小，来参与总利润的分配。所以，资本家的计算本来就是建立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例如，一个周转得比较缓慢的资本（因为商品有较长的时间停留在生产过程内，或因为它必须运送到相隔很远的市场去出售），会设法把因此失去的利润捞回，所以会用加价的办法，来得到补偿。”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二〇五——二〇六页（应为第二〇九——二一〇页——译者）（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二二二——二二三页）。

〔4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八三九——八四〇页（应为八六〇——八六一页——译者）（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一〇一〇——一〇一一页）。

- [45]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第一三一页,这里有著名的一段话:“两座金字塔,为了死者的两种群众,都会比一个好一倍,但是从伦敦到约克修两条铁路可并不是如此。”
- [46] 关于在大萧条时期在国家压力之下被迫发生的卡特尔化的例子,见拙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第十四章,第四九六——四九九页;关于不赢利工厂的国有化,以及这些工厂在一旦在赢利之门槛重新打开时之再度出售给私人资本家的情况,见同一著作的第五〇二——五〇六页。
- [47] 见杜丘·卡瓦利里 (Duccio Cavalieri):《La Politica dei Lavori Pubblici: Sviluppi Teorici e Indirizzi Programmatici》,载“Pianificazione”,第三卷第三期,一九六六年九——十二月,这一著作附有相当多的参考书目。
- [48] 詹姆士·奥康诺尔在一篇有趣的论文中,区别了“补充的”与“任意的”国家投资。前者创建了一些企业,这些企业是私人部门赢利生产所不可缺少的(也就是基础结构方面的投资),而后者则代表私人部门放弃了的或从来不从事的那些投资,原因是缺乏赢利性。《国家的国库危机》,载“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七〇年一月——二月号。
- [49] 私人资本占有的这种利润总额增加,显然并不是以相等比例对每一种个人资本都有利:它适应于在各种私人资本间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
- [50] 在相对的甚至绝对的需求减缩的工业部门中,国有化显然可以伴之以国有化资本的大规模贬值。但是,这种国家事务也是完全可以与强制现代化或强制进行新投资和谐共存的。见煤矿工业在这一方面的例子。
- [51] 正象选择性投资指导的社会意义问题那样,这一问题在十五章中进行论述。
- [52] 麦蒂克:《马克思与凯恩斯》,第一一五——一一八页。
- [53] 我们这里指的是在中欧和东欧、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的那些被无偿地没收了的企业所有主,或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逃走的资本家阶级的那一部分。这并不是意味着,这些一度的所有主停止了作为资本家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设法携带着他们的资本的一部分,并且在西德、美国、澳大利亚、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地方建立起了新的资本主义企业。当然,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制度尚

未被推翻的那些国家的国有化企业的那些所有者中,是更为明显的。苏伊士运河运输公司、波里文锡业巨头巴蒂诺或联合矿业公司在今天所拥有的资本比他们原来企业国有化之前还要多。

- [54] 见海尔莫特·茨丘克 (Helmut Zschecke) 所作的有趣的计算 (前引著作, 第八十八页)。茨丘克估计, 在西德的工业界, 流通资本每年周转周期的数目, 从一九五〇年的 3.86 增长到一九六八年的 5.10。关于计算机控制存货的重要性, 见斯蒂芬·保丁顿 (Stephen Bodington):《计算机与社会主义》, 诺丁汉姆, 一九七三年, 第一〇一——一〇二页。
- [55] 这一发展的辩证法是这样: 世界市场在地理方面的减缩, 完全可以很好地伴随着它在价值和已售出使用价值的物质数量方面的扩大。公认的是, 这一种扩大只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变得意义重大, 如果我们使按人口平均的世界贸易或这一时期制成品工业中最重要产品的输出份额, 与一九一三年或一九二九年的相对比的话。

## 第十八章

###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危机

晚期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史上，是这么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残余之间的矛盾，采取了一种爆炸性的形式。这一矛盾导致了这些生产关系的扩散性的危机。

首先，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加以详尽界说。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包括男人和女人之间在他们物质生活生产中的一切基本关系。<sup>[1]</sup>因此，把这些关系只局限于资本关系的单一方面，那是不正确的，比如活人从属于死的劳动，或在一个生产单位内生产者与生产手段的关系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质在于商品生产的一般化。后者决定了生产者从生产手段中分离开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与奴隶劳动时代的形式是不同的；后者还决定了占有剩余生产物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与封建社会的形式是不同的；后者还决定了社会劳动力重新组织的特殊形式以及各生产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商品生产的一般化就意味着劳动力和劳动手段本身已经变成商品了。所以，资本主义关系不能简单地导源于生产者对“行政官员”或“积蓄者”的隶属，而这些人每一个阶级社会里都是有的。这些人使得劳动力商品出售给生产资料所有主；他们使这些所有主又在相互竞争中分裂而为不同的资本家<sup>[2]</sup>，这些资本家必须把他们所占有的价值的数量交换成为货币，以便来实现包含在其中的剩余价值，并以一种扩大了规模来继续进行生产；他们还使个别单位的这种额外资本，

纳入一个积累过程，这一过程取决于竞争的紧张状态。

物质生产如果没有原料、机器和其他劳动工具、辅助物质和能源等的正常供应，那么，其不可想象程度就正如在工人与劳动手段之间没有一种特殊关系一样。所以，当马克思给资本下定义说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也就是一种生产关系的特殊类型——的时候，他同时以同样的方式给商品生产下了定义，即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sup>[3]</sup>

企业之间作为交换价值而互相购买生产资料、原料或能源，这一事实同样地也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生产关系的一个特征。如果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关系，在企业内部被彻底废除了（比如通过它们的转化成为生产合作社），而一般化的商品交换仍然可以在这些合作社之间通行（也就是相互作为商品来购买或销售生产资料）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种因素的持久性，将会重新使生产者从他们的生产手段中分离出来，这种情况的发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sup>[4]</sup>

人们生产商品，因为他们所掌握的社会劳动在以前已经区分成了“各自独立执行的私人工作”。<sup>[5]</sup>劳动所采取的这种特殊的形式，反过来也要依赖一种特别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取决于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和社会劳动工具的发展。只要社会劳动还在或多或少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单位（部落的、亲族的或村社的）中进行，那么，用一种简单的、先验的规律来保证劳动的直接社会性质，就没有什么大的困难，而这种规律是以习俗、礼仪和基本组织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交换、私有财产和简单商品生产等的发展，逐渐使这种社会劳动能力分裂成了各种私人工作，这种工作的社会性质或是完完全全被承认，或者部分地被承认，或者根本就不被承认，这要从经验上经过市场上商品关系的迂回道路，而且只是在通过了实现商品价值这一紧要考验之后（在资本主义中是平

均利润这一考验)。

而在另外一方面，社会劳动分散成为各自独立执行私人工作的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个阶段，就达到了其顶点，换句话说，随着这一生产方式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发展，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倾向。资本使得数目不断增加的工人会集于一个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劳动过程中。它把人类越来越大的一些部分联合到生产过程中，这种生产过程客观地在社会化，并且以相互依赖的千头万绪互相关联在一起。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劳动越来越客观社会化与私人占有进一步持续进行之间的这一矛盾〔6〕——与下面两者之间的矛盾是相适应的：一方面，私人劳动越来越消失（不但是在个体工厂中消失，而且也在大公司或世界范围的大公司中消失），另外一方面，作为生产目的的利润或交换价值商品形式的残存，而这一矛盾是以私人劳动为基础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某一特定的阶段，才是可能的——一旦物质方面的先决条件存在的话，首先是在资本中形式上的劳动归类，然后是实际上的劳动归类。这些物质前提当然都后于并次于已经描述过的那些社会先决条件。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预示着劳动社会化发展中的一个特定水平，这既是真实的，也是矛盾的。当基本的劳动分工在彻底私人劳动阶段被抑制的时候，在这个阶段中，小的消费单位的使用价值几乎是用不变的劳动工具生产出来的，而且生产者的相互依赖，也降低到了为了满足一些需要只依靠别人的部分劳动，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商品生产肯定是能够得到发展的，但资本主义式的商品生产却不能得到发展。在这一阶段，劳动社会化的程度、劳动生产力和社会剩余生产的发展等，都仍然还太低，不能允许普遍化了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7〕

就是这个缘故，劳动的社会化必须开始来取代劳动的个体性质。制造业和大企业的劳动分工，必须促进各种各样职业之间的劳动分工。生产者中的绝大部分都必须停止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并主要以市场的方式来满足这些需要。这就要求发展机器，也就是说，要求更大得多的社会剩余生产，如果没有这种更大的剩余生产，那么，另外那种大大发展了的机械，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出来。机器的生产、物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客观社会化过程的不断加速——所有这些，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进步的成就。〔8〕

劳动社会化由于资本而具有的这种对抗性的性质，包含在下面这种事实内：现在工人们既面对着他们的生产，也面对着他们的劳动手段，这些以资本所固有的一种神秘的方式，就象某种异化的、敌对的东西而从他们身上分离出去了。马克思曾经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客观社会化的这种形式——这对工人是个沉重的压力——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可以归因于这样一种事实：工人本身必须个别地从事一种生产过程，而工人群众则必须以分散的方式从事这种生产过程，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他们自己的普通生产力变成了脱离他们本身的一种东西：

“实际上，协作中的共同的统一，分工中的结合，自然力与科学的运用，作为机器的劳动产品的采用，——所有这一切都作为异己的，物质的，既与的东西，没有单个劳动者参加而且往往反对单个劳动者参加的东西，独立地跟单个的劳动者相对立，就是说，都是作为同单个劳动者无关的和统治着单个劳动者的劳动资料的单纯存在形式，只要这些劳动资料是物质的，是资本家或其Understrappers〔手下〕（代表人）所体现的总工厂的意识与意志，只要所有这一切，是由劳动资料本身——作为存在于资本家〔人格〕中的资本的职能——的结合所形成的。单个劳动者自身的劳动

的社会形式——主客观形式——或单个劳动者自身的社会劳动的形式，是完全不依赖单个劳动者而形成的关系；劳动者作为来属于资本的人变成了这些社会构成的元素，而这些社会构成并不属于劳动者。所以，这些社会构成作为资本本身的形式，作为同劳动者的单个的劳动能力相区别的，从属资本的，产生于资本的和合并到资本中去的各种结合，跟劳动者相对立。而且，由于两方的情况，这一点会采取越来越现实的形式；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本身通过这些形式越来越发生变化；劳动能力在自己的独立性中即在这种资本主义关系之外，会变成无力的，它的独立的生产能力会被破坏；另一方面，随着机器的发展，劳动条件在工艺上也越来越表现为对劳动进行统治的东西，同时，劳动条件越来越代替劳动、压迫劳动，使劳动在独立形式中变成多余的。在劳动者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以一定程度上资本化的形式跟劳动者相对立，——比如对机器来说，明明白白的劳动产品表现可劳动的统治者——的过程中，就自然力与科学即一般历史发展在其抽象精华上的成果来看，也自然而然地会发生同样现象：这种自然力与科学是作为资本的能力同劳动者相对立的。这种自然力与科学实际上是脱离单个劳动者的熟练技巧和知识的。——尽管从它们的来源方面来看，它们又是劳动的产物，——凡是在它们参与劳动过程的地方，它们到处都表现为被合并到资本中去的东·西。”〔9〕马克思接着说“劳动的社会自然力并不是在价值增殖过程本身中发展自己，而是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发展自己。所以，这种社会自然力表现为属于资本作为物、作为物的使用价值的属性。生产劳动，作为生产价值的东西，始终是作为单个的劳动者的劳动同资本相对立，不管这些劳动者经常在什么样的社会结合下参加生产过程。所以，当资本代表跟劳动者相对立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时候，生产劳动总是跟资本相对立只代表单个的劳动

者的劳动。”〔10〕

马克思经常描述社会主义社会是联合生产者的一种社会，其原因就在此。因为，如果在生产和劳动过程中的这种分离，被一劳永逸地彻底废除了，而且，如果从此以后生产者以自愿联合的形式共同地来组织、计划〔11〕、讨论并实现他们的劳动过程，那么，社会生产力的神秘性就消失了，而且，后者似乎也不再依附于作为生产者“外部”集体力量的那些事物之上，而被认为是共同的、共同计划的和所有工人共同组织的劳动力的结果。

劳动的客观社会化是一种过程，技术、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这种过程变成为不可改变的了。但是，它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和非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却有基本的差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度之内，劳动社会化只是在间接地流行。确定经济资源在经济的各种分枝中以适应于平均利润率的波动和偏离方式而分配的，仍然是价值规律（资本基本上是向能够实现剩余利润的那些部门中流动）。对比之下，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普遍化了的商品生产——已经被废除了，那么，联合生产者就可以先验地理解到他们的劳动的客观社会化。经济资源将会以一种有计划的方式，根据社会确定的顺序，在经济的各种分枝中分配。就是在这个时候，劳动的性质会立刻变成为社会的，并且，“社会必需劳动时间”这一范畴（社会必需劳动量），就不会再具有较资本增值更多的意义了。〔12〕

在这一点上通常会出现关于马克思那种生产关系概念的第二种误解：将这些划分成“技术的”和“社会的”关系的企图。〔13〕当然会有特殊生产关系的先决条件。在资本之下没有现代机器的存在而要作到真正的劳动归类，其不可能的程度，就与使以手工劳动方法为基础的小企业不必转化其技术而社会化的无效程度一模一样。〔14〕但是，从这一点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既然“技术方面的

生产关系”不允许有一种劳动的“彻底社会化”，或由社会“彻底占有产品”，那么，就必然会有—种商品生产的连续性，〔15〕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把马克思将生产关系界说成人與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概念，降低成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引进—种新的技术拜物教。

劳动的性质并不是直接取决于技术，发展的阶段也不是依靠生产力而达到的。在每一个孤立的生产单位中，肯定不是这么决定的。〔16〕甚至整个社会也不是如此决定的。两种基本上不相同的社会结构，可以适应于一个特定的技术水平。在社会革命时期中，总会是这样的。〔17〕在这些社会革命的时期中，新技术的发展倾向是超越现存生产关系，这种新技术的发展在传统的社会秩序内，将会越来越变得不彻底、多矛盾并有破坏性，而与此同时，新的、革命的生产关系在其他地方的引进——这种生产关系象其他一切这类结构—样，不能够“—步—步”地引进——将会有超出现存技术状态的倾向（这样恰恰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动力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空间）。晚期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当前那些过渡性社会的类似而又不同的问题，可以追踪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特殊的辩证法。〔18〕

因此，在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的时期，不能期望科学和技术使之可能发生—切革新，都会在社会生产关系转化之前完成。但是，这一矛盾恰恰表现在下面—事实中：—次潜在的科学与技术革命在现存的社会生产关系结构中，只能得到部分的实现。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大工业的普遍自动化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前，要期待这种普遍自动化，其不正确的程度，就如同期望只是通过自动化的发展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样。〔19〕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危机，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整个的社会危

机——那就是在整个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所行的整个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的衰落。这既与古典的那些生产过剩危机不相一致，也不排除那些危机。这种社会危机的最高峰，是阶级斗争革命前的和革命的形势，这时候，它在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彻底的政治危机中达到了顶点，在这种政治危机中，无产阶级对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构成了客观的威胁，并且开创了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的所有那些事件，给这些发展高峰有力地准备了条件，并且迫使工人们在工厂、企业、地方、区域和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临时性的双重权力机构。这种情况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发生的呢——在这种条件下是没有经济上的让步的，例如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法国和一九六九年的意大利——还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的——在这种条件下是有经济上的让步的，比如在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的西班牙——这要依靠这一时代外部性质的联合因素来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张长波结束后所造成的本质的、内在的结果，以及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以来所引起的为争取剩余价值率的加强了斗争，是向本质上尖锐化了的阶级冲突发展的世界范围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将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那种特有的危机，带向爆炸之点。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危机似乎是在生产单位（企业）内部或在生产单位之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体系的那种危机，这种危机或是在现在的形式中或在可能的形式中，与劳动的技术基础，越来越不相适应了。我们可以给这种危机下这样一个定义：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占有条件、增值和积累的危机，而且还是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劳动分工、资本主义企业结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和劳动归类等在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之下的一种危机。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危机，都只不过是一个单一现实、一个社会经济总体的不同的方面：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sup>〔20〕</sup>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危机是作为资本主义占有条件、增值和积累的一种危机出现的。在我们讨论持久性通货膨胀的时候，我们已经强调过，这一体系现在已不能使用在稳定黄金价值“正常的”条件下它那生产能力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没有信贷和货币的持久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在深入到经济现象内部进行理论分析的时候，实现剩余价值的基本困难，从来没有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具有潜在扩张倾向的长波”阶段那样明显过。

降低成本价格、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劳动社会化、改良机器和提高资本有机组成等的永久性的竞争压力，不可避免地会在使用价值堆中的那种不均衡增长中有所表现。这样，“多种资本”就被驱向了市场的永久性人工扩张和群众需要的扩大。<sup>[21]</sup>每一个个体资本家都愿意限制“他自己的”工人的消费，而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则必须扩大消费品的市场，与此同时，来保证资本的增值。用一些办法可以部分地克服这一矛盾。第一，它可以使得消费的生产越来越“间接”，致使产品总额中越来越多的一部分包含着生产手段，而不是包含着消费品。<sup>[22]</sup>第二，它可以将已生产出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消费品，销售给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一些社会阶级（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和非家庭手工业者），或者把购买力转移，使之不利于简单商品生产者或其他的资本家（其中包括“外国的”资本家，这是通过世界市场的重新划分）。第三，它可以用赊购的办法而不是用交换收入的办法来销售越来越大的一部分消费品（增加私人债务）。最后，它可以保证，群众性消费的增长（包括它“自己的”工人的消费增长），成比例地小于商品价值总额的增长，这样就使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得到提高。

但是，所有这些补救办法，没有一个能匡救下面这一事实：即同时实现剩余价值并提高剩余价值率的困难，是固定在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上的，因为，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一方面代表着劳动过程与资本增值的统一，另外一方面也代表着流通和实现过程，而资本只能保证前一个，利用前一个则最终会增加第二个的不稳定性，反之亦然。

贸易和信贷（包括晚期资本主义关于信贷货币持久膨胀的特殊形式在内）是暂时克服实现剩余价值各种困难的两种基本手段。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越来越大的独立自主性以及商品和货币流通的独立领域的发展，就是为了使实现剩余价值的各种永久性困难能够得到暂时的、部分的松缓，工业资本所付出的价格。其结果所产生的流通资本周转期的加速，使得每年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总额能够增长，所以，这种独立自主性并不一定就降低工业资本所占有的利润。但是，与提高资本有机组成的总压力相提并论的，是发展起来了降低流通资本在生产资本总额中所占份额、并将一切资本都转移到固定资本中去的进一步的压力，这种压力更进一步地提高了资本的有机组成，并且最终必然会压低利润率。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流通和服务领域的萌芽，还完成了另外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是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稳步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也是货币商品与迄今还不受其影响的那些领域的关系能持续扩大所必不可少的工具：“生产越是一般地发展为商品生产，每一个人也一定愈是成为商品交易者，每一个人也愈是愿意成为商品交易者，愈是愿意从自身产品或自身服务中制造出货币，如果他的产品按其自然性质仅仅以服务的形式存在着而这种货币制造又表现为每一种活动的最终目的的话（见亚里士多德）。现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方面，作为商品的产品生产变成绝对的，另一方面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的形式，也变为绝对的。有许多职务与活动，过去具有非常神圣的色彩，他们以自身为目的，是免费执行或间接支付的（例如英国的一切自由职业者，

医生、律师等等；在英国，律师和医生过去不能或者也不能为支付起诉）；现在一方面，这些职务的活动直接变成了雇佣劳动者，不管它们的内容和支付怎样不同。另一方面，它们——它们的价值估价，这个从娼妓到国王的各种各样活动的价格——也陷于那个调节雇佣劳动价格的规律之下。”〔23〕

独立的手工业者、家庭工业、小农企业（维持生活的耕作）、小商贩、研究工作、私人服务工作以及“文化用品”的生产等等，一个接一个地屈从于“赚钱的有组织的事业”。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随着艺术、教育、科学研究和个体的“自由职业”等的普遍商品化，这一过程达到其最高之点。在一方面，单单通货膨胀本身就允许包含在商品生产总额中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占有，而在另外一方面，还发展起来了越来越严重的过分资本主义化，或一个日渐增大的非增值资本数量总额，这种资本总额只能用经济中晚期资产阶级国家的直接干预，才能作到暂时的增值。越来越多的工业分枝部门唯一地要依靠国家的合同来维持下去。

在我们讨论持久的军火经济的时候，我们已经强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中军事合同的重要意义（没有必要再来强调军备经济在最终扭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所起的国际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计划，都是由社会直接资助的。英国雇主联合会的发言人甚至要求几乎一切研究费用都彻底社会化。〔24〕只是由于直接的或间接的国家援助，才使得越来越多的投资成为可能，这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就绝对意义而言是缺少资本，而是因为资本增值的条件已经恶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资产阶级国家不能保证赢利性的话，企业家就不去进行冒险。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过程中，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已经有历史意义地开始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基本的基础，

即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它同时从两个方面这么作。<sup>[25]</sup>在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进步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市场足量供应现象，这种现象把市场经济推向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在这里，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农业方面的情况。在美国和加拿大，一种扼杀生产的人工体系，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这种人工体系自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以来，已经越来越向西欧传播，现在也正在日本开始发展。由于现在已经大大地廉价化了的农业劳动力的产品，不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结构内部摆脱掉这种商品形式，越来越过剩的这些产品不能够在仍然生活在“富裕”国家而又需要这些商品的那些大多数人中进行分配——尤其是不能在不发达国家的那些忍饥受饿的人口中进行分配。而一种不合理的补助制度却不得不创造出来，这种制度包含着削减粮食生产和破坏牲畜生产，人为地对可能的消费进行限制，而且也不能保证农业生产者已完成工作每小时所期望得到的收入。这种荒谬而又不人道的秩序所造成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一九六八——一九七〇年，在全世界农业方面最富庶的国家中，系统的减削了生产并收缩了耕地面积，最终导致了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在亚洲和非洲可怕的饥馑的威胁。

在另外一方面，部分合理性与全面不合理性之间的客观对立，其根源在于劳动日趋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标志，<sup>[26]</sup>这种对立还取得了这样一种爆炸性的可能性，即晚期资本主义的全面不合理性在中期不但威胁着现存社会形式，而且还威胁着整个人类的文明。允许原子弹和有毒气体的“自由买卖”不仅仅是非理性的和无意义的，而且还有自杀性的危险因素，这种事实任何一个小孩子都能够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有毒食物、有害于健康的药剂和药物、不安全的车辆和破坏环境的化学制品——所有这些全都委之于由利润动机驱策的私人积极性——所有这些也许最终会威胁到人类的生

命。<sup>[27]</sup>然而，已经暴露了这些过程的那些专家们，通常拒绝从他们的分析中得出这种必要的社会结论。<sup>[28]</sup>这些罪恶的根源，在于商品生产的残余——换句话说在于社会劳动力总额的重新创造，这种重新创造随着一切人类关系的具体化，随着一切经济活动从旨在满足人类合理需要和扩大人类生活可能性的手段，转变成其本身即是目的，通过市场规律的弯路而分裂成了各种私人的劳动。<sup>[29]</sup>只有生产的直接社会化及其对群众民主确定的需要的自觉的从属，才能导致技术和科学的新的的发展，这种发展能促进个体的以及全人类的自我发展，而不是促进其自我毁灭。<sup>[30]</sup>

就纯经济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客观的全面的不合理性可以归结为这两者之间的对立：一者为以工厂为单位（或以公司为单位）的“私人支付”生产成本的核算，一者为整个社会的直接和间接生产成本——换句话说，也就是个体公司的赢利性与成本利益的社会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对立。<sup>[31]</sup>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用“自由商品”产生的部分“利润”这种术语把这种对立加以神秘化。<sup>[32]</sup>来自当代技术的对环境越来越大的威胁，就种因于越来越缺乏这种“自由商品”，或被算作“负的商品”或“负的利润”。<sup>[33]</sup>商品生产的未来和永久性的匮乏，就由这种弯路而得到了保证。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详细讨论市场法西斯主义的那种野蛮的逻辑。因为，公司为了扩大其利润而污染了大气，使空气新鲜的简单的权利被废弃了：这种“商品匮乏”的“通道”，必然被“赋税”加以收买。<sup>[34]</sup>当然，真正的任务恰恰就是把生产从关系到工厂或公司的赢利性的计算中解放出来，从私有制和商品生产中解放出来，并在没有巨大浪费的情况之下，合理地满足需要。<sup>[35]</sup>一旦这些条件作到了，那么，认真的、民主的计划自然就会保证，不论是“人口爆炸”还是“商品崩落”，都不会威胁到空气、水、土地或人。因为，使人类生存处于危险境地的，并不是科学和当代技术“本身”，

而是科学和当代技术的组织和应用。对技术租金的追求，创造出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与保护人类健康直接相冲突。例如，这种追求迫使化学工业每四年或五年将一些新的合成产品投放到市场之上，而这时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些新产品所可能包含的生物学上的和生态学上的危险性，进行任何负责的研讨。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发展趋势，他那时写道，资本只能以同时掠夺人类财富资源、土地和劳动来发展其自身（以及生产力）。

到了晚期资本主义年代，这种掠夺达到了不可估量的比例。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对立，在资本主义全盛期间，只是在例外地、突然地在经济危机期间才表面化，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则总是表露在外的。这种对立最突出地表现在破坏手段的大规模生产（不仅仅是军事武器的生产，而且还有对人类肉体、心理和道德进行破坏的其他一切手段的生产）；这种对立也可以在这样一些经济部门中看到，这些部门已不再取决于公司赢利性的计算，而取决于“公共的”优先权。<sup>[36]</sup>生产力、人类的利益以及科学的“内在的”进化等，都越来越向这一方面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内部，这种计划必须经常保持在边缘方面。公共优先权由统治阶级中的一个小集团来决定，仅仅有创造物质资源额外浪费的威胁，和损害人类生存的威胁（空间旅行的军事开发、国家机器和私人利益的生物实验）。<sup>[37]</sup>同样，每一个公民都有一个个人的“卡片索引”，明显地应用了可能的政治监视，总结性地将其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所有“事件”都编码记录，这也是为了保护这种社会制度对当代技术非人道地应用的另外一个例证。<sup>[38]</sup>私人占有与国家经济干预相结合，产生一种进一步的经济效果，这必须更仔细地加以探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多种资本”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企业内部的精确的核算和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的部

分的合理性。在这里，政府的原則是最严格的资源经济。<sup>[39]</sup>但是相比之下，国家这一部分之中并没有持续降低成本的客观社会机制，国家这一部分是由配给经济的原则来支配的，其中包含着一种永久性的资源浪费，这种浪费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在其中积极活动的个人，在提高这些配给时，都有物质利益，<sup>[40]</sup>因为，他们仍然自我富裕的这种私人动机所控制着，而这种动机在商品生产经济中，是被普遍化了的。<sup>[41]</sup>

这一矛盾被下面这种事实进一步加深了：从国家那一部分中增加了的那些配给可以为那些公司和资本家构成一种增加私人利润的源泉，或提高他们的能力，以与其他资本集团作竞争。<sup>[42]</sup>这样一来，经济的国有化部分与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之间的连锁关系，就加深了整个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除了其他东西之外，还产生了经济资源的更大的浪费。这种不合理性就连公共部分中赢利的假象也不能加以克服。<sup>[43]</sup>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了这种私有经济与国家干预的连锁关系，这种生产方式的衰落，甚至在历史远景中表现得更为清楚。在一个时期，资本——为了能作到在一种扩大规模方面的增值而受到了竞争和积累的紧迫感的刺激——发展的速度大大快于技术的进步，它带动了技术的发展，并把技术发展导向生产渠道，坚定地要把技术发展置于其势力之内。资本的集中（比如在银行方面），较之实际劳动过程的集中远为优越。因而在十九世纪才为资本的“经济独立自主”打下了基础。在今天，技术的发展已经一劳永逸地越过了“多种资本”的集中化。客观的劳动社会化、最新式的生产方法，一再地超越资本积聚和集中的最先进的形式。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和私人积累，越来越变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一种障碍。部分社会剩余生产的国家集中（以及超国家集中），已经再一次——正像多次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

那样——日趋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先决条件了。虽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日趋国家集中，对于客观的劳动社会化，较之私人资本主义竞争为更适合，但是，它也越来越落后于最先进的技术。这一落后现象在跨国公司及其固有的一切倾向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明白。

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强化，是资方为克服其内部越来越严重的爆炸性矛盾的企图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也是这种企图必然失败的一种表现。在今天，只有全世界范围的一种生产者协会，与生产力和客观劳动社会化的当代国家是相一致的。在一个水平上废弃竞争（也就是无政府状态）的任何一种“中间的解决办法”，都只能在更高的水平上，以更大的破坏力来重新生产出这一情况。这种情况在晚期资产阶级国家是如此，在晚期资本主义跨国垄断集团的情况，也同样是如此。

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不但更加正面地与生产的商品形式、私人占有和由大公司个体赢利性作出的决定发生冲突，而且也与劳动力的商品形式直接发生冲突。劳动分工的冻结和与这种商品形式相适应的劳动资格，都被技术革新的加速发展带向了荒谬地步——正象在西欧的持久的“生产过剩”把黄油的商品形式或苹果的商品形式带向了荒谬地步那样。由于基本劳动技术的一天比一天迅速的发展变化，周期性“保持”的必要性，现在播散到了智力劳动的领域中；它甚至在大学的资本主义改革结构中，还创造出了向持久性部分时间研究方向发展的边际倾向，从而实现了马克思的一个预言。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限度之内，这一种可能的倾向当然是不可能流行的。伴随着它并使之窒息的，是使得大学和整个教育制度直接“获益”的那种中性化并有抑制作用的反倾向。但是，在一生较大部分时间延长学习活动的客观紧张状态，势必会削弱劳动资格的“私有”性质。既然个体的资格主要

是个体努力的一种功能——而且也是由个体户偿付的（或由个人来偿付）——那么，后者就是有意义的。可是在今天，个体资格的生产成本，绝大部分都已经社会化了。绝大多数发明家、研究家、科学家和医生，如果没有数以十万计，实际上是如果没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来生产实验室、建筑物、机械、仪器、工具和物质以供他们使用的话，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他们的那些任务；如果整个生产者大众所生产出来的社会剩余产品，没有向他们保证必要的工作时间而不受再生产他们眼前生活必需品的紧迫感的影响——没有这种必要的工作时间，他们就不能进行他们的科学工作——那么，他们也不可能完成他们的那些任务；如果过去的和现在的其他发明家、研究家、科学家和医生等没有付出必要的先驱性的伴随劳动——没有这种劳动的话，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科学活动是不可能进行的——那么，他们也不可能完成他们的那些任务。因此，每一个同时代的人，只能作为社会劳动力的一部分来发挥他的私人才能。正是在这种智力生产的领域中，迟迟而来的劳动过程社会化，在现在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排除了在“生产者”与“管理人员”之间，或者在“低报酬”的“物质”创造者与“高报酬”的“智力”创造者之间，存在社会等级劳动分工的任何正当理由。<sup>[44]</sup>

但是，在晚期资产阶级社会内部聚集起来的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及其现象方面的特殊形式，劳动力的商品性质的客观挑战，也具有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在这里，马克思的分析又一次被证实了。<sup>[45]</sup>个体的生产力越来越从体力上的努力和神经上的努力（能力的异化）中获得了解放，并且越来越变成了技术或科学设备的一种功能和科学或技术资格的一种功能。其结果就是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界线，变成了流动不定的了。在技术上最发达的企业和工业分枝部门中，劳动的客观结果变成了与雇员的

活动相一致的那种关怀和兴趣的一种功能。这些与他那工作时间的长度和他那劳动异化的程度有一种相反的关系，并且是直接劳动集体自我证实、自我确定的可能性的一种直接功能。<sup>[46]</sup>的确，形势接近于这样：劳动生产力越来越依赖自由时间的增长，这不但是在作为学习时间那种意义的自由时间方面，而且还在作这种意义的自由时间：单独能刺激兴趣和潜在创造性劳动的那些个体的才能、希望和意愿的发展。由于彻底自动化而削弱了的机械竞争性劳动，反过来也将使劳动时间的严格测量——提倡从每一个生产者那儿得到最高限度剩余价值的有历史意义的手段——注定地要消失掉。

在工厂内部，以输送带和劳动分组为基础的有特色的泰勒主义工作组织，既与任何一种绝对的技术需要或科学需要毫不相适应，也与活劳动力的最大限度经济企图不相适应。它只与资本主义的这一目的相符合，那就是将生产成本的大大下降与剩余价值的最大限度增长或使用这些技术的那些公司自然增长的利润结合起来。这就意味着对每一个单一生产者的劳动过程有必要进行全面的控制和管理，有必要控制和管理它降低到普遍机械体系的接近机械并易于用数量表示的那一部分。<sup>[47]</sup>但是在半自动化或自动化的那些工厂中，活劳动力保留资本的功能，变得比它那生产剩余价值的功能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工厂（公司）实质上占有了在其他公司实际生产出来的社会剩余价值的一些部分。极其复杂而又昂贵的机器必须要用活劳动力在这些工厂里进行维护和修理，这种机器需要很高的注意力和技术，而这并不能那么机械而又迅速地就能得到。因此，劳动周转期的拉长和普遍的对工作和机器的漠不关心，变成了这种工厂资方的一种威胁——也正象在精密产品的工厂中那样，这种工厂产品的质量，要求高度的注意力。在这样一些情况之下，不仅仅有这样的目的，即“降低社会紧

张状态”，从而降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面危机的爆炸点，而且还有更为直接得多的把利润扩大到最高限度的目的，雇主们已经开始在实验“职业丰富化”的技术、在工厂内部劳动力的更大的流动性、抑制输送带等等。<sup>[48]</sup>但是，对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敲诈，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当然决不可能松懈下来的，不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进行怎样的伪装。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的社会劳动分工——剩余价值生产者与发展并保证资本扩大过程的所有那些人之间的分工——在每一个企业内部，决定了一种等级结构，这种等级结构的基础是严格执行部分合理性和成就原则。向社会化发展的倾向和向第三次技术革命所固有的更高的劳动资格发展的倾向，不可避免地会以特别尖锐的方式来冲击这一等级制度。

尤有进者，在今天，社会劳动力已经不是自由联合生产者的活动了，这种活动已经不能自我管理并认真指导，也就是不能够以民主方式和集中计划的方式进行了；正好相反，它已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跌入了命令垂直锁链的集中势力中去了。但是，这一矛盾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唯一致命的弱点，甚至在“最有利的上升”时代、“最迅速”的增长时代和群众消费“最广阔”的时代，也是如此。因为，劳动变得客观社会化的程度越高，依赖自觉合作的程度越高，那么，直接的不足就越要消失，而且，典型生产者的教育水平和普通资格，也就要求的越高——劳动在组织方面和技术方面的直接前题，对于靠工资维持生活者就会变得更加不能容忍，其社会经济属性也会是如此。

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危机，在企业家的权威和企业结构的危机中，就有了合乎逻辑的表现。尽管资方经常企图阻止或限制这种危机，<sup>[49]</sup>但是，日常阶级斗争的一种新的倾向出现了，这种新的倾向能够将这些冲突转向群众性反资本主义运动的

起点。对于阶级斗争的强调，越来越从对于由劳动新创造出来的价值在工资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划分问题，转移到了对机器和劳动力的控制权问题。由反对企业结构的暴动所引发起来的直接劳动争执的次数，在不断地增加：今天的工人越来越抵制雇主的这样一些权力：减少雇员的数目、变换机器和订单、确定装配带的速度、改变劳动组织、修订工资偿付制度、扩大工厂中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或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或关闭工厂等。<sup>[50]</sup>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包含松散地互相结合并且只是偶然互相结合在一起的那些生产单位。已经创造出来的劳动客观社会化的程度，使得工人阶级就经济和社会而言不可能再赢回其单单在企业中已经使之发挥作用的那种生产手段。<sup>[51]</sup>作为资本集体利益的代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再干预而欲控制劳动局势和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方面（税收与通货膨胀、就业与信贷政策、对外贸易或农业决定等等）的行动，就是无产阶级受到政治教育的永久性的源泉。实际上，国家的干预使得工人阶级懂得了争取阶级斗争的最高级形式：争取政治权力的征服和对生产手段的控制、争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以及争取逐步瓦解商品和货币经济与劳动的社会分工。劳动客观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不仅仅取决于第三次技术革命，取决于资格高超的劳动的越来越大的必要性，以及取决于工人阶级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的提高，而且还取决于下面两者之间的那道鸿沟：一方面是潜在的丰裕，而另外一方面则是实际的异化和具体化。在古典资本主义时代，工人斗争的主要推动力来自现在与过去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今天，它却来自实际情况与可能有的情况之间的紧张关系。

与潜在的丰裕和个人创造能力的可能发展相对比的话，次等货物无意义生产的越来越严重的疲劳，<sup>[52]</sup>在工人和资本家中广泛

流行的那种忧虑的感情——这种感情来自对自发的自我行动的压抑和普遍不安全感的传播——及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那种“求一致”和“求成功”的紧迫感，社会生活的日趋孤寂及广告和产品分化的失败，国家大规模运输情况的恶化，住房条件的恶化和大城市的窒息等，所有这些都变得一天比一天不能容忍了。恰恰在这么个时刻，即当社会个体的自我发展会比以往无比容易地作到的时候，其实现看来似乎更进一步退缩了。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不单单是一种主观的范畴，而是一种客观的范畴。即使是从其异化的意识中异化了的一个个体，也仍然是被异化了的。这种客观的条件、归根结蒂较之操纵工业工人阶级或使工业工人阶级一体化的一切企图，都是更为强大有力的一种现实；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它使得赚工资的人能够集体地认识到他们受其约束的那种连续不断的异化过程，并因而创造出了社会主义自我解放的条件。即使是在最大限度的“繁荣”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这些矛盾也已证明在我们的时代是不可能解决的并且是不可能缩小的。归根结蒂，工人阶级决不会满足于看来似乎是生命的一种损失的那种工作时间，决不会满足于看来似乎是强制劳动的那种劳动过程，也决不会满足于这样一种企业，这种企业的结构所给予他们的不过是一种从属地位而已。

当工人们以直接的工厂斗争方式向企业雇主当局提出挑战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危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今天，挣工资群众越来越也争夺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价值和优先权。这种全球性的“争夺过程”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直接冲突的，在我们进入社会革命的一个新的时期的时候，它迄今已采取了三种主要的形式：

1. 对消费品越来越丰富与大规模的社会消费发展不足（集体的服务）之间的矛盾，进行紧急冲击。现在甚至已被自由主义者

所承认的这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sup>[53]</sup>有助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日趋严重的不安全感，这种意识形态是以对“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的赞美为基础的。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那种越来越高的需求水平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扩张长波，已经给某些服务项目赋予了越来越大的重要性——这些项目是健康、居住、教育、地方运输、假日等——这不仅表现在消费的“客观”结构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工人的主观意识方面。就其性质而言，这些需要只能得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勉强的满足：当然，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些需要没有得到私有资本主义经济的系统的发展。但是，这种不充分发展反过来加重了它们那普通经济压力，并且可能提高了为满足这些需要所需费用的彻底社会化的需求。这样，为争取一种新的分配形式就有发生一种斗争的倾向，这种分配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深刻的冲突，其基础在于最适宜地满足彻底消除市场的那些需要（自由的健康服务、地方性运输等等）。英国政客鲍威尔氏（Powell, Enoch）曾宣称，医药护理的需要是“无限的”，因而其价格应当取决于一种“自由的市场经济”，<sup>[54]</sup>这种看法已经被许多工业化国家——如果不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话——人口中的大多数都认为是野蛮的。

2. 决定投资的那些机制的正面挑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就理论而言，资本是从利润率的实现低于平均利润率的那些部门中流出，流入到其实现超出平均水平的那些部门中去。由于技术利益（以及技术垄断的地位）有利于剩余利润，那么，官方的教条就可以宣称，部门的投资类型通常是可以促进整个经济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实际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大公司在战略上有决定性意义的投资，已经日趋脱离了这些分配标准了。垄断性和控制性的市场形势早已结束了市场成功与劳动生产力之间的相

对近似性。国家资助、国家对垄断利润的保证和持久的通货膨胀等，对于大公司的投资决定发生了直接的影响，这在与经济合理性直接相对立的意义上是很常见的。“垄断性竞争”的逻辑和竞争游戏与今日生产成本的系统降低，没有什么关系。在这些情况之下，使靠工资生活的广大群众越来越不能接受的是，大公司董事会的一小撮董事们所作出的一些投资决定，居然能决定数以十万计家庭的就业、收入、甚至住处问题。投资决定的社会化——以及奠定这些决定的基础的社会优先权的公共表现——很快就将变成有爆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倾向的另一种无产阶级的要求。

3. 对大公司在经济衰退时期对国家资助、合同和帮助的一再依赖与这些公司对商业和银行秘密的注意保留之间的矛盾普遍谴责。<sup>[55]</sup> 废除银行秘密的要求、公开账目的要求以及工人控制车间生产、工厂生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要求等，所有这些要求的力量，在今天都在一天比一天壮大。这些要求对私有财产、竞争和资本对劳动力和生产手段的控制等，也提出了激进的问题，从而直接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此同时，晚期资本主义使工会与国家机器向一体化发展的倾向性，和限制或废除商定工资的自由倾向性——这些都取决于共同花费和投资计划以及整个资本总额的经济规划——都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抵抗。

最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当代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危机是密不可分的。生产力的日趋国际化、半殖民地群众的那些大量的未满足的需要以及扩散到全球的对环境的威胁，使得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基本经济资源进行认真的计划，成为绝对必要的了。但是，民族国家的残余与帝国主义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是不可分的。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内部之不能被取代，正象无用的和有害商品的制造、庞大的经济资源之被弃置、失业的再度发生或机器和其他生产手段的有计划的运用不足等等

不能被取代一样。只要对生产力的控制权没有从资方的手中夺取过来，所有这些冷酷无情的问题就都得不到解决。联合生产者对生产手段的占有、由工人群众用民主方法决定的优先权的有计划使用、作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积极自治一种先决条件的对劳动时间的大大缩短、以及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的退位等等，都是解决那些问题必不可少的步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终废除，将是国际工人阶级群众性革命运动的中心目标，这个目标正在一天天接近。

## 注 释

- 〔1〕 卡尔·马克思，“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十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第四页。着重点系著者所加。
- 〔2〕 马克思：“因为价值构成了资本的基础，所以资本必然地只有通过与对等价值的交换才能存在，它必然地要脱离自身而向外冲出去。可见一个万能的资本，要是没有其他的各个资本和它进行交换，和它相对待——并且从我们目前的立场来看，除开工资劳动和资本自身以外，并没有什么其它的东西和它相对待——是一种无从设想的怪物。多数资本互相排斥，是早已包含在作为实现了的交换价值的资本底本性以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四二一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二十四页）。也见已经引用了的那段声明：“资本是作为多数资本而存在的，而且只能作为多数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便表现为多数资本彼此间的交互作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四一四页（中译本同上，第三分册，第十五页）。
- 〔3〕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利润（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

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成分和它的各个源泉的联系的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性质直接合而为一的现象是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荒唐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是当作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当作单纯的物来发动妖术。”《资本论》，第三卷，第八〇八页（应为第八三〇页——译者）（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九七四——九七五页）。

- 〔4〕 马克思：“但是，把贬低货币和颂扬商品当作社会主义的核心来认真宣传，从而使社会主义变成根本不了解商品和货币的必然联系，这要等蒲鲁东先生和他的学派来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伦敦，一九七一年，第六十八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第六十九页）。
- 〔5〕 卡尔·马克思：“使用品变成商品，一般地说，只是因为它是互相独立经营的私人劳动的产品。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的总劳动。生产者们只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的交换而发生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是在这种交换中方才显现出来。或者说，私人劳动只有通过那种由交换直接在劳动产品上面，间接在生产者身上确立的关系，方才事实上确证它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因此，在生产者看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得象现在这个样子，那就是，不象是人与人在他们的劳动中发生的直接社会关系，而宁可说像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七十二——七十三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一卷，第四十八——四十九页）。
- 〔6〕 恩格斯：“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失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二〇页（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三卷，第四二八

- 页)。也见这一段以下的几页。
- [7]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三九七——三九八页。
- [8] 来源同上，第三〇九、六九九——七〇〇页。
- [9] 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一五八——一六〇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第一二三——一二四页)。
- [10] 来源同上，第一六二页(中译本同上，第一二五页)。
- [11] 马克思：“最后，让我们变一个方向，想象一个自由人的公社，他们用共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有意识地，把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支出。……劳动时间按社会计划进行的分配，将会对不同种劳动职能和不同需要的适当比例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劳动时间会同时作为一种尺度，以计量各生产者个人在总劳动中加入的部分，因此也计量各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中可得而用在个人消费上的部分。在这里，无论是在生产上面还是在分配上面，人们对他们的劳动，对他们的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都是十分简单，十分容易理解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七十八——七十九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一卷，第五十四——五十五页)。
- [12] 当然，这并不就是意味着经济计算和劳动成本的比较——与节约劳动的目的比较——也都消失了。恰恰相反：它们比以前变得更为重要了。因为，它们现在可以被更精确地进行估价，在整个社会水平上估价，并且还要把一切费用都考虑在内，这些费用没有计算在商品生产之内，但在社会的背景之下被“社会化”了。此外，它们还可以用实际消耗的各种劳动量的精确簿记来加以测量(不管这些在现在是表现为工作小时呢，还是表现为计算货币)。因为，既然社会本身今后要在其生产的不同部门中分配其经济资源，那么，它就不能对集体组织起来的劳动的任何一部分直接社会特性放弃责任。
- [13] 见普兰察斯前引著作，第六十四——六十七页。
- [14] 这种社会主义化如果能以简单的合作而节省劳动的话，还是可以加速生产力的发展的，正象中国的公社所表现的那种情况。
- [15] 这一论点最终被查尔斯·贝特尔海姆所发展了，见其所著：《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时期》，巴黎，一九六八年。
- [16] 见上面刚引的贝特尔海姆在其著作中所表示的看法。

- [17]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第二十一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八十二—八十三页）。
- [18] 为了完全正确对待这种辩证法，人们不得不说：1. 现存生产力为了新的社会化生产关系，在帝国主义世界经济水平方面是更趋成熟了；2. 这种成熟所激起的社会危机，取决于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规律的这种社会危机，并没有同时得到发展，而是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有断断续续地发展，而这种社会危机也在创造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这种社会主义革命最初只是在国家的限度内是胜利的；3. 于是在生产力的国际发展与国家要使生产关系革命化的企图之间，产生了进一步的矛盾。
- [19] 正是这一类的希望构成了罗吉尔·加罗迪在其所著：《社会主义的转折点》（伦敦，一九七〇年）一书的观点的基础，并且也部分地构成了利契达报告：《二十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法兰克福，一九七〇年）中的观点的基础。
- [20]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始就是用如下两个特点来表示它的特征的。第一，它是把它的产品当作商品来生产。生产商品，不是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由以区别的事情；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互相区别的事情是，变为商品，已经是它的产品的支配的、决定的性质。这首先包括着如下的事实：劳动者自己，也只是当作商品的售卖者，因此是当作自由的工资雇佣劳动者出现，劳动一般也当作工资雇佣劳动出现。根据以上已经提出的说明，已无需重新论证，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的关系，怎样决定着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工资雇佣劳动者，作为资本家和工资雇佣劳动者，也不过是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的体现、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刻印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各种确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特别可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标志特征的第二点，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在本质上就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

- 更进一步，在考察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时，我们已经看到，怎样在这上面会有一种为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生产方式建立起来。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特殊形式。在这个特殊的形式上，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是当作资本的、与劳动者独立无关的力来发生作用，因此直接与劳动者本身的发展，形成对立。”《资本论》，第三卷，第八五七——八五八页（应为第八七九——八八一页——译者）（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一〇三三——一〇三四页）。
- [21] 马克思：“假使为提供很小的产品量而使用非常昂贵的机械，那样它就不是以生产力而发生作用的，只有无限地提高产品的成本，甚至比不用机械而操作时还要昂贵。机械所以能创造剩余价值，不是由于它有价值——因为这种价值只能单纯地被抵偿——，而是由于它增加相对的剩余时间，或减少必要的劳动时间。可见，固定资本量增加了，产品数量一定要以同一的比例增大起来，而且使用的活劳动也要相对地减少。比例于固定资本底作用，它的价值越小，便越符合于它的目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七三九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分册，第三九八页）。
- [22] 根据官方数字，美国消费品生产在工业总生产中所占份额，从一九三九年的39%落到了一九六九年的28%。《联邦储备公报》，一九七一年七月。
- [23] 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一三二页（中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第一〇八——一〇九页）。
- [24] “泰晤士报”，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 [25] 市场经济危机的另外一个例子：西德制氮工业职业协会正在考虑“只从最近便的工厂给消费者供应商品，不考虑这个工厂归谁所有，这是不是能节省运费”。《法兰克福新闻报》，一九七一年七月。
- [26] 参见本书第六章。
- [27] 除了前面已经引用的科门诺尔的著作之外，可参见麦克斯·尼科尔松(Max Nicholson)：《环境革命》，伦敦，一九六九年；约翰·艾斯波西多(John Esposito)：《消失的空气》，华盛顿，一九六五年；尼科尔(H. Nicol)：《人的局限》，伦敦，一九六七年。关于这一问题方面的文献，正在以指数的速率增长——正象这一问题本身一样。到目前为止，全面研究资本主义对环境的威胁和对付这一威胁的可能措施

的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就是我的朋友哈利·罗特曼 (Harry Rothman) 所写的：《毁灭性的忧虑——工业社会污染的研究》，伦敦，一九七二年。

- [28] 例子是米山 (E. J. Mishan) (《经济增长的费用》，伦敦，一九六九年) 和新近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丹尼斯·加波尔 (Dennis Gabor) 的著作，这些著作论述了我们这里扼要概述的许多问题，但仅仅论述的是某些领域，或者是根本没有提出“为什么？”的问题，或者是用一些陈词滥调例如“人类侵略”或“无知”等来回答这一问题。这些著作家拒绝揭示出商品生产、实证主义的部分合理性与全面的社会不合理性之间的联系。因此，他们本身仍然是特殊的部分合理性与全面不合理性两者结合体的俘虏。对这两部著作的一个很好的评论，刊登在“当代问题”杂志上 (第十四卷，第五十五期，一九七一年四月)：安德柳·麦克斯威尔 (Andrew Maxwell)，《论“财富”观念》。
- [29] 赫伯特·金蒂斯 (Herbert Gintis) 在其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精辟研究 (迄今尚未出版的手稿) 中，正确地强调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骗人性质，即通过货币有效需求而实现的任何消费，事实上是合理的。如果它们都是一致的，那么，这一原则的赞同者就也可以宣称，出售烈性药物也同样是合理的，因为，这些药物也可以找到购买主的。马克思总是强调，消费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生产，而且，其最终发展倾向，也要依靠生产关系。在加尔布雷恩和米山之后，没有再去相信“消费者王国”这种神话了。
- [30] 当代美国生产结构如果扩大到了全世界的话，就会在本世纪结束之前，摧毁一切原料来源，确实危及世界的氢气带，这些话见于唐尼拉·麦斗斯 (Donella Meadows)、丹尼斯·麦斗斯 (Dennis Meadows)、约根·兰道尔斯 (Jorgan Randers)、威廉·兰道尔斯 (William Randers) 和威廉·贝伦斯三世 (William W. Behrens III) 等所写的书：《增长的限度》(纽约，一九七二年) 中。他们可能是正确的，虽然他们毫无疑问是夸大了从当前发展倾向得出的推断。很清楚，一次社会制度的大改变，因而物质资源和社会优先权的分配的大改变，可以使抗拒污染和保护环境技术，得到质的改进，而且原料缺乏的代用品也可以得到质的增加。毫无疑问，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之在全世界范围推广，将会是人类的一场恶梦。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增长应该停止，

把不发达国家的人民群众束缚在他们那悲惨命运之中。唯一可以得到的逻辑结论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的增长必须代之以有意识计划的增长，而且还要把一切“间接社会花费”也加以考虑。

- [31] 虽然所谓花费利益分析技术（参见 E. J. 米山：《花费利益分析》，伦敦，一九七一年），允许把“间接社会花费”包括在不同投资规划的挑选中，但是它不得不在“货币价值”方面表现对健康甚至对人类生命有危害，这只能在使……过程资本主义化的基础上才能作到。对待这一问题的这种方式的显然不人道性以及因而导致的反革命结果，是很明显的（参见罗特曼在前引著作的第三一二——三一六页所作的很好的批判）。即使是使花费利益分析普遍化而将“间接花费”也考虑在内，这种分析也只不过是揭示了部分经济合理性的界限。
- [32] 比如可参见罗伯特·多尔夫曼 (Robert Dorfman)：《价格》，新泽西，一九六四年，第一一九——二一〇页。
- [33] 蒂波尔·西托夫斯基：《福利与竞争》，伦敦，一九五二年，第一八七页。这一论据原本出自 A. C. 皮古：《福利经济学》，这里引自其第四版，伦敦，一九六〇年，第一三四——一三五、一八三——一八七页。
- [34] 见迪特尔·威斯 (Dieter Weiss) 的评论，“基本上不能允许的前提（把人类生命和健康转化成货币价值的努力的前提），就是把休息、新鲜空气、无污染水和身体健康等的基本物质需要重新解释为对货币收入的需要。实际情况是这样：正是这些需要没有通过市场机制而接合起来并得到满足。”迪特尔·威斯：《基础结构计划》，载《取舍的目的、标准和评价》，柏林，一九七一年，第四十六页。
- [35] 例如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特征的那种令人可怕的废物生产：美国在一九二〇年是每人每天 1.25 公斤；一九七〇年则为 2.5 公斤（比利时在一九六〇年仍然只是每人每天 250 克），也就是说，每年生产废物 18,000 万吨。
- [36] 一个例子是美国的登上月球计划。但是与此同时，武断选择“社会优先”的互相缠绕（最后取决于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和“政治竞争”），和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是这样一种情况：企业变成了垄断剩余利润的巨大来源，变成了浪费了的资源。参见“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胡果·扬 (Hugo Young)、布利安·西尔科克 (Bryan Silcock) 和彼

得·杜恩 (Peter Dunn) 的研究。

- [37] 关于与“生物定时炸弹”有关的危险，参见拉特雷·泰勒 (G. Rattray Taylor)：《生物定时炸弹》，伦敦，一九六九年；大卫·菲什洛克 (David Fishlock)：《更改了的人》，伦敦，一九七一年。
- [38] 见盖拉德·麦塞迪 (Gerald Messadié)：《私生活的结束》，巴黎，一九七四年。
- [39] 与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相比，这一点对垄断资本主义当然更不是如此了。
- [40] 在一种分配经济中，费用的节省会导致分配的减缩。在有关的那些经济中，其利益在于分配的增长——而且不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利润——这些经济因此就不得不经常地、自动地来增加其花费。这一原则在商品生产社会中，统治着所有的公共管理机构。
- [41] 由于东方过渡社会的国家和经济官僚政治已经被群众性的生产者使其本身免除了政治控制——这些生产者的基本兴趣在于节省他们的劳动时间并在货币经济中争取个人致富——所以，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这一社会阶层。
- [42] 例如，自由的政府卫生服务机构与私人制药工业的结合，变成了这一工业分支利润长期扩大的一种广泛的机制，大大地提高了其与化学工业其他部门的竞争能力。
- [43] 这一类假像的企图是由福特专家治国论者麦克纳马拉 (Mao Namara) 以相当规模引进五角大楼的。
- [44]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们仍坚持一种神话，说工人是“无知”的或有“无知的感觉”，以证实等级制度是正当的并使之永久化，而工人的阶级特性，他们往往是否认的。比如伊尔文·路易士·霍罗威茨 (Irving Louis Horowitz)：《美国工人阶级的行为》，载“劳动社会学”，第三期，一九七一年。
- [45] 见我们已经摘引过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 中的著名的一段话：“真正的经济——节约——在于节约劳动时间，即最低限度的、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生产成本，但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第七一一页 (中译本第三分册，第三六四页)。
- [46] 在美国，使用一周四日工作制的努力和在美国和瑞士使用“每周灵活工作日”制，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是，这些计划往往取决于提高赢

- 利性的压力（否则就不引进这种制度了），或取决于特殊的垄断条件；比如参见娄·戈莫莱克（Lou Gomolak）：《Quattro Giornidi Lavoro e tre di Festa》，载“西班牙”，一九七一年四月。
- [47] 安德烈·高尔兹在他的论文中强调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见《技术、技术专家与阶级斗争》，载《劳动分工批判》，巴黎，一九七三年。
- [48] 见《劳动组织批判》（一九七三年二月）中对意大利的IBM工厂劳动过程的组织的有趣的分析；关于在诺尔斯克·海德罗（Norsk Hydro）和沃尔沃（Volvo）的经验，见“世界报”，一九七二年四月五日，和“新苏黎世报”，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
- [49] 因此，大资本广泛流行的企图是使“天然的”阶级斗争的这一新发展革命潜能中立化，其办法是利用专门设计来把它转变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经济计划中积极工具的那种“参与”或“互相决定”计划。当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是为了工人作为一种否决权的控制，而不考虑任何利润关系（“不是公司的赢利性，而是阶级团结”）。
- [50] 这一倾向表现在近些年来大不列颠、法兰西、意大利和比利时的罢工统计中。说明这样一点是有趣的：同样的倾向正在美国缓慢地但肯定地出现。例如可参见艾玛·罗斯契尔德（Emma Rothschild）对俄亥俄州劳兹城现代化的通用汽车工厂汽车工人的反抗所进行的深入的分析，“纽约图书评论”，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 [51] 参见我们对这一集子的介绍：《工人的管理、工人的建议、工人的自治》，巴黎，一九七〇年。
- [52] 每年有2,000万美国人在与生产有关的事故中受伤，伤势需要医药处理。其中有110,000人造成永久性残废，30,000人致死。每年花费在55亿美元以上。
- [53] 在这一方面，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以及美国纳德尔集团的努力有主要的影响。
- [54] 这一论据只不过是暴露了“正统”资产阶级经济方面意识形态的荒谬。难道我们真的会相信人民要吃“越来越多”的药物并在医院里住得“越来越久”，这只是因为这些物品和服务是在需要的基础上免费分配的吗？难道这种过度消费对健康无损吗？难道其不合理性不会由于大规模教育而在人口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吗？难道说不恰当就是利润最大化

和市场经济的逻辑，以其广告和中介体系（更不用说无意识的空想），在资本主义中创造了这种过度的消费吗？

- [55] 例如法国在一九六九年法郎贬值之后的普遍愤怒：资产阶级集团中提出了一项提案：凡在贬值之前把资本调往国外的投机家，应当被起诉，这一提案在议会中仅以微弱的多数被否决。

## 人名译名对照

Adams, T.,	阿丹姆斯
Adelmann, Gerhard,	阿德尔曼, 盖哈德
Adorno, Theodor,	阿多诺, 西奥多
Aftalion, Albert,	阿夫泰利昂, 阿伯特
Ahluwalia, Montek Singh,	阿鲁瓦利亚, 蒙特克
Aike Blechschmidt	艾克·布莱什米特
Albrecht, Ulrich,	阿尔布列希特, 乌利希
Aldcroft, Derek	阿尔德克罗夫特,
Althusser, Louis,	阿萨塞尔, 路易斯
Altvater, E.,	阿尔特维特尔, 艾玛
Amin, Samir,	阿敏, 萨米尔
Ammann, F Lindhof Helmsta-	阿曼, 艾因霍夫, 海尔姆斯塔特
dler & Isselhorst,	勒, 伊塞霍斯特
Anderson O. B.	安德森
Anderson T. A.	安德森
Ansoff, H. F.	安索夫
Aristotle,	亚里斯多德
Armytage, W. H.,	阿米台治
Arthur P. Mendel	阿萨·门德尔
Ashton, T. S.,	阿什顿
Baade	巴德
Babbage, Charles,	巴伯治, 恰尔斯
Bachman, J.,	贝克曼
Bain, A. D.,	贝因
Bain, Joe S.,	贝因
Bairoch, Paul,	拜罗克, 保尔

Balibar, Etienne	巴里巴尔, 艾铁尼
Baran, Paul A.,	巴兰
Barnet, Richard,	巴尼特, 理查德
Barratt-Brown, Michael,	巴拉特布朗, 米契尔
Bauchet, Pierre,	皮叶·保希
Bauer, Otto,	奥图·鲍威尔
Bell, Daniel,	贝尔, 但尼尔
Bemerl, Bonhoffer & Strigel	贝莫尔、邦豪夫, 斯特利格尔
Bendix	本迪克斯
Berle	贝尔利
Bernal, J. D.,	伯纳尔
Bernstein, Eduard,	伯恩斯坦
Berrill, Kenneth,	伯利尔, 肯尼特
Bessemer	贝塞莫尔
Bettelheim, Charles,	贝特尔海姆, 查尔斯
Bieda, K.,	比达
Binning, K. G. H.,	宾宁
Blande, Neuss	布兰德·纽苏斯
Blank	布兰克
Blaug, M.,	布劳格
Bloch, Ernst,	布劳赫, 厄尔斯特
Boccaro, Paul,	波卡拉, 保尔
Boddy, R.,	保迪
Bodington, Stephen,	保丁顿, 斯蒂芬
Bogdanov, Alexander,	波格丹诺夫, 亚力山大
Bondin, Louis B.,	路易斯·鲍丁,
Brandenburg, Richard O.,	布朗登堡·理查德
Brenner, Otto,	奥图, 布伦诺

Bright, James R.,	布赖特, 詹姆斯
Brito, Fedorico,	布利托, 费德利科
Brittan, Samuel,	萨缪尔·布利坦
Broadbridge, Seymour,	布罗德布利治, 西莫尔
Brooks, Harvey,	哈维·布鲁克斯
Brooman, F. S.	布鲁曼
Brown, A. J.,	布朗
Brown, Courtney	布朗, 考特尼
Browne	布朗尼
Brown, courtney	布朗, 考特尼
Bryan Silcock	布利安·西尔考克
Bukharin, Nikolai	布哈林
Burgess, G.,	布尔吉斯
Burnham, James,	波恩哈姆, 詹姆斯
Busch, Schüller & Seelow,	布什、舒勒、西罗
Caracciolo, A.,	卡拉西奥罗
Cavalieri, Duccio,	杜丘·卡瓦利里
Carr, Albert Z.,	卡尔, 阿伯特
Carter, A. C.,	卡特尔
Carter, Anne P.,	安娜·卡特尔
Carter, O. F.,	卡特
Castles, S.,	卡塞尔斯
Casterman	卡斯特曼
Chaloner	恰龙纳尔
Chamberlin, E. M.,	恰姆伯林
Chandler, Alfred D.,	钱德勒, 阿尔夫利德
Charpie, Robert A.,	恰尔皮, 罗伯特
Cheprakov, Victor,	切普拉科夫
Christie	克利斯蒂

Clark, Hyde,	克拉克, 海德
Clausewitz, Karl von,	克劳塞维茨
Claveya, Juan	克拉夫拉
Clemence	克莱门斯
Cliff, Tony,	克里夫, 统尼
Cochrane, W. W.,	考克雷恩
Cockerill	柯克利尔
Cole, W. A.,	柯尔
Comin, Alfonso O.,	柯敏, 阿尔方索
Commoner, Barry,	科门诺尔
Cook, Fred J.,	库克, 夫利德
Cooper, R. N.	库伯
Copernicus, Nicolas,	哥白尼
Cox, Oliver,	考克斯·奥里弗
Crosland, Anthony,	克罗斯兰
Crotty, J.,	克罗蒂
Crouzet	克罗柴特
Cumberland, John H.,	库伯兰
Cunow, Heinrich,	库恩诺·海纳里希
Cutler, F.,	库特勒
Dal Pane, Luigi,	鲁吉·达尔·波恩
Danim Walter	丹尼姆, 瓦尔特
De Brunhoff, Suzanne,	戴·布隆霍夫, 苏赞尼
De Cecco, Marcello,	戴塞克, 马塞劳
De Gaulle, Charles,	戴高乐
De Lichtbuer, Michel Cardon,	戴·利特布尔, 米契尔·卡顿
Dennis L, Meadows	丹尼斯, 麦斗斯
De Wolff, Sam,	萨姆·德伍尔夫

Deane, Phyllis,	迪思·菲立斯
Dechesno, Laurent,	迪契斯尼·劳伦斯
Denning, B. W.	但宁
Denizet, Jean,	但尼采, 金
Dhont, J.,	东特
Diebold, John,	代鲍尔德
Dobb, Maurice,	杜勃·马里斯
Domhoff, William,	多姆霍夫
Donella H. Meadows	唐尼拉·麦斗斯
Dorfman, Robert,	多尔夫曼, 罗伯特
Dos Santos, Theotônio,	西奥顿尼奥·多斯·桑托斯
Dow	道
Draker, H. O.,	德拉克尔
Duccio Cavaliere	杜丘·卡瓦利里
Dumazedier, D.,	杜马泽迪尔
Dunkirk	敦刻尔克
Dupriez, Leon,	杜普利茨
Einstein, Albert,	爱因斯坦
Einzig, Paul	保尔·艾因齐格
Eisenhower, Dwight D.,	艾森豪威尔
Elsenhans, H,	艾尔森豪斯
Emma Rothschild	艾玛·罗斯契尔德
Emmanuel, Arghiri,	艾曼纽尔, 阿菲利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ler, Robert,	英格勒, 罗伯特
Enos, John L.,	约翰·恩诺斯
Esposito, John,	艾斯波西多, 约翰
Esteban, Joan	埃斯蒂班
Farvar, M, Taghi	塔菲·法瓦

Fearon, Peter	菲荣, 彼得
Fedder, J.,	菲德尔
Fenster, Leo,	芬斯特尔
Finkelstein, Louis	芬克尔斯坦因, 路易斯
Fishlock, David,	大卫·菲什洛克
Ford, Gerald.,	福特
Fos	福斯
Fourastie, J.,	弗拉斯德
Fourier, Charles,	佛利埃, 恰尔斯
Frank, Andre Gunder,	佛朗克, 安德烈·刚德尔
Freeman, C.,	弗里曼, C
Frelman, R.	弗里曼, R.
Friedman, Milton,	弗利德曼, 米尔敦
Friedmann, George,	弗利德曼, 乔治
Froomkin, Joseph,	弗鲁姆金, 约赛夫
Fueller W. F	弗勒尔
Gabor, Dennis,	丹尼斯·加波尔
Galbraith, J. K.,	加尔布雷思
Galileo, Galilei,	伽里略
Gallmann, Robert E.,	加尔曼, 罗伯特
Garaudy, Roger,	罗吉尔·加罗迪
Garibaldi, Rinaldini & Zappelli,	加里巴尔迪, 里纳尔迪尼, 查 皮里
Garvy, George,	加尔维
Gehlen	盖伦
Gellman, Aaron J.,	盖尔曼, 阿荣
Genovese, Eugene,	尤金·杰诺维斯
Gerhard Hoffman	盖哈德, 霍夫曼
Gille, A. B,	盖尔

Gillman, Joseph,	吉尔曼, 约赛夫
Gilmore, Frank G.,	弗朗克·盖尔莫尔
Gintis, Herbert,	赫伯特·金蒂斯
Glen Cain	格伦·凯因
Glyn, Andrew,	格林, 安德流
Glyn, Sutcliffe	格林, 苏特克利夫
Godelier, Maurice,	哥迪利尔, 毛利斯
Goethe, Wolfgang,	歌德
Gold, Bela,	贝拉·古尔德
Goldfeld, S. M.,	格尔德菲尔德
Goldmann, Lucien,	格尔德曼, 路西安
Goldmith, M.	哥尔兹米斯
Gomolek, Lou,	戈莫莱克, 娄
Goodman	古德曼
Gordon Wills, David	高尔顿·威尔斯, 大卫·阿什
Ashton, Bernard Taylor	顿, 伯纳尔德·泰勒
Gorz, Andre,	安德烈·高尔兹
Gouverneur, Jacques,	高弗尔纳, 亚克斯
Gramsci, Antonio,	葛兰西, 安东尼奥
Granovsky	格兰诺夫斯基
Green, Mark,	马克·格林
Grimberg	格容伯格
Grossmann, Henryk,	格罗斯曼, 亨利克
Gruson	格鲁森
Guberman	古勃尔曼
Gundel	龚德尔
Güsten, Rolf,	古斯敦, 罗尔夫
Habermas, Jurgen,	哈贝尔玛斯
Hague D. O.	海格

Bahn, Erich,	汉, 爱里
Hansen, Aloin	汉森, 阿尔文
Harper	哈波尔
Hallgarten, George W. F.,	哈尔加顿
Hammer, Marius,	马利乌斯·海莫尔
Hammond, Bray,	布雷·哈蒙德
Harbison, F. H.,	哈比森
Harman, Chris,	哈尔曼, 克利斯
Harms, Bernard,	哈尔姆斯, 伯纳德
Harrington, Michael,	哈林顿, 米契尔
Harris F.	哈利斯
Harrod, R. F.,	哈罗德
Heath, Edward,	希思
Heckmann, Nikolaus,	海克曼, 尼古劳斯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尔
Heide, Holger,	海德, 霍尔格尔
Heilbronner, Robert L.,	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尔
Heininger, Horst,	海因宁格尔, 豪斯特
Helphand, Alexander	亚力山大·黑尔普汗
Henderson, W. O.,	亨德逊
Hennessy, J.	亨尼赛
Henri Bourguinat	亨利, 鲍古因纳
Hermanin, Monte & Rolshausen	赫尔曼宁, 芒特和罗尔绍森
Herzenstein,	赫尔岑斯坦因
Hicks, J. R.,	黑克斯
Hiemstra, S. J.,	海姆斯特拉
Hilferding, Rudolf,	希法亭, 鲁多尔夫

Hinkelammert, Franz,	弗朗茨·海因克拉莫尔特
Hitler, Adolf,	希特勒
Hoag, Malcolm W.,	霍格, 马考姆
Hobsbawm, Eric,	霍布斯包姆, 艾里克
Hoechst	霍希特
Hoffmann, Walter G.,	霍夫曼
Hofmann, Werner,	霍夫曼, 沃尔诺
Honer-van Gogh, Arthur,	阿萨·霍诺, 危, 高
Hone, Angus,	霍恩, 安古斯
Hopkins, S. V.,	霍普金斯
Horowitz, I. L.,	霍罗威茨
Hoshi, I.,	霍什
Hrubesch, Peter,	鲁比什, 彼得
Huffschnid, J.,	胡夫什米德
Hugo Young.	胡果·扬
Huisken	胡伊斯肯
Hund, Wolf,	沃尔夫·胡恩德
Hymer, Stephen H.,	海莫尔, 斯蒂芬
Ilyenkov, E. I.,	伊林科夫
Imbert, Gaston,	伊姆伯特, 卡斯頓
Imlah	伊姆拉
Immler, Hans,	汉斯·伊姆勒
Issawi, Charles,	查理斯·伊萨威
Izard, Wakter,	伊查德·瓦尔特
Jacquesmyns, A. G.,	雅克斯敏
Jalee, Pierre,	加里, 皮叶
Janossy, Franz,	雅诺西
Jaszi, George,	乔治·雅西
Jeffries, Peter,	杰夫利斯, 彼得

Jenks, L. H.,	金克斯
Jenssen, Otto.	奥图·金森
Jevons, W. S.,	杰丰斯
Jewkes, Sawers & Stillerman,	久克斯, 萨涅尔斯, 斯蒂勒曼
Joachim Hirsch	约希姆·黑尔什
Johnson, H. G.,	约翰逊
Jorgan Randers	约根·兰道尔斯
Jourdain, Gilles,	约尔丹, 盖尔斯
Julee, Pierre	加里, 皮叶
Junne, G.,	容尼
Kaemmel, Ernest,	凯莫尔, 厄尔尼斯特
Kahn, Hermann,	赫尔曼·卡恩
Kalachek, E. D.	卡拉契克, 艾德瓦尔德
Kaldor, Nicholas,	卡尔多尔, 尼古拉斯
Kalecki, Michal,	米恰尔·卡列基
Kant, Immanuel,	康德
Kanzow, Eckhard,	堪佐, 艾克哈德
Kaufman, R.,	考夫曼
Kautsky, Karl,	考茨基
Kay, Geoffrey,	卡伊
Kaysen, Carl,	卡尔·凯森
Kemp, Tom,	肯普, 汤姆
Kerensky, Alexander,	克伦斯基
Keynes, John Maynard,	凯恩斯
Kidron, Michael,	吉德隆, 米契尔
Kindleberger, C. P.,	金德伯尔格, 查尔斯
King, W. T. C.,	金
Kingsley, J. Donald,	金斯莱, 唐纳德

Knoppers, Antonie T.,	瑙波尔, 安东尼
Kofler, Leo,	考夫勒
Kohlmey, Gunter,	贡特尔·考梅尔
Kolke	科尔科
Kondratieff, Nikolai	康德拉系耶夫, 尼古莱
Kosik, Karel,	科西克, 卡列尔
Kossack, G,	科萨克
Kozlik, Adolf,	科兹里克, 阿道尔夫
Kriellaars, F. W. J.,	克利拉斯
Kritzman, Leo N.,	辽·克利茨曼
Kruse, Kunz & Uhlmann,	克鲁斯, 康恩茨, 乌尔曼
Kuczynski, Jurgén,	库钦斯基
Kugelmann, Ludwig,	库格曼
Kuhn, Thomas S.,	汤姆斯·库恩
Kulischer, Josef,	库利舍尔, 约塞夫
Kumps, Anne-Marie,	安纳玛丽·库姆普斯
Kuusinen, V.	库辛年
Kuznets, Simon,	库兹尼茨
Laclau, Ernesto,	拉克鲁, 厄尔涅斯多
Landes, David,	大卫·兰茨
Lange, Oskar,	奥斯卡·兰格
Lanzillotti,	兰齐罗蒂
Lapinski, P.,	拉宾斯基
Lapple, Dieter,	迪特尔·拉普尔
Lassalle, Ferdinand,	拉萨尔
Lattes, Robert,	莱兹
Leasco-Pergamon	里斯科—波尔加芒
Lee Hansen	李·汉森
Lefebvre, Henri,	莱菲夫列, 亨利

Lefevre, Theo,	勒菲弗尔, 西奥
Leiman, Melvin,	雷曼·米尔文
Lemnitz, Alfred,	列姆尼茨, 阿尔夫莱德
Lenin, Vladimir Ilyich,	列宁
Leontief, Vassili,	列昂捷夫
Lessure, J.,	莱舒尔
Lettieri, Antonio,	莱蒂厄利, 安东尼奥
Levinson, Charles,	莱芬逊, 查尔斯
Levy-Leboyer, Maurice,	列维-列保义尔, 毛里斯
Lewis, Bernard,	伯纳德, 刘易斯
Lewis, W. Arthur	刘易斯·阿萨尔
Lilley, S.,	里莱
Lipson, E.,	里普森
Lobl, Eugen.	尤金·罗布尔
Locke, John,	洛克
Lockwood, W. W.,	洛克伍德
Lohmann, M.,	劳曼
Lorenz, Konrad,	劳伦茨
Lowenthal, Richard,	卢恩塔尔
Ludwig, Helmut,	鲁威格, 黑尔姆特
Lukacs, Georg,	卢卡克斯
Lundberg, Ferdinand,	隆德伯格·菲迪南
Lutz F. A	路茨
Luxemburg, Rosa,	罗莎·卢森堡
Lynn, Frank,	弗兰克·林
Mac Arthur, Douglas,	麦克阿瑟, 道格拉斯
MacRae, Norman,	麦克拉·诺曼
Magdoff, Harry,	马格多夫, 哈里
Mage, Shane,	麦吉, 善因

- |                        |               |
|------------------------|---------------|
| Mairesse, Jacques,     | 迈里斯, 雅克       |
| Mandel, E.             |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     |
| Mansfield, Edwin,      | 曼斯菲尔德, 埃德温    |
| Marcuse, Herbert,      | 马丘斯, 赫伯特      |
| Marini, Ruy Mauro,     | 鲁伊·毛罗·马利尼     |
| Marshall, Alfred,      | 马歇尔, 阿尔夫利德    |
| Marx, Karl,            | 卡尔·马克思        |
| Masse, Pierre,         | 皮叶·马塞         |
| Mata, Hector Malave,   | 海克托·马拉维·马达    |
| Mattick, Paul,         | 麦蒂克, 保尔       |
| Mattison, Alan O.,     | 马提森           |
| Maxwell, Andrew,       | 安德柳·麦克斯威尔     |
| Mayr, Hans             | 迈尔, 汉斯        |
| Means, Gardiner O.,    | 米恩斯, 加迪纳尔     |
| Meier, Bernard,        | 伯纳, 迈尔        |
| Meldolesi, Luca,       | 卢卡·麦尔多莱西      |
| Melman, Seymour,       | 米尔曼, 塞莫尔      |
| Mendelsonn             | 门德尔森          |
| Merrett, A. J.,        | 麦利特           |
| Messadie, Gerald,      | 盖拉德·麦塞迪       |
| Meynaud, Jean,         | 梅瑙            |
| Milgram, Prof.,        | 米尔格拉姆         |
| Miliband, Ralph,       | 拉尔夫, 米利班德     |
| Mill, A.               | 米尔            |
| Milton, John.          | 米尔敦           |
| Minas, Bagicha Singh,  | 星·巴吉查·敏纳斯     |
| Mishan, E. J.,         | 米山            |
| Mitchell, B. R.,       | 米契尔           |
| Mola, Aldo Alessandro, | 毛拉, 阿尔杜·亚力山德鲁 |

Mones, Antonio	蒙恩斯
Monserrat, Antoni	蒙斯拉特
Morf, Otto,	莫尔夫, 奥图
Morris, Jacob,	莫利斯, 雅考伯
Moszkowska, Natalie,	莫斯克夫斯卡, 纳塔里
Mulhall	穆尔豪尔
Muller, Ron,	缪勒, 戎
Muller, Wolfgang,	缪勒·沃尔夫刚
Muller-Plantenberg, Urs	缪勒·普兰敦伯尔格
Munk, Bernard,	芒克, 伯纳德
Murray, Robin,	罗宾·马雷
Myers, O. A.,	迈尔斯
Myint, H.,	迈因特
Nader, Ralph,	拉尔夫·纳德尔
Nagels, Jacques,	纳格尔斯, 雅克斯
Napoleon I	拿破仑一世
Naville, Pierre,	纳维尔·皮叶
Necochea, Hernan Ramirez,	尼科契亚, 赫尔南·拉米列兹
Nell, Edward,	爱德华, 奈尔
Nelson, E. L.,	奈尔森
Nelson, Peck & Kalachek,	奈尔逊, 皮克和卡拉契克
Nelson R. R.	奈尔逊, 理查德
Neumann, Franz,	纽曼, 弗朗茨
Neususs, Christel,	纽萨斯, 克利斯特尔
Newton, Isaac,	牛顿
Nicholson, Max,	尼科尔松, 麦克斯
Nick, Harry,	尼克, 哈利
Nicol, H.,	尼克尔
Nicolaus, Martin,	尼克劳斯

Nikolinakos, Marios,	尼克里纳科斯, 马利奥斯
Nixon, Richard,	尼克松
Nordhaus, William,	威廉·诺多斯
Norton, F.	瑙尔顿
Novack, George,	诺瓦克
Novozhilov	诺伏日罗夫
Nutzinger & Wulstetter	努辛格尔和乌尔斯台特尔
O'Connor, James,	奥康诺尔, 詹姆士
Oakes, Walter J.,	奥克斯, 瓦尔特
Okun, A.	奥孔
Oppenheimer, Franz	奥本海默, 弗朗茨
Oparin	奥巴林
Owen, E. R., J.,	欧文
Packard, Vance,	万斯·派卡尔德
Padmore, George,	巴德莫尔
Paish, F. W.,	派什
Palloix, Christian,	帕劳克斯, 克利斯蒂安
Pareto, W.,	巴列托
Parkin, Frank,	弗朗克·巴尔金
Parvus, Alexander,	巴瓦斯, 亚力山大
Pasukanis, E. H.,	巴苏卡尼
Patterson, Shorey,	帕特森, 绍尔利
Patton, Arch,	巴统
Pavel, T.,	帕维尔
Pearson	皮尔顿
Peck, Merton,	皮克, 莫尔顿
Perroux, Francois,	波尔鲁
Perry, L.	波尔利
Peter Dunn	彼得·杜恩

Perlmutter	波尔缪特尔
Petrowsky, Werner,	皮特罗夫斯基, 伍尔诺尔
Pfeifer, Wolfgang,	菲费尔, 伍尔夫刚
Phelps-Brown, E. H.,	弗尔普斯-布朗
Phillips, Joseph D.,	菲立普斯, 约赛夫
Pigou, A. D.,	皮古
Pilkington	皮尔金敦
Pinto, Anibal	安尼巴尔·品脱
Polak	波拉克
Pollock, Friedrich,	波劳克, 弗里德里希
Pompidou, Georges,	蓬皮杜
Popper, Karl,	波普尔
Pornschnegel, Hans	汉斯·波恩什莱格
Porroux, Fransoir	波尔鲁
Portal, Roger,	波特尔, 罗吉尔
Potter	鲍特尔
Poulantzas, Nicos,	普兰察斯, 尼科斯
Powell, Enoch,	鲍威尔
Prager, Theodor,	普拉格尔, 西奥多
Prebisch, Raul,	普利比什, 鲁尔
Proudhon, Pierre-Joseph,	蒲鲁东
Proxmire	普鲁克斯迈尔
Quesnay, Francois,	奎斯奈, 弗朗索瓦
Quijano, Anibal,	奎加诺·安尼巴尔
Ranis, G.,	兰尼斯
Raphael, Max,	拉菲尔, 麦克斯
Rattray Taylor, G.,	拉特雷·泰勒
Rechard Freeman	理查德·弗里曼
Reinhold Von Der Marwitz	利因豪德·封·德·马维茨

Renner, Karl,  
 Reuker, Hansjorg,  
 Reuss  
 Rezler, Julius,  
 Richard Nelson  
 Ricardo, David,  
 Richta,  
 Ridgeway, James,  
 Riggleman  
 Robinson, Joan,  
 Rolfe, Sidney E  
 Roland N. Mckean  
 Rombravella, Ros  
 Romeo, Rosario,  
 Rosdolsky, Roman,  
 Rosenberg, Hans,  
 Ross, Arthur,  
 Roth, Karl-Heinz,  
 Rothman, Harry,  
 Rowthorn, Robert,  
 Rueff, Jacques,  
 Sachverständigenrat  
 Sader, Emile,  
 Salama, Pierre,  
 Salter, W. E. G.,  
 Sampson, Anthony,  
 Sarc, Omer Selal,  
 Sartre, Léon,  
 Sayers, R. S.,

仁纳, 卡尔  
 鲁克尔, 汉索格  
 鲁斯  
 尤里乌斯·利兹勒  
 理查德·奈尔森  
 李嘉图  
 利契达  
 利奇微  
 利格尔曼  
 约安·罗宾森  
 西德尼·鲁尔夫  
 罗兰·麦克吉安  
 罗姆布拉夫拉  
 罗米欧, 罗萨里奥  
 罗斯多尔斯基  
 罗森堡, 汉斯  
 阿萨·罗斯  
 罗特, 卡尔-海因茨  
 哈利·罗特曼  
 罗托恩  
 鲁厄夫, 雅克斯  
 萨维斯坦迪根拉特  
 萨德尔, 艾米尔  
 皮叶·萨拉马  
 萨尔特尔  
 安东尼·萨姆普逊  
 萨尔斯, 欧莫尔·塞拉尔  
 列兹·萨特尔  
 萨伊尔斯

Schelsky	舍尔斯基
Scherer, Frederick M.,	舍若尔
Schmidt, Conrad,	施米特, 康拉德
Scholler	绍勒尔
Schultze, Charles O.,	舒尔策, 查尔斯
Schulz-Hansen, Klaus,	舒尔茨-汉森, 克劳斯
Schumpeter, Joseph,	熊彼特, 约赛夫
Schwartz, Anna Jacobson,	什瓦茨, 安娜·雅考伯森
Schwartzmann, D.,	什瓦茨曼
Scitovsky, Tibor,	西托夫斯基, 蒂波尔
Secombe, Wally,	塞康伯, 瓦利
Seelow	西罗
Sereni, Emilio,	塞伦尼, 艾米里奥
Sering	塞伦
Servan-Schreiber, Jean-	塞尔万-什莱伯尔, 金-雅克
Jacques,	斯
Shinohara Miyohai	篠原三代平
Shonfield, Andrew,	绍恩菲尔德
Siebricht	塞布利希特
Siemens-Martin	西蒙斯-马丁
Silk, Leonard, S.,	西尔克, 列翁纳德
Simmonds, Kenneth,	西芒兹, 肯尼特
Smilianskaya, I. M.,	斯米里昂斯卡亚
Smirnov, V. A.,	斯米尔诺夫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Smith, Gerald W.,	盖拉德·斯米士
Smith, Thomas O.,	斯米士, 汤玛斯
Solmer	索尔摩尔
Spietoff, Arthur,	斯皮托夫

Sraffa, Piero,	斯拉发
Stalin, Joseph,	斯大林
Stanley, J.,	斯坦利
Stern	斯特恩
Sternberg, Fritz,	斯特恩伯尔格, 弗里茨
Stigler & Kindahl	斯蒂格勒和肯达尔
Stocking, George W.,	斯托金
Strachey, John.	斯特拉契
Struik, D. J.,	斯特鲁伊克
Strumilin, S.,	斯特鲁米林
Studensky	斯图顿斯基
Subrahmaniam, K. K.,	苏布拉哈曼尼亚姆
Sudha H. Shenoy	苏达·申诺伊
Sutcliffe, Bob,	萨特克利夫, 保伯
Sulzer	苏泽尔
Svennilson, Ingvar,	斯芬尼尔逊·因格瓦尔
Sweezy, Paul,	斯威茨
Sylos-Labini, Paolo.	塞洛斯拉比尼
Taff-Hartley	塔夫脱-哈特莱
Tambia, S. J.,	台姆比亚
Taylor, A.,	泰勒
Temple, Philippe,	菲立普·泰姆普勒
Terborgh, George,	泰尔堡
Thorez, Maurice,	多列士
Timberlake-Weber, Hilde,	蒂姆伯莱克-韦伯尔, 海尔德
Tinbergen	廷勃尔根
Triffin, Robert,	特里芬
Trotsky, Leon,	托洛斯基
Tsuru, Shigeto,	多留重人

Tugan-Baranovsky Mikhail,	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米海尔
Tugendhat, Christopher,	图根达特, 克利斯托弗
Ure	乌列
Usher, A. P.,	乌舍尔
Usinor	乌辛诺
Valier, Jacques,	瓦利尔, 雅克斯
Van Gelderen, J.,	范·盖尔德伦
Vance, T. N.,	万斯
Varga	瓦尔加, 尤金
Verhaegen, Benoit,	费尔海根
Vernon, Raymond,	费尔农, 拉伊芒
Villari, Rosalio	维拉利, 罗萨里奥
Vilmar, Fritz,	威尔玛, 弗里茨
Von Bortkiewicz, Ladislaus,	封·波尔特吉耶威茨, 拉迪斯 劳斯
Von Clemm, Michael,	米契尔·封·克莱姆
Von Hayek, F. A.,	封·海克
Von Kempski, Jurgen,	封·开姆普斯基
Von Waltershausen, Sar- torius,	萨托利乌斯·封·瓦尔特尔绍 森
Watkins, Myron W.,	瓦特金斯, 麦伦
Webb, A.,	韦伯
Weber, Max,	韦伯尔
Weidenbaum, Murray,	马雷·威登保姆
Weigel, Dale,	代尔·威格尔
Weinberg, Nat	温伯格, 纳特
Weinstock, Ulrich,	魏因斯托克, 乌尔利希
Weiss, Dieter,	威斯, 迪特尔
Weston, J. F.	威斯顿

White, Lawrence,	怀特, 劳伦斯
Whyte, William H.,	威廉·怀特
Wilber O, K.,	威尔伯尔
Williams, B. R.,	威廉斯
Williams, Eric,	艾里克
Williamson, Oliver R.,	威廉森, 奥里弗
William Randers	威廉·兰道尔斯
William W. Behrens III	贝伦斯三世
Wilson, Charles,	威尔逊, 查尔斯
Wilson, Charles E.,	威尔逊, 查尔斯
Wojtichow, A. P.,	渥蒂耶科
Woronoff, A. D.,	伍龙诺夫
Wright Mills, C.,	赖特·米尔斯
Yaffe, David,	雅菲, 大卫
Yates, Lamartine,	拉马丁·伊茨
Yewdall, Gordon	犹德尔, 高尔东
Young, Allan H.,	扬, 阿兰
Zahn, Ernest,	扎恩, 厄尔尼斯特
Zarnowitz	查诺威茨
Zeleny, Jindrich,	金德里契, 紫林尼
Zieschang	齐尚, 库尔特
Zschocke, Helmut,	茨丘克, 海尔莫特